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四十九卷



東海大學文學院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四十九卷

*Volume 49*

- 
- |              |                          |  |
|--------------|--------------------------|--|
| 發行人          | Publisher                | : 程海東 Chen, Hay-dn H.D<br>(東海大學校長)   |
| 編輯委員會<br>召集人 | Editorial Board<br>Chair | : 丘為君 Chiu, Eugene W<br>(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長)  |
| 執行編輯         | Editor in Chief          | : 吳福助 Wu, Fu-Chu<br>(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 編輯委員         | Editors                  | : 戴絲美 Desmet Mieke K.T.<br>(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br>陳計堯 Chan, Kai-Yiu<br>(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br>蔡家和 Tsai, Chia-He<br>(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br>北川修一 Kitagawa Shuichi<br>(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
| 顧問委員         | Advisers                 | : 王孝廉 Wang, Siao-Lian<br>(日本西南學院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教授)<br>施懿琳 Shih, Yi-Lin<br>(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兼主任)<br>陳靖奇 Chen, Ching-Chi<br>(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br>陳文豪 Chen, Wen-Hao<br>(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br>楊祖漢 Yang, Cho-Hon<br>(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br>中畠孝幸 Nakahata Takayuki<br>(日本甲南大學文學部日本語日本文學科教授) |
| 助理編輯         | Editorial Assistant      | : 王嘉弘 Wang, Chia-Hung  |
-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出版  
Published in July, 2008
- 封面、封底繪圖：陳瑞州
- 刊名：清陳鴻壽書體 陳菽玲集字
- 出版者：東海大學 Published by Tunghai University
- 印刷者：逢甲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 19 巷 5 號 04-24518187  
E-mail: fctpc@ms71.hinet.net
-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四十九卷

## 目 錄

### 〔論文〕

1. 東漢碑刻發展及研究概況深析……………陳星平 …… 1
2. 《老殘遊記》中的知識份子……………紀俊龍 …… 37
3. 變調的物候——黃文儀的季節書寫……………許惠玫、廖美玉 …… 67
4. 乙未抗日相關文獻所見臺灣漢人抗日份子形象  
——以簡大獅、詹振爲例……………王嘉弘 …… 99
5. 臺灣蔡國琳藏書考略……………楊永智 ……121
6. 施梅樵的風月書寫探析——以女性主題爲對象……………林翠鳳 ……141
7. 從左拉「實驗小說論」觀點探討戰後臺灣自然主義小說……………唐毓麗 ……165
8. 李炳南教授對淨土法門在台流佈之貢獻……………吳麗娜、陳美惠 ……199
9. 孤絕與再生——從白先勇筆下到曹瑞原鏡頭下的《孽子》……………許建崑 ……225
10. 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中的「國家是父親」隱喻……………陳瓊婷 ……245
11. 霹靂布袋戲特殊人物之造型符號探析……………黃敬欽 ……283
12. Saul Bellow and Moses Herzog:  
Vague and Problematic Discourses in Herzog……………Wu, Pin-hsiang Natalie ……311
13. Transfer with no parameter resett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ubjects……………Stano Kong ……333
14. Tunghai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 Program……………James Sims ……353
15. On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Word Correspondence in Translation  
…………… Chuo, Chih-Cheng、Chen, Hsiao-Ching ……375
16. 實在與幻化——《蛙氏奧義書》與《喬氏釋義》的實有論分析……………鄭芷人 ……391
17. 日本における失語症者の言語回復過程の一考察……………紀朝榮 ……435

18. 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が使い続ける日本語の意義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 の母語定義の観点から——  
 .....松尾慎、横川彰 .....463

〔書評〕

1.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考古學·兩周卷》評介.....劉慶柱 .....485  
 2. 奇文解楚騷，妙理注宋賦——吳廣平《宋玉研究》、《楚辭全解》評介...蘇慧霜 .....489  
 3. 普及與提高兼顧，繼承與創新並重——吳福助《楚辭註釋》評介  
 .....張玉金、王 琨 .....501  
 4. 楚辭研究中的夜光珠——吳福助《楚辭註釋》評介.....方 銘 .....509  
 5. 雅俗共賞的楚辭學佳作——《楚辭註釋》評介.....張顯成 .....515  
 6. 人性眼光，史家情懷——《中國文學史新著》評介.....馬世年 .....523  
 7. 史華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中譯商榷.....張端穗 .....533  
 8. 葉嘉瑩的詩詞道路軌跡.....徐志嘯 .....543  
 9. 《現代新詩美學》評介.....洪靜芳 .....557

〔學術活動報導〕

1. 秦阿房宮遺址考古新發現與新思索——意料之外考古發現的科學啓迪  
 .....李毓芳 .....563

〔附錄〕

1.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中文撰稿格式 .....569  
 2.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外文撰稿格式 .....571  
 3. 『東海大文學院學報』日本語論文執筆要綱 .....575  
 4. 更正啓事 .....學報編輯委員會 .....577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1-36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1-36

# 東漢碑刻發展及研究概況探析<sup>1</sup>

陳星平\*

The analysis in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n the tablet  
carving in the East-Han Dynasty.

by  
Chen, Hsin-Ping

關鍵詞：碑刻、書法、東漢

**Keywords:** tablet carving, calligraphy, the East-Han Dynasty.

---

<sup>1</sup> 本文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6-2411-H-150-001-獎助，此為研究計劃成果的部份內容，謹此致謝。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 〔提要〕

中國碑刻的歷史雖然不及西亞、北非等地那麼悠久，但多以文字銘文為主，故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其形成與發展有相當長的歷史，周代應是碑刻的原始期，僅作為入葬時下棺工具；秦始皇勒石紀功，不稱碑而稱「刻石」；碑的形制在西漢中期前並無固定形狀，武帝之後才有了雛形；之後，臣子為追述君父的功美，書刻褒彰業績的銘文，從而產生了今日所稱的「碑」。第一塊自銘為「碑」的是東漢順帝永建三年（128年）刻立的《王孝淵碑》，其碑文有墓主的卒葬日期、職官，而且還有頌辭，東漢碑刻在此時成熟定型；因厚葬豎碑立傳之風盛行，至桓靈之時，達到極盛。

東漢碑刻成熟的原因應是多方面的，因煉鋼技術的進步，建立了石碑流行的物質基礎、標識墓葬習慣的普及、厚葬風氣盛行、東漢崇尚名節，墓前立碑成為名垂青史的指標，加上當時墓前立碑的制度存在嚴重缺陷，百姓也可不經批准隨意立碑，因此，東漢石碑大量產生。

東漢立碑風氣盛行，雖導致部分碑文浮誇不實而為人所詬病；但這些豐富的資料正足以成為研究當時文化社會相關現象的重要線索，其碑刻書體也成為了解東漢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彌足珍貴，成為書法、文字發展演變的可靠見證，為研究漢字的演變和漢代書法藝術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資料。

##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ablet carving is not so long as that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But Chinese tablet carvings were mostly done with inscriptions and specifically valuable in documents. It had long history of 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tablet carvings must have been in the Jou Dynasty as the accompanied items of the coffins in a burial service.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Chin Dynasty carved rocks to show his merits, while called it “carving rocks” and not tablets. The tablets had no definite style before the West-Han Dynasty.



It was not in embryo till the period after the Han-Wu emperor. Since then, the courtiers carved inscriptions to commemorate their monarchs on the rocks as coming to be the tablets we call now. The first self-called tablet was “Wang Shiaw-Juan tablet ,established in A.D.128-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huenn emperor in the East-Han Dynasty.

The epitaph had death date, burial date, official title and eulogies fir the death. The tablets of the East-Han Dynasty had final draft till then. The prevalence of solemn funerals and establishing tablets had made tablet come to its utmost in the period of the Huan and Ling emperors. There were many sided caused for the tablet carving to be mature in the East-Han Dynas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eel skill set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evalence of the tablets. The popular habits of marking burial, solemn burial, worshipping honors, and establishing tablets become an indication to leave a man in history. Besides, there had been serious defects in the system of establishing tablets. People could do randomly without permission. That’s the reason the tablets had appeared in great quantities.

The prevalence of establishing tablets in the East-Han Dynasty had led to criticism due to some superficial epitaph. The abundant data can be important clews to study the related cul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a at that time. The tablet carving styles can be important and precious records to understand the calligraphy arts in the East-Han Dynasty. That would be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nd letters, provide perfect data for the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Han letters and calligraphy arts in the Han Dynasty.

## 一、碑刻發展概述

書法藝術與各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哲學、各類文藝的發展以及社會習俗等，有著緊密的關聯。中國書法之風格變化繽紛，所謂「漢人尚氣、魏晉尚韻、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趣、清人尚樸」<sup>2</sup>之說，即反應出不同時代的書法風格與書法美學思想的發展變化，而這些書法藝術之發展趨勢則取決於時代和社會的發展。

以王羲之書風為核心的帖學傳統，發軔於魏晉之際，在唐初蔚然成為正統。直到 17 世紀，書法家取法古拙質樸的金石銘文，書法品位發生了重要變化，並且在 18 世紀發展成碑學傳統，帖學的一統一天下不復存在，在過去的三百年中，碑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對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性，相當於印象派繪畫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雖然治中國書法史的學者都承認碑學的重要性，但相關的系統研究卻寥若晨星。關於這個課題的中文學術界成果主要有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研究》一書，和為數不多的一些散見於書刊中的論文或章節，在西方藝術史界，雷德侯的《清代的篆書》是唯一詳細研究碑學的西方著作<sup>3</sup>。

碑學研究中，對於碑額的研究更是稀少，除未見有完整系列之專題研究，大多數僅止於在論述碑文時簡單說明碑額內文和風格簡述而已；再加上碑刻自身的特點，以往主要依靠拓本的椎揚與流傳，但對碑額的輕忽，以至於在拓碑時往往忽略碑額，導致多見碑文拓本而不見碑額拓片；隨著時間推移，有的佚散、有的損毀、有的殘缺，有的則可能被竄改得面目全非，導致碑額資料散亂而不集中。而迄今未見全面性的探討碑額之價值與內涵，這對於碑刻書法之研究是美中不足之處。

今日我們所稱的「碑」，其形成與發展其實有著相當長的歷史。趙超認為：

隨著生產工具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充分利用石料做建築材料，進而在石塊上雕

---

<sup>2</sup> 參考〈中國書法網〉網址：<http://www.zgsfw.net/Get/sxly/122006887.htm>

<sup>3</sup> 參見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2006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頁 2。

刻各種圖像，刻寫銘文。公元前約 8000 至 7000 年的西亞耶利哥遺址中已經出現了石築的望樓和城樓，公元前 3500 至前 3100 年的西亞烏魯克文化出現了刻有文字的石板和雕有圖像的石碑，公元前 3100 至前 2686 年的古埃及早王朝時代有了石碑和石建築，公元前 2686 至前 2181 年的古王國時代便有了大量的石質神廟、金字塔和宏偉的方尖碑。這些都展現了石刻歷史的源遠流長，幾乎與人類的文明史一樣古老<sup>4</sup>。

由上可知，樹立碑石是在西亞文化、古埃及等古代文明中常見的現象，且遠遠早於中國，因此也勢必產生廣泛的影響。他又說：西漢自武帝始，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日廣，而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在漢代以前的出土器物中，很少見到外形與漢碑相似的。漢碑的圭首、圓首、上部以圖案裝飾、表面精工磨製等形制特點，卻可以在遠早於漢代的北非、西亞乃至中亞古文化碑刻及遺物中找到先源。由此可見，東漢碑石的外形，很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sup>5</sup>。中國碑刻的歷史雖然不及西亞、北非等地那麼悠久，但多以文字銘文為主，故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

在中國，「碑」這名詞在先秦文獻中已出現，如《儀禮·聘禮》所言：

「賓自碑內聽命，…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sup>6</sup>」

「鉦一宰，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sup>7</sup>」

《禮記·祭義》言：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孔穎達疏：「麗，

<sup>4</sup>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頁5。

<sup>5</sup>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頁12~13。

<sup>6</sup> 《十三經注疏4儀禮》（台北：藝文印書館），卷23，頁271。

<sup>7</sup> 《十三經注疏4儀禮》（台北：藝文印書館），卷21，頁255。

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編貫碑中，君從此待之也。<sup>8</sup>」

《禮記·檀弓下》：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絰繞，天子六絰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絰二碑，碑如桓矣。<sup>9</sup>」

《禮記·喪服大記》又云：

「君葬用輶，四絰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絰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絰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孔穎達疏：「“四絰二碑”者，絰有四條，條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絰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二絰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絰各穿之也。……“二絰無碑”者，手縣下之。」

「凡封，用絰去碑負引。」鄭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sup>10</sup>」

由上可知，先秦當時所稱之「碑」，用處有三：其一是作測日影的日晷，其二是豎於廟門用來繫牲口的柱子，其三是豎於槨四角以引棺入墓的豎木；這些均指沒有文字的豎石或豎木，與日後石刻之「碑」有別。

<sup>8</sup> 《十三經注疏 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卷 47，頁 812。

<sup>9</sup> 《十三經注疏 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卷 10，頁 188。另，《十三經注疏 2 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卷 15，頁 502：〈小雅·采芣〉：「汎汎楊舟，紼纒維之。」鄭氏箋：「紼，絰也。」孔穎達正義引孫炎曰：「紼，大索也。」可知，紼、紼，爲下葬時拉引靈柩入墓穴的繩索。

<sup>10</sup> 《十三經注疏 5 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卷 45，頁 789~790。

也就是說，周代應是中國墓碑的原始期，但此時墓碑僅作為入葬時下棺工具，稱為「豐碑」，上無銘文，但其豎石、帶穿的基本形制已經出現，現存紹興大禹陵的「窆石」，范邦瑾認為應是先秦遺制<sup>11</sup>。今日所稱之墓碑，無疑應源於墳墓用的「豐碑」。這種「豐碑」最初「斲大木為之」，可能因易爛壞，後改石製。因此，馬衡認為漢碑「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暈者，乃墓碑施鹿盧之遺制」<sup>12</sup>。而且由於這種醒目的豎木能有標識墓葬方位的作用，於是「碑」又由下棺的木質轆轤基架<sup>13</sup>逐漸變成石質的「墓表」，但仍是無文字的豎石<sup>14</sup>。後來才又在無字的豎石上書刻死者姓名、籍貫等少量文字。

秦始皇平定六國後，到處勒石紀功，不稱碑而稱「刻石」。西漢時期用於墳前的刻石也不稱碑，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戰國到西漢是墓碑的醞釀期，此時各類墓前題銘材料及記功刻石相繼出現，但尚未出現在有穿孔的豎石上刻字題銘這一形式和自銘為「碑」的刻石。因此，碑的形制在西漢中期以前並無固定形狀，在武帝之後才有了雛形<sup>15</sup>。之後，臣子為追述君父的功美，才書刻大量褒彰業績的銘文於墓表之上，從而產生了今日所稱的「碑」。漢·劉熙《釋名·釋典藝》中就說：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sup>16</sup>。

<sup>11</sup>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年版）頁50、62。其云：「現存紹興大禹陵的「窆石」傳為禹下葬時所用，當其遺制。」「窆石傳為夏禹之物固甚可疑，然據上刻東漢永建元年（126年）等歷代題銘，說它是先秦遺物當是可信的。」

<sup>12</sup>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台北：明文書局，1981年9月初版）〈中國金石學概要下〉卷二，頁69。

<sup>13</sup> 1986年陝西鳳翔秦公大墓中，曾發現四座無字豎木的巨碑實物，當時引棺入墓的轆轤基座（高1.7~2米，直徑0.4米的木柱）。（仲威《碑學10講》，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sup>14</sup> 1996年在河南省新鄭市黃帝故里西側600米處的戰國韓國宗廟遺址，發現一塊「無字碑」。整體成圭形，下半部中間有一穿孔，質地是灰色砂岩。全長3.25米，寬0.45米，厚0.25米。此碑是戰國時期韓國太廟所立之碑，這比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漢代石碑還要早數百年，被譽為「中華第一碑」。（參見仲威《碑學10講》，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頁2~3）

<sup>15</sup>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書法》1988年第4期，頁10~15，另見《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年版）頁24~36。

<sup>16</sup> 漢·劉熙《釋名卷6·釋典藝第20》，百部叢書集成之84《小學彙函》（第一函）（台北：藝文印書館，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亦曾說：

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石碑碣，卒不可得<sup>17</sup>。

立石書刻文字並有固定形制的「碑」，一直到東漢才產生。也就是說，東漢墓碑的形成是經過不同歷史時期逐漸演化發展的結果。王思禮、賴非〈漢碑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中將碑石形制發展分為三期，第一期為「無固定形狀期」（秦至西漢武帝時）、第二期為「雛型期」（西漢武帝後—東漢初）、第三期為「定型期」（東漢中晚期），指出《王孝淵碑》、《景君碑》時碑已定型，至桓靈二朝才達到鼎盛階段<sup>18</sup>。

東漢初年應是墓碑的轉化期，例如：東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袁安碑》出土時首部已殘，但有穿，所以是現存最早帶穿孔的豎石上刻字的碑石，其形制已與後來的墓碑沒有甚麼區別。但其碑文雖然有墓主的履歷、卒葬年月，但是沒有頌辭。因此，從功能上講，未具墓碑的歌功頌德的作用，亦可推論當時的碑外觀形制已基本成熟定型，只是碑文還未定型<sup>19</sup>。類似的還有東漢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的《袁敞碑》。

第一塊自銘為「碑」的墓石是東漢順帝永建三年（128年）刻立的《王孝淵碑》<sup>20</sup>，其碑文有墓主的卒葬日期、職官，而且還有頌辭，所以，徐玉立認為此時東漢墓碑的碑

---

1967)

<sup>17</sup>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見《石刻史料新編 24 目錄題跋類》（新文豐出版社）頁 17869。

<sup>18</sup> 王思禮、賴非〈漢碑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漢碑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90年版）頁 24~36。

<sup>19</sup> 《袁安碑》石高 1.53 米，寬 0.74 米，出土時首部已殘，且有穿。其形制已與後來的墓碑沒有甚麼區別。只是因為其上部殘損，我們還無法知道它是圭首、圓首而已。見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 18。

<sup>20</sup> 1966年於四川省成都郫縣犀浦二門橋出土「王孝淵碑」，高 2.35 米，寬 0.96 米，碑文 13 行，刻於東漢永建三年(128)六月，且自名為碑，是目前所能見到自名為「碑」的最早實物，見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頁 67~71。

另見范邦環〈東漢墓碑溯源〉《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年版）頁 62 注 17 云：「在《王孝淵碑》前有《戚伯著碑》和《李昭碑》雖亦自銘為碑，但《戚伯著碑》僅書“大歲丁亥”無確切建年；《李昭碑》據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四和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一疑為偽作，今二碑原石均佚，難以查證，故不取。」

文也已成熟，不再是簡單地刻寫墓主的姓名，以起標識墓域的作用；碑刻的內容已成為一種新體裁的文章，有了歌功頌德的作用，所以他認為東漢墓碑在此時成熟定型<sup>21</sup>。而《北海相景君碑》（漢安二年即公元 143 年立）和《武斑碑》（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 147 年立）的出現，則標誌墓碑大量湧現的到來<sup>22</sup>。

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范邦瑾則認為《王孝淵碑》出土於磚券墓中，且正面向墓室，是用作護壁的，其形制也與東漢普遍盛行的立在墓前帶有穿、暈的碑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特例。因此，他認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真正是在墓前帶有穿孔的豎石上刻字，又自銘為「碑」並有墓主生平事迹和頌辭，具有標誌墓地和歌功頌德作用的，目前所見恐怕要以立於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的《武斑碑》為最早了；也就是說他認為《武斑碑》才「標誌著墓碑已完成其不斷演進發展的過程。這時的墓碑從形制、內容文體到刻立目的等均已基本定型」<sup>23</sup>。

前三者說法對於東漢墓碑成熟定型的時間點都認為在東漢中後期，但具體表述上略有不同；主要差異性在於對《王孝淵碑》刻立目的與形制的認知差異；徐玉立認為其被改用在一座晉代墓葬中作護壁使用，但與王思禮、賴非均認為已具碑的成熟型式；但范邦瑾認為其用作護壁，且形制也與東漢普遍盛行的立在墓前帶有穿、暈的碑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特例。范邦瑾認為須從形制、內容文體到刻立目的三項要點去界定碑的成熟與定型化。

史書中有關東漢碑刻記載如下：

《後漢書》卷三十九記載了淳于恭仕於王莽末年，「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亨，恭請代，得俱免。…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五年，…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sup>24</sup>」雖不能認定這種「刻石表閭」就是墓前刻石，但是這種彰顯德行的刻石，在章帝（即肅宗）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時仍尚未稱碑。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言：韃為孝女叔先雄為悼父，而自投水死，

<sup>21</sup>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頁 18~19。

<sup>22</sup>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頁 18~19。

<sup>23</sup>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 年版）頁 60~62。

<sup>24</sup>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二》（鼎文書局）卷三十九〈劉、趙、淳于、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頁 1301。

「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sup>25</sup>」順帝永建初年時，這種爲彰顯德行的刻石已稱「碑」，最晚不會超過於永建七年（131）。

《後漢書》卷二十三「順帝初，（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sup>26</sup>」也就是說，至少到了順帝永和五年（140），這種爲彰顯德行的刻石除已稱「碑」外，而且「辭」也有專人撰寫了。

再者，《後漢書》卷五十二記載崔瑗「漢安初，…病卒，年六十六。…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凡五十七篇。<sup>27</sup>」崔瑗卒於順帝漢安二年（143），徐玉立因此推測「順帝在位十八年，正是崔瑗的人生後期，如果說他所著的『碑』都是在五十歲以後寫成的，那麼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碑』在順帝之初或在安帝之末已經成熟。因爲它已經有別於其他文學形式而存在了。<sup>28</sup>」

「碑」既在順帝漢安時期前已成一專有文體，代表其形式已相當成熟，其時間點比范邦瑾所主張的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武斑碑》再早一些，因此，透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推測碑應是在順帝時期成熟定型的；也就是說，此時東漢墓碑已完成了從原始的「下棺以繚繞」到「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的轉化，象徵著墓碑的性質與目的已經有根本上的轉變，東漢墓碑形制至此時發展成熟。

更由於厚葬豎碑立傳之風盛行，上自帝王，下至庶民，莫不豎碑，至桓靈之時，達到極盛，數量相當可觀，劉勰《文心雕龍》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sup>29</sup>」足見東漢碑碣之盛。

---

<sup>25</sup>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鼎文書局）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頁 2799~2800，其文：「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sup>26</sup>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鼎文書局）卷二十三〈竇融列傳第十三〉，頁 822。

<sup>27</sup>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鼎文書局）卷五十二〈崔駰列傳第四十二〉，頁 1724。

<sup>28</sup>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 19。

<sup>29</sup> 劉勰《文心雕龍》卷三〈誄碑〉第十二。



直到魏晉之際，魏武帝<sup>30</sup>、晉武帝<sup>31</sup>出於遏制侈靡的社會風氣和維護自身統治，曾先後詔令廢棄厚葬，嚴禁豎碑的行政命令。此舉雖使盛行一時的墓碑從地面上消失，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民間喪葬習俗，反而成爲促使墓碑向墓志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型因素<sup>32</sup>，可說是對於後世墓碑的發展演變產生極大作用。

東漢立碑風氣盛行，導致部分立碑者爲表彰死者生前事蹟，故假托高門，誇稱德業，使碑文浮誇不實而爲人所詬病；但也因當時立碑風氣之普及，使得這些豐富的資料正足以成爲研究當時文化社會相關現象的重要線索，至今保存下來的石碑或拓本，其碑刻書體也成爲了解東漢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彌足珍貴，成爲書法、文字發展演變的可靠見證，爲研究漢字的演變和漢代書法藝術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資料。

## 二、東漢立碑盛行緣由

現存的西漢晚期廡校禹刻石、新莽萊子侯刻石等在形制上仍處於碑初具雛形的萌芽狀態，仍在石面上刻劃界格，仿效簡牘文書的書寫格式，表現出它的原始性<sup>33</sup>。直到東漢順帝時期發展成熟而且形成形制完善、獨特的石刻—「碑」，究竟是何原因促使碑刻在此時期迅速發展成爲形制完善的碑刻呢？相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筆者認爲東漢碑刻成熟的原因應是多方面的，它必然受到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藝術等各方面的影響。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層面提出一些看法，例如：物質條件、工藝技術、西方文化影響、史傳的影響、崇尚名節思想、封建制度等角度來思考這個問

<sup>30</sup> 建安十年（西元 205 年），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其曰：「妄媚死者，增長虛僞，而浪費資財，爲害甚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一：「（建安）十年春正月，…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附索引一》（台北：鼎文書局），頁 27）。

<sup>31</sup> 晉武帝司馬炎於咸寧四年（西元 278 年）下詔禁碑，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駭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sup>32</sup> 1973 年於山東高密縣發現熹平四年（175）孫仲引墓志，因此石發現於墓道之內，所以是墓志。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通墓志，也證明墓志在東漢中期就已經出現了。見于書亭、李儲森〈山東高密新發現漢孫仲引墓志〉《書法》1991 年第 4 期，頁 42。參見丁瑞茂《漢鮮于璜碑研究——從鮮于璜碑看漢碑碑形、篆額書風及畫像紋飾》（1996 年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1。

<sup>33</sup> 參考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版）頁 8。

題。

楊寬曾說：

東漢以前，皇帝和官僚的墳墓之前，所有祠堂、闕、表、碑之類都是用木材製成的，到東漢時期，由於豪強大族重視上冢禮俗，講究建築墳墓，再加上煉鋼技術的進步，鋒利的鋼鐵工具便於開鑿和雕刻石材，在建築石祠、石闕、石柱的同時，更流行雕刻石碑了<sup>34</sup>。

楊寬認為碑在東漢之前就有了，但到了東漢，因為物質條件的改變，也就是煉鋼技術的進步，再加上「上冢禮俗」的發展，而導致石碑的流行。這是從物質發展層面來探討碑盛行的原因。

趙超也從文化的層面探究，他說：

促成東漢時期石碑大量產生及定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標識墓葬習慣的逐漸普及，厚葬之風的盛行，西亞北非等西方文化影響的傳入等<sup>35</sup>。

趙超認為當時標識墓葬習慣的普及與厚葬風氣盛行，在加上西方文化影響之下，東漢石碑才因此大量產生與定型下來。

另外，徐玉立〈漢碑說略〉中提出三種原因，他說：

首先是紀傳體史書對人們的影響…以人為本的紀傳史學，是在兩漢時期確立的。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為其代表。……兩書中的「列傳」對人們的影響，這種影響喚起人們要「垂名竹帛」的欲望。…

其次，東漢崇尚名節。…亂世之中，「碑」能在史書之外，為自己彰顯名節而垂之後世，也表現了人們在動盪變化的時代，情感的失落、徬徨，以及對人生價值的追求。

---

<sup>34</sup> 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sup>35</sup>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頁10。

第三，封建制度的不完整，是墓碑成熟的催化劑。兩漢王朝，在有關喪葬制度問題上，屢有詔書，禁民厚葬，然亡人墓前能否立碑歌功頌德，不見完整記述。…碑的成熟定型之初，官府的控制還是很嚴的，是有制度的。或由地方官府逐級上報批准，或由帝王詔令，而且要由「史官」承擔任務。說明人們把墓前立碑與史冊立傳看得同樣重要。同時還存在除官府立碑以外，自己可以立碑的可能。趙岐事就說明了這一點。…東漢時期關於目前立碑的制度從開始就存在嚴重的缺陷。吏民可以自己立碑頌德。正是因為如此，墓碑初現之時，即便是有所規定，也是完全可以被打破的。人們可以不經批准，想立就立。所以它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迅速地成熟。至於桓、靈之際墓碑大面積地涌現，更是國家制度喪亂的寫照，也與當時政治狀況相吻合<sup>36</sup>。

徐玉立認為，東漢尚名節，墓前立碑成爲名垂青史的指標，加上當時墓前立碑的制度存在嚴重缺陷，雖有規定，但是在政治混亂之中，百姓也可不經批准隨意立碑，因此，數量急速增加。

在《後漢書》中由帝王詔命立碑的記載有：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章女順帝初入宮，早卒，帝「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sup>37</sup>」

《後漢書》卷三十九：淳于恭建初五年卒，「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sup>38</sup>」

由官府立碑者，有：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孝女曹娥之父溺死，不得屍骸。娥乃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sup>39</sup>」

<sup>36</sup>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一》（河南美術出版社）頁 20~22。

<sup>37</sup> 《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二》（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卷二十三〈列傳第十三〉，頁 822。

<sup>38</sup> 《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二》（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九〉，頁 1301。

<sup>39</sup> 《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四》（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卷八十四〈列傳第七十四〉，頁 2794。

《後漢書》卷八十四：孝女叔先雄為悼父遂自投水死，「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sup>40</sup>」。

由百姓自立者：

《後漢書》卷七十六：許荆，和帝時任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sup>41</sup>」、

《後漢書》卷六十四：「趙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sup>42</sup>」

可知，除帝王詔命外、地方官府也可立碑，甚至平民百姓也可自由立碑。而且，不論墓主身分仕或不仕，都能在史冊之外立歌功頌德的碑，可說達到相當廣泛的地步。

綜合上述，東漢時期碑刻盛行的原因，是社會多方面現象的反應；其必然是建立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也就是必須有鋒利的鋼鐵工具便於開鑿和雕刻石材，再與社會風俗民情喜愛厚葬的雙重作用下產生的結果。也許立碑文化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但當時若無諸多條件同時作用之下，也不必然能產生這樣的結果；再加上東漢末年政治局面混亂，導致原有的制度規範與限制蕩然無存，形成似乎人人皆可隨意立碑的局面，由此說來，碑刻數量眾多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 三、東漢碑刻研究概述

中國的石刻文字起源較早，現存的石刻文字實物有戰國、秦國的刻石，兩漢承接前代的刻石傳統而發展成熟，因此，兩漢石刻文字在金石學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

---

<sup>40</sup> 同註 39，頁 2801。

<sup>41</sup> 同註 39，頁 2472。

<sup>42</sup> 《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三》（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卷六十四〈列傳第五十四〉，頁 2121。

東漢是碑刻成熟時期，數量相當豐富，其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

回顧歷代碑刻研究情況，最早著錄漢代石刻者，始於後魏酈道元《水經注》<sup>43</sup>，雖非專為漢碑而著，但所載錄漢碑條目卻成爲最早記載漢碑名稱的著作；南朝梁元帝蕭繹集錄碑刻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sup>44</sup>，現雖不存，實開石刻資料專著之先河。後宋人專輯成書而傳於世者，有歐陽修《集古錄》<sup>45</sup>、趙明誠《金石錄》<sup>46</sup>等，「繼而有具錄全文之作也。今所存者，惟洪适《隸釋》<sup>47</sup>一書」<sup>48</sup>；又有纂輯文字者，如劉球《隸韻》<sup>49</sup>、婁機《漢隸字源》<sup>50</sup>等。宋代石刻之學極爲鼎盛，元、明而中衰，少有可觀者<sup>51</sup>，至清代

<sup>43</sup> 見宋·洪适《隸釋》卷二十，頁195~211。朱劍心《金石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7月（臺二版）頁19：「酈道元注《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宋洪适、明楊慎俱輯碑目另刻。）」

<sup>44</sup> 見其所撰《金樓子》第五卷〈著書篇〉，此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六、史部四十二、目錄類二歐陽修《集古錄》下所引。鮑氏知不足齋所刊《金樓子》第五卷〈著書篇〉，止載《碑集》十帙百卷。鮑廷博案云：《隋書·經籍志》：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全文。

<sup>45</sup> 見宋·洪适《隸釋》卷二十一、二十二（歐陽氏集古錄上下），頁211~237。歐陽棐，又撰《集古錄目》二十卷，見宋·洪适《隸釋》卷二十三，頁238~248。

<sup>46</sup> 見宋·洪适《隸釋》卷二十四~二十六（趙明誠金石錄上中下），頁249~283。

<sup>47</sup> 洪适《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第一版、2003年12月第2二刷）出版說明：「洪适字景伯，諡號文惠公，宋代饒州鄱陽人；平生酷嗜隸古，曾編寫了一系列考釋研究漢隸的著作，今僅存《隸釋》、《隸續》。《隸釋》二十七卷，前十九卷薈萃漢魏碑碣一百八十九種，每篇依據隸字筆畫以楷書寫定，繼而進行考釋，其中包括對史實的介紹、碑碣石刻的說明、漢隸文字的考證等等。二十卷之後附錄《水經注》中的漢魏碑目、歐陽修《集古錄》、歐陽棐《集古錄目》、趙明誠《金石錄》、無名氏《天下碑目》中漢魏部分，作爲參證。《隸續》二十一卷是《隸釋》的續編，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原刻散佚，爾後又逐漸集佚成書，今本並非完帙，且體例亦不甚統一。……今據洪氏晦木齋刻本影印。」

<sup>48</sup> 見朱劍心《金石學》頁29。

<sup>49</sup> 劉球《隸韻》，凡十卷，載入《宋史·藝文志》，其碑目所引諸碑，凡二百六十一種，存於今者，不及四分之一。參見朱劍心《金石學》頁31。

<sup>50</sup> 婁機《漢隸字源》六卷，悉依《隸釋》原次，蓋以補洪氏之闕，凡錄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又一，成書時間不詳。參見朱劍心《金石學》頁31。

<sup>51</sup> 朱劍心《金石學》頁35~37：「其存目者，有楊慎之《水經注碑目》一卷，…而楊慎之目，不知宋洪适《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未免贅疣，且精密亦不及适。…存目而附跋尾者，有趙頤之《石墨鐫華》六卷，凡錄碑目二百五十三種。金、元國書，世不多見，則仿集古錄摹載鐘

繼而復興，「兼具存目、錄文、摹寫、跋尾之長，幾於集金石學之大成者，則王昶之《金石萃編》」<sup>52</sup>，而屬通論者則首稱葉昌熾《語石》<sup>53</sup>，其他另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sup>54</sup>、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十二卷<sup>55</sup>等，各家專著，蔚為極盛。

自宋以來，各代雖陸續纂錄碑刻資料，然東漢數量眾多的碑刻，仍難以統計，此乃因碑刻散佈各地，無論平原沃地、荒山窮谷，無處不有，加上時間久遠，保存不易，或因忽視其價值而至隨地毀棄，不知凡幾，導致損失破壞的程度十分嚴重。葉昌熾《語石》曾言：

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遍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酈道元水經注所引，十僅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古刻淪胥，良可惋惜<sup>56</sup>。

主要是說：東漢碑刻遍於郡邑各地，但以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對校《水經注》所錄碑目，僅存十分之四、五；至清代，再以王昶（字蘭泉）《金石萃編》、孫星

---

鼎之例，鉤勒其文。惟所跋詳於筆法，而略於考證。…」

<sup>52</sup> 朱劍心《金石學》頁45：「昶以所藏自三代至遼、金計千五百通而甄錄之，以時代為次，先錄碑文。其文字漫漶鑿於他書者，則為旁注以紀其全。篆隸及古文別體，則摹其點畫，加以訓釋。凡題額，碑陰，兩側，亦必詳載。…書凡百六十卷，蓋頗近於類書之體例。葉昌熾稱其『譬之唐人義疏，經與傳合，注與疏合，實便學者，在金石著錄家可謂集其大成矣。』」

<sup>53</sup> 葉昌熾《語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3月臺二版）全書十卷，均以石刻為論，其自言：自少從事碑版之學，「訪求逾二十載，藏碑至八千餘通，…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徵島索，製作之名義、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弃（度）之源流，以逮摹拓裝池軼聞瑣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釋、非輯錄，但示津塗，聊資談圃…都四百八十六通，分為十卷。」（《語石》敘目）

<sup>54</sup>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六卷，與其跋尾別行，亦同於歐、趙之書。《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共二十八卷。參見朱劍心《金石學》頁39~40。

<sup>55</sup> 朱劍心《金石學》頁39：「自周、秦迄元，約八千種。」其中漢碑數量有196種，見《中國碑文化》（重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序，頁14，提及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中各時代碑刻數量：「漢196」。

<sup>56</sup> 葉昌熾《語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3月台二版）卷一〈前漢一則〉〈後漢一則〉，頁2~3。

衍（字淵如）《寰宇訪碑錄》之碑目對校歐趙之碑目，則僅存十分之二、三而已，對於古代石刻遺失損壞的情形相當感慨。換言之，自古至今，碑刻數量應是相當豐富，惜因時代久遠、自然風化與人為破壞等因素，雖見於著錄者相當豐富，但遺存至今者數量相對而言並不多。

宋·婁機《漢隸字源》所載漢碑有 309 種<sup>57</sup>，規模不可謂不大；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漢碑刻數量有 196 種<sup>58</sup>、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共收兩漢石刻 98 種；現代學者施鰲存《漢碑目錄》共收西漢碑刻 22 種、東漢碑刻 388 種<sup>59</sup>，1965 年時，丁念先曾統計兩漢碑刻見於歷代著錄者有四百種以上<sup>60</sup>、但遺存至今的兩漢石刻僅存有 145 種<sup>61</sup>；2005 年《碑學 10 講》認為現存東漢碑石有 160 塊<sup>62</sup>；2006 年 8 月《漢碑全集》共收錄了 285 種漢碑、360 件資料<sup>63</sup>。近世以來，隨著新資料的不斷發現，兩漢碑刻的總數還在增加；以下，筆者將二十世紀後陸續出土的兩漢碑刻資料整理成〈東漢碑刻出土年表〉，羅列如下：

表一 〈東漢碑刻出土年表〉

編號	出土年月	出土地點	碑刻年代	碑刻名稱	備註
1	1901.7	雲南昭通出土	東漢和帝永元八年（96 年）	《孟孝琚殘碑》	
2	1903	山東莒縣出土	東漢順帝漢安	《宋伯望分界刻石》	

<sup>57</sup> 引自《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張海〈隸書藝術淺識（代序）〉頁 3

<sup>58</sup> 見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 2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19852~19857。

<sup>59</sup> 引自《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張海〈隸書藝術淺識（代序）〉頁 3。

<sup>60</sup> 見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上），《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5 期（1965 年 3 月 15 日），頁 145。其言：「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引用漢碑即有百種之多。歐陽修集古錄收八十多種。趙明誠金石錄收二二一種。洪适隸釋隸續共收二五八種。到了清朝翁方綱撰兩漢金石記，僅收漢石刻七十三種，期間還有重刻者多種。近人方若校碑隨筆收九十種。」

<sup>61</sup> 見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上），《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5 期（1965 年 3 月 15 日），頁 145：「根據八十多家的金石著錄，作一初步統計，除去重覆及偽刻，共有四百多種。其中宋人著錄中的石刻，很多已經不存。而明清人所著錄，有不少是新出土的，為宋人所未及見者。……現存漢石刻，只有一四五種。」其分布地區：山東 54、河南 19、四川 15、陝西 14、河北 9、甘肅 3、新疆 3、江蘇 3、將 2、湖北 1、安徽 1、山西 1、雲南 1、青海 1、韓國 1、未詳 17。

<sup>62</sup> 《碑學 10 講》（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1 版）頁 4：「現存東漢碑石就有 160 塊之多」。

<sup>63</sup> 見《漢隸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張海〈隸書藝術淺識（代序）〉頁 3：〈凡例〉頁 29：「本書採用廣義的漢碑概念，涵括所有種類的兩漢石刻文字，以碑碣為主。」

			三年（144年）		
3	1908	河南開封出土		《偃師開渠等自畫像題字》	
4	1911	陝西長安出土		《朝侯小子殘碑》	
5	1913	河南安陽出土	東漢安帝元初二年（115年）	《子游殘石》、《賢良方正等字殘石》	
6	1913	朝鮮平安道龍岡郡出土		《平山君碑》	註 <sup>64</sup>
7	1919	河南出土		《漢酸棗令劉熊碑》	
8	1921	河南洛陽出土	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	《曹椽史等字殘石》	
9	1922	河南洛陽出土		《熹平石經》殘石《三篇篇鐘殘碑》、《袁博碑》	
10	1926	河北磁縣出土		《處士等字殘碑》	
11	1926	四川雅安出土	東漢獻帝建安十七年（212年）	《上計史王暉造石槨題字》	
12	1926		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靈帝熹平二年（173年）	黃腸石	
13	1927	河南洛陽、孟津、偃師三地接壤地處王窑村出土		《賈仲武妻馬姜墓石》	
14	1929		東漢和帝永和四年（92年）刻	《袁安碑》	
15	1932	河南偃師出土	東漢和帝永元十年（98年）	《東曲里通利水大道刻石》	
16	1937	河南南陽出土		《趙蒞殘碑》	
17	1942	山東東阿縣出土	東漢桓帝永興二年（154年）	《薊他君祠堂刻石》	
18	1943	青海省樂都縣老鴨城出土	東漢靈帝光和三年（180年）	《趙寬碑》	
19	1956	山東肥城縣出土	東漢章帝建初八年（83年）	《肥城漢畫像石闕題字》	
20	1956	河北正定縣出土	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	《中山簡王劉焉墓石》	
21	1956	雲南昆明南郊出土	東漢安帝延光四年（125年）	《延光四年界石》	

<sup>64</sup> 朝鮮平安道龍岡郡，漢時為樂浪郡積彈縣。



22	1957	陝西綏德出土	東漢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	《郭稚文墓畫像題字》	
23	1957	發現於新疆哈密地區巴里坤松樹塘村北草原上	東漢和帝永元三年（91年）	《漢平夷碑》亦稱《漢尚任碑》	註 <sup>65</sup>
24	1957	山東曲阜陶洛村發現		《陶洛殘碑》	註 <sup>66</sup>
25	1958	河南鄆城縣出土		《王君坐榻》	
26	1958	河南南陽市南城整修街道時出土	東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	《張景造土牛碑》	註 <sup>67</sup>
27	1958	山西運城出土		《運城古銅礦摩崖題字》	
28	1962	河南偃師市佃莊鄉太學村附近出土		《熹平石經》殘石	註 <sup>68</sup>
29	1964	洛陽城南郊		刑徒墓地 522 座，出土墓	註 <sup>69</sup>

<sup>65</sup> 李遇春〈新疆巴里坤縣新發現漢任尙碑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4期；胡順利〈關於東漢任尙碑考釋的商榷〉《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1期；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漢唐石刻叢考〉《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4：「《任尙碑》1957年在新疆巴里坤草原被發現。這裡曾出土《裴岑紀功碑》、《沙南侯碑》。李遇春考證碑立於東漢「永元三年」（公元91年），因與《後漢書》載大將軍竇憲派遣任尙大破北匈奴於金微山的時間相吻合，於碑額處補一「夷」字為「平夷碑銘」。胡順利則認為補釋「夷」字不當，因為「東方曰夷」。同時，又認為將該碑考訂為永元三年有可商榷之處。馬雍親自考察實物後，認為該碑應是東漢永元五年（公元93年）所立。馬雍同時還對同出於巴里坤的其他漢代碑刻從文字到歷史背景進行了考釋，並澄清了一些問題。」

<sup>66</sup> 碑已成碎石，一塊最多者存32字，少者1字。碑陽存10石共40多字，碑陰為門生故吏題名。《陶洛殘碑》，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版。

<sup>67</sup> 碑四周皆殘。碑文是南洋太守告知「宛」（今南陽）人的公文，即官府同意張景以「以家錢」造土牛等立春儀式的用具，並以此免除張家勞役的告示。鄭杰翔〈南陽新出土的東漢張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頁1~3。

<sup>68</sup> 陽面存字37字，陰面存84字。引自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2。

<sup>69</sup> 相關漢代刑徒及書法的研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頁2~19；吳榮曾〈漢刑徒磚誌雜識〉《考古》1977年第3期，頁193~196；許景元、李淼〈東漢刑徒磚文及其書法特色〉《中國書法全集 9 秦漢金文陶文》（北京：榮寶齋，1992年10月第一版）

				磚 820 餘塊。	
30	1964	北京西郊石景山出土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	《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柱與石闕》，又稱《烏過哺母等字殘石》	註 <sup>70</sup>
31	1965	山東莒南縣東蘭村出土		《孫仲陽畫像石闕題記》	註 <sup>71</sup>
32	1966	四川成都郫縣犀浦出土		東漢殘碑	註 <sup>72</sup>
33	1966	四川成都郫縣犀浦二門橋出土	刻於東漢永建三年(128)六月	《王孝淵碑》	註 <sup>73</sup>
34	1968	河南偃師市佃莊鄉太學村附近出土		《熹平石經》殘石	註 <sup>74</sup>
35	1970	江蘇徐州出土	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	《彭城王墓封石》	
36	1970	曲阜城南九龍山			註 <sup>75</sup>

<sup>70</sup> 石刻共五件，有刻銘，對研究東漢墓上建築有重要意義。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發現漢代石闕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第11期；郭沫若〈烏過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文物》1965年第4期；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1964年第11期；陳直〈關於漢幽州書佐秦君石柱題字的補充意見〉《文物》1965年第4期；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2~13。

<sup>71</sup> 孫仲陽石闕，是殘存的單闕，闕身由一石構成，下寬上窄，正面和側面刻畫象，右側刻題記：「元和二年…」墓地闕在東漢時期所起的作用，就是作為墓地大門的標識性建築。劉心健、張鳴雪〈山東莒南發現漢代石刻〉《文物》1965年第5期。

<sup>72</sup> 對其性質探討之相關研究：主張「資簿」（或稱「簿書」，漢代為徵收財產稅而編造的登記簿）性質者：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頁67~71；蒙默〈犀浦出土東漢殘碑是泐石「資簿」說〉《文物》1980年第4期，頁68~71；好並隆司、郝雁高譯〈關於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頁60~64；秦暉〈郫縣漢代殘碑與漢代蜀地農村社會〉《陝西師大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2期，頁90~96。主張「分書」（大地主分家析產的書冊）性質者：張勛燎、劉磐石〈四川郫縣東漢殘碑的性質和年代〉《文物》1980年第4期，頁72~73。

<sup>73</sup> 《王孝淵碑》高2.35米，寬0.96米，碑文13行，刻於東漢永建三年（128）六月，且自名為碑，是目前所能見到自名為「碑」的最早實物，見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頁67~71。

<sup>74</sup> 兩面存100多字。引自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2。

<sup>75</sup> 其中10塊刻「王陵塞石廣四尺」，下邊刻「二尺」。（西漢）。見山東博物館〈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報告〉《文物》1972年第5期。

		西漢三號墓出土 封門石 19 塊			
37	1971	陝北米脂出土	東漢安帝永初 元年（107 年）	《牛文明墓室題字》	
38	1973	山東蒼山縣出土	東漢桓帝元嘉 元年（151 年）	《元嘉元年畫像題記》	
39	1973	河南南陽出土	東漢靈帝建寧 三年（170 年）	《許阿瞿墓記》	
40	1973	山東蒼山縣出土		《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 墓題記》	註 <sup>76</sup>
41	1973	南陽市李相莊出 土	東漢建寧三年 （170）	《許阿瞿畫像石題記》	註 <sup>77</sup>
42	1973	天津市武清縣高 村公社出土	東漢延熹八年 （165）	《鮮于璜碑》	註 <sup>78</sup>
43	1973 冬	河南偃師市緱氏	東漢建初二年	《侍廷里父老俾買田約	註 <sup>79</sup>

<sup>76</sup> 同出的畫像石共 11 塊，題刻二石共 327 字，記述了建墓時間、畫像石的內容以及其在墓葬中的位置等。有人認為元嘉元年應是南朝劉宋的元嘉元年（424），但是從墓葬結構、畫像內容及書體看，應是東漢元嘉元年（151）。見山東博物館等〈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考古》1975 年第 2 期；方鵬鈞、張勛燎〈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考古》1980 年第 3 期。

<sup>77</sup> 題記刻於墓室頂部一塊畫像的左側，共 136 字。南陽市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志畫像石〉《文物》1974 年第 8 期。

<sup>78</sup> 此碑在歷史文獻和歷代金石書籍中均無著錄，相關文獻報導：天津市文物館處、武清縣文化館〈武清縣發現東漢鮮于璜墓碑〉《文物》1974 年第 8 期，頁 68~72；天津市文物館處考古隊（敖承隆）〈武清東漢鮮于璜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3 期，頁 351~365；張傳璽〈東漢雁門太守鮮于璜碑銘考釋〉《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2 期，頁 47~60；敖承隆〈關於漢鮮于璜碑釋文〉《文物》1983 年第 8 期；陳直〈考古炳燭談（四篇）——漢雁門太守鮮于璜碑考〉《考古與文物》1980 年第 2 期；日人·荻信雄〈鮮于璜碑〉《書道》第 39 卷 5~7 期，1980 年第 2 期；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頁 13。

<sup>79</sup> 1977 年移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其內容是侍廷里的居民組成一個名「父老俾」的組織，並集資買了一些田產成為大家共用的約定，組織中的成員可以輪流擔任「父老」。還有一些其他規定。石卷的發現為漢代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因而備受學者們的關注。對「俾」性質探討，如下：黃士斌〈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卷〉《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頁 17~20；寧可〈關於漢侍廷里父老俾買田約束石卷〉《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頁 21~27；邢義田〈漢代的父老、俾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俾買田約束石卷」讀記〉《漢學研究》第 1 卷第 2 期（1983 年 12 月），頁 355~377；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俾、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0 月第一版）；杜正勝〈漢「單」結社說〉《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1992 年 10 月），頁 953~970；

		鄉鄭瑤村發現	(77年)	東石卷》	
44	1974	四川都江堰出土	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	陳壹造《李冰石像題記》	
45	1975			《桓弄食堂記》	註 <sup>80</sup>
46	1975	河南密縣出土		「未萃先古」等字殘石	
47	1976	山西臨猗縣關鄉翟村出土	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	《建寧元年殘碑》	註 <sup>81</sup>
48	1978	河南唐河縣湖陽鎮獅子山新店村發現	新莽時期	畫像石墓。	註 <sup>82</sup>
49	1979	山東曲阜城南舞雩台出土		一塊刻石	註 <sup>83</sup>
50	1980	四川成都東郊發現	東漢和帝永元六年(94年)	《王文康闕》、《王君平闕》	
51	1980	山東棗莊張山子鄉發現	東漢熹平三年(174年)	《伯興妻殘碑》	註 <sup>84</sup>
52	1980	山東境內發現	東漢熹平二年(173)	《四神刻石》	註 <sup>85</sup>
53	1980、1990	山東金鄉縣魚山村發現		《襍盜刻石》各一截	註 <sup>86</sup>
54	1980	河南偃師市佃莊		《熹平石經》殘石 661 塊	註 <sup>87</sup>

此文原題為〈「單」的公社還是結社〉《新史學》創刊號，1990年第3期；林甘泉〈侍廷里父老俾與古代公社組織殘餘問題〉《文物》1991年第7期，頁52~59。

- <sup>80</sup> 現藏山東省濟寧市博物館。石呈長方形，左右兩側題記90字，告誡後世子孫「慎無相忘」。「食堂」即漢代墓地上面的祠堂，也稱「廟祠」、「齋祠」，是對死者進行祭祀的地上建築。見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
- <sup>81</sup> 碑殘，存50餘字，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sup>82</sup> 墓內建築構件上分別刻有「鬱平大尹馮君孺人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歲不發」及其他題記。(新莽)見南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唐河漢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 <sup>83</sup> 石上刻二字，皆似篆書「廩」字。(西漢)見：宮衍興《濟寧全漢碑》，1990年版。
- <sup>84</sup> 李錦山、文光《棗莊市發現東漢記年殘碑》《文物》1983年第7期。
- <sup>85</sup> 現藏濟寧市博物館，石為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其刻字內容是對四方之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詮釋。見：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版。
- <sup>86</sup> 前半段存25字後半段存34字，其書未脫盡篆意，早於《萊子侯刻石》，應是西漢中期的遺物。(西漢)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版。
- <sup>87</sup> 其中刻字的有96塊，刻字的內容包括《儀禮》、《春秋》、《論語》等，這些殘石分別保存在洛陽市博

		鄉太學村附近出土			
55	1982.12	山東平度縣灰卜鄉侯家村西山坡漢墓集葬區出土	東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四月	《王舍人碑》殘碑	註 <sup>88</sup>
56	1982	山東高密縣出土		《孫仲隱墓志》	註 <sup>89</sup>
57	1983.2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好穀鄉發現		《昭覺石表》，或稱《五曹詔書》	註 <sup>90</sup>
58	1991.7	偃師市南蔡庄鄉南蔡庄村出土	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四月	《肥致碑》	註 <sup>91</sup>
59	1992	山東榮成市馬道鎮發現		《偉德山鄭玄摩崖題刻》	
60	1995	陝西華陰市西岳廟發現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刻	《西岳華山廟碑》殘石	
61	1995	施安昌在法國巴黎做法藏中國石		五鳳二年（西元前56年）石函銘文的拓本。	註 <sup>92</sup>

物館和偃師市博物館。引自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2。

<sup>88</sup> 平度縣博物館《漢王舍人碑》，齊魯書社，1986年12月版。

<sup>89</sup> 高0.88米、寬0.34米，圭首。從外形看似碑，但比一般碑要小得多，且出於墓葬。《孫仲隱墓志》刻字九行：「青州從事北海高密孫仲隱，故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長。年卅，以熹平二年七月十二日被病卒。其四年二月廿十日戊午葬於此。」據考察，北海高密孫氏在漢代當是大族，《隸釋·隸續》所載《漢安平相孫根碑》也出於此地。見：李儲森、張曉光、孫建華〈山東發現東漢墓志一方〉《文物》1998年第6期。

<sup>90</sup> 〈昭覺石表〉文字記載了有司任命馮佑為安斯鄉有秩，且免除安斯、上諸兩鄉賦稅的文告，是研究東漢行政制度的很好資料。見：吉布初木、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考古》1987年第5期。

<sup>91</sup> 河南偃師文物管理委員會〈偃師縣南蔡莊鄉漢肥致墓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9期；王育成〈東漢肥致碑探索〉《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6年第2期；趙超〈東漢肥致碑與方士的騙術〉《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1期；劉昭瑞〈論肥致碑的立碑者及碑的性質〉《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黃展岳〈早期墓志的一些問題〉《文物》1995年第12期；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13。

<sup>92</sup> 銘為：「唯漢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司隸校尉卜伊討北海，四十戰，卒上谷，火葬家焉。」其書體為隸書，有波挑。」見：施安昌〈關於五鳳二年石函〉《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4期。

		刻拓本的編目和 研究工作時發現			
62	1996	四川三台縣永明 鄉	東漢永和年間 (136-141年)	大型厓墓題刻	註 <sup>93</sup>
63	1998	山東巨野出土		《行事渡君碑》	註 <sup>94</sup>
64	1998 夏	內蒙古自治區包 頭市南郊出土		《建寧三年殘碑》	註 <sup>95</sup>

綜觀上列，二十世紀以來出土漢碑刻資料數量相當眾多，加上歷代文獻資料與保存下來之實物數量頗多，因此，研究整理的工作相對繁雜。對於這些漢碑研究的情況，1965年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曾將歷代漢碑研究的情況分為十類：

- (一) 綜合研究：如宋洪适隸釋、隸續。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 (二) 彙集碑字：如宋婁機漢隸字源，宋劉球隸韻。明李石疊漢隸分韻。清顧藹吉隸辨，清項懷述隸法彙編（此書後來改為隸字彙），清瞿允升隸篇正續。
- (三) 攷釋義例：如清劉寶楠漢石例。
- (四) 解釋經句：如清丁晏漢碑釋經。
- (五) 補訂史傳：如近人徐乃昌續後漢書儒林傳補逸。
- (六) 纂錄碑文：如清馬邦玉漢碑錄文。
- (七) 注釋文字：如近人黃公渚兩漢金石文選評註。
- (八) 彙編碑目：如清王懿榮漢石存目
- (九) 佚碑專考：如清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清許槌古均閣寶刻錄（一名夏承碑考），近人顧燮光劉熊碑考。
- (十) 傳摹集刻：如清錢泳漢碑縮本三十八種。清萬承紀百漢硯碑，清何澂漢碑篆額<sup>96</sup>。

以上對碑刻的研究，主要分類是對碑刻文字的纂錄與釋讀、對史傳的補訂、對字形的彙

<sup>93</sup> 「永和」、「善言者無飯□甘」等字整壁題刻。

<sup>94</sup> 碑形完整，惜字漫漶過甚。據該縣文管所周建軍所長介紹。引自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頁9。

<sup>95</sup> 殘石共三塊，存90餘字。引自魏堅《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sup>96</sup> 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下），《大陸雜誌》第30卷第6期（1965年3月31日），頁196。

編、傳摹以及對單個碑刻的考釋。

近年來，隨著出土碑刻資料不斷增多，對漢碑的研究也有許多新的進展與發現，我們可從以下不同研究角度對於漢碑研究的近況作更全面性的掌握。

## 1. 概論性質

葉昌熾《語石》<sup>97</sup>對於碑刻的時代、分類、文字體例、碑形體例、書法藝術，甚至拓本，都做了簡要的介紹。

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sup>98</sup>，其全面性討論兩漢的石刻文字和畫像磚石、在石刻文字方面從石刻範圍、數量、及分布情形、書體的演變、重要漢碑的介紹。

徐光冀《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內寫了〈漢代碑刻〉一節<sup>99</sup>，簡要而又系統地論述了漢碑的形制、分類、碑刻內容等。

徐暢〈東漢碑帖〉<sup>100</sup>

黃永年〈碑刻學〉《新美術》1999.3，頁 4~16

李民昌〈談中原碑刻文化〉《學習論壇》1995 年第 5 期，頁 40~41

楚保玲、趙振乾〈漢碑概說〉《史學月刊》1997 年第 5 期，頁 116~117<sup>101</sup>

袁維春《秦漢碑述》<sup>102</sup>

## 2. 價值與應用

黎明釗〈兩漢石刻史料之應用〉<sup>103</sup>：主要說明漢代石刻文字之史料價值，以碑文為主、旁及相關資料。

葉國良〈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例及其相關問題〉<sup>104</sup>：主要從《隸釋》等金石書籍

<sup>97</sup> 葉昌熾《語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1 月臺三版）

<sup>98</sup> 丁念先〈兩漢石刻文字和石刻畫〉（《大陸雜誌》第 30 卷 5、6 期，頁 143~146、193~199）

<sup>99</sup> 徐光冀〈漢代碑刻〉《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年 2 月第四刷）頁 162~164。

<sup>100</sup> 徐暢〈東漢碑帖〉《南京大學學報》1979 年第 1 期。

<sup>101</sup> 楚保玲〈漢碑概說〉《史學月刊》1997 年第 5 期。

<sup>102</sup> 袁維春《秦漢碑述》（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一版）

<sup>103</sup> 黎明釗〈兩漢石刻史料之應用〉（《大陸雜誌》第 70 卷、第 6 期，頁 267~286）。

<sup>104</sup> 葉國良〈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例及其相關問題〉《石學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5 月初版），頁 1~46。此文原題為〈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例及其運用〉《漢學研究》第 3 卷第 1 期，頁 55~80。

中找出東漢官宦墓碑所紀錄的仕履及其碑額題職的關係，確定漢代碑額題尊之例，此文乃考察東漢碑額題尊習慣之重要參考。

王立軍〈談碑刻文獻的語言文字學價值〉《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4期（總第65期），頁96~100

何如月〈碑刻文獻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以《金石錄》和《集古錄》為例〉《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4期，頁89~92

### 3. 形制發展研究

日人·關冶貞《支那碑碣形式之變遷》**105**

日人·水野清一〈碑碣的形式〉**106**

日人·伏見沖敬〈碑頭〉**107**

日人·冢田康信〈碑的起源與形式〉**108**：其認為碑的要件有四，石質、文章、書法、形式。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和分期及碑形釋意〉**109**

陳秀卿〈從漢碑的穿說起〉**110**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111**：其認為墓碑應源於古代墳墓用的「豐碑」。漢代墓碑是先秦時期下棺用的「豐碑」轉化而來的。

黃曉芬〈漢墓形制的變革——試論豎立式椁墓向橫穴式室墓的演變過程〉《考古與文物》1996.1期，頁49~69

### 4. 漢碑分類與書風

---

<sup>105</sup> 日人·關冶貞《支那碑碣形式之變遷》（東京：座右寶刊行會，昭和十年（1925）九月）

<sup>106</sup> 日人·水野清一〈碑碣的形式〉《書道全集第二卷·漢》（台北：大陸出版社，1989年1月再版），頁30~31。

<sup>107</sup> 日人·伏見沖敬〈碑頭〉《書道史點描》（東京：二玄社，1979年12月初版），頁27~37。

<sup>108</sup> 日人·冢田康信〈碑的起源與形式〉《中國書道之基礎的研究》（東京：東方書局，1992年3月），頁48~81。

<sup>109</sup>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和分期及碑形釋意〉《書法》1988年第4期，頁10~15。

<sup>110</sup> 陳秀卿〈從漢碑的穿說起〉《書譜》第十卷，頁380~381。

<sup>111</sup>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年版），頁49~63。亦見《華夏考古》，1991年第4期。



朱應尊（1627~1709）〈西嶽華山廟碑跋〉：分爲方整、流麗、奇古。

王澐（1668~1743）《虛舟題跋》〈禮器碑〉條：分爲雄古、渾勁、方整三類。

王澐（1668~1743）《竹雲題跋》：古雅、方整、清瘦。

康有爲（1858~1927）《廣藝舟雙輯》（本漢第七）：駿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艷、虛和、凝整、秀韻。

眞田但馬《中國書道史》上卷（1967年，木耳社）：正統派、古勁派、浪漫派

石橋犀水《中國書道史·序說》（1973年，角川書局）：古隸、飄逸奇古、峻嚴瘦長、肥大重厚、方整謹嚴。

日人·浦野俊則著、劉藝譯〈漢碑的分類與書風〉<sup>112</sup>：將漢碑分爲歌頌神冥靈驗者（神碑、神廟）、記述祖廟祭祀與修造者（廟碑）、歌頌個人德行者（德政碑、墓碑、墓門石闕）、紀念土木工程完成者（完工紀念碑）、其他（畫像題字、墓記、買冢記、石經、題字）

方傳鑫〈說隸〉<sup>113</sup>

王思禮、賴非〈漢代通俗隸書類型〉<sup>114</sup>：將書法分爲典型書法和通俗書法兩類型，認爲通俗隸書是楷書形成的基礎。

王思禮、賴非〈山東四十年來出土的兩漢碑刻〉<sup>115</sup>：再次強調通俗隸書是楷書形成的基礎。

何應輝〈論秦漢刻石的書法藝術〉<sup>116</sup>：東漢晚期有標準隸書、通俗隸書與新隸體，並認爲通俗隸書刻石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狀態。

裘錫圭〈秦漢時代的字體〉<sup>117</sup>：主張通俗隸書在受草書影響而成爲所謂的「新隸體」，而新隸體由於融入草書筆法，如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後來楷書硬鉤的筆法，呈現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面貌。

<sup>112</sup> 日人·浦野俊則著、劉藝譯〈漢碑的分類與書風〉《書法》1988年第4期，頁60~63。

<sup>113</sup> 方傳鑫〈說隸〉《書法》1988年第3期，頁60~61。

<sup>114</sup> 王思禮、賴非〈漢代通俗隸書類型〉《書法研究》1989年第2期，頁76~87。

<sup>115</sup> 王思禮、賴非〈山東四十年來出土的兩漢碑刻〉《書法》1991年第4期，頁43~45。

<sup>116</sup> 何應輝〈論秦漢刻石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全集8秦漢刻石一》（北京·榮寶齋，1993年3月），頁17~19。

<sup>117</sup> 裘錫圭〈秦漢時代的字體〉《中國書法全集8秦漢刻石一》（北京·榮寶齋，1993年3月），頁47~49。

白鶴〈從民間書法看書體的演變與用筆特徵〉，《書法研究》1996年1月，頁22~35：認為民間書法在書體的發展上較快。

叢文俊〈論民間書法之命題在理論上之缺陷〉，《書法研究》1995年3月，頁81~94：認為應將「民間書法」之名改為「大眾書法」。

松井如流《隸書歷史》<sup>118</sup>

王靖憲〈秦漢的書法藝術〉<sup>119</sup>：將隸書分為：一整飭隸書（端莊秀麗、雄強古樸）、二自然意趣的隸書，另有摩崖文字。

唐吟方、夏冰《漢代刻石隸書》<sup>120</sup>：西漢—古隸階段，東漢早期—隸書過渡階段，東漢中期—隸書大發展階段，東漢晚期—成熟豐滿階段。

徐森玉〈西漢石刻文字初探〉<sup>121</sup>：文章對當時所能搜集到的十種西漢石刻文字逐一介紹，並做了考釋。他認為，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我國古代石刻文字，不僅能發現各種史料，以補充、糾正史書的不足和錯誤，而且也是探討我國文字演變和書體、書法沿革的一條重要途徑。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汪慶正〈東漢石刻文字綜述〉<sup>122</sup>：首先對散存在我國各地的東漢碑刻做了概述，然後對這些碑刻所涉及的經濟史料、政治軍事史料、文學史料進行研究，一一指出其在我國古代文字研究、經與史的關係研究上的重要性，並對「碑」的形式溯源等問題有所討論，對後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藤原楚水〈漢的碑碣、石室、石闕文字〉<sup>123</sup>

薛龍春〈明末清初碑刻研究中的書學觀念〉《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6年第1期，頁32~39

## 5. 漢碑研究

平山君碑：《書道全集第二卷漢》<sup>124</sup>

---

<sup>118</sup> 松井如流《隸書歷史》（《書道講座》六，二玄社，1956年版）

<sup>119</sup> 王靖憲〈秦漢的書法藝術〉《中國美術全集一》（人民美術，1987年版）

<sup>120</sup> 唐吟方、夏冰《漢代刻石隸書》（北京：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sup>121</sup> 徐森玉〈西漢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5年第4期。

<sup>122</sup> 汪慶正〈東漢石刻文字綜述〉《上海博物館館刊》1981年第7期。

<sup>123</sup> 藤原楚水〈漢的碑碣、石室、石闕文字〉《圖解書道史第一卷》（東京：省心書局，1977年9月第四版），頁280。

- 乙瑛碑：秦公〈談東漢乙瑛碑拓本及其他〉 125  
勞榦〈孔廟碑石卒史碑考〉 126
- 華山廟碑：馬子雲〈談西嶽華山廟碑三本宋拓〉 127  
周長源〈阮元摹刻的西嶽華山廟碑和摹補碑中缺字的巨硯〉 128  
伍角聲〈貞漢閣本西嶽華山廟碑〉 129  
方衍〈關於西嶽華山廟碑〉 130
- 王孝淵碑：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 131
- 趙寬碑（1942年發現）：沈年潤〈釋東漢三老趙掾碑〉 132  
蘇瑩輝〈漢三老趙寬碑考略〉 133
- 張景造土牛碑：鄭杰翔〈南陽新出土的東漢張景造土牛碑〉 134
- 袁安碑：馬衡〈漢司徒袁安碑跋〉 135  
袁敞碑：馬衡〈漢司徒袁敞碑跋〉 136
- 四神刻石：刻於東漢熹平二年（173），1980年在山東境內發現，石為不規則的天然石頭，其刻字內容是對四方之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詮釋。見：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版。
- 熹平石經：許景元〈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考略〉 137

<sup>124</sup> 《書道全集第二卷漢》（台北：大陸書局，1989年1月再版）圖說，頁179~180。

<sup>125</sup> 秦公〈談東漢乙瑛碑拓本及其他〉《文物》1981年第7期，頁76~79。

<sup>126</sup> 勞榦〈孔廟碑石卒史碑考〉《大陸雜誌》第70卷第6期，頁267~28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頁99~175；乙瑛碑的碑文考釋

<sup>127</sup> 馬子雲〈談西嶽華山廟碑三本宋拓〉《文物》1961年第8期，頁31~35。

<sup>128</sup> 周長源〈阮元摹刻的西嶽華山廟碑和摹補碑中缺字的巨硯〉《文物》1992年第8期，頁86~89。

<sup>129</sup> 伍角聲〈貞漢閣本西嶽華山廟碑〉《書譜》第37期，頁76~80。

<sup>130</sup> 方衍〈關於西嶽華山廟碑〉《書譜》第41期，頁18~19。

<sup>131</sup> 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頁67~71。

<sup>132</sup> 沈年潤〈釋東漢三老趙掾碑〉《文物》1964年第5期，頁22~24。

<sup>133</sup> 蘇瑩輝〈漢三老趙寬碑考略〉《大陸雜誌》第13卷第5期，頁138~141。

<sup>134</sup> 鄭杰翔〈南陽新出土的東漢張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頁1~3。

<sup>135</sup> 馬衡〈漢司徒袁安碑跋〉《凡將齋金石叢稿》1984年7月，頁183~185。

<sup>136</sup> 馬衡〈漢司徒袁敞碑跋〉《凡將齋金石叢稿》1984年7月，頁183~185。

<sup>137</sup> 許景元〈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考略〉《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

范邦瑾〈兩塊未見著錄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釋及綴接〉 138

范邦瑾〈〈熹平石經〉的尺寸及刻字行數補證〉 139

漢中褒斜道石門的摩崖刻石：

陳明達〈褒斜道石門及其石刻〉 140

黃盛璋〈褒斜道與石門石刻〉 14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門附近棧道遺跡及題刻調查〉 14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陝南工作隊〈褒斜道連雲棧南段調查簡報〉 143

秦中行、李自智、趙化成〈褒斜道棧道調查記〉 144

郭榮章《石門摩崖石刻研究—石門十三品專輯》 145

郭榮章〈石門頌小考〉 146

郭榮章〈石門石刻全貌探蹤發微〉 147

第四屆蜀道及石門石刻國際學術討論會《蜀道及石門石刻研究專號》 148

其他發掘報告：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卷煙材料廠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頁3~1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李屯東漢元嘉二年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2期，頁1~7

<sup>138</sup> 范邦瑾〈兩塊未見著錄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釋及綴接〉《文物》1986年第5期。

<sup>139</sup> 范邦瑾〈〈熹平石經〉的尺寸及刻字行數補證〉《文物》1988年第1期。

<sup>140</sup> 陳明達〈褒斜道石門及其石刻〉《文物》1961年第4、5期，頁57~61。

<sup>141</sup> 黃盛璋〈褒斜道與石門石刻〉《文物》1963年第2期，頁29~33。

<sup>142</sup>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門附近棧道遺跡及題刻調查〉《文物》1964年第11期，頁25~42。

<sup>143</sup>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陝南工作隊〈褒斜道連雲棧南段調查簡報〉《文物》1964年第11期，頁43~44。

<sup>144</sup> 秦中行、李自智、趙化成〈褒斜道棧道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頁96~99。

<sup>145</sup> 郭榮章《石門摩崖石刻研究—石門十三品專輯》（陝西人民美術，1985年10月第一版）

<sup>146</sup> 郭榮章〈石門頌小考〉《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頁100~103。

<sup>147</sup> 郭榮章〈石門石刻全貌探蹤發微〉《文博》1995年第2期，頁5~11。

<sup>148</sup> 第四屆蜀道及石門石刻國際學術討論會《蜀道及石門石刻研究專號》（《文博》1995年第2期）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邙飛機場 903 漢墓〉《考古與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15~18

河南商丘地區文物工作隊〈河南永成黃土山三號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8 年第 2 期，頁 25~30

呂名軍〈漢碑新訪錄〉《中原文物》2000 年第 5 期，頁 64~68

呂名軍〈河南漢碑保存現狀〉《鄭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9 月，第 18 卷第 3 期，頁 85~88

趙小平〈包頭出土漢碑二種淺談〉《內蒙古文物考古》2000 年第 1 期，頁 203~204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三爻村漢唐墓葬清理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 年第 3 期，頁 3~2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康村漢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4 期，頁 21~33

## 6. 碑刻鑑定

清·方若原著、王壯宏增補《增補校碑隨筆》（台北：華正書局，1985 第 4 月初版）

袁維春《秦漢碑述》（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一版）：針對《增補校碑隨筆》中秦漢碑刻的部份抽出來，再做更詳細的考證，並對碑文做註釋。

馬子雲、施安昌《碑帖鑑定》（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馬子雲《碑帖鑑定淺說》（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年 12 月第二版）

黃公渚《兩漢金石文選評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10 月臺一版）：

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 年 8 月第一版）：一書收五十九種，針對一些重要的漢代碑刻文字做考證和釋義。

## 7. 相關博碩士論文研究

洪金山《漢魏南北朝碑學之研究》（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1971 年）

葉程儀《漢魏石刻文學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年）

郭伯佶《漢碑隸書的文字構成》（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1991 年）

丁瑞茂《漢鮮于璜碑研究—從鮮于璜碑看漢碑碑形、篆額書風及畫像紋飾》（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洪然升《書法與政治關係之研究——以兩漢、魏晉南北朝為研究範圍》（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1999年）

吳淑娟《漢代隸書及其教學之研究——以漢碑書法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2003年）

陳錕鍵《東漢到晉買地券文字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2005年）

## 8. 碑額研究

松井如流〈漢魏篆額集小解〉《中國書道史隨想》（東京：二玄社，1977年1月）

凌士欣〈漢代碑額篆書藝術鑑賞〉《美術嚮導》1996年第5期，頁47~50：將篆額分為三大類型：一為流暢蕭疏、主拙樸實：包括西狹頌、趙寬碑、鄭季宣碑陰、孔彪碑；二為若篆若隸、方正平直：包括張遷碑、景君碑、鮮于璜碑、白石神君碑；三為工整精細、安祥舒放：包括韓仁銘碑、孔宙碑、鄭固碑。對於這些例舉碑額的藝術風貌，針對其筆法、特性，有所說明。

劉清揚〈兩漢碑額書法藝術試論〉《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130~133：本文認為漢碑碑額篆書大量使用誇張與變形的富於裝飾性的藝術處理手法，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並就以下四部份說明之。一為對三代金屬器物鑄刻形式的借鑑、二碑額的鐫刻方式與造型特徵、三從碑額篆書看兩漢時期篆書的藝術特色、四漢篆額對書法與篆刻創作的啓發意義。

一芥〈《校官之碑》碑額新解〉《東南文化》2006年第1期（總189期）：對於碑額「校官之碑」的「校官」，歷來說法不一。本文主張「校官」之意，乃涉及碑主最主要的功德事件，此碑立於學官，旨在廣為傳頌碑主潘乾建造校官（學舍）、重視人才培養的不朽功績。

王勁〈碑額志蓋篆法初探〉（網路文章）：將碑額與志蓋篆法分為漢魏、南北朝至唐、唐至明清三大階段，並對這三大階段的碑額篆法作書法藝術風格之闡論。

王銀忠〈略論漢代碑文之碑額題尊〉《鄭州航空空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2月，第25卷第1期，頁60~61：歷代所書寫碑額的方法很不一樣，漢代碑額是書寫碑主所任官職中最尊貴的官職，南北朝時其碑額就比較混亂了，而唐代碑額是書寫碑主所任官職中最後的官職。文中並以孔彪碑、劉寬碑為例，透過相關書籍的記載與相互辯說，詳述漢人碑額題尊之心理及原因。

## 9. 圖錄

宋·洪适《隸續》卷五的碑圖

清·楊守敬《寰宇貞石圖》

清·牛震運《金石圖》（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所收甚備，悉整幅影印）

《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收錄石刻拓本285種、360件。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一冊戰國、秦漢》

中國展望出版社編集，秦公主編《中國石刻大觀》（資料篇一、二）（京都市：株式會社同朋舍，1991年）

東漢碑刻的資料相當龐大繁複，上述分類僅先就概論、價值應用、形制、書風、個別漢碑研究、真偽鑑定、碑額等做資料分類，大致上可以了解目前東漢碑刻的研究範圍與議題。當然，除此之外，大量的東漢碑刻資料仍可再就其文體、文字學、體制、材料、書風、甚至從社會學、文化學、政治的角度去剖析，相信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去切入，仍有許多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筆者希望從碑額書法藝術的角度去切入，目前對碑額藝術研究的部分相較於其他部分明顯薄弱，有關東漢碑額之研究均散在各處，尚未見專書專論之文，偶見極少數的文章論述碑額，目前僅見松井如流〈漢魏篆額集小解〉、凌士欣〈漢代碑額篆書藝術鑑賞〉、劉清揚〈兩漢碑額書法藝術試論〉、一芥〈《校官之碑》碑額新解〉、王勁〈碑額志蓋篆法初探〉（網路文章）、王銀忠〈略論漢代碑文之碑額題尊〉等六篇論文，大多限於舉例部分碑額作為書法風格之說明，未見完整有系統之論說，足見對於漢碑額的研究尚有許多待開發的部份。

## 四、結語

中國碑刻的歷史雖然不及西亞、北非等地那麼悠久，但多以文字銘文為主，故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其形成與發展有相當長的歷史，周代應是碑刻的原始期，僅作為入葬時下棺工具，無銘文；秦始皇勒石紀功，不稱碑而稱「刻石」；西漢時期用於墳前的刻石

亦不稱碑，碑的形制在西漢中期以前並無固定形狀，在武帝之後才有了雛形，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戰國到西漢是碑的醞釀期；之後，臣子為追述君父的功美，才書刻大量褒彰業績的銘文於墓表之上，從而產生了今日所稱的「碑」。

第一塊自銘為「碑」的墓石是東漢順帝永建三年（128年）刻立的《王孝淵碑》，其碑文有墓主的卒葬日期、職官，而且還有頌辭，代表此時東漢墓碑的碑文也已成熟，不再是簡單地刻寫墓主的姓名、標識墓域的作用；碑刻的內容已成為一種新體裁的文章，有了歌功頌德的作用，東漢碑刻在此時成熟定型；因厚葬豎碑立傳之風盛行，上自帝王，下至庶民，莫不豎碑，至桓靈之時，達到極盛；也就是說，東漢碑刻已完成了從原始的「下棺以繚繞」到「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的轉化，象徵著碑的性質與目的已經有根本上的轉變，東漢碑刻形制至此時發展成熟。

導致東漢碑刻成熟的原因應是多方面的，除因煉鋼技術的進步，建立了石碑流行的物質基礎、標識墓葬習慣的普及與厚葬風氣盛行外，東漢崇尚名節，墓前立碑成為名垂青史的指標，加上當時墓前立碑的制度存在嚴重缺陷，雖有規定，但是在政治混亂之中，百姓也可不經批准隨意立碑，因此，數量急速增加，東漢石碑才因此大量產生。綜合而言，東漢時期碑刻盛行的原因，是社會多方面現象的反應。

東漢立碑風氣盛行，雖然導致部分立碑者為表彰死者生前事蹟，故假托高門，誇稱德業，使碑文浮誇不實而為人所詬病；但也因當時立碑風氣之普及，使得這些豐富的資料正足以成為研究當時文化社會相關現象的重要線索，至今保存下來的石碑或拓本，其碑刻書體也成為了解東漢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彌足珍貴，成為書法、文字發展演變的可靠見證，為研究漢字的演變和漢代書法藝術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資料。

## 參考書目

1. 何澂，《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清光緒九年（188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書影印本。
2. 于還素譯，《書道全集 2 漢》，台北：大陸書店，1975年5月初版。
3. 葉昌熾，《語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3月臺二版。
4. 松井如流，《中國書道史隨想》，東京都：二玄社，1977年初版。



5. 萬承紀輯，《百漢碑硯》，台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4月初版。
6. 馬衡，《凡將齋金石概要》，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7月再版。
7. 高文，《漢碑集釋》，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8. 王壯弘、周志高，《秦漢石刻的篆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9. 方若原著、王壯弘增補，《增補校碑隨筆》，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4月初版。
10. 葉國良，《石學蠡測》，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
11. 劉正誠編，《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香港：旺文出版社，1989年。
12. 中國書法家協會山東分會編，《漢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5月第一版。
13. 袁維春，《秦漢碑述》，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14. 《中國石刻大觀·資料篇（一）》，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91年7月第一版。
15. 《中國石刻大觀·資料篇（二）》，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91年11月第一版。
16. 《中國石刻大觀·研究篇》，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93年3月第一版。
17. 馬子雲，《碑帖鑑定》，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18. 朱劍心，《金石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7月臺二版。
19. 凌士欣，〈漢代碑額篆書藝術鑑賞〉《美術嚮導》1996年5月。
20. 丁瑞茂，《漢鮮于璜碑研究》，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21. 商承祚編，《石刻篆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0月第一版。
22. 徐自強、吳夢麟，《中國的石刻與石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第一版。
23. 金其楨，《中國碑文化》，四川：重慶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4. 趙超，《古代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第二刷。
25. 徐自強、吳夢麟，《古代石刻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26. 啓功，《啓功書法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27. 洪适，《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第一版，2003年12月第2刷。
28. 孫伯濤，《兩漢刻石碑額》，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29. 仲威，《碑學10講》，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30. 《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31. 《石刻史料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7-66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7-66

# 《老殘遊記》中的知識分子

紀俊龍\*

##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Travels of Laocan*

by  
Chun-Lung Chi

關鍵詞：晚清、劉鶚、老殘遊記、知識分子、太谷學派

**Keywords:** Late Qing, Liu'e, *The Travels of Laocan*, Intellectuals, Taigu school

---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提要〕

1903年開始連載於《鏞像小說》的《老殘遊記》，是探究晚清風貌極為重要的小說作品。《老殘遊記》所映現的內容與旨思，無論是救亡圖存的政治議題，或是反射生活風景的現實關懷，都為我們提供了解晚清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因此，本文嘗試以知識分子形象的深入縷析為切入視角，窺伺並探析晚清有志之士如何回應時代課題的心理思維與具體作為。另一方面，亦冀圖透過老殘、璵姑、黃龍子、酷吏（玉賢、剛弼）與良吏（莊宮保、白子壽、德慧生）等知識分子的身影形象，微觀地呈現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遞嬗過程中，選擇不服膺主流思潮的細部現象。我們發現，老殘及璵姑、黃龍子所呈現的意義，乃是秉持「太谷學派」倡導的「養民」基本精神，從而展現對於黎民社稷的深沉關切，凸顯了既非強調維新，也非訴諸革命的特殊救國論調。就官吏形象的塗抹來說，譴責玉賢與剛弼兩位酷吏的描寫，除了反映蒼民生活卑微、任人宰割的壓迫困境外，更點出了知識分子將知識道統視為追逐名利工具的另類黑暗面向；而良吏形象的並置其中，則客觀地說明了官吏並非全是虎豹豺狼的殘暴形象，且與酷吏形成對照，成為全面理解晚清圖景的重要註腳。由是觀之，立足於傳統與現代的過渡階段，《老殘遊記》的知識分子群像，不僅具備了折射現實的意涵，亦是提供中國知識分子在「典型化」迭變過程中，更為全面且細致的觀察線索。

## Abstract

Serialized in *Xiuxiang Novels* in 1903, *The Travels of Laoca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xample of late Qing dynasty novelistic style. The contemporary concerns and stylistic fashions it reflects, be they the crisis of national survival that dominated the politics of the time, or the favouring of an artistic realism that would reflect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ll indispensable clues to understand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Travels of Laocan*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intellectuals responded, in both thought and deed, to the concerns of their age. In addition, from the images of

intellectuals such as Laocan, Yugu, Huanglongzi, various ruthless officials such as Yuxian and Gangbo, and various virtuous officials such as Zhuanggongbao, Baizishou and Dehuisheng, we see reflected in detailed microcosm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s rejection of mainstream modes of thought, which occurred during the greater social movemen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e discover that Laocan, Yugu and Huanglongzi represent the Taigu school's spirit of "nurture the people" and display a deep concern for common society, while conspicuously not emphasizing reform nor appealing to revolution, entirely avoiding these themes of national salvation. Regarding the besmirching of the image of bureaucracy and the condemning description of the ruthless officials Yuxian and Gangbo, besides reflecting the plight of the oppressed common people, we also see represented the dark side of knowledge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when it is regarded by the intellectual as a means to fame and fortune. Also, the contrasting image of virtuous officials objectively demonstrates that not all officials are jackals and wolves in Confucian robes, and their appearance along with the contrasting image of their ruthless counterparts serves as a footnote to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late Qing society. Therefore, situated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Travels of Lao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reality of late Qing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and detailed course by which the changing figur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an be interpreted.

## 一、前言

晚清是中國的歷史推演進程中，一個極為變動震盪的不安年代。清朝歷經康、雍、乾的太平盛世，直至道光開始，內政已逐漸走向腐化。清初的思想箝制與高壓政策已日漸崩解；同時，西方世界歷經工業革命的洗禮後，展現科學技能的昌明興盛，大幅提昇西方世界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從而使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逐漸蔓延至東方，相形之下，劃地自限的中國便成為西方列強蠶食鯨吞的主要對象之一<sup>1</sup>。因此，面對內憂外患紛擾不已的局面，許多知識分子有感身處於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紛紛提出拯救社稷的建言，特別是道光廿年（1840）鴉片戰爭失利後，迫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面對西方世界長足進步的事實，因而提出效法西方，推行「自強運動」的改革。但是，未能擺脫「四方皆夷」老大心態的中國，一直無法有效推動變革的腳步，反而遭致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此一失利，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徹底覺醒，進而提出振興中國的維新運動，換言之，真正使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與心態上徹底省思的扭轉力量，當屬「甲午戰爭」的挫敗<sup>2</sup>。

唯我獨尊的泱泱大國，竟慘敗於蕞爾小國日本之手，這個窘境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認真」的探究西方世界百尺竿頭的深層質素。他們苦思於船堅礮利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外，真正讓西方大步躍進的因素究竟為何。其中，梁啟超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轉折角色。梁任公流亡日本後，體會到其之所以能夠迅速茁壯且擊敗中國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能夠從本質上修正，開懷接納西方的學術思想與政治、社會制度所致<sup>3</sup>。因此，短暫脫離政治圈的梁任公，開始思索中國本質的改造，並提倡以小說教化啓民的改革口號；企圖藉由小說深入人心的質性，追求民智、民權、民德、民力的揚升，作為救亡圖存、國富民強的根本基礎，進而高舉「小說界革命」的旗幟，這連帶地也成為晚清小說蓬勃發

---

<sup>1</sup> 參考李威熊，〈晚清的疑經風氣及其時代意義〉，《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401-417。

<sup>2</sup>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於周陽山等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82），頁 19-33。

<sup>3</sup> 關於梁啟超的思想議題，可參閱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展的主因之一<sup>4</sup>。

1903年開始連載於《鑄像小說》的《老殘遊記》，不僅被稱為「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也是藉以觀察晚清社會風貌的重要線索<sup>5</sup>。《老殘遊記》的重要性除了狀物描景與敘事結構、模式經營的寫作技巧外，揭發諷喻官場酷吏的醜陋黑暗面，亦是考察中國傳統思想在晚清發生轉折變遷的重要場域<sup>6</sup>。長久以來，論者對於《老殘遊記》的析論，泰半執著於政治思想的闡述，以及藉由諷刺而傳達出的愛國之情。然而，刻劃身處危亡之秋的「知識分子」形象，究竟是以何種姿態出現在《老殘遊記》當中的議題，其受到矚目的程度遠遠不及其他<sup>7</sup>。準此，本文以補苴罅漏的思考角度出發，試圖為《老殘遊記》中「知識分子」形象進行探究，耙梳轉型時期樣貌紛雜的「知識分子」類型，冀圖呈顯出面向世變，卻不必然服膺主流思潮的另類「知識分子」的型態，考察其在「典型化」過程中更為細膩的樣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此深入《老殘遊記》更為豐富多層的文學面貌。

<sup>4</sup> 關於「小說界革命」議題的論述甚多，可參閱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方長安，《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等。

<sup>5</sup> 《老殘遊記》與《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並稱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見林瑞明，《晚清譴責小說的意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

<sup>6</sup> 魯迅認為《老殘遊記》的描寫是「敘景狀物，時有可觀」，肯定其文字技巧，見《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頁268；而胡適也持相同看法，見〈《老殘遊記》序〉，收於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另外，關於小說結構與敘事模式的分析，可參見米列娜（Dolezelov -Velingerov）的〈晚清小說情節結構的類型研究〉與〈晚清小說的敘事模式〉，收於米列娜編、伍曉明譯，《從傳統到現代：19至320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131-152。

<sup>7</sup> 從以《老殘遊記》為探討對象的學位論文看來，王瑞雪《劉鶚及其老殘遊記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論，198574年）、李承基《老殘遊記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論，74年）、方哲桓《老殘遊記析論》（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75年）、蔡文賓《劉鶚《老殘遊記》的敘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論，94年）以及陳姿苒《《老殘遊記》女性人物的社會角色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論，92年）等，雖然都有談及小說人物的形象，但未見以「知識分子」的角度來闡明這些角色的時代意義。

## 二、劉鶚的「知識分子」定位

### (一) 劉鶚生平與思想淵源略述

劉鶚（1857-1909）原名孟鵬，字雲博；後更名鶚，字鐵雲，又字公約，原籍江蘇鎮江。出身傳統官宦門第的劉鶚是劉成忠最小的兒子，劉成忠於咸豐二年（1852）錄取進士，並先後擔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河南知府與道台等官職，從而使劉鶚自小在耳濡目染的影響下，奠定了傳統文化的根基。廿歲那年，劉鶚參加南京鄉試失利，於落第返鄉的路途中經過揚州，認識了影響他終生的恩師李龍川（李光炘）；同時他也開始隨順自己的個性，埋首鑽研治河、天算、樂律、方技、詞章、醫學、兵法之學。光緒十年（1884）劉成忠逝世後，劉鶚再無法享有衣食無虞的優渥生活，被迫開始投入社會、走向現實人生。劉鶚自小便無心制藝、疏於功名，再加上科舉失利，使其在前程茫茫的迷惘中，接受了李龍川哲學思想的影響，選擇了「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踏上實現理想與抱負的崎嶇道路。

離開家庭豐厚的羽翼後，劉鶚不僅開設煙草館、掛牌行醫，也曾經營出版事業，開設石印書局，卻都無疾而終。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才投效當時的河督吳大澂，協助其治理黃河之患，也因而擔任三省河圖局董事，從事繪制三省黃河圖的工作。光緒十七年（1891）劉鶚憑藉治河功績，被當時的山東巡撫張曜擢調至濟南，以同知銜擔任山東黃河下游提調。後經巡撫福潤的舉薦，保送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驗。劉鶚也曾建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利用外資興辦「京漢鐵路」，計畫由外商自行建築，三十年後無條件收回，卻因與盛宣懷意見不合，未能實現。往後又至北京提出「京浦鐵路」建造的計畫，又遭同鄉京官反對而作罷。

光緒廿三年（1897）劉鶚應允擔任英商福公司山西煤礦的華人經理職務，卻因為上任後，要求修改當時山西巡撫胡聘之與英商簽訂的許多侵犯國民權益的條款草約，慘遭英商解聘。光緒廿六年（1900）庚子變起，劉鶚奔走入京且傾其資金辦賑以濟災民。未料此舉竟成為日後遭袁世凱誣陷，並淪為流放新疆的事證。光緒廿八年（1902）以後，劉鶚便將全部心力投向紡織業、鋼鐵工業、電車工業、自來水廠、鹽業等工商實業的經營，卻都鎩羽而歸、失敗作結。光緒卅四年（1908）遭清庭政府逮捕，流戍新疆，翌年



卒於迪化，結束五十三年的人生旅途<sup>8</sup>。

總覽劉鶚乖舛顛躓的一生，正可映照晚清搖墜殘燼的危亡時局。然影響劉鶚最為深遠的思想質素，首推「太谷學派」，而李龍川正是此一學派的南宗領袖。「太谷學派」的思想特質乃以儒家為主，且將思想內涵歸結於《周易》，同時也汲取吸納佛道之說、旁及百家雜言，而在屬性上傾近於宋學程朱學派的發展理路，故可視為儒家的一支新流派。雖然「太谷學派」系出宋儒，但對於宋儒強調的「名理」、「修養」卻多所質疑與批判。由於重視《周易》，以致於「太谷學派」除了強調儒家的民本思想，並進一步推衍出一套宇宙人生的觀念，且在如此的基礎下，尋求更符合於科學的理論及修養的實質，發展助益民生的科學實行。於此前提，「太谷學派」在政治經濟方面，極力講求「復井田」的提倡以作為突破封建制度的根據；同時又著重禮樂兵農的教養方案，訴求於「富而後教」的「養民」思想與立場，呈現具有強烈社會改革的實踐色彩。其與民間力量結合的結果，使其主張反對封建官僚政治、愚民八股、婦女守節、封建道德、法律、禮教，以及駁斥儒為一尊，且要求思想自由、反對利用宗教而豢養不勞而食的和尚、道士等強烈思想<sup>9</sup>。除了文化思維與政治經濟的連番革弊外，「太谷學派」更強調「一蟻之飢，猶己之飢」的悲天憫人襟懷，以及「以養天下為己任」的道德修為。而這些思想意涵，不僅成為劉鶚

<sup>8</sup> 關於劉鶚生平可參閱劉厚澤，〈劉鶚與《老殘遊記》〉，頁 1-15，收於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蔣逸雪，〈老殘遊記考證〉，頁 354-365，收於《老殘遊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魯迅，《中國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頁 268；以及王學均，〈劉鶚與老殘遊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 4-12。

<sup>9</sup> 「太谷學派」是清道光至光緒年間，一支組織不大且結合民間力量的秘密結社，可以說是近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大暗流。「太谷學派」的精神領袖周谷本是富家子弟，年少時喜好神、佛之學，亦曾受業於道士韓子愈學道、拜從和尚陳少華學佛，再加上本身精通《周易》，使其成為融貫儒、道、佛三家之得道高人形象，並在揚州收弟子二十餘人，開啓「太谷學派」的秘密講學。道光十二年（1832）周谷病逝揚州，而由其生前指派之得意門生為自己的傳人（即張積中與李龍川），繼續宣揚教義的佈道工作。張積中遵循周谷遺命，北遷定居山東黃崖山，是為北宗；李龍川則在南方傳道，主要活動於揚州、江都、泰州一帶，是為南宗。後因「黃崖教匪案」的發生，導致以張積中為主的北宗覆滅，其中一些倖免於難的弟子，轉而投奔李龍川。從此「太谷學派」便無南北之分，而由李龍川繼續帶領，實行更為隱密的講學活動。關於「太谷學派」相關說明，可參閱劉蕙孫，〈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太谷學派的遺書〉、嚴薇青，〈劉鶚與太谷學派〉，三文收於《劉鶚與老殘遊記資料》，頁 591-642；王學均，〈劉鶚與老殘遊記〉，頁 4-9；董國炎，〈明清小說思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483-487。

行事依據之圭臬<sup>10</sup>，更是觀察劉鶚晚年履踐工商實業的基本精神，以及閱讀《老殘遊記》的重要線索<sup>11</sup>。

## （二）劉鶚的知識分子角色

然而，學通中西又力圖革弊振衰的劉鶚，是否即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具體展現呢？余英時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以西方「知識階層」(intellectual)的概念類比與尋覓中國傳統社會中「士」的歷史意義，進而析論「士」所呈現的面貌特徵<sup>12</sup>。余英時認為「知識階層」與「士」雖然不能輕易地畫上等號，但是兩者之間共同特性，卻替我們提供一個考察「士」基本特質的合理視角<sup>13</sup>。該文指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始於孔子時代。「士」是貴族階級中最低一層的集團，為擔任管理各部門基層事務的官吏，這是其所具備的社會功能。以這樣的聯繫看來，「士」的定位便無可避免的要與君王政治產生緊密的連結，形成互相合作、共榮共存的「共生」關係<sup>14</sup>。

余先生接著指出，「道」是「士」價值取向的最後依據，「道」即是能超越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關係，從而發展出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若以比較文化史的角度來看，

---

<sup>10</sup> 王學均指出：「他曾非常自信的表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據這個學派（案：即太谷學派）的教義。」見《劉鶚與老殘遊記》，頁3。

<sup>11</sup> 陳俊啓先生曾以「商戰」的角度出發，縷析劉鶚思想中，強調用「養民」的基礎達臻「民富國強」、「以夷制夷」的愛國職志與胸懷。見〈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晚清文人劉鶚的一個思想史個案考察〉，《國立編譯館刊》，第30卷1、2期合刊，頁305-328。

<sup>12</sup> 〈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收於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1-83。下文說明皆出於此。

<sup>13</sup> 余英時以 Confino 所舉的近代俄國知識階層的五項特徵，說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與其之間的通性。余氏以為，除了「有一種義務感，要不顧一切代價追求終極的邏輯結論」這一項求真精神的特質之外，其餘如「深切的關懷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對於國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識分子都視之為他們個人的責任」、「傾向於把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及「深信事務不合理，須努力加以修正」這些特質，都可以在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身上找到痕跡。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3。

<sup>14</sup> 狄百瑞 (William T. de Bary)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地位〉一文中說：「基於官僚體制對於文官的依賴，中國政府與儒生之間逐步發展出一種共生的關係，儒生如果想要踏入仕途成為文官就必須熟於文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並且有仁民愛物的胸襟。我個人認為要形容中國與儒生之間微妙的關係，唯有採用『共生』這個生物學上的名詞最為貼切的」，收於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17。

「道」強調的歷史性，使其與以往的文化傳統產生密切的聯繫，而這一份歷史性具備了強烈政治傾向的特質，誠如余氏所言：「我們有理由相信，戰國時代的各國君主多少都感到需要一套具有歷史淵源的理論（即所謂「道」）來強化他們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sup>15</sup>。而「道」的另外一個特徵則是「人間性」，即是「強調人間秩序的安排」<sup>16</sup>，也就是說，「士」在中國傳統中的原生秉性，使其注定要與政治權威產生微妙的軛轡，亦如余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

春秋戰國之際，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出現以後，首先便面臨著如何對待政治權威的問題。這個問題牽涉到兩個方面：從各國君主一方面說，他們在「禮樂崩壞」的局面下需要一套淵源於禮教傳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權力的合法基礎。從知識分子一方面說，道統與政統已分，而他們正是道的承擔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領袖更高的權威——道的權威<sup>17</sup>。

可以想見，傳統中國的「士」（或稱知識分子）<sup>18</sup>不僅要強調禮樂教化的內在涵養，更要將這個內在的價值取向，具體外化為君主統治所依循的政統，而這「內聖外王」的思維曲徑，也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遵循恪守的原則，及其輻射外顯的內涵特徵<sup>19</sup>。

由是觀之，劉鶚的思想理路與實際作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吻合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然而，當劉鶚鄉試落第後轉而投向「太谷學派」的知識吸納與觀念的浸淫，導致他從未「真正」透過科舉取士的機制，進入到仕宦的官僚系統，因此，我們似乎無法將其納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界定範圍之中。那麼，如果將劉鶚放置於近代知識分子界定的範疇之中，又會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sup>15</sup>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 47。

<sup>16</sup>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 50。

<sup>17</sup> 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見《士與中國文化》，頁 99。另外，同樣收錄於《士與中國文化》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亦是余英時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特徵的專文，可相互參照。

<sup>18</sup> 馮友蘭認為：「所謂『士』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階層」，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5。

<sup>19</sup> 詹石窗更直接將「道統」指稱為「儒家傳道的傳統」，見詹石窗，《新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2），頁 419。

眾所周知，列強入侵、兵戎倥傯的晚清，不僅在傳統的文化與思想上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挑戰，同時也開啓了面向世界的顛簸旅程。鴉片戰爭的失利，迫使當時的知識階層必須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震盪，因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訴求，展開學習泰西知識的步伐，從而肇始洋務思潮的「自強運動」。此時，「中體西用」的政治考量，說明了傳統的「道統」主流思潮並未退場<sup>20</sup>，只是「經世致用」<sup>21</sup>的概念逐漸滲入了西方學術與科技的摻雜；直至甲午戰爭的潰敗，牢不可破的中國傳統才真正面臨根本性的質疑。此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驚覺，西方的強盛並非僅有科學智識與「器用」的先進，而是在於文化根基與制度層面的厚實完整，因此，謀求「維新變法」以救亡圖存的聲浪旗幟遂逐步高漲。緊接著，庚子事變的發生，不僅揭露了清朝政府強弩之末的昏聩，也致使民主革命的呼喊浪潮敲起了清廷政府的絕命喪鐘<sup>22</sup>。

歷經鴉片與甲午戰爭潰敗的激盪，中國知識分子服膺仰息的「道統」，儼然失去了曩昔的權威價值。然而，論及刺激中國知識分子轉型的重要事件，則不可忽視光緒卅一年（1905）廢除科舉的影響。廢除科舉標誌著「道統」的傳統價值徹底瓦解<sup>23</sup>，中國知識分子從此無法尋著前人足跡，透過「試途」邁入政統體系的「仕途」。此一變滅，不僅形

---

<sup>20</sup> 張朋園在〈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中說到：「知識分子背景的變化所透露出來的意義是觀念的蛻變。……傳統士紳爲了維護固有的文化，師夷制夷，模仿西方的技術，戊戌變法之前有所謂的自強運動，這顯示統治階層的觀念已有所改變」，此文收於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223-231，註釋引文見頁226。

<sup>21</sup> 所謂「經世」即「入世」，顧名思義即經國濟世、志平天下之意，也就是經由「內聖」的修養轉而爲「外王」的思維，這是中國儒家傳統思想的精萃與目標。見張灝，〈宋明以來儒家思想試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歷史研究所，1984），頁3。

<sup>22</sup> 可參閱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武漢：人民出版社，1982）；鄭大華，《晚清思想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黃順力，《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論》（湖南：嶽麓書社，2005）。

<sup>23</sup> 葛兆光說：「『道統』，則是指思想史中擔著真理傳續的聖賢的連續性系譜，被列入這一系譜就意味着思想的合理性，凸顯了這一系譜，也就暗示了由這一系譜敘述的道理，一定優於其他的道理，應當尊崇的普遍真理」，同時又說「可是到了近世中國，傳統思想世界面臨西方衝擊而逐漸瓦解的時候，顯然漸漸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可見葛氏的說法，一方面更細緻的說明、深化了余英時指稱「道」的「歷史性」，同時也指出科舉取士制度的廢除，形同「道統」的崩解，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要調整、修正、尋覓自己的價值目標，這也是激發了近代知識分子轉型的重要刺激。葛氏之言見〈道統、系譜與歷史〉，頁170、172，收於葛兆光，《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成了「士農工商」四民結構的解體，連帶也使中國社會必然出現許多「近代的」知識分子的產生，誠如羅志田在〈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中指出，影響近代知識分子出現的主要特徵之一，便是廢除科舉的舉措；這導致傳統的「士」逐漸消失，使得知識分子逐步走向邊緣。四民社會的解體，更讓他們面臨前途無以為繼的窘境，因此，他們似乎只能轉向與傳統截然不同的路途選擇，此一結果促成了中國知識分子轉型的機緣，換句話說，大量邊緣知識分子的產生幾乎是與新型近代知識分子同時誕生<sup>24</sup>。

伴隨著西方文明的漸入與工商實業的日漸擴張，這些知識分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與之靠攏，進而形成與傳統知識分子不盡相同的樣貌。當初，清廷爲了因應日漸詭譎的變局而學步西方，然而卻在自洋務運動的推行下，開啓了中國現代化的腳步，也帶給了知識分子在傳統科舉體制下許多發展的嶄新空間；無論商賈營生、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抑或是從事新聞、醫務等「自由職業」的選擇，都提供了知識分子轉型的基礎養分。因此，當科舉廢除之後，這些窮途末路的邊緣知識分子也只能選擇依賴於「市場法則」的服從而走向社會，並且憑藉著現代科學技術的專業，以及在這些基礎下所形成的有別以往的知識群體中，轉變成爲新型知識分子<sup>25</sup>。除了走向商賈利益的知識分子之外，另外還有其他的知識分子，選擇利用以現代技術爲基礎的載體，投向公共領域的參與，進而展現「公共知識分子」的雛型<sup>26</sup>，正如章清所言：「1905年科舉廢除作爲一段歷史的終結，也促使中國讀書人尋找新的角色安排；以報章、學校、學會等載體的制度的確立，即預示著讀書人獲得了有別於『士』的新的角色與身份」<sup>27</sup>，易言之，這些知識分子雖

<sup>24</sup> 參見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頁 119-120、142，收於《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頁 127-161。

<sup>25</sup> 參見高瑞泉，〈近代價值變革與晚清知識分子〉，收於高瑞泉、山口久和編，《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5-52。

<sup>26</sup> 陳來於〈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一文中認爲：「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指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活動之外，同時把專業知識運用於公眾活動之中，或者以其專業知識爲背景參與公眾活動。這些公眾活動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個各方面，而這種運用和參與是以利用現代大眾媒介等公共途徑發表文字和言論爲主要方式。無疑，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的提出，是要強調專業化的知識分子在以學術爲志業的同時不忘致力於公共問題的思考和對解決公共問題的參與」，收於許紀霖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10。

<sup>27</sup> 章清，〈近代中國對「公」與「公共」的表達〉，見《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頁 220。

然失去了傳統仕宦的路途，然而透報章、學校、學會這些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發聲載體，他們似乎仍可延續傳統「經世致用」的理想與抱負；只是發揮的舞臺不再是政治官僚體系，而是投身於公共領域的參與。此一階段知識分子角色的變遷正如許紀霖所云：

晚清的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較，有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識結構變化了，從四書五經轉變為亦中亦西的新學，從倫理政治的規範性知識變為應用性的自然知識；其次是知識的空間變化了，從過去的私塾、書院變為中西混雜的洋學堂，……最後是讀書人的出路變化了，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只有仕途一條路，他們與國家制度化的聯繫隨著科舉的廢除被切斷了，知識分子不再是國家精英，他們成為了自由浮動資源，開始流向社會：軍隊、商業、金融、實業、媒體、出版業和學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會正式結構的邊緣和外圍，成為國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sup>28</sup>。

可見，近代知識分子與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呈現迥然不同的樣貌。讓我們回到劉鶚身上，如果我們無法將他納入傳統知識分子的系譜當中，那麼他是屬於新型近代知識分子的群體嗎？答案是否定的。顯而易見，科舉的廢除是肇生近代知識分子的重要因素，然而上述劉鶚生平經歷時，清楚看見他對於科舉仕途向來漫不經心，因此，科舉廢止對於當時知識分子所形成的衝擊與轉變模式，並不能夠適切的統攝劉鶚的思想與作為。而劉鶚晚年投身實業，亦不似當時知識分子尋求生計或參與公共領域的想法，他的作為其實是服膺「太谷學派」的精神意涵所具體化的「養民」思路，並以此為基礎謀求國家的富強，所以他與當時維新人士訴諸於「政統」基準的思維並不相同。同時，劉鶚也不同于其他職業作家，不以寫作專業作為謀生的工具，職是之故，我們也無法草率地將劉鶚視為新型的近代知識分子。因此，劉鶚的知識分子屬性，當是以「太谷學派」的思想為骨幹，且依循當時局勢潮流的變化從事實業經營，發揮對於社會的關懷，並在傳統 / 近代的知識分子類型中，呈現相當特殊的個別性質。然而，區隔劉鶚知識分子定位的用意，一方面是藉以深化當時的知識分子並未全然擺脫傳統的游離現象<sup>29</sup>，嘗試呈現中國知識分子

---

<sup>28</sup> 見許紀霖，〈「斷裂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頁2。

<sup>29</sup> 張灝在〈傳統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文中指出，欲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議題，不應當以斷層、脫節的角度，將傳統文化的質素從知識分子的身上抽離，反之，也不能夠過份強調對其繼承延續性，

由傳統走向近代的動線軌跡，同時也凸顯出知識分子「典型化」過程的移替中，仍有部份選擇不向主流依附的獨特現象；另一方面，當然也試圖為分析《老殘遊記》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尋找探討的基礎。

### 三、《老殘遊記》的知識分子群像

#### (一)「道」之傳承的知識分子：老殘

阿英認為劉鶚在塑造「老殘」這個懸壺濟世的行方郎中時，已然投射了個人的理想與情感<sup>30</sup>。因此，延續「太谷學派」以「悲天憫人」的襟懷為基礎，著眼於現實社會的觀察，進而呈現感時憂國的焦慮，揭示了老殘具備知識分子特質的重要特徵<sup>31</sup>，正如劉鶚在《老殘遊記·自敘》中所言：「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之作也」<sup>32</sup>，這淒楚的哭泣，正是源自於對國家社稷的極愛之心，並藉著書寫以抒發愛國救國的理想實現<sup>33</sup>。除了〈自敘〉的痛哭之外，在第六回的情節中，老殘眼見曹州的黎民受迫於酷吏玉賢的

---

而是理解其共伴並存的融會狀態。收於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1991），頁 171-185。另外，陳俊啓也在〈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晚清文人劉鶚的一個思想史個案考察〉中認為劉鶚充分理解並接受西學、西方的科技工商業，並以此為工具來幫助積弱的中國；而劉鶚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雖然心靈開放地欣賞、接納西方學術科技，但是對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並未喪失信心，也就是說，劉鶚雖然胸襟開闊的接受西方，但在心態上仍貼近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參見頁 327。

<sup>30</sup> 參見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臺二版，頁 37。相關討論另可參閱鄭兆江〈從《老殘遊記》看劉鶚對「自我」的探求〉，《靜宜人文學報》，第十五卷第二期，2003年12月，頁 47-65；陳俊啓，〈《老殘遊記》中的「個人主觀主義」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涵〉，「靜宜大學中文系第二十六次學術論文研討會」，2001年5月24日，頁 1-34。

<sup>31</sup> 誠如關愛和在〈論老殘〉一文中分析老殘時說：「感時傷世，悲天憫人是中國士人參與社會政治，實現兼濟之志的重要替代方式。老殘一哭於苛政殺人，二哭於國運不昌，三哭於百姓塗炭，皆出於至誠之靈性，至深之感情」，收於《文學評論》，1994年4期，頁 46。

<sup>32</sup> 劉鶚，《老殘遊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2。後文的引文出處皆同，為求簡潔，僅標示回目與頁碼。

<sup>33</sup> 關於老殘的「哭泣」意象，另可詳參李瑞騰，《《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頁 103-116。

摧折傾軋時，亦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饑，卻是為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頁 53)

面對遭逢苦難的百姓，老殘的哭泣，當然是出自於「人溺己溺」的深邃關切。而老殘於第十二回又再度哭泣，此番落淚之因，則是苦於無力扭轉江河日下的中國命運所致：

「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為家！」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頁 107)

而第十三回裡，老殘聽聞翠花與翠環姊妹，因為政府治理黃河不當，導致家破人亡且淪落風塵、遭受老鴉凌虐的悲慘際遇時，他「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角裏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頁 119)。我們可以看到，老殘的三次哭泣，一是為了苦難的百姓，二是面對國祚日薄、紛亂震盪的時局而哭，呈現了他悲天憫人的濃鬱情懷。即便《老殘遊記·二編》第八回中的老殘，夢遊進入陰森地獄，他也對受到酷刑懲處的囚魂，流露一份不忍之情。無可否認，老殘的這一份襟懷，正是展開他日後行為的核心情感與職志；若忽略了悲憫情愫的基礎，則其所流露感時憂國的焦慮無奈，以及療癒時弊的觀察便顯得無立基之地。

正因為「悲天憫人」，所以老殘對於日漸凋敝的時政觀察，便有了深刻的立論基礎。第一回便由老殘的夢境，顯露了中國命運的前途茫茫，且寄寓了深刻的感時憂懷：

「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樓下四人專管掌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著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舊不新的帆，算起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這船雖有二三十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那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侵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



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裡管，只是個人管個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對裡亂竄，不知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裡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頁 7)

這艘岌岌可危的帆船，便是當時中國的象徵；而二三十丈，即是暗喻中國的行省數；掌舵四人，喻軍機大臣人數；八桅喻行省總督人數；東邊一塊喻東三省；船上擾亂的情形，喻戊戌政變，而這洪波巨浪則是晚清衰危不安的局勢<sup>34</sup>。老殘在蓬萊閣上看見的危急情勢，也正是中國的處境。從老殘的眼中，中國正面臨著滅頂消逝的危機，而在此危機中，中國人正如船上的掌舵者與水手一般，不知道在緊急時刻相互合作，反而「彼此不相關照」，任由混亂的情勢持續進行。這也正是劉鶚寄託於小說之中，對於當權者的巧妙諷刺與時事的省思，一方面呈現了中國小說的諷刺性質中，向來具有「秉持公心、指撻時弊、感而能諧，婉而多刺」的特質<sup>35</sup>，同時也傳達出知識分子憂國的觀察以及憂民的感嘆。

面對如此危急的情勢，老殘卻說：「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指出陷入危機的原因，乃是駛船之人「只會過太平日子」與「未曾預備方針」(頁 8)，才導致這艘帆船產生如履薄冰的險境。如此的描寫，似乎展現出劉鶚比較貼近於改革維新的政治立場<sup>36</sup>；再加上劉鶚曾被視為保守的維新派(即改革派)<sup>37</sup>，因此，《老殘遊記》才會被視為具有保守傾向的小說。然而，如果我們以知識分子堅持「道」的思維觀之，便可得知劉鶚之所以賦予老殘背向激烈改革的言論，其實是與內心恪守的思想學統有深刻的反映關係。因為「太谷學派」的學術訓練，並非以隔斷傳統的手段為目標，反之，則是以「養民」、「富國」的思想進路為主，因此，老殘才會在十九回與莊宮保討論玉賢的殘酷時，娓娓道出「救民即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頁 182)的話語。換言之，老殘對於時症

<sup>34</sup> 見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收於《老殘遊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299-300。

<sup>35</sup>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 199。

<sup>36</sup> 汪叔子在〈劉鶚及太谷學派與維新運動關係〉一文中，說明瞭劉鶚與維新運動的牽繫。此文指出，雖然劉鶚透過吳德瀾的居中引線，曾與維新派有所接觸，並且在救國思維上與其相類，然維新派主張開設議院，而與劉鶚則強調整頓工商、廣引商力，以求富國的精神牴觸，導致兩者分道揚鑣的結果。該文收於《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3期，頁 235-243。

<sup>37</sup> 見王德威，〈老殘遊記與公案小說〉，《從劉鶚到王禎和》(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0)，頁 55。

弊端的觀察糾舉，以及恢復國家社會安定的想法，並未完全等同於當時任何一流派的救國論調，反而是源自「太谷學派」的精神承繼與實踐具現。

倘若從老殘拒絕進入政治官僚系統的行為看來，或許更可以驗證我們上述的觀察。第三、四回中，老殘向莊宮保提出了解決黃河水患的建議，深獲宮保的賞識並獲致躋身官僚的機會，然而老殘卻選擇「開溜」加以回絕。至第六回，受到莊宮保的指示，企圖說服老殘入仕的申東造再次邀請他成為幕僚時，老殘又以「深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揄揚」（頁 51）的藉口婉拒其邀，並且發出「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嗎」（頁 55）的質疑，可見，老殘心中「經世」思維的拔濟之道，並不在於為官任爵。那麼，老殘的濟世之道又在哪裡展現呢？顯然，「以民為本」、「民胞物與」的「養民」關注，才是老殘心中的濟道之本。除卻第三回提出治理黃河的真知灼見外，拯救百姓免於酷吏慘刑壓迫時的仗義執言，以及以精湛醫術治癒百姓的描述，已明確指出老殘心中「救民即所以報君」的濟世思維。

在第一回中，老殘便以仁心仁術的精妙醫道，治癒了黃瑞和「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的累年宿疾而名誦一時<sup>38</sup>。除了治癒疾病讓百姓免除病痛的折磨之外，面對玉賢與剛弼等酷吏的摧殘百姓，老殘更展現行俠仗義、救濟百姓的具體行動。例如第七回中，當申東造向老殘尋求解決玉賢殘酷吏治的良方時，老殘便舉薦為人正直、體魄精強的劉仁甫，以作為壓制盜賊的重要力量，並可藉此消弭玉賢酷治的現象；同時，老殘也親筆書信二封，一是邀請劉仁甫到衙署效力，二是向莊宮保說明玉賢的治理「政績」。聽到老殘挺身而出、鼎力相助的承諾，身為玉賢部屬的申東造如釋重負地說：「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聞得此番議論，如夢初醒，如病初癒，真是萬千之幸！」（頁 61）。從申東造的回答不僅可以窺伺玉賢吏治的巨大壓迫，同時也看到老殘濟民心切的身影，連帶地亦將「醫病／醫國」的微妙隱喻勾連起來。這當然並非老殘聽聞申東造的片面之詞，便決計挺身而出的愚勇。在書信設法之前，老殘早對於玉賢的殘暴行徑，產生義憤填膺的指責之意。第五回中，老殘聞得車店掌櫃老董，談及于朝棟父子遭逢玉賢刑求的不平之境時，即憤怒的道出：「這個玉賢正是死有餘辜的人，怎樣省城官聲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權，此人在必殺之列！」（頁 45），可見，申東造求助於老殘的言說，僅是激發他拯救黎民百姓的導火線，其遠因更在於玉賢的酷治。

---

<sup>38</sup> 黃瑞和即「黃河」的隱喻。見蔣逸雪，〈老殘遊記考證〉，頁 347。

面對酷吏的氣憤與解救百姓免於其荼毒的描寫，於第十五至十七回中再次出現。這幾回出現的剛弼，亦是自秉清廉而殘賊百姓的酷吏形象。剛弼受命查辦賈家十三口人命的懸疑案件，且以嚴刑逼問的方式緝查真相。在審理的過程中，魏家的管事不忍心見到主人受到冤枉官司的殘害，因此央託鄉紳胡舉人代為「打點」處理，不料此舉竟成為剛弼判定賈家媳婦魏氏殺人的證明。眾人皆疑賈魏氏背負了毒害親人的虛有罪名，只有剛弼一人認定賈魏氏的罪證確鑿，並以酷刑脅迫賈魏氏俯首承認通姦與殺人罪名。正當眾人手足無措之際，老殘的適時出現，為此樁冤獄懸案燃起一絲平反的曙光。老殘一面著手致信給莊宮保，向其稟告詳情並央求宮保派遣白子壽前來覆審，另一方面，老殘也在剛弼欲施刑於賈魏氏時，親身前往公堂阻止，且義憤填胸地罵道：「這是制強盜的工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在？良心安在？」（頁 155），經過老殘力挽狂瀾的嚇阻，賈魏氏才獲得平反的喘息空間。隨後，白子壽的到來，不僅釐清了案情的來龍去脈，同時也將栽贓的主謀賈幹繩之以法，還給賈魏氏清白。眼見賈魏氏與其父沉冤昭雪，老殘洋溢歡欣喜悅之情，並在心中暗想「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目見了一個酷吏，卻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裡還快活」（頁 156）的興奮心情。也就是說，老殘秉持「悲天憫人」的胸懷，企圖解救百姓脫離酷吏殘虐宰制的心理思維，正是他濟世之道的重點所在。

以上細數老殘的作為，可以發現他最為關切的議題，乃是透過對酷吏的戮力撻伐，以捍衛百姓生命及生活的權益，從而展現其深切的社會關懷。誠如鄧美華在分析晚清小說中知識分子精神的體現時，認為他們在某種層面上，依然秉持著傳統主流中「經世致用」的主體意識，實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責任，以及發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使命<sup>39</sup>。這份淑世精神當然是老殘履踐心中價值意涵時的重要目標。因此，我們看到一個胸懷「悲天憫人」道情的行方郎中，透過行醫與治河的技术、以及面對官吏壓迫時不畏強權的傲骨，堅持保衛黎民的權益，藉以呈現知識分子心繫社稷的高遠情操。

然而，我們卻也看到了老殘複雜矛盾的另外一面。誠如第一回中，眼見搖搖欲墜的帆船旋將滅頂，老殘出於本心向船員遞上指引方向的「羅盤」與「紀限儀」時，不僅不

<sup>39</sup> 見鄧美華，〈試論晚清小說對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刻劃〉，收於《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頁35。

被採納，反而遭受對方拒斥並指責其為使用「外國羅盤」的漢奸。如果我們把劉鶚的經歷帶入此一情節的描寫，可以看到，老殘嘗試以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尋求危難的紓困卻被誤會的情形，不僅呈現出遭受曲解的無奈，似乎也暗示了當時知識分子無以為繼卻又無計可施的兩難情緒。又如老殘面對玉賢的殘虐無道與剛弼的剛愎自用，縱使心中憤恨難當，但是解決之道，卻仍然得仰仗求助於被他所拒絕的官僚體制。「搖個串鈴」的懸壺濟世，說明了老殘不進入政統體系的漂泊選擇，然而弔詭的是，當他謀思疏解酷吏強權時，卻仍舊得依循傳統的官僚力量方得以解決，如此一來，「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嗎」的論調，就成了老殘矛盾複雜的心理註腳。一方面批判傳統官僚舊痼的根深蒂固，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並借助傳統官僚的力量來解決時弊，依違於兩者之間的辯證，老殘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處於轉型時期的徬徨思索，正如關愛和所言，「老殘是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過渡人物」<sup>40</sup>。值得注意的是，處於轉變階段的老殘形象，並沒有真正提出像維新派或革命派訴求救國的方針謀略，而是站在庶民百姓的立場，強調養民、護民的根本思維，進而呈現出不同於強調維新或革命等主流思潮的另類知識分子形象。

## （二）桃花山上的隱遁者：瓊姑與黃龍子

出現在八至十一回的瓊姑與黃龍子、申子平於桃花山論道的描寫，則可視為《老殘遊記》中另一種知識分子的形象展現<sup>41</sup>。這看似支絀的部份，其實是劉鶚藉以闡明「太谷學派」精神的重要場域。申子平為申東造胞弟，為了代替申東造聯繫劉仁甫而來到桃花山，與瓊姑、黃龍子相遇並且展開一場議論，而討論的過程則聚焦在凸顯「太谷學派」的思想意蘊。因此，當申子平詢問瓊姑，關於黃龍子題於壁上的六首七絕詩所呈現的「非佛非仙」意涵時，瓊姑便說道：

他（案：黃龍子）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舖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舖子大些，佛道的舖子小些，皆是無

<sup>40</sup> 見關愛和，〈論老殘〉，頁 46。

<sup>41</sup> 劉大紳在〈關於老殘遊記〉中，說明了黃龍子為黃葆年（黃歸群）的影射，頁 304；阿英則認為瓊姑即為劉鶚自己的理想化身，見《晚清小說史》，頁 37。

所不包的」……又說：「道面子有分別，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便吟詠的。（第九回，頁 79）

瓊姑的這段回答，已清楚說明了「太谷學派」雜揉三教而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而接著瓊姑又娓娓道出對於宋儒的駁斥：

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了，不如弄兩句闢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根據韓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卻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第九回，頁 80）

顯而易見，我們從瓊姑的言論當中，看到她立足於儒學卻猛烈抨擊宋儒以降，曲解孔孟思想的觀察與體悟。瓊姑此番言說的目的，無非是想要維護她心中「道」的思維之合理性。因此，她在第十一回中，藉由討論月球圓缺的自然變化，闡述遭受誤解而傷損的儒家傳統：

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總是明了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為明為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自欺欺人的心去作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為奇的事。（頁 95）

足見瓊姑心中，始終透顯著「太谷學派」的精神面貌與核心思想。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對於歷代聖賢遭一筆抹煞的感嘆，也正訴說著瓊姑心中對於「道」之核心價值的積極維護，與眼見其失落折損的感傷。無獨有偶，同樣出現在桃花山的黃龍子，其思想底蘊與瓊姑如出一轍。比方在第十一回中，黃龍子對瓊姑、申子平說明佛經當中「阿修羅王與上帝戰爭之事」時道出：「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最為精妙」（頁 99）的言詞。如果將黃龍子及瓊姑的言論勾連貫串，則「太谷學派」以《周易》為歸依的學術特質便躍然紙上。

然而，黃龍子與瓊姑最大的不同處在於，他對當時國是的分析與立場較瓊姑來的鮮明。瓊姑只是感嘆儒家「道」的核心價值已遭扭捏輕蔑，因此，傳統價值才會與「北拳南革」產生連結。然黃龍子則是堅守捍衛傳統的立場，展現對於激烈革命的反思：

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那革呢！革是個皮，即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著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是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至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應卦象，不可小覷了他。諸位切記，若攪入他的黨裏去，將來也是跟著潰爛，送了性命的。（第十一回，頁 99-100）

由黃龍子的言論看來，他的政治立場並不明顯偏向溫和的維新變革或激越的革命取向，而是從時間的推移，指出無論維新或革命都應該緩慢且謹慎的進行，不能夠一味求快，而是應當隨著時序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正如他檢討革命行動快速進行時說道：

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的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第十一回，頁 101）

可見黃龍子對革命思維過於迅疾的發展，其實已在心中埋下隱憂，或者說，黃龍子透過時政的觀察，抒發了自身對於國家命運的深刻省思。

瓊姑、黃龍子與老殘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老殘行走聽聞於民間，並且運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而瓊姑與黃龍子則是居處清閒山林的隱逸議論國是。換言之，瓊姑及黃龍子雖不涉足社會問題的解決實踐，然卻秉持心中「道」的價值判斷，嚴肅而具體地「論國是」、「議政事」，此種接近批評的「議論」，卻也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不治而議論」的精神與特質<sup>42</sup>。換個角度來說，瓊姑與黃龍子的形象，似乎也揭露了某些知識分子堅持捍衛傳統，強調循序漸進、步步為營，不盲從於主流思潮的存在現象。

---

<sup>42</sup> 參見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 59-60。

### (三) 官場中的知識分子

#### 1. 酷吏：玉賢與剛弼

官場的觀察與描繪是《老殘遊記》極為關切注目的焦點，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對於玉賢與剛弼兩位「酷吏」的譴責<sup>43</sup>。在中國，自《史記》首創〈酷吏列傳〉以來，「酷吏」事蹟的紀載，幾乎都伴隨著歷代正史的撰述流傳後世，成為警戒後人的重要史料。「酷吏」的存在，除了維持社會倫理及秩序的穩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酷吏」具備有鞏固封建專制的效果，成為君主強化統治系統、建立權威的重要治術之一<sup>44</sup>。根據吳淳邦的歸納，中國的「酷吏」大抵可分成「昏而酷」與「欲而酷」兩類，他認為：

酷吏都以剛愎酷虐為特徵，其酷政動機則大抵分為兩種：昏而酷、欲而酷。前者本身素質低落，是非不明，徇私舞弊，或草率斷案，或糊塗定罪，以致百姓蒙冤、害身殘體；後者為了逞其私欲，舞文弄法，陷民殺人<sup>45</sup>。

剛愎自用、殘暴酷虐是「酷吏」傾軋百姓的重要特質。不過，吳淳邦的看法，卻也拈出「酷吏」使用酷刑背後不同意義的覺察。「昏而酷」的官吏本身無法明鑑是非，僅能一味施以濫刑，將刑法視為權力的展現；「欲而酷」的嚴吏則是有意識地運用官僚系統所賦予的施刑權力，將其視為追求自我心中某種「價值」實現的工具。若以此角度切入玉賢與剛弼形象的分析，或許更能深化「酷吏」的立體形象，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深層意義。

玉賢出現在《老殘遊記》的第三至七回。在這幾回中，于朝棟父子三人蒙冤下獄的冤案，是劉鶚刻劃玉賢、彈劾酷吏形象的重點所在。然而述說懸案之前，劉鶚刻意安排曹州百姓的街談巷語，以凸顯玉賢吏治的殘酷，例如第四回裡，老殘與車店掌櫃老董談天時，老董便說道：

玉大人卻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盡力，只是手段太辣些！初起還辦著幾個強盜，

<sup>43</sup> 玉賢影射毓賢，剛愎影射剛毅。兩人皆為晚清時期的酷吏。見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頁304；蔣逸雪，〈老殘遊記考證〉，頁346。

<sup>44</sup> 參見范忠信，〈酷吏現象與中國專制政治〉，《歷史月刊》，第94期，1995年11月，頁108-112。

<sup>45</sup> 吳淳邦，《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10。

後來強盜摸著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頁 33）

從老董的言說，我們可以看到玉賢動輒施以酷刑的吏治，的確為曹州百姓帶來巨大恐怖的壓迫感。緊接著，老董便開始陳述于朝棟父子遭受強盜栽贓的來龍去脈，以及于氏父子與媳婦慘遭玉賢酷刑脅迫的對待情形。比如第四回中，于學禮在公堂上自陳並無勾通強盜的答辯時，玉賢毫不審視理會，反而剛愎自用地認定于家人犯罪，並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頁 35）。由於玉賢已經認定于氏父子有罪，因此，于氏一家人難逃死於「站籠」酷刑的下場。此間于學禮的媳婦吳氏曾央求父親吳舉人代為尋覓解決之道，可是玉賢面對眾人的勸說，非但不予重視，反而氣憤的說道：

俗話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案：衙門稿案）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第五回，頁 41）

于學禮的媳婦吳氏早已不耐嚴刑拷問，香消玉殞於牢獄之中。衙門稿案等小吏雖然懷疑于家人可能遭贓蒙冤，轉而向玉賢進言，但是玉賢非但置之不理，反以其「威嚴」恫嚇有意勸說細審案情之人。受到衙門稿案勸說的刺激，玉賢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立刻要求對於家人施刑，「無奈」站籠已經再沒有「空間」可讓于家人服刑：

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記得這兩天沒站甚麼人，怎麼會沒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第五回，頁 39）

人滿為患的「站籠」當然說明了玉賢吏治的殘酷。面對此境，玉賢處理方式，卻是將原本「站籠」裏的四人下放並拉至公堂上，處以二千板子的刑罰致死後，再將于氏父子放進「站籠」，結束了于氏一家人的性命。表面上看來，玉賢是一位擅於治理的官吏，並讓治區擁有路不拾遺的淳樸景象（第三回），但他卻是以「站籠」的嚴酷刑罰，以達到長治



久安的良善風氣。玉賢以「站籠」的滿溢，自詡能夠保護地方百姓身家安全的政績，然而，披掛在「政績優良」的實質裡，卻是為了謀求光明前程的私欲所致。正如他斥退衙門稿案欲勸說謹審于家案件時說道：「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了！」（第五回，頁 41），的確，雷厲風行的酷刑吏治，確實為玉賢帶來官場升遷的大好機會，一如第三回中，玉賢就因為優良績效，重現古時「路不拾遺」的善良風俗，從而獲致莊宮保的賞識，並且得到莊宮保「專摺明保」補缺曹州府的機會。也就是說，玉賢確實是個不接受關說賄賂的清官，相反地，他還是個「公事公辦」的官吏，然而，過於自恃剛愎的浮濫施刑，卻讓他成為草菅人命的「喪門星」、「賽過活閻王」酷吏形象，而這一種形象，即成為玉賢追逐錦繡前程的最大諷刺。

第十五至十八回中出現的剛弼，則是《老殘遊記》譴責的另一個酷吏。前文已述，胡舉人試圖以賄賂的方式，來疏通賈家的命案，因為胡受到魏家管事的央託，知道賈家命案的被告是遭受誣告的，因此企圖挽回被告魏氏父子的性命，然剛弼不僅拒絕了這樣的請求，並以此作為判定賈魏氏有罪的證據。范忠信認為酷吏時常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治安敗壞的地方官吏，肩負著肅清盜匪豪強、維護治安及恢復社會秩序的重要使命<sup>46</sup>，因此，剛弼奉命審理賈家命案時，劉鶚便先賦予剛弼不明究理、草率施刑的殘酷形象：

前數日，齊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性剛，名弼，是呂諫堂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撈子。兩人都暈絕過去，卻無口供。（第十五回，頁 142）

尚未審理案情，即立刻施予夾棍、撈指酷刑，剛弼的殘暴身影於甫登場之時，便已昭然若揭、躍然紙上。可憐魏老兒與賈魏氏無法承受酷刑嚴逼，在萬般不得已的情況下畫押認罪。即使已經屈打成招而伏首認罪，魏老兒也已經冤屈伏法，但剛弼的追索仍欲罷不能無法停止。原來賈幹構陷魏老兒父女時，曾提出賈魏氏乃是與姦夫共謀設計，施法毒害賈家十三口人命，因此，當賈魏氏頂替了謀殺罪名之後，剛弼更要窮究賈魏氏姦夫的蹤跡，欲定下賈魏氏的通姦之罪，此時賈魏氏無奈表示實無姦夫，無從招供的窘境：

<sup>46</sup> 見范忠信，〈酷吏現象與中國專制制度〉，頁 109。

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大老爺怎麼吩咐，他怎樣招；叫他捏造一個姦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廳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個淫婦，真正刁狡！撈起來！」堂下無限的大人叫了一聲「嘎」，只聽跑上幾個人去，把撈子往地下一摔，霍綽的一聲，驚心動魄！（第十六回，頁 153）

面對通姦這種莫須有罪名的加諸，賈魏氏抵死不認，因此，「刑上加刑」是剛弼用以追查案情的唯一手段，而其殘酷形象也在賈魏氏的言說中表露無遺。剛弼憑藉著賈幹的指控、胡舉人關說的證據，以及嚴刑逼供的施罰，便一口咬定魏老兒與賈魏氏犯罪定案的歷程，正如王學均所指稱的「有罪推定」；也就是說，剛弼依恃著學問識見的累積，以及以「君子」自居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的思維，使其形成剛愎自用的「理學化清官」特質，而這種特質的具體展現，便是「有罪推定」的審案模式<sup>47</sup>。因此，魏老兒與賈魏氏的慘境，可以說是剛弼推演論定及實施酷刑下的必然結果。

當老殘爲了拯救賈魏氏而寫信給莊宮保，並請求白子壽前來覆審後，一樁冤案才得到解決。然而，剛弼施以酷刑的目的，是否與玉賢博求能吏名聲以謀飛黃騰達的思維相同，這我們不得而知，不過，自白子壽到來後，從剛弼的言行舉止卻能夠窺見其與玉賢殊異之處。剛弼見到白子壽，便將他所掌握的案情一一訴說，並且義正詞嚴的談道：「但此魏老頗有錢文，送卑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處攪亂黑白」（第十八回，頁 166），剛弼的說詞，很明顯的是他自己推斷的結果，此一說詞，不僅深化了他「有罪推定」的行爲模式，連帶地也點出他以「清廉」自居的判斷價值。等到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之後，剛弼雖然「心中甚爲難過，卻也說不出甚麼來」（第十八回，頁 170），不過當他接受白子壽點出清官自大迂腐的缺失後，他倒也能夠由衷認錯。白子壽說：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第十八回，頁 172）

---

<sup>47</sup> 王學均在〈以理殺人與有罪推定——《老殘遊記》對理學化清官的批判〉一文中，從「程朱理學」爲清朝官方哲學的角度出發，爬梳透過科舉而出仕的官吏，皆在不自覺中內化了以程朱理學爲社會行爲規範，即「政教合一」的性格模式，從而認爲自己（官吏）便是國家權力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實施者，這就是「理學化清官」的重要特質。收於《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2期，頁 139-150。

表面上看來，剛愎的形象頗為清廉，但他卻自以為是地濫用酷刑，企圖讓無辜的魏氏婦女認罪。他破案的決心是可以嘉許的，但是為了實踐內心價值的彰顯而濫虐酷刑，卻也是人民生活中的痛楚，也難怪劉鶚在第十六回的評述中言道：「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頁 154）。然而，從白子壽的言論可以發現，剛弼之所以剛愎自用，其最大的目的便是恪守「清廉」舉止的內在修為，易言之，剛弼最在意的，既不是賄款財帛，也未必是煊赫宦途，而是他對自我修養修為的苛求，以及追尋維護社稷平穩的典範價值。

到了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老殘遊記》中的酷吏，都是有意識的將傳統的「道統」價值，視為一種藉以追求自我肯定的實踐步履。玉賢利用「道統」所賦予合理性的刑法，作為博取官名、升官晉爵的仕途工具，而剛弼則以之作為追逐「廉潔不阿」清高形象的樹立。若將玉賢、剛弼的形象與老殘相較，亦可以窺見立基於「道統」傳承之下所開展出的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形象與精神面貌。

## 2. 良吏群像：莊宮保、白子壽與德慧生

《老殘遊記》並非將所有的官吏都納入批判譴責的對象，例如莊宮保、白子壽與德慧生等官吏的形象，劉鶚都給予客觀公允的描寫與呈現。誠如王學均所指，歷來討論《老殘遊記》的官吏形象，大抵都因為魯迅將其歸入「譴責小說」而模糊了「酷吏」之外的官場情境<sup>48</sup>。其實莊、白、德的官吏形象，便不是以「酷吏」身影出現其中。以莊宮保而言，大抵說來，除了在第十四回中，因為治理黃河的決策失誤，導致沿上居民的慘重損傷外，其所展現的官吏形象頗為正面。例如第三回中，當他聽取老殘治河的卓越見識，便亟欲延攬入幕，以濟州民；而他之所以會舉薦玉賢補缺曹州府，也是因為玉賢擁有「路不拾遺」的治聲，可見莊宮保禮遇賢士的行為，並不是劉鶚欲予譴責的酷吏。不僅如此，當莊宮保收到老殘的來信，乞求遣調白子壽覆審魏老兒與賈魏氏冤案時，他便立即派遣並且阻止了一場冤案的發生。尤其當魏老兒刑案終結後，莊宮保與老殘見面時，便自承罪愆的說：「前日捧讀大札，不料玉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第十九回，頁 182），坦承了他推舉玉賢時的輕率粗疏。可見劉鶚賦予莊宮保的形象，並非一味求取功名利祿的昏庸貪殘，而是惜才用才，卻又肯坦承錯誤的磊落官員。

<sup>48</sup> 見王學均，〈以理殺人與有罪推定——《老殘遊記》對理學化清官的批判〉，頁 141。

而白子壽則是講求實證與科學辦案的官吏。第十八回中，由於白子壽不懷成見的細心瞭解案情，以及步步尋求案情的突破關鍵，才讓賈幹的詭計浮出檯面，免去魏老兒頂罪埋冤的慘境。不同於玉賢與剛弼的動輒濫刑，白子壽更講求的是重證據、重推理的辦案過程，以致於他能夠擺脫「有罪推定」的窠臼，同時也呈顯了不同於問訊逼供的傳統模式。

《老殘遊記·二編》中再次登場的德慧生，也是「二十多歲上中進士，點了翰林院庶吉士，因書法不甚精，朝考散館散了一個吏部主事，在京供職」（第一回，頁 201）的官吏。在此回中，德慧生更展現了高瞻遠矚的不凡識見，直指日本即將侵略東北三省的陰謀。由此看來，德慧生所關切的議題，則要比玉賢著眼於自身仕宦功名的胸懷遠大的多。而《老殘遊記·二編》第五回中，德慧生聽聞泰安縣宋大爺之子，因求歡女尼靚雲不成，進而騷擾嵩里山斗姥宮的情形時，便憤恨不平的寫信給莊宮保請求協助。由這樣的舉措看來，可以發現德慧生同樣具備路見不平、人溺己溺的熱腸俠氣，亦為《老殘遊記》的官吏群像增添不同層面的觀照。歐陽健在觀察《老殘遊記》時指出：

《老殘遊記》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教導做官」的書。在劉鶚看來，「做官的法子」的關鍵，就在於「有濟於世道」；而「有濟於世道」的關鍵，又在於「有濟於民」<sup>49</sup>。

的確，劉鶚將「酷吏」與其他官吏的形象並置其中，一方面是透過「酷吏」身形的描摹譴責，表達他的社會關懷；另一方面，對於能吏形象的鏤刻，也正是劉鶚藉此發揮心中蘊含的「道」的透顯。也就是說，從與黎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官吏描寫，劉鶚不僅表達了他對於國家現況與百姓生活的殷切關愛，同時，他也能夠以此諷喻，彰顯其心中「道」的價值意義與具體展現，當然，這裡的「道」依然是「太谷學派」的基本精神，即「以養民為己任」的思想意涵。

---

<sup>49</sup>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173。

## 四、《老殘遊記》中知識分子群的時代意義

綜上觀之，我們發現劉鶚在《老殘遊記》裡，戮力描摹晚清紛雜多樣的知識分子群像，其中，老殘當然是最爲重要的人物。顯而易見，劉鶚從「太谷學派」的思想出發，賦予老殘秉持「悲天憫人」、「以養民爲己任」的情懷，著眼於時弊糾舉的撻伐，鏤刻其殷殷關切現實社會與民生疾苦的知識分子形象。就人物描繪的呈現，我們看到老殘本著心中那份貼近「太谷學派」思想的「道」爲基礎，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淑世理想，尋求一種不完全等同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道統」的價值與內在思維。就此層面而言，桃花山上的璵姑及黃龍子可與老殘相互參照，進而形成了屬性相近的知識分子類型。不過，兩者之間存在著「外王」層次上的差異。老殘雖然有感濟世之道不在出仕爲官，而是依循從「養民」到「富國」的思考路徑與藍圖，可是當他面對拯救蒼民的蹣跚時，卻仍無法避免求助於官僚體制的裁決力量，且在此進退維谷的矛盾依違中，呈現了知識分子複雜且無力的猶疑及無奈。而璵姑與黃龍子在《老殘遊記》的文本語境中，則展現清高遯隱的知識分子圖像。與老殘相似，他們以持道自秉、絕世超然的姿態登場，觀察並議論著時政時弊的發展與缺失，展現對於社會的關心。然而，跡匿隱形的與世無爭，是否也暗示著匡正時弊的力不從心？相較於行方各處的老殘，璵姑及黃龍子似乎也在「不治而議」的形象擘畫裡，流露出無力社稷改革的長吁短嘆，以及完美理想的寄寓，從而與老殘形象相互遙映，形成知識分子的唉聲嘆息。

相較於老殘、璵姑及黃龍子的形象，《老殘遊記》中的官吏則是知識分子描摹的另一層面。玉賢與剛弼的酷吏形象，說明了某些傳統知識分子在傳統「道統」的意涵開展下，有意利用它作爲陞官進爵與樹立廉潔的價值追求。浮濫施加的酷刑，諷刺著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殘虐及迂腐，塑造其僅是關切己身的知識分子形象。與之對照的則是良吏的並置呈現。莊宮保、白子壽與德慧生這些人物，雖然也有其缺陷，但是他們並不顛覆地堅持成見，反能展現在傳統政治體制下，自我反省與關切國家的正面形象，這也替晚清知識分子群體的時代精神，增添一抹細微的註腳。可見，《老殘遊記》中的知識分子群，絕大多數都未依附在維新或革命思潮的主流價值之中。易言之，《老殘遊記》裡知識分子的多重樣貌，除了見證晚清詭變轉折的時代風貌與精神價值，同樣地，也替我們提供了知

識分子從傳統走向近代過渡的「典型化」遞嬗歷程中，更為細緻的觀察與陳述，以及釐清深化晚清在維新與革命思潮之間，另類「救亡圖存」思考曲徑的展現。

## 參考書目

### 一、文本

1. 劉鶚，《老殘遊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 二、專著

1. 林瑞明，《晚清譴責小說的意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0。
2. 周陽山等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82。
3.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武漢：人民出版社，1982。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歷史研究所，1984。
5. 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0。
8.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9. 米列娜編、伍曉明譯，《從傳統到現代：19 至 320 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10. 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11. 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12.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輯委員會主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史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
13.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14. 吳淳邦，《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5. 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臺二版。

16.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7.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8. 李瑞騰，《《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
19.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
20. 王學均，《劉鶚與老殘遊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21. 詹石窗，《新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中國書店，2002。
22. 方長安，《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 20 世紀 30 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23. 許紀霖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4. 高瑞泉、山口久和編，《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5. 董國炎，《明清小說思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6.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27. 許紀霖編，《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8. 鄭大華，《晚清思想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9. 黃順力，《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論》，湖南：嶽麓書社，2005。
30. 葛兆光，《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三、期刊論文

1. 關愛和，〈論老殘〉，《文學評論》，第 4 期，1994 年。
2. 范忠信，〈酷吏現象與中國專制政治〉，《歷史月刊》，第 94 期，1995 年 11 月。
3. 汪叔子，〈劉鶚及太谷學派與維新運動關係〉，《明清小說研究》，第 3 期，1998 年。
4. 陳俊啓，〈《老殘遊記》中的「個人主觀主義」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涵〉，「靜宜大學中文系第二十六次學術論文研討會」，2001 年 5 月 24 日。
5. 陳俊啓，〈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晚清文人劉鶚的一個思想史個案考察〉，《國立編譯館刊》，第 30 卷 1/2 期合刊，2001 年 12 月。

6. 鄧美華，〈試論晚清小說對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刻劃〉，《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2001 年。
7. 鄭兆江〈從《老殘遊記》看劉鶚對「自我」的探求〉，《靜宜人文學報》，第十五卷第二期，2003 年 12 月。
8. 王學均，〈以理殺人與有罪推定——《老殘遊記》對理學化清官的批判〉，《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2007 年。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67-98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67-98

# 變調的物候——黃文儀的季節書寫

許惠玟 廖美玉\*

## Unigue weather description ——Wen-Yi Huang's Season Description

by

Huai-Wein Hsu and Mei-Yu Liao

關鍵詞：黃文儀、鳳山、季節書寫、變調物候

**Keywords:** Wen-Yi Huang Feng Shan Season Description unique weather description

---

\* 許惠玟，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廖美玉，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 〔提要〕

在鳳山文人中，黃文儀存詩總數高達 96 首，高居第一，題材內容也較其他文人多元，其冬季書寫的詩作總數量，幾乎超過全部作品的一半。黃文儀身處在臺灣南部的鳳山縣，一個冬天不見雪的地方，何以詩人會如此著重在「冬季」或「冬景」的書寫？他的季節書寫呈現出什麼特殊的意涵？

從「方志與詩作的兩種冬景」來看，黃文儀冬景書寫呈現了臺灣南部冬景的「不可能」。而詩人在詩中大量出現的「雪」與「鶴」書寫，均出自詩人的「想像」。不管是「想像」雪、鶴，或是「想像」季節，即使非臺地所有，只要和冬天有關，都可以藉由「想像」冶為一鑪，型塑成詩人自己的「虛擬空間」。黃文儀的「虛擬空間」可視為個人生命歷程的重要寄託，藉由「誇飾」反映出的「真實」，可以使我們從中窺得詩人的內心世界。當詩人作品出現秋冬不分，同時以霜、雪並列，用冬天才會出現的「雪」來凸顯秋季之「冷」時，可視為因黃文儀極為怕冷，因此才將秋天的寒冷氣候予以誇大；其專寫早春的用意也在此。而夏季節的消隱不見，又可以視為其對炎熱氣候的不耐，因此不願藉由書寫加重其燥熱感。兩者相互映照，黃文儀既怕冷又怕熱的虛寒性體質，應是可能的。此外，黃文儀詠在地的梅花，除了置入臺地所沒有的雪景外，還摻雜了許多神仙思想與用典。就詩人內在情蘊來看，其對冬季雪景的想像是聯結神仙世界的，二者都是一種虛構，同時也是一種嚮往。或許是因為感嘆生命的有限與無常，希望可以在神仙世界中找到寄託；也或許是因為現實生活的不如意，希望能藉由神仙世界的塑造，在心靈上找尋可以隱遁的理想空間。正因為現實生活缺乏可以恣意宣洩的管道，因此才會藉由神仙世界的想像找尋出口。而神仙世界的「現實化」與「人世化」，透過冬季一片皚皚白雪的景象，將二者連結成密不可分的情境，使黃文儀的季節書寫映現出獨特的變調物候。

## Abstract

Among the writers in Feng Shan, the volume of poems Wen-Yi Huang composed ranked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of poems he composed is 96. The content of his poems are more

varied than those of other writers, but those describing winter are over half of his total works. Wen-Yi Huang comes from Fong Shang county, southern Taiwan, a place where one cannot see snow, so why does Huang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descriptions of snow?

From “two winter scenes of local records and poems,” Wen-Yi Huang’s description of winter presents an “impossibility” of southern Taiwan’s winter scenery. “Snow” and “crane” appear in Huang’s poems a great number of times, but they all come from his imagination. No matter he that he imagined the snow, cranes, or the season, as long as they are related to winter, they can be realized and visualized through the writer’s creativity; hence, the writer’s “virtual space” was created. Huang’s “virtual space”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his life. Through “the exaggerated,” it reflects the “reality” and hence we can see into the writer’s inner mind. The writer exaggerates autumn’s coldness, and we can see that Wen-Yi Huang is afraid of the cold. This also happens when he describes early springs, an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ummer is not mentioned at all in his works, so we can assume that Huang is annoyed by the summer heat. Therefore, he is not will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which may increase his discomfort. Wen-Yi Huang is afraid of cold and heat, so it is possible to assume that he is not healthy at all. In addition, Huang praises the beauty of plum blossom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many fairy tales. From the aspect of Huang’s inner emotion, his imagination of the winter’s snowy scene is connected to fairy world, for both are a type of fiction and also a dream. Perhaps he realized that life is short and changeable, so he was hoping that he could seek for an ideal space where his soul could hide. Perhaps he had no way to release his feelings in reality, so he found a way out through imagining the world of fairies. The “real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in the world of fairies combined closely, which reflect in his unique weather description.

## 一、前言

黃文儀（？～？），鳳山邑附貢，現存詩 96 首，是鳳山地區作品數量最多的本土文人，惜其生平資料仍多不可考。據其詩作〈記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中述及道光 4 年「許成之役」，又據《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乙、示諭」所載，道光 7 年正月鳳山縣知縣杜紹祁曾據「興隆里城內廩生鄭闐、陳琨，生員張振□、黃文儀、藍文俊，耆民吳傳、黃助、錢興等呈」示禁，要求「居民人等知悉：爾等毋得在武廟□圍香燈之草山混行樵採。如敢抗違，定行拏究不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sup>1</sup>。」，可知黃文儀為鳳山縣興隆里人士。興隆里或稱興隆莊，康熙 22 年 8 月提到「設縣治於興隆莊，取其名曰鳳山<sup>2</sup>」。另據現存於臺南市大南門碑林的「缺題碑」，上有「生員黃文儀……捐銀五十員<sup>3</sup>」的記載，時為道光 18 年。此外，《臺灣私法人事編》「第一款能力·第五婦女之能力」的「（甲）不動產之獲得及其處分<sup>4</sup>」有一段記錄，內容為：

立約字人興隆里新城內黃文儀，有明買過英必類田參坵，受種四分捌厘，在南門外瓦◆後，東西四至俱載上手契明白為界。帶蓮花潭水陸分，灌溉水路由吳林二宅之田經過，年納供粟貳石伍斗參升。今因外甥重業家事清淡，願將此田付與重業子孫為祠田，收租納課，世守勿替。後來儀子孫不得爭較討回，而異日重業子孫亦不典賣他人，致使祠費無資。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約字壹紙，並繳連上手契參紙，共肆紙，付執為炤。

道光貳拾七年拾貳月 日

- 
- <sup>1</sup> 見《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乙、示諭」〈示禁碑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1965 年，頁 460~461。
  - <sup>2</sup> 見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一《封域志》〈建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二年（1737），頁 3。
  - <sup>3</sup> 見《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丙、其他」〈缺題碑〉，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1965 年，頁 628~629。
  - <sup>4</sup> 見《臺灣私法人事編》「第一款能力·第五婦女之能力」的「（甲）不動產之獲得及其處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1961 年，頁 71~72。

知見人 黃進  
立約字人 黃文儀  
公親人 張振南  
代書人 黃鐘

顯示黃文儀的活動時間，至少跨越道光 4 年、7 年、18 年、27 年。若黃文儀於道光 4 年已經歷「許尙、楊良斌之役」並留下記錄，則可推斷其當出生於嘉慶年間，主要活動時間為清道光時期（1821~1850）。其餘生平不詳。

盧德嘉等人撰修的《鳳山縣采訪冊》，就其新輯錄的詩作者加以統計來看，黃文儀被選錄的作品最多，高達 96 首，所占比例超過采訪冊所有新收錄詩作數量六成，題材內容也較其他文人多元，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指出：

《鳳山縣采訪冊》雖選錄了黃文儀為數眾多的詩歌作品，卻沒有黃文儀的傳略事蹟、詩文著作的記載說明，也無任何黃文儀與采訪冊修志者來往關係、淵源的紀錄，……而《鳳山縣采訪冊》的修志者之所以會選錄黃文儀數量如此多的詩歌作品原因……據筆者推測很有可能是因為早期鳳邑本地文人詩歌作品蒐集不易，所以大量刊登黃文儀的詩作，具有保存流傳本邑文人之文學史料的用意<sup>5</sup>。

這樣的推論大抵可以成立。以盧德嘉為例，他是撰修《鳳山縣采訪志》的主要文人，但該書中所收詩作不過 7 首；周揚理、林靜觀、吳士俊都參與《鳳山縣采訪志》的纂修，但書中也都只有收錄他們關於〈鳳山竹枝詞〉的詩作 2 首；僅次於黃文儀詩作數量的沈時敏，是鳳山縣茂才，也曾擔任鳳儀書院董事，但收錄的詩作是 14 首，和黃文儀的 96 首相比，同樣為天壤之別。如果不是黃文儀本身詩作數量龐大，且恰於修志當時為盧德嘉等人蒐羅，或許不至於有這麼多的詩作流傳。

有關黃文儀詩的研究，最早是彭瑞金在〈鳳山文學發展簡史〉的說明，指出黃文儀「較少寫八景詩之類的題目，詩題輕盈多了」、「畢竟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雅士詩篇」，重

<sup>5</sup> 見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189。

點則放在〈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稱許為「有價值之文學文獻<sup>6</sup>」。其後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仍集中在〈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並與同為鳳山文人鄭蘭的〈剿平許逆記事（並序）〉相對照，許成是張丙事件中的「南路賊<sup>7</sup>」，因此屬於張丙事件<sup>8</sup>。從鄭蘭的活動時間來看，這一點是可以成立的，《鳳山縣采訪冊》的〈己部·科目〉「歲貢」條記載，其為「縣學，原籍龍溪」，道光 17 年丁酉歲貢<sup>9</sup>，與黃文儀同為興隆里人，曾於道光 22 年參與修曹公新圳的工程<sup>10</sup>，二人居住地相鄰，活動時間相近，有可能同時經歷許成事件，因此兩人作品的確有關連性。此外，王俊勝也探討了黃文儀的「詠懷詩」與「詠物詩」，指出「其詩作題材以閒居生活的雜詠感懷詩為主，而且內容多描寫秋、冬景及寒梅，另外他善以組詩的方式作詩歌寫作的形式<sup>11</sup>。」不管是彭瑞金或王俊勝，對於黃文儀的詩作都聚焦在記實成份極高的〈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組詩，對於為數眾多的閒情詠物之作，並未詳加討論。

李友煌在〈失落的亞熱帶植物群落初探—以清代鳳山縣二志一冊植物書寫為例〉一文中，以黃文儀和陳輝的植物書寫，作為「自欺」與「自覺」的分別，認為黃文儀是「沒有本土自覺，徒在詩中設地造景，冰天雪地、梅妻鶴子，進行中國式的詩文想像<sup>12</sup>」。黃

<sup>6</sup> 彭瑞金〈鳳山文學發展簡史〉指出：「歲貢鄭蘭作有〈剿平許逆記事〉……同是本邑附貢的黃文儀，則留下了〈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分別以〈用人犧〉……〈迎官軍〉為題。雖然以同樣敘事觀點，認定是「許逆滋事」，敘述事蹟也大體相同，卻留下了這場「戰事」令人傳述不已的事蹟。……記錄這場戰事的詩文，都是出自與官方立場一致的文人之手，聽不到民間的聲音，但仍可隱約從中捕捉到「官逼民反」的歷史影像……鄭蘭、黃文儀等人的詩文，只要換個角度去看，還是可以看出端倪，仍然是有價值之文學文獻。」收入《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3 期，2000 年 8 月，頁 36。

<sup>7</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年，頁 426。

<sup>8</sup> 王俊勝認為「雖然黃、鄭二人用不同的文體描寫許成事件一事，但比較兩人所記述的內容情節、及對於閩客衝突所抱持看法批評，幾乎是有志一同，因此推想黃文儀所寫作的〈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詩，應與鄭蘭的〈剿平許逆記事（並序）〉一文有相當的關連性。」同註 5，頁 184。

<sup>9</sup> 見《鳳山縣采訪冊》〈己部·科目〉「歲貢」條，頁 243。但《臺灣通志》〈選舉·貢生〉「鳳山縣」，卻作道光 15 年，見《臺灣通志》頁 422，當以《鳳山縣采訪冊》為是。

<sup>10</sup> 見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丙部·地輿（三）〉「圳道（水利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年，頁 78。

<sup>11</sup> 王俊勝指出「詠懷詩都是寫他在讀書賦詩、飲酒品茗，參禪悟道閒居生活的感受」，並認為「這種描寫山林生活經驗、抒發對生命萬物的體會感想的内容，是他詠懷詩作的主調，也以這類風格的詩作最多。」同註 5，頁 189、185、186。

<sup>12</sup> 見李友煌，〈失落的亞熱帶植物群落初探—以清代鳳山縣二志一冊植物書寫為例〉，《高市文獻》16 卷

文儀身為本土文人，卻對臺地氣候「無感」，是否真的只是如李友煌所推斷的「忽視腳下立足處」、「犧牲本土環境氣候之現實與真實面」，以至於「在中國意象（詩文想像）與台灣現實（地理環境）間存在著嚴重的斷裂<sup>13</sup>」？或者應如胡徵（廣西桂林人）在〈恆春竹枝詞八首<sup>14</sup>〉所說「居民習慣渾閒事，反說無風瘴氣濛」，正因為太過習慣，加上一直未曾離開過臺灣，缺乏體驗中國內地氣候的經驗，因此無法藉由「比較」去「意識」到臺灣氣候的「特色」？本文爬梳方志相關記載，並全面檢視黃文儀的詩作，期能對黃文儀季節書寫的變調現象，有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 二、方志與詩作的兩種冬景

以清代鳳山文人的描寫內容來看，黃文儀對於「季節」（時間）的大量著墨，與卓肇昌對於空間書寫的偏好，二人剛好呈現分庭抗禮之勢，各自凸顯不同的描寫面向。這也可以看出，黃文儀對於「時間」書寫的偏重，恰好突凸顯出其對「空間」的忽視，卓肇昌則恰好相反。而僅次於黃文儀詩作數量的沈時敏，所收 14 首詩中，〈陳明府邀覽園花〉前後共 9 首，〈送陳諒山夫子歸福州〉 3 首，另二首為〈偕友人遊鳳山〉及〈除夕〉，總計酬唱之作就佔了 12 首，與黃文儀、卓肇昌的書寫內容均不同。而其他鳳山文人則偏向在八景詩的創作。由此也可以看出黃文儀的季節書寫，的確有不同於其他鳳山文人的特殊性。

檢視黃文儀的 96 首詩作，其中直接描寫冬季的作品有 25 首（含〈即景四首〉之四），寫冬天梅花的有 23 首，若加上詩題並非冬景或梅花，但詩句內容實為冬季，則冬季書寫的詩作總數量，幾乎超過全部作品的一半。考量黃文儀身處在臺灣南部的鳳山縣，這地方的地理位置是「臺僻東南隅，地勢最下，鳳為尤甚。四面環海，遙隔重洋<sup>15</sup>。」因此，氣候上的明顯特色呈現：

---

3 期，2003 年 9 月，頁 15。

<sup>13</sup> 同註 12，頁 15。

<sup>14</sup> 見陳文煒，〈恆春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75 種，光緒二十年，頁 249。

<sup>15</sup> 見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三《風土志》〈氣候（附歲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二年（1737），頁 45。

與內地懸殊，大抵暑多於寒。鐘鼎之家，狐貉無所用；細民無衣無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匏蔬菜之屬，雖窮冬亦華秀。此寒暑之氣候不同也。（「府舊志」）<sup>16</sup>

風治如下淡水等處，冬少朔風，土素和煖。蘊隆之氣，晝為特甚。入夜轉寒，未晡而露降。日出而霧消。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有也<sup>17</sup>。

一個冬天「狐貉無所用，細民無衣無褐，亦可卒歲」，甚至「霜霰，則無有也」的地方，何以黃文儀會如此著重在「冬季」或「冬景」的書寫？他的季節書寫呈現出什麼特殊的意涵？與其他鳳山文人相較，又呈現出哪些自己的特色？

施懿琳在〈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嵌集》中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一文提到，康熙年間來臺的孫元衡，在初面對臺灣這塊陌生土地時，所感知到的臺地氣候特色便是將最具南國風味的「炎蒸濕熱」，而「幾乎所有清代來臺者對冬季的書寫，都類似孫元衡所採取的視角，可以說是來臺詩人四季書寫中最弱的一環<sup>18</sup>。」究其原因，跟這些詩人所處的籍貫多位於四季分明的區域有關，也因此「在季節感混亂、幾乎沒有寒冬的臺灣，除了一再強調歲暮天暖、冬季無雪，表達個人的遺憾和不適應之外，似乎很少開展出新的寫作視域<sup>19</sup>。」這個議題，是臺灣古典詩中極耐人尋味者，值得進一步關切。

相對於來臺遊宦文人普遍感受到的是「地暖臘殘無雪到」（高拱乾〈東寧十詠〉），生長鳳山的黃文儀詩中，反而屢屢出現「雪滿前山路正深」（〈冬日雜詠〉）、「寒侵三徑雪」（〈冬夜八首〉）、「雪蕊散時天欲曉」（〈冬景八首〉）、「栖煙壓雪橫籬落」（〈梅〉）的雪景書寫。來臺遊宦文人與在地詩人在冬景書寫上的反差，又當如何看待？

清代道光年間的鳳山縣冬天，真的能見到雪嗎？抑或這只是詩人的想像之詞？

對此我們先從當時官方的方志記載尋求佐證。依徐泓在《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所作的整理，「清代台灣霜雪冰雹史料」的記載，在數量上遠低於地震、旱災、洪災

<sup>16</sup> 同註 15，頁 45~46。

<sup>17</sup> 同前註，頁 46。

<sup>18</sup> 參考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嵌集》的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1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1。

<sup>19</sup> 同前註，頁 131~132。



與風災。爲方便論述，整理成表格如下<sup>20</sup>：

時間／氣候	出處	篇目卷頁	內文
康熙廿二年十一月 (1683/12/18~1684/1/16) 臺灣西部下雪或下霜，並結冰	高拱乾《臺灣府志》	外志·災祥 (卷9, 頁218)	癸亥冬，始雨雪，冰堅厚寸餘。臺土氣熱，從無霜雪。是歲八月，甫入版圖，運屬一統；地氣自北而南，此其兆也。
	陳夢林《諸羅縣志》	雜記志·災祥 (卷12, 頁276)	冬十一月，始雨雪，冰堅厚寸餘(諸羅有霜無雪；是歲甫入版圖，地氣自北而南，信有徵矣)。
	王禮《臺灣縣志》	雜記志·祥 (卷9, 頁217)	冬，雨雪。臺地燥熱，從無霜雪，聖化所沾，天時爲之變易，信不誣也！
	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	雜記·祥異 (卷15, 頁545)	冬十有一月，雨雪冰(臺地氣煖，從無霜雪。是歲八月，甫入版圖，冬遂雨雪冰，堅寸許·地氣自北而南，運屬一統故也)。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	政志·祥異·賑卹 (卷2, 頁94)	冬十有一月，雨雪冰(是歲八月入版圖，冬遂雨雪，冰堅寸許，爲前所無·地氣自北而南，運屬一統故也)。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	天文·冬雪 (卷下·頁152)	是冬北路降大雪，寒甚。自後氣亦漸寒。雖有時隆冬穿單袷汗流，亦偶然耳。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	海東臚語上·冬寒 (頁60)	是冬北路降大雪，寒甚；自後氣亦漸寒，雖有時隆冬穿單袷汗流，亦偶然耳。惟鳳山差煖。

<sup>20</sup> 詳見徐泓，《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行政院國科會，1983年，頁23~24。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1788/3/8~4/5) 北部大雨雪	陳培桂《淡水廳志》	祥異(卷 14, 頁 348)	春二月, 大雨雪, 饑。斗米千錢。
	沈茂蔭《苗栗縣志》	祥異考(卷 8, 頁 128)	春二月, 大雨雪, 饑。斗米千錢。
嘉慶廿年十二月 (1815/12/30~1816/1/28) 北部雨雪有冰	陳培桂《淡水廳志》	祥異(卷 14, 頁 348)	冬十二月, 雨雪, 冰堅寸餘。
	沈茂蔭《苗栗縣志》	祥異考(卷 8, 頁 128)	冬十二月, 雨雪, 冰堅寸餘。
嘉慶廿一年十二月 (1817/1/17~2/15) 彰化有冰	周璽《彰化縣志》	雜識志·災祥(卷 11, 頁 385)	冬十二月, 有冰。
道光卅年六月初一 (1850/7/9) 下午一、二時宜蘭風雹	薩廉《噶瑪蘭廳志》	祥異(卷 5 風俗上, 頁 223)	夏六月辛酉, 風雹(初一日未刻, 西勢大湖莊突起旋風, 雨雹, 打傷土名八十佃隘界田園稻穀、青果園、蔬菜等物)。
咸豐五年十二月 (1856/1/8~2/5) 北部雨雹	陳培桂《淡水廳志》	祥異(卷 14, 頁 349)	冬十二月, 雨雹。
	沈茂蔭《苗栗縣志》	祥異考(卷 8, 頁 129)	冬十二月, 雨雹。
咸豐七年正月 (1857/1/26~2/23)	陳培桂《淡水廳志》	祥異(卷 14, 頁 350)	春正月, 大雪, 屯山積數尺。
	沈茂蔭《苗栗縣志》	祥異考(卷 8, 頁 129)	春正月, 大雪。
光緒元年六月廿八、九日 (1875/7/30~31) 埔里八同關下霜 七月初一(8/1)下雪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	天文·霜雪(卷下·頁 149)	六月二十八、九日, 嚴霜兩夜, 次日雨雪交霏。八同關, 今在埔裏廳。
光緒五年十二月 (1880/1/12~2/9)	倪贊元《雲林采訪冊》	斗六堡·災祥(頁 40)	十二月十五日, 大雨雹。

雲林大雨雹	倪贊元《雲林 採訪冊》	布 嶼 西 堡 · 災 祥 (頁 203)	十二月十五日，大雨雹。
光緒六年六月初三 (1880/7/19)	倪贊元《雲林 採訪冊》	斗六堡·災 祥 (頁 40)	大雨雪
雲林大雨雪	倪贊元《雲林 採訪冊》	布 嶼 西 堡 · 災 祥 (頁 203)	大雨雪
光緒十八年十一月 (1892/12/19~1893/1/17)	沈茂蔭《苗栗 縣志》	祥異考 (卷 8, 頁 131)	冬十一月，大雪。
苗栗以北大雪	林百川《樹杞 林志》	祥異考 (頁 114)	冬，大雪連下三日，平地高丈 餘，深山中尤甚。樹梢堆積， 斷者無算。
	林豪《澎湖廳 志》	(卷 11, 頁 378)	十一月，天大寒，內地金門、 廈門大雪盈尺，為百年來所未 有。澎雖無雪，奇寒略相等。
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一 (1893/1/18)	沈茂蔭《苗栗 縣志》	祥異考 (卷 8, 頁 131)	十二月朔，復大雪。
淡北、雲林、嘉義大雪	倪贊元《雲林 採訪冊》	布 嶼 西 堡 · 災 祥 (頁 203)	十二月，大雪，五穀、豬羊多 凍死。
	不著傳人，《 嘉義管內采 訪冊》	打貓堡·災 祥 (頁 9)	十二月，雪下數寸，六畜凍死 。
光緒廿二年十二月 (1897/1/3~2/1)	不著傳人，《 嘉義管內采 訪冊》	打貓堡·災 祥 (頁 9)	十二月，天降霜威，地瓜凍死 。
嘉義降霜			

從上述資料來看，清廷治臺的 212 年，見諸於臺灣方志記載的霜雪冰雹，共計出現在 13 年份中。值得注意的是，道光 30 年 6 月的宜蘭，光緒元年 6 月、7 月的埔里，以及光緒 6 年的雲林，都曾在夏季出現大雨雪。就地域來看，集中在今嘉義以北，如方志中的雲林「布嶼西堡」，在「在縣西三十里……南以舊虎尾溪與白沙墩、大坵田分界，北以

潭墘溪與彰化深耕堡分界。<sup>21</sup>」，又如嘉義「打貓西堡」，在「嘉義城之西北二十五里……南以新港與牛稠溪堡菜公厝莊分界，北以柴林腳莊之北端雙溪口溪與臺中縣打貓北堡新莊仔分界。<sup>22</sup>」二地領轄範圍的南界均不超過嘉義。而這些資料中尚有幾點值得一談：

一、臺地下雪記錄並非歸入〈風土志〉中的「氣候」，而是放在方志的「災祥」或「災異」類，而該類別又多置於〈外志〉、〈雜記志〉或〈雜識志〉，顯然正是因為冬季「大雪」、「霜威」、「冰雹」並非臺地氣候「常態」的緣故。

二、康熙 22 年冬 11 月的方志記載，特別提到該月下雪是「是歲八月，甫入版圖，運屬一統；地氣自北而南，此其兆也。」（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地燥熱，從無霜雪，聖化所沾，天時爲之變易，信不誣也！」（王禮《臺灣縣志》），正因下雪並非臺地氣候「常態」，因此當康熙 22 年臺灣初收入清朝版圖，又碰上「雨雪」時，文人的普遍思維認爲因「運屬一統」，故地氣的延伸自北至南，形成空間地理上的「統一」，因而把「天時爲之變易」的氣候異常，美化成「聖化所沾」的帝王德澤。也因此王禮《臺灣縣志》直接認爲在不下雪的臺灣下雪，根本就是「祥」而不是「災」，並直接納入〈雜記志·祥〉中，顯然臺地異於常態的氣候特質，在遊宦文人的方志采錄下，已被賦予了政治的意涵。

從官方的方志記載來看，臺灣本地出現「冰雪」的記錄寥寥可數，而鳳山地區甚至並無有關該地下雪的記錄，因此黃文儀要在故鄉鳳山地區經驗冰雪的實景，應該是不太可能的<sup>23</sup>。但如果臺灣全地的「冰雪」並不常見，而南部的鳳山地區甚至不可能在冬天出現冰雪現象的話，黃文儀有無可能是在臺灣以外地區經歷冰雪的冬季經驗？

對此我們可以從其身份來作檢閱。黃文儀的身份是鳳山邑的「附貢」，在清朝科舉制度下，這算是「異途」，相較於五貢（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的正途出身，「准貢」、「廩貢」、「增貢」、「附貢」、「例貢」等名目，都是由捐納而來。而不管是正途或異途的貢生，其身份的取得都是在臺灣由廩生出貢。換言之，假若黃文儀只具「附貢生」

<sup>21</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光緒二十年（1894），頁 194。

<sup>22</sup> 不著傳人，《嘉義管內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8 種，明治三十年（1897），頁 1。

<sup>23</sup>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正史以外，沒有記載的下雪記錄也許存在，不能因為沒見到文獻記載而排除有下雪之事，暖熱的南方也未必不飄雪。如果只是偶然飛霜作雪，隔天一早即散去，並不造成災害，方志似乎也沒有記載的必要。只是上述推論因為缺乏文獻記載，故只能作爲參考，筆者仍選擇方志上的記錄作爲本論文佐證。

身份，而未往上取得更高功名的話，則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未離開過臺灣，也因此要從臺灣以外的地方看到冰雪，同樣變得不太可能。緣於上述理由，黃文儀作品中出現的冬季書寫，很有可能多半是其想像之詞。

### 三、黃文儀冬季書寫的虛擬性

我們接著想進一步探討的是，為什麼黃文儀要對於臺灣冬天不可能出現的「雪景」，並且一再進行「想像」？

#### (一) 實景所無的冬景與地景

##### 1. 「雪滿空山人獨立，霜凝老幹木初凋」——鳳山邑出現的冬景？

這是黃文儀〈冬景八首<sup>24</sup>〉之五的一聯，在此以問號作為標題，正是因為「富貴之家，獸炭、貂裘既無所用，細民即無衣褐，亦可度歲」的臺灣，特別是位居最南端的鳳山縣，能夠看到「雪滿空山」、「霜凝老幹」這樣的景致嗎？但黃文儀的詩作中卻屢屢出現類似的景觀，如〈冬日雜詠〉之三「雪滿前山路正深」、〈冬夜八首〉之三「嚼雪題新句」、之四「雪香梅暗吐」、之六「寒侵三徑雪」、之八「雪黏千樹白」、〈冬景八首〉之一「半壁青燈立雪時」、之二「傲雪寒梅雨意新」、之五「霜凝老幹木初凋」、之七「冰堅地凍水無聲」、之八「雪蕊散時天欲曉」等，雪深冰堅，一片白茫茫大地，彷彿置身北國隆冬景象。從前面的方志整理中可以看出，在官方記載中，臺地是不可能下雪的，土生土長的黃文儀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事實上，在他的〈醒來〉一詩就提到「炎地寒無雪」，顯然他很清楚臺地這樣的氣候特徵，既然知道又這樣寫，很明確可以看出他是「有意為之」。

##### 2. 「倚欄日日看雲行，風動疏林鶴夢驚」——鳳山邑中群鶴飛舞？

黃文儀的冬景書寫中，常出現的物候，除了雪景，另外一個是「鶴」。本土文人在詩句中出現「鶴」字，頻率最高的也是黃文儀。從黃文儀的詩文內容來看，常會讓人誤以為鶴是鳳山常見的飛禽，但我們查閱清代臺灣方志的〈物產志〉，發現最早提到「鶴」的

<sup>24</sup> 見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五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128。以下所引黃文儀詩作，俱出於《全臺詩》第五冊頁125~145，以下不再贅述出處。

是周鍾瑄的《諸羅縣志》，但該志記載卻非以「鶴」為主角，而是藉「鶴」來說明「鶴」的長相：

鶴。〈格物論〉：「鶴，水鳥，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阜裙。狀類鶴，而無朱頂。善飛搏，巢必喬木之高枝」。〈禽經〉：「鶴生三子，其一為鶴」。臺無鶴<sup>25</sup>。

重點在最後的「臺無鶴」三個字，該書的〈外紀〉更明確提到「禽無鶴而有鶴，多雉，多斑鳩，多烏鶯、黃鸝、烏鴉<sup>26</sup>。」檢視康熙年間編纂的方志，的確也缺乏關於臺灣有鶴的記載。後來的蔣師轍在《臺灣通志<sup>27</sup>》中，完全依《諸羅縣志》所寫，同樣提到「臺無鶴」一事。至於李丕煜《鳳山縣志<sup>28</sup>》、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sup>29</sup>》、劉良璧《重修福建通志臺灣府<sup>30</sup>》、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sup>31</sup>》諸書，雖未明確點出「臺無鶴」一段，但重點的確也只放在說明「鶴」的長相。而更晚出的薩廉《噶瑪蘭廳志<sup>32</sup>》和周璽《彰化縣志<sup>33</sup>》，和前述方志記載不同，在說明「白頭翁」時指出：「似鶴而小，頭有白點」，雖有提到「鶴」，仍是借用來說明「白頭翁」的長相。

不管是用來說明鶴或白頭翁，「臺地無鶴」一事幾乎是可以確定。既然如此，何以黃文儀的冬景書寫中會一再出現「鶴」的描述？

## （二）虛擬冬景所反映的「真實」

既然鳳山地區不可能出現「雪滿空山」、「霜凝老幹」的雪地「實」景，黃文儀之所以偏好冬景書寫，恐怕不能以傳統的「誇飾」手法來概括，反而在某種程度透顯出黃文

<sup>25</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羽之屬」，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五年（1716），頁231~232。

<sup>26</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外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五年（1716），頁297。

<sup>27</sup> 蔣師轍，《臺灣通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一年（1895），頁169。

<sup>28</sup> 李丕煜，《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八年（1719），頁113。

<sup>29</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二年（1737），頁318。

<sup>30</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七年（1742），頁118。

<sup>31</sup> 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十七年（1752），頁432。

<sup>32</sup> 薩廉，《噶瑪蘭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道光十二年（1832），頁299。

<sup>33</sup>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道光十五年（1835），頁346。

儀的生活面向，亦即從「誇飾」反映出的「真實」，或可補黃文儀生平傳記之缺。

從現存詩作來看，黃文儀極為怕冷，因此將冬天的寒冷氣候予以誇大，詩人從感官的描述，一一凸顯冬天氣候所帶來的苦寒感受。詩人要如何告訴讀者，其身處的地方正陷入「嚴寒」呢？「雪景」的營造是古典詩歌中最具普遍性的呈顯途徑，因為「雪景」的「白」是一種視覺摹寫，而藉由視覺的描摹，可以提供讀者具體的想像空間，這比直接在文詞中書寫「冰」、「寒」、「冷」等字眼更能增加讀者的「切身感」。而詩人在詩句中屢屢提到冬夜或冬天中「必備」的暖爐與溫酒，也就愈發增添了「暖意」，並從「暖」意的營造反向去推衍出天氣之「寒」，如：

爐蒸名香霧裊遲。(〈冬景八首〉之一)  
 爐火香清蒸紫檀。(〈冬景八首〉之八)  
 地爐頻煮酒。(〈夜雨〉)  
 簾霧煖如煨。(〈閒居雜詠〉)  
 爐火細添香欲裊，蘭煤別盡蕊開濃。(〈醒來〉)  
 地爐松火鐘敲夜，斗酒孤燈讀漢書。(〈齋中閒居〉)

這幾首詩有的雖不都是以〈冬夜〉或〈冬景〉為題，但其書寫時節卻很明顯是在冬季，詩人在寒冷冬天用以「驅寒」的利器是「爐火」及「煮酒」。而〈醒來〉的「冷風侵煖榻」，頗能呈現身躺暖榻中，卻仍因酷寒而醒來的情狀。在寒冷的冬天中，黃文儀身處「地爐」與「煖榻」的溫暖裡，主要的消遣就是「作詩」，如〈冬夜八首〉之一說「酒後詩情在」、〈冬夜八首〉之四說「頻敲數韻詩」、〈冬景八首〉之一說「琛情間寄幾行詩」，都是描寫下雪時的室內娛樂。除了作詩、煮酒，還有同樣需要爐火的「品茗」：

茶烹活水珠跳急。(〈冬景八首〉之一)  
 天冷茶聲歇。(〈冬夜八首〉之三)  
 茶烹瑞草魁。(〈冬夜八首〉之六)  
 蟹眼聲初咽，跳珠雪亂翻。清神與滌興，玉水灑靈源。(〈閒居雜詠〉)

都很能看出在溫暖空間中一面驅寒，一面品茶的愜意生活。伴隨著煮酒、熟茶，詩人在

冬夜書寫中常常出現「夜未眠」的用詞，不難想像因為天氣寒冷，以致詩人難以入眠的情形。而濤聲是詩人在冬天不眠的夜晚中最常聽見的聲音，如：

夜靜風濤響若霆、長江寒急波濤惡。(〈冬日雜詠〉)

風起寒濤響。(〈冬夜八首〉之一)

風送濤聲來枕畔。(〈冬景八首〉之一)

夜靜濤聲聞汨沒。(〈冬景八首〉之三)

兩岸寒濤萬頃灘。(〈冬景八首〉之八)

風濤起處夜深聞。(〈即景四首〉之二)

從風聲與濤聲雙寫可以看出這樣的心緒：有風吹動才會產生濤聲，但詩人如何在夜晚聽見風聲與濤聲？多半是因為尚未入眠的緣故。〈冬景八首〉之二說：「寶鴨頻添炷，銅壺漏二更」，已經二更了卻尚未入睡，耳邊還聽到狗吠與蟲叫聲，「牢牢花犬吠，唧唧草蟲鳴」，自然是因為失眠。和前者相似，〈冬景八首〉之七的「報曉鐘初擊，霜寒落葉慄」，與之八的「整衣默坐雞三唱」，都是因為徹夜未眠，因此等待報曉的鐘聲或雞鳴聲。

除了藉由誇張或虛構的方式凸顯冬天的嚴寒與酷寒，來顯示自己的「怕冷」之外，黃文儀的季節書寫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亦即缺乏夏季書寫的詩作。《諸羅縣志》提到：

舊稱臺地立春後，即御紗葛單袷之衣，可以卒歲。夏秋酷暑，爍金流石。今不盡然。清明陰雨，尚可披裘。盛夏早晚，涼生几席；惟烈日無風，熱不可耐耳<sup>34</sup>。

這段文字後來被《重修鳳山縣志》所採納，用以說明諸羅以南的氣候特色。假若諸羅地區的「盛夏」尚且「烈日無風，熱不可耐」，則鳳山邑的炎熱應是更甚於此。何以對此一極具地方特色的酷熱，黃文儀竟無一語道及？由此以觀，黃文儀對「爍金流石」的「熱不可耐」，畏惡之情恐怕更甚於「怕冷」。因此，若時序正在盛夏，又身在嚴熱的鳳山地區，詩人在難以消暑的情況下，在詩文之中「想像」冰雪的寒冷，從而詩中營造出來的

<sup>34</sup> 見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氣候（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康熙五十五年，頁 180。



「冰」、「寒」氣息，也就成了詩人一再耽溺的想像。從另一個角度看，黃文儀詩作中夏日季節的消隱，是否也可以看成是因為不耐炎熱，因而對冬季的清淨涼爽產生莫大的渴望呢？那麼，當黃文儀亟力書寫鳳山邑不可能出現的冬景時，未嘗不可以解讀為他在酷暑炎熱底下對於寒涼天氣的渴望。

不管是因為怕冷，因而對於冬天寒意極度「誇飾」；或是因為怕熱，於是對於冬景有所耽溺，黃文儀詩文中的冬景書寫，都是在非正常情況下，呈現大量的「反常」現象。無論是「想像」雪、鶴，或是「想像」季節，正因為這些都不是實況摹寫，也就有了無邊的發揮空間，所有和冬天有關的景物與物產，即使非臺地所有，都可以藉由「想像」這個途徑冶為一鑪，型塑成黃文儀自己的「虛擬空間」。

### （三）虛擬之「鶴」的多重意涵

黃文儀所虛擬出來的空間，正因不是真實世界可見可感的實況，所以既可以是詩人在面對現實生活不如意時，一個心靈上的寄託；也可以是詩人個人生命情調中，對於出世生活的嚮往。其中對於「臺地所無」的鶴，黃文儀的虛擬則出現了比較複雜的意涵。

#### 1. 仙鶴——仙鄉化的冬景

鶴在傳說中是神仙的坐騎，也是長壽的象徵。在冬景書寫中，黃文儀顯然是有意以雪景的白象徵仙界的「不染塵」，並以鶴的存在，進一步強調神仙世界的「可及」，藉以連結現實人世與想像中的仙界。〈冬夜八首〉之三「且醉流霞待鶴還」的「流霞」所指的是一種仙酒，「飲流霞」係項曼都的典故。王充《論衡》〈道虛〉提到：項曼都好道學仙，後隨仙人上天，口飢欲食，則仙人賜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後返回人間，人稱之為「斥仙」。而「待鶴還」也具神仙色彩，黃文儀在這裡化用「王喬騎鶴」一事，劉向《列仙傳》卷上「王子喬」提到：王子喬喜歡吹笙，隨道士入山學神仙術，二十餘年後，騎鶴在緱氏山頭與家人見面的故事。同樣的用法也見於非冬景書寫的詩作中，〈扶鸞〉說「駕鶴飛來紫氣芬」，「扶鸞」本身就是一種民間請示神明的方法，而「駕鶴」更指騎著仙鶴翱翔於天，可比喻得道成仙。「紫氣」為祥瑞之氣，係老子的典故，傳說老子將過函谷關，關令尹喜登樓，見有紫氣從東而來，知道有聖人過關。這些用法都將鶴視為「仙鶴」，將鶴賦予了神仙色彩。至於〈冬夜八首〉之二「衝霄老鶴雲情在」的「衝霄老鶴」，或是〈冬夜八首〉之四「遐心寄與雲邊鶴」的「雲邊鶴」，則可以視為「乘鶴駕

雲」，指騎著仙鶴、駕著雲頭翱翔於天，得道成仙。至於其神仙世界的營造與偏愛，我們將在下文的詠梅書寫中進行探討，於此先不贅述。

## 2. 野鶴與雲中鶴——詩人心志的表跡

黃文儀有關「鶴」字用法，顯然還有另一個含意。〈清閒〉中的「欲與梅為友，常隨鶴作朋」，顯然是林和靖「梅妻鶴子」的典故。前述〈冬夜八首〉之二的「衝霄老鶴」，與〈冬夜八首〉之四的「雲邊鶴」，除了仙鄉的意象，也可以視為「閒雲野鶴」，比喻來去自如，無所羈絆的人。〈醒來〉之三「獨鶴雲邊至」，則更有「孤鶴」之意，與「閒雲野鶴」意義相同。除此之外，幾句詩作都將雲與鶴聯結，也可以解為「雲中白鶴」，用以比喻人品高潔、不同凡俗。不管是「閒雲野鶴」的無所羈絆，或「雲中白鶴」的人品高潔，其實都將鶴的意涵「人世化」。或許黃文儀正有以鶴自比的意味在，強調自己的品格高潔、無所牽絆。

## 3. 鶴唳——經歷民變的驚懼

將鶴從「仙化」到「人世化」，都有著黃文儀自比的意味。至於鶴的另一層含意，則極具獨特性。〈冬夜八首〉之六的「風動疏林鶴夢驚」，〈即景四首〉之二的「地僻最宜秋鶴唳」、之三的「夜半月明驚鶴唳」，我們都看到不同於前面的遠離塵世、一派悠閒的況味，反而一再感受到驚嚇疑懼。「鶴唳」在東晉淝水之戰的典故中，本身就是形容驚恐不安的情況；而「鶴夢」何以會「驚」？我們彷彿看到蘇東坡在〈卜算子〉中所營造出的「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的孤寂感。鶴之所以自夢中「驚」醒，〈醒來〉之四的「鶴豈離罾繳」，或許可以作為一個詮釋角度：「罾繳」是指繫有絲繩的射鳥工具，也就是說，鶴正處在遭人陷害的危急之中。此句跟下文的「鴻應脫網罟」成一對句，目的在引出末二句「乘桴如有意，一葉任西東」。既然「道不同」，也只能「乘桴浮於海」，黃文儀關於「鶴」的多數用法，不是在仙鶴就是野鶴，前者是出世的，後者則在人世邊緣。相較之下，「鶴唳」是在「人世中」的悲鳴，它的「入世」意味更為濃厚，與前二者相較也呈現出迥異的心志。究竟是什麼樣的理由，讓黃文儀的冬景書寫從仙界進入到人世糾葛，而有著驚懼與不安的情緒？在其有限的生平資料中，大致推斷出這或許跟黃文儀曾經歷過「張丙事件」有關。

黃文儀的〈紀許逆滋事五古十二首〉組詩是張丙事件的記錄，詩題的「許逆」指「許成」，鄭蘭在〈勦平許逆紀事（並序）〉曾記載「許成，邑觀音里人，病蠱，綽號大肚。

聞嘉匪茲事，遂於十月十三日首豎逆旂。……用人犧而祭纛，嚇道士以銷魂……<sup>35</sup>」，正因為「用人犧而祭纛」相當殘忍，故黃文儀才會有〈用人犧〉一詩批判。〈立帥府〉一詩提到的是李受，詩云：「粵匪毒於賊，攻莊恣殺虜。列幕掛帥旂，榜起中軍府。主幟惟李受，偉中誤為輔。飛檄調三軍，分營併設伍。……」，李受本身是「鳳山粵莊監生<sup>36</sup>」，而曾偉中是粵籍舉人，鄭蘭的記載說他「粵舉人李受，自分不足服其鄉人；邀同立營保莊……迂腐之儒，不早自引決，其獲軍罪也，宜哉<sup>37</sup>」，因為李受跟曾偉中都是粵籍，所以黃文儀才用「粵匪」形容。除了忠實記錄南路許成、李受一行人的作亂過程外，黃文儀在這組詩中記錄了兩組特殊的組成份子，一是「青樓軍」，一是「袈裟賊」。而從「觀者列如堵，爾賊誠遊戲」一句來看，這批女妓組成的「青樓軍」，並沒有實際殺敵的能力，恐怕是用以鼓動軍心而已。相對於鄭蘭的記錄而言，黃文儀對於這批女子軍隊算是「手下留情」了，稱她們為「俠妓」，至少不是全面否定的用語。相較之下，他對於袈裟賊的批判就很嚴厲，〈袈裟賊〉說：「禿奴敢作賊，樹幟岡上殿。一陣袈裟兵，箇箇羅漢面。背負金觀音，漫云佛助戰。菩薩如有知，汝曹豈得免。」詩中提到「背負金觀音，漫云佛助戰」的現象，關於這一點，鄭蘭曾記錄「幾箇袈裟賊，林和尚（岡山寺僧）獨佩小觀音（沙門作亂，代有其人；至邀菩薩作賊，則未之前聞。錄此以誌異云）<sup>38</sup>。」因此，可知這批「袈裟賊」是以「林和尚」為首，而且因為「獨佩小觀音」惹人側目，因此屢見於文人作品中。至於〈截援兵〉提到：「援兵一旅餘，時自郡南下。行次楠梓阮，環宿王宮社。一卒警夢呼，有謀來謀夜。起視賊紛紛，礫石浪擲瓦。急擊槍連環，竟爾眾避寡。彼賊固無能，神助亦非假」，黃文儀將結果推到「神助亦非假」，主要也是為彰顯這批起事者的所作所為是「天理不容」的緣故。〈攻陂城〉更指出：「得勝通軍號，綠葉插上頭。天寒夜昏黑，長驅過敵樓。如入無人境，北風鳴颼颼。進薄焚前署，殺聲喊咻咻。火砲連擊之，逃生無處求。隘巷遇民兵，飛彈紅亂投。顛倒蒺藜內，截屠血漲溝。……」由此可知「得勝」及「綠葉插上頭」都是用以區分誰是內應的方式，也因為有內應，所以即使有「數重木柵，關鎖甚牢<sup>39</sup>」，還是如入無人之境。至於二軍交戰的慘烈，也可從

<sup>35</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光緒二十年，頁426。

<sup>36</sup> 見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內自訟齋文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29。

<sup>37</sup> 同前註，頁429。

<sup>38</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光緒二十年，頁429。

<sup>39</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光緒二十年，頁429。

詩作中窺知，「火砲」、「飛彈」、「(鐵)蒺藜」並用，終於迫使賊軍「鼠竄與鹿奔，星星急散休」，因此才要謀求羅漢門為根據地。〈打漢門〉一詩中的「蘇大哥」，主要記蘇講等人攻打羅漢門一事，因羅漢門險固，故欲以此為巢穴。蘇講一事不見於周凱記載，依鄭蘭所記，他是「番仔粧人，最狡，豎旂後，即勾通房胥，詐言欲擒許成並諸股首來獻，騙給一札，便其勒派搶劫，蕩平又可作護身符<sup>40</sup>」，而且「綽號豆變，言其反覆無常也。平定後，竟被漏網，殊為憾事<sup>41</sup>」，從「狡猾猶如鮪」、「眾唾不堪聞」等句，也可看出詩人對蘇講的評價是很負面的。相較之下，黃文儀對於李受及曾偉中的批判還不如蘇講強烈，詩人對於曾偉中甚至是同情而欲為其緩頰的，這難道是因為他們同屬知識階層，不願深責的緣故嗎？黃文儀也對守備陳雲蛟的草木皆兵、膽小如鼠不以為然，〈擊林投〉說：「畏賊陳騎尉，分壘護陂城。屯軍北郭外，刁斗夜丁丁。未曾見一卒，那有賊謀營。發砲擊投樹，官軍空夜驚」，用「畏賊陳騎尉」，其實很不客氣了。除了他之外，黃文儀也罵了另一位守城者翁遊戎，〈守火庫〉說：「數間火藥庫，僻在城東裏。環植竹四圍，用以藏軍器。堂堂翁游戎，潛身此依據。賊來不出勦，干城枉爾寄。藉非民勇力，逆黨何由避。散財得民心，託公善為計。」認為他怠忽職守。事實上，翁遊戎的行為不只於此，他同時也是位膽小怕死之輩，「阿公店幾嚇翁遊戎（兵至阿公店，銜眾望軍如望歲，塞滿康衢，有登屋觀者，翁疑是賊，手足抖顫，不寒而慄）<sup>42</sup>」，就是接二連三被這樣的守軍延誤，以致陷百姓於水火，亂事才無法早日消弭。所記〈獲巨砲〉一事，提到有了巨砲的協助，才不至於讓「粵匪」長驅直入，殘害生靈。至於最後一首〈迎官軍〉，則是記載亂事弭平後，百姓歡欣鼓舞的情形：

北鄙功成後，南轅返旆時。盆香迎道路，父老望旌旂。赫赫馬提軍，桓桓列虎貔。  
揚威掃孽豎，鳴鉦震鼓擊。聞風賊股栗，一矢怕交馳。星散獸竄伏，執醜爭戲之。  
我民素知方，先驅義勇為。擒渠致麾下，曾不勞王師。善後宜籌畫，毋貽惡蔓滋。

馬提軍就是馬濟勝。黃文儀說「我民素知方，先驅義勇為。擒渠致麾下，曾不勞王師」，其實也不著痕跡表達對官軍援助遲遲未到的不滿。從〈用人犧〉的「大軍快來蘇，焚香

<sup>40</sup> 同前註，頁 431。

<sup>41</sup> 同前註，頁 432。

<sup>42</sup> 同前註，頁 431。

祝上蒼」開始，詩人就一直翹首盼望官軍到來，可以盡快弭平亂事，到了〈再嘯聚〉時，詩人再度提出「舉頭望青天，何時見官軍」，而〈攻陂城〉則更急切呼籲：「誰提一旅師，逐寇出捕搜。孽氛立掃淨，逆豎敢稽留。如何再延蔓，猖獗爲民憂」，顯然詩人對於官軍的平亂速度是深有不滿的。除了忠實記錄戰事演變外，詩人也極力描寫在這事件中，無辜百姓的種種苦況：

驀地縱剽掠，哀鴻目慘傷。……勒金與封穀，冤慘不可當。（〈用人犧〉）

溪南五百莊，一炬成焦土。我民竟何辜，風餐夜宿露。呼天喊地來，栖身竟無所。

死者紛狼籍，生者猶罹苦。（〈立帥府〉）

慘茲離亂日，民命誠雞豚。……村莊罄劫掠，冤聲不可聞。（〈再嘯聚〉）

如果再對照鄭蘭所記：「梁野橫屍，莫認誰家之子」、「悅忘遺子（婦人忙急，致孩上背襁鬆，兒墜，稍定，反手一搥，方悟遺失），佩解匪夫（忙時有婦人解包袱與夫，誤落他手）。蓮襪沒泥，最苦凌波步步（女人行淤泥中，辛苦萬狀）；麻衣被體，剛逢雨雪霏霏（是冬嚴寒，下雨如雪，逃難貧民有以麻布袋爲衣者）。半綻尚含，蜂遭亂采（難女有被賊強污者）；一枝聊借，雉自爲媒（投宿家有男，即以女妻之，不索聘，不用媒）。保抱攜持，珠忍擲於掌上（日食難度，愛女隨便賣人）。緘膝扁鍵，篋即肱於懷中。躲粵鋒，仍遭賊手（賊匪伏鬼仔埔、墓庵、龍眼宅一帶，截搶避粵難民）。當瑣尾，復病膏肓（家破親亡，憂鬱內傷，風餐露宿，死者甚多）。冤上加冤，慘中更慘。<sup>43</sup>」真是讓人一掬同情之淚。對於起事者的殘忍無道，詩人固然是極力指責，但對於官軍的勦敵不力，他也多所批評，至於百姓面臨的苦況，詩人也都照顧到。指責的對象除了「作亂者」的「行動」外，還有「作亂者」的「身份」，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僧侶的投入作亂，黃文儀是相當不以為然的。

也因為曾經經歷張丙事件，對於戰事的慘烈與百姓的苦況有著深入了解，因此當我們回顧詩文中的「鶴唳」用詞時，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詩中會出現迥異於仙鶴、閒鶴的悲苦用詞。

黃文儀冬景書寫中出現的「雪」與「鶴」，二者間有著極大的共通性，除了「白」雪與「白」鶴的白，在顏色上相類之外，黃文儀營造出的神仙世界中，冬天雪地中的白鶴，

<sup>43</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光緒二十年，頁428。

有著顏色上的深淺差異，鶴嘴與鶴腳的黑在雪地中就更顯凸出；而雪地的「靜謐」也與白鶴的「靈動」成對比，呈現出一副清高無暇的仙鄉圖畫，這是出世的世界。但一旦面臨戰爭離亂，雪地的瑩白也就多少增添了寒意與鬼氣，跟「鶴唳」的情境相謀合，同時在視覺與聽覺上呈現令人不安的畫面。而冬意的清冷，更加深遭受戰事的亂民們悲慘的處境，這又從出世的清明掉入俗世的泥沼。可以看出，雖然同是冬景書寫中的「雪」與「鶴」，隨著描寫內容的不同，呈現出二種截然不同的世界。既然「雪」與「鶴」均是鳳山邑現實中「不可能」出現的景致，則這些描寫均出自詩人的「想像」，也就可以成立。

## 四、從書寫中消隱的春夏季節

除卻正面直接書寫冬季的作品之外，黃文儀對於其他季節的書寫，呈現出何種配置？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事實上，「秋季」雖非黃文儀的書寫主題，但有許多秋天景物卻屢屢出現於作品之中，形成除了冬季之外，另一個常見於其作品的季節。〈秋景〉說：

秋來何物最關心，籬滿黃花橘滿林。一藝未成慚夙志，千詩寄意記幽音。奇文過眼聊成誦，奧義連篇費苦尋。讀倦焚香欣獨坐，不時悅耳聽幽禽。  
玉階綠蔭連枝樹，金鼎香開獨占蘭。喜作坡翁兩日坐，未妨康節一身閒。半捲疏簾邀月色，好開幽徑對花權。柴門靜掩苔無跡，味道應須萬慮刪。

詩人用來填滿秋景空間的物品，是外面的籬笆、菊花、橘樹、玉階，其中的籬菊應該與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的用典有關。不管是竹籬、黃花或是橘樹、苔跡，整個畫面充填的是黃綠的繽紛色彩。而室內的「金鼎」，在色澤上與菊花、橘樹相應，同時也點出是時正在「焚香」，並藉由香氣進一步連結「蘭」。至於〈寄興〉的「秋月一輪高」、「秋鏡響夜蟲」，〈清閒〉的「心空秋月白」，〈閒居雜詠〉的「秋水連天碧」，均明白點出季節在「秋天」，捕捉秋天所特有的秋月、秋蟲與秋水。

另有幾首作品是可以確定描寫秋冬季節，但不能確定是秋季或冬季者，如〈夜雨〉的「細雨蕭齋夜，寒氈冷似霜。地爐頻煮酒，傾盡一壺觴」，〈曉日〉的「稜稜霜徹衣衾

冷」，以及〈醒來〉的「竹外風冷韻似鐘」、「空山尚有葉乾落，老幹都經霧暗封」、「爐火細添香欲裊，蘭煤別盡蕊開濃」，這是因為黃文儀的詩作中會出現秋「霜」與冬「雪」並列，而秋「菊」、秋「楓」又與冬「梅」夾雜的緣故。以〈齋中間居〉一詩為例：

茅屋蕭然靜不譁，幽居何物作生涯。數枝黃菊閒時酒，一炷清香醒後茶。妙理細觀如有悟，狂吟無意學名家。尋詩寫興供吾樂，入夜梅梢桂月斜。  
綠樹侵簷竹繞廬，蕭然還似野人居。霜稜梅吐千條白，露冷楓飛幾葉疏。雁陣衝寒過極浦，雪花帶雨落前除。地爐松火鐘敲夜，斗酒孤燈讀漢書。

因此，讀到〈山窗〉的「歲暮眾芳搖落盡，鮮妍菊尚繞籬西」，或者〈閒居雜詠〉的「霜寒黃葉地，日暮碧雲天」，光從詩句本身判斷，著實難以辨識這是描寫秋或冬季。如果沒有〈閒居雜詠〉第二首的「秋水連天碧」作為佐證，我們其實也很難判斷這確是秋景書寫。

相較之下，黃文儀作品的春、夏書寫似乎就消隱不見了。其中又以夏季最為明顯，其所見的 96 首作品中，不只題目未見夏字，就連詩文內容也不見，而以夏天為描寫主角的意涵或是「苦熱」、「苦旱」的書寫，同樣不見於其作品。這或許是因為所收詩作不全，剛好和春夏二季有關的詩作未被收入方志中的緣故。但是再怎麼不全，有可能連一首都沒收到嗎？這又似乎難以理解。勉強要說，從黃文儀對於詠梅詩作的偏愛，或可視為另一種書寫早春的方式，如黃永武在〈梅花精神的歷史淵源〉中提到：

梅是春的先鋒，它帶領新春，排難犯雪，迴轉天地，直奔向人間來！詩人在冰凝泉涸、眾木落寞的季節，忽然望見了光輝的梅花，怎不欣喜！……只消幾點梅花，回春在望，朔風繁霜的苦難，都將成為回憶中的噩夢了<sup>44</sup>！

正因為如此，黃文儀〈梅〉詩中屢屢出現「雪中特為開生面，看取枝頭數點春」、「數點春心花裏現」、「風霜歷盡始春來」、「衝寒傲雪本來身，老幹橫開數點春」，〈冬景八首〉也有「煙籠春色上梅枝」等句，顯然梅花已成為詩人聯結寒冬與早春間的重要過渡。詩人不直寫春天的草木萌芽，一片生機盎然，不直寫春光明媚，活力喜悅，而專寫早春的

<sup>44</sup> 參考黃永武，〈梅花精神的歷史淵源〉，收入氏著《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204。

「寒」，可視為黃文儀季節書寫的一個特色。

由此推斷，黃文儀季節書寫的作品，可以相當程度透顯出詩人的身體感與審美觀，這恰可呼應前文：當詩人作品出現秋冬不分的情況，同時以霜、雪並列，用冬天才會出現的「雪」來凸顯秋季之「冷」時，或許可視為因黃文儀極為怕冷，因此才將秋天的寒冷氣候予以誇大；專寫早春的用意也在於此，此其一。而夏季節的消隱不見，又可以視為其對炎熱氣候的不耐，因此不願藉由書寫加重其燥熱感，此其二。兩者相互映照，黃文儀既怕冷又怕熱的虛寒性體質，應是可能的。

## 五、冬景書寫的基本色調——瑩白梅雪

本土文人的詠花作品中，以詠梅數量最為龐大。其中黃文儀詠梅詩作有五律 1 首、七絕 22 首（含〈羅浮夢〉2 首），數量居本土文人之冠。梅原屬於經濟作物，平常百姓賴以佐食，與需要諸多照護的名花相比，梅花的暗香疏影，遍生山野村落，綻放於寒風霜雪中，顯得更有鄉野平居的特性<sup>45</sup>。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四云：

梅花開首百花，故名曰花魁。……諸羅縣淡水極多，當冬春之交，山谷盛開，沿途十餘里香氣不散<sup>46</sup>。

顯然臺地本來就已經有梅花，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進一步說明：

臺地暖，故不待春，冬初已影斜香動矣。另有清而艷者曰綠萼梅，一蒂三花者曰品字梅，漳、泉乃有之。又茶梅，花如鵝眼錢，粉紅而黃心，雅素耐久。杭州有玉蝶梅，棟樹接成之。墨梅，梅之別種，曰臘梅，北路皆未之見<sup>47</sup>。

---

<sup>45</sup> 詳見廖美玉〈吳梅村的「詩人」意識——黍離麥秀與香草美人的《詩》《騷》交響〉，收入《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年3月13~14日，頁163-197。

<sup>46</sup> 見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重印，康熙廿四年，頁80。

<sup>47</sup> 見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康熙五十五年，頁208。



到了王禮《臺灣縣志》〈輿地志〉，可確定的是品字梅、綠萼梅等特殊品種，仍未傳入臺灣：

又有一蒂三花為「品字梅」、有花白而蒂綠者曰「綠萼」，種之最貴者，皆臺之所無也<sup>48</sup>。

李丕煜《鳳山縣志》卷七〈風土志〉中的「物產」，進一步點出臺地梅花的特色：

梅花：開當首春，故為花魁。色白者為上，有單葉、百葉，而單葉者最佳。本地所產，皆係白而單葉，但不如內地之蕊大而清香耳<sup>49</sup>。

由以上方志對於「梅花」的記錄，多半著重在「臺地暖，故不待春；冬初已影斜香動矣」的「氣候」特色，可知臺灣梅花開於冬初，單葉色白，與大陸地區的百葉大蕊、品目繁多，顯然有差異。

本土詩人們吟詠梅花，多著重在其「耐寒」上，至於黃文儀詠〈梅<sup>50</sup>〉詩所云：「雪花封處是瑤臺，冷對清樽雪夜開。酒醒夢回風細捲，瓊英飛落滿蒼苔」，即全由傲雪寒梅著眼，至於「玉骨冰魂雪後姿」、「笑傲冰霜寂歷開」、「寒風吹下月稜稜」、「雪中特為開生面」、「嚴寒始放一枝花」、「冰肌耐卻寒威瘦」、「雪裏幽姿開半面」、「衝寒傲雪本來身」，也仍是從其綻放於冰雪之中進行描述。但是黃文儀所居住的鳳山，明明看不到「雪」，梅花有可能跟雪同時呈現嗎？黃文儀的七絕組詩〈梅〉的第 2 首，頗能代表詠梅書寫的幾個主要質素：

玉骨冰魂雪後姿，黃昏月色暮鐘時。板橋流水香初度，竹外橫斜見一枝。

除了不可避免的強調梅花「傲立雪中」的形象外，對於梅花的「香氣」，則用「香初度」標舉出來，而「板橋流水」除了暗示梅花生長在岸邊，也有香氣似「流水」般源源不斷

<sup>48</sup> 見王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康熙五十八年，頁 22。

<sup>49</sup> 見李丕煜，《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康熙五十八年，頁 107。

<sup>50</sup> 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五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頁 138~141。

的意味。自然，黃文儀也有不少對梅花香氣的描寫，如「香浮風韻細」、「香清韻細絕纖埃」、「瘦到骨時香到骨」、「幽氣襲人香冉冉」、「清香氣味沁脾肝」、「嚼蕊含香樹樹芬」、「水流香動黃昏月」、「香處梅花破笑顏」等，都是從嗅覺上的「香」體現梅花的特性。

除卻「風」飄送香氣的嗅覺描寫之外，黃文儀也從視覺上的「白」去鋪陳梅花的美感，空間的潔白，特別是梅與月在描寫上的相輔相成，也為冬景憑添了幾許孤寂：「黃昏月色暮鐘時」、「水流香動黃昏月」，從黃昏到月色出現，則頗能看出時間的推移。詩人對於「花」、「雪」、「月」的描寫，使得其冬景除卻梅香、梅色、雪白、清冷外，還多了「月色推移的「時間感」。月色下的景物，似乎都蒙上了霜雪般，蘇軾〈永遇樂〉即說「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月色所引出的「銀」白，常給人冷清淒涼的情緒，如果再伴隨著「寒」風（「寒風吹下月稜稜」），這一份冷意就更加強烈。此外，在漆黑夜色中，月色所引出的「銀」白，和「白」雲的白（「雲冷月明清有韻」）格外明顯，二者都是仰視時所見，伴隨偶而出現的「白」煙（「冷月疏煙伴最宜」），不僅在視覺上產生了視差，當視線由上往下移動，空間感也因視角的由上往下拉而展現，呈現「立體」的白色空間，也造成了朦朧的美感（「薰水籠沙帶月開」），充填在詩人營造的白色空間的是「千樹」的景致，「溪橋千樹月痕涼」、「孤山千樹月明中」，詩人描寫在寒夜中的「千樹」梅花，不是寫梅花的傲立雪中、堅忍不拔，就是寫它的香氣襲人、清幽淡雅，而其背景多是一片白皚皚、寂靜無聲的鄉間，不是「行過寂寞江村路」，就是「木落山枯霜雪清」，全詩基調除了孤寂還是孤寂。

詩人還從味覺摹寫入詩，寫出「嚼蕊」的趣味：「嚼蕊含香樹樹芬」、「嚼蕊和花帶雪餐」、「高枝攀摘細加餐」，從視覺、嗅覺及味覺多方面去「感知」梅花的一切，梅花「外在」的形象因而完整呈現出來。

當詩人寫梅花「冰姿鐵幹水雲隈」、「寂寞枝頭笑冷風」、「空山明月見精神」、「潔白最宜松竹伴，幽馨應不染風塵」時，也有託物自喻的含意，將自己與梅花合為一體，寫梅即是寫己，期望在「飽受風霜煉玉顏」後，能盼得「風霜歷盡始春來」。黃文儀在詠梅詩中映現出多重的喻意，其一，「自從逋客微吟後，寂寞枝頭笑冷風」、「孤芳解占百花魁」（〈梅〉）的書寫，映現出傳統出世的隱者形象；其二，「嚴寒始放一枝花」、「冰肌耐卻寒威瘦」、「玉骨冰魂雪後姿」、「雪裏幽姿開半面」（〈梅〉）的寫法，寓示入世受難的節士形

象<sup>51</sup>；其三，「玉立佳人窈窕姿」、「玉骨冰魂雪後姿」、「霜高瘦卻玉肌青」、「飽受風霜煉玉顏」（〈梅〉）、「野梅應放玉千條」（〈冬夜八首〉），將玉與梅二者結合，帶出「玉」的清冷與高潔，也帶出冰清玉潔的佳人形象，因此詩人也用仙女或美女比喻梅花，如「天女維摩本絕塵，香魂同化此花身」、「縞素魂交靚靚妝」。這種人花雙寫的作法，將所有梅花的特質逐一系列，其實是以梅自比，以暗喻自己的高潔品格。

黃文儀的冬景書寫中，詠梅書寫是由植物來側寫出冬季，從梅花生長及盛開的季節點出冬天的景致。引人注意的是，黃文儀詠在地的梅花，除了置入臺地所沒有的雪景外，還摻雜了許多神仙思想與用典，如「幽姿何必傍瑤臺」、「雪花封處是瑤臺」，「瑤臺」指仙人居住的地方。而「藐姑不食人間火，飽受風霜煉玉顏」中的「藐姑」，即藐姑射之山，為神話傳說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梅花開在雪地之中，而雪地的情景又跟神仙居住的場合混而為一，如「羅浮夢醒冷於冰」的「羅浮夢」，用的是隋文帝開皇年間，趙師雄遷羅浮，日暮天寒，醉憩於松林酒店旁，見一素妝女子，共入酒家相談甚歡，翌日酒醒，竟臥於梅花樹下的典故，本身就含有道教神仙思想。黃文儀甚至還有以〈羅浮夢〉為題的二首詩作：

江頭千樹月黃昏，香滿梅花欲斷魂。縞素仙人來入夢，瑞煙籠罩枕嬌雲。  
嬌雲墜砌玉姍姍，縞袂相將夢裏間。忽覺霜華飛滿地，寺鐘遠聽韻閒閒。

以「縞素仙人來入夢」、「縞袂相將夢裏間」二句，形塑出一片雪白的景致。此外，黃文儀詠梅詩中出現的「縞素魂交靚靚妝」、「潔白最宜松竹伴」，原指梅花的「白」，這種白又跟雪地的白相襯，並進一步呼應了仙人身上的「白衣」。由詠梅書寫也可看出黃文儀對於白色的偏愛，這是黃文儀目前所知 96 首詩作中最為明顯的特色，雪是白、鶴是白，梅花是白，雲是白，清晨的白霧是白，煙也是白。所有跟冬天有關的外在環境，幾乎都脫離不了白色色彩。林書堯在《色彩學概論》中曾分析色彩對人身心的影響，其中白色的情感特徵是：

<sup>51</sup> 此處借用黃永武〈梅花精神的歷史淵源〉文中歸納陸游的梅花詩，指梅花具有「處士出世恬退與國士入世受難」的雙重性格。見氏著《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207。

<sup>51</sup> 同前註，頁208。

白色有它固有的感情特徵，既不沉靜，也不刺激，跟旁邊所配的顏色會覺得暖和也會變成清冷，象徵潔白、光明、神聖、純真。同時表示輕快、樸素、恬澹、清潔衛生的意思。……白色象徵西方，最容易使我們連想到雪，白色有引人注目的效果，和低明度的色彩在一起更覺得清楚，但是對比過份強烈會影響其他色彩，使其他色彩變暗，面積覺得小<sup>52</sup>。

林書堯同時也指出「傳統和習慣給色彩的嗜好也有很深而無法磨滅的影響」，也指出色彩與性格的關係：「白、青綠、青色是內向而沈默的人，不容易受感動，缺乏愛情、同情、羞恥心的性格，做事細心深刻，但是做起來慢而不夠積極。」而灰色則是「不能自主與自律，缺乏打開困境的勇氣，容易受誘惑的人。<sup>53</sup>」至於大智浩則歸結出白色可以讓人聯想到「歡喜、明快、潔白、純真、清潔。<sup>54</sup>」簡言之，白色具備「潔白、光明、神聖、純真。同時表示輕快、樸素、恬澹、清潔衛生」等正面意義，由此亦可約略推知黃文儀對白色偏愛的原因，以及他的情感特性。相較之下，詩人用來填滿秋景空間的物品，不管是竹籬、黃花或是橘樹、苔跡，整個畫面充填的是黃綠的繽紛色彩，這樣的書寫基調又與冬季的一片瑩白有別。

但也有例外，以〈冬日雜詠〉來看，「濛濛細雨阻行旌」、「濃雲密密布層陰」，色調都是暗灰色，更在地理空間中，用「高凌霄漢雲長護」往上拉開視覺上的開闊感，高是「凌霄漢」的高；而「長江寒急波濤惡」、「夜靜風濤響若霆」則點出所處位置靠海，並藉由「幽壑潛龍睡未醒」將空間再往下拉至「幽壑」，於是在拉高下挖之中，空間感也隨之擴展。外在環境的灰濛，耳邊震耳欲聾的濤聲，都可以視為詩人內在心境的反射。而未句的「雨為天寒吹似霰，梅花開遍玉成林」，色調從暗轉明。至於〈冬景〉四首，「霞彩雲陰暮景中」是暗紅的色彩，加上「桑枯木落」的風聲蕭颯，帶給人蒼茫無依的感受，但是「樹色蒼蒼遮不斷，滿江還有木芙蓉」二句，卻反而從寥落的畫面蹦出一線生機，在山齋中吟風坐，從山窗向外看月，在夜晚中煮冰烹茶，以致於「爐焰猶然煖氣蒸」，外在環境的從冷到熱，也表示內心的暖意漸升。而從「萬象繞歸仁壽鏡，一塵不翳玉壺冰」、「半畝塘開一鑑澄」、「半畝塘開一鑑澄」等句，可以看出詩人在體「道」的過程中，身

<sup>52</sup> 林書堯，《色彩學概論》，林書堯發行，三民書局經銷，1980年9月，頁94。

<sup>53</sup> 同前註，頁107~108。

<sup>54</sup> 大智浩著，陳曉罔譯，《設計的色彩計劃》，大陸書店出版，1987年7月，頁36。

心靈都得到安頓。這些詩作雖然都不是以「白色」為單一書寫主調，但是因為最後都由「灰」、「暗」歸結到「梅花開遍玉成林」、「一塵不翳玉壺冰」的「白」，因此多少也有從黑暗轉向光明的意涵存在。

身處炎熱氣候的黃文儀，其詩作應該慣用「紅橙等暖色系」才是，與此相反，黃文儀故意漠視家鄉的氣候特色，詩作中不見「橙」色色系，而他的紅色不是「紅蓼」就是「紅雲」，不是夕陽就是燒殘的燈芯，呈現都是暗紅而非鮮紅、亮紅的色調，簡單來說，都不是夏天會使用的顏色。從他對白色的喜愛，鮮少使用暖色色系，偏好冷色系用詞的特色來看，我們可以從中窺知他的性格傾向是「內向而沈默」的，正因為這種先天的性格特質，並非後天外在環境所能輕易改變，因此詩作中才會出現與現實生活環境背道而馳的虛擬想像空間。

## 六、結論

從「方志與詩作的兩種冬景」來看，黃文儀冬景書寫呈現了臺灣南部冬景的「不可能」。而詩人在詩中大量出現的「雪」與「鶴」書寫，均出自詩人的「想像」，並隨著描寫內容的不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二種世界。不管是「想像」雪、鶴，或是「想像」季節，正因為都非實況摹寫，也就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即使非臺地所有，只要和冬天有關，都可以藉由「想像」冶為一鑪，型塑成詩人自己的「虛擬空間」。這個虛擬空間，在清朝臺灣與內地相似的教育體制與科舉制度訓練下，受到中國詩文情境影響固然是難以避免的，而詩人如何以自身成長特質予以創發性轉化，顯然更值得探究。

將黃文儀的冬景書寫放回中國傳統文學的脈絡，嘗試由傳統文學批評的觀念來檢視詩人在創作上的意圖是什麼？劉勰《文心雕龍·物色》強調外在氣候的「春秋代序，陰陽慘舒」會使得「心亦搖焉」，這種「四時之動物深矣」對詩人造成的影響是：「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音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也因此才會「詩人感物，聯類不窮」。但是詩人在描寫外在氣候對於內在情蘊的影響時，泰半是就身之所感，忠實呈現在詩文內容之中，因此才会有「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

韻」這種記實性的作法，而「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sup>55</sup>，也是在詩文作品中呈現氣候如何在人的五官中被感知。由此來看身處炎熱鳳山邑的黃文儀，按理應該是要在詩文中強調地域性的炎熱特徵，或是如何嚮往清涼才是，但是檢視其現存作品卻會發現，黃文儀作品中並未呈現這樣的「實況」，反而有許多對於冬季的季節想像，虛構出一個鳳山邑不可能出現的景致。很顯然，在文學的寫實傳統與浪漫傳統下，黃文儀的冬季書寫偏向浪漫而非寫實。

因此，黃文儀的「虛擬空間」可視為個人生命歷程的重要寄託，藉由「誇飾」反映出的「真實」，可以使我們從中窺得詩人的內心世界。當詩人作品出現秋冬不分的情況，同時以霜、雪並列，用冬天才會出現的「雪」來凸顯秋季之「冷」時，可視為因黃文儀極為怕冷，因此才將秋天的寒冷氣候予以誇大；其專寫早春的用意也在此。而夏季節的消隱不見，又可以視為其對炎熱氣候的不耐，因此不願藉由書寫加重其燥熱感。兩者相互映照，黃文儀既怕冷又怕熱的虛寒性體質，應是可能的。

此外，黃文儀詠在地的梅花，除了置入臺地所沒有的雪景外，還摻雜了許多神仙思想與用典。就詩人內在情蘊來看，黃文儀對於神仙思想的偏愛可以是一個切入角度，從仙鶴、白雪到仙人的白衣，詩人對於冬季雪景的想像，與對神仙世界的想像是聯結的，二者都是一種虛構，同時也是一種嚮往。黃文儀對於神仙世界的情有獨鍾，或許是因為感嘆生命的有限與無常，希望可以在神仙世界中找到寄託；也或許是因為現實生活的不如意，希望能藉由神仙世界的塑造，在心靈上找尋可以隱遁的理想空間，正如同陶淵明所型塑的桃花源一樣。不管是哪一種理由，都跟黃文儀本身內向沉默的性格有關，正因為現實生活缺乏可以恣意宣洩的管道，因此才會藉由神仙世界的想像找尋出口。而神仙世界的「現實化」與「人世化」，透過冬季一片皚皚白雪的景象，將二者連結成密不可分的情境，使黃文儀的季節書寫映現出獨特的變調物候。

<sup>55</sup> 以上引文見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第四十六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音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見梁劉勰撰，《文心雕龍》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1983年，頁64~65。

## 參考書目

1. 大智浩著，陳曉罔譯，《設計的色彩計劃》，大陸書店出版，1987年7月。
2.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二年（1737）。
3. 王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八年（1719）。
4. 不著撰人，《嘉義管內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明治三十年（1897）。
5. 不著撰人，《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6. 不著撰人，《臺灣私法人事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7. 李丕煜，《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八年（1719）。
8. 李友煌，〈失落的亞熱帶植物群落初探--以清代鳳山縣二志一冊植物書寫為例〉，《高市文獻》16卷3期，2003年9月。
9. 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內自訟齋文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10.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康熙五十五年（1716）。
11.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道光十五年（1835）。
12. 林書堯，《色彩學概論》，林書堯發行，三民書局經銷，1980年9月。
13. 徐泓，《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行政院國科會，1983年。
14.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五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
15. 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嵌集》的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15期，2006年12月。
16.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年（1894）。
17. 陳文煒，《恆春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年（1894）。
18. 彭瑞金，〈鳳山文學發展簡史〉，《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3期，2000年8月。
19. 黃永武，〈梅花精神的歷史淵源〉，收入氏著《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
20. 廖美玉〈吳梅村的「詩人」意識——黍離麥秀與香草美人的《詩》《騷》交響〉，收入《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年3月13~14日，頁163~197。
21. 劉良璧，《重修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七年（1742）。
22. 蔣師轍，《臺灣通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一年（1895）。
23. 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重印，康熙廿四年（1685）。

24. 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乾隆十七年（1752）。
25.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光緒二十年（1894）。
26. 劉 鋹，《文心雕龍》，臺北市：臺灣商務出版社，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8 冊，1983 年。
27. 顏進雄，〈初唐奉和應制詩歌中的季節意象探析〉，《花蓮師院學報》16 期（綜合類），2003 年 6 月。
28. 薩廉，《噶瑪蘭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道光十二年（1832）。

### 附錄：黃文儀詩作勘誤

1. 〈醒來〉「坐對銀缸氣肅恭」、〈冬夜八首〉之五「銀缸落盡煤」，「銀缸」當為「銀缸」，銀燈之意。
2. 〈冬夜八首〉之五「酒酌葡萄綠」，「葡萄綠」當為「葡萄綠」之誤，是以青葡萄釀造，未曾過濾去渣的濁酒。
3. 〈寄興〉之一「簷前竹四帷」，「四帷」當為「四維」。指東、南、西、北四方之隅。
4. 〈寄興〉之八「爻詞如可會」，「爻詞」當作「爻辭」。易經中每卦下詮解六爻意義的文詞。為十翼之一。
5. 〈寄興〉之十八「遺文盈篋筍」，「篋筍」當為「篋筍」，指竹編的箱子。
6. 〈閒居雜詠〉之十八「款乃一聲聞」，「款乃」當作「欸乃」，搖櫓的聲音。
7. 〈夜雨〉「文壇靈不抵」，「抵」當作「泯」。不泯，不滅之意。
8. 〈梅〉「香從何處貴疑猜」，「貴」當作「費」，恐形近而誤。



# 乙未抗日相關文獻所見臺灣漢人抗日 份子形象——以簡大獅、詹振爲例

王嘉弘\*

## The Image of Anti-Japanese Warriors of Taiwan Han Nationality Presented in Related Literatures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1895 (乙末年) ——Take Jian da-shih (簡大獅) and Jhan jhen (詹振) for examples.

by  
Wang, Chia-Hung

關鍵詞：乙未抗日、簡大獅、詹振、乙未割臺文獻

**Key words:**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1895(乙末年)、Jian da-shih (簡大獅)、Jhan jhen (詹振)、The Literatures about Cession of Taiwan in 1895

---

\*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提要〕

本文探討 1895 年乙未抗日，以及其後數年武裝抗日份子形象轉變的時代意義。內容從烈士與義民的定義，簡大獅與詹振兩位 1895 年臺北地區重要抗日份子的文獻所呈現的意義，並從這兩位抗日份子從人格到神格：義民與烈士的形象轉變等四部份來討論。本文所著重的文獻，是以官方資料與民間資料來作比對參照，如 1897 年上海點石齋印行〈臺省民主歌〉、〈臺灣歸日本領有前後臺北附近流行之歌謠〉、〈士林土匪仔歌〉、〈姜紹祖抗日歌〉、〈黃文星抗日經過苦哀詞〉等歌謠，都是以日本治臺初期，臺灣人民武裝抗事件為創作題材的作品。本文將從這些民間半知識份子的創作歌謠，比對當時的一些相關官方文獻，析論出臺灣一般百姓對臺灣初期抗日份子的英雄形象之塑造與官方或傳統知識份子的描寫有何差異，並以簡大獅、詹振兩個臺灣北部抗日份子在文獻上形象的流變為例，來探討其形象流變的歷史意義。另外在就目前臺灣所發現在抗日初期的鸞書與廟宇文獻中的殉身者形象來看這些抗日分子在漢人心中的地位轉換，來探討抗日殉身者從人格轉變為神格的特殊現象。

## Abstract

This discourse treats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times about the image transition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riors from 1895 (乙未年) to the next few years. The content would focus on four part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martyrs and militi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teratures of two important anti-Japanese warriors Jian da-shih (簡大獅) and Jhan jhen (詹振) in Taipei area in 1895, how these two warriors had been apotheosized from human, and the image transitions of militias and martyrs. The literature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e official and civil materials. For instance, "Democracy of Taiwan Province Song", "The Popular Songs of Taipei Area Before And After Japan occupied Taiwan", "Shihlin Bandits Song", "The Song of Jiang shao-zu (姜紹祖)'s Reaction against Japan", "The Lyrics of A Tough and Sorrowful Process about Hung wun-sing (黃文星)'s Reaction against Japan" and so forth. These materials

were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Dian Shih-Jhai (點石齋) in 1897, and I also do some comparisons with the reference between them. These songs took the incidents of armed Taiwanese fighting against Japan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s their creative themes.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compare the songs created by these Taiwan semi-intellectuals to some related official literatures. Besides, the hero images of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riors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e official and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I would t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 also take the image transitions in the literatures of Jian da-shih (簡大獅) and Jhan jhen (詹振) who were anti-Japanese warriors in north Taiwan as my examples, and discus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s about that. Moreover, I would analyze the capacity transitions of these anti-Japanese warriors in the eyes of the Taiwan Han nationality through the image of martyrs in ruan shu (鸞書) and literatures of temples during the early anti-Japanese movement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aiwan so far, and discuss the special situation about the martyrs in anti-Japanese movement who had been apotheosized from human.

## 一、前言

清、日馬關係約之後的 1895 年至 1902 年之間，是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臺灣人民以成立臺灣民主國的方式，與各地方勢力用武裝形式來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時期。當時相當多的實錄記聞與官方記錄都對此時期參與抗日的臺灣漢人，有大量的記錄。而文獻上所保留以此時期為背景的民間文學創作與相關的民間書寫，有相當豐富的資料，如 1897 年上海點石齋印行〈臺省民主歌〉、〈臺灣歸日本領有前後臺北附近流行之歌謠〉（伊能嘉矩輯錄）、〈士林土匪仔歌〉（何連福口述、吳萬水筆記）、〈姜紹祖抗日歌〉（黃榮洛藏）、〈黃文星抗日經過苦哀詞〉（曾紀棠輯錄）、〈日本竊據臺灣歌〉（片崗巖輯錄）等歌謠都是以日本治臺初期，臺灣武裝抗日事件為創作題材。本文將從這些民間半知識份子<sup>1</sup>的創作歌謠，比對當時的一些相關文獻，析論出臺灣一般百姓對臺灣初期抗日份子的英雄形象之塑造與官方或傳統知識份子的描寫有何差異，並以簡大獅、詹振兩個臺灣北部抗日份子在文獻上形象的流變為例，來探討其形象流變的歷史意義。另外再就目前臺灣在抗日初期殉身者所發現的鸞書與廟宇來看這些抗日份子在漢人心中的地位轉換，來探討抗日殉身者從人格轉變為神格的特殊現象。

## 二、烈士與義民

乙未割臺後，臺灣成立的民主國失敗，然而島內對日本殖民政府仍有相當程度的武裝抵抗，如著名的抗日三猛（簡大獅、柯鐵、林少貓）與胡阿錦（嘉猷）、陳秋菊、詹振等紛起抗日，但這些抗日份子的出身與後來的歷史評價卻不盡相同。如簡大獅本為臺北地區土豪，雖曾與陳秋菊一同抗日，受日本招撫後，因為日本掃蕩臺灣各地方勢力而受到迫害，後遁走福建，然清國懼怕日本勢力，而將簡大獅從廈門押解回臺灣，在文獻上記載有〈慘死憤言〉一文，而此事一曝光，引起輿論嘩然，後來簡大獅甚至被江蘇詩人

---

<sup>1</sup> 胡萬川〈從集體性到個人風格——民間文學的本質與發展〉論到「半知識份子」是「傳統社會中那些能讀書識字的傳承人，雖然不一定可以稱得上是知識份子，至少可以被當作半知識份子。」《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大出版社，2004 年，頁 51。

錢振鏗視爲民族英雄，爲其作〈簡大獅傳〉，然而臺灣地區流傳的〈士林土匪仔歌〉卻是將簡大獅爲盜匪的實際身分以民間歌謠的模式呈現。另外〈臺省民主歌〉後段有相當程度的篇幅描寫詹振抗日，與日軍在錫口（今臺北松山）周旋的英勇事蹟。此二人相同的事蹟，都曾參加過 1896 年臺北城反攻之役，並在最後都壯烈犧牲。由史料上看來，簡大獅、詹振等在當時都可稱爲是地方角頭勢力，其抗日動機也相當複雜，但其後來被臺灣人所認識的形象記憶裡，均被塑造成抗日義民、烈士等。反而當時與其一同抗日的陳秋菊<sup>2</sup>，雖然與簡大獅一樣都有接受過日本政府的招降，但卻有著毀譽參半的歷史評價。在簡大獅、陳秋菊二人事蹟相較之下，陳秋菊僅是並未在當時犧牲，但後來相關的臺灣史家與研究文章上的評價，卻截然不同。甚至簡大獅還被稱爲是抗日三猛之一。而未能爲臺灣人民犧牲的陳秋菊後來就逐漸的在臺灣歷史記憶裡淡忘，模糊掉。

「烈士」與「義民」，是史學家用來評價某歷史人物的專有名詞。而烈士是指爲某事件或是民族利益犧牲者，方可稱爲烈士。但義民就不同了，就官方的角度來看，只要是協助官方的一方，都能稱爲義民，如客家義民廟或六堆忠義祠等供奉的神靈可稱爲義民。而乙未年這些臺灣抗日份子，就日本統治者的角度，是所謂的「土匪」、「盜賊」身分。日本政府甚至頒布「匪徒刑罰令」<sup>3</sup>來壓制這些「土匪」、「盜賊」。然而就漢人史觀來看，

---

<sup>2</sup> 陳秋菊（1855~1922），臺北深坑人，由於當地位居土匪出沒之處，所以其稍長便常習武技，加上其賦性慷慨能容人，故成爲一方領袖。1884 年因率衆抵抗法軍侵臺，而爲清廷授予四品軍功。1895 年臺灣民主國成立，日軍進逼臺灣，北臺各地相繼陷日，但陳氏卻乘此時機召集各方土豪游勇，與其他北部義軍聯合抗日，會攻臺北城，其後復劫掠大稻埕，並襲擊日人警察所。陳氏經此數役，因而聲名大噪，但是隨著日本統治臺灣愈趨穩固，卻暴露出陳氏部衆之紀律欠佳此一致命傷，使得這些武裝抗日行動，漸成擾民之舉，甚至被視爲是土匪行徑。1898 年兒玉源太郎上任，更將討伐政策由「圍剿」改爲「招撫」，陳氏迫於形勢，乃於同年 8 月接受日方的議和條件，後來還獲得樟腦製作特許權，且爲日人開鑿公路，遂成巨富。黃潘萬〈陳秋菊抗日事蹟採訪記〉，《臺灣文獻》，10 卷 4 期。

<sup>3</sup> 明治 31 年（1898）11 月 15 日，兒玉源太郎任內以律令第 24 號公佈實施，至日治時代結束爲止。匪徒刑罰令主要目的是爲了鎮壓抗日行動。法令共 7 條：1. 不分目的爲何，凡聚衆而以暴行或脅迫達成目的者，即構成匪徒。爲首謀、或教唆者、或參與謀議、或擔任指揮者處以死刑，參加者處以有期徒刑或重懲役。2. 參加者若反抗官吏、軍隊，或是毀壞建築物、火車、船舶、橋樑，或是放火燒毀作物、柴草，或是毀壞交通設施、及其標識，使往來產生危險，或是毀壞電信、郵便、電話用途物件，或是殺傷人、強姦婦女，或是擄人掠奪財物者，皆處以死刑。3. 未遂犯科處本刑。4. 資助匪徒者，一律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5. 藏匿匪徒，或是企圖替其脫罪者，處以有期徒刑或是重懲役。6. 罪犯如自首者，可依情況減刑或全免刑罰。7. 犯本令之罪者，如在實施前所犯，仍依本令處刑。「匪徒刑罰令」

這些抗日份子都是「義民」，進而因為犧牲生命而成爲「烈士」。這背後其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因素影響史評，或是一般大眾對這些抗日份子的觀感。

從初期臺灣武裝抗日份子的身分轉變，只要是爲臺灣人殉身、殉族者，基本上都能冠上「義民」身分，如連雅堂〈吳、徐、姜、林列傳〉所列吳湯興、徐驥、姜紹祖、林崑崗等四名義民，最後都在乙未割臺之役中戰死，甚至在身分上都是由「義民」轉化成「烈士」。連雅堂〈吳、徐、姜、林列傳〉中，此四人的身分相當類似，如吳湯興「粵族也，家於苗栗，爲諸生……以義俠聞里中。<sup>4</sup>」徐驥「苗栗諸生也。<sup>5</sup>」姜紹祖「世居北埔，家巨富，爲一方豪。<sup>6</sup>」林崑崗「滬洪莊人，嘉邑諸生也。設教鄉中，素好義<sup>7</sup>。」上述《臺灣通史·卷36》列傳8的部份，所列傳者均是書生或是地方富豪等抗日者的事蹟爲主。然而如果是一開始身分是地方角頭勢力或是原本就爲土匪身分者，則簡單帶過，或是有意的忽略。相對於吳德功《讓臺記》、洪棄生《瀛海偕亡記》中的記載來看，吳、洪二人就對這些地方勢力的抵抗就有較多的著墨。然而連雅堂、吳德功與洪棄生等，均爲傳統的知識士紳階級，其著作是有意塑造出一種臺灣在乙未割臺後，草木皆兵的意象，而起來抗日的份子在陣亡犧牲之後，都能被冠上「義民」、「義軍」的形象，就這些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原先這些抗日份子的背景可以忽略，甚至可以將其就地合法其嘯聚山林的不法動機，如《臺灣通史·卷4》〈獨立記〉提到招撫中部土豪、角頭之事：

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莆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永福赴曾文溪籌防。黃榮邦、林義成、簡成功及子精華均受撫，願效死。十一日，副將楊泗洪率鎮海中軍及格林砲隊取大莆林，義成、精華各以所部數千助戰<sup>8</sup>。

這裡提到劉永福鎮守臺南時，曾至中部地區招撫一些地方勢力與黑旗軍互通聲氣，令其

---

法令嚴苛，動輒處以死刑。其中處罰未遂犯、及溯及既往的規定，更是與罪刑法定主義的刑法原則不合。此法一齣，根據統計，至明治39年（1906）爲止，共有5893多人被告爲匪徒，其中3213多人被處以死刑。

<sup>4</sup>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36》，〈吳、徐、姜、林列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034。

<sup>5</sup> 同上註，頁1035。

<sup>6</sup> 同上註。

<sup>7</sup> 同上註，頁1037。

<sup>8</sup>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4》，〈獨立記〉，同上註，頁101。

部眾以游擊隊的方式擾亂日軍的進攻。洪棄生《瀛海偕亡記》也提到黃榮邦一事：

有中埤莊土豪黃榮邦，小名阿丑(應募名黃榮邦)，先受劉帥札募勇，及是引眾追擊，敵愈狂奔。迫至他里霧(在斗六街西南)，敵入神廟，閉廟門，眾圍之。阿丑自手大斧，劈門，七人隨之，敵槍亂發，阿丑跳而入，敵越牆逃；有走散者，死於路。殘卒五十人逃回北斗，衣裝軍械盡失，身淋漓遍泥塗<sup>9</sup>。

像黃榮邦這類由地方土豪變成義軍的例子在記載有關 1895~1902 年之間臺灣武裝抗日事件的漢文書籍裡，不勝枚舉，又吳質卿《臺南日記》提到黃榮邦的身份因為參與劉永福黑旗軍抗日而轉變的文字：

十三日，檄簡成功總統義民，賞給功牌頂戴，令其子精華（原名大肚）及黃榮邦（原名丑）、林貓生（更名義成）等，各率義民協助官軍剿賊。黃榮邦、林貓生等，皆著名土匪，劉公命札往撫之，黃榮邦等各率義民數千來歸，公悉給以翎頂<sup>10</sup>……。

如黃榮邦、簡精華、林義成等皆是此類人物，從吳質卿的日記更能發現原本臺灣乙未年間地方土匪、土豪勢力被劉永福吸收，並轉變身分的例證。然而實際上這些人物在臺灣傳統知識份子的包裝下，只要是「對抗日本，就是義民」的觀念，逐漸成型，但英雄不怕出身低，在這些原屬土豪或是綠林的臺灣人，一披上抗倭保臺的外衣之後，就能變成後人景仰的抗日英雄。這些事蹟流到 1895 年之後對岸中國，更是被當時對日本義憤填膺的文人操作，操作成抗日民族英雄。而這類所謂的「綠林豪傑」轉變成「抗日英雄」者，最有名的要算簡大獅、詹振二人。下面就分別依兩人的相關文獻記載與民間歌謠相互析論，來討論乙未抗日份子的形象轉變。

<sup>9</sup>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中華書局，1959年10月，頁16。

<sup>10</sup> 吳質卿《臺南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140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6月，頁299。

### 三、簡大獅在相關文獻上呈現的形象意義

簡大獅，臺北淡水人，被稱為日治初期抗日三猛之一。目前可見的記載抗日份子的文獻裡，史料以《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臺灣憲兵隊史》等日本官方資料裡呈現簡大獅為一匪首，在劉永福遁回中國之後，北部抗日份子以胡阿錦、陳秋菊、簡大獅等人為領袖，並於 1895 年 12 月 31 日反攻臺北城，簡大獅當時率眾進攻淡水失利，退入山中，此為第一次反攻臺北城。1897 年 5 月 8 日，又與詹振、陳秋菊、徐祿等人會攻臺北城，此為第二次反攻臺北城。而簡大獅除了參與這兩次反攻臺北之役外，另外於 1898 年 3 月 10 日與羅錦春等進攻金包里堡磺溪日本憲兵隊駐紮地等。後於 1898 年 9 月 10 日在士林芝山岩舉行簡大獅、林清秀、劉簡全等人的歸順儀式。而後盤據在芝蘭堡、燒煥寮莊一帶，不肯出山，在臺北縣知事村上下令移居士林街，雖虛應日方代表，並在 1898 年 12 月 11 日遷居之，但後來發生 12 月 10 日在北山一帶的襲擊民家事件，日方調查結果指向簡大獅集團所為。隨後日本憲兵隊組成北山討伐隊進攻簡大獅於 1898 年 12 月 11 日出發討伐簡大獅，後於下午 3 時結束惡戰，簡大獅脫逃。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北部土匪之情況·歸順匪徒之背誓與盲動〉一文中載道：

簡大獅隱現於各處之傳說喧囂一時。但彼巧妙逃出包圍線，自淡水渡海至廈門，與林李成等通謀策劃再度起事，終未得成，潛於漳州府龍溪縣城內楊老巷黃心忠家，改名簡青，巧妙躲過廈門道台與我警察之偵尋。但終為艋舺專員公署探知。明治 33 年（1900）3 月 11 日該署派警察五名及清國官憲二十餘名前往逮捕。簡與二名部下一起被捕獲，押回淡水。3 月 22 日經臺北地方法院審理宣判死刑，同月 29 日被執行<sup>11</sup>。

就日本官方史料上所記載的簡大獅略述，可知此人為匪首，冥頑不靈，心態反覆，且難以控制，是名擾亂良民的地方惡霸。但就漢人角度來看，簡大獅不僅是義民，更是烈士、

---

<sup>11</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頁 569。



民族英雄。如中國清末進士錢振鏜<sup>12</sup>有〈簡大獅〉詩云<sup>13</sup>：「痛絕英雄洒血時，海朝山湧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甚至有〈簡大獅愛國〉這類記載：

閩人簡大獅，少有勇名，富民族平等思想。市井傭工請見，亦禮之若上賓焉。嘗遊廈門，偶於途中睹一西人欺凌一華人，又有一人袖手旁觀，其色若自得者。大獅恥之，乃擊旁觀者之頰而罵之曰：『若視同胞受辱，不引爲恥，反顧而笑之，誠無恥之尤者也！』西人見其勇，亦遽退焉。光緒乙未，大獅聞臺灣割於日，甚不平，乃散其家資，募死士拒強鄰。卒以眾寡不敵，敗竄泉州。然日人憚之，威逼閩官，謂若不予大獅，當興師問罪。閩官懼，亟索大獅，獲而囚之。大獅泣曰：『吾寧見殺於本國，不願被赦於他邦』。閩官不可，遂畀日人。日人甚敬之，呼爲烈士，欲降之。大獅不可，乃不屈死<sup>14</sup>。

這類文字可以說明簡大獅在清末中國掀起輿論譁然，還讓簡大獅披上了除了義民之外的其它稱譽，譬如富民族平等思想與讓外國人不敢欺負華人的事蹟等，這是簡大獅事蹟流傳到中國之後，被對外國欺負而心生不滿的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大眾心理。因此在 1895 年左右，中國地區不論是報紙、詩文，都將臺灣乙未抗日運動當成是民族對抗外辱的重要戰役，甚至 1897 年在上海流行《劉大將軍臺戰演義》小說，將劉永福在臺灣的戰事誇張虛擬化，將節節敗退的劉永福寫成屢戰屢勝，甚至還斬殺了樺山資紀這類不實的情節，都是滿足當時中國仇外的心態。這也是符合爲漢人犧牲的大義，錢振鏜事實上，亦借簡大獅之事來諷刺滿清的無能，才會讓外患不斷，棄地拋民。

在日本官方與中國文人的心態，我們看出簡大獅不同身分的轉變，是爲了符合兩方面的政治宣傳需要所導致。然而臺灣民間歌謠是如何形容簡大獅的形象，由〈士林土匪

<sup>12</sup> 錢振鏜（1875-1944）江蘇武進人，名振鏜，字夢鯨，號名山，又號謫星。別署星影廬主人，也署藏之，偶署庸人。

<sup>13</sup> 見《名山續集》，引阿英《中日甲午戰爭文學集》。詩序云：「光緒乙未，我割台灣與倭。台民簡大獅與日本戰年餘，至廈門，爲當事所獲。簡大獅供：『倭淫虐妻妹，皆死焉。予之戰，不敵，故至此。我反倭，非反大清也。今爲中國官吏所殺，亦復無恨。若以我予倭，則死不瞑目。』當事者竟縛大獅獻於倭，置極刑。後其弟簡大度復與倭戰，亦敗。」

<sup>14</sup> 徐珂輯錄《清稗類鈔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14 種），臺灣銀行研究室，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55-56。

仔歌〉就可以部份還原簡大獅原先的身分。據吳萬水說明是簡大獅下屬何先，受傷逃竄於山中，無聊所作，後傳遍了草山一帶。歌詞如下：

土匪南旁來起置，過來北山招兄弟，食酒結拜來講起，不可梟心及背義，自掠慮野作大哥，世事給伊去伐落，土匪亦敢抬打操，臺灣占返有功勞，土匪出門背刀銃，頭兄背印押號令，招伊和庄若不肯，掠來狹吊及欺凌，土匪要做真兇死，較講也是愛人錢，有錢來講放汝去，無錢來講再凌治，講到作頭人歡喜，掠來抬頭浸血池，大獅管兵作頭兄，出來北山真出名，日本探聽及探影，即時點兵來輸贏，日本相抬陣陣輸，不時給番結死對，打死番仔坐六牛，總督自提李國代，招汝北山和大獅，錢銀外多由汝愛，不可兩旁來相抬，國代坐轎到雙溪，借問大獅何一個，招汝來和敢著好，不可兩旁來冤家，招我來和我歡喜，愛汝淡泊的銀錢，下日擔銀與汝呼，錢銀給汝去造路，講實不是打嘴鼓，不可路頭無招呼，大獅心內想好好，兄弟造路有人無，減彩日後若失錯，建置江山無功勞，兄弟造路免認真，較講也是愛汝銀，返來守營大要緊，只驚日本先反面，日本反面也不知，天光點兵觀看覓，看到五番四面來，日本號齊掠大獅，大獅銃藥扛上山，扛到山頭著發火，大獅看著頭就低，臺灣不是土匪的，兄弟相招亦著退，十月廿八濛煙雨，日本站在草山埔，土匪相抬擗戰鼓，飢餓失頓無疑誤，十月廿八著晏晏，日本交戰七股山，兩旁銃子暴暴彈，打入查某透心肝，通街大小走四散，走入山頭去藏山，要食滷粥三頓攜，若有親族走來看，即時消瘦變人干，衫褲沃浴白白踊，尋無滷粥可食燒，這遭煩惱攏無笑，不比往時被削踊，恚糞歪庄打橫鬧，打死日本哭媽媽，日本退到聖公媽，土匪號齊與伊剗，日本的銃是馬貢，打死土匪著滅亡<sup>15</sup>。

從歌詞的內容推測是簡大獅在 1898 年 9 月 10 日暫時降日後，聚眾於北山滋擾良民，後日軍於 12 月 10 日來討伐其部眾之間的事情。其中有提到綁票勒贖的事情，如歌詞「土匪要做真兇死，較講也是愛人錢，有錢來講放汝去，無錢來講再凌治。」

這反映了簡大獅綠林性格，擄人勒贖以求贖金。另外提到日本招撫簡大獅，命其在山中造路。簡笙簧《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簡大獅傳》提到總督府撥款命其率舊部修築土

<sup>15</sup> 〈士林土匪仔歌〉見《臺灣文獻》第 4 卷第 5 期，1954 年 5 月 31 日，頁 55~56。

林到金山的山路，但他一面修路，一面仍祕構要塞，儲備武器糧食，不幸爲日人發覺，日軍再集大軍圍攻，彈盡糧絕，隻身脫困，南下龍潭、關西和其他義軍聯合，再攻北埔，但因槍械短缺，仍告失敗，不得不內渡廈門，匿跡安溪。這裡與歌詞裡「兄弟造路免認真，較講也是愛汝銀，返來守營大要緊，只驚日本先反面。」反面就是閩南語的翻臉之意，歌詞中陳述了簡大獅因爲歸降者很多都被消滅，而心生懷疑日本政府的用心不良，因此一面造路，一面固守自己的勢力。而終與日本再次開戰。

從〈士林土匪仔歌〉可以看出簡大獅嘯聚山林的土豪形象，並非中國士人所想像的那個崇尚正義、鋤強扶弱的簡大獅。那是屬於過份美化抗日身分所造成的假象。然而簡大獅在戰後文史記載上，卻都只表彰其抗日的形象，對於其曾降日的相關事蹟，僅輕輕帶過或支字未提。這個現象與國民黨政府初期，有系統的推動抗日英雄事蹟之目的有關，除了彰顯國民政府八年抗戰之功以外，還要讓臺灣人恢復 1895 年那時抗日的歷史記憶。讓臺灣人也以抗日先驅的先烈自豪，藉此來鼓吹「抗日意識」。如 1954 年省文獻會出版的《臺灣抗日忠烈錄》描寫簡大獅事蹟除了用〈簡大獅愛國〉這類野史述聞作來強調其任俠果敢的性格爲開頭外，在書寫其投降一事也是以佯裝歸順，伺機反攻恢復臺灣爲目的。爾後簡大獅與諸多抗日份子均入祀臺中市忠烈祠<sup>16</sup>，更是將原先是綠林豪傑的簡大獅從義民轉爲忠烈之士，讓後來的臺灣人對乙未抗日份子的形象逐漸單一化，類型化，讓戰後的臺灣人對日治時期的抗日份子動機，也都統一了我們的共同思維，即是恢復臺灣，心向祖國，抵抗外辱等「民族意識」。簡大獅可說是抗日份子文獻中，形象最複雜的一位，但卻因爲政治操作歷史記憶而便成類型化的抗日英雄。相較之下，也是與簡大獅頗具盛名的「白馬將軍」陳秋菊，被日人招撫後，因爲受日人以專營事業樟腦扶植與產金權等，並受日本勳章等事情，反而不被國民黨政府視爲宣傳「抗日意識」的指標人物，甚至有意的要消除其在臺灣抗日史的歷史地位，在《臺灣抗日忠烈錄》並未收錄，甚至戰後所重修的地方志書也都不替其立傳，相較於簡大獅在戰後四本臺灣方志<sup>17</sup>書籍中均有立傳的情形對比，就可以知道此二人在政治上的歷史宣傳因其有無犧牲來作爲價值取捨的標準了。

<sup>16</sup> 參考臺中忠烈祠網站，烈士名冊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cc208e](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cc208e)。

<sup>17</sup> 分別見《臺灣省通志》、《臺北市志》、《臺北縣志》、《重修臺灣省通志》等四本均有爲簡大獅立傳。反觀陳秋菊僅見於最近出版的《坪林鄉志》才有立傳。

## 四、詹振在相關文獻上呈現的形象意義

詹振，臺北五分埔人(今臺北松山一帶)。生平資料不多，有關詹振的文字記載可以分為賊首、義首兩方面來觀察。在日本官方史料上的詹振，是日本軍警相當頭痛的人物。除了和陳秋菊、簡大獅等人參與兩次反攻臺北城之役以外，其它相關資料記載詹振的事蹟見《臺灣警察沿革志》〈臺北近郊之匪擾〉「一月一日（1896），匪魁詹振率眾二百餘名襲擊錫口，守備兵二名戰死，餘遁臺北，匪徒放火焚毀陳春光宅，繼襲鐵路隊，工人一名、傭人三人被戮，錫口盡被匪徒佔領，臺北、基隆間之鐵路及電線悉被截斷。後日鐵路隊鐵路班員於錫口火車站東側材下立碑曰：鐵路工人戰死之碑，碑陰鐫刻戰死者姓名<sup>18</sup>。」而《臺灣憲兵隊史》〈憲兵掃蕩詹振、陳捷陞及其它匪徒〉：「明治 29 年（1896）3 月，匪首詹振、陳捷陞等率匪徒二百於名自松山莊興雅方面來襲擊該地的憲兵所。……同年 6 月某日，匪首詹振之部下百餘名自內湖莊州尾方面來侵，襲擊了松山土地公廟附近的民家，駐屯該地的憲兵隊與警察合作將其擊退，但敵我雙方均有數名傷亡<sup>19</sup>。」又〈擊退匪首詹振及憲兵逮捕土匪〉一文記道：「明治 31 年（1898）4 月 6 日夜，匪首詹振率部下數十名出現在臺北大稻埕，搶奪財物，逃入二叭山中<sup>20</sup>。」由上述資料可以說明詹振在日治初期，為北臺灣抗日份子中的活躍者，令日本軍警相當頭痛，而詹振與林李成<sup>21</sup>曾在明治 29 年（1896）3 月左右多次以文告的方式鼓動臺民抗日，如在《臺灣憲兵隊史》記載到：

<sup>18</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中譯本名稱為《臺灣抗日運動史》（二）），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頁 497。

<sup>19</sup> 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89。

<sup>20</sup> 同上註，頁 188。

<sup>21</sup> 林李成，字笑溪，臺北貢寮人。少從雙溪舉人連日春、貢生莊逸書遊，嘗入臺北府學，目睹國事危急，潛心於西洋槍砲。乙未割臺，挺身抗日，從之者眾。1895 年 11 月與簡大獅等相約進攻臺北城，首先發難，率千餘人進攻臺北城。是月 12 日襲日軍於烏土窟，敗日人頂雙溪分遣隊及派出所，克復頂雙溪；13 至 14 日繼滅探查日軍；19 日日軍後備隊補充兵登陸基隆，以 700 人再攻頂雙溪，強弱懸殊，退守山地。1896 年 3 月再聯詹振等，偷襲日軍松山憲兵屯所。日人欲以清鄉之策，絕義軍糧彈，李成偕許紹文、林維新等數度由廈門密運軍火，使臺北抗日軍維持數年之久。1899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名利相誘不成，由是相迫益急，乃遷居文山堡厚德公坑後山中。是年，行蹤為日諜偵知，被圍，遂自殺。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 477。

詹振、林李成等以謀反不平之事告白於人民，開臺灣，助清國，明君有道。正稅律，遵古例，毫無私，實有恩主光緒帝。然而日本不依前例，總督同乞食……第一條大罪：不敬天、不敬神明。第二條大罪：不敬孔子、不惜字紙。第三條大罪：貪官污吏輕百姓。第四條大罪：不重律法私刑罰。第五條大罪：不顧廉恥同禽獸。第六條大罪：不分善惡逆天意。第七條大罪：日本做事同乞食。第八條大罪：放尿要罰錢。第九條大罪：買賣要抽稅。第十條大罪：逼迫臺民<sup>22</sup>……。

詹振與林李成這篇檄文可以看出詹、林兩人是以義軍自居，痛陳日軍不僅是殘暴無道，甚至是不尊重神明與孔子等事，企圖讓當時仍是傳統儒家文化爲主的臺灣人對日軍產生反感等。而詹振抗日事蹟目前以廖漢臣〈詹振抗日考〉所錄其事蹟最爲詳盡，而廖漢臣在記載詹振事蹟時，除了用上述的《臺灣警察沿革志》、《臺灣憲兵隊史》的相關史料外，更是以〈臺灣民主歌〉相關歌詞中的資料來補論詹振抗日事蹟，如：

詹振招兵真敢死，采舍<sup>23</sup>招人去力伊。等待十一月中時，十六冥中豈代志。通到山賊滿滿示，卜打日本無延遲。詹振一人奔烏令，卜管山賊土匪兵。就來過港安大銃，卜打日本真清榮。十六冥中四點鐘，詹振號頭放大銃。日本官兵無路用，未劊半陣就退兵。虧得采舍真受苦，大厝燒了成平埔。好得許年毛伊路，走去搭攸逗冥摸。五份埔庄出詹振，盡忠報國塊招兵。招到石曹山仔頂，五路招豈八萬兵。十七早豈劊戈里，錫口眾庄全罷市。看見火車來到只，詹振點兵去征伊。火車返去多得知，總督點兵就豈來。無宜一陣就來敗，去搶飯員扛返來。詹振个兵真示精，水返腳圭就點兵。來到錫口接一陣，無宜敗兵來者緊。日本敗兵一下走，無宜妝后設后抄。來到南港大橋頭，被伊打死就來走。十七日豈著塊劊，日本落難無人知。敗陣走入府城內，通城个番流目滓。且到十八早豈時，日本官兵想計致。火車大銃就再豈，再來錫口無延池。土匪一時想不到，城內無開就無頭。叫見火車一不到，人人多示想卜走。詹振厝在五份埔，招軍買馬成匪徒。想卜打開

<sup>22</sup> 同註 19。

<sup>23</sup> 采舍，是指陳春光，臺北錫口（今松山）人。清季歲貢生。1897年12月獲臺灣總督府頒授紳章。翌年，獲總督府選任爲臺北辨務署參事。其後，獲選任爲錫口莊長。爲地主富豪，頗受地方民衆敬重。1907年2月病歿，享年64歲。原與詹振是好友，後因爲對日的態度不同，陳春光主張歸順，詹振主張對抗，因而反目成仇。

有功勞，無宜錫口成平埔。錫口查某罵一疼，詹振狗拖不示人。無頭公案先不通，害人無厝最掛重<sup>24</sup>。

歌詞是說明治 29 年初（1896）反攻臺北城之役時，詹振率部進攻錫口，破壞鐵路電線等設施，並且讓日軍挫敗。而日軍受挫之後，對錫口一帶展開報復攻擊，無差別掃蕩，因而引起婦女怨言之事。這裡的歌詞可以觀察出詹振當時是以黑旗號令部眾抗日，為當時抗日份子的習慣，以劉永福的黑旗軍名號指揮，其形象是以英勇的「詹振一人奔烏令，卜管山賊土匪兵。就來過港安大銃，卜打日本真清榮。」那種威風凜凜，並對詹振忠義之舉頗有稱譽「盡忠報國塊招兵」。

〈臺灣民主歌〉是光緒丁酉年（1897）年在上海由點石齋印行，歌詞中多對日本軍隊頗有批判，如對媽祖不敬「日本那有手了賤，去扯媽祖个丕肩」<sup>25</sup>可以證明詹振抗日檄文其來有自。〈臺灣民主歌〉後半段以錫口、三峽、新庄一帶在 1895~1896 時期的抗日事件為內容，作此歌謠的人對這些地方發生的抗日事件頗為熟悉，是否為當地附近的人士則已不可考。但與〈士林土匪仔歌〉相同的是，都將抗日份子冠上土匪之名，而在文獻上研究的學者如廖漢臣〈詹振抗日考〉、吳萬水在〈士林土匪仔歌〉前的序言，都認為是為掩人耳目的一種用法。但從〈臺灣民主歌〉的作者眼中，詹振雖是忠義捨命之士，但卻「卜管山賊土匪兵」，說明其部眾的組成份子複雜。後來也造成百姓的怨言，認為這些抗日份子的行動讓無辜的百姓牽連，實在令人頭痛。甚至怒斥詹振不是人。也可見抗日行動並非所有的臺灣人都支持，大部分的百姓是以安定為主，像詹振這種人物，只是麻煩製造者而已。但就廖漢臣〈詹振抗日考〉中引用所謂當時詹振抗日事件目擊者的說法是「詹振的部下，多是獵戶，射擊準確。」則又與「山賊土匪兵」的形象相距甚遠，詹振的事情經過了六十幾年到廖漢臣寫作〈詹振抗日考〉一文時，土匪兵的形象就因為抗日義軍的帽子，而用當地獵戶，且槍法準確來轉化這些抗日份子的身分。

詹振的死，雖然沒有簡大獅那樣被塑造成慘烈犧牲，出自於自己忠愛的祖國背叛那樣具有戲劇張力。然其死因卻是有著多種的說法，甚至還有並未死亡的傳言，讓抗日英

<sup>24</sup> 佚名《新刻手抄臺灣民主歌》（藏於臺灣大學伊能嘉矩文庫：伊能嘉矩手抄及抄寫 J605 翻拍本），石印書局，出版時間不詳，頁 10-11（J6050019~20）。

<sup>25</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中譯本名稱為《臺灣抗日運動史》（二）），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頁 542。

雄的死因成謎，增加詹振這個人物的傳奇性。就《臺灣警察沿革志》所言詹振是明治 30 年 5 月 8 日第二次反攻臺北城一戰後陣亡，其形容詹振是「身長五尺七寸左右，體格、營養均佳，頗具人品。服裝等異於普通匪賊。示之捕獲之匪賊，果為匪首詹振之屍體<sup>26</sup>。」此為日本警察的說法，然而就日本憲兵的說法是在明治 30 年 11 月 21 日，日本憲兵與警察各 30 名參加臺北守備隊 500 名部隊攻擊臺北獅子頭山一役，擊退唐潘、詹振等匪首後，「匪首詹振則於逃歸其本來居住之地坪林尾頂溪途中，於區尺字小粗坑，因身纏紅毛毯被部民誤認為生番人而將其射殺<sup>27</sup>。」就日本官方史料就有不同的版本，以上是日本史料呈現的詹振之死。廖漢臣〈詹振抗日考〉除了有引《臺灣警察沿革志》的說法外，並再增補上錫口耆老林湖樹的說法，林湖樹言其與詹振有親戚關係，在明治 30 年 5 月 8 日第二次反攻臺北城一戰並未戰死，事後不久，他在五份埔詹振家見過詹振，後至宜蘭羅東經營木材行之事。另外又補上其實那時死的是詹番<sup>28</sup>，而非詹振的說法。廖漢臣所存留的詹振死因，可以看出漢人與日人對詹振的抗日事件觀感不同，日本認為匪徒一定要死，而且死的要很狼狽，要摧毀其在漢人心中的英雄形象，如《臺灣憲兵隊史》記載被自己人誤殺等死法。然而漢人心中，詹振是抗日英雄，英雄不會輕易犧牲，也反映在廖漢臣所記傳聞中。

簡大獅、詹振是在抗日書寫文字上身分轉換相當成功，甚至並入祀臺灣地方性的忠烈祠，變成忠烈之士。然而從義民領袖轉變成烈士的不僅是簡大獅、詹振。其它如何鐵、林少貓等其背景身分都是相當複雜。然而「殉身」的觀念是讓這些抗日份子在臺灣人的歷史記憶裡，最被肯定的一部分。故其雖然身分從秀才、地方士紳、農民、前清軍事將領等諸多身分，甚至原本就是魚肉鄉里的地方豪強、土匪等，只要抗日殉身，臺灣百姓就能夠接受他們是義民、烈士的說法，甚至將這些抗日份子入祀，供奉等。反之，為了保障原有基業或是護衛鄉里百姓而迎合日軍者，便扣上漢奸、走狗的身分。然而這些所謂的漢奸、走狗，或許還比這些抗日者保護的人民生命財產還要可觀。就如詹振抗日，造成錫口被日軍掃蕩，反而害死更多臺灣百姓，孰是孰非，實難有一公允的評價。

<sup>26</sup> 同上註。

<sup>27</sup> 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189~190。

<sup>28</sup> 詹番也是臺北地區抗日領袖之一，據聞為詹振堂弟。

## 五、從人格到神格，義民烈士的身分轉變

臺灣民間書寫中，在義民轉變成神靈的記載上，有黃榮洛輯錄〈乙未戰爭在客家人的善書上〉可以佐證只要為民族殉身，就能為神，受後人香火供奉的一種普遍觀念，如〈現報新新三月十五戌刻條〉記載楊再雲（載雲）、徐驥兩人為神之事蹟：

吾乃湖南重望鄉人也。姓楊，名再雲。吾幼年，早有懷忠抱義之心，讀書見古人有盡忠報國之義士，輒為慷慨歎之。流連慕之，後吾讀書未成，即投筆從戎。吾有一事關乎陰騭，無人知覺，吾三十歲時，在台南城內有一姓王之婦人，歸寧母家，與吾寓隔牆，夜至三更，窺吾房門無關，便進身入來，我見之便吃一驚，愕然久之。吾乃問彼曰，爾是婦人，夜深來此何大無禮，彼對曰吾慕君才貌，故多情愛君，君能愛我乎。我便正色拒之，斥言曰爾女人，以節為重，何不自愛，宜速出門外，吾得在此胡亂狂言，彼又欲言，吾便大聲罵之曰速走速走，若不走吾即一拳打死爾也。此女即垂頭走去，吾亦就寢。思此婦人，非遇我硬漢哪有乾柴燒不起火者乎，此是吾拒莽女之陰德也。吾隨劉道台來台灣，在營效勞，惟吾獨公正無私，勤勞不息。復蒙唐巡撫提拔吾為都司之職。至乙未年我聞割台之事，登時怒氣衝天誓欲為國雪恥復仇，後聞唐師逃回，吾則無日不痛哭，血淚洒遍台中，後聞新竹粵人，仗義拒賊，吾乃稍有望焉，奈吾管下營兵散去儘留有二百餘民兵，相隨至頭份街駐紮。吾初意謂有義民可靠，惟一死可以報國耳，吾見陣中無一敢戰之兵，望風先逃，吾心憤極。吾即拔刀連殺數兵，豈料吾管下親兵，將銃打我正中額角，吾登時歸陰。

至冥司案下，我尚怒氣勃勃厲聲問冥君曰，我死應當死，但不願死於悖逆兵丁之手，冥君曰：二十日內拿來該逆兵任君發落，良久吾乃息怒，後對冥君曰，陰司之事吾無權柄何能發落此逆，冥君笑曰那位不日就是君登的權柄，就是軍操的，何謂不能發落也。吾方悟我死即有為神之日。冥君即引吾在聚善所居，停候旨。越十八日，玉旨即到吾即上任判斷，次日即命無常拿該逆到案，吾即親手分割其身碎割其肉，亂砍其屍後，付冥司打入酆都永受苦劫萬年，方得轉世為畜類也。



我今日得爲城隍之神，皆由功績，平生忠盡一時遂享萬古之馨香，爾世人何不效吾之所爲乎。

問：英靈有在頭份之墓否？我七魄即在墓間。

問：陰司何神稱爲冥君？秦廣王即爲冥君。

問：城隍不登冥君之任，何能發落逆兵？何爲那位是君登的。若登城隍之職，可以判斷陰事，故謂哪位是君登的，凡魂歸陰，先由城隍判斷付陰曹也。

問：城隍即是陰司否？非也。

問：該逆受苦萬年真有此久也？有之。

問：該逆何姓？湖南人，姓馮名興，是因其弟馮勝欲逃，吾拔刀殺之，故其兄馮興及如此也。

問：大人在台中爲城隍是府？是縣？是府。

問：徐驥死在何處？現有爲神否？爾粵人獨此一人，吾甚取之，他在台南戰沒，即在台南爲神。

問：爲何神？他本應爲城隍，但彼管下之兵，路劫人財，殺死七命罪有及他，故降爲台南土神之職，但此人冥君亦甚愛惜他亦頗有才能，不久即有陞任<sup>29</sup>。

楊再雲，或稱楊載雲，不詳其籍貫。中日甲午之戰時，臺灣府知府黎昌嵩臨時組織軍隊，稱新楚軍，以備守土衛民之用，楊載雲屬新楚軍管兵統領<sup>30</sup>。而上述這段鸞書記載到楊載雲降駕，說明自己在乙未割臺之役時，奮戰不懈，但遭被背叛的軍士從背後開

<sup>29</sup> 見黃榮洛輯錄〈乙未戰爭在客家人的善書上〉，《客家》，44期，1994年1月。

<sup>30</sup> 當日軍登陸，進兵台北，唐景崧逃亡大陸，全臺人心惶惶，陷入無政府狀態之際，楊統領奉黎知府命統率新楚軍二營，會同另外兩營共赴前線禦敵。兵未至新竹，而新竹已爲日軍所佔。楊統領遂紮營於距新竹城不遠處，急與駐水仙崙、二重埔等處義軍統領姜紹祖、徐泰新、鍾石妹等取得連絡，更與頭份之吳湯興、徐驥，安平鎮之胡阿錦、黃娘盛等約相呼應。遂於七月十日反攻新竹城，因日軍早有準備，反攻失敗，姜紹祖被捕，鍾石妹敗回大山背。楊副將孤軍無援，乃轉移陣地於水尾溝榕樹崗；佈置砲隊以阻日軍南下。然而日軍分由石碎崙及雙溪兩面夾攻，更佈砲陣地於雙溪崎東邊高處。在砲戰激烈之際，楊軍大砲手中彈，軍心動搖。有提議轉進者，楊副將叱爲臨陣退縮，即手刃之，以示死守陣地決心。但兵將皆無戰意，其中有一不義部屬，從背後開槍擊斃楊副將。衆將士即以戰旗裹楊副將屍退入新城，葬於苗栗縣頭份鎮，當時人稱爲楊大人之墓，慕其忠烈者，常往憑弔。今頭份鎮建有楊統領廟。《新竹縣志·卷九·人物志》，頁47。

槍而死。遂在臺灣為神。而一同抗日的臺灣人徐驥也一並為神的民間宗教記載。這段文字相當有趣，姑且不論神蹟是否真能顯靈降駕在乩身上，但此文的記載反映了臺灣人對抗日份子犧牲後的想像，來說明這些義軍將領，烈士的身後遭遇。

楊再雲（載雲）在《臺灣思勳錄》、吳德功《讓臺記》、洪棄生《瀛海偕亡記》等書中記載裡，僅有洪棄生稍為提到說楊載雲可能是被人從背後暗算，書中記道：

天未明，電光爍路，礮火震山，左翼為川村中將，右翼為山根少將，中路為能久親王，一衝傅德星營，一衝楊載雲營，一衝吳湯興營。是時我軍鋒鉞已鈍，漫無約束，使明哨埃，設暗伏，即敗猶可成軍。而我軍不然，敵至，或戰或奔。於是楊載雲督戰中礮死，德星軍潰……徐驥退至義民亭，糾湯興潰兵憑山再戰。……楊載雲屍自石屑崙昇過南隘歸。或曰載雲不退，部下殪之也<sup>31</sup>。

然而其它相關楊載雲資料，並非以被暗算而死，而是採取勇敢不退，與日軍力戰而死的說法，但《臺灣抗日忠烈錄》「楊再雲」條卻採用《瀛海偕亡記》暗算說來撰寫楊載雲的死因。此一現象如胡萬川〈亡命好漢的生與死—莊芋、曾切、廖添丁傳說之研究〉將亡命好漢的死因歸為同夥、女人、親信的背叛，並說明這是故事經過類型化的結果。而楊載雲的死因，筆者推斷這也是類型化的一個例子，雖然楊載雲不是亡命好漢，而是抗日英雄，但民間要接受一位為臺灣人犧牲的義軍領袖，使其逐漸轉為神格化的人物時，必定要將其人格提高，是忠義精神的象徵人物，如上述文字中拒絕女色誘惑的描寫，正突顯楊載雲正直的形象，而且提到其死並非戰陣無勇，而是被人暗算。如此描寫方能在從人格轉為神格的過程中，為一般人所接受。目前楊載雲的廟仍在苗栗頭份仁愛里<sup>32</sup>，曾被內政部列為二級古蹟。

這類由烈士、義民變成神靈的例子，尚有林崑崗、黃琦田、方大憨等相當多的例子，如林崑崗的廟位於臺南學甲竹篙山，被稱為竹篙山之神。佳里鎮埔頂鎮山宮是供奉抗日份子黃姓義士，但姓名不可考<sup>33</sup>，北門鄉桃榔山義勇祠主神是黃琦田等抗日份子，另外

<sup>31</sup> 同註 9，頁 11-12。

<sup>32</sup> 楊統領廟，參考網址 <http://www.yes.mlc.edu.tw/nine/country/coun-3.htm>，2007.6.30 網站資料。

<sup>33</sup> 據涂順從《南瀛抗日誌》記載：鎮山宮有副門聯寫著：「鎮殿威儀抗暴精神長不泯，山宮壯肅除奸膽氣永留傳。」由此可知黃府元帥生前曾是「俠義之士」，是何等俠義之士，問過好幾位耆老，竟說不

如七股鄉股尾境安宮、六甲鄉甲東「四王公廟」、佳里鎮廣安宮將軍府、鹽水鎮忠義公廟、楠西鄉鐵谷山宮等廟，都是供奉乙未役犧牲的抗日份子，此爲臺南地區的乙未抗日份子廟。另外如屏東長治有烈士廟<sup>34</sup>供奉 1895 六堆火燒寮之役犧牲的抗日份子，高雄梓官鄉聖安宮<sup>35</sup>供奉抗日份子盧石頭等都是這類型抗日份子烈士化、神格化之後的形象轉變。也透過這樣的人格到神格的形象變化，再附會上一些神蹟的情況之下，祂們的入祀，也才能符合了臺灣漢人信仰中，爲自己民族犧牲的義民神標準。

## 六、結論

從日治到戰後，臺灣在日治初期的抗日份子的形象逐漸的單一化、類型化，在日治時期因爲還有和、漢的衝突，遺民意識與抗日精神仍在臺灣初期相當濃厚，雖然日本官方以「匪徒刑罰令」來定義抗日份子都是土匪，並且進行招撫與勦滅的兩手策略，此爲後藤新平的「飴與鞭」策略。日本殖民當局對於歸順者給予優渥的待遇，而反抗者則是極盡殘酷的手段加以消滅。因此原本就在清代嘯聚山林的地方土豪反而會比反抗清朝政府，更加反對這個現代化日本政權。而劉永福當時以黑旗軍爲主力，另外招募義軍、新楚軍等地方武裝勢力來抵抗日軍的南進，這些原本的土豪角頭自然也成爲了劉永福招撫的對象，企圖運用其在地理上熟悉的優勢來進行游擊戰，牽制日軍。這也是爲何這些抗日份子的身分許多皆爲是地方土豪角頭勢力的領袖。

然而在戰後，日本投降，臺灣重回祖國之後，國民政府作了一連串讓臺灣人心寒的事情，如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且戰後初期的臺灣仍因爲日本統治五十一年，而殘留相當多的日本文化下來。這對當時政府要融合本省與外省之間的文化隔閡頗有困難，因此在語言上，推動國語教育，加強臺人的祖國認同；思想上，自然就是灌輸抗日思想來清除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的緬懷。而這一連貫的修方志與纂寫抗日事蹟就是企圖在思想上改造臺灣人潛意識的日本文化基因。而乙未抗日事蹟恰好符合國民黨政府的臺灣人文化改

---

出所以然，請教是否爲抗日英雄？皆納悶搖頭，因他們只知：只要供奉的神祇，「蒼黎皆欣沐慈煦聖德」，何許人也，與吾何關！最後在鎮山宮委員黃明道先生追憶其先父的敘述，印證黃府元帥確實爲一八九五年，日軍攻佔台南府城時期，極力抗日的忠烈義士，而且也探知此黃姓義士爲佳里鎮人士。

<sup>34</sup> 屏東長治烈士廟網站：[http://www.cultural.pthg.gov.tw/lib/lib01/lib\\_4.htm](http://www.cultural.pthg.gov.tw/lib/lib01/lib_4.htm) 2007.6.30。

<sup>35</sup> 高雄梓官鄉聖安宮盧石頭抗日事蹟 <http://www.kssh.khc.edu.tw/resource/khsu/1/1.htm> 2007.6.30。

造政策的，鼓吹抗日意識的臺灣抗日份子，就不論其背景，而加以贊揚，如簡大獅、詹振、林少貓、林李成等人。如《臺灣抗日忠烈錄》的凡例文字就能看出一些端倪<sup>36</sup>，這些抗日份子是要符合政府標準才能入祀忠烈祠，纂入《臺灣抗日忠烈錄》或地方志忠義列傳等，而對於相關記載不利於政府要編錄這些抗日份子的事蹟者，則可看出有忽略或不寫的現象，如以陳秋菊為例，就沒有入祀忠烈祠與纂入《臺灣抗日忠烈錄》，反而出身沒有陳秋菊優秀的簡大獅、詹振等人，因為抗日殉身的事蹟而影響國民政府的史評。這是官方處理抗日英雄的模式：1.殉身者：義民、烈士。2.被日本人招撫者：忽略其抗日事蹟。3.雖曾被日本招撫者但又後來起來反抗而殉身者：則強調其義民、烈士一面，忽略曾投降之事，或是簡單帶過。此方式有如《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要美化關羽曾經降曹操一事，而說他是降漢不降曹。相關文獻中所呈現出簡大獅對日本的投降舉措也只是不得已，期待下次舉事的手段等美化文字，都可看出當官方有意美化某些歷史人物，要將其事蹟成為看版時所作的一些手段，增強好的一面，消除不好的一面。然而若是能全面比對所有文獻的記載，或者就能還原其真面目。

〈士林土匪仔歌〉、〈臺灣民主歌〉正是從民間的角度出發來觀察這些抗日份子在當時一般百姓的觀感如何，也能看出一些不同於官方記載的抗日份子真面目。而泛神主義的臺灣，忠烈是臺灣人選擇祭祀神靈的一個標準，因此楊再雲、林崑崗等人的抗日義民廟讓我們看到這些抗日份子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其精神也從單純的保鄉保里的單純意識擴大成抗日救臺的偉大義舉，這幾項特點結合在一起之後，可以發現抗日英雄的形成似乎有個一定的脈絡，從地方意識到國家大義的不斷昇華，更透過政府有系統的吹捧之下，使得臺灣乙未年身分背景相當複雜的抗日份子都被類型化，只要抗日犧牲就是好的前提下，讓臺灣人不斷的吸收這種觀念，乃至抗日犧牲者也變成了新的臺灣神明信仰的一環。

---

<sup>36</sup> 《臺灣抗日忠烈錄》凡例有列出符合抗日忠義烈士標準：1.在本會調查時已故世者 2.經政府明令褒揚者 3.入祀忠烈祠者 4.錄自省縣市志經本會審查會審查通過者 5.其它有關記載，經本會審查會通過者。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1. 佚名《新刻手抄臺灣民主歌》（藏於臺灣大學伊能嘉矩文庫：伊能嘉矩手抄及抄寫 J605），石印書局：出版時間不詳。
2. 思痛子《臺海思痛錄》（臺灣文獻叢刊 40 種），臺灣銀行研究室，臺北：大通書局，1959 年。
3. 吳德功《讓臺記》（臺灣文獻叢刊 57 種），臺灣銀行研究室，臺北：大通書局，1959 年。
4.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灣文獻叢刊 59 種），臺灣銀行研究室，臺北：大通書局，1959 年。
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抗日忠烈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臺北：1965 年。
6.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衆文圖書公司，南投：1979 年。
7. 阿英《中日甲午戰爭文學集》，臺北：廣雅圖書公司，1982 年 4 月。
8. 簡筌簧《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簡大獅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9. 張裕宏校注《臺省民主歌》，臺北：文鶴出版，1999 年。
1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
11. 徐珂輯錄《清稗類鈔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14 種），臺灣銀行研究室，臺北：大通書局，1987 年。
12. 涂順從《南瀛抗日誌》，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0 年。
13. 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 年 6 月。
14.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大出版社，2004 年。
15. 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

## 二、論文

1. 廖漢臣〈詹振抗日考〉，《臺北文物》，第3卷第1期，1954年5月。
2. 黃潘萬〈陳秋菊抗日事蹟採訪記〉，《臺灣文獻》，第10卷第4期，1959年12月，頁51~62。
3. 黃榮洛輯錄〈乙未戰爭在客家人的善書上〉，《客家》，第44期，1994年1月。
4. 何先〈士林土匪仔歌〉，《臺灣文獻》第4卷第5期，1954年5月31日，頁55~56。

## 三、網站資料

1. 臺中忠烈祠網站，烈士名冊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cc208e](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cc208e)，2007.6.29。
2. 楊統領廟，參考網址 <http://www.yes.mlc.edu.tw/nine/country/coun-3.htm>，2007.6.30。
3. 屏東長治烈士廟網站：[http://www.cultural.pthg.gov.tw/lib/lib01/lib\\_4.htm](http://www.cultural.pthg.gov.tw/lib/lib01/lib_4.htm) 2007.6.30。
4. 高雄梓官鄉聖安宮盧石投抗日事蹟 <http://www.kssh.khc.edu.tw/resource/khsu/1/1.htm> 2007.6.30。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121-140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121-140

# 臺南蔡國琳藏書考略

楊永智\*

##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sia Kuo-Lin's Book Collections in Tainan

by  
Yang, Yung-chih

關鍵詞：臺南、蔡國琳、蔡碧吟、叢桂堂、藏書

**Keywords:** Tainan, Tsai Kuo-Lin, Tsai Pi-Yin, Tsung Kuei Tang, book collections

---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提要〕

清領時期臺南地區私人藏書知名者，見諸進士許南英在赤嵌城南修築「窺園」、舉人蔡國琳自建「叢桂堂」、富紳吳筱霞私人別業「晚香樓」，然而歷來研究者屢聞其名，未得其實。近年筆者勤于田野，戮力蒐訪，竟以極佳機緣輾轉購得蔡國琳、蔡碧吟父女未曾披露與著錄的藏書，計有經部 14 種、史部 24 種、子部 9 種、集部 55 種，共 102 種。今略加爬梳，佐以管見，公諸方家，以饗學林。

## Abstract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Ching Dynasty, some celebrated book collectors in Tainan area, such as Chin Shih Hsu Nan-Ying who built Kuei Yuan in south Tainan, Chu Jen Tsai Kuo-Lin who built Tsung Kuei Tang, and the rich man Wu Hsiao-Hsia who has the villa Wan Hsiang Lou. However, the researchers barely found their col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I strived to search for the books in many places and luckily found Tsai Kuo-Lin and his daughter Tsai Pi-Yin's book collections which never exposed in public. There are fourteen for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Four Collections of Books, twenty-four for the second, nine for the third, and fifty-five for the fourth. The books come to one hundred and two. This paper explores my collected works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all researchers.



## 一、引言

蔡國琳（1843.10.27~1909.8.10），字玉屏，號春巖，後號遺種叟，臺南府臺南縣仁厚境街人，祖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祖父名福，字錦宗，生員。父名懋亭，字汝博，號觀瀾，廩生，候補州同，俱顯正。當時以三世儒學之家，全臺靡不艷稱。蔡氏天資聰穎，9歲能詩，咸豐8年（1858）16歲入泮，同治2年（1865）23歲補廩生。同治13年（1874）偕宜蘭進士楊士芳、臺南舉人王藍石等稟請沈葆楨轉奏修建延平郡王祠。光緒元年（1875）8月告竣，既而設帳於祠畔，顏其宅曰：「叢桂堂」。光緒8年（1882）中舉，光緒16年（1890）以鄉試第三名授國史館校尉，遇缺即用。歸籍返臺先後擔任澎湖文石書院、臺南蓬壺書院山長、補用育嬰堂及恤嫠局主事。光緒19年（1893）受命纂修《臺灣通志》採訪。乙未（1895）之役，攜眷內渡，翌年旋歸。著手編纂《臺南縣志》及《南部臺灣誌》。明治30年（1897）偕許南英、陳瘦雲重振「浪吟詩社」。明治33年（1900）3月15日代表臺南縣出席「揚文會」，膺任臺南支會長。明治37年（1904）擔任臺南製糖株式會社取締役監。明治39年（1906）又與連橫、趙雲石等人籌組「南社」，並且榮膺首任社長。翌年並以「臺南樂局董事」指導重修後的宜蘭孔廟舉行春祭<sup>1</sup>。蔡氏先後培植賴文安、羅秀惠、林湘沅、曾春華、丁南金、汝銓、謝鯉魚等門生。蔡國琳娶妻顏氏，獨生女蔡碧吟（1874.10.3 1939.10.26）克紹箕裘，書詩俱佳，享有「赤崁女史」之稱，及長許配於賴文安，但未成婚，及文安病歿，適羅秀惠；蔡國琳曾納一妾吳圓氏，產一子，名鷺生<sup>2</sup>。

蔡國琳生平博學多才，詩文清新，著有《叢桂齋詩鈔》4卷，王國璠：「所作措辭宛轉，寄託遙深，頗得漁洋論詩之旨。<sup>3</sup>」藏於家，未刊<sup>4</sup>。連橫：「文人著書，嘔盡心血，

<sup>1</sup> 〈聖廟祭祀〉：「深恐禮未明，而樂不備。……特請臺南廳參事蔡孝廉國琳為糾儀之官，導引禮樂所未備。」，《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30日。

<sup>2</sup> 盧嘉興，〈記前清舉人蔡國琳與女蔡碧吟〉，《臺灣研究彙集》第6期（臺南：作者自印本，1968），頁23-29。又盧嘉興，〈關於楊草仙與蔡國琳之部份補正〉，同前書，頁41-42。前者收錄於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臺南：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頁88-115。

<sup>3</sup>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頁79-80。

<sup>4</sup> 筆者曾輯佚盧嘉興〈記前清舉人蔡國琳與女蔡碧吟〉、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兩文，加

必須及身刊行，可方自慰。若委之子孫，則每多零落。蔡玉屏山長以儒素起家，積資三十餘萬，身死未幾，而產已破。《叢桂山房》之詩集不知能保全歟？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詩之不傳，而哭其財之不守。<sup>5</sup> 廖漢臣：「其稿已逸。<sup>6</sup>」其子鷺生將其遺書及遺稿一併出售鄉人何義。何氏原擬於其所營永豐公司設一資料室，不幸急逝。據云遺稿尚存於何氏北投別墅中，猶未為刊刻行世，殊可惜也。<sup>7</sup> 盧嘉興：「後來他的遺著及所藏書籍經事業家何義氏向其子蔡鷺生承讓珍藏，據聞原擬闢設何家所營永豐公司資料室，因遇何義棄世後，現由何夫人珍藏於新北投別墅，《叢桂齋詩鈔》諒亦在該批藏書之中。<sup>8</sup>」字裡行間當可嗅出歷來研究者的遺珠之憾。

## 二、蔡氏藏書概況

極其幸運的卻是筆者，民國 95 年（2006）夏天透過臺南市友人的聯絡牽成，輾轉自何傳<sup>9</sup>後人經眼，並且陸續購入蔡氏「叢桂堂」藏書乙批，雖然無法掌握全豹，但是鳳毛麟趾，吉光片羽之中尚可回溯清季臺南藏書家的風格與規模。

筆者檢視蔡氏藏書鈐入的名章、藏書章，計有：「蔡國琳印」<sup>10</sup>（朱文方章，2.8 cm×2.8

---

上《慶饗老典錄》、《如蘭詩集》、《松鶴遐齡集》、《葯煙集》、《西簋薤露集》、《稗海槎程》、《江瀕軒唱和集》、《烏松閣唱和集》、《竹風蘭雨集》、《臺陽詩話》、《瑞桃齋詩話》、《臺灣詩乘》、《瀛洲詩集》、《東寧擊鉢吟集》、《臺灣詩海》、《臺海詩珠》群書，得蔡氏詩作 22 題，計 52 首。連橫：「〈秋日謁延平郡王祠〉一首，可謂集中傑作。……又有〈秋荷〉四首，用王漁洋秋柳韻，措辭宛轉，寄興遙深，足與阮亭抗手，誠集中之佳作也。」《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95。

<sup>5</sup> 連橫，《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 294。

<sup>6</sup>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第三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頁 91。連景初亦云：「碧吟詩稿現恐已散失不存。」《海嶠偶錄（上）》《臺南文化》第 8 卷第 3 期（1968.9）：44-45。

<sup>7</sup>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卷六學藝志文學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頁 61。蔡碧吟的際遇也不遑多讓，王國璠：「她所作的詩有二卷，與蔡國琳的《叢桂堂詩鈔》合在一起。因為臺南的士君子，不滿她委身羅秀惠，逐走王罔市，沒有替她刊行，漸漸的，人被遺忘了，詩也失傳了。」王國璠、邱勝安，《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高雄：臺灣時報社，1977），頁 136。

<sup>8</sup> 盧嘉興，〈記前清舉人蔡國琳與女蔡碧吟〉，頁 28。

<sup>9</sup> 何義（1903~1956）排行第四，何傳（1897~1989），字信誼，為其長兄，曾經擔任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晚年遷居臺北市，在蔡國琳藏書之中即挾存其名片。

<sup>10</sup> 此印鈐蓋在明治 38 年（1905）綠軒毛受真編次《葯煙集》書前序文的落款。

cm)、「蔡國琳」(楷書木質名章, 9.5 cm×3.5 cm)「玉屏」<sup>11</sup>(白文方章, 2.8 cm×2.8 cm)、「玉屏」(朱文方章, 1.7 cm×1.7 cm)、「叢桂堂珍藏」(白文方章, 1.8 cm×2 cm)、「讀書聲裏是吾家」<sup>12</sup>(綠文方章, 2.6 cm×1.3 cm)、「不佞」(朱文方章, 2 cm×0.8 cm)、「蔡氏碧吟」(朱文方章, 1.1 cm×1.1 cm)、「蔡碧吟」(朱文橢圓章, 最長徑 1 cm), 計 9 種。進而再將群書以四部分類, 計有經部 14 種、史部 24 種、子部 9 種、集部 55 種, 共 102 種, 今整理條陳表列如後。

### 臺南「叢桂堂」藏書簡明書目

#### (一) 經部 (計 14 種)

編號	書名	出版年	出版單位	版式內容簡介
1	尚書注疏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封面刊「尚書注疏二十卷, 同治十年夏湖南省城尊經閣校朶」, 缺第 1 卷第 1-10 葉及第 2 卷第 11-20 葉, 由蔡國琳影鈔補入, 漢孔安國序、唐孔穎達疏。
2	毛詩注疏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缺封面及第 1 卷第 1-20 葉, 後者由蔡國琳影鈔補入, 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
3	周易注疏校勘記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封面刊「周易注疏校勘記, 同治十年夏湖南省城尊經閣校朶」, 阮元撰。
4	尚書注疏校勘記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封面刊「尚書注疏校勘記, 同治十年夏湖南省城尊經閣校朶」。
5	周禮注疏校勘記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封面刊「周禮注疏校勘記, 同治十年夏湖南省城尊經閣校朶」, 阮元撰。
6	論語注疏校勘記	同治 10 年 (1871)	湖南省城 尊經閣	封面刊「論語注疏校勘記, 同治十年夏湖南省城尊經閣校朶」, 阮元撰。
7	春秋五傳	乾隆 6 年 (1741)	桂華樓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仁和張岐然先生原本, 桂華樓梓, 左傳、國語、胡傳、公羊、穀梁、附呂博議, 莆田書屋藏板」; 版心刊「同文堂」; 書前加刊「東坡指掌春秋圖」, 計 17 卷。

<sup>11</sup> 同前註。

<sup>12</sup> 語出盧承贊 (859~932)《書齋謾興》:「池塘四五尺深水, 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須頻問姓, 讀書聲裏是吾家。」

8	四書左纂	乾隆 41 年 (1776)		清溪吳崑克□纂輯晉水吳洛愧書全纂，計 4 卷。
9	四書題鏡			苕上汪鯉翔靈川纂述。
10	四書典制類聯			存第 14-16 卷。
11	四書經註集證			存論語第 6 卷。
12	四書味根錄			計 19 卷。
13	說文繫傳			封面刊「小學彙函第七，壽陽祁氏本」；文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朝散大夫行秘書省校書郎臣朱翱反切；番禺陶福祥、南海廖廷相校字，計 8 卷。
14	說文解字韻譜	乾隆 46 年 (1781)	富文齋	番禺劉昌齡、黎永椿、王國瑞校字，計 4 卷附錄 1 卷。

(二) 史部 (計 24 種)

編號	書名	出版年	出版單位	版式內容簡介
1	貳臣傳 (附逆臣傳)		都城琉璃廠	封面刊「國史館繕本」，封底刊「都城琉璃廠□松居士排字本」，木活字本，計 12 卷附《逆臣傳》4 卷。
2	資治通鑑綱目	嘉慶 8 年 (1803)	敬書堂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正編、陳明卿先生評定，敬書堂梓行」，計 59 卷。
3	續資治通鑑綱目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計 117 冊。
4	東華錄	乾隆 30 年 (1765)		湘源蔣良驥于之父撰，32 卷。書皮由蔡碧吟題寫，封面刷紅色龍標印黃色紙；第 24 卷摺葉，記朱一貴事。
5	西夏紀事本末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烏程汪曰楨校寫，計 36 卷。
6	明朝紀事本末	順治 15 年 (1658)	本衙藏板	封面印黃色紙，刊「明鑑紀事本末，豐潤谷應泰編著，本衙藏板」，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男際科、際第、際辰訂，計 80 卷；第 76 卷錄〈鄭芝龍受撫〉。
7	路史	光緒 2 年 (1876)		宋廬陵羅泌纂、男萃註，明廣陵喬可傳校，〈前紀〉計 9 卷。
8	國語注解		成文堂	封面印黃色紙，高陵韋弘嗣解，宋鄭國公宋庠補音，明侍御史蜀張一鯤、楚李

				時成閱，虞部郎豫章郭子章選部郎東粵周光鑄校，計 21 卷。
9	戰國策注		文盛堂	封面印黃色紙，縉雲鮑彪校注，東陽吳師道重校，計 33 卷。
10	明季稗史彙編		都城琉璃廠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都城琉璃廠留雲居士排字本」，木活字本；內容包括《烈皇小識》8 卷，《聖安皇帝本紀》2 卷，《嘉定屠城紀略》1 卷，《幸存錄》2 卷，《續幸存錄》1 卷，《也是錄》1 卷，《求野錄》1 卷，《江南聞見錄》1 卷，《粵游見聞》1 卷，《賜姓始末》1 卷，《兩廣紀略》1 卷，《東明聞見錄》1 卷，《青燐屑》2 卷，《行在陽秋》2 卷，《耿尙孔吳四王合傳》1 卷，《揚州十日記》1 卷。
11	沈文肅公政書		福州吳玉田	沈葆楨著，福州吳玉田鐫字，計 7 卷；第 5、6 卷刊福建臺灣奏摺。
12	歷代名人年譜	光緒 1 年 (1875)	樵山草堂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南海吳榮光撰，嘉定瞿樹辰、南海吳彌光編校；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南海張蔭桓重校刊」，計 11 卷。
13	廣輿記	康熙 25 年 (1686)		雲間陸應陽伯生原纂，平江蔡方炳九霞增輯，計 24 卷；卷首刊〈廣輿總圖〉、〈福建全圖〉皆含臺灣，第 18 卷〈福建〉收錄臺灣資料。
14	海國聞見錄	乾隆 58 年 (1793)	廣東大文堂	同安陳倫炯撰、石門馬俊良重訂、蛟川林秉璐校字，計 2 卷。
15	水經注	乾隆 39 年 (1774)		後魏酈道元撰，計 40 卷。
16	瀛環志略	同治 12 年 (1873)	淡雲樓	徐繼畲撰，計 10 卷。
17	欽定大清會典	乾隆 39 年 (1774)		計 100 卷；第 63 卷第 12 葉刊〈福建全圖〉含〈臺灣前山輿圖〉。
18	二十一史緯	同治 9 年 (1870)	溫陵輔仁堂	封面刊「晉江陳臺齋刪修，溫陵輔仁堂藏板，同治庚午仲春刊補」，晉江（泉州）陳允錫刪修，黔中羅大春刊補。
19	十國春秋	乾隆 53 年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鄴城牛奐潛子氏

		(1788)		閱，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計 116 卷。
20	國朝先正事略	同治 8 年 (1869)		封面印黃色紙，平江李元度次青纂；目錄末刊平江孔廣心澄齋、湘陰蔣恭鑑東觀、平江楊存蔚玠生校訂，計 60 卷。
21	聖武記	道光 26 年 (1846)	古微堂	封面印黃色紙，邵陽魏源撰，計 14 卷；第 2 卷及第 8 卷收錄與臺灣相關史料。
22	胡文忠公遺集	同治 7 年 (1868)	醉六堂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胡文忠公遺集十卷，同治戊辰秋醉六堂重刊」；新繁嚴樹森鑒定，儀徵厲雲官、朝邑閻敬銘、陽湖盛康編輯。弟子江寧汪士鐸、涇縣朱榮實、江都郭奎勳同校，計 10 卷。
23	閩中摭聞	乾隆 52 年 (1787)	本衙藏版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晉水陳孫朋鵬輯，本衙藏版、翻刻必究」。
24	吾學錄初編	道光 12 年 (1832)	閩汀會經堂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書名及「南海吳榮光，閩汀會經堂藏板」，吳榮光恭述，舉人黃本驥編次，戶部郎中陳傳均、詹事府主簿吳彌光同校，計 24 卷。

### (三) 子部 (計 9 種)

編號	書名	出版年	出版單位	版式內容簡介
1	日知錄集釋		金陵劉漢洲	崑山顧炎武著，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計 36 卷。
2	格致鏡原	雍正 13 年 (1735)		清陳元龍輯，康熙 56 年刻，雍正 13 年印本，計 100 卷。
3	御製分類字錦	康熙 61 年 (1722)		清何焯等撰，封面龍標印黃色紙，計 64 卷。
4	莊子因	乾隆 2 年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計 6 卷 <sup>13</sup> 。

<sup>13</sup> 本書計有康熙 2 年 (1663) 初刊本、康熙 27 年 (1688) 作者自刻本、康熙 55 年 (1716) 挹奎樓增註重刊本、嘉慶 2 年 (1797) 敦化堂刻本、光緒 6 年 (1880) 常州培本堂重刊白雲精舍本、民國 2 年 (1913) 上海千頃堂精校石印本、民國 16 年 (1927)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 57 年 (1968) 臺北廣文書局排印本、民國 58 年 (1969) 及民國 64 年 (1975) 臺北蘭臺書局標注本、以及《莊子集成初編》景印本。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第 3 冊子部 (北京：線裝書局，2005)，頁 1140。陳品卿，〈歷來莊學版本及其現藏〉，《莊學新探》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534。陳氏據嚴靈峰藏書著錄，惟本書未及收錄。

		(1737)		
5	玉皇真經	明治 29 年 (1896)	臺南天壇經 文社	計 13 葉，書末鐫「板存天壇經文社」。
6	佩文齋廣群芳譜	康熙 47 年 (1708)		汪灝等撰，計 100 卷目錄 2 卷。
7	子史精華	雍正 5 年 (1727)		書皮由蔡國琳題寫，康熙 60 年張廷玉等奉 聖祖敕撰，雍正 5 年告成，計 160 卷。
8	增補事類統編	道光 29 年 (1849)	丹陽黃氏敦 好堂	黃保真增輯，版心刊「敦好堂」，計 67 卷；第 21 卷載臺灣府。
9	詩韻類錦	咸豐 2 年 (1852)	四堡靈蘭堂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咸豐壬子秋鐫，謹遵 佩文韻府，校對無訛，靈蘭堂藏板」，封 底書皮鈐「蔡國琳」木記，鄂北郭化霖雨 三氏編、懋功陳銘章參訂、男鳳翥丹山校 字、徐炳文同校，計 12 卷。

## (四) 集部 (計 55 種)

編號	書名	出版年	出版單位	版式內容簡介
1	仰止子詳考古今名家潤色詩林正宗			明余象斗輯、李廷機校正，計 12 卷。
2	憑山閣增輯留青新集	康熙年間	本衙	書皮由蔡國琳題寫，加鈐「叢桂堂珍藏」；每冊首葉鈐「玉屏」；西泠陳枚簡侯選、男德裕子厚增輯，計 30 卷。
3	重刻昭明文選		盟鷗書屋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李善先生評註，汲古閣校定」，計 60 卷。
4	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			中吳金榮林始箋注、徐淮岱陽纂輯；卷首加鐫「漁洋山人戴笠像」及宛陵梅庚贊、侯官林佶書，計 12 卷；書皮由蔡碧吟題寫，內葉鈐「叢桂堂珍藏」「蔡氏碧吟」。
5	杜詩集說	乾隆 48 年 (1783)		嘉興江浩然孟亭氏纂輯，男壘聲先校，計 20 卷加集外 1 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6	吳詩集覽	乾隆 40 年 (1775)	凌雲亭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乾隆四十年春鐫，凌雲亭藏版」；太倉顧湄伊人、許旭九日原編，黎城靳榮藩介人集覽，同學諸子校訂，計 20 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7	南園前五先生詩、南		粵東省城學	殘存王聽雨 (卷三)、李易庵 (卷四)、黃

	園後五先生詩		院前翰芳齋	雪篷（卷五）、梁蘭汀（卷九至十一）、黎瑤石（卷十二至十三）、李青霞（卷廿至廿五），附刻《南園花信詩》1卷；番禺陳起榮奎垣校字；粵東省城學院前翰芳齋承刻；版心刊「樵山草堂」；計25卷。
8	嶺南三大家詩選	康熙31年		番禺王隼蒲衣選，番禺陳起榮奎垣覆校。計梁佩蘭《六瑩堂詩》（卷一至八）、屈大均《道援堂詩》（卷九至十六）、陳恭尹《獨漉堂詩》（卷十七至廿四）。
9	湖海詩傳	嘉慶年間		青浦王昶德甫輯，計46卷，內葉鈐「讀書聲裏是吾家」、「蔡碧吟」。
10	湖海樓文集	同治5年 (1866)		宜興陳維崧其年著，從孫淮同男懿本、崇本、楸本編校，計6卷。
11	湖海樓儷體文集			計12卷。
12	湖海樓詞集			計20卷。
13	秋坪詩存			閩中陳登龍秋坪撰，殘存第5-11卷。
14	平遠堂遺詩	道光29年 (1849)		甌寧許賡秋史撰，其弟許賡年編刊，計5卷附補錄1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15	湘中草	康熙44年 (1705)		古吳湯傳楹卿謀撰，計6卷，內葉鈐「叢桂堂珍藏」。
16	小東山草堂駢體文鈔	道光5年 (1825)		永嘉張泰青孟平撰，林則徐、梁章鉅書序，計10卷。
17	契蓮先生駢體文			元和宋體淳契蓮，殘存1卷。
18	西堂全集			書皮題寫書名及「香草山房藏」，長洲尤侗悔庵撰，內葉鈐「叢桂堂珍藏」，計67卷。
19	樊南文集詳註	乾隆45年 (1780)	桐鄉馮氏德聚堂	封面印藍色紙刊書名及「重校本、德聚堂藏版」，桐鄉馮浩孟亭編訂，計8卷。
20	玉谿生詩詳註	乾隆45年 (1780)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計3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21	庚子山集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計16卷。
22	梁谿全集	道光年間		邵武李綱著，計180卷。
23	小西腴山館詩鈔	同治2年 (1863)	京都	封面刊「同治元年□成刊于京都」；同治2年馮志沂序；沅陵吳大廷桐雲撰，計2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24	小西腴山館文鈔	同治4年		封面刊「同治甲子仲冬古連道傳澤鴻署首



		(1865)		」；又鐫「吳桐雲先生四十小像」附徐宗幹同治 4 年題識：沅陵吳大廷桐雲撰，計 5 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25	小西腴山館集外文	同治 3 年 (1864)		封面刊「同治甲子仲冬傅澤鴻署」，沅陵吳大廷桐雲撰，計 2 卷。
26	小西腴山館詩鈔續編	同治 4 年 (1865)	福州鹽署	封面刊「同治四年乙丑刊于福州鹽署」，沅陵吳大廷桐雲撰，計 2 卷，內葉鈐「蔡氏碧吟」。
27	遐憩山房詩	同治 1 年 (1862)	福州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同治紀元福州開雕」，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撰；卷一燼餘草，卷二旅樵草，卷三棲榕草、閩南游草，卷四戊巳草、庚辛草，計 4 卷。
28	遐憩山房詩續存	同治 1 年 (1862)	福州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撰；卷一壬戌草、癸亥草、甲子草、乙丑草、丙寅草、丁卯草，卷二戊辰草、己巳草、庚午草、辛未草、癸酉草，卷末詞附，計 4 卷 <sup>14</sup> 。
29	退遂齋詩鈔	光緒 7 年 (1881)	泉州	倪鴻著，宋文瀚校。
30	詩法入門			遊藝輯，計 4 卷。
31	歷朝賦楷	康熙 25 年 (1686)		西陵顧豹文且庵鑒定、王修玉松壑選輯、兄鳳翼來阿參閱，男元斌、元稹、滄升、孝升較訂（卷一）姪大業、大千、恂若、九煙校訂（卷二、六）男儒星、儒晟、譽升、曙升校訂（卷三）姪丹林、朱□、赤書、子凡較訂（卷四）男儒旦、儒曾、滄升、孝升校訂（卷五）男元雯、元稷、譽升、曙升校訂（卷七）姪大成、儒昺、聖集、懋升校訂（卷八），計 8 卷分訂 4 冊，內葉鈐「叢桂堂珍

<sup>14</sup> 楊希閔（1809~1878），字臥雲（一署臥雲老人），號鐵備、鐵備居士，又號息齋，江西新城人。咸豐 6 年（1856）因太平軍攻佔江西，舉家遷徙至福建邵武，隔年再避難到福州。同治 9 年（1870）以前渡臺，掌教海東書院，光緒 3 年（1877）6 月間作〈朱子石刻碑記〉；他曾替何澂編輯的《臺灣雜誌合刻》寫序。生平著述甚多，如《長樂縣志》20 卷、《遐憩山房詩》4 卷、《閩南游草》3 卷、《四書改錯平》14 卷、《榕陰日課》10 卷、《餘師錄》32 卷、《讀書舉要》2 卷、《水經注匯校》40 卷、《鄉詩摭談正集》10 卷、《鄉詩摭談續集》10 卷、年譜 17 種、以及在臺南海東書院撰序刊刻的《戊辰酬唱草》1 卷。

				藏」，版心刊「天鑑樓選」。
32	御選唐宋詩醇	乾隆 15 年 (1750)		清高宗弘曆輯，計 47 卷目錄 2 卷。
33	宋四六選	乾隆 41 年 (1776)		芸楣定本，曹振鏞編，計 24 卷。
34	國朝駢體正宗	嘉慶年間		南城曾燠賓谷輯，計 12 卷補編 1 卷。
35	律賦新機合刻箋註	嘉慶 25 年 (1820)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嘉慶庚辰年孟春鐫，鎮洋孫理少初評輯，受業胡金棫敬占、胡玉樹崑秀箋註」，周學敦伯校字。區分初、二、續集。
36	善卷堂四六	道光 2 年 (1822)	金閭步月樓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道光壬午年重鐫，金閭步月樓藏板」；武林陸繁弨拒石撰，桐城吳自高若山注，計 10 卷分訂 4 冊。內葉鈐「不佞」、「蔡氏碧吟」。
37	萬青堂時文	道光 11 年 (1831)		陳恭甫夫子鑒定，屏南張正元貞甫；陳壽祺書序。
38	竹笑軒賦鈔	道光 24 年 (1844)	百忍堂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道光甲辰春鐫」，丹陽孫清達又舫編次，計 2 集。
39	賦海測蠡	咸豐 10 年 (1860)	鋤經堂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咸豐庚申春鐫」。
40	唐宋八大家文選	同治 8 年 (1869)	正誼書院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福州正誼書院藏版」，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侯官楊浚雪滄總校；版心刊「正誼堂」，計 19 卷。
41	駢體文鈔	同治 6 年 (1867)		封面印白色紙並刊「駢體文鈔三十一卷，同治丁卯孟春婁江徐氏藏版」，牌記刻「合河康氏刻梓家塾」，李兆洛編選，計 31 卷，分爲上中下 3 編。
42	正誼書院課選	光緒 2 年 (1876)	正誼書院	封面印黃色紙並刊「光緒丙子冬月勒竣，翻刻必究」。
43	紫陽書院小課		紫陽書院	
44	成均課士錄	光緒 5 年 (1879)		封面印白色紙。
45	湖南闡墨、闡詩	光緒 14 年 (1888)		光緒戊子科。
46	四六新策			殘存下卷。

47	律賦行遠箋注			計 2 卷。
48	分類律賦從新			木活字版，計 10 卷。
49	新選七律試帖詳註			江蘇杜占梅輯，藜閣同人註，計 4 卷。
50	雞跖賦續刻			應心香等編，計 30 卷。
51	七十二明珠樓賦鈔			計 4 卷。
52	有正味齋駢文			錢塘吳錫麒著，慈谿葉聯芬蘭笙箋註，受業宗弟金潮、金泉校字，大字本，計 16 卷。
53	有正味齋駢體文			錢塘吳錫麒聖徵，小字本，存第 7-9 卷。
54	註釋時文備法新編	泉州以文居	陽湖史夢琦卓峰氏評選，計 4 卷。	
55	楔湖課藝、芹香課鈔			合訂 1 本，加鈐「蔡氏碧吟」。

### 三、蔡氏藏書分析

從附表知見的 102 種圖書，筆者略以下述三種面向分析：

#### (一) 編修志書的斟酌參考

日本明治年間蔡國琳曾經參與臺島《臺南縣誌》與《南部臺灣誌》的編纂，緣起自清領時期南部臺灣畫分 5 縣，光緒 20 年（1894）前後陸續採輯完成《雲林縣采訪冊》、《嘉義管內打貓各堡采訪冊》、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與屠繼善《恆春縣志》。蔡國琳參與過《安平縣采訪冊》的採輯工作，並且繳送資料給臺灣通志總局，終以全冊未成，而無傳本。可惜又因戎馬倥傯，稿多佚失。明治 29 年（1896）3 月 31 日臺灣總督府正式公布地方官制，設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一廳，由磯貝靜藏擔任臺南縣知事，轄管嘉義、鳳山、恆春、臺東四支廳<sup>15</sup>。他秉持「凡為政之要，在詳悉風俗人情，欲知風俗人情，莫善乎徵諸史乘；《臺灣府誌》重修於清乾隆中葉，距今已一百三十餘年矣，《縣誌》亦將近百年，未有續修之舉。況臺為帝國新領版圖，諸凡草創，文獻無稽，遺憾殊甚。」

<sup>15</sup> 賴建銘，〈日據時期（日籍）臺南地方長官人物表〉《臺南文化》新 7 期（1979.6）：78-94。昭和 9 年（1934）9 月宜蘭郡員山庄大湖信眾再聚資，交託宜蘭街王蔡樹經營的「王活版所」，依據木刻本改用鉛活字重排復刊。

於是要求臺南縣潮州庄辦務署長瀨戶晉「蒐遺帙，採舊聞，質諸宿儒耆老，編纂一部縣誌，以供爲政之便。<sup>16</sup>」所以成立「臺南縣誌編纂委員會」，任命臺南縣事務囑託（也是臺南新報社取締役兼主筆、副社長）奧村金太郎、臺南縣參事蔡國琳、臺南縣囑託（臺南民政部通譯）陳修五與葉芷生等人爲編纂委員，由瀨戶晉擔任編纂主任，從 8 月開始著手編纂，翌年 6 月到明治 32 年（1899）5 月之間陸續出版 4 編<sup>17</sup>。明治 34 年（1901）11 月 11 日，當局更改行政區域，以全島分設 20 廳，廢臺南縣，改設臺南廳，故將《臺南縣誌》改稱《南部臺灣誌》，賡續編成 4 編<sup>18</sup>。

蔡國琳爲《臺南縣誌》書序：「按全臺志乘，惟陳少林先生《諸羅縣志》、鄭六亭先生《臺灣縣志》，傳爲善本。<sup>19</sup>」纂修時不忘提及《諸羅縣志》、《鳳山縣志》的搜羅，概未有得<sup>20</sup>。但是到了續纂《南部臺灣誌》時，他就已經引據《諸羅縣志》，知已搜得。黃

<sup>16</sup> 瀨戶晉，〈《臺南縣誌》原敘〉，村上玉吉，《南部臺灣誌》（臺南：臺南州共榮會，1934），書後頁 1-2。

<sup>17</sup> 即首編〈沿革之部〉、第 2 編〈制度之部〉、第 3 編〈警察制度、司法制度、監獄制度〉、第 4 編〈沿革之二〉。首編底本今藏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鈔者不詳，刊本在明治 30 年（1897）6 月印刷，32 頁；第 2 編在明治 31 年（1898）4 月印刷，158 頁；第 3 編在明治 31 年（1898）7 月印刷，169 頁；第 4 編在明治 32 年（1899）5 月印刷，158 頁。宋體鉛字排印本，每面 12 行，每行 25 字。書高 21.5 公分、寬 14 公分，平裝 4 冊。今藏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三）》（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8），頁 71-110。

<sup>18</sup> 即第 5 編〈田賦沿革〉、第 6 編〈教育〉、第 7 編〈產業〉、第 8 編〈宗教〉、第 9 編〈雜事〉（其中第 6 編僅有資料，未成定稿）編成後，並未付印，底本不存，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曾於大正 7 年（1918）4 月 25 日謄寫 1 部，包括第 5 編在明治 35 年（1902）4 月編成，89 葉；第 7 編在明治 35 年（1902）8 月編成，77 葉；第 8 編在明治 35 年（1902）10 月編成，47 葉；第 9 編，未署編成時間，65 葉。係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朱絲欄稿紙抄寫，每半葉 13 行，每行 20 餘字。第 5、7 編係士林潘光儲所精抄，筆跡工整，書眉附有校字。書高 26.9 公分、寬 18.9 公分，線裝 4 冊，今藏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昭和 5 年（1930）10 月臺南舉辦「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內設「史料展覽會」一項，史料展科長村上玉吉因負責徵集文獻興發掘史料，發現《南部臺灣誌》4 編定稿藏於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 6 編資料存於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村上玉吉此一發現引起學界之重視，當時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村上直次郎、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臺灣總督府囑託尾崎秀愼等咸認有印行之價值，乃有合編之議：會後，臺南州知事今川淵以州費補助，委村上玉吉爲主編，以富地近思；宮本一學、鹿沼留吉等爲編纂委員，將《臺南縣誌》4 編、《南部臺灣誌》5 編予以整理重編爲 10 編，前後費時 4 年。於昭和 9 年（1934）完稿，由臺南州共榮會排印發行，書名仍題《南部臺灣誌》。同前註。

<sup>19</sup> 村上玉吉，《南部臺灣誌》（臺南：臺南州共榮會，1934），書後頁 3-4。

<sup>20</sup> 蔡國琳〈《臺南縣誌》原敘〉：「《臺灣縣志》雖續修於嘉慶十二年，偏而不全，苦於咄咄書空，羌無故實。磯貝縣憲又錄書目，郵寄申江帝國領事，囑向書肆廣爲尋撫，亦未獲一部。」同前註。

天橫回想起自己透過好友莊松林的引見，曾經在蔡國琳獨子蔡鷺生手中經眼過《續修臺灣府志》及《諸羅縣志》等書，惟因書品甚劣，放棄購藏的念頭，筆者推測這些方志應該就是蔡國琳當時修志的重要參考<sup>21</sup>。此外，蔡國琳在纂修《臺南縣誌》第2編〈制度·官衙〉還曾引據《大清會典》；第3編〈諸政·司法〉除開《大清會典》之外，也參考過吳榮光《吾學錄》；第4編〈租稅〉亦轉錄沈葆楨《沈文肅遺稿》等書，如今此批藏書中尚存殘編，幽光彷彿可親。

## （二）宗教事務的精神領銜

蔡國琳曾經在光緒21年（1895）攜眷內渡，翌年旋歸。此時臺南天公壇<sup>22</sup>亦以蔡氏為管理人，可是實際廟務至蔡氏去世前皆由神明會「如蘭堂」打理；明治32年（1899）12月蔡國琳仍以董事名義率眾鳩金重修，並改廟名為「天壇」<sup>23</sup>。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玉皇真經》。此書在明治29年（1896）3月出版，版框高23cm，寬13.5cm，內文每半葉8行，行20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下刊葉次，封面刊三龍標，中嵌「玉皇真經」，以朱色刷出；經前鐫序文1葉，序題下小注：「降於汕江慕道仙館」，文末署名：「光緒丙申三月之望，蓬萊李鐵拐恭撰」，首葉首行刊「玉皇真經誦本」，計13葉，第13葉末鐫「板存天壇經文社」<sup>24</sup>。再補〈善士捐緣芳名〉1葉，刊明黃渭濱等23人各捐銀乙大員，以及開買烏心石柴1塊、僱刻印工（每字4文）、僱夯工、敲工、鋸工、刻雙龍標1塊的工價。推測蔡氏雖未具名，然收藏此書亦可證明與天壇關係匪淺。

## （三）文學課藝的專題蒐藏

觀覽蔡氏集部藏書中，不僅囊括歷來重詩文別集的作品，也對駢體詞賦著力收集。

<sup>21</sup> 2008年2月9日下午3時筆者於黃天橫宅中筆錄。

<sup>22</sup> 連橫：「天公壇，在東門內。咸豐元年建，祀玉皇上帝。」《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594。

<sup>23</sup> 《臺灣首廟天壇沿革誌》（臺南：臺灣首廟天壇管理委員會，1990），頁38-40。

<sup>24</sup>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334-335。昭和9年（1934）9月宜蘭郡員山庄大湖信眾再聚資，交託宜蘭街王蔡樹經營的「王活版所」，依據木刻本改用鉛活字重排復刊。

其中與「股賦」相關的書籍為目前全臺僅見完整者，「股賦」即「八股文賦」的簡稱，由律賦與散賦雜揉而成，在對偶中羈入八股文句法，寓駢於散，以俳為偶的一種賦體，使用八股文法及押韻為其特色，發軔於明，盛行於清<sup>25</sup>。例如頗富盛名的《歷朝賦楷》，卷首即收錄王儒且等人所輯〈論賦十二則〉，以及司馬相如、揚雄、劉勰、祝堯、王世貞等 5 家論賦文字，囊括 167 篇作品，詳加月旦，開創清代賦話在書前刊載賦論的先例，選賦的標準對於後來賦話家影響深遠<sup>26</sup>。又如《國朝駢體正宗》選錄毛奇齡、陳維崧、毛先舒、陸圻、吳兆騫等 42 家文 172 篇，堪稱清代駢體文總集。

## 四、小結

縱使蔡國琳及蔡碧吟的「叢桂堂」藏書全貌無法確認（筆者未見傳世藏書書目），《叢桂齋詩鈔》的 4 卷手鈔本也未能追索覓得，可是筆者以為這一批從未被披露和著錄的臺灣私人藏書，仍然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父女兩代積累的豐富圖籍亦反映清末民初臺南文人的閱讀氛圍與品味，即便科舉考試突然由於日本當局抵臺中斷廢除，故國衣冠的孺沐與教養仍然在士大夫的潛意識中難以割捨，摩挲吟哦中的孤臣無力，書香氤氳後的掩卷太息，讓筆者禁不住要浮起種種疑竇：他們為何讀？（師承要求／學風影響）？從何讀（購書管道／調借傳鈔）？如何讀（次第進度／眉批割記）？讀後如何用（經世濟民／安身立命）？猶俟後來者踵事前賢、賡續釐清。

---

<sup>25</sup> 李曰剛，《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頁 211-217。

<sup>26</sup> 詹杭倫，《清代賦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133-134。



圖1 蔡國琳肖像  
(翻攝自《臺南事情》，1900)



圖2 「玉屏」、「蔡國琳印」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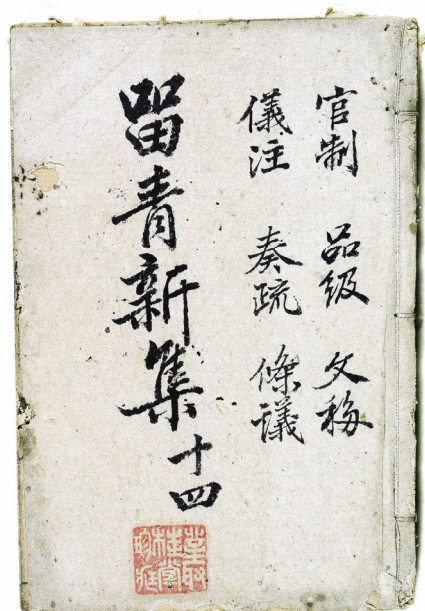


圖3 《憑山閣增輯留青新集》書皮，  
由蔡國琳親筆題寫



圖4 「叢桂堂珍藏」藏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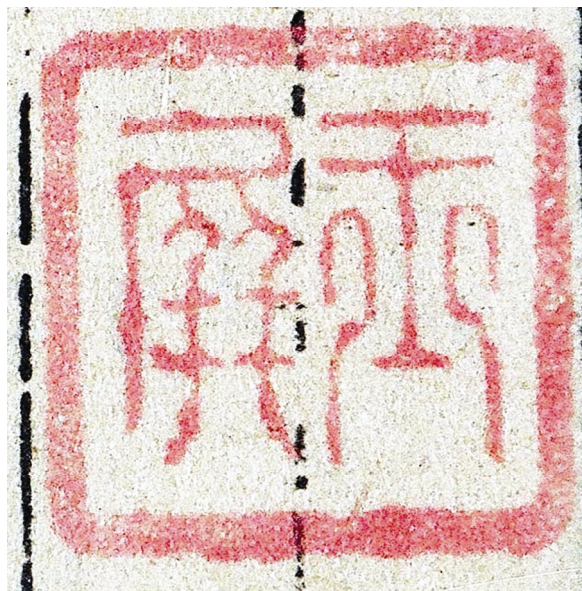


圖5 「玉屏」名章



圖6 「不佞」藏書章



圖7 「蔡氏碧吟」名章



圖8 「蔡碧吟」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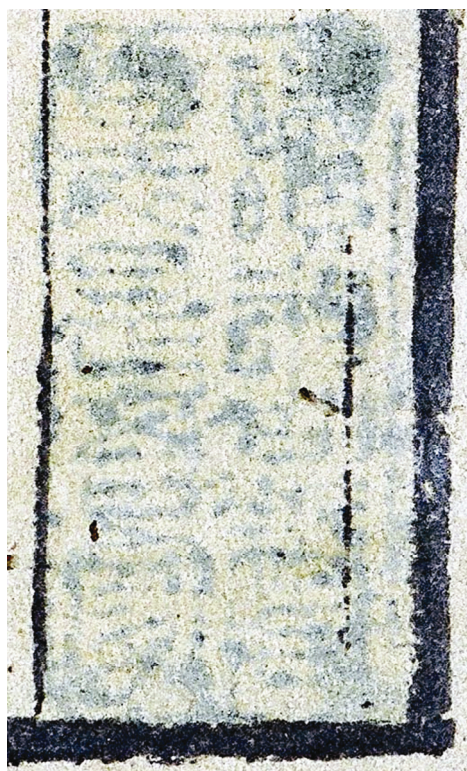


圖9 「讀書聲裏是吾家」藏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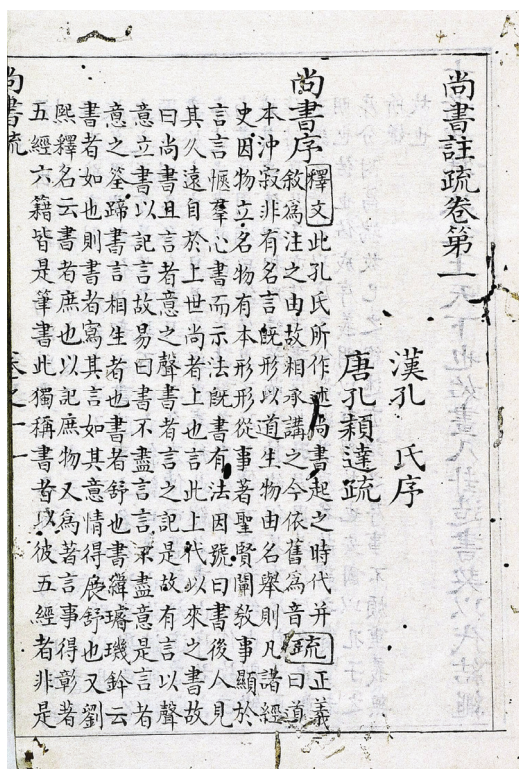


圖10 《尚書注疏》第1卷補鈔首葉



圖11 《遐邇山房詩續存》內文的朱筆圈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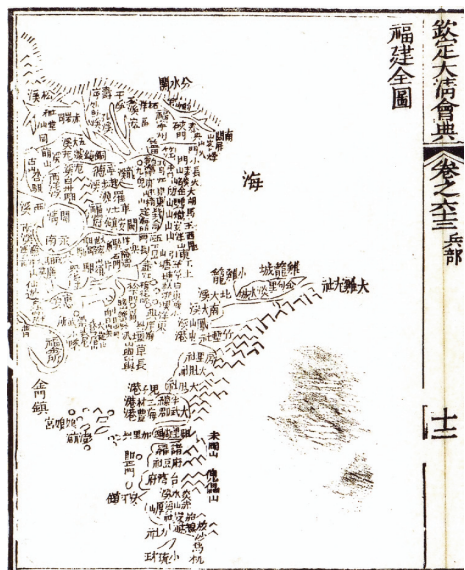


圖12 《欽定大清會典》〈福建全圖〉的臺灣圖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141-16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141-164

# 施梅樵的風月書寫探析 ——以女性主題為對象

林翠鳳\*

Shi Meiqiao the love affair writes  
searches analyzes  
——take the feminine subject as an object

by  
Tsuey-Feng Lin

關鍵詞：施梅樵、《捲濤閣詩草》、《鹿江集》、風月、女性

**Keywords:** Shi Meiqiao, "Volume Tao Chinese style pavilion Draft poem", "Deer Jiangji", love affair, female

---

\*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專任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 〔提要〕

臺灣日治時期鹿港詩人施梅樵（1870-1949），人譽為「三臺詩壇導師」。作為一個心思細膩，多愁善感的詩人，施梅樵的風月情懷具有飽滿的多元面向。本文嘗試先針對其中以女性為主題的詩歌進行觀察，藉以一窺詩人風月情懷的一個特色側面。觀其所作，本文歸納有三項特點：一、風月溫柔兼具有社交應酬與心靈慰藉的雙重功能，這也是詩人現實生活的片段反映；二、風月女子為施梅樵重要的書寫對象，而具有詩樂才藝的殷勤女子，格外能得到詩人的賞識；三、風月心情提供了施梅樵詩歌文學創作的靈感與推敲。包括懷人酬贈、兒女情懷、幻遊仙鄉等，採用不同的角度和形式，靈活描畫其風月經驗，並寄託心志。「臺灣柳永」施梅樵可謂為任重道遠傳詩教，溫柔香膩寄客心。

## Abstract

The Taiwan date governs time Lugang poet Shi Meiqiao (1870-1949), the human reputation is "three poetic world teachers". Is exquisite as thoughts, the sentimental poet, Shi Meiqiao the love affair mood has full multi-dimensional fac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aims at first carries on the observation take the female as the subject poetry, as soon as so as to peeps the poet love affair mood a characteristic side. The view its does, this article induces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love affair gentle concurrently has the public relations to treat with courtesy the dual function which consoles with the mind, this also is the poet real life fragment reflection; Second, love affair female for plum firewood important writing object, but has the poem happy talent and skill attentive female, can obtain poet's recognition especially; Third, the love affair mood provided the plum the firewood poetry literature creation inspiration with to deliberate. Gives a gift in thanks, the children mood including the bosom person, swims imaginary the paradise and so on, uses the different angle and the form, draws its love affair experience nimbly, and reposes the will. "The Taiwan willow tree forever" Shi Meiqiao it may be said for has heavy responsibilities passes on the poem to teach, gentle fragrant sends the guest heart greasily.

## 一、前言：兼談風月

何謂「風月」？清風明月，良辰美景是也。迎風賞月，閒情逸致是也<sup>1</sup>。吟風弄月，新詩篇篇是也<sup>2</sup>。風前月下，則兩情綣繾，男歡女愛是也<sup>3</sup>。笑風賣月，則騷情放浪，春心搖蕩是也<sup>4</sup>。藏風行月，則藝苑獻雅，煙花媚俗是也<sup>5</sup>。

風月乃人性內在溫婉的本質，行之於外，可雅可俗，是多感柔情的煥發。自古才子佳人多風流，文人與紅粉佳人之間的交遊與吟詠，在傳統文學史上流傳著無數動人心弦的故事與詩篇。日治時期臺灣隨著專制高壓，壓抑的時代更需要抒發的窗口，文人與風月場的往來風氣頗盛，兼以當時娛樂業的發達，文人的風流韻事在臺灣文壇真實地上演，文學界也因此平添許多纏綿的詩文。《風月》的創刊，凸顯了這個時代的特殊性<sup>6</sup>。《風月·發刊辭》<sup>7</sup>說得好：

惟夫風之為物也，其氣清；月之為物也，其色明。聞聲四座，當可襟披。對影三人，邀宜杯舉。大塊聞噫，則吾必變。中天想墜，于意云何。兩袖皆清，休思障面。一輪自滿，幾見當頭。笑談只可，世事疏慵。……為今日之創刊。文宜共賞，德必有鄰。雅俗同流，是非不管。任老子以婆婆，思美人之態度。樂其樂而利其利，賢其賢而親其親。

<sup>1</sup> 如《梁書·徐勉傳》：「常及閨人夜集，客有虞囂求詹事五官，（徐）勉正色答云：『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sup>2</sup> 如宋代歐陽修〈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sup>3</sup> 如《醒世恒言·賣油郎獨佔花魁》：「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是沒分。」

<sup>4</sup> 如《金瓶梅詞話》第一回回目：「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sup>5</sup> 如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傳歌》：「妾身姓李，表字貞麗，煙花妙部，風月名班。」

<sup>6</sup> 邱旭伶《臺灣藝姐風華》頁150、156：「在吳子瑜（按：《風月》出資創刊人）的理想裡，《風月報》將要專門刊載文人吟詠給藝姐們的詩作。……（改版復刊後）《風月報》刊載名妓逸文趣事的文章，是每一期都會有的篇幅，與當初創立的宗旨相差不遠。」臺北：玉山社，2002年4月，初版二刷。

<sup>7</sup> 見《風月》第1號頁2，昭和10年5月9日。未註明作者。時主筆謝雪漁，副主筆林述三。或為二人之一。

風月披襟，特煞多情。何不疏離於紛擾世局之外，騁才於娉婷美人之間，既樂利，又親賢。文刊一經流佈，妙趣齊邀共賞，豈不是再添一筆風月清談！

鹿港詩人施梅樵（1870-1949），人譽為「三臺詩壇導師」。他以前清秀才遭遇割臺一夕變天，曾與同鄉許劍漁、苑裡蔡啓運<sup>8</sup>共同倡立「鹿苑吟社」，積極推展詩教，視延續漢文香火為使命，應邀設帳各地，桃李天下，生前卒後在詩壇都受到極高的尊崇。他也曾主編《孔教報》，提倡儒學，「希望提倡傳統的道德倫常，藉以維持社會的穩定。<sup>9</sup>」有著任重而道遠、捨我其誰的儒者氣概。凡此而贏得「垂老尚餘豪氣在，嘯吟長抱漢精神」<sup>10</sup>的敬佩。

而詩人之所以為詩人，往往是有一份天生敏感多情的心思，所謂自古才子多風流，詩人在奔赴道德志業的理想之外，其實也同時並存著血肉之軀的風月情懷。翻開施梅樵現存的詩集《捲濤閣詩草》與《鹿江集》，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詩歌中多有涉及風月抒情者。或旅夜書懷，或四時遣愁，或臨風嘯歌，或把酒喟息。其中也不乏憐香惜玉、偎紅倚翠之作。作者大方存錄傳世，展現不同的詩歌面貌，也呈現一個更為立體的真實人性。

本文即嘗試就其中具有兩性互動背景，以女性為內容主題的詩歌，作為討論的取樣對象，藉以一窺詩人風月情懷的一個面向。在目前《捲濤閣詩草》、《鹿江集》兩本詩集合計共 880 題的詩歌數量中，以不精確粗估，此類作品若僅就題目文字統計，大約佔 5% 左右的數量。若加之以相關內容的詩作，則篇幅更眾。這樣的比例乍看雖不算很高，但在施梅樵大多數以詩友為對象的酬贈寫作中，女性對象的書寫，仍然值得關注。這些作品的研究，應對反映詩人性格、生活與文學，有一定的正面意義。期望也能因此對認識更全面的施梅樵，提供有效的助益。

<sup>8</sup> 施梅樵有〈偕劍漁遊公園〉、〈輓蔡啓運〉。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4、卷下頁 11。收在高志彬主編《梅樵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 年 6 月初版。

<sup>9</sup> 見翁聖峰〈日據末期的臺灣儒學——以「孔教報」為論述中心〉頁 46。收錄於《第一屆臺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7-50 頁。臺南市：成功大學中文系，1997 年 6 月。另可參，江啓綸〈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變異與發展——以《孔教報》為分析對象（1936~1938）〉，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2007 年碩士論文。

<sup>10</sup> 見林玉書《臥雲吟草》〈懷故人詩——懷施梅樵茂才〉題目下臥雲自註：「放懷詩酒，老更風流」。民國 61 年 9 月初版，高雄發行。

## 二、寫作背景分析

### (一) 日治時期的風月時尚

自古以來，才子佳人衍生許多美談，創作經常因此得到激發與促進，而靈感泉湧，佳作頻出。如柳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的淒悵，再如姜夔「小紅低唱我吹簫」（〈過吳江垂虹橋〉）的盡興，都留下了許多話題。

日治時期臺灣受到殖民高壓統治，嚴格管控言論，往往動輒得咎。雖說傳統詩的寫作與活動受到官方特定意識下的鼓舞而蓬勃，然而詩壇同樣沒有獲得言論思想的豁免權，心生異議不吐不快者，有能義勇抗議，而更多人是隱晦諷寄，詠物詩、香奩體等無關乎政治的主題，成為寄情騁才的人氣題材<sup>11</sup>。

臺灣在日治時期承襲了中國與日本雙軌的淵源，發展出屬於臺灣的風月文化。以漢民族為軸線的藝旦系統，注重藝術才華與氣質<sup>12</sup>，深受文人雅士與地主富商階級的欣賞，傳統藝文界的許多活動，包括詩社的擊鉢、吟宴、出遊等，不僅經常可以看到紅裙翠袖的陪伴<sup>13</sup>，幾乎也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時尚。古典詩壇數量龐大的贈妓、詠妓之作，正是傳統文人將割臺後的漢族情感，寄託在充滿中國傳統風情的藝旦身上的文學表徵<sup>14</sup>。而《風月報》的出現，更反映了時代的一個縮影。

從施梅樵的作品中來看，也確實可以看到許多文會吟宴的場合中，經常都是群花相伴。試看詩人云：「高樓吟宴許勾留，坐看佳人奪酒籌」（〈過二林陳建上留飲賦贈〉）、「苦吟轉惹群花笑，暢飲能消逆旅愁」（〈桃源閣吟宴賦質諸賢〉）、「小憩爭先寫豔詞，婉轉鶯聲啼不斷」（〈醉紅樓題壁〉）、「慣向花前頻索笑，拼教醉後共拈題。……一刻千金春夜讌，

<sup>11</sup> 例如：鄭坤五〈也是詩話〉曾說：「或曰：何必單指詠物？曰：餘固有大欲存焉，如詠史、時令、香奩、應酬、摘句為題之詩，已是我口所欲言，已出古人口矣，無過為古人應聲蟲已耳。若詠時事，又恐有觸忌諱。倘要發揮個性，舍詠物之外無他也。」見《三六九小報》昭和9年9月29日第381號4版「話柄」專欄。

<sup>12</sup> 參嚴明《中國名妓藝術史》，臺北市：文津初版社，1992年8月。初版一刷。

<sup>13</sup>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42。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

<sup>14</sup> 另參吳品賢《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古典詩作研究》頁118-119，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問誰座客不沈迷？」(〈西園小集拈韻〉)、「衆香國裡駐些時，角勝歡場有健兒。傾盡白壺拼醉死，只思心血付蛾眉。」(〈高賓閣席上書所見〉)等等，詩中場面總是釵光帽影，舞袖香粉，好不炫目熱鬧。風氣之流行，藉可窺一斑。

相對的，風月場中諸女子，也以習得詩文唱和或南北管戲曲的才藝，做為職業需求下的必備技能<sup>15</sup>。在漢學風行的當時，臺北劍樓書塾的趙一山<sup>16</sup>、稻江礪心齋書房的林述三<sup>17</sup>、鹿港捲濤樓的施梅樵，都是許多旗亭女校書<sup>18</sup>登門邀請教詩的知名師家。以施梅樵為例，披露於報端者如：

臺南市新町酒杯亭妓女荷香，及玩春園支店阿桂，性好讀，自二年前，從施梅樵氏學習詩文，每日殷勤誦讀，無少休息<sup>19</sup>。

邇來文風稍振，漢學振興。無論學界生徒，年年增加，學級加額。甚至於本島娼寮妓女，就捲濤閣施梅樵氏之私學者，計有數人<sup>20</sup>。

施梅樵早具「三臺詩壇導師」令譽，才子名媛出其門下者不計其數<sup>21</sup>，而北里歡場聞其盛名求教者亦如是。詩人時而出入風月場中，而風月才女亦出入詩人門下，兩相交遊，淵源既深，牽緣亦長矣。

## (二) 詩人的現實生活經驗

施梅樵家世，自祖父閣銓公始由福建省晉江縣錢江鄉渡海，來臺卜居鹿港。父施家

<sup>15</sup> 參邱旭伶《臺灣藝旦風華·藝旦的養成》頁47-68，臺北市：玉山社，2002年四月初版二刷。

<sup>16</sup> 趙一山，字文徽，為前清秀才。日治時設劍樓書塾於大稻埕永樂市場旁邊，教授漢詩文。臺北知名藝旦王香禪即出於其門下。參聞樂〈連雅堂與王香禪〉，《中外文學》4卷2期，1975年。

<sup>17</sup> 林述三先生(1887~1957)，名纘，以字行。礪心齋書房女弟子以曾經紅極一時的奎府治、真珠、小雲英等名妓為最知名。

<sup>18</sup> 校書，妓女別稱。據《風月》昭和10年9月3日26號頁2〈妓女異名考〉：「校書，《鑑識錄》云：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按，唐妓薛濤，工詩，寓於蜀，胡曾贈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妓稱校書，由此始也。」

<sup>19</sup> 見《臺灣日日新報》第9252號4版(1926年2月7日)〈赤崁特訊·文雅可嘉〉。

<sup>20</sup> 見《臺南新報》第8161號5版(1924年11月7日)〈店員好學〉。

<sup>21</sup> 詩人才子如楊爾材，名媛如黃金川，皆出梅樵門下。參《捲濤閣詩草》刊頭、《金川詩草·梅樵序》。



珍為同治年間歲貢生，曾任福建省福寧縣教諭，後返回鹿港，經營當舖<sup>22</sup>。施家珍亦善於交通府、縣，為地方上名重一時的仕紳。同鄉洪月樵（1867-1929）謂施家「為鹿鉅族」<sup>23</sup>，應當即此時。一直到光緒 14 年（1888）施九緞事件發生之後，施家家道才一夕中落<sup>24</sup>。時施梅樵未及弱冠。

洪棄生與施梅樵為同鄉好友，其詩文集中可見兩家頗有往來<sup>25</sup>。在洪棄生《寄鶴齋詩話》曾記載：

是時梅樵家貲尚鉅萬，以喜狹邪遊傾其貲；而梅樵始終興不衰。余序其詩，有「旗亭劃壁，則伶人共詫王郎；樂府彈箏，雖妓女亦知柳七」句。梅樵讀之，乃大喜。顧梅樵早歲惟工艷詩；中年以後肆力古風<sup>26</sup>。

由上可知：施家原本豐厚的產業，或許造就了施梅樵的公子習氣，他喜於冶遊，至揮霍傾家，而仍然興致不減。又兼以天賦才氣，而至旗亭妓女，無不知之。也因此，二十歲之前的梅樵，生活優渥，英才早發，家世背景提早培養了他的名士性格。他的「早歲惟工艷詩」，必然地反映了他少年時期的風流生活經驗。洪棄生序《捲濤閣詩集》時，揮筆描述了施梅樵青春時期的風月英姿，云：

于時清平風月，錦繡江山，裙屐翩翩，衣香嫋嫋。旗亭劃壁，則伶人共詫王郎；樂府彈箏，雖妓女亦知柳七。蓋君素性風流，為人倜儻。謝鯤任達，未損一邱一壑之儀；徐逸陶情，何妨半醉半醒之度。又況江左鶯聲，堪砭戴顓之耳；吳中鸞翠，能牽夏統之腸。時既笙歌之盛世，君亦金粉之才華。是可樂已，亦足尚也<sup>27</sup>。

<sup>22</sup> 施家珍事見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 41，2000 年 6 月。

<sup>23</sup> 據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詩·五言古體》〈題施梅樵祖母像〉頁 268，臺灣文獻叢刊第 304 種。

<sup>24</sup> 施家珍與施九緞事件，參見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施案紀略》頁 105-108，臺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

<sup>25</sup> 從洪棄生《寄鶴齋選集》中可見如〈題施梅樵祖母像〉、〈寄別豐梅樵韻〉、〈喜施梅樵見過三首〉、〈柬梅樵三首〉，分見《寄鶴齋選集·詩選》頁 268、頁 297、頁 304、頁 353。臺灣文獻叢刊第 304 種。

<sup>26</sup> 見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詩話》，頁 212。臺灣文獻叢刊第 304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出版。

<sup>27</sup> 見《捲濤閣詩草》洪棄生〈序〉頁 5。施梅樵著、高志彬主編，《梅樵詩集·捲濤閣詩草》，臺北：龍

洪月樵大約以施九緞事件發生前的清平時代為背景，寫年少多金的梅樵，歡愉無憂地享受於歌舞昇平、醇酒美人之間。他在風月場中受歡迎的程度，一似施美男子王郎<sup>28</sup>，也恰如才子柳永；性格好比謝鯤<sup>29</sup>的好色不拘小節，也恰似徐邈<sup>30</sup>的沈醉酒鄉，縱情曠達，真乃名士之流亞。而鶯聲燕語也的確蕩人心腸，名家如戴顓<sup>31</sup>、木人如夏統<sup>32</sup>者，都難以抗拒，何況是「平生都為情牽掛」<sup>33</sup>的多情種子施天鶴呢？洪月樵好生嘲諷了好友施梅樵，說他是色既迷人人自迷。這段話卻讓施梅樵讀之大喜，顯然施氏對其風流形象不僅不以為意，尚且還有幾分得意。

類似的觀察，好友林培張〈寄捲濤閣主人〉<sup>34</sup>也曾提及，謂施梅樵：「廿載風塵忙驥足，一生衣鉢付花魁。」則似乎施梅樵是予人風流的形象。旗亭歡場的迷人，人們常暱稱作「溫柔鄉」<sup>35</sup>、「神仙窟」等。而施梅樵其實也不諱言其嗜好，觀其詩中曾云：「美人醇酒堪娛老，泥醉渾忘日影斜」、「談諧曼倩無拘束，行樂還應讓老夫」、「歡場我亦鍾情客，散盡黃金莫怨嗟」<sup>36</sup>，施梅樵真是個千金散盡樂狎遊的風流才子。而這些風月興

---

文出版社，2001年6月。

<sup>28</sup> 王郎指清初名伶王紫稼。尤侗《良齋雜說》：「余幼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若狂。年已三十，遊於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而龔芝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

<sup>29</sup> 據《晉書·謝鯤傳》載：謝鯤「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深慕竹林七賢。」與胡毋輔之等人，俗譽為「八達」。鄰人有女甚美，鯤往挑逗，女正織布，順手以織梭擲之，鯤因折門牙兩顆。時人因譏言：「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不以為意，仍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sup>30</sup> 據《三國志·魏書·徐邈傳》載：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於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sup>31</sup> 據《宋書·隱逸傳》載：戴顓，南朝著名琴家。與父戴逵、兄戴勃均著聲於時。戴顓善造新聲，有《三調遊弦》、《廣陵止息》等名曲，為嵇康《琴賦》舉列稱道。

<sup>32</sup> 據《晉書·夏統傳》載：夏統，晉朝江南名士。博學多才，擅於雄辯。時人多勸其出仕，均為所拒。太尉賈充曾以軍伍、車乘、珠玉、美女誘惑之，統始終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不得已各散，慨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sup>33</sup> 〈北遊將歸若川永南強留桃園三宿〉，見《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3。

<sup>34</sup> 見《寄廬遺稿》頁75。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初版。

<sup>35</sup> 舊題漢代伶玄〈飛燕外傳〉：「是夜進合德（按：趙飛燕妹），（漢成）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按：仙鄉）也。』」後世因以稱美色迷人的境地為「溫柔鄉」。

<sup>36</sup> 錄自〈席上玉霞校書索詩率成絕句〉、〈寄示近樗〉、〈新新旗亭春宴賦示花卿〉，分見《捲濤閣詩草》

味，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在詩歌的寫作上。

### 三、題材分類與寫作手法

詩人的風月情懷，聯繫在與眾家女子的往來情緣裡。今以現存作品來看，筆者將檢閱所得，據其題材分別，可得見三大類型：（一）懷人酬贈、（二）兒女情懷、（三）幻遊仙鄉。茲分述如下：

#### （一）懷人酬贈

施梅樵詩集中的酬贈詩甚多，以女性對象而言，可區分為二類：1. 妻子 2. 風月女子。

##### 1. 妻子

施梅樵長年設帳奔波在外，〈寄內〉傳達了他清夜思念結髮妻子的心情：「一燈愁倚枕，多病慣思鄉。……他年修野史，天壤笑王郎」<sup>37</sup>，或許是傳統不慣於直言表白，梅樵婉轉地以思鄉代言其相思，還自嘲妻子是嫁給天壤王郎<sup>38</sup>的自己。言辭雖不夠彩麗，內在卻難掩疼惜之意。

清風明月的良辰美景，若能儷影成雙，才是真美好。施梅樵有〈中秋夜偕內子觀月〉<sup>39</sup>，代表性地反映了兩人的牽手之情，詩云：

一顆明珠燦九天，人間雙影尚團圓。自從嫁作梁鴻婦，荏苒光陰五十年。

月圓人圓已是圓滿，而詩人自喻為清貧而幸得賢妻的梁鴻，婉轉地讚譽了妻子的賢慧，

---

卷上，頁 13、40；《鹿江集》七言律詩部，頁 39。

<sup>37</sup> 〈寄內〉，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14。

<sup>38</sup> 天壤王郎，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謝道韞初適王凝之，甚不樂。謂謝安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後用以指婦女對所嫁丈夫不滿意。

<sup>39</sup> 〈中秋夜偕內子觀月〉，見《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 11。

甜蜜與感謝盡在含蓄詩語中<sup>40</sup>。

## 2. 風月女子

與女性的懷贈詩中，為數最多的是和風月女子間的往來。在日治臺灣傳統詩壇有大量贈妓、詠妓的詩作，施梅樵也不自外於此時代洪流。施梅樵詩集中，樓閣亭臺的宴樂時見，而鷗鷺吟聚，往往鶯燕伴隨。統計詩題中可見的女校書名號者，就有十一位，芳號分別為：川貝、雙鯉、琴仙、白玉杏、玉霞、劍英、寶桂、瓊瓊、豔春、儷秋、彩雲。觀施梅樵賦贈妓女諸作，蓋可大別為二類：

### (1) 席中賦韻

有索詩贈韻，如：〈雙鯉校書索詩率成贈之〉、〈琴仙校書索書偶賦三絕〉、〈吟贈川貝校書〉<sup>41</sup>等。

而即席賦贈之作更為多見，如：〈席上聽白玉杏校書唱古涼州曲校書向余索詩賦此贈之〉、〈席上玉霞校書索詩率成絕句〉、〈席中即事贈彩雲〉、〈回春院席上即事〉、〈即事戲作〉、〈席上即事〉、〈臺南即事〉、〈新新旗亭春宴賦示花卿〉、〈高賓閣席上書所見〉、〈西園小集拈韻〉等等。

風月女子在社交、宴樂或職場結識仕紳文人，與之吟唱賦贈，恰是投客人之所好，也象徵著比較高尚的格調，是身份層次的提升。不能詩者，歌詠或索詩為念；能詩者，次韻唱和往來，都能賓主皆歡。風月女子若能得到文人的品題，身價往往容易增漲。以施梅樵當年在詩壇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校書們的頻頻索詩，也是可以想見的。

施梅樵出入旗亭酒樓頻繁，此類作品甚眾，頗能道出席上和曲索詩的場面和心情，例如有詩云：

周郎顧曲原情種，趙女彈箏亦性靈。世事彩雲容易散，為卿把筆寫娉婷。（〈雙鯉校書索詩率成贈之〉<sup>42</sup>）

塵世何從覓酒泉，飛瓊小玉奏鈞天。逢場作戲君休笑，買盡風光不費錢。（〈即事〉）

<sup>40</sup> 施梅樵於夫人李氏 75 歲壽誕寫真時曾作〈題內子李孺人寫真〉（《鹿江集》古詩部，頁 24），讚其懿德，可參考。

<sup>41</sup> 〈吟贈川貝校書〉，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5。

<sup>42</sup> 〈雙鯉校書索詩率成贈之〉，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8。

43)

詩興三分酒二分，吟聲朗朗動人聞。化蟬有恨憐齊女，覆被多情憶鄂君。(〈還浦席上以有感詩見示次韻奉和〉 44)

花枝映水綠漪漪，小憩爭先寫豔詞。婉轉鶯聲啼不斷，風光遠勝習家池。(〈醉紅樓題壁〉 45)

釵光帽影映玻璃，賭酒猜拳盞競攜。慣向花前頻索笑，拼教醉後共拈題。風流事合垂青史，月旦詩非博紫泥。一刻千金春夜讌，問誰座客不沈迷？(〈西園小集拈韻〉 46)

眾香國裡駐些時，角勝歡場有健兒。傾盡白壺拼醉死，只思心血付蛾眉。(〈高賓閣席上書所見〉 47)

高樓吟宴許勾留，坐看佳人奪酒籌。羨煞孟公詢好客，新詞禁唱到涼州。(〈過二林陳建上留飲賦贈〉 48)

這類作品，詩人大多採用第一人稱的「直言」立場，賦陳現場見聞感想。詩歌讓當年詩酒同歡、絲竹齊發、士女逐笑、花樓拼醉的場景，宛然喧喧鬧鬧地浮現眼前。風月春宵，自當即時行樂。詩人身在香國粉境，酣眼迷離，詩情泉出，縱橫的才氣贏得滿堂的掌聲，除了大大滿足了男兒內在虛無的豪情，尤有進者，是在群體的觥籌交錯、詩才的援筆立就之間，鼓舞了「自我」的尊嚴價值，也彰顯了「主體心性的充分自由伸展」<sup>49</sup>。主客盡歡中，彷彿所有的失意困愁，都已拋諸腦後。諸如此類尚有不少，反映著施梅樵綺豔生活中的部分寫真。

## (2) 懷思回憶

如〈疊前韻示舊識妓〉、〈重過萃園感舊有作〉、〈寄質劍英女史〉、〈花魂〉、〈散悶〉、

<sup>43</sup> 〈即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10。

<sup>44</sup> 〈還浦席上以有感詩見示次韻奉和〉，見《捲濤閣詩草》卷下，頁33。

<sup>45</sup> 〈醉紅樓題壁〉，見《捲濤閣詩草》卷下，頁53。

<sup>46</sup> 〈西園小集拈韻〉，見《鹿江集》七言律詩部，頁110。

<sup>47</sup> 〈高賓閣席上書所見〉，見《鹿江集》七言絕詩部，頁21。

<sup>48</sup> 〈過二林陳建上留飲賦贈〉，見《鹿江集》七言絕詩部，頁26。

<sup>49</sup> 吳彩娥〈古典書寫與主體性－施梅樵詩歌的一個考察〉，見《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2。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2年12月。

〈記得〉、〈有贈〉等。

溫柔的時光總是令人難忘，或是酸甜百味，經年更添滄桑；或是溫存懷想，謐室倍增憐惜。較之即席賦詩，在回憶之作中，似乎對當年的美人形貌和溫柔，特別容易回味再三。可以令施梅樵回味的女子，究竟有哪些特色？〈記得〉三首恰好反映了梅樵觀察的三個方面，試看詩云：

記得吟筵汝執觴，秋來猶著越羅裳。近前拂袖嫣然笑，未肯逢人道逢長。(一)  
爛漫天真自可人，淡粧分外見丰神。雲鬟偏喜趨時樣，剪斷烏絲百萬緡。(二)  
幾回拇戰奏奇功，如此裙釵亦足雄。應把管城書露布，不堪視作可憐蟲。(三)

第一首寫二人相逢於吟宴時對女子衣著輕薄，巧笑倩兮的迷人印象；第二首寫其青春儀態，天真的氣息，時髦的裝扮，正是勇於嚐新的「毛斷女」<sup>50</sup>形象；第三首寫其拈拳的屢奏捷報，堪稱才藝出眾。則互動、儀態、才藝三者，是詩人回味的三個印象。

在風月女子的迷人風情之外，才子與佳人之間還有著相互的慰藉。如〈琴仙校書索書偶賦三絕〉中，施梅樵對琴仙因遇人不淑而離異，是給予支持的態度。他謂「怨耦何妨去下堂，天生尤物破慳囊」，開明的婚姻態度，相信可以給對方些許的安慰。此外，對妓女們堪憐的風月生涯，詩人也寄予同情與關心。例如詩云：

如剪東風入幕寒，一杯卯酒怕憑欄。落花似比人憔悴，未忍朝朝帶淚看。  
臨流意外得雙魚，消息詳明一紙書。忽觸浮萍身世感，漢臯解佩竟成虛。(〈有贈十首之二〉)  
秋月春風雙淚落，情天恨海隻身羈。桃源自有神仙婿，莫嫁長安遊俠兒。(〈寄質劍英女史〉)

前者同情其神女身世，託身不易，淒涼悲感；後者則關心其沈浮於風月，真情難覓，而祈望能得從良於穩定歸宿，成就神仙美眷。文人與風月女子雖是露水情緣，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尊重與疼惜，相互撫慰了寂寞旅人心。

在眾香國中，與施梅樵唱和而詩作於現存文獻上仍可得者，惟見名妓彩雲。《鹿江集》

<sup>50</sup> 毛斷女，乃「modern girl」的漢譯文，是日治時期指穿著既嚐鮮又大膽的都會女性。

中收有施梅樵〈吳萱草攜妓彩雲訪余於旅邸〉<sup>51</sup>一首。此詩寫作年代不詳。觀其詩雖有嘲謔吳萱草挾妓出遊之意，惟其寫作主訴於詩情，既符合主客皆為詩家的身份，也同時因為彩雲是擅於詩文的知名詩妓。

彩雲乃嘉義西門町西蒼芳知名女校書，昭和 16 年（1941）曾經在《詩報》公開以〈薄命花〉七絕命題徵詩<sup>52</sup>，廣獲響應，得詩達 1184 首，名噪三臺。昭和 17 年（1942）詩人林臥雲、林友笛接待宴請施梅樵，席上與彩雲即事唱和，詩載報端。此作未收錄於《鹿江集》中，特錄存如下：

客中無計遣春寒，得女清音破寂寥。但願移花須有主，莫教錯過好春朝。（施梅樵〈席中即事贈彩雲〉）

燈紅酒綠可憐宵，座伴詩人慰寂寥。卻羨簾前雙粉蝶，猶酣香夢過花朝。（彩雲〈敬次施梅樵先生見贈瑤韻〉）<sup>53</sup>

施梅樵詩中讚譽彩雲歌唱美妙的同時，帶著幾分長者的老成，勸他把握青春，早覓歸宿。彩雲則得體的感謝客座照顧，並自傷孤涼。她另成〈呈天鶴施梅樵先生〉<sup>54</sup>絕句一首，且以「梅樵」二字冠首於上聯，獻給詩人，可謂細心體貼，其詩云：

梅時同醉甕頭春，樵水漁山話夙因。欲把形圖買絲繡，青天一鶴見精神。

詩語婉轉嬌美，柔中有骨，媚而不俗，的確討人喜歡。林臥雲說她「解語名花第一人」、林友笛也讚她「風雅如卿有幾人」<sup>55</sup>，果然名不虛傳。而呂左淇更特別為她鋪寫〈羅山

<sup>51</sup> 〈吳萱草攜妓彩雲訪余於旅邸〉，《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 22。

<sup>52</sup> 《詩報》昭和 16 年 10 月 20 日第 258 號頁 1「徵詩啓事」：「彩雲乃嘉義西蒼芳之妓女也，性耽風雅，喜學吟詠，者感嘆身世飄零，欲向島內徵詩，望諸大雅勿吝珠玉，多惠佳作，以垂永遠紀念。」又徵詩結果披露見《詩報》262 期頁 1。

<sup>53</sup> 〈席中即事贈彩雲〉、〈敬次施梅樵先生見贈瑤韻〉，《詩報》昭和 17 年 6 月 5 日 273 號，頁 8。

<sup>54</sup> 〈呈天鶴施梅樵先生〉，《詩報》昭和 17 年 6 月 5 日 273 號，頁 8。

<sup>55</sup> 見林臥雲〈席中即事贈彩雲〉、林友笛〈次臥雲先生瑤韻贈彩雲女史〉，《詩報》昭和 17 年 6 月 5 日 273 號，頁 8。

彩雲歌妓賦》<sup>56</sup>，彩雲的動人風華，更是躍然紙上，傳諸久遠啊！

## （二）兒女情懷

施梅樵作品中有幾組詩歌，藉由設身比擬的「代言體」手法，託於女子之口，道出幽微的兒女情志，寫盡私心衷曲，可說大抵承襲了傳統文學中閨怨一脈的寫作。這種閨怨的表現雖然和大男子形象迥異，但其實自古以來為騷人所慣用，從漢樂府民歌〈上山採靡蕪〉、以至曹丕〈燕歌行〉、李白的〈長干行〉等許多文士的閨怨詩、宮體詩的名作，都具體示範了婉轉纏綿的感情，效果十分突出。

如施梅樵的〈六憶詩〉<sup>57</sup>，此作在題目和格式上都明顯地模仿了沈約〈六憶詩〉。詩中藉託於女子的立場和口吻，分別回憶與情郎聚時、別時，以及自己在行時、坐時、食時、眠時對情郎的心思。詩詠六種不同的情境，而每一首詩都取「憶」字為開頭，故題為「六憶」。平易地從日常生活中的一顰一笑、言行儀容等細節著手，描寫了女子的清純羞赧，內斂巧慧；人前的拘束端莊，和人後的坦率表露，形成對比效果，更顯示了對情郎傾心相許，期成眷屬的熱切。戀愛中小女子心緒的浪漫波盪，十分可愛動人。體例特殊，語言簡潔樸雅，反覆詠述中，富含思念縈懷的深情。

施梅樵詩作中的此類抒發兒女情懷的作品，在形式上鮮明地偏好於仿效歷朝民歌的型態來寫作。民歌大抵率真自然，淺白易懂，尤其對於兒女情長的描寫，往往能曲盡其意。施梅樵的仿民歌詩作，也有意圖藉此抒發細膩情懷。歸納後約有四類，茲分述如下：

### 1. 有仿《詩經·國風》者，如〈狡童三章〉<sup>58</sup>

這一組詩，施梅樵直接套用《詩經·鄭風·狡童》，改易其中部分文字，並加增一章而成。詩人模擬女子對心愛對象的不理不睬發出嗔怨，活潑地表現出熱戀中頓挫的小插曲。「處」、「好」、「厚」是抱怨對方不在身邊、不夠善待，而因此使得自己「無可語」、「幾莫保」、「不能受」，孤單寂寞，難以承受，則平日的親密依賴，自是顯明；對愛人愛情熱度的需索，是毫不隱藏了。施梅樵的〈狡童三章〉在題材形式與文字上襲古，不無遊戲成分。創意雖然不足，但描繪戀人的心情與形象，卻是一樣的質樸生動。

<sup>56</sup> 呂左淇〈羅山彩雲歌妓賦—以「文君終不負長卿」為韻〉（《詩報》昭和17年3月7日，267號頁14。

<sup>57</sup> 〈六憶詩〉，《鹿江集》古詩部，頁28。

<sup>58</sup> 〈狡童三章〉，《捲瀾閣詩草》卷下，頁28。



## 2. 有仿漢代樂府古詩者，如〈相逢行〉

〈相逢行〉<sup>59</sup>擬樂府古題，寫單戀女子的私心衷曲。民歌「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此即謂也。漢魏的馬車，早已因時代不同而改為「汽車」，但那純情癡心女子的款款溫情，卻跨越時空，千古一同。體會詩歌「任人以棄置」的情境，女主角應是煙花女，飄萍的哀怨，專情卻難以依託。施梅樵或許是代為寫出了風月女郎的寂寞心事了。

另，有〈無題〉<sup>60</sup>一首寫青梅竹馬的愛人，長大的女孩不能確認情郎是否變心，齊眉之樂讓她歡喜，也更傾心相許，即使為伊憔悴，也在所不辭。有類似〈古詩十九首〉「所思在遠道……同心而離居」、「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的意味，並且在詩中融入了《漢書·張敞傳》的為婦畫眉之樂；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與曹植〈七哀〉詩的「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等典故，詩意清晰而層次豐富。題目以「無題」為題，越發顯出曖昧的小兒女心思。

## 3. 有仿南朝吳歌者，如〈采蓮詞〉（4首）

〈采蓮詞〉<sup>61</sup>描寫青年男女在追求愛情時的青澀與天真。開篇的「芙蓉池北葉鱗鱗，芙蓉池南花入神」二句，宛如南朝吳歌〈江南可採蓮〉：「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復沓輕快的趣味。而採蓮女的美麗不從外在的容貌描述，卻透過「浪花點點濕羅巾」，牽引讀者許多想像，性感魅力不言可喻。作者既言「欲採未採立水濱，欲採須採莫逡巡」，又謂「勸君採蓮莫採蘋……休使鶯飛過別津」，殷殷勸人要及時把握愛情，切莫猶豫空蹉跎，正所謂「好花堪折直需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首詩自然清新，感情純潔浪漫，真實而委婉地反映了採蓮兒女初開情竇的酸甜心情。與吳歌大多寫農村男女愛情的風格，可說是極為類近的。

## 4. 有仿南朝西曲者，如〈江干曲〉、〈渡頭曲〉、〈懊儂曲〉<sup>62</sup>、〈古意〉（4首）

西曲的特色主題，是常見遊子商婦離情別緒的書寫。施梅樵上述作品，都在形式上近似於歌行體的模擬，除了〈江干曲〉為五言八句較長之外，其餘率皆五言四句的小巧

<sup>59</sup> 〈相逢行〉，《鹿江集》古詩部，頁5。

<sup>60</sup> 〈無題〉，《鹿江集》古詩部，頁11。

<sup>61</sup> 〈采蓮詞〉，《捲濤閣詩草》卷上，頁44。

<sup>62</sup> 〈江干曲〉、〈渡頭曲〉、〈懊儂曲〉，《鹿江集》古詩部，頁10、11。

詩作，且均出之以女子的立場和口吻，描寫了離別或等待的惆悵情懷。

試看〈渡頭曲〉、〈江干曲〉、〈懊農曲〉，宛若傷心三部曲。〈渡頭曲〉寫癡心的女子來到江邊，從破曉等到日落，她所期盼共渡人生的「他」，卻遲遲沒有出現，徒增落寞感嘆。〈江干曲〉以悠悠江水貫穿全詩，那浪蕩的情郎一如流水，來匆匆，去匆匆，江邊總是離別的傷心地。〈懊農曲〉傳達了看破、了悟後的憤怨，年少純稚的愛戀，長大後變異，想到那已經異心的情郎，怎麼能不令人又懊悔、又怨恨呢？施梅樵以寫實的筆觸，自訴離情，毫無扭捏作態，心思透明動人。

〈古意〉有二題<sup>63</sup>。一則見諸《捲濤閣詩草》，寫自比作「斷腸花」的女子怨嘆情郎是「無根草」，兩難相依，無法長保。以簡單而對立的比喻，凸顯了女子絕望的心情。另一則見諸《鹿江集》，女子雖明知情郎是「江上萍」，卻仍然日日「密密行書」、望穿「悠悠」長路，忍受著「隔歲不相見」的磨人相思之苦，仍自比作「澗中石」般堅定不移地等待，甚至期盼「且種合歡花」的美麗結局。真是個又純又傻的癡情女。綿綿的思念，堅貞的愛情，以連連比喻，表現得如此流暢自然，曲折深刻而動人，實在深得西曲的風神。

### （三）幻遊仙鄉

《梅樵詩集》中有〈小遊仙〉五組詩歌<sup>64</sup>，每組 4 首絕句，共計連作 20 首詩；又另有題名為〈夢遊仙〉<sup>65</sup>的一組詩作，為 2 首絕句。這是詩人唯二的遊仙詩作，前者尤為其詩集中僅見的大規模組詩，相當特殊。「遊仙詩」原是體現道教精神的一種文學體式，歷史上有修道人以之為求道之途者，也有文人為寄託牢騷者，衍至後世，不乏鋪陳狎遊人間的男女情事，甚至是私暱的性愛暗示。

施梅樵對於佛、道宗教的態度是敬而遠之，他說：「覓盡寰區無淨土，不期世外有禪林」、「老至方知事事非，佛門何必誓皈依」<sup>66</sup>，可見求佛、求仙都不是詩人的生活志趣。又，身處家國淪沒的時代，施梅樵對民族長期懷抱著深沈的憂患，這是他在詩歌創作中

<sup>63</sup> 〈古意〉，《捲濤閣詩草》卷下，頁 14(1 首)；又，《鹿江集》古詩部，頁 11。

<sup>64</sup> 〈小遊仙〉，《捲濤閣詩草》卷下，頁 134-135。

<sup>65</sup> 〈夢遊仙〉，《捲濤閣詩草》卷下，頁 144。

<sup>66</sup> 見〈圓光寺僧妙果招隱賦此示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11。

的最重要主題之一，也是其為詩壇敬重的重要特質<sup>67</sup>。以之綜合反觀其〈小遊仙〉、〈夢遊仙〉之作，則其立意顯然不在道心的尋訪，而可能是文人藉遊仙以側寫浪漫，寄託別意了。

前朝士子施梅樵在難堪的世局中為時俗所迫的許多壓抑，藉著幻遊仙境求得一部份精神的紓解和理想的寄託，則其尋向旗亭歡場，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便曾說「歌舞場中藉遣愁，周郎顧曲自風流」、「泥醉花前興致豪，劫餘未減舊風騷」<sup>68</sup>。即使是苦中作樂，也是個自我解放的所在。

在施梅樵〈小遊仙〉中，讀者看到了珠樓金闕，晶簾玉窗，美酒佳餚，射覆藏鈎<sup>69</sup>，雅靜的白雲洞，熱鬧的歌舞場，還有「屐痕花下印雙雙」、「正是變成惜別時」。若說仙境在人間，則詩歌中諸如此類的場景，都反映了人間風月場的樣貌。學者余美玲便指出：「這裡的『遊仙』，不是道教縹緲的仙鄉，而是人間狹邪的風月場所，這也是作者在現實世界不得意後的苦中作樂的自我解脫之所<sup>70</sup>。」施梅樵遊戲旗亭，樂於冶遊，銷魂窟不啻人間仙境一般，梅樵的遊仙詩，既含蓄又露骨地反映了他浪遊狹邪的風月經驗。

在〈小遊仙〉的意象經營上，施梅樵組合了大量的道教元素，如故事、人物、建築、思想、術語等事物，型塑了濃濃的仙道氛圍，也提供了隱晦內容的浪漫掩飾。特別是詩人遊訪的仙女們，個個風格殊異，包括有工於彈唱的許飛瓊<sup>71</sup>、泥寫新詞的小憐<sup>72</sup>、奔月訴懷的嫦娥，還有奉壺雲英、披髮麻姑<sup>73</sup>，以及青盧小玉<sup>74</sup>等。詩人的樂遊，其實間接反

<sup>67</sup> 參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5年碩士論文。

<sup>68</sup> 〈北遊將歸若川永南強留桃園三宿〉，分見《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11、3。

<sup>69</sup> 射覆，是猜物遊戲，乃用碗盆覆蓋著要猜之物，使人以占卦等術數去猜出來。

藏鈎，晉代周處《風土記》記載：「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人奇則奇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藏為一部……藏在上曹即下曹射之，在下曹即上曹射之。」後每月的十九日，古稱「下九」，是屬於婦女的節日。屆時婦女們置酒暢飲，並常為藏鈎諸戲，有至通宵達旦者。

<sup>70</sup> 見余美玲〈鹿港詩人施梅樵詩歌探析〉，《國文學誌》8期頁273-297，2004年6月。

<sup>71</sup> 飛瓊，事見《漢武帝內傳》：「王母乃命諸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sup>72</sup> 小憐，指北齊後主寵妃馮小憐。參《北史·後妃列傳下·齊後主馮淑妃》。李商隱〈北齊〉詩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sup>73</sup> 葛洪《神仙傳·麻姑傳》載：「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

<sup>74</sup> 見白居易〈長恨歌〉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

映了他對女性的欣賞。

雖然施梅樵坦承「徵逐歡場亦寡歡」<sup>75</sup>，美人醇酒其實並不能真正使人消憂解恨，然而遊仙詩的寫作，也是施梅樵的精神出口之一。詩人移情於想像的天地，宴樂於蓬萊，敞徉於月宮，建構仙境的遼闊美麗，周遊於才情兼富的仙家兒女。當家國變色，世道崩亂，詩人藉遊仙寄託理想，而詩人忘情於風月，尋求暫時解脫，紅塵經驗藉遊仙寫作而昇華美化，自其中慰藉了對自在遨翔，富足溫柔生活的渴望。可以既含蓄又奔放地，抒發被壓抑的自我身心情志，圓滿其生命本質。

## 四、書寫角度與情感意涵分析

吟風弄月的文人有單純飲酒尋歡、應酬往來者，也有借酒澆愁、寄託紅粉者。以文字書之，或能明筆白描坦言，或借暗筆委婉暗示，巧妙各異，以期彰顯情感的轉折幽微。觀施梅樵諸作，可從二方面說之：

### （一）記錄自我經驗，放懷醇酒與美人，尋求遁世慰藉

人間何處無風月，溫柔鄉中最堪憐。作為一位詩書雙絕的藝術家，施梅樵有一份天生的浪漫瀟灑。迷人的旗亭酒場可以自在放浪，可以遂興豪邁，他在〈席上玉霞校書索詩率成絕句〉寫得直率，詩云：

當筵不唱懊儂詞，飲殷勤進酒卮。動得座中齊拍手，競舒醒眼看花枝。強醉拼教翠袖扶，漫云咳唾便成珠。談諧曼倩無拘束，行樂還應讓老夫。（二首之一<sup>76</sup>）

這是一幅酒場尋歡圖的寫照。眾人歡唱拼醉，同座齊舞，施梅樵忘我地解放，毫無拘束地行樂，就著酒意，還戲言比名家東方朔還更談諧！情感得到宣洩，形骸解除拘束，生活中縱然有再多的鬱結，在醇酒美人，歌聲舞影中，相信必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詩

---

變成……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sup>75</sup> 〈江山樓席上感賦示諸賢〉，《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4。

<sup>76</sup> 〈席上玉霞校書索詩率成絕句〉，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40。

人曾不止一次地津津樂道：

文讌春宵肆綺筵，我來抗手會群仙。蓬萊亦有談諧客，笑向洪厓一拍肩。（〈回春院席上即事〉 77）

本無俗氣身偏健，尚有豪情眼未花。……美人醇酒堪娛老，泥醉渾忘日影斜。（〈寄示近樗〉 78）

塵世何從覓酒泉，飛瓊小玉奏鈞天。逢場作戲君休笑，買盡風光不費錢。（〈即事〉 79）

年輕時風流尋歡，老來寄情娛心。特別是詩人長年奔走各地，放懷於風月溫柔之鄉，使得寂寞客途得以因此消遣解愁。

炎熱場中羞涉足，繁華隊裡忍回頭。談諧我愛東方朔，客夜無聊借遣愁。（〈北投新蒼芳賦似菽廬教堂〉 80）

泥飲還同上酒樓，天涯孤客轉增愁。……差喜好花供醉眼，未聞新曲出歌喉。（〈席上即事〉 81）

每憶故人頻入夢，偏逢佳會又登樓。苦吟轉惹群花笑，暢飲能消逆旅愁。（〈桃源閣吟宴賦質諸賢〉 82）

詩壇導師施梅樵，在授課教詩、字斟句酌的師尊生涯之外，風月場的魅力，或許是一種轉換角色，平衡壓力的方法。

施梅樵曾詩云：「泥醉花前興致豪，劫餘未減舊風騷」<sup>83</sup>，他的常在花叢，除了是慰藉遣懷之外，恐怕還有著遁世的用意。曾經諸賢吟讌時，施梅樵笑著說：「只應醉臥群花

<sup>77</sup> 〈回春院席上即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29。

<sup>78</sup> 〈寄示近樗〉，《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13。

<sup>79</sup> 〈即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10。

<sup>80</sup> 〈北投新蒼芳賦似菽廬教堂〉，《鹿江集》七言律詩部，頁 40。

<sup>81</sup> 〈席上即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57。

<sup>82</sup> 〈桃源閣吟宴賦質諸賢〉，《鹿江集》七言律詩部，頁 39。

<sup>83</sup> 〈北遊將歸若川永南強留桃園三宿〉，見《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 3。

畔，雪地霜天藉避寒！」話中有著言外之意，那「雪地霜天」應該隱喻著異族殖民的高壓專制，日治時期傳統文人遭受到無比冷酷的時局，則或許尚能談詩論曲的風月場中，猶能感受到些許的安頓與溫暖吧！

美人與醇酒，是最好的麻醉劑。試觀其作品，歸納他對風月女子的欣賞角度，主要有三方面：

### (1) 執觴侍奉的體貼殷勤

施梅樵詩中寫回憶者，常見對吟宴歡會的追想。而吟宴時佳人的執觴侍奉，體貼殷勤，讓詩人最是念念不忘。如：「記曾春日陪吟讌，累汝爭杯替飲醇」、「殷勤治酒贈銀絲，多卿情更深於海」、「康成猶有吟詩婢，雞黍殷勤餉老夫」、「當筵不唱懊儂詞，勸飲殷勤進酒卮」、「磨墨雖勞總不辭」、「走馬章臺幾度陪」<sup>84</sup>等。不論是飲酒、勸食、磨墨、訪陪，溫順而細心的奉待，都讓詩人深懷眷戀。

### (2) 可憐動人的形影神態

美麗的容貌，很容易讓人產生深刻的第一印象，歡場女子尤其必須精心打扮。如：「一幅丹青面目新，南都粉黛畫中人」、「幾樹薔薇半作花，可憐濃豔勝朝霞」、「靚面驚疑畫裡人，臉邊猶印筆紋新」<sup>85</sup>，以比擬的手法，寫對美人容貌的驚豔。而〈記得〉之二描寫了女子：「爛漫天真自可人，淡粧分外見丰神。雲鬟偏喜趨時樣，剪斷烏絲百萬緡」<sup>86</sup>，清新時髦，嬌羞天真，形象尤顯立體，這般少女的可愛，也是為施梅樵所欣賞。

### (3) 熱情出眾的詩藝才華

讚嘆妓女們琴棋書畫等的才藝，這是詩人經常書寫的重點。如：「高雅能吟七字詩，樓頭笑比拾釵時。」(〈散悶〉)、「幾回拇戰<sup>87</sup>奏奇功，如此裙釵亦足雄。」(〈記得〉之三)。又如他讚美雙鯉校書「彈箏亦性靈」；讚嘆白玉杏校書「素淡衣裳自入時、既工絃索又工詩」；尤其賞識劍英女史，寄詩云：「詠絮應推筆一枝，甲元瀆面待何時。每從吟侶傳詩稿，轉憶旗亭負酒卮」；也曾對寶桂校書說：「老夫具有憐才意，非未尋春逐隊來」<sup>88</sup>。

<sup>84</sup> 依序錄自〈散悶〉之二、〈吟贈川貝校書〉、〈重過萃園感舊有作〉、〈席上玉霞校書索詩率成絕句〉、〈散悶〉之二、〈同訪瓊瓊疊前韻〉，分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5、11、40。

<sup>85</sup> 依序錄自〈有贈〉(一)、(六)、〈散悶〉(二)，分見，《鹿江集》七言絕句部，頁13、15。

<sup>86</sup> 見〈記得〉，《鹿江集》七絕部，頁20。

<sup>87</sup> 拇戰，即揶揄、猜拳。明代王徵福有《拇戰譜》，專記揶揄令辭。

<sup>88</sup> 依序錄自〈雙鯉校書索詩率成贈之〉、〈席上聽白玉杏校書唱古涼州曲，校書向余索詩，賦此贈之〉、

雖然風月女子的社會地位不高，但別具才藝的女性，特別是能詩善吟的女校書，在傳統文人眼中，依然十分看重。女校書們的才或情吸引了詩人的注目，而在作品中給予了較多的描述。施梅樵作品中有明顯的重才輕貌的傾向，這和傳統漢文化社會中偏好吟詩作對的多情才女是完全一致的，和當時詩壇一股偏好具有漢民族色彩的風氣<sup>89</sup>，也是同流的。

## （二）揣摩女性心境，書寫感情與身世，並託情以喻己

傳統文人在失意之餘常有歸隱山林者，而醉心風月者亦復不少。臺灣在歷經乙未割臺的巨變之後，文人仕途夢斷，丹心無托，高飛如施士浩者有之，隱逸如洪棄生者有之，而放浪如林朝崧者<sup>90</sup>亦有之，凡此都是顯著的例子。而日治時期詩人聚會常有紅裙侑酒，施梅樵設帳遊走三臺，樓館亭臺的千般體貼，他並不陌生，藝旦妓女的萬種風情，他也必然觀察體會甚深。

中國古典詩中，如閨怨詩、懷春詩等，文人常見假設女性角色，揣摩其心境口吻，而其實寫女子即是寫自己的身世情懷，此乃傳統詩的重要特色之一。臺灣文人的古典文學寫作中，承襲前人，也有相同的手法。

施梅樵詩中即有不少藉由思婦、神女之口所寫的抒情之作，有酸甜愛戀如〈狡童三章〉、〈采蓮詞〉、〈六憶詩〉，有相思離情如〈古意〉、〈江干曲〉、〈無題〉，有感傷身世如〈懊惱詞〉、〈相逢行〉，有自怨自艾如〈渡頭曲〉、〈懊農曲〉等。女性特有的纖細心思，在感情的領域中，特別敏感脆弱，委屈婉轉。詩人亦是多情人，揣摩女性的心境和口吻，傳達幽微的情感，分外含蓄微妙。

〈狡童三章〉、〈采蓮詞〉、雖明顯是仿古之作，若是搭配〈有贈〉：「莫把閒情問神女，朝雲暮雨負巫陽」、「客中藉汝遣愁懷，剔火煎茶拔玉釵」，〈相看〉：「鏡中窺幻影，襟上

〈寄質劍英女史〉、〈席上次韻示寶桂女史〉，分見《捲濤閣詩草》卷上頁 8、38、58、67。

<sup>89</sup> 參呂明純〈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日據時期台灣藝旦的文化傾向及其影響〉：「日據五十年間，台灣的風月場所基本上是沿著兩條軸線發展。而漢人軸線的藝旦，強調的是精通南北管和長於詩文唱和等漢文化傾向。由於消費客群多為傳統仕人、舊式知識份子和封建地主，藝旦間這個『秦樓楚館』，似乎格外具有一種國破山河在的暗喻，故而被提升為故國想像的漢家符碼，呈現一種前朝才女的風雅情調。」網址：<http://www.srcs.nctu.edu.tw/cssc/essays/10-2.pdf>

<sup>90</sup> 施梅樵有〈輓林癡仙〉詩十首之七云：「春風客路數相逢，攜妓提壺喜過從。孤樹何堪雙斧伐，不圖中歲興尤濃。」見《捲濤閣詩草》卷下頁 37。

露啼痕」<sup>91</sup>等一同并觀，未嘗不令人聯想：上例諸作乃詩人粉色經驗的隱筆側寫？以〈相看〉為例，詩中寫女子貼心服事，親密相伴的甜蜜與感激。這位紅粉知己或者是其結髮夫人，卻也極可能不是。而相看不厭，盡在不言中的情意，卻濃厚的瀰漫在字裡行間。感情的悸動沒有年齡的分別。〈相看〉以第一人稱的賦體筆法直述，剪去了激情，在穩重中道出略顯壓抑的熟齡情感。但這一份隱藏的激情，施梅樵轉借了女性的立場，揣摩其角色心境，道出幽微情愫。藉由〈狡童三章〉、〈采蓮詞（一）〉，以既羞澀又嬌嗔的女性意象，反映了一種單純的動心，吐露出年少之愛的俏皮可愛；又以〈六憶詩〉中，對戀人的一幕幕回憶思念，反映著禮教下的傾心愛戀，理性而熾熱。詩人在角色互換中分別抒情，讓情愛得到了相映互補的發舒，顯出了跨越年齡與性別的雋永與迷人。

〈古意〉、〈無題〉以組詩型態寫癡情女子的堅心守候。雖然散發著「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sup>92</sup>的輕怨，然而年久月深，心終不易；為情消瘦，願入君懷，又如何不讓人心疼？如此的一往情深，與施梅樵一生對漢學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同樣地堅定不移。在「擇善固執」的意志上，男子與女子無異。而以女子之口說出，堅毅中似乎更多了一份韌性。

〈江干曲〉寫相聚無多，江水悠悠的離情，豈不恰似施梅樵奔走於三臺絳帳詞壇之間，風塵僕僕，或為生計，或為人情，而不得不可行。他寫給妻子的詩中提到：「作客經旬久，高樓此夜長」<sup>93</sup>，詩人登臨望遠，相思盡付夜風中。〈江干曲〉將角色易位，以閨中婦的立場，反向訴說了對離情的委屈心境，分外動人心弦。

煙花女子的身世多有曲折，經常惹人堪憐。〈渡頭曲〉、〈懊農曲〉裡空等待的怨嘆，惋惜著傾心非人的青春浪費。〈懊惱詞〉、〈相逢行〉裡感嘆妾命賤薄，昔日濃情，一朝變化，如秋風之捐團扇，任人棄置，終究孤鸞獨影，好不歎噓！施梅樵對風月女子的身世頗寄予同情關心，例如：「怨耦何妨去下堂」<sup>94</sup>的不反對離婚，「莫教誤嫁瞿唐賈」、「莫嫁長安遊俠兒」<sup>95</sup>的慎選所託。反觀施梅樵的身世經歷，又何嘗不值得感慨？早年遭變，

<sup>91</sup> 〈有贈〉，《捲濤閣詩草》卷上頁16。〈相看〉，《鹿江集》五言律詩部，頁6。

<sup>92</sup> 見湯顯祖《牡丹亭·驚夢》之〈皂羅袍〉。

<sup>93</sup> 〈寄內〉，《捲濤閣詩草》卷上，頁14。

<sup>94</sup> 見〈琴仙校書索書偶賦三絕〉，《捲濤閣詩草》卷上，頁9。

<sup>95</sup> 分見〈席上聽白玉杏校書唱古涼州曲，校書向余索詩賦此贈之〉、〈寄質劍英女史〉，《捲濤閣詩草》卷上，頁38、58。



富家子成落難兒，新秀才忽斷登雲路；晚歲喪子，孤淒老人奔波衣食，戰亂阻道更添愁城<sup>96</sup>。如此境遇，怎不令人浩嘆？雖然可能男兒不輕易訴苦，若託口於女子，一吐胸中積鬱，又何嘗不可稍作平衡？所謂藉他人故事，澆心中塊壘，憐人亦以自憐啊！

施梅樵遭遇時不我與的割臺之變，滿腹漢學不合政治時宜，有懷才不遇的落寞。隨著新式教育與白話文的逐步普及昌盛，漢學及漢文人，難以抵抗潮流地逐漸被邊緣化<sup>97</sup>，風月場中的女子，同樣是社會中的弱勢族群，在同理心中，特別能夠引起文人的認同。文人對他們的愛戀憐惜，無非也可視為自戀自憐的投射。詩歌中的風月書寫，既是回味花月良宵的美好，也兼具了自我療癒的撫慰效果。

## 五、結論

施梅樵身在詩壇以鶯燕相伴為風尚的時代裡，其相關於女性議題的詩歌，大約如本文上述所舉例之諸多作品。在目前《捲濤閣詩草》、《鹿江集》兩本詩集合計共 880 題的詩歌數量中，以不精確粗估，大約佔 5% 左右。這樣的比例不算高。但在其大多數以詩友為對象的酬贈寫作中，女性對象的書寫，仍然引人關注。經由上述的耙梳整理，則施梅樵的風月書寫可歸納如以下三項特點：

一、風月溫柔兼具有社交應酬與心靈慰藉的雙重功能，這也是詩人現實生活的一個片段反映。施梅樵在詩歌中頻頻提及「客中遣愁」，詩人在奔赴詩教道路的同時，對長期的漂泊於旅途，有著深沈的寂寞無奈。風月溫柔恰為客途遊子提供了溫暖與體貼。

二、風月女子為施梅樵風月書寫的主要對象，也似乎是其心靈生活的重要寄託之一。而以漢文化為彼此間共同交集的關係中，具有詩樂才藝的殷勤女子，格外受到詩人的賞識。

三、風月心情提供了施梅樵詩歌文學創作的靈感與推敲。詩人或是以正面懷贈，寫

<sup>96</sup> 施梅樵生平請參見施讓甫〈施公梅樵家傳〉，1957年2月17日題記，見《鹿江集》頁2。又林文龍〈鹿港詩人施梅樵資料雜錄〉，《臺灣風物》26卷4期，1976年12月。

<sup>97</sup> 依據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51研究統計指出：含有科舉功名、僅通四書五經等舊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在1910年代，佔社會的48.3%，約近半數；到了1930年降至23.9%；至1940年，僅僅剩下4.1%。只具有傳統漢學背景的知識份子，迅速地被師範、醫學校出身的新式教育青年，和歸國的留學菁英所取代。

場面，說關心；或是寄託民歌自然風韻，側寫喜怒哀樂；更甚至以遊仙幻境，曲筆影射朦朧閨情。不同的題材中，選擇不同的性別和角度，採取不同的詩歌形式，靈活婉轉地描畫虛虛實實的風月情景與經驗。以舊有的文學體式，描寫個人經驗，並寓託心志。

施梅樵以詩名騰芳三臺，有若柳屯田的「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施梅樵出入旗亭宴樓，校書爭求豔詞，好比柳七流連煙花柳巷，歌妓們「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施梅樵遭遇割臺，青雲之路乍斷，一如柳三變的淺斟低唱，「奉旨填詞」；柳永《樂章集》中多見羈旅窮愁之詞，施梅樵詩集中時出旅懷惆悵之聲。就這些方面類比來看，二人頗有相近之處，筆者因此認為：施梅樵或可謂為「臺灣柳永」。觀察詩人以女性為主題的風月書寫，施梅樵可說是：任重道遠傳詩教，溫柔香膩寄客心啊！

（本文參考書目已詳見附註，恕不贅列。）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165-198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165-198

# 從左拉「實驗小說論」觀點探討 戰後臺灣自然主義小說<sup>1</sup>

唐毓麗\*

A study of Zola's 「Le Roman  
Experimental」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Taiwan post war Naturalist novels

by  
Tang Yu-Li

關鍵詞：自然主義、自然主義小說、左拉、實驗小說論、戲劇中的自然主義

**Keywords:** Naturalism, Naturalist novels, Emile Zola, “Le Roman Experimental”, “Le Roman  
ciers naturalistes”

---

<sup>1</sup> 本論文 2007 年 11 月 2 日發表於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舉辦「臺灣文學與電影」研討會，原題〈台灣戰後自然主義小說研究〉，今略作更改，並刪削及修改了部分內容。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提要〕

左拉的自然主義小說(Naturalist novel)與「實驗小說理論」(Le Roman Experimental)，在十九世紀中末期曾造成風起雲湧的影響，他個人更成為自然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本文深入探索左拉的自然主義宣言——〈實驗小說論〉與〈戲劇中的自然主義〉中「實驗小說」的思想，觀察他的小說創作，發現自然主義的核心思想在於：一、認為自然科學的規律適用於人類社會，並從病理與生理學解釋人的思想與行為；二、利用客觀的寫實主義，以解剖為基礎、分析為工具進行小說創作；三、強調環境與遺傳的決定性。本文依此標準探討幾篇臺灣小說，發現宋澤萊、王禎和、東年與陳映真的幾篇作品，呈現出非常濃厚的自然主義思想；不但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人類行為，更展現本能欲望、遺傳或環境因素操控人類命運的範式或模型，推導出決定論的解釋，小說呈現出近似人類報告的研究成果。本文更進一步比較這些小說與左拉作品的近似性，闡述臺灣小說如何具體呈現自然主義強調的科學觀點與形式，深入探討小說敘事的特殊手法，如何揚棄無技巧性的單調缺點，轉以生動又不失真實的視角揭露生活暗流；在刻畫真實、展現真實的策略上，同時達至極高的審美價值與精準度，本文最後總結這些小說的整體價值。

## Abstract

Emile Zola (1840-1902), with his literature theory 「Le Roman Experimental」 and various naturalistic nove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xample of the literary school of naturalism. They highlight that novel should conduct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write human condition in a strict sense.

In the study, at the first part, I hope to show readers the various layers of Emils Zola's intended meaning in “Le Roman Experimental” & “Le Roman ciers naturalistes”, to see how Zola applied scientific techniques and observations in writing. Among his literatural theories, I try to focus on 3 emphases as follows:

- 1 Human's existence can be observed by the scientific laws of natural, such as the

knowledge of “Pathology” and “Physiology”

2. Literature is about observing; therefore, the novelist is experimenting on man through observation.
3. the human spirit can be seen as the sequent of the reaction of on ones'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se three mainpoints of Zola's ideas, at the other part of my study, I would like to illustrate characters of various novels by Song, Ze-Lai (宋澤萊), Wang, Zhen-He (王禎和), Dong, Nian (東年) and Chen, In-Chen (陳映真), to portrate how naturalism rooted in Taiwan literature. In another words, to demonstrate how human morals can be presented by these novels as the way the naturalism thought that phenomena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cientific laws, which is a fudemenatl idea of Naturalism.

Certainly, Taiwan naturalistic novels share the same marks of Zola's works in many ways, such as being seen as fatalists and realisms, since they all deny the human free will and put emphasiz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eredity condition. However, in the study, I would like to take my analysis a further step, not only showing how these Taiwanese writers adapted themselves into naturalistic techniques—the similarities of their writing with Zola's, I also want to demonstrate how naturalism being modified into Taiwan history context, to be accepted as a way to show social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Taiwan by these authors.

At the last part of my study, I would like to review and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 achievement among these Naturalist novels in Taiwan literatural background.

## 一、緒論

自然主義（Naturalism）與寫實主義（Realism）此二詞彙具有多重的意義，不但指稱西方歷史上，十九世紀中期至末期所發生的文學現象、文學思潮與文學主張，更延伸指稱非特定時空下具有特殊表現的文學思潮與創作手法。也因寫實主義此詞彙指涉的內涵十分豐富，學界時常發生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混用的情況，或有評論者特別強調某些特色藉以辨識或區分二者，或對寫實主義常有模糊且印象式的界說與評論，至今為止尚未針對戰後臺灣小說中的自然主義作品，有更完整且系統性的論述。

但本文若只做理論的鋪陳與介紹，實際上並不能證明小說創作也照搬運用這些理念，我們可以做的是從文本解析中，深入探索台灣文學受自然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跡，思考自然主義代表作家左拉（Zola）推崇的「實驗小說」（Le Roman Experimental），是否在戰後台灣小說中找到具體的實踐？觀察作家如何體現並傳播這些思想？要徹底釐清這些問題，必須從小說中著手，才能解答這些疑惑。本文著眼於此，深入探討台灣自然主義小說的特色，並進一步比較它們與左拉自然主義理論及作品的相關性，探討小說如何具體呈現左拉強調的科學觀點與形式，最後總結這些小說的整體價值。

## 二、左拉的「實驗小說論」與自然主義小說

自然主義教主左拉創作的自然主義小說與實驗小說理論，在十九世紀中末期造成風起雲湧的思潮與文學熱潮，顯然與十九世紀特殊的世界氛圍息息相關。十九世紀時，科學技術已得到全面的進展，細胞學說、能量轉化學說與進化論已成知識的權威，自然讓自然科學奠定了重要的地位；此後，科學研究不但越來越自由，還促使人們思想上產生重大變革，人們開始以理性的經驗解決宇宙與實際人生的問題，此時，科學家的研究方法被宣揚成救世解藥，更成為普世認可的知識，從各個面向看來，都明白地宣告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科學至上時代已經來臨。

當時，包括左拉在內的十九世紀作家，巴爾札克（Balzac）、司湯達（Stendhal）、福樓拜（Flaubert），無不接受了科學思想的洗禮，他們的作品不約而同顯露了客觀寫實的一

面，而這樣的文學現象，皆與整個時代氛圍息息相關。左拉意識到科學的影響竟是如此巨大，接受孔德(Comte 1798-1857)的實證主義哲學、泰納(Taine)的《藝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t)、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貝爾納(Bernard)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La Medecine Experimentale)的思想，認定只有從觀察與經驗得到的知識，才是可信的知識，更決定以實證哲學為基礎，把這種理性思考的方式進一步推到極端，建構一套自然主義的文學主張。他撰述〈實驗小說論〉(1880)與〈戲劇中的自然主義〉(Le Roman ciers naturalistes)(1881)二篇文章，是最能代表他的自然主義思想的著作，也是闡述實驗小說科學理論最重要的論文。

左拉提出自然主義文學的目標，就是希望把科學研究的方法實際運用在文學創作上。他在〈戲劇中的自然主義〉一文詳盡地說明創作的手法：「自然主義就是回到自然，就是當學者們一旦發覺應當從研究物體和現象出發，以實驗為基礎，以分析為手段的時候所創立的方法。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同樣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觀察、精確的解剖以及對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寫。」<sup>2</sup>從此段內容可發現，左拉特別強調作家從事創作時，應像研究室人員一樣，把握觀察、實驗的方法，以充分展現「對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寫」，呈現出人們受物質環境影響下的生活真相。左拉對創作手法的關注，除了以自己的創作直接印證理論之外，更以文評家的身分，分析其他作家的創作手法，進一步奠定與擴充自然主義的理論版圖。

在兩篇文章中，我們看見左拉奠定自然主義作品譜系的企圖，顯然並不認為只有自己的作品才算是自然主義文學。他從巴爾扎克、司湯達與福樓拜的作品中，追索自然主義文學的特徵，更藉由論述，進一步建立了自然主義小說的公式。他認為自然主義隨著巴爾扎克的著作，獲得了全面的勝利，此時，浪漫主義風潮已衰，自然主義文學不但變得更為強大，更成為引領時代的主導思潮。巴爾扎克從人的氣質與環境研究人類，自詡為社會科學博士；在匯聚九十多部小說的巨作《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裡，充分顯現他對唯物論的信服，認為人是物質環境下的俘虜，特意從「風俗研究」、「哲理研究」與「分析研究」的角度來觀察法國、研究法國，探索在金錢與物慾的追逐下，人性的溫情逐漸崩解的過程，提出一篇篇犀利的社會調查報告<sup>3</sup>；此作也贏得恩格斯(Engels)

<sup>2</sup>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1986)：〈戲劇中的自然主義〉，《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191。

<sup>3</sup> 請參巴爾扎克(Balzac)(1998)：〈《人間喜劇》前言〉，《巴爾扎克精選集》。丁世中譯。濟南：山東

由衷的推崇，認為《人間喜劇》「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sup>4</sup>」此外，左拉也推崇司湯達爾（Stendhal）的作品，認為能如實地表現出心理學家的深度，但左拉把最高的禮讚留給了福樓拜，認為他為自然主義帶來真正強盛的力量，賜與小說更完美的文體，從此奠定了自然主義作家努力的目標<sup>5</sup>。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寫實主義在法國達到輝煌的成果，在人性論與宇宙論上，不約而同顯露了科學至上、貶抑人性的看法。這些作家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藉著小說執行人類研究或調查工程，不再依賴想像來杜撰故事，而是藉由觀察分析的步驟來探索人類，作品充分地展現獨創力與文體科學性；更重要的是，他們重新賦與小說再生「真實」的力量。在巴爾扎克、福樓拜與左拉筆下，巴黎成為匯集資本主義慾望與罪惡的城市，看似行屍走肉的法國市民，早已被城市的屬性決定了他們日後的命運；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就像閱讀完整的資本主義體制之社會學報告，小說顯示出非常強烈的寫實性。左拉在巴爾扎克的基礎上，以前所未有的關注力，以摹仿細節與再現巴黎的敘事，完成並奠定了十九世紀寫實與寫時（十九世紀的即時新聞）文學的書寫範式；他依循恆常不變的自然定律，全面描述人類的生活與歷史，從而顯現人類意志的脆弱與渺小，成就斐然。

我們統整左拉在〈實驗小說論〉所建構的自然主義思想，其核心不外乎於：一、認為自然科學的規律適用於人類社會，並從病理與生理學解釋人的思想與行為；二、利用客觀的寫實主義，以解剖為基礎、分析為工具進行創作；三、強調環境與遺傳的決定性。而左拉一心標舉的實驗小說，便是把化學研究、生理學研究的成果，運用到人類學與社會學上，從而引導人們認識人類的情感與精神現象，最終，他的理想就是在文學的觀察與實驗之上，建立一門實驗科學。

而這樣的文學傾向正如廚川白村所述，太過強調文學與科學間的緊密關係，甚至得出文藝乘以科學等於小說的結論<sup>6</sup>。左拉胸懷大志地建立了自然主義理論，但對照他的小說，卻發現就連他自己也無法全盤按照〈實驗小說論〉的構想，完成所有小說的創作，這的確是理論與實際作品間難以面面俱到的裂隙。但我們仍能發現，他的小說竭力描述

---

文藝出版社。pp.18-19。

<sup>4</sup> 恩格斯（1978）：〈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上海：人民社會出版社。pp.462。

<sup>5</sup>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1986）：〈戲劇中的自然主義〉，《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197。

<sup>6</sup> 廚川白村（1987）：《西洋近代文藝思潮》。陳小南譯。台北：志文出版社。pp.196。



各類階級的人物，不論是官僚、貴族、妓女、記者、劇院老闆、商人、銀行家、演員或農民，大都描述他們臣服在自然法則的定律下，無法擁有自我意志的一面。《盧貢—馬卡爾家族》(Les Rougon-Macquart) (1871-1893) 囊括二十卷小說，不但是左拉二十多年心血的結晶，也是十九世紀法國文學的重量級著作，更是闡述自然主義科學思想最佳的代表小說。

《盧貢家族》(Les Rougon) 做為系列小說的序曲，描述嫁入盧貢家族的精神病女子與墮落酒鬼馬卡爾，成為二十卷小說百餘人物的血親之源，小說藉由這兩大家族的興衰歷史，展現遺傳蘊含疾病之外更難以想像的神奇力量。盧貢—馬卡爾家族子孫遍佈社會各種階層，有的攀升為主教或上流社會的總理大臣，有的擅於官商勾結成為富商，有的成為畫家，有的成為巴黎名伶，有的淪落為農人、工人或妓女，各自過著不同的人生。但神奇的無形鎖鏈，讓遺傳基因在每個人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每個人都遺傳了親屬身上的劣根性；這二十卷小說，以遺傳基因串聯並發展了命運同構的平行結構，藉以推導人類如果不被滅絕，盧貢—馬卡爾家族所遺傳的惡根性，就不可能被消滅的結論<sup>7</sup>。小說以巨大的體制與完整的機械論思想描述十九世紀的巴黎社會，完成一部驚世駭俗的世紀奇書。

我們從左拉的作品判定，小說的思想早臣服在穩固的唯物主義之下。達爾文假定進化純屬於機械性的作用，讓演化此舊觀念透過天擇的新觀念，成為時代認可的物理學<sup>8</sup>。舉《小酒店》(L'Assommoir) (1877) 為例，女主角蓋凡司是馬卡爾家族的後裔，是安東尼馬卡爾與浪蕩妻子的結晶。她十四歲懷孕後離家，卻遭男人遺棄。後來她嫁給一個銅匠，把辛苦得來的工錢全奉獻給酒店讓生活更趨貧困，小說著力刻畫的是下層階級最殘酷的現實生活。而《娜娜》(Nana) (1880) 剛好承接《小酒店》的後續內容，描述蓋凡司的女兒娜娜在貧困的家庭中誕生，十幾歲時就成為街頭應召女，只能流落到幾個下流男子的手裡，後來劇場老板把她捧成男人垂青的巴黎女神；受環境牽累，她沉迷於虛華，過著淫亂奢華負債累累的生活，最後因照顧幼子而感染天花，死時十分淒清，突顯物慾世界原是一場虛華幻夢。這兩部小說與其他小說一樣，具體而微地顯現人類生理與心理的墮落本性，而這墮落的行徑，顯然是資本主義與瘋病酗酒家庭交相影響的必然結果。

<sup>7</sup> 茅盾 (2004)：《西洋文學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pp.113。

<sup>8</sup> 巴森 (Barzun) (2005)：《從黎明到衰頹》(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鄭明萱譯。台北：貓頭鷹出版。pp.972。

當左拉不再向浪漫主義的文壇前輩看齊，決心要摒除暗示或隱喻的方式，利用瑣碎冗長的細節書寫呈現人類的生活狀態、描繪人際網絡，塑造無與倫比的真實感時，此時，法國的街景、酒館、劇院、賭馬場與妓院所代表的空間意涵，都不再是空泛的名詞，更不是聊備一格的背景，而是主宰人們命運最真實的存在物件，幾乎等於環境、社會、時代或是命運的同義詞了。而那些空有軀殼在城市中行走、行動的人們，僅是宇宙定律之環境決定論（determinism）、遺傳決定論及強大衝突與壓力合力擠壓下的犧牲品。

我們進一步探討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中提及的理論法則，是否具體地實踐在他的小說創作上。顯然，在《娜娜》或是《小酒店》兩篇小說中，我們發現實驗小說的敘事法則，幾乎透過完整的實驗方式，以「上流貴族社會所處的環境和條件」與「現代社會工人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來安排人物的行動。我們追索人物死亡或墮落的前因後果，可以獲致「受原欲、環境與遺傳支配下的人，決難獲得好的下場」、或是得到「華奢縱慾的女人最後必定不幸」、「揮霍犯罪的工人最後必定不幸」的定論。而這定論式結局的推導，從控制項到操作項無一不吻合十九世紀最核心的思想<sup>9</sup>。

換言之，自然主義小說的結論，必須完全符合實驗小說「決定論」的預設，這也顯示這些小說的思想早已服膺「無論有生命物體還是無生命物體，在自然現象的存在條件下，都具有一種絕對的決定論。所謂決定論即決定現象出現與否的近因。<sup>10</sup>」當近因出現時，也就意味著存在或現象表現的物理和物質條件，對人們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在《娜娜》裡，左拉塑造娜娜時，早預設她一連串被宰制的命運，「說她的四五代祖先，都是酒鬼，所以歷代窮困和酗酒的遺傳，感染了她的血統，傳到她的本身，神經上就形成性慾特別強，她是乞丐和流浪者們的最後的產物。<sup>11</sup>」娜娜被當成是吸血的惡魔，她榨取伯爵和其他男人的金錢，成為巴黎所有女人的模仿對象。當時資本主義帶來的糜爛惡習早充斥於法國各個階層，娜娜能以性愛關係動搖整個巴黎的根基，應歸咎於拿破崙三世的

---

<sup>9</sup> 德國唯物主義、法國實證、美國實用及英國功利主義的末流思想都有共同的一致性，就是把人性降低成物性的層次，進而把傳統的精神價值與人性尊嚴，全都化成靜態的實驗室觀察，以科學實驗的成果作為真理的唯一標準。參閱鄔昆如（2005）：《西洋百位哲學家》。臺北：三民出版社。pp.338。

<sup>10</sup>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1986）：〈實驗小說論〉，《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226。

<sup>11</sup> 左拉（2006）：《娜娜》。鍾文譯。台北：桂冠出版社。pp.233。

腐朽與敗德，早已宣判瀕臨崩潰的帝國時期必然遭致滅絕的惡果<sup>12</sup>；娜娜的存在不過是更加突顯出法國貴族、中產階級與下層階級早已隱藏致命的病源，有朝一日勢必招致全面的毀滅。當外在環境的催化加上遺傳因素的強化，最終促成娜娜的淪落與死亡；毫無疑問，像《娜娜》這樣具有社會史意義的作品，以最犀利的角度解剖了資本主義的真實面貌，體現上流社會物欲交易的真相，此時，小說甚至比歷史學家或經濟學家更能展現人類經濟生活的全景視域。

整體說來，這些實驗小說無不具體地從遺傳、生理與環境因素，呈現人們受各項條件支配的面貌，以此闡述人類的歷史。顯然，《娜娜》證明了左拉能把自然主義的科學理論，成功地貫徹到他的創作中。不論透過環境或遺傳決定論體現科學法則，或把世間一切現象視為物質盲動的結果，都造成娜娜或穆法伯爵、伯爵夫人，藉淫亂獲利的記者花車利、為情慾迷失的喬治、飛利浦，甚至是最後自殺身亡的范多夫逃脫不了自然法則的控制，全深陷在欲望享樂中。人們的存在方式完全服膺於機械性法則，就連社會運作的方式也服膺於宇宙自然的法則，人們當然只能成為盲從的動物。基本上，這些小說以具體的方式展現了《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的一貫思想，把自然天擇當成是演化的唯一成因，並透過結局暗示：人們是不具自由意志的動物，不論是蓋凡司或是娜娜，都僅具有生物的本能而沒有主宰生命的強大能力。左拉讓進化論思想蔓延在小說當中，刻意忽視人的創造性與自由意志，僅強調生理主義與物質主義的必然影響，讓人物淪為動物的化身、人型的傀儡。

普遍說來，從〈實驗小說論〉可看出左拉要求小說家，期望他們成為人類及其情感的預審法官，能以觀察者與實驗者的角度對人類進行深入的研究。他把科學的實驗方法所得到的結論應用到人類研究上，他的小說自然產生於不同以往的寫實景致，顯現非常獨特的自然主義世界觀。但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作品雖同樣強調以客觀中立的寫實觀點描述世界，但仔細觀察，兩者秉持不同的世界觀紀錄現實，所以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風貌。

總括來說，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文學都偏以敘事性的文體，總結了人類歷史的真實面向，但在經驗傳遞上卻呈現許多差異：寫實主義的文學常強調反映社會、批評社會與建設社會的積極目的，但自然主義文學作品更專注於體現人類社會不變的自然法則，所

---

<sup>12</sup> 彭小妍 (2006)：〈是娜娜腐蝕了法國社會嗎〉，《娜娜》。左拉著。台北：桂冠出版社。pp.9。

以傾向使用絕對客觀的角度與手法進行創作；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不但是區分寫實主義文學與自然主義文學的重大差異，更是分辨俄國寫實主義與法國寫實主義的重要關鍵：

「俄國的寫實主義理論在於重視藝術真實的基礎上，不遺餘力地強調他的社會功利效果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法國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理論則更注意藝術的真實性和作家創作時的客觀態度，而且竭力要把他們提高到一種幾乎可以通過科學測定的精準程度。

13」可以說，法國寫實主義是寫實主義的繼承與延續，卻走上更徹底、更寫實的主張。

左拉與同時期的其它寫實作家如巴爾扎克、福樓拜，代表法國寫實主義的標誌，無論從歷史地位的聯繫、作家精神譜系或作品特色來看，都難以截然區分三人的差異<sup>14</sup>。但寫實主義文學與自然主義最重要差異在於，自然主義者（如左拉之輩）一直把文學的重點放在向世人揭示「世界是『怎樣』的狀況」，而不把焦點放在「世界『如何』變成這樣的狀況」，也就是說自然主義作家更關注的總是事物的樣貌（how），而非事物的成因（why）。此思想的差異，讓同樣受到科學理性思維洗禮的作家，走上大不相同的道路。

左拉在創作上，除了維持客觀中立的寫實手法，更以特殊的角度觀照人世，把生物學上關於人類的研究報告直接運用到文學上，自此以後，自然主義成爲一種明確可辨識的理論，它的範圍比寫實主義更爲具體，也更爲狹窄，自然主義可說是一種具有明確理論內容與手法的文學運動<sup>15</sup>。簡單說來，自然主義小說接受了科學至上的理論與方法，

---

<sup>13</sup> 羅綱（1993）：《歷史匯流中的抉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p.62。

<sup>14</sup> 三人間較明顯的差別在於，福樓拜雖有不少優異的寫實著作，《包法利夫人》（*Madam Bovary*）被當成是自然主義的代表作，但其他作品常有超越現實的描寫，亦可當成浪漫主義文學來看，自然與左拉一貫的創作路徑有些出入，參閱本間久雄（1972）：《歐洲近代文藝思潮》。台中：普天出版社。pp.124。另外，巴爾扎克已在《人間喜劇》透露了他的思想，他不只是要成爲一名畫師、敘事人、考據家、收集人與記錄員，爲了讓他的藝術得到激賞，他更關心的是，每個作品務必在敘述中探索社會變動的成因、推敲重要事件背後的內在意涵、探求社會背離哪些永恆的法則，如此一來，小說中所描繪出來的社會自然包含了變動的成因，他的創作思想顯然與左拉不同。巴爾扎克（1998）：《〈人間喜劇〉前言》，《巴爾扎克精選集》。丁世中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pp.10。盧卡契（Georg Lukacs）也注意到這個部份，在《作家與批評》（*Writer and Critics* 1955）中提出一針見血的看法：「社會問題在左拉的作品中也未嘗沒有。但是，它們只是作爲事實，作爲事件，作爲發展的『渣滓』而被描寫。左拉的劇院導演不斷地重覆著：別叫什麼劇院，叫『妓院』好了。但是，巴爾扎克卻表現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劇院是怎麼變成了妓院。」<sup>14</sup> Lukacs(1978). *Writer and Critic*. London: Merlin Press. pp.113-4.顯而易見，寫實主義文學與自然主義文學在思想上仍有重大的差異。

<sup>15</sup> Furst, Lilian R. & Skrine, Peter N.(1971). *Naturalism*. London :Methuen.pp.8.

所以闡述環境、遺傳的決定論思想幾乎成爲自然主義小說的重要內容，而客觀觀察則顯示小說表達科學理念時，所需採用的必要形式與方法。

寫實主義文學在中西文學早有悠久的傳統，唯西方社會面臨自然科學的急速發展，直接促成自然主義小說的誕生<sup>16</sup>。自然主義思想曾在十九世紀時，在美學領域取得主流支配的地位，至今，我們討論自然主義一詞雖各有所重，有時把重點放在十九世紀的那段歷史環境與藝術活動上，有時把焦點放在左拉及其追隨者的文學特色上，更多時候，我們關注的是自然主義文學的特徵、態度與人性觀，以及後繼者對科學精神的深入闡揚。而「自然主義」此名詞所指涉的文藝運動、流派或創作手法，此廣泛的歷史性概念漸與「一種新的涵義，及類型學的涵義結合在一起。<sup>17</sup>」我們現在把自然主義文學看成某種歷史類型學，一方面思索十九世紀以來自然主義曾寫下的文學歷史，並思考自然主義在文學發展中留下的印記與歷史意義；此外，我們清楚地辨識自然主義文學特殊的審美作品與藝術形式，以及它把各國各種題材不一的作品串聯起來的核心與獨到之處，絕不只牽涉到客觀與寫實的手法，更觸及到科學規律與法則的呈現。惟有這樣的認知，才能幫助我們面對戰後台灣小說，這些從新時代不斷萌生或滋長的新文學作品，留意到自然主義小說的重要意義，直到現今仍保存獨有的思想。

### 三、「世界就是這樣」：評議台灣自然主義小說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此處所討論的台灣戰後自然主義小說，皆吻合本文對自然主義所下的定義，即小說本身透過客觀的觀察法與敘述手法，展現環境、遺傳決定論之自然律思想。但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這些作者的創作觀雖不大相同，在題材上也各有所重，但一致呈現自然主義對科學理論及環境、遺傳決定論的濃厚興趣。本文認爲東年、王禎

---

<sup>16</sup> Furst, Lilian R. & Skrine, Peter N.(1971).*Naturalism*. London :Methuen.pp.42.

<sup>17</sup> 威勒克 (Wellek, René) (1988)：〈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概念〉，《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pp.130。威勒克看待浪漫主義及其流派，抱持的態度是：「我們必須將它們(指浪漫主義)視爲在歷史進程中的某個特定時期曾在文學領域內取得過支配地位的種種規範體系的名稱。」同前書，pp.126。他認爲「浪漫主義」此名詞所指涉的文藝運動、流派或創作手法，這種廣泛的歷史性概念應該與「一種新的涵義，及類型學的涵義結合在一起。」同前書，pp.130。此態度提醒我們，應把十九世紀以後的自然主義文學看成某種歷史類型學。

和、陳映真與宋澤萊的作品，呈現出非常濃厚的自然主義思想，不但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人類行爲，更展現本能欲望、遺傳或環境因素操控人類命運的實驗模型，以推導出命定論的解釋，讓小說完呈現近似人類學的研究，值得深入探究。

宋澤萊可說是少數既能創作、又能撰寫文學評論的好手，除了常在主持的雜誌上發表論文，更是台灣少數公開擁護自然主義的作家。他在〈從「打牛瀆村」到「蓬萊誌異」〉一文提及，西方文藝觀點極早就已進入他的審美視野，他也樂於將這些人生發現展現於作品當中。他提及有意創作自然主義思想的作品，是因為深刻體會到人性的陰暗面和心理情結，皆受到天生條件的限定，不論人意識到或沒意識到這種限定，都無法擺脫人類的宿命。作者自行坦露的創作觀，雖是學術研究重要的參佐資料，但我們更仰賴實際的文本分析，深入探索小說的內涵與思想。在〈舞鶴村的賽會〉、〈創痕〉、〈省親〉、〈病〉與〈分家〉自然流露了自然主義的思想，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探討它們所呈現的美學價值與時代意義。

宋澤萊在這一系列作品中，生動地描述台灣各個階層人物的處境，以農夫、畫家或工人教師等各行各業的生活，提供了近於社會全史的視野，特別強調受環境與遺傳命定論支配下人們的處境。在〈舞鶴村的賽會〉中，作者利用庶民著迷的賽狗活動顯現一個大環境的蒙昧，人物既昏聩又無知，以短淺的目光根本無法意識到玩物喪志的可怕性，最終促成自毀的結局。在〈創痕〉中，作者利用舊友的相聚，讓人物回顧各自身上的傷痕，為子孫揭露一切創痕皆源自不可逃避的歷史／環境悲劇。在〈省親〉裡，作者透過人物的逃離、反叛到澈悟的三個階段，揭露血緣命定的不可違逆性。畫家嘗試以畫筆反駁他被詛咒的人生，卻在死亡前坦然接受自己的命運，接受血緣與遺傳疾病是無可違抗的事實，以平靜的心接受命運的安排。而〈病〉則描述兩個家庭的妻子皆受環境所限，只能以女性最卑微的方式，犧牲自己保全破碎的婚姻。〈分家〉描述一個深具掌控欲的父親，透過暴烈的方式以控制他的孩子，他的兒子無法反抗，最後以可議的方式結束父子情份，敷展人性最為幽暗殘酷的一面。

以上這幾篇小說遵守自然主義的規律，描述人與環境的各種衝突，又不透露任何解決的方案；在形式上追求簡潔與質樸，文學語言則顯現新意。小說刻意在敘述層次上安排說故事的人與聽者角色，讓經驗老到或見識頗多的人，對傾聽者傳頌各式鄉鎮傳奇與人生大道。在這些故事中，敘事者未必與說故事的人物位居同一個敘述層，若主要透過故事外敘述敷陳，反而成功地塑造出冷觀世相的作用。若透過同故事者的講述，則因敘

述者緊緊依附著人物情緒，反而清楚地紓發了見證者的感懷，同時讓聽者直接從聆聽中，得到最巨大的震撼。

宋澤萊透過這些作品，以剖面筆法，精準地描述了台灣各個村落的特殊景致，毫不掩藏地表現了人們赤裸裸的獸性與環境限制。透過自然主義式的鏡頭／描寫，以不動聲色的方式，自然呈現主控命運的重大因素：在〈創痕〉中，許君與戰友在婆羅洲經歷了生死搏鬥與殘酷戰爭所遺下的身心創痕，經過多年仍未消除，因而發現世界是由創痕塑造的真理：「事實上這世界便是由創痕所積成的，我以為那是理所當然，也不覺它有什麼野蠻可怕的。<sup>18</sup>」淡然的言語，是逃難者在歷經生死搏鬥與環境戕害後，不得不習得的淡然姿態。那昔日之痛與傷，對照世界層出不窮的殺戮與暴力，創痕暗示的野蠻與可怕本質，已被時間之河轉化成生命中不能忘記的印記，因此變得「厭惡與親切」、「悲慘而溫暖」了。後代子孫從父親的談話中，才真正體會到父執輩受環境所限，不得不背負的歷史憂傷。又如在〈省親〉裡，林木青起初不能接受自己染病的事實，無法接受身體受到的限制而憤然出走，以繪畫超越病痛的束縛。待1976年回到故鄉後，他開始原諒父親了，這個原諒的心態意味著他對環境與血緣控制的接受和妥協，最後他坦接受一切命定的事實：「是的，一切最不能反抗的便是遺傳，對的，一切都不要緊了，父親施予他的一切也不必苛責了，他要諒解父親。<sup>19</sup>」

宋澤萊的自然主義小說主要透過描述法而非敘述法，彰顯許君接受環境決定論、林木青接受環境與血緣命定論的事實；特別在結尾處，透過鏗鏘有聲的命定式結論，呈現環境的不可違抗性或人性醜惡的本質。作者幾乎杜絕任何戲劇性的衝突，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現台灣庶民生活的剖面圖，只有透過如此淡化的描寫，才能翔實地呈現命運真實的軌跡。我們發現，寫實主義小說中最注重的情節在這些小說當中，已失去塑造角色的必要性與功能性；情節的存在，只不過為了突顯人們生活無不受到天生條件限定的必然敷衍罷了，為了更完整地提供一個據實描寫的環境而已。

這幾篇小說，關注台灣鄉鎮底下的人民生活百態，在自然平易的筆法裡，十分逼真地挖掘台灣眾生相，展現「受環境與遺傳因素決定及控制」的思想，頗有可觀之處。透過白描的文字緩緩陳述，規避任何批判性的指引或道德評價，淡然從旁注視不仁不義不

<sup>18</sup> 宋澤萊（1988）：《蓬萊誌異》。臺北：前衛出版社。pp.214。

<sup>19</sup> 宋澤萊（1988）：《蓬萊誌異》。臺北：前衛出版社。pp.205。

平不公的情事，這些細節性的描述仍給人非常真實的感受，在形式上卻能不論為散漫或毫無組織，頗具神采。

另外，王禎和的部份小說富有鮮明的特色，始終讓人物自然地呈現自己，也極少在小說中加入小說家主觀介入的評斷，也因如此，呂正惠認為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自然主義小說家<sup>20</sup>。但呂正惠只關注王禎和的敘事角度與技巧卻忽略思想，並不足以說明他是個徹底的自然主義作家，我們需要探索作品的命定論思想，如何利用情節展現命運的枷鎖——環境與命運的龐大勢力，綑綁住小說中的那些不自由的人物。

眾所皆知，王禎和的小說相當擅於描繪人的渺小與卑微生命，幾乎大部分著作都以小人物為主。雖然很多作家也擅寫小人物的際遇與悲哀，但王禎和與他們不同之處，在於他筆下的主角常是喪失理想的人物，終日為營營役役、為生計而勞動，他們缺點甚多，可說是自私、無知又愚昧。王禎和以毫不留情的態度描繪這些「醜陋的人性」，卻鮮少以悲憫的眼光注視他們的困窘，反而極盡展現人性的可憐可悲之處，不論〈鬼·北風·人〉、〈嫁妝一牛車〉、〈兩隻老虎〉等，都可見出他的筆端不但揭發了貧困等外在的生存問題，更觸及了人的內在性格缺陷的問題，但不論描述多少災難的情境，幾乎不在敘述中流露任何同情的態度。

〈嫁妝一牛車〉描述以妻易牛的農村百態，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強調在命運的巨輪底下，小人物不得不承受難堪的羞辱以換得溫飽的窘況。萬發、阿好與姓簡的之間橫互了經濟盤算、倫理大忌與面子問題，困於盤算自身的利益，讓三人都無法做出超越算計的抉擇。其中，王禎和選擇透過具體的描寫，而非籠統的陳述來突顯人物，描寫三人劣於常人的醜態與窘狀：阿好面醜愛賭又愛放屁、萬發耳聾、姓簡的有狐臭，加上先天性格的缺失，三人始終夾纏於混亂的男女與分贓關係；阿好沉迷於姓簡的曖昧關係，姓簡的仗恃自己的經濟能力而敢胡來，萬發存有失面子但貪便宜的僥倖心理，也因如此，三人上演了這樁荒謬無比的反倫理劇。

此外，小說中的另一重要要角——環境，更是影響小說發展的決定關鍵。在落後鄉鎮裡，人們對失節一事仍有微詞，但為了要生存，阿好與萬發只好故意裝聾作啞不管鄉人的耳語。當阿好與萬發接受他人的資助後，婚姻的基石隨即動搖了，此時，居住的破爛小屋和鄉鎮不只是微不足道的旁襯，更是型塑二人性格最重要的具體物件。農村的環

---

<sup>20</sup> 呂正惠（1988）：《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pp.76。



境在小說中看似沉默不語，我們卻無法忽視它所具有的操控力量，遠遠大過於個人意志或尊嚴所能扭轉的局勢。

阿好與萬發各有缺陷，即使失去尊嚴，也只能委曲求全的各取所需。村人不堪入目的言語，正代表他們對萬發鄙夷的態度，小說中更意有所指地暗示眾人的輕賤態度，皆源於萬發的自我輕賤所致；讀者對萬發產生輕狎而非憐憫的態度，不能不說是作者有意的操弄。我們以為小說違反了自然主義強調客觀中立的書寫態度，卻不知作者故意透過敘事者有意的嘲諷，藉此更鮮明地暴露了人的卑微與低賤之境，呈現下等人之所以可憐可悲的面貌。姚一葦認為王禎和對卑微的嘲弄和過分的揶揄，已窒息了作者某種非常「人間底」的東西，不能不說是一針見血的批評<sup>21</sup>。卑抑雖是一種喜劇（comedy）的手法，但在這種低賤中見人性、人性中見獸慾的荒謬喜感中，恰好凸顯出人性的限制，相當符合自然主義醜化人類的看法：從人的身上，只看見無盡的缺陷與貪婪，令人可厭、可憎的人性。

在〈嫁妝一牛車〉中，我們格外注意到王禎和對人性抱持的態度，吻合自然主義悲觀的人性論，特別是對醜陋與缺陷毫不保留的強化及呈現。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透過旁觀的視角，加上從高處俯視的敘述聲音，呈現三人的墮落本性，而讓這樁醜事得到特殊的關注。故事中觸及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在資本主義挾持巨大勢力進駐花蓮小鎮時，像萬發這樣微小的人物根本無法維持生計，僅能豎起白旗投降。正如尉天聰所述，萬發所承受的涼薄人情與屈辱，若不能用阿 Q 的方式自我解嘲，便只能無可奈何地忍受這些悲苦了<sup>22</sup>。小說揭露了萬發之所以願意戴綠帽的醜陋面貌，更以萬發屈從的姿態，刻意塑造出現實炎涼的效果，在醜化與嘲弄的同時，俯視的眼光幫助我們認識人性的卑微之處，從輕蔑轉趨冷靜，理解萬發難以屈從、更難以反叛的兩難處境。

由此可見，王禎和最在乎的，只是藉由小說徹底揭露貧困環境與人性帶來的殘酷考驗，毫不關切改革社會的可能方案。在嘲諷的態度裡，我們看見小說仍寓有自然主義式的提醒：萬發這些丑角不過就是個卑微的小人物，他之所以令人啼笑皆非，是因他限於環境與天性所困，不可能完美地擁有高尚的情操，也不會成為十足的惡棍。窮困彰顯一個最明顯的事實：萬發在經濟上、身體上或心理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弱者，雖飽受道德的

<sup>21</sup> 姚一葦（1974）：〈論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文學論集》。台北：書評書目出版社。pp.137。

<sup>22</sup> 尉天聰（1979）：〈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出版社。pp.190。

掙扎，他竟毫無能力能保全自己的尊嚴。在萬發放任妻子偷人的背後，內心卻有著無法填補的自卑感，他是一個最像凡人的人，我們在嘲弄中終於發現事實的真相。當金錢與牛車可能帶來生活的轉變時，爲了滿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此時，抽象的道德意識與倫理禮防、婚姻戒律都變得非常虛偽，隨時可能棄置。小說透過鄉人尖酸的嘲諷，正突顯萬發面臨最難自處的困窘，以嘲諷的方式對婚姻關係、人倫規範與生存本質進行深入的探索，獲得最清楚的展現。

或許因爲王禎和始終秉持著隔岸觀火的方式，細微地展現卑微人物的荒謬人生，反而讓我們覺得小說的情境非常真實。除了展示殘缺人士命定的限制之外，更突顯了荒謬背後環境、窮苦情境、群體意識型態等幕後之手，影響庶民生計與生存的一面，那是無形且巨大的操控力量；王禎和在這些作品中，不可否認地顯露了較爲悲觀的思想，但他不會陷溺在悲觀的厭世情境裡，反而深刻地體驗到人們運命所受的內外限制，讓他成功地擺脫哀矜感傷的姿態，蛻變成這種置身事外的觀察方式<sup>23</sup>。他刻意保持敘事的距離，冷靜地觀察世事，顯露人生無法逃避的荒謬處境，始終節制不投入個人感情，讓他的小說時時洋溢著自然主義作品最被人讚譽的深邃洞察力，總能在人生切片中顯露客觀獨到的視野<sup>24</sup>。

東年的作品中，從理念到結局都帶有非常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除了具有深沉的悲觀思想，更強調環境的命定論主題如：〈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路〉、〈遊夜街〉、〈賊〉等。其中，〈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可說是自然主義小說的代表佳作，清楚可見作者試圖選取一個特殊的模型來表現現實、觀察人生，他讓讀者透過小說，看到某些強大的力量正操控著我們的人生，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些力量的存在，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只是親眼目睹它造成毀滅或促成死亡，而被誇大的這些力量，不過就是環境的力量與人性原欲。

---

<sup>23</sup> 高全之（1997）：《王禎和的小說世界》。台北市：三民出版社。pp.3。同時，高全之也看出王禎和小說中，特別強調人的有限性與命定性思想，特別歸納小說中常出現的四種受限情境，認爲人物常常受制於謀生或反抗惡勢力的限制、無法改善內在性格缺陷的限制、群體意無從自覺惡性意識型態或社會行爲的限制、受制於生命有涯的限制，以至於最終難逃悲劇的命運。

<sup>24</sup> 呂正惠（1988）：《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pp.33。呂正惠認爲王禎和與張愛玲一樣，都習於以置身事外的方式撰述小說，使得小說獲得極大的客觀性；同時認爲王禎和創作時，既能感同身受，又能冷眼旁觀，十分契合自然主義要求的客觀精神。

大體而言，〈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以理念小說的姿態，縱橫發展實驗小說的精隨，不但針對生存哲理呈現頗具深度的探討，在哲理的背後，更突顯自然主義命定論尖銳的思想。尤其〈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兩篇小說的場景設置，幾乎變相成為作家的實驗室，利用因果關係的觸發、刺激與實驗步驟，一步步驗證出身背景或環境所造成的思想與性格，加上無可杜絕的獸性與暴性，最終必定造成悲慘不堪的後果。兩篇小說一致選擇海洋做為實驗的場景，由此觀察人們生存的模式，進一步從社會關係中挖掘人性，記錄人的網際脈絡與環境對人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從中驗證：「人不是孤立的，社會環境不斷地改變著個人」的法則。不論研究社會對個人、或是探索個人對社會的相互作用，在這個層次上，〈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直書人性的黑暗、醜陋、野性與暴力，完成左拉要求的「人生實錄」，在文學價值之外，更富有豐富的心理學及社會學的解剖價值。

在〈海鷗〉中，一個畫家為了描繪人的真正內涵而登赴漁船，最後竟發現人類根本就是人形畜牲，像海鷗一樣只知道成群掠奪，「牠們不是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他們成天找東西吃，呃，他們總是成群相聚，所以應該是搶東西吃——你問我有什麼感想，呵，當真實面這樣強的時候，我想，我的感想是沒意義了。<sup>25</sup>」畫家對人性的哀矜與感嘆，根本無助於改變相互猜忌的人際關係。更現實的景況便是畫家也許受到環境及船上敗壞風氣的影響，也許受原始暴力慾望的驅使，他跟其他人一樣終日以殺海鷗取樂，從觀察者「人形畜牲」的身分轉變成參與者，成為他所鄙視的「群眾」的一員。

東年刻意揀選畫家、知識分子作為人性試驗的見證者，讓他們以故事內與同故事的第一人稱角度，陳述海上鬥爭與見聞。〈海鷗〉、《消失的太平洋三號》散佈自然主義式的觀點，暗示船上即是人類生存空間的縮影，在狹小的空間裡，人們過著械鬥、陰暗、孤寂的生活，活得毫無任何希望。當畫家或知識分子加入了海上獵捕的行列時，成為外來的刺激因素，直接引起了船艙／系統內最直接的反應效應。最後，他們犯下的錯誤和罪惡，正巧驗證「世界就是這樣」的環境決定論、人性決定論的不變定律。

在〈海鷗〉中，畫家最終對人類全景提出總結報告，他認為人的存在只是一種狀態，可怕的鍵結關係迫使人與人必須建立鎖鏈，魚產利益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但人卻拋卻仁愛之心陷於拼鬥中，失去了本身的價值與尊嚴，這才是寫實人生，「這種孤獨與恐懼不

<sup>25</sup> 東年（2000）：〈海鷗〉，《東年集》。臺北：前衛出版社。pp.114。

是出自於想像或者猜疑，是實實在在，實實在在存在存在於就是這樣的世界。簡單的說，人們的恐懼、痛苦、失望、仇恨，一切，歸根結蒂都是發生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sup>26</sup>」小說試圖透過實驗證明猜忌與殺戮絕不是特例案件，把畫家換成任何人，也絕逃不掉喋血事件的發生。人類生存的場景，早被宣判為一座封閉的競技場，時時上演死亡與暴力的威脅，死亡不是一個意外事件，而是人人在極度武裝與精神虛無的狀態下，必然發生的爭鬥結果。

小說對於人類關係的描述雖是悲觀的，但從悲觀的凝視出發，卻能更進一步挖掘到暴力與仇恨的內部本質：發現暴力的背後，竟源自人們恐懼被傷害的弱點，為了逃避恐懼，人們卻製造出更多的暴力，小說不但顯示了人類的無明與暴力，由此追索到暴力發生的真正主因。這篇小說的可貴之處，不只透過情節——演繹環境與人性決定論的觀點，更特別是，最後透過畫家與敘述者的對話，刻意提出突破決定論的微弱聲音，透過一問一答，從困惑的問號中提出了悖論，「你希望世界就是這樣嗎？」「沒人會希望這樣的。<sup>27</sup>」這個問號雖無法動搖籠罩在整篇文章中「世界就是這樣」的消極悲觀思想，但為決定論本身提供了反省的雜音：正因雜音的出現，賦予小說質疑「世界就是這樣」的力量，雖然這樣的力量極其微弱。畫家身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性見證者，痛苦地承受殺人的罪責，他從絕望之境提出無奈的詢問，反而給予世人更深沉的警惕。

東年在〈海鷗〉的序言裡，明言小說主要闡述一個殘酷的理念：他依循達爾文的思想，積極闡述人類與動物間的相同之處。人們嘴上的裂褶處原長有兩支獠牙，現雖已退化消失了，但當耍狠或嘲笑時，人們彼此折磨的景象，遠比動物們相互撕咬的慘況還要暴烈，而這樣的痛楚會鮮明地成為記憶深處，一個永不縫合的傷口<sup>28</sup>。作者明目張膽地以動物生物學與生理學的觀點詮釋人類行為，所依據的思想基礎，正是常受世人批駁矮化人性的進化論觀點。當世人開始質疑自然科學的規律，怎能完全適切運用於人類社會時，作家靜極思動，堂而皇之擇取生理學的角度，企圖解釋人的複雜思想與行為。

為了呈現更客觀的寫實場景，作者刻意利用敘述者與畫家釣魚時的對話，召喚起畫家對海上生活的記憶，透過一次次回溯，一次次建構了海上真實生活的場景。不論是描述海鷗此飛禽的外觀、習性、動態與詠物啓示，或是描述海上的人際關係、分析每個船

<sup>26</sup> 東年（1983）：《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pp.162。

<sup>27</sup> 東年（2000）：〈海鷗〉，《東年集》。臺北：前衛出版社。pp.119。

<sup>28</sup> 東年（1983）：《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pp.2。

員的家世來歷，描繪他們裝腔作勢的衝突與鬥毆，都不是透過細緻的描寫，如實展現對象或人物的微妙表情，而是偏向以一種概括式的速寫方式，捕捉聚焦物的身影來建立真實感。而這樣的寫實手法，不違背以解剖為基礎、以分析為工具的寫實法則，能夠勾勒一幕幕狀似真實的客觀場景。

小說從生理學與生物學的顯微鏡下解剖人性，毫無例外的，證實任何人都是環境條件、生理條件、當時壓力與進化論下的必然產物。小說充分呈現環境擠壓、群體競爭的痛苦，人就像海鷗一樣尚未擺脫獸性的控制，只能毫無能力地服膺於命定論的操控：「我想他們最迫切的危險並不在這樣的意外，而是在他們的群體生活；他們總是成群相聚，因此必須爭食，他們的尖喙和利爪時常弄得彼此皮破血流，甚至瞎了眼——他們是這樣緊張度過他們命定的一生，永無希望。人通常也如此。<sup>29</sup>」將人類比於動物的題材，督促我們更進一步思索人性的醜陋面與揮之不去的現實枷鎖。我們或許會認為，小說刻畫的雖是海上衝突與猜忌關係，但描述的情境根本不是個別案例，而是人性普遍存在的衝突際遇，這讓小說呈現出人性調查報告般沉重的價值。

同樣深入地描述海洋生活，〈海鷗〉一文可與《消失的太平洋三號》對照參看，長篇小說《消失的太平洋三號》顯然比〈海鷗〉更加複雜；但相同的是，人與人恆常處在獸性鬥爭的狀態，此種人形畜牲與缺乏理想的世界觀始終籠罩著全文。在《消失的太平洋三號》中，作家就像實驗室的科學家般，設定並執行所有的戲劇動作、衝突，同樣無情地把人物拋入無所依恃的汪洋大海，以提出實驗的結果與啓示。只是，這個以「太平洋三號」為名的小說，極像是富有象徵意義的島國寓言，以長篇小說的篇幅向世人展示各種意志對決的衝突、對峙與搏鬥的過程。小說運用最私密的語言——日記紀實體，以寫實的細節展現人物最真實的表情，紀錄最完整的細節瑣事。但象徵式的寓言故事在刺激與反應的兩端，早寓有明確的邏輯性與因果關係，此種強勢的理念，卻伴隨最私密的語體，形成這篇小說獨特的結構與敘述，無形中強化了內容形式間無止盡的張力與對話。我們雖然不易稱許第一人稱的航海紀錄，到底能呈現多少客觀性的紀錄，但透過這樣的敘事方式，卻絕對能傳達非常真實的親身經歷，讓小說超出日記體的承載容量，真正達至拍照寫真般紀實的密度，而讓世人對生命狀態受制於無形力量的抽象哲理，有更深層的認識。

<sup>29</sup> 東年（1983）：《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pp.2。

小說透過知識分子華北的眼光，以航海日記揭示喋血案的發展始末。在日記中，華北一方面是個客觀的紀錄者，記載每天船上發生的特殊事件，但同時他也是個評論者，主觀地評斷各項事件。他從生存狀態上描述這些船員，認為他們就像人形畜牲，只會不斷滋生各式罪惡。人的存在就像動物一樣，嚴格遵循著生物決定論的法則，只要給牠特定的刺激，就必然會得到既定的反應。他發現無知的人們受制於必然性的可悲景況，不由得在日記裡哀嘆默認：「如果有所謂的歷史的洪流，那麼事實上，它是由那些俗世的人匯聚而成的。<sup>30</sup>」知識份子雖能見微知著，但通常他們只能冷眼旁觀悲劇的發生，因為他們早是被群眾拋棄的對象，「當他們內在的力量又盲目的擠出另一個方向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竟然擠在後面，或者被踩在腳底」。(1998：109-110) 身為歷史的紀錄者與思考者，他卻無權修正他所參與的歷史，這是知識份子最普遍的悲哀。

在小說裡，有許多篇幅細緻描述船員生活的百態，更重要的，小說尖銳地處理知識份子與勞動階級可能存在的對立衝突，我們甚至可以說，小說是如此成功地表現眾聲喧嘩的雜語現象，並置展現社會中同時存在的多項意識形態衝突、利益衝突與價值衝突，這是《消失的太平洋三號》披露社會寫實面極其精采的段落。它呼應的是左拉耳提面命的法則，自然主義作品定要具象呈現社會與個人之間不斷延伸的衝突，「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會中，即在社會環境中，這樣，對我們小說家來說，這社會環境不斷地改變著現象。甚至我們最重大的課題就在於研究社會對個人、個人對社會的相互作用。<sup>31</sup>」在飄流的島嶼上，知識份子與勞動階級的對立狀態不但無法緩解，就連李梅岑與華北這樣的知識份子，對改造世界的方式都有不同的主張。最終，環境對個人、個人對環境的交叉影響，終於在封閉的環境積累了層層疊加的衝突與對立，立刻引爆成海上喋血案件，促成難以挽回的死亡悲劇。

左拉要求小說家要能駕御世界的核心，首先必須從研究物體和現象出發，觀察、解剖人類世界，「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同樣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觀察、精確的解剖以及對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寫。<sup>32</sup>」顯然，東年此作吻合了自然主義的信條，塑造

---

<sup>30</sup> 東年（1998）：《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pp.109。

<sup>31</sup> 左拉著、伍蠡甫、胡經之主編（1986）：〈戲劇中的自然主義〉，《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191。

<sup>32</sup>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1986）：〈戲劇中的自然主義〉，《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191。

人與自然最原始的狀態，透過觀察與解剖的雙重工程，細膩地捕捉到人性的醜惡面；但令人驚愕的結尾，卻也讓人震驚惡劣的環境與墮落的人欲，同樣都是促成海上災難的罪魁禍首。小說通過日記告訴我們許多真相，卻讓我們逐漸發現真相後，進一步探測到人性與社會體制的複雜關聯，最終證實這兩者因素結合之後，終將一場人類掠奪自然的旅程，演變成屠殺人性的血腥屠宰場。

在《消失的太平洋三號》中，環境決定論與消極的虛無主義，讓人物紛紛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整篇小說陷入黑暗的尾聲沉沒在悲觀思想中無法超脫，此作恐怕比其他自然主義小說，在表達黑暗沉境上更為悲觀。而這樣的悲觀思想，正是作者時時叨唸進化論觀點所促成的結果：「人之所以仍然沉淪於海歐那般困境，乃是因為他沒能在心靈上也進化到直立的狀態和自覺。或者說，他把這種自覺的能力只應用在記憶創傷和反應創傷，而非應用於解析和了悟隨時隨地必然發生的困境，使自己不傷害自己會傷害別人；對於中國來言，在以後某段漫長的時間裡，人們或許仍然必須命定的繼續一種擁擠的生活。<sup>33</sup>」東年急切地感受到，人雖身為「高等生物」卻只有「低等精神」，人的精神無法與身體軀幹組織同時進化到高等生物的狀態，人的歷史就只能反覆重蹈不斷耗損的悲劇。我們在「太平洋三號」這艘船上，以抽象的理念，再一次對人類的侷限、重複的歷史、決定論鐵証，浪擲或喪失的價值、意義與真理，進行一個完整的回顧。我們可以說，作家東年完成了《消失的太平洋三號》這篇小說，正巧切中了左拉自然主義幾個重要的核心思想。作者透過小說直接探索太平洋三號／台灣之島／人類之島的前景，充滿了悲觀的想法，這種種因素，都讓小說的延伸內涵更顯複雜。

另陳映真的〈死者〉同樣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小說藉由一個家族病史，突顯遺傳本身富有神秘不可解的弔詭規律，表現得可圈可點。小說利用生發三代的淫亂醜聞，展現血緣基因與自然律支配人的命運的定律，串聯血緣、疾病、失德與原罪的錯綜關係，曖昧地宣揚命定論無可動搖的權威，敷展出詭異又震懾人心的命運圖景。

作者刻意透過寫實筆法，把小鎮描述成一個遺世獨立的村落。我們很難從小鎮的描述中，看到文化之外任何關於政治經濟或時間的暗示，雖不知道故事具體指涉的時空，我們卻不會覺得這樣的村莊是陌生的，因為我們早明瞭，對情慾的需索是人類極其自然的本能；我們只是無法想像庄里人竟能如此放任，從不擬設各種禮法來箝制人們過度的

<sup>33</sup> 東年（1983）：《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pp.2。

慾望與敗德的行徑。陳映真處理這樣的題材時，刻意採取冷靜客觀的敘述聲音／視角，隱藏作者或敘事者本身的感情態度；之所以不彰顯任何主觀的評價，就是為了更加凸顯人的自然命運及其規律，從而顯現我們毫無所悉的命運枷鎖在生存中，扮演死神的那張臉孔最真實恐怖的樣貌。

小說著意描寫人的生物本能，尤其是最接近動物性的性衝動和性本能，而村內的母性／女性既是人倫法紀的背叛者也是造物者，未經規訓與懲罰的原始野性驅使她們放縱沉溺於性愛，此舉也促使後代子孫像她們的生身母親一樣縱慾沉淪。生發一家醜事更是延續三代，生發的妻子淫奔失責，生發的女兒、林鐘雄的養母始終在男人身邊流浪，媳婦淫亂、孫女兒秀子尚未成年也敗壞門風，女性淫亂似乎成爲代代相傳命中註定的結果。當人們的自持力量無法控制本能性慾時，遺傳和環境竟同樣成爲巨大的暗示力量，助長人們日趨沉淪墮落；這些力量太過龐大，逼使著生發不得不思索家族遺傳與命運詛咒間的神奇關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說塑造了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環境——敗德村，充滿了黑暗的情慾、惡性的遺傳與詛咒的鬼影，生發無疑是揭露此中奧密最關鍵的一位人物。生發是鎮上的異類，雖正直、善良、勤勞且杜絕邪淫，他卻管束不了失德的妻子，更讓失德之辱成爲一生耿耿於懷的創痕。生發認爲村裡的人沾染了罪惡，已把村莊踐踏成受天譴詛咒的村落，這是他無法逃離的牽制。「命運如今在他是一個最最實在的真理了，否則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無法解釋的：他勞苦終生，終於還落得赤貧如洗；他想建立一個結實的家庭，如今卻落得家破人亡；他想盡方法逃離故鄉，卻終於又衰衰敗敗的歸根到故鄉來。而那些敗德的，卻正興旺。<sup>34</sup>」「命運」之神把他帶回故鄉，他對至高無上的神祕主宰力量，開始有了最深切的體悟。

更詭譎的，便是生發一家三代遺傳了致命的病症，讓生發親自經歷失去父親、次子、長子與女兒的悲慟。肝癌造成林姓家族前後八個人殞命，顯然基因是最主要的致死病因；禍延三代的致命性肝癌讓林家人拖著一雙水腫的腳，「『男穿統，女穿褂』你看他那一雙腳。正是他家的老病呢」<sup>35</sup>。家人除了樣貌相像外，就連死亡的方式也一樣，透過疾病這座神奇的橋樑，家族的生者與死者詭譎串聯起相似的命運線；肝癌不但成爲奪命的殺

<sup>34</sup> 陳映真（1995）：〈死者〉，《我的弟弟康雄》。臺北：人間出版社，pp.54。

<sup>35</sup> 陳映真（1995）：〈死者〉，《我的弟弟康雄》。臺北：人間出版社，pp.48。



手，更殘酷地斷絕了林家後代命脈的繁衍。

此時，敗德村的背德行爲與宇宙自然律間似存在神奇的感應，疾病被賦予了道德譴責的意涵，促使生發不得不追問到底是什麼力量宣判了他與家族走向衰亡，卻始終不能理解疾病是否注定成爲背德村民背負的原罪，抑或是家族醜事的懲罰與報應。小說刻意透過生發、林鐘雄的局部觀點，針對自然命運的走勢提出許多疑問，我們從生發與林鐘雄的侷限觀點可看出，他們漸漸承認了命定論的掌控幾乎無所不在。作者在此處顯露純熟的寫實技法，出實入虛細描人物的心理變動，生發雖質疑天道之報應，卻也深刻體認到自由意志絕無法改變他的既定命運，他在龐大的命運面前顯得無知又渺小，不論做什麼事都無法改變限定的死期，永遠無法理解致死疾病背後真正的因果牽連。

林鐘雄因收養關係才納爲家族的一員，他的心境自然跟悲慘守喪的家人有些隔閡。林家三代男性盡數死亡，養子林鐘雄自然成爲繁衍象徵性命脈的最後希望。林家以領養方式延續命脈是台灣人執信的傳統習俗，爲了紹繼祖先與傳承子孫，得把嗣系給繼承下去<sup>36</sup>。毫無血緣關係的林鐘雄，以最清醒冷靜的眼光觀察林家，驚訝這個家族盡數死於疾病的厄運，也暗自慶幸自己逃過劫難。小說安排一個介於家人／外人灰色地帶的人物，貼近並親臨這場生者與死神搏鬥的場景，實際上具有目擊者與見證人的雙重身份；當他發現血緣關係竟帶有離奇的致命性，促成家族不可改變的死亡契約，更親眼目睹最淒慘的血緣悲劇時，也從一開始的無動於衷，轉而對命運感到無比的震懾與恐懼。林鐘雄此人物具有特殊的功能，近於左拉自然主義小說中常出現的「第三類人物」，此類人物可追蹤並展現命運自然的走勢，作爲貫穿主題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但出現在死亡現場成爲目擊者，更是一個見證命運奇景的窺視者，最後兀自在棺木前發出神秘而且冷漠的微笑<sup>37</sup>。〈死者〉最終結束於林鐘雄的內在視角，對血緣不可解釋的神秘性質，留下一個令人震懾又恐懼的問號。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外的敘述觀點刻意維持不介入的姿態，關注敗德村的淫亂風俗與道德評價卻不置一詞，小說巧妙利用故事外聚焦與兩位人物的心理視角，形成三股極

<sup>36</sup> 謝繼昌（1999）：〈中國家庭的文化與功能〉，《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主編。臺北：漢學中心印行。pp.266-267。

<sup>37</sup> 于啓宏（2007）：《實證與詩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p.139。于啓宏注意到左拉自然主義小說中常出現的「第三類人物」，常是死亡現場的目擊者與命運的窺視者，多半是女性。

具張力的對峙力量，也對命運真相提出最深沉的叩問：生發對命運充滿無能為力的不解與困惑、林鐘雄對命運感到無比的震懾與恐懼，以及全知敘事者久閱人事的洞察，我們終究會受到不同視角的觀感所感染，最終不得不默認人類歷史中的無數死者，可能遭受社會決定論和生物決定論的無形控制，而死亡僅是無可違背的結局。

在〈死者〉中，作者以自然主義有限觀點的寫實筆法，表現真實人生的真實困惑，在帶出自然情慾與詛咒困惑的同時，展現人物的尷尬處境。無論從詛咒懲罰或超越道德的框架來思索疾病，臨終之人是不可能解開心裡的困惑了，只因人的慾望與性愛都是自然，它既不是善、也不是惡，既非美、也非醜，作者僅是如實展現這些騷動的慾望。小說極力展現性慾的不可克制性與墮落性之外，卻也矛盾地顯示道德衝突的背後，性慾正激發出難以抵擋的生之力量與死之力量，以客觀的洞察力挖掘出極具深度的社會學報告與心靈探索。而小說最終不願替讀者論斷自然命運的軌跡，或做出善惡分明的論斷，而把焦點放在人們掙扎的內在視野，展現那些擺不平的矛盾、看不透的玄機與參不悟的迷障。正因廣大的民衆看待命運之玄機，總是困於「或許是這樣——或許是那樣」的狀態，而有許多痛苦的困惑，卻又無法真正從至高無上的角度，窺透自己生命的規律與大限；所以，我們僅能懵懂地從生老病死的過程中，重新發現遺傳或環境可能成爲人們難以逃避的限制，能夠接受種種不平的對待，了悟生命依存與世界運轉的模式。正因爲人們無能對待命運的不確定性，人類的力量顯得渺小，所以，我們惶恐地從詛咒思想或懲罰思維來理解疾病／命運的圖譜。雖然，〈死者〉本身並無牢固且預設的道德成見，它僅忠實地展現人們面對世界不確定事物的猶疑態度，這篇小說仍指引我們，從玄怪的、遺傳的與命定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樣貌。

## 四、結語

回顧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發展史，可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至末期人們普遍面臨了價值崩解、道德解體、宗教失去主宰地位、人心紊亂的局面。當理性觀察與科學至上的思想取代唯心論體系後，哲學家、科學家與文學家以新觀點顯現他們對世界的觀察，以新的世界觀解釋世界。我們發現，唯物論與自然主義的思想之所以那樣強調機械的、物質性的世界觀，完全是因爲它自身正是實證論與科學萬能思想下的產物。

1880 年後，更多學者面對科學的態度已經轉變，雖持續稱許科學帶來的豐富成果，但已開始質疑科學所建構的各種假設。時代的種種新發現，促使人們重新反思十九世紀設定的物理與化學假設，不但對機械觀有所批評，連放諸四海皆準的自然律，也不再見效。此時，時人對科學至上論已產生疑惑，有人更進一步提出所謂的自然法則，不過就是小心翼翼的測試所得到的規律狀態，不具有絕對性；顯然，實證主義的真確性開始受到嚴格的質疑<sup>38</sup>。雖說如此，這場精神與思想上的革命依舊徹底影響了人類的世界觀，改寫了人類的歷史<sup>39</sup>。而此種深信機械觀與自然律的組織知識已建立完成，此後更擴大地延伸到生物學、地理學、地球史甚至是人文學科上，各學科間彼此相互勾連影響，具體而微地串聯起一個龐大的認知網路與知識架構。

一直以來西方學界以科學至上觀及環境、遺傳決定論，作為區分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文學最大的差異。回顧台灣新文學八十年的發展歷程，可發現台灣文學的發展不像國外或日本一樣，狹義的自然主義不曾形成特別矚目的流派或運動；此外，強調科學至上以及決定論觀點似乎未曾在台灣文壇得到廣泛的關注。雖然，戰後台灣文壇並沒有形成較有組織的自然主義運動，更遑論聚集成什麼具體的流派或目標，但從這些小說的討論當中，我們仍可發現台灣部分作家已接受了自然主義的科學思想，更具體地透過作品闡述這些思想。我們發現這些作者在作品中觸及到一個沉重的面向，他們沉重地發現外在環境存在著難解的僵局，甚至是個人的自由意志也完全發揮不了作用，僵局始終無法透過合理的方式得到解決，他們故意不去美化這些醜陋的現實，改以直言不諱客觀描摹的方式，對這些束手無策的困境投以最直接的關注。從這些作品當中，我們看見作家看待社會問題所持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認為人們不論遇到什麼樣的社會難題都無法得到解決，人的意志與一切努力都是徒然，這些小說都顯露出消極或絕望的一面，被迫地、無奈地接受了命定論的觀點<sup>40</sup>。

<sup>38</sup> 巴森（2005）：《從黎明到衰頹》。鄭明萱譯。台北：貓頭鷹出版社。pp.1066。

<sup>39</sup> 王道還認為我們習慣以「革命」來形容科學的重大突破，是因任何科學理論都不是孤零零的認知工具，必然與其他歷史因素有深入的牽扯；若想憑一個實驗、一個簡單的論證就推翻受普世接受的觀點，機率並不高。所以，科學理論的興替，往往涉及世界觀複雜的變化，的確相當於革命。王道還（2002）：〈科學史上的這一個月——1869年2月，赫胥黎就職倫敦地質學會會長〉，《科學發展》350期。pp.77。

<sup>40</sup> 茅盾曾對左拉自然主義文學的模式做出總結，認為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困擾人的社會問題，卻始終無法獲得解答，最終證得人的一切努力不過都是徒然罷了。茅盾（2004）：《西洋文學通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pp.120。

追溯戰前台灣的文藝思潮史，可發現台籍文人針對自然主義的運用與發展，也曾提出非常犀利的看法。楊逵是日治時期非常活躍的創作大將與理論家，他在幾篇文章中提到幾個重要的觀點，文學不能沒有浪漫理想的追求，但要呈現這種浪漫的文學，更需要利用科學的眼光來觀察現實；也就是說，只有透過最高明的寫實技法，才能在觀察或表現上展現更好的寫實作品<sup>41</sup>。楊逵的想法，顯然認為自然主義作家並非真的理解「寫實」的真意，反而誤把屍體或黑暗表象當成真實，充滿了謬誤。從楊逵堅定的態度我們可發現，他對寫實主義文學與自然主義文學的分判是清楚的，他的區分點在於：自然主義過份強調社會與人性黑暗面，顯示文學重大的缺失，故而認為自然主義是資產階級頹廢的產物<sup>42</sup>；他要求台灣文藝不能像自然主義文學那樣，從頭到尾只愛描寫黑暗面，必須要追求光明的精神與浪漫的理想。不可否認的，戰前台灣的作家便從自然主義思想得到啓發，最後卻選擇放棄過於顯露醜陋現實、強調病態人生的觀點，轉而以寫實文學呈現更深入的寫實功力與理想的願景。透過楊逵的觀察，幫助我們瞭解自然主義未曾在台灣文壇凝聚重大流派最重要的歷史成因。

葉石濤比楊逵小二十歲，更是橫跨戰爭前後期著名的小說家、文學理論家與翻譯家，

- <sup>41</sup> 他在〈擁護行動主義〉(1935)一文提出，進步的文學原本就是積極主動的現實主義文學，如果文學不能立足於現實主義，就有陷入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楊逵(2001)：《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涂翠花譯。pp.141。同年11月他在〈台灣文壇近況〉(1935)一文中闡發臺灣新文學的起步及運動，本來就是針對無病呻吟的遊戲文學而發。他的文學觀非常強調社會的基礎，如果作品中沒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又缺乏現實主義積極的要素，這並不是楊逵所要追尋的真正的現實主義，而是自然主義的殘餘。顯然，只揭露社會的瘡疤，而不提供光明的遠景的自然主義文學，是被他厭棄的虛假文學。楊逵(2001)：《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涂翠花譯。pp.138。除了重申文學真正的精神之外，楊逵還對自然主義提出非常中肯的批評，以下這段話極具重要性：「人性的一面是具有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的要求——想要活得更好。忽視這種浪漫的任何一面，或者只看虛無面而不看浪漫面，這樣的自然主義都不是寫實主義，而寫那種作品的人也不是寫實主義者。自然主義不看人和社會活生生的狀態，就像看照片一樣只看表面；極端的話，就把死屍當成真人了。」楊逵(2001)：《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涂翠花譯。pp.412。楊逵的文藝觀點數十年來相當一致，沒有太大的改變；在三零年代時，他已留心部分台灣作家受到日本或國外自然主義手法的影響，但這種描述人性黑暗的文學，終究無法讓作家得到滿足，最後多數作者還是加入了左翼運動。楊逵(2001)：《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涂翠花譯。pp.412。
- <sup>42</sup> 楊逵(2001)：《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涂翠花譯。pp.411。

最善於引薦東洋與西洋文藝思想和美學，以此為參照座標檢視台灣文學的獨特性。他提出嚴正的聲明，認為臺灣文學真正的典範在巴爾扎克、史當達爾（司湯達爾）、迭更司（狄更斯）（Dickens）、托爾斯泰（Tolstoy）、普希金（Pushkin）和果戈里（Gogol）身上，唯有效法他們同被殖民或被封建制度束縛的人民打成一片，透過冷靜透徹的寫實功力描寫民族苦難，既描述清晰具有詩意的光明面，又諷刺陰森社會的另一面，如此才能發揮寫實主義文學真正的價值，創造出完美的民族文學<sup>43</sup>。

總結葉石濤此文對台灣文學提供的意見，可統整出幾項重要的特點，而這些特點，顯然與台灣戰後文學的整體發展方向息息相關。其一，葉石濤明顯貶抑法國自然主義者如左拉的成就，卻忽視了自然主義毫不保留揭露原欲與醜惡，實藏批判現實的力道，反而認為書寫墮落本身，根本坐實了作家亦是資本主義墮落拜金集團一員的事實。葉石濤認為環境決定論下的揭醜內容，根本不是正常世界的寫實記錄，而是變態與畸型世界的寫照，而這種書寫理路絕不是台灣文學可能發展的方向。其二，葉石濤認為唯有批判性的寫實主義，才是台灣文學的正途，可看出文評家早為理想的寫實作品預設書寫的範圍，那便是國族與大我的苦難，絕不是小我的悲喜哀愁。但這樣的寫實主義，明顯把文學的終極關懷當成首要任務，希望放大文學的影響力量，以文學的批判力量來改變或提昇社

<sup>43</sup> 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一文中，他特別標舉台灣文學的特性，「台灣鄉土文學所採取的寫實主義手法，並非歐美國家肆無忌憚地在作品裡所追求的那種肉體、精神兩層面的無窮盡的異常性；因為歐美作家的意識，已被發狂的世界——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拜金思想——所侵蝕，是窮途末日的畸形世界，這完全和我們鄉土文學的歷史經驗背道而馳。」葉石濤（1978）：〈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驄編。台北：遠流出版社。pp.78。此外，葉石濤提出台灣文學的創作手法務求冷靜透徹，如此才能真正深刻地書寫明暗交雜的真實景況，過度耽溺於美好的幻象或是醜惡的現狀，都忽略現實明暗交雜的完整樣貌。他認為我們閱讀左拉的作品時，總讓人對世界感到既絕望又厭憎，發覺人是這樣低鄙瑣碎又可憐，這樣的作品雖也深沉，但俄國小說真正的偉大之處，是讓我們感受到人性的低鄙瑣碎與可憐之境，的確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頭，但我們絕不會只臣服於絕望與厭憎之中，能對承受苦難的人們，興起憐憫與驚嘆的感懷。葉石濤（1978）：〈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驄編。台北：遠流出版社。pp.69-92。在此，葉石濤已嚴密分隔東歐寫實主義與法國自然主義的文學主張，他雖自陳也推崇法國的巴爾扎克、史當達爾，但顯而易見，他更推崇的是彰顯民族與時代苦難的東歐寫實作品，因這些巨作能閱讀到人性的醜劣與侷限，也能激發出人性的光輝。一直到1987年撰述《臺灣文學史綱》時，葉石濤仍堅持著這樣的觀點，展現台灣作家以抵抗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方式完成文學創作，回溯歷史讓民眾深刻體認到，台灣這一豐饒的土地是所有人民命運共同體的事實。

會。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不但要書寫光明的理想性，還要精細刻劃黑暗的深沉，只有透過光明／黑暗的對照才能激發人性，喚醒人們對於應然世界的期望。而這樣富有積極性的文學思想與史觀，幾乎形成台灣大部分文學家與文評家的共識，認為文學能召喚人們對應然世界——「世界應該是這樣的」的理想，又能反省現實的侷限與醜惡，這樣的創作觀與使命感形塑了台灣文學的特殊風貌。

顯然，不論是戰前的楊逵或戰後的葉石濤，都看清了自然主義描述病態、黑暗世界的手法、題材與思想，會限制台灣文學健康的發展，因而提出拒絕的態度。實際上，對照戰爭前後的文壇情況，我們發現楊逵或葉石濤攻擊或批評自然主義，完全是基於憂心台灣寫實文學墮入歧途而發，不願意墮落或黑暗的思想損害到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對照之下，寫實主義文學既富有光明性、理想性又具批判性，寫實主義作家能以現實為基礎考察理想世界的可能性，卻不見得比自然主義文學失真，正好提供台灣所需。台灣文壇的後繼者在寫實文學紮實的基礎上，依舊把文學當成激勵社會進步、分析社會弊病不可取代的手段，能以冷靜的方式觀察現實，客觀地思考同胞的命運，不斷深化寫實主義文學更豐富的視野。

從文學發展的趨勢來看，自然主義曾在歐美締造出十九世紀的熱潮，在東方的二十世紀初在日本也締造了小說的盛世，在台灣卻未有擴展的空間。追究起來，文學的發展未必與科學至上的思想不普遍、或不重視有關<sup>44</sup>；更直接的關聯，可能是大部分作家並不願意以一種機械性的眼光看待人性，雖然這些作家同樣關注人性的醜惡與病態本性，但卻未承認它們的支配性可否決人性的其他可能，這樣的人性觀顯然與自然主義作品強調的決定論觀點顯然不同。我們看見台灣更多的小說作品傾心於反映人生、刻劃俗民百姓的困頓，藉著作品傳達改造世界的遠景，承繼的是東歐寫實主義一脈的精神，而非法國強調絕對科學絕對客觀的寫實精神<sup>45</sup>。正因為普遍民衆或作家對「人形畜牲」的人類

---

<sup>44</sup> 劉崇稜考察日本文學史，發現左拉的自然主義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就引進到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已成為日本文壇聲勢最大、規模最巨的一次文藝思潮運動。此文學浪潮一直延燒到1912年，造成創作與理論齊頭並進的盛況，青年們甚至把自然主義當成是真實、自由與反叛的代名詞。劉崇稜（1997）：《日本近代文學概說》。臺北：三民書局。pp.76。而後期日本的自然主義已能脫離西歐的模仿形式，變成徹底日本式的自然主義。葉渭渠、唐月梅（2000）：《日本文學史》近代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pp.227。

<sup>45</sup> 從台灣的文學作品可看出，大部分作家較接受東歐作家賦予寫實主義的遠景——改造世界，而非效法西歐如法國作家保持冷靜的創作姿態，那麼極力要求作品必須達到科學寫實的境地。這個結論與羅

觀或人性觀，抱以懷疑或批判的態度，不輕信人性只有醜惡的面貌，更不把人們的苦難與罪惡輕率地歸結於環境、原欲與遺傳因素的控制，顯然對於自然主義所信服的性惡論、遺傳論或環境決定論皆抱持保留態度，自然而然限制了自然主義論在臺灣文學的發展空間，也影響了新文學的大致走向。

本文著重闡釋自然主義小說的諸多特點，尤其把重點放在戰後臺灣小說當中，探索作家如何透過科學的觀察精神、物質觀與方法探索台灣的問題，對社會與人性提出更審慎的觀察報告。這些小說的敘事角度雖不同，卻具有一致的共同點，儘可能採用真實或客觀的態度，展現人們被環境物質、生理遺傳條件或宇宙法則所控制的事實。此外，作品中強勢散布生物或環境決定論的思想，讓作品沾染濃厚的悲觀氣息，在台灣小說當中顯得相當特別。

在這些受自然主義思想影響的作品中，除了東年之外，我們看見其他小說的確較少著墨於唯心論思想，幾乎不從精神、信仰或宗教觀點去探討人之所以存在的價值，更不可能觸及超越自身存在的可能，而是竭盡可能地放大了環境、遺傳基因等物質論的影響力，這樣的理念直接影響最高權威的敘事者，不斷強調人類的被決定性與不可改變的事實。東年的小說雖具有強烈的理念傾向，但這些具有行動力的人物，卻不像是遭遇衝突的血肉之軀，更像是盛裝理念與情感的行動者，不但帶有批判的精神，也顯示了相當深奧的理念，此時複雜的理念竟成為區隔人物最強烈的特徵。但我們進一步把船上所有人物進行歸納之後，不難發現這艘象徵之船之所以引爆如此強大的衝突，皆源來自於三種勢力／理念的爭奪，享樂與墮落的勢力、妥協的自我意識與道德超我實現的對決，最終三種力量無法得到妥協，只能玉石俱焚。在「環境決定了人的意識」的決定論底下，每個人物都是環境操縱下的玩偶，自然而然成為犧牲品。

這幾篇作品完成的年代不一，但小說指涉的難題顯然與台灣社會的一系列變動有密切關聯。宋澤萊認為，台灣陸續出現自然主義理念的小說，主要是因為台灣農業崩解、社會結構改變、受害與被遺棄的人數增多所致；加上當代作家已失去前代作家樂觀進取的精神，紛紛轉而描述「萬事有限觀」的思想，自然而然寫出了吻合自然主義思想的作品，強調人在生理上、心理上與環境上的種種缺陷，此番觀點正提供我們另一個角度的

---

網對中國五四時期文學活動的觀察是一致的，當時中國對西方文藝思潮的接受方向，仍傾向於俄國的寫實主義，也就是亟欲透過文學達到介入社會改造的最終目的，而非西歐強調的冷靜寫實主張。羅鋼（1993）：《歷史匯流中的抉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p.51-57。

思索<sup>46</sup>。我們從這些作品看見寫實主義技巧已趨成熟，小說集中刻畫的是混亂失衡的台灣社會，就連道德觀也更加搖搖欲墜，守法、守貞、高尚、堅強、仁愛等良好的道德已失去昔日尊嚴，這些小說透過真實筆法描繪台灣一隅，既不修正現實、也不粉飾現實，而是選擇從道德崩解的卑微處出發，環繞獨特的社會問題暴露國內根深蒂固的陳腐，從國民性著手，完成了屬於台灣性的自然主義文學。

自然主義文學散佈的悲觀思想常招致許多負面批評，不少文評家批判自然主義文學，刻意呈現一個善惡混亂道德淪喪的世界，更著力於刻畫人類的屍體及腐肉，描繪的盡是未加編整的黑暗世界；再加上敘事單調、粗糙、平凡與冗贅的缺失，造成此類文學普遍缺乏感動人的力量。但我們發現台灣的自然主義小說不乏精彩之作，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陳映真的〈死者〉、宋澤萊的〈舞鶴村的賽會〉、〈創痕〉與東年的《消失的太平洋三號》既富有濃厚的人性關懷、又探索卑劣的國民性，還針對民族與文化弊病進行深層反省，創作出具有自然主義思想卻深植於台灣歷史的作品，實屬珍貴。

這些小說雖表露了值得商榷的命定論思想，卻明顯規避掉那些遭人詬病的缺點，這幾位作家揚棄無技巧性敘事的單調缺點，轉以生動又不失真實的視角與技法揭露生活底層的真實暗流，在刻畫真實、展現真實的追求上，已達至刻劃真實所需的精細與準確向度。儘管，我們討論自然主義小說最看重的「寫實與否」之問題，很大一部分受到閱讀慣性的限制，自然主義小說擅長以模擬筆法呈現生活切片，說穿了，他們僅是更善於利用藝術法則的虛構成規而已<sup>47</sup>。無論如何，戰後台灣的自然主義小說雖走向與寫實主義不同的方向，不刻意顯露人道主義與道德意識，反而能以敘事文體達到如科學般精確的實證主義要求，對當代某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真實地暴露那些巨大的衝突與矛盾。整體說來，這些自然主義小說既具呈現社會學般的研究價值，同時又保留了文學的美學價值，值得我們重視。

---

<sup>46</sup> 宋澤萊（2007）：〈台灣戰後的自然主義文學〉，《第一屆臺日文學與城鄉意象研討會論文集》。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南華大學中日思想研究中心與國立台灣文學館聯合出版。pp.15。

<sup>47</sup> 威爾克（Wellek, René）& 華倫（Warren, Austin）（1999）：《文學理論》。梁伯傑譯。台北：水牛出版社。pp.20。



## 參考書目

### 中文參考書目

#### 一、台灣自然主義小說

1. 王禎和（1976）：《嫁妝一年車》。台北：遠景出版社。
2. 宋澤萊（1988）：《蓬萊誌異》。臺北：前衛出版社。
3. 東 年（1998）：《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4. 東 年（2000）：〈海鷗〉，《東年集》。臺北：前衛出版社。pp.103-120。
5. 東 年（1983）：《去年冬天》。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6. 陳映真（1995）：〈死者〉，《我的弟弟康雄》。臺北：人間出版社，pp.45-57。（原載一九六〇年十月《筆匯》第2卷。第3期）

#### 二、專書

1. 巴 森 (Barzun, Jacques) (2005)：《從黎明到衰頹》(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鄭明萱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2. 于啓宏（2007）：《實證與詩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左 拉 (Zola, Émile) (2006)：《娜娜》(NaNa.)。鍾文譯。臺北：桂冠出版社。
4. —— (Zola, Émile) (1986)：〈戲劇中的自然主義〉(“Le Roman ciers naturalistes”)，《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伍蠡甫、胡經之主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187-223。
5. —— (Zola, Émile) (1986)：〈實驗小說論〉(“Le Roman Experimental”)，《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伍蠡甫、胡經之主編。畢修勺、洪丕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224-259。
6. 巴爾札克 (Balzac, Honore de) (1998)：《巴爾札克精選集》。丁世中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7. 本間久雄（1972）：《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臺中：普天出版社。

8. 朱雙一 (2001) : 《戰後臺灣新世代文學論》。臺北 : 揚智出版社。
9. 呂正惠 (1988) : 《小說與社會》。臺北 : 聯經出版社。
10. 宋澤萊 (2007) : 〈台灣戰後的自然主義文學〉, 《第一屆臺日文學與城鄉意象研討會論文集》。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南華大學中日思想研究中心與國立台灣文學館聯合出版。pp.9-18。
11. 李慶本 (1999) : 《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美學》。北京 : 現代出版社。
12. 林增益 (1994) : 《王禎和小說創作風格析論》。南華大學文學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論文。
13. 姚一葦 (1974) : 〈論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 《文學論集》。臺北 : 書評書目出版社。pp.123-137。
14. 威勒克 (Wellek, René) (1988) : 〈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概念〉, 《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 : 四川文藝出版社。
15. 威爾克 (Wellek, René) & 華倫 (Warren, Austin) (1999) : 《文學理論》。梁伯傑譯。臺北 : 水牛出版社。
16. 柳鳴九 (2004) : 〈重新評估左拉的幾個問題〉, 《法蘭西文學大師十論》。上海 : 復旦大學出版社。pp.233-258。
17. 茅盾 (2004) : 《西洋文學通論》。上海 : 復旦大學出版社。
18.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1978)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上海 : 人民社會出版社。
19. 高全之 (1997) : 《王禎和的小說世界》。台北 : 三民出版社。
20. 尉天聰 (1979) : 〈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 《民族與鄉土》。臺北 : 遠景出版社。pp.187-190。
21. 彭小妍 (2006) : 〈是娜娜腐蝕了法國社會嗎〉, 《娜娜》。左拉著。臺北 : 桂冠出版社。pp.9-15。
22. 斯泰恩 (Styan, J.L) (2001) : 《現代戲劇理論與實踐》。劉國彬等譯。北京 : 中國戲劇出版社。
23. 楊逵 (2001) : 《楊逵全集》收錄於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北 :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24. 葉石濤 (1978) :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聰編。臺北 :

遠流出版社。pp.69-92。

25. 葉渭渠、唐月梅（2000）：《日本文學史》近代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26. 劉崇稜（1997）：《日本近代文學概說》。臺北：三民書局。
27. 劉毓秀、曾珍珍譯（1984）：《希臘悲劇》。臺北：書林出版社。
28. 廚川白村（1987）：《西洋近代文藝思潮》。陳小南譯。臺北：志文出版社。
29. 衛姆塞特（Wimsatt, William K）等（1978）：《西洋文學批評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顏元叔譯。臺北：志文出版社。
30. 盧卡契（1988）：《現實主義論》。陳文昌譯。臺北：雅典出版社。
31. 謝繼昌（1999）：〈中國家庭的文化與功能〉，《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主編。臺北：漢學中心印行。pp.69-80。
32. 鄔昆如（2005）：《西洋百位哲學家》。臺北：三民出版社。
33. 羅 鋼（1993）：《歷史匯流中的抉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三、期刊

1. 王道還（2002）：〈科學史上的這一個月——1869年2月，赫胥黎就職倫敦地質學會會長〉，《科學發展》350期。pp.75-77。
2. 賴松輝（2006）：〈日治時期臺灣自然主義小說理論研究：張梗理論與中國大陸、法國自然主義之比較〉下，《台灣文學評論》第6卷第2期。pp.107-136。

### 英文參考書目

1. Lukacs, Gorg (1978). *Writer and Critic*. London: Merlin Press.
2. Rimmon-Kenan, Shlomith(1983).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 Furst, Lilian R.and Skrine, Peter N.(1971).*Naturalism*. London : Methuen.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199-22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199-224

# 李炳南教授對淨土法門在台流佈之貢獻

吳麗娜 陳美惠\*

## A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rofessor Li Bingnan toward the spread of Pureland Buddhism in Taiwan

by

Wu Linuo and Chen Meihui

關鍵詞：李炳南居士、淨土法門、臨終關懷、助念、台灣佛教

*Keywords:* Li Bingnan, Pureland Buddhism, Dying care, Taiwanese Buddhism

---

\* 吳麗娜，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陳美惠，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提要〕

李炳南教授（1891—1986）山東濟南人，1949年蒞台後，在台灣默默推動文化紮根工作，並以淨土宗為專修專弘之志業，其踏上台灣土地之初，即發願要將彌陀聖號傳遍台灣。故創立了許多弘法事業，是台灣長期講經弘法先驅，更以「四為三不」為修行者樹立正知見。為使淨土宗法脈長流首建蓮社及佛教圖書館，又筵僧為在家眾傳戒建立人天師範、組織念佛班、助念團、推動臨終關懷助念。為佛教徒豎立優良典範，匡正世人對「避世學佛」之誤解。計其弘護正法在台首創開其先鋒者，有長期講經弘法；倡導結七念佛共修；結社念佛；籌建佛教圖書館、佛教醫院；辦理大專佛學講座，使佛教的流佈，由中下階層推展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推動臨終助念，協助志求生西之行者成就本願；提倡佛教婚禮與佛教喪禮移風易俗，37年之中灌溉耕耘，不僅促成了社會純善慈悲之風，亦增加了社會安定的力量，對淨土宗在台灣之流布有極大的貢獻。

## Abstract

The late Professor Li Bingnan (1891—1986), a native of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rrived in Taiwan in 1949. From then, he had devoted himself in planting the seed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oil of Taiwan. He especially focused his work in spreading the Pureland thoughts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wish of his was to pass the teaching and to allow the name of Amitabha to be chanted through the land of Taiwan. For this reason, He ha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to help the Dhama to be known. By the easy-to-remember slogan “Four-yes and three no”, he tried to lead the devotees to a right understanding of Pureland Buddhism. In order to secure the lineage of righteous teaching, a lotus society and a Buddhism library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him. Except for giving classes, he had also organized working groups such as Amitabha chanting groups to give blessings to the town people’s funerals. Asking for no return to his own benefits, Professor Li’s social work had helped people in thei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and hed helped correct the general misunderstanding toward Buddhism during earlier ages.

In summary, Professor L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many workshops and institutions of Buddhism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n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included Buddhism librari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orkshops for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who disrupted their schooling during their early age, and a hospital to help the poor. In the 37 years until his death, he had established a model for the Taiwan society to follow.

## 一、前言

李炳南教授，號雪廬，山東濟南人。據《李炳南先生事略》：「公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姓李氏，籍山東濟南，世居城內南券門巷，積善聚族，已歷三百餘年。」時人尊稱「雪公」、「炳公」或「李老師」。李炳南教授於亂世出生，當時世局動盪、宗教衰微，社會上更瀰漫著毀佛謗儒、仙佛不分之現象，在此惡劣環境下，其能盡其一生，於台海兩岸弘揚中華文化，提倡淨土法門，並於台灣行化時間長達37年，使「倫常道德」之價值顯露曙光、「淨土教法」普及三台。其濟世之功厥偉，法脈長流所及之處除了台灣本島外，也遍及東南亞及北美洲；其德澤利益於當世，更影響至90年代的台灣社會與文化。觀其個人行誼與濟世之德業與對淨土法門在台流佈之貢獻，真可謂民國以來學佛居士楷模第一人<sup>1</sup>，近來相關研究逐漸豐碩，以其行誼為研究範圍如吳麗娜《李雪廬炳南先生研究》、王見川〈李炳南與戰後初期台灣的佛教（1949~1952）〉，或就其儒佛思想層面作論述者如吳聰敏〈雪廬老人學術思想與貢獻〉、李榮輝〈雪廬老人儒學思想與實踐之研究〉、釋悟常〈李炳南居士之佛學思想〉、黃麗娟〈台中蓮社創始人李炳南及其儒佛教化〉、陳雍澤《李炳南先生儒佛融會思想研究》、董時〈儒學是人格學—李炳南教授的儒學觀〉，吳麗娜〈雪廬老人之生平及其淨土思想探究〉，就其詩作為研究方向有張清泉〈雪廬老人「山東古調」唐詩吟誦研究〉、顧敏耀〈搜腸嘔血識辛酸·天教留與後人看—雪廬老人李炳南在台詩作研究〉，而本文期望針對李炳南教授於儒佛思想之體現，對當時社會面、教育面、宗教面所做之具體貢獻作查考，依事顯理如實呈現其對淨土法門在台流佈之貢獻。

## 二、彌陀聖號遍傳台灣之宏願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後早與中國文化融合一體。佛教的慈悲與孔孟的仁義思想皆重視慎終追遠，故能相行不悖，出世、入世相輔相成。歷代之治亂、文化經濟之興盛衰敗，

---

<sup>1</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詩集·蔡念生序》（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11。



往往與宗教互為依緣。而東初老人以為：「佛教不僅是宗教也是哲學，足以砥礪民族氣節，陶鑄國民思想<sup>2</sup>。」李炳南教授亦持相同觀點，其舉孫中山先生所云：「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黨綱約法均載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sup>3</sup>。」為其弘揚佛教積極之背景，在民初時政變化急遽，以孔孟為本之中國文化與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和考驗之時，外有西方文化與外道攻擊與阻礙，內有「吃人禮教」、「全盤西化」之批判，又有「洪楊之亂」毀像焚寺之厄難、「廟產興學」之威脅<sup>4</sup>，這些迫害與摧殘，對中國社會道德導向及民智啓發產生深遠的影響，亦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後患。

於此內憂外患之際，有志之士，本著愛國護教、救人救世之心，毅然負起復興中華文化，弘揚佛法，搶救社會人心之重責大任。縑素二眾，各盡其力，僧眾之中，印光大師、弘一大師、太虛大師等弘揚正教，任重道遠，而居士之中以章太炎之「告佛子書」為護教，首先發起。更有歐陽竟無、楊仁山、范古農等維護正法，盡心盡力<sup>5</sup>。李炳南教授此時為復興文化，組織「通俗教育會」奔走於鄉里推廣中華文化，後更秉著印祖遺教，為重建佛教，努力不懈。

國民政府遷台後，李炳南教授亦隨孔上公隻身蒞台，因當時台灣於日本「皇民化」之統治 50 年中，「中華文化」已近乾涸，復興中華文化成為李炳南教授來台後之當急要務。而日據時期，台灣之佛教僧侶混淆的現象充斥，經懺佛事成為村夫民婦信仰的一部份，佛教出離三界，解脫生死之大義已流於形式。李炳南教授蒞台後見此情狀曾感慨地說：

市內寺廟，雖有七八處；但是守清規的，卻閉門自修；貪圖名聞利養的，就玩弄一些迷信事項。再就是錯認龍華外道，當作佛教。敲敲打打，唱一些破壞佛法的歌謠。真正信徒，能解能行的固然有人；而佛天鬼神分不清楚的，實在不少。請看他們的家庭差不多掛一張畫像，上有觀音、有媽祖、有灶君、土地等等。據這

<sup>2</sup> 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84年）頁3。

<sup>3</sup> 李炳南教授《弘護小品彙存·叩鳴集》（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1。

<sup>4</sup> 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頁2。

<sup>5</sup> 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頁3。

一張畫像，也就看出他的宗教思想。你若問他奉的是何教？他總自稱是佛教信徒！想不到日本自命為佛教化的國家，在台灣統制了五十年，竟然把台灣佛教，弄的這樣七亂八糟<sup>6</sup>。

面對佛教界留下的日本龍華佛教、齋教遺風，與佛道不分、神廟林立的台灣，他發出了以「願將彌陀聖號傳遍台灣各個角落」之宏願，並以此行願為要務。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之職，席不暇暖地展開儒佛弘化事業。推廣中華文化、弘揚正信佛教不遺餘力，為台灣文化建設筆路藍縷之時注入一股活水，也在台灣人民心中種下一顆顆彌陀種子，為台灣社會的安定與文化的傳承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 三、為修行者建立「四為三不」的正知見

孔子聖哲，以政治與教育實踐禮樂社會之教化，期使百姓安居樂業；大悲世尊降跡垂化，以清淨法轉移五濁，引導眾生離苦得樂。李炳南教授，護持孔子第 77 代哲嗣與孔府文物應緣蒞台，肩負文化傳承重責，又秉濟世度眾宏願，致力「揚儒弘佛」。在台除以推行社會教育、培養國家人才外，更以培植社會善良風俗為使命，冀樹立聖賢文化之傳承，歸淳民風。為振興正信佛教，李炳南教授長期講經弘法，更於所創辦之《菩提樹》雜誌中，以「卷首語」抵抗外教侵侮，鞭策教界宗風，導正視聽；後編輯成《叩鳴集》與《逆耳言》，續末法時期學佛者之慧命；又以婚、喪、喜、慶等風俗為媒介，做禮樂文化內涵之教化，倡依古禮辦理佛化婚禮、佛化祝壽、佛化喪禮等等，以「彌陀聖號」淨化人心。其於推展佛教事業時，面對種種外道之障礙，及教內之誤解、毀謗，而能無動於心，仍秉持「任重道遠」之襟懷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亦往矣」之豪傑精神，為革除惡俗作獅吼，化導人心。

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白衣學佛最忌僧不僧、俗不俗，或是對佛所制定之戒律與儀軌，死板不知權變，而成了佛呆；更有甚者，藉著佛法而牟一己之私利。有鑑於此，李炳南教授立下「四為三不」，作為學佛修道之標竿，更強調「白衣學佛不離

---

<sup>6</sup> 寄漚生（李炳南教授之筆名）——〈台中市佛化進展的大概〉《人生復刊》1 卷 2 期（台中，1951 年 3 月），頁 5。

世法，必須敦倫盡份」作為在家學佛處事之原則；其所提倡之佛化婚禮與喪禮，更可使儒佛文化內涵，如風行草偃般貼近人民生活，收潛移默化之功。為此，李炳南教授倡導「四為三不」之精神以表現出學佛人應有的本色。

李炳南教授本著儒家仁人及佛家慈悲精神，不募捐隨緣隨力，創辦「大專青年佛學講座」，免費提供學子食宿、講義及文具用品。但佛教在蓬勃發展後不免有人假借辦理佛學夏令營、佛學講座，貪名圖利，四處募捐，批販如來。於是李炳南教授特於大專講座期間樹立「講經之地，例禁募捐」標示，以此正本清源，正道人心。講經之道場，絕不擺設功德箱，或借辦活動斂財。為防止他人至道場募捐，破壞清淨修行，其於台中蓮社重建落成典禮開示時，特別強調：

蓮社只准研究學術，辦理慈善公益事業，再就是辦社會教育，在家人不許受皈依，收供養。……二十幾年來，我們蓮友自己有淨財，所有天災人禍，不論中外，只要力之所及，都盡量辦，一概不許勸捐，但是每次國家辦公益慈善事業，都先響應，公開請大家樂意捐助，數目多少，當時公佈<sup>7</sup>。

所以李炳南教授對所建立的道場律戒謹嚴，除了例禁募捐外，還特別以「四為三不」做為學佛人的原則。四為三不的內容如下：

## （一）四為

### 1. 為求學問

李炳南教授常勉勵學生，學者未成聖人，必須博學，以資推行仁慈之事業。古語：「一事不知，儒者所恥。」以有感而不知，故以為恥。所以求學問不但是做一切事業的基礎，也是弘法利生者所必需，因為一事不知，即是迷惑，辦事度眾必生障礙。除了世間法上處事待人之學問，更需以出世法上解脫生死煩惱的學問，自我充實，自利利他。

### 2. 為轉移污俗

學佛之目的，在於承擔社會責任，慈悲一切，為淨化人心盡己之力。今之社會，「人心惟危」，社會充斥歪曲思想，奪正成非。糾正歪風，革除不良風俗，為社會習尚注入清

<sup>7</sup> 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台中蓮社重建落成典禮開示》（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318。

流，是李炳南教授對學子，所賦予的現時責任。

### 3. 為求解脫

世間之學問，其旨無非為眾謀福利，解除煩惱痛苦。然世間之煩惱，考其實際，皆小者末者，其根本大苦，莫過生死輪迴。佛教的真正目的，在於解脫眾生之生死大苦，所以修行須求當生成就為標的，不為世間名利所惑。李炳南教授云：「佛陀應世之因緣，在了眾生之生死大事。諸生學佛，承此一因緣，方不辜負佛恩」<sup>8</sup>。

### 4. 為弘護正法

李炳南教授云：「佛法盛衰，人之盛衰也。道在人弘，非佛法與時合背。」所以社會之邪教魔道昌行，並非佛法不合時宜，而是學佛人未嘗真正發菩提心，以克念內修為務。若要佛法興，學佛人須發大乘心，以擔荷如來家業為己任。故其又云：「弘法必使受弘者知所重，護法必使被護者顯其尊。知重則受持心殷，顯尊則魔外自退<sup>9</sup>。」弘法乃於使學佛人知反躬自省，自尊自重，不徇物情；護法乃於使學佛人明修德為護教之急，是以嚴修戒定，三業清淨，乃佛面之榮光，反之「若問黑心人，念佛堂裡尋」，是佛法之侮蔑、毀壞。故弘法護法乃於學佛之人能受持三皈，規過遷善，而非談玄說妙，不務實修。至於衡量正法之標準，以佛經為依歸，李炳南教授一生講說經論皆以四依法為圭臬<sup>10</sup>，以「說法者離經一句，即是魔說」做為自他之勉。

## (二) 三不

### 1. 不以佛法受人利用

許多富有責任感卻對人情事故較不練達的學佛人，常在不自覺中便成為有心人士貪名圖利之工具。李炳南教授以儒家「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之處事原則勉勵學生。凡濟眾以利天下者，皆應提起佛家「大無畏」的精神，精勤不息，用智慧去抉擇<sup>11</sup>，而不以佛法受人利用。

---

<sup>8</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真了生死》（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39。

<sup>9</sup> 李炳南教授《弘護小品彙存·弘法護法》頁58。

<sup>10</sup>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四依法條：「一、依法不依人，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三、依義不依語，四、依智不依識」（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1992年），頁769。

<sup>11</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寓臺文存·叮嚀》（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245。

## 2. 不藉佛法，貪名圖利

名利乃求道者之致命傷，亦是道場變質之導因。李炳南教授云：「求道求名，兩相背馳，故真實人，必遠名聞利養。此關不破，遑能論道。昔蓮池大師，遠參遍融和尚，膝行再請，融僅曰：『守本份，不要去貪名逐利。』數語。退出，同行者大笑曰：『千里遠來，原來不值半文。』蓮師卻奉若拱璧，一生遵守，故其成就也大<sup>12</sup>。」學佛人不能藉佛法貪名圖利，否則便是失道。學佛乃為破迷啟悟，故須擇道固執，不為盛、衰、苦、樂、稱、譏、毀、譽八風所動，不為名利鎖所惑，小心戒慎，否則染上惡習，著了魔道，誤入歧途，戕害了慧命，唐捐其功<sup>13</sup>。

## 3. 不昧佛法，同流合污

我等眾生，流轉生死苦海，歷劫受苦無量，幸得佛陀放滅苦光，在黷闇中示解脫法啟以光明。學佛欲得成就，需具解脫生死知見，弘護正法，需闡明「解脫生死法門」方能暢佛本懷。《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勤修清淨波羅密，恆不忘失菩提心」，菩提心即求覺之心，唐朝澄觀大師注云：「若忘失菩提心，而修行諸善根者，是為魔業。」<sup>14</sup>故李炳南教授講經說法，必定強調「覺悟、解脫」之重要觀念，因佛法難聞，眾生因緣既以成熟，必使之明瞭，佛為導眾了脫生死大事出現於世之悲願，以啟解脫生死之心，而不為「三世怨」所纏。當時佛教表面極為興盛，但有人藉著辦活動來貪名圖利，或雖不為名利，卻不具解脫知見，而誤導修行方向。故李炳南教授，提醒後輩晚生，要不昧佛法本意，與世間不如法者同流合污。

而後雪門弟子皆以「四為三不，例禁募捐」為精神圭臬，奉行不逾，此風亦影響各地聯體機構，以為其團體之社訓。

<sup>12</sup> 李炳南教授《逆耳言·名之害》（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頁42。

<sup>13</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寓臺文存·慈光大專佛學講座第九屆開學講話》，頁234。

<sup>14</sup> 鄭聖揚居士整理《普賢行願品表解》（台中，雪心文教基金會，1990年），頁100。

## 四、依淨土宗教法在台首創之弘法利生事業

### (一) 長期講經弘法於台灣的第一人

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當時台灣於日本統治後，佛教界與一般中國傳統佛教差異極大。僅存一般神壇，或是已經變質的佛法。連橫在《台灣通史》中對日據前的台灣佛教有以下觀察：

台灣之佛教，則愈失之誣。緇徒既乏高明，檀信亦少智慧。其所以建寺造像者，多存邀倖之心，求福利而禳禍災也。其下者則墜入外道，穢垢心身，歷萬劫而不起，此其可哀也<sup>15</sup>。

政府遷台前後，雖大陸僧侶相繼來台弘法，但為期短暫，效果不彰。李炳南教授雖是白衣居士身，而其佛學源流接承淨土宗第 13 代祖師印光大師法脈，來台後，汲汲於尋覓弘法場所，推展弘化利生事業。他首先於寺廟、學校弘法。當時台灣的佛教界，雖偶有開辦法會，或請法師講經，但並無長期講經慣例。民國 38 年 4 月 1 日（1949），李炳南教授接受法華寺住持邀請，於法華寺首開經筵，開講《般若心經》，並由法華寺住持翻譯台語，經筵引起極大迴響，促成長期講經的因緣，李炳南教授成為在台長期講經弘法的先驅，對台灣學佛風氣的倡導，有極大的影響。

### (二) 首倡導結七念佛共修

由於法華寺開講《般若心經》弘法效果極佳，不少聽眾提出只聽教理但缺乏實修的問題，於是李炳南教授在講經之外再加上定期念佛，成立了淨土小道場，參與的人數漸漸增加。李炳南教授的宏化，也漸漸拓展到台中靈山寺，並在靈山寺開辦佛七。《民國佛教大事年紀》中，民國 38 年 12 月 7 日（1949）有如下的記錄：

---

<sup>15</sup> 連橫《台灣通史·宗教志》卷 22（台北市，台灣時代書局，1975 年 5 月），頁 656-657。

德欽尼法師於台中靈山寺組成念佛會，請李炳南居士弘揚淨土法門。台地結社念佛以此為始。<sup>16</sup>

從此以靈山寺為重心，講經時間最久，它也成為台中著名的念佛淨土道場。李炳南教授講經的道場，由台中法華寺開始，而後靈山寺、寶覺寺、碧山巖、慎齋堂、佛教會館，以及菩提場；當時也有神教鸞壇，敦請李炳南教授蒞臨講經，建立正確的知見，影響許多龍華教派及鸞壇信徒逐漸皈依法，如台中慈善堂、贊化堂、豐原龍意堂<sup>17</sup>皆是。

由於政局不安，又經歷戒嚴時期，使當時李炳南教授在弘法路上受到重重障礙。加以其山東腔調的語音，容易使聽眾產生隔閡。為了克服障礙，其甚至在講演稿上用反切注成古音閩南語，方便聽眾了解經典義涵，後逐漸培養翻譯人才，協助發揮弘法效益。起始弘法時，人們全然不解何謂學佛，更遑言學佛風氣，李炳南教授善巧接引，先以義診醫療，進而勸說因果，後導入佛智。初講經之時門可羅雀，李炳南教授仍繼續講，可是卻引來反對白衣說法的攻擊，及外教對佛教的破壞，講經之時，有人發傳單、拉人，甚至有請西樂隊、大鼓陣來打對台，干擾他講經<sup>18</sup>。種種評擊，誤解、毀謗、攻擊接踵而至，但李炳南教授不為障礙所困，其秉持著「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但能光照遠，不惜自焚身」的傳法使命，為利樂有情、弘護正法，不疲不厭地奔忙，數十年如一日；為復興文化、弘揚正教，精勤不懈地為眾演說佛法。直到大家受益了，反對的聲浪亦平息了，學佛的風氣也慢慢被帶動。

### （三）首建蓮社弘揚淨土法門

佛教東傳到晉朝，自廬山慧遠大師及諸賢人，肇基建立蓮社，專修淨土念佛法門，求生西方極樂淨土，淨土宗遂大宏於中夏，佛日固因而得以彰顯，而世風亦賴歸淳樸。

李炳南教授在台弘法以倡導淨土法門為重心，以解脫生死，往生彌陀極樂世界，當生成就為目的。要成就佛道，重在行解相應，福慧雙修。李炳南教授有鑑於當時台灣學佛風氣雖漸漸興盛，但於行解定慧，呈現不均衡之發展。為使蓮友於修行道上能解行並

<sup>16</sup> 《民國佛教大事年紀》，（台北市，海潮音雜誌社出版，1965年），頁272。

<sup>17</sup> 《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台中，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文物特展籌備會編印，1989年），頁13。

<sup>18</sup> 吳麗娜《李雪廬炳南先生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77。

進，正助雙修，使法務能順利推展，學道、共修有固定的場所，故深感建立道場，刻不容緩。且其久慕晉朝慧遠大師，結集蓮社的古風，故有效法東晉廬山諸賢，結社念佛修行，成就往生淨業之構想。民國 40 年（1951），首先由許克綏、朱炎煌等居士施資，買到了綠川南湄一間民舍，後又有眾多蓮友淨財齊輸，數年之後建成莊嚴的淨土道場—台中蓮社。

蓮社建成後，李炳南教授親手訂立十條社風：一、真心奉行教義，用智慧上求佛道，用慈悲下化衆生。二、力遵三皈五戒，雖未受戒，亦當發心守戒。三、深信因果，多積福德，勿爭名利。四、社內同修，不宜分黨分派，互相攻擊。五、不得兼修外道，使邪亂正。六、同教團體中，不問出家在家，凡有弘法事宜，必須讚歎擁護，不許嫉妒。七、除探討教義外，不議論同教中任何人之是非。八、凡遭毀謗，平心自省，有改無勉，不與人爭。九、要常覺知，自己道德、修持、學問，皆極淺薄，不可心生驕慢。十、要精進修持，積德求學，不惜心身二力，布施一切，爲衆生拔苦與樂。

社風的訂定旨在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積德求學，深信因果。又將蓮社社務區分爲三：一者、講演儒佛經典，化導人心。二者、集衆念佛，各求當生成就。三者、興辦文化慈善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以講演儒佛經典，化導人心，集衆念佛，各求當生成就，興辦文化慈善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爲主<sup>19</sup>。

其中不斷規劃發展到了民國 50 年（1961）時已有總務部、法務部、慈務部、國文補習班、裁縫講習班、救濟會、放生會、印經書會、助念會、念佛班聯誼會、護國祈禱會、兒童德育週、禮樂服務部、天樂隊、慈音歌詠團、四十八願等等之設立<sup>20</sup>。

從此念佛共修與弘法講經並進，恆無虛時，所以使得國內淨業修行者，大都雲集中台。一年之後，四方更有許多欣慕者，爭相效法，以致於南北名城，紛紛建立蓮社，甚至有重見於海外者<sup>21</sup>。

#### （四）筵僧為在家衆起建千人戒會

台灣佛教在日本皇民化運動統治後，蒙上佛教日本化陰影，正信佛教幾乎盪然無存。

<sup>19</sup> 《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頁 15。

<sup>20</sup> 台中蓮社職員名單（民國 50 年 11 月訂），資料來源參考自雪廬老人紀念館。

<sup>21</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寓臺文存·台中蓮社碑記》，頁 97。



台灣佛教的缺點，在於佛教徒生活沒有嚴格合乎佛制的規定<sup>22</sup>，日據時僧侶甚至有娶妻食肉之情形，而佛教中之三無漏學—戒、定、慧以戒為首，佛入涅槃前囑咐弟子「以戒為師」，守戒得定方能開慧。李炳南教授所創建之台中蓮社，雖為在家居士修行之道場，亦非常重視戒律，教導信眾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民國 41 年 1 月（1952），李炳南教授禮請大陸來台僧侶，天龍寺證蓮老和尚，為在家修行之優婆塞、優婆夷傳授三皈五戒，又於 44 年 6 月（1955），禮請本地高僧斌宗和尚傳授菩薩戒，以後則常請懺雲老和尚主持「布薩」誦戒。民國 49 年 6 月（1960），再度禮請證蓮老和尚啓建千人戒會於慈光圖書館，受戒者多達 1278 人<sup>23</sup>。由於李炳南教授對弘護正法不遺餘力，使在家眾亦能如法皈依受戒，對台灣正信佛法之推展，助益極大。

### （五）首先組織助念團提倡臨終關懷、助念

印光大師於《臨終三大要》中云：「世間最可慘者，莫甚於死，而且舉世之人，無一能倖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為之計慮也。」修習佛法，志求解脫生死，末法時期，惟依念佛一法發願往生極樂得辦。《佛說阿彌陀經》云：「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欲成就往生志業，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實為關鍵。李炳南教授云：「臨命終時，阿彌陀佛來了，要不顛倒才能往生，所以淨土宗裏才須要有助念團。」助念是怕臨終的工夫不足，身體病痛，八識田中愛怨種子不斷起現行，一糊塗，淨念斷了，容易障礙往生。但若有別人於旁念佛，臨終之人只要能聽見，心中提起佛號，使之不斷，即能成功。故唯有淨土宗有助念，別宗沒有助念的方法。李炳南教授更明白指出：「助念都是念阿彌陀佛，可沒叫你在那裏念這經、念那經，敲敲打打的，助念不弄這一套，外行才弄這套！……佛教徒不論平素念多少經，或多少咒，臨命終時，種子出來的，唯有阿彌陀佛四字才有用，才能幫助往生。」故李炳南教授首先於民國 50 年（1961）成立台中蓮社時即設立了念佛班、助念團，並設有四十八願化導部，到了民國 61 年時，聯體機構中已組織有六十餘單位的念佛班及往生助念團，如法遵守助念儀規，是為台灣提倡臨終關懷助念之先驅。

助念的方式則謹尊印光祖師於《臨終三大要》中所示：「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

<sup>22</sup> 闕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台灣，大千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358。

<sup>23</sup> 《菩提樹》，第 92 期，（台中，1960 年 7 月）頁 14-15。

一切，概不宜用。引磬聲清，聽之令人心地清淨。木魚聲濁，故不宜用於臨終助念。……又宜念『阿彌陀佛』四字，不念『南無』，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隨之念，或攝心聽，皆省心力。」李炳南教授於台中蓮社成立助念團時，特別說明助念之意義與規矩云：「一聲阿彌陀佛，三乘皆包括。重要在能引起病人的佛號，功德就無量了。」

李炳南教授於〈台中蓮社成立助念團講話〉中對助念規矩有嚴明的訓示：「助念時，要遵守規矩。家人千萬不能出來打擾，亂出主意。人死了不要圖什麼熱鬧。助念團來到家中，可以準備茶水，其餘均不用準備，助念者必須注意二點：一、自己吃飯，不麻煩別人，只喝茶可以。二、萬不可收紅包，此絕對不可破例。萬一破規矩，變成不給紅包就心不在焉，不誠心念，助念變成去賣錢，這是破壞佛法。連收人東西也不可以，在家人去助念，拿錢就是造罪業，拿人紅包這助念團就完了。大家要學印祖，否則是叛徒，不遵守規矩就是欺師滅祖<sup>24</sup>。」

從民國 46 年（1957）至 95 年底（2006），橫跨半個世紀，經雪心文教基金會（李炳南教授所創辦）助念往生極樂世界，並茶毗得舍利子的修行者，總共有 299 位，其中男性 120 人，佔百分之 40；女性 179 人，佔百分之 60。往生修行者的平均年齡約 75 歲，超過百歲的有 2 位，年齡最長的 108 歲；年紀最輕僅 10 歲。近 300 位往生的修行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富貴中人，亦有貧無立錫者；有不識字的愚夫愚婦，亦不乏高級知識份子；有多年學佛的老修，也有臨終前幾天，遇善知識開示而念佛往生的有緣人。這些證據，顯示出念佛法門的平等與殊勝，亦可看出臨終助念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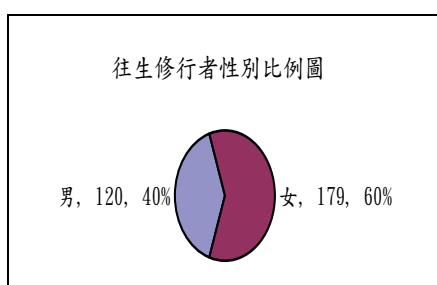


圖 1 往生修行者性別比例圖<sup>25</sup>

<sup>24</sup> 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助念之意義與規矩》，頁 279。

<sup>25</sup> 此圖表資料數據來源引用自雪心文教基金會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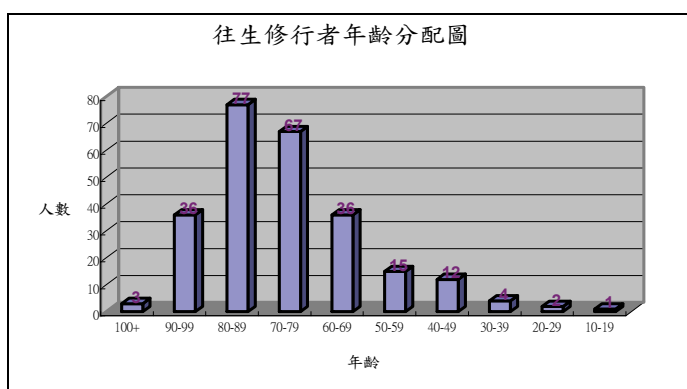


圖 2 往生修行者年齡分配圖<sup>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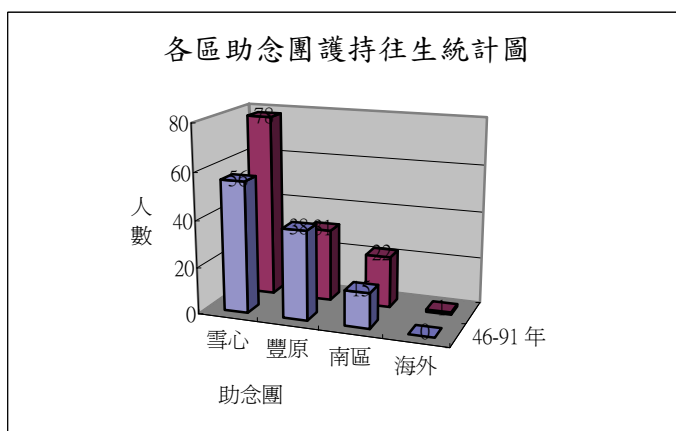


圖 3 各區助念團護持往生統計圖<sup>27</sup>

助念團的成立成就了許多蓮友的道業，目前除了雪門弟子繼續推廣臨終關懷及正確助念方式之外，更影響台灣全省各地佈教所及念佛會組織助念團，如今已推廣至馬來西亞、美國等海外地區，甚至不同宗派的佛教徒也開始正視臨終助念之重要性。

## (六) 提倡佛化喪禮

有情世間生、住、異、滅的六道輪迴，是人生的真諦，生命輾轉在生死苦海中頭出頭沒，「生死事大」是覺悟修行者案頭的箴銘。而死生的交替，是沈浮的關鍵，軀體雖與草木同朽，神識卻受行業牽引受報。人一旦命終後，神識尚未投生前稱為中陰身，中陰

<sup>26</sup> 同上註。

<sup>27</sup> 同註 25。

身的壽命七日一變化，最多經七次的變化，當業定後即去各道投生受報。然這段期間如果家中眷屬為亡者念佛修福追薦，亡者就能受用其功德而超生善道。所以自古以來中國人家屬過世，喪葬大事包括小殮、大殮和告別式；此外，還有作七、做百日、做對年的習俗，並守喪三年。孔子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為儒家對孝的表現，故由小殮到滿七的 49 天稱為慎終期，而後稱為追遠期。慎終追遠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涵，而佛教中亦強調孝親報恩是做人的根本，佛經上比喻「一肩荷父，一肩荷母，從劫至劫，不少休息，也不能報恩萬一。」《觀無量壽經》中之「淨業三福」，第一福即教導眾生要孝養父母，孝養父母的方法，儒家以禮為對，佛家則以幫助父母出離生死為首要。

李炳南教授來台後，提倡佛化喪禮，主張由臨終關懷、助念到告別式的家祭、公祭、做七、百日、對年等，皆遵循古禮辦理，三牲祭品改為素齋花果，也勸導家親眷屬於七七四十九日之間能茹素，為亡者祈福。喪事過程純以念佛功德回向亡者，不做別佛事，請阿彌陀佛慈悲願力攝受，協助生死交關的眾生，出離苦海。時下喪葬儀式中之殺生、鋪張浪費、敲敲打打，或做一些破壞善良風俗、違禮的事，對社會人心產生許多負面的影響。念佛非但莊嚴了喪葬禮儀，轉移社會不良污俗，更令存亡兩方受益無窮。

## （七）首辦大專佛學講座接引大專知識青年學佛

大專青年接觸佛法雖早在民國 39 年（1950），南亭法師繼慈航法師之後，在台北民本電台開播「佛學廣播」。民國 41 年（1952）周宣德居士、李用謀居士與鄭崇武等居士成立中佛會廣播組，敦請各方縉素大德撰寫適合大、中學生程度的講稿，每天早上廣播半小時，這是佛學與知識青年接觸的開端。47 年（1958）周宣德居士開始捐印《八大人覺經》，後附梁任公所撰「佛教之特色及其價值」及尤智表所撰「佛教之入世應用」二文，廣贈大專同學，並設立獎學金，徵求研讀心得報告，激起了大專學生學佛的風潮，也奠定了各大專院校自組社團研究佛學的基礎。其中首先籌劃成立的是台大慈光學社（後改為晨曦學社），而後有師大中道學社及中興智海學社等，都在 49 年（1960）先後組成，繼之有政大等校社團相繼成立。由於佛學的薰陶，對青年同學思想上之啓迪，生活上之改善，毋待贅言，而皈依佛門者，亦實繁有徒<sup>28</sup>。

<sup>28</sup> 周宣德《明倫月刊，大專學佛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及對明倫月刊的展望》，第 0 期（台中，明倫社，

周宣德居士，在台北倡導大專青年學佛，雖然成績斐然，但真正有系統為大專青年奠定學佛基礎的是民國 50 年（1961）李炳南教授所創辦的「慈光學術講座」。「慈光學術講座」緣起於民國 48 年時，因有部分糖廠員工開始學佛，影響當地居民子弟林敏雄等幾位同學，前來拜訪李炳南教授，聆聽其開示後，法喜充滿，後便邀集包括中興大學王國光等數位同學，利用假日來向李炳南教授請益佛法。李教授除為他們開示佛法，並致贈佛書，林敏雄等回校後便積極推動籌設台大慈光社（晨曦學社），故有推動籌辦慈光講座之因緣<sup>29</sup>。當時為接引知識青年，深入佛學殿堂，在課程中有李炳南教授統攝佛學精華、入門要領，親編《佛學概要十四講表》，並為暑假的初級班，廣開《佛學概要十四講表》、《佛說八大人覺經》、《唯識簡介》、《般若心經》、《佛說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等六門課程。李炳南教授則親授《佛學十四講表》與《阿彌陀經》；寒假高級班則親授《大乘起信論》、《彌陀要解》。當時擔任教授者除李炳南教授之外，還有許祖成、郝恩洪、劉汝浩、徐醒民、周家麟等幾位宿儒大德，有系統地為大專學子奠定學佛基礎。當時參加者皆是各校佛學社團幹部，參加講座之後，回到學校必須複講給未能參與之社員聽，並在社團中成立「佛學概要十四表研討會」，形成研究佛學風氣。「慈光學術講座」後改為明倫大專佛學講座，其中培養了不少人才<sup>30</sup>；講座自 53 年起至 58 年（1964-1969）暑假止，舉辦了九屆，每屆為期 2 週至 4 週之久，先後結業的同學多達 576 人（參加旁聽者尚不計在內），代表之大專院校甚多。近千人之受訓同學中，許多皈依三寶，而且離校後學成致用，留在國內任教或就業，對正法之弘揚亦不遺餘力。李炳南教授多載辛勤，在社會上發生了不少效用，使佛教的流佈，因知識份子的投入，由中下階層推展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 （八）籌建全台首座佛教圖書館

李炳南教授云：「國家興替，事有百端，民族團結，乃其根基。查其團結原素，血統之力實微，而文化確握其樞紐也<sup>31</sup>。」中華民族自漢武獨尊儒術以來，禮樂倫理文化形

1970 年 10 月），頁 31。

<sup>29</sup> 資料引自鄭勝陽先生（李炳南教授親沐弟子，現任雪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口述歷史採訪稿。

<sup>30</sup> 《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大事年表未定稿》，頁 31。

<sup>31</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寓臺文存·台中佛教文化圖書館籌設緣起》，頁 113。

成道統，歷代以來雖有外族入主，然普為文化所統。漢化之功，禮樂居首。佛教東來，與中華文化相照交融，更顯璀璨光耀，數千年來，外儒內佛，乃成社會文化之習尚。然民初五四運動以來，儒學道統遭受橫挫，影響所及，佛亦共同遭厄，人民失其重心，社會風氣又為歐風唯物思潮所淹，乃至失國失土，華夏易色。政府遷台以來，固有文化之復興，為當局所倡，儒術重興，指期可待，然日據五十年之間，語言文字概受管制，文化土壤乾涸，當時推動文化，以教育為先，然潛移默化則圖書之功不可沒。光復之後，設有省立圖書館一處，然其勢有供不應求之感。李炳南教授施教，一向弘儒揚佛，冀依儒學齊之以禮，佛教攻導人心，復人性之光明，而佛徒愛國，向不後人，文化復興人人有責。惜佛教之經典，亦因連年燹火，而文獻凋殘。幸於民國 44 年 8 月（1955），全台由蔡念生居士發起，與當時學佛大德大力促成影印《大正藏》之議，並舉行環島宣傳。李炳南教授深感此乃續佛慧燈之舉，事歎稀有，故與志同道合友人，集資預約請得三部；並廣搜典籍，冀以五明萃科哲之精英，因果澈福禍之底蘊，救時弊復人性之元明，而重伸正道。為安置藏經法寶，及方便群眾閱覽，更規劃將來能推行眾善事業，乃有佛教文化圖書館籌設之計畫。

民國 46 年 9 月 6 日（1957）計畫呈奉教育部准予成立後，便苦心籌畫，而後各界賢達聞知，咸爭相樂輸淨財，購得柳川西涓汽水工廠舊地，改其低窪狹窄為高廣光亮，整修規劃，終於民國 47 年 5 月 25 日（1958）正式成立開幕，名為「台中佛教文化圖書館」，後改名為「財團法人台中私立慈光圖書館」，是為全台首座佛教圖書館，亦是台灣佛教關建圖書館之濫觴。

圖書館以「增進國民知識，闡揚佛儒文化，輔翊民族固有道德，協助政府推行社會教育，助成社會淳厚風俗，以期民德厚培，國本永固。」為成立宗旨<sup>32</sup>。並規劃舉辦學術演講、收容孤兒、施予貧病醫藥、義務夜學、棺殯施捨、年關調米、冬令放衣、天災人禍緊急救濟等要務。圖書館落成後，於典藏方面以佛學資料為主，其中以大藏經、二十四史、四部備要、傳記、經律論註解、佛教儀軌、佛教文學、宗派專書、佛學雜誌期刊及現代科學、哲學等圖書為主要，旁及儒、道等書籍。除一般圖書館業務外，還有講經、共修、助念、急難救助、辦理內典研究班，及大專青年佛學慈光講座等研習活動，

<sup>32</sup> 台中私立慈光圖書館章程，第二章宗旨；王炯如《慈光·本館簡介與展望》（台中市，紀念雪公恩師示寂七週年專輯，1993 年 5 月），頁 16。

並附設托兒所。李炳南教授於每星期三晚間，在圖書館講經，聽眾恆在 400 至 500 人左右，自始至往生前一月，常年不輟，曾講《地藏經》、《金剛經》、《維摩結經》、《法華經》、《楞嚴經》、《圓覺經》，及《華嚴經》，故慈光圖書館在當時不但成為專弘淨土宗念佛法門的重要道場。更因其利益民衆的層面普遍與多元，使得佛教文化漸漸融入人民的生活之中。

### （九）成立台中佛經注疏語譯會與內典研究班

台中佛經註疏語譯會與內典研究班之成立，源自於「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與李炳南教授的一段因緣。沈居士為留德、留美之學者，在美國發心度眾，希望在西方社會弘揚佛陀正法，於是成立「美佛會」，除了美國的華人社會，更希望將佛法介紹給西方人士，但因為佛經並無英文譯本，弘揚的過程中，深感無力，所以希望推展英譯佛經一事。後來在新竹設立「譯經院」，聘請兩位科學家，許巍文居士與戈本捷居士，負責尋找適合人選，將中文佛經翻譯成英文；其間也曾經延聘各大學中精通英文之教授與翻譯家參與協助，可惜所翻譯的內容，經行家鑑定，仍無法採用。

然沈居士並不因此放棄，仍請許、戈兩位居士繼續在台訪求高明，後因戈本捷博士之夫人在嘉義學佛，經常閱讀李炳南教授之《佛學問答》，便建議戈居士訪求李炳南教授，協助英譯經典一事。許、戈二位居士在深入拜讀《佛學問答》之後，驚異佩服，便相偕至台中，求見李炳南教授，相談之下，促成了「台中佛經注疏語譯會」之設立。民國 63 年 2 月（1974）開始，由沈家楨居士提供經費，李炳南教授負責辦理，當時為了節省經費，所以人事架構極為簡單，由陳修善居士擔任秘書，鄭勝陽居士擔任總務兼會計，張進興居士擔任幹事，並聘請一位工友。按件計酬，延請許多學養俱優之僧眾、居士參與。語譯會之工作，係選藏經中之經論，翻譯為語體文，但幾經開會後，以經文非證果者不能譯，決定翻譯經論之注疏，冀初機學者由此得以深入經藏。而後為造就佛教人才，又附設了「內典研究班」，選才 7 位，資格為大專院校畢業者，分二階段，計 4 年，全職深研經藏，培訓弘揚佛法人材。自 63 年 8 月（1974）開學，聘請蔡運辰、周慶光、王禮卿等儒學、佛學大家前來授課。然歷經兩年，英譯經典一事，仍毫無成果，參與翻譯之大德表示，若將明、清時祖師所作經典之疏鈔，翻譯成現代白話文，文字或可翻譯，但是其中所含藏之境界，無法言傳，感到極為慚愧。故英譯經典一事並無成功，之後李炳南

教授又將幾年來所報銷之經費，回捐給沈老居士美國道場<sup>33</sup>。

佛法難聞，中土難生，佛教東傳來華，由梵文翻譯為中文，主譯者皆是有道高僧大德，而譯經大業更是當時國家盛事，佛學博大精深，言簡意賅，故說：「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吾等有幸得聞佛法，且是當生成就的淨土法門，應慶幸並珍惜這「百千萬劫難遭遇」殊勝因緣。

## （十）建設首座佛教醫院

李炳南教授除首先以民間力量施醫、救災之外，其為拔眾生苦之悲心流露，更應時之所需，成立了菩提救濟院，在〈菩提救濟院簡介〉中，可窺其成立初衷：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生、老、病、死；這四個大問題，即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也解決不了。唯有借助佛法探得人生真相，或可獲救於萬一。不過『病』和『老』是非常現實的，它們夾在『生』『死』之間，需要以佛陀救世救人的精神，拔苦與樂，然後導入真相，了生脫死，始免於永劫的沉淪。本院同仁有鑑於此，基於佛陀精神的感召，為報佛恩，為救眾生，為解決人生四大難題，不辭艱難，於是有菩提救濟院之依法成立焉<sup>34</sup>。

佛陀曾說「四事供養」包括：衣服、飲食、臥具與湯藥。湯藥為祛病療癒之必需，人身為四大假合之體，偶有疾病，必須住院醫療。當時一般普通醫院，於茹素飲食上發生困難，而戒殺護生，為佛門弟子行持之一，一旦入院，往往無奈破戒；當患者病篤，醫院首重急救醫療，或灌藥，或注射，或電擊，病人若於痛苦中斷氣，容易失去正念，障礙往生解脫大願；命終之後即刻送入太平間，若要求助念概所不許，而臨終助念為淨土行者能否往生之至要關鍵。故於持齋立場、送亡立場，皆應有籌建佛教醫院之必要性。再者一般公私醫院並非救濟院，繳款入院為例規所在，窮困衣食不繼而貧病交迫者，往往求助無門，真謂人間慘境。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佛教以慈悲為本，更應積極推展救濟事業，故李炳南教授本著儒佛仁慈濟世之精神，首先於民國 51 年（1962）籌建「佛

---

<sup>33</sup> 同註 29。

<sup>34</sup> 〈菩提救濟院簡介〉（台中，菩提救濟院董事會印行，1966 年 2 月），頁 1。



教菩提醫院」，以施醫濟貧造福世人，在眾多大德的護持下，先於台中市台中路 26 號，設施醫門診，52 年 4 月 8 日（1963）佛誕節開幕，擬試辦二年，以救世活人為宗旨，為佛教四眾及台中市貧病市民服務。創立時並為醫院立下四種誓願為大眾服務：

1. 施診施藥——不分任何宗教，凡有疾病，家貧無力醫療者，本院概予施診施藥。
2. 精神安慰——預防護士忙碌之時，伺候病人或不周到，由發心蓮友組織慰問團，輪流在病房服務，使病人得到一切便利。
3. 祈禱法會——建設佛堂，定期共修，專為樂捐善士，及來診病人，消災延壽。
4. 助念往生——住院病人，形壽盡時，凡有佛教信仰者，移入佛堂為之念佛，助生極樂。

診所雖小，五臟俱全，由 52 年 4 月到 54 年 4 月（1963-1965），統計醫藥費全免的受施診者，有一萬六千餘人、醫藥費半價的義診者有一萬八千餘人，共計三萬五千餘人。後應各方之期盼與樂捐，於市郊台中縣大里市，鳩工闢材營建房舍。並於 53 年 10 月 28 日（1964）立案為菩提救濟院，菩提救濟院的宗旨為發揚佛教慈悲精神，協助政府推行社會救濟事業。60 年 7 月（1971）奉政府通令改為今名—菩提仁愛之家。擬定發展之業務有醫院、安老所、施醫所、保嬰所及佛教善果林等事業，計劃逐步完成，此是佛教在台灣對社會大眾慈善事業之開端。

救濟院本著佛教慈悲大願，施診，施藥。並計劃在其中，設祝壽堂，供佛像，分期講經說法，來調和病人身心，增其福慧。及設聖蓮室，提供壽命終時，助念往生之場所，幫助眾生解決人生最終之大事<sup>35</sup>。後皆一一實現其悲願，事業發展概況如下：

1. 佛教菩提醫院——於 54 年 4 月（1965）興工，建有 3 樓醫療大廈一座，門診及住院各科具備，為綜合救濟醫院。除一般營業外，並配合施醫所辦理施醫，以濟貧病之苦。營業之盈餘，則支援安老所等救濟事業。
2. 施醫所——設於救濟院功德堂，做施診與義診，凡政府登記有案之甲級貧民，或佛門四眾與一般社會貧民，貧病無力醫療者，發給施醫券，病患可持往菩提醫院就醫，醫藥費全免；而生活困難者，則發予義診券，醫藥費僅酌收成本。
3. 安老所——民國 55 年（1966）落成，現有二層樓房二棟，收養貧苦無依老人，使其安享天年。男、女老人分樓安住，各人均有單人寢室。另有養心堂，及 61

<sup>35</sup> 李炳南教授《雪廬寓臺文存·籌建佛教菩提醫院歡迎樂捐宣言》，頁 238-240。

年元月（1972）啓用的耆德樓，專供老年佛教徒公費或自費安養修持，設施完備，先後收容五十餘位老人。

4. 兒童福利——民國 60 年（1971）星洲華僑鄭真如居士，為紀念其先師寶松和尚暨其親人，鼎力發心捐建寶松和尚紀念療養院，救濟院以「寶松和尚紀念療養院」三樓大廈一座，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合辦小康計劃兒童福利中心，推展兒裡福利事業。
5. 佛教善果林——設「太虛紀念館」，是救濟院精神中心，內設講堂以供共修或講演佛法之用，並陳列佛教圖書以供院內病人，作安定精神之用，李炳南教授每星期四晚間在此講經，常年不輟，聽眾恆在三百餘人左右。
6. 西方聖蓮室——在「太虛紀念館」右側，有一遍植蓮花的蓮池，池中央矗立一座圓形蓮座式建築物，即西方聖蓮室，室內供陳西方三聖像，四壁繪上極樂勝景，一旦臨終病人世緣將盡，即可由蓮友為他助念，助其安詳往生。

此外，尚有靈巖書樓，作為學術上之研究室；功德堂專為出資捐建者與住院診療者，朝夕課誦回向，每年並定期舉辦各項社會救濟。菩提救濟院，對當時之社會貧病百姓，猶如闇夜明燈，顯露曙光，對社會人民之貢獻巨大，不可計量。而其中更可見時下所倡導之「臨終關懷」、「安寧飭終」，李炳南教授於 30 年前即已高明首倡矣。

## 五、結語

佛依眾生根機，教八萬四千法，化導使其離苦得樂，了脫生死輪迴。《法華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此大事即指生死大事，佛法三藏十二部經典，無非為眾生指點生死大苦迷津，但因眾生根機有利、鈍之別，且法運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時。即凡一佛出世，以其佛為本，立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此三時可作為擇法修證之助。

如今去佛世已二千多年，依前所述三時年限，正當末法時期，李炳南教授擇淨土法門專修專弘，除恪守世尊於《大集經》中金口所宣：「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惟依念佛，得度生死。」的遺教，更依照印光祖師所示「九界眾生離是門，上難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難普度群萌。」是故李炳南教授雖教演三藏，行則專尚彌陀，不論

宣講那一部經論，最後必定指歸淨土，且常自云：「講經三十幾年，數十部經典，其實只講了一句『阿彌陀佛』。」，或人有微辭曰：講述經典，往往導歸念佛法門，失去原經典深意。實其不然，要知三藏經典，皆歸於「戒、定、慧」三無漏學，而戒、定、慧更統攝於一個「淨」字，念佛法門正是成就「淨」之捷徑。因為念佛而得三昧，則一切智慧更不用他求；念佛而得生西，則一切諸行悉在其中。所以《淨土聖賢錄卷六·智旭傳》中蕩益祖師說道：

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癡，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閒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為他歧所惑，即大智慧<sup>36</sup>。

而印光祖師於〈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亦說：「須知律為教禪密淨之基地，若不嚴持禁戒，則教禪密淨之真益莫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固，則未成即壞。淨為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法門。」所以李炳南教授教演三藏以攝受群機，歸於淨土以引導其行，更見其悲願之深重，因為其深知「惟眾生修行成佛，須經三大阿僧祇劫，而末法眾生，於五濁惡世，修學尤其困難，若求當生成就，必修念佛法門，先求往生西方，以期不退，始有成佛之望。」

當李炳南教授由基隆港踏上台灣的土地時，即發願要將彌陀聖號傳遍台灣的各個角落，在台以淨土宗為專修專弘之推展，其所倡導組織念佛班，及推動臨終關懷助念，組織助念團，提倡三代同修，是以在家居士身份，在民間推動宗教、教育與慈益事業的先驅，計其在台灣為弘揚淨土法門，所創辦之慈悲事業中，首創開其先鋒者，有長期講經弘法於台灣；首先倡導結七念佛共修；首先以民間力量辦理施醫、救災；首先在台建立蓮社結社念佛，修行淨土法門；籌建全國第一間佛教圖書館；創建全國第一間佛教醫院；首倡大專學生學佛開辦大專佛學講座，更首先在台提倡佛教婚禮與佛教喪禮移風易俗；

<sup>36</sup> 《淨土聖賢錄卷六·智旭傳》（台中，青蓮出版社，1996年3月），頁220。

於台灣首先提倡並實行臨終助念，協助志求往生之信願行者成就菩提；創設台中佛經注疏語譯會；培養佛學研究弘揚人才設立內典研究班；首先倡導三代同修組織佛化家庭等等。由於他長期大力的推廣與弘揚，使佛教思想、彌陀聖號由中下階層的流佈，因知識青年之投入，而能推展到社會的各行各業；李炳南教授的大願大行，不僅弘揚了正信佛教亦為台灣社會昌明了倫理；增加了社會環境安定的力量，對淨土宗於台灣的流布有極大的貢獻。

## 參考書目

### 一、李炳南著作

1. 李炳南，《佛學概要十四講表》，台中：青蓮出版社，1993年5月。
2. 李炳南，《阿彌陀經接蒙義蘊合刊》，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3. 李炳南，《大方廣佛華嚴經表解》，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4. 李炳南，《佛說四十二章經表注講義》，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5. 李炳南，《無量壽平等覺經眉批》，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6. 李炳南，《佛學問答類編（上）、（中）、（下）》，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7. 李炳南，《講經表解（上）、（下）》，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8. 李炳南，《大專佛學講座初級教材》，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9. 李炳南，《弘護小品彙存》，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10. 李炳南，《修學法要》，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11. 李炳南，《雪廬述學語錄》，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12. 李炳南，《逆耳言》，台中：青蓮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13. 李炳南，《雪廬老人淨土選輯》，台中：青蓮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

### 二、專書

1. 《民國佛教大事年紀》，台北：海潮音雜誌社，1965年。

2. 《菩提救濟院簡介》，台中：菩提救濟院董事會，1966年2月。
3.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台灣時代書局，1975年5月。
4. 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84年。
5. 《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台中：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文物特展籌備會編印，1989年。
6. 鄭聖揚，《普賢行願品表解》，台中：雪心文教基金會，1990年。
7.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2年。
8. 《淨土聖賢錄卷六》，台中：青蓮出版社，1996年3月。
9. 闕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台灣：大千出版社，2004年4月。

### 三、學位論文

1. 吳麗娜，《李雪廬炳南先生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2. 陳雍澤，《雪廬老人儒佛融會思想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四、論文

1. 寄滙生，〈台中市佛化進展的大概〉，《人生復刊》，第1卷第2期，台中：1951年3月。  
《菩提樹》，第92期，台中：1960年7月。
2. 周宣德，〈大專學佛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及對明倫月刊的展望〉，《明倫月刊》，第0期，台中：明倫社，1970年10月。
3. 王炯如〈本館簡介與展望〉，《慈光》，台中：慈光圖書館，1993年5月。
4. 釋悟常，〈李炳南居士之佛學思想〉，《慧炬》第395期，台北：慧炬雜誌社，1996年。
5. 王見川，〈李炳南與戰後初期台灣的佛教（1949-1952）〉，《台灣歷史學會通訊》，第9期，1999年9月。
6. 黃麗娟，〈台中蓮社創始人李炳南及其儒佛教化〉，《國文學誌》第8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2004年6月。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225-24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225-244

# 孤絕與再生——從白先勇筆下到曹瑞原 鏡頭下的《孽子》

許建崑\*

## Desperation and Rebirth ——“Crystal Boys,” from Hsien-Yung Pai’s Novel to Ruen-Yuan Tsao’s Camera

by  
Chien-kun Hsu

關鍵詞：孽子、權威與忤逆、孤絕與再生、文本與再創、大眾文化

*Keywords:* Crystal Boys, authority and disobedience, desperation and rebirth, native and remake, popular culture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提要〕

白先勇的《孽子》故事背景在 1970 年，主角李青是個高三學生，眷區長大的小孩。父親軍職退伍，對他要求甚多；母親則年紀輕輕，寵愛弟娃，對他卻很疏遠。然而母親與樂團小喇叭手私奔，弟娃意外死去，李青受到刺激，被實驗室管理員性侵，又被學校開除。父親大怒，將之逐出家門，因此流落到新公園的同性戀圈子之中。這個悲慘的故事，係因父親生涯中挫，失去了自尊與經濟力，孤絕於社會。而孩子李青在無助的環境下，走上不歸之路。然而白先勇又創造了楊教頭師父，試圖帶領這群無助的孩子從困境中自拔再生。

時隔三十餘年，青年導演曹瑞原，將故事以電視連續劇的方式搬上銀幕。對於故事與當時社會的觀察了解，顯然有了不同的認知。

本論文試圖了解當年父子間的親情表現，以及父權作崇下的父子緊張關係。孤獨絕望，對李家每個人而言，都必須忍受不同層次的痛苦。

也嘗試（1）再現 1970 年代父子間的緊張關係（2）探討白先勇筆下提供李青再生的機會（3）探討導演曹瑞原透過鏡頭對白先勇原著的再生（4）探討在大眾文化的前提之下對故事結局安排的意義。

## Abstract

The story background of Hsien-Yung Pai's novel "Crystal Boys" is based on the 1970s in Taiwan. The protagonist in the story, Ching Lee, w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his senior year that grew up in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Ching's father was a veteran, and was a very demanding parent. His mother was young and did not care much about him while coddling his young brother all the time. A series of mishap then had stroked Ching deeply -- his mother eloped with a band trumpeter, and his young brother died in an accident; he got sexually assaulted by a library manager, and was expelled from the school. His father was extremely upset and kicked him out of the family home. No place to go, Ching then



wandered at a public park called “New Park,” a homosexual cruising area where he met other primary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is story was resulted from a father who failed to maintain a career and lost his pride and the ability to live well in the society, which made his son to take a furcated path without turning back. There were still, however, some hopes -- Pai did not forget to create a senior character who attempted to guide Ching to be reborn.

After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 young director, Ruey-Yuan Tsao, had remade this novel to a drama series on television. It is obvious that Director Tsao had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story based on his social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ed to illustrate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ather and a son at the 1970s, and the tensions and impacts resulted from the paternalism. With loneliness and desperation, every member of Lee’s family had to suffer and sustain different levels of agony. Furthermore, I also attempted to (1) reconstruct the tensions generated between fathers and sons during 1970s, (2)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Hsien-Yung Pai provided to Ching Lee to be reborn, (3) discuss the rebirth of the original “Crystal Boys” under Ruey-Yuan Tsao’s camera scene, and (4) discuss the meanings of the story’s ending based on popular culture.

## 一、前言

去年十二月，邀請導演曹瑞原、編劇陳世杰連袂來東海演講，題目是〈當文學遇見電影：文學與電影的對話〉<sup>1</sup>，討論文本原著與影視媒體的再創，希望了解作者、劇作家與導演間的關係，也關切文本與讀者、觀眾間的互動。在兩位主講人的敘述中，可以知道他們對《孽子》、《孤戀花》的文本、編劇到導演演出，曾有詳細的討論。當作品以電視連續劇的方式重現於電視螢幕上，竟可以逼肖於原作；而作者白先勇也有恢宏雅量，容許劇作家與導演自由的揮灑。相互諒解，攜手合作，直可說國內最佳榜樣。讓我在觀賞電影片段之後，燃起閱讀原作的想望。

我反覆看了電視劇集，在網路上閱讀許多報導，也逐篇去讀影劇愛好者的觀劇日記。動念寫「原著與電影比較」的論文，翻查期刊論文資料，發覺《孽子》已經引發好幾波討論的熱潮。

1983年《孽子》第一次由遠景出版社發行單行本，應鳳凰、蔡源煌首先發表了評論。次年，周浩正主編的《新書月刊》，五、六兩期，袁則難、龍應台參加討論。以後幾年，均有作家、學者零星的論述。

1994年之前，海峽兩岸分別完成了幾本討論白先勇及其作品的論文<sup>2</sup>。1995年，《孽子》法文譯本在歐洲出版，引起法國書評界的討論<sup>3</sup>。而此年起，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連續舉辦數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年，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時報文化與輔仁大學合辦「當代台灣情色文學研討會」，性別與情慾的討論風氣大

---

<sup>1</sup> 2005年12月16日，藉「教育部補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邀請導演曹瑞原、劇作家陳世杰來校演講，副導許綺鶯，還有另外一位劇作家王詞仰亦連袂到來。

<sup>2</sup> 1991年南京大學劉俊完成博士論文《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1995年台北爾雅出版。1992年，政治大學林幸謙完成《生命情結的反思——白先勇小說主題思想之研究》，1994年麥田出版。1994年文化大學陳碧月完成《白先勇小說的人物及其刻劃》，部分文字收入自著《小說選讀》之中，1999年台北五南出版。

<sup>3</sup> 尹玲〈研悲情為金粉的歌劇——白先勇小說在歐洲〉，收在允晨版《孽子》（台北：允晨文化，2003.3），頁392-398

開。紀大偉在會議中以「性與流放」討論男同性戀的命運<sup>4</sup>。次年7月，簡政珍以「敘述者與放逐者」來論白先勇擅用的敘事技巧<sup>5</sup>；12月，聯合報與文建會合辦「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張小虹撰文談論《孽子》中的家族想像<sup>6</sup>。1998年，葉德宣、朱偉城同時在《中外文學》發表性別、情慾與國族<sup>7</sup>等論述。2001年7月，《中外文學》製作了「永遠的白先勇」紀念專號，邀請柯慶明、梅家玲、江寶釵、朱偉成、葉德宣等人撰寫論文<sup>8</sup>。爾後的論文書寫，當以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為總其成。曾秀萍是陳芳明的高足，直接以「同志小說」切入主題，震聾聵耳。因為論文完成的時間，在曹瑞原公視版的《孽子》上映之前，有關電視劇版《孽子》的論述，均以附錄的方式載入，也算是《孽子》研究的全璧了。

雖然是續貂之作，我還是要嘗試以「變體」方式，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回到文本、劇本、殺青的電視劇咀嚼，希望從中看見「時間」的軌跡，感受台灣社會的溫暖與努力。

## 二、白先勇書寫《孽子》的故事主軸

白先勇《孽子》故事的開進點，設在1970年8月中旬，而終於1971年初的農曆元旦<sup>9</sup>，總共半年時間。主角李青是個高三學生，眷區長大的小孩。父親軍職退伍，對他期

---

<sup>4</sup> 紀大偉〈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收在林水福、林耀德主編《蕾絲與鞭子的交歡：當代台灣情色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7.3），頁129-166。

<sup>5</sup> 簡政珍〈白先勇的敘述者與放逐者〉，《中外文學》（總302期，1997.7），頁169。

<sup>6</sup> 張小虹〈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收在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文化，1998。

<sup>7</sup> 《中外文學》26卷12期（總312，1998.5），葉德宣〈兩種「露營/淫」的方法：《永遠的尹雪艷》與《孽子》中的性別越界演出〉，頁67-89；朱偉誠〈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頁45-65。

<sup>8</sup> 《中外文學》30卷2期（總350期，2001.7），推出「永遠的白先勇」專號，中有柯慶明〈情慾與流離：論白先勇小說的戲劇張力〉（頁24-58）；梅家玲〈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從《台北人》到《孽子》〉（頁59-81）；江寶釵〈時間、空間與主體性的建構：閱讀《孽子》的一個向度〉（頁82-105）；朱偉誠〈父親中國·母親（怪胎）台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羅曼史與國族想像〉（頁106-123）；葉德宣〈從家庭受動到警局問訊：《孽子》中父系國/家的身體規訓地景〉（頁124-151）。

<sup>9</sup> 白先勇1971年開始撰寫《孽子》，1977年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開始連載。1983年第一次由

望甚殷，希望他高中畢業後，投考軍校，以實際行動報效國家；母親則年紀輕輕，寵愛鬍子弟娃，對他卻很疏遠。母親受不了父親的蠻橫，認識樂團的小喇叭手，在李青八歲的時候，私奔他去；李青因此兼代母職，與弟娃相依為命。十年後，弟娃感冒，引發肺炎致命。李青受此刺激，被實驗室管理員性侵，又遭學校記過開除。父親大怒，將之逐出家門，露宿新公園，流落到同性戀圈子之中。幸好李青遇見教頭楊金海，認識了幾位同病相憐的孩子，相依為命。後來得到傅老爺子協助，掙脫了悲劇的枷鎖。

故事的節奏很快，第二頁倒敘「李青被學校記三個大過勒令退學的佈告」<sup>10</sup>，是在三個月零十天之前。兩頁的篇幅，完成第一部〈放逐〉。

第二部〈在我們的王國裡〉，以 215 頁篇幅，分 33 個小節，來交代新公園的同性戀圈子。郭老，長春路攝影館的主人，收集這群年輕人的故事，拍攝青春肖像編入「青春鳥集」中，像個「史官」，更像戲劇中的「報幕人」。他的出現，往往控制著故事進展的速度。除了李青之外，還有四個孩子屬於楊教頭旗下的人物。他們打臨時工以外，以「接客」為生，換得衣食的溫飽。

王小玉，現實勢利，一心想去日本尋父，利用恩客來獲取機會。吳敏，則忠心於寡恩的張先生，苦苦守候，甚至為情自殺，張先生中風以後，還回去照顧他；父親還是個前科累累，監獄裡的常客。老鼠，住在哥哥烏鴉經營的賭窟，常偷竊恩客的物品。原始人阿雄仔，弱智，愛吃零食，沒有工作能力，他的命是楊教頭撿回來，留在身邊。小玉以外，其他三個人都沒有「存活」的能力。他們的共通點，都是被「父愛」所棄絕的人。

楊家班之外，新公園裡也有其他流動的幫派，只是不成氣候。不過，遠古傳奇人物龍子、阿鳳，透過眾人之口，像神話，也像歌曲，悠悠的傳遞，宛如永生。王夔龍，殺死阿鳳，被父親王尚德將軍驅往紐約，父死方回。阿鳳身世悲慘，從靈光育幼院脫逃，死於與龍子的感情糾葛。龍子重出，讓「龍鳳戀」之外，又多了「龍青戀」，掀起故事的高潮。

第三部〈安樂鄉〉，142 頁，也分作 33 小節。傅崇山老爺從警局保釋李青等人，勾起

---

遠景出版。參見曾乃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作論》（台北：爾雅，2003.4），頁 17。白先勇選擇以 1970 年為故事背景，必然有他的道理。

<sup>10</sup> 張貼佈告的時間是「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五日」，敘事的開端是「三個月零十天」之後，應是八月十五日以後。見允晨版《孽子》（台北：允晨文化，1999.3），頁 7-8。以下文本引述皆以此本為主，直接註明於文中。

「龍鳳戀」往事，也觸及失子之痛。李青代替受傷的吳大娘照顧傅爺，得以親近傅爺。爲了穩定生活，楊教頭經營「安樂鄉」，卻被有心人破壞。傅爺病逝以前，仍不忘平撫這些孽子的憤恨，也派人去照顧靈光育幼院的孩子。

第四部〈那些青春鳥的行旅〉，20頁，分2節。以書信往返，交代小玉、吳敏、老鼠和李青的現況。最終一節，讓李青重會郭老、龍子之後，在除夕夜將逃家的小孩羅平帶回居處。

從內容的配搭來看，白先勇以李青父子衝突，穿越「同性戀世界」，以大篇幅描寫新公園的「龍鳳」故事，顯然才是故事主軸。書前的題字，說：「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那群孩子，是什麼原因而流露街頭？

### 三、「父權崇拜」與「性的自覺」

在白先勇書中，李青除了受到實驗室趙姓管理員的性侵（頁8、74），曾與中學體育老師（頁29）、龍子（頁28、114、210）、兪講師（頁320）上床過；也曾在旅館（頁74）、車站、廁所、亭閣（頁322）等處，被許多「面目模糊」的人「留下污穢」。他拒絕永昌西裝的賴老闆（頁183），也逃避龍子同居的要求，有些人說他不願意當阿鳳的替代者。依我看來，他除了換取生活所需之外，並不喜歡擔任「承受者」，或者「被掠奪者」，一如傳統的女性，一如默默的母親。

母親以十九歲之齡，嫁給相差二十六歲的父親，心中的不安可想而知。儘管白先勇爲她安排了「桃園養鴨人家養女」的身分，擔任過「中壢下等茶室的女招待」，「使兩個少尉軍官爲她爭風吃醋」（頁51），但都不足以說明她熟稔於「男女情事」。在外人眼中，她們是「一對極不相稱、走在一起令人發噱的老夫少妻」（頁51）。當母親懷有李青，難產血崩，因此恨透了李青，認爲他是「前世的冤孽」，這與《左傳·鄭伯克段於鄆》中，姜氏與親生長子莊公的仇隙相近<sup>11</sup>。丈夫的木訥無珠，生子的痛苦惶惑，剝奪她感受「男女情事」的歡愉。稍後獲得的弟娃，卻一如莊公之弟阿段，得到了她全部的愛。

阿青對母親受辱於父親的情形，必然常見。對母親的情緒不定，與陌生男子挑情搭訕，必然嫌惡。對弟娃霸佔了母愛，也極不可忍。當母親離家時，還交代他必須替代「管

<sup>11</sup> 《左傳》隱公元年第三條，見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文化，1982.3），頁10-16

家務，照顧弟娃」的母親角色。

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男孩子往往具有「弑父戀母」情結，要與父親爭勝，並且贏得母親的關愛。然則，李青反而被壓迫到「女性」的角色上來，只有「順從」，失去了「爭勝」的意圖。這也是悲劇的根源吧。

照顧幼小，一直是李青的責任。弟娃之後，在西門町野人咖啡室遇見十四、五歲恆毅中學的趙英（頁 63）；在蓮花池畔搶下十四、五歲的傻子小弟（頁 162）；幫助住在植物園裡就讀母校初三的娃娃臉打贏籃球（頁 325）；幫傅老爺去探視靈光育幼院六七歲大失去雙臂的傅天賜（頁 353）；帶領離家出走十四、五歲的羅平回居處（頁 389）。照顧弱小，與李青等人遭受「父親」的捨棄，以及「買春客」的貪婪血食，成了強烈的對比。

父權的傷害，是歷史的烙印，當不止於大陸或寶島台灣一地。叛逃的妻子，忤逆的大兒子，當然都是「父權」下的撻伐的對象。然而，李青的父親未始不是「父權」下的犧牲者。

民國三十八年大別山戰役為共軍俘虜，脫逃來台，又被革去軍職。由於老友黃子偉幫助，找個顧問閒職，有了棲身之處。他以前的抗日戰功，竟一筆勾銷。他多麼期望兒子能夠克紹箕裘，為國奉獻，來表現對「父權結構」的禮敬（頁 47-49）。然而他戰敗受辱，悲抑的情緒轉嫁到家庭裡，導致妻離子散，嚴重的摧毀「父親」的形象，讓他崩潰於一夕。他也是「父權結構」下的犧牲者。

研究者喜歡談論李青的「出軌」，是因為「父子衝突」，還是「同性情欲」？

李青個性上被壓抑，顯而易見。他「淪落」在新公園，以皮肉為生，未始是他的本願。這也是在結局的時候，白先勇安排他到圓桌餐廳擔任酒保（頁 373），讓他能獨立生活，遠離玻璃圈人的宿命。

然則李青自己就沒有情欲嗎？在那個禁錮的時代，男女授受不親，教官嚴格管理，又有聯考在即，很少有異性相識、相戀的機會。青春期的到來，身體的變化，每個人都得獨自摸索成長。光身子打球，與同學推打擁抱，與父兄裸裎洗浴；或者在浴廁裡，對鏡自照，自我撫觸。身體的美與力量的感覺<sup>12</sup>，是否就如鏡照湖水的納西斯（Narcissus），

---

<sup>12</sup> 白先勇在〈月夢〉中描寫吳鐘英與靜思月下湖中共游之後，靜思得了肺炎過世，那是他初次對同性身體的接觸。為了銘刻這樣的印象，吳鐘英在家砌起一尊大理石像：「那是一個半裸體少年像，色澤溫潤，像白玉一般，紋理刻得非常精緻。側著頭，雙手微向前伸，神態很美，纖細的身材，竟有一股蘊藉的纏綿意緒，月光照在石像的眉眼上，沁出微亮的清輝，好像會動了似的。」（《寂寞的十七

不自覺的愛上了自己？還是像阿宕尼斯（Adonis）一般，追逐青春美少年<sup>13</sup>？李青對母親的不貞、惡毒、無情、病痛與亡故，是畏縮的，不表意見的。對小玉表姊麗月名牌吧女，有很棒的身體，穿著奶罩、三角褲進出房（頁 41），也視若無睹，因為他們都是身分相同的「性工作者」，喪失了異性相吸的衝動。顯然他在「父權崇拜」之壓抑下，把自己類化為陰柔的角色，卻又仰慕雄壯的伴侶。

對「性的自覺」的描述，在李青身上，白先勇多所保留，但在「龍鳳戀」的神話傳說中，才顯現了「同性情欲」的飢渴。從郭老「青春鳥集」的觀覽中展開。第五十號阿鳳為啞女所生，出生就被送進中和鄉靈光育幼院，十五歲流落到新公園，不肯被人收伏，不願意以污穢、骯髒、有毒的身子，與鍾愛他的龍子長相廝守，導致龍子以尖刀刺死了他（頁 83-87）。這個事件，在王夔龍回台北，重新出現新公園後，不斷的被述說。趙無極與楊教頭的對話（頁 88-91）、王夔龍對李青的自述（頁 114）、藝術大師的阿鳳繪像<sup>14</sup>（頁 262）、傅老爺子與王夔龍的對話（頁 301-304）、傅老爺子對李青的述說（頁 309-312）、靈光育幼院孫修士的追述（頁 351-352），波瀾不斷，證明龍、鳳兩人是「同性情欲」，也是「真心相愛」。王夔龍與李青呢？他們在除夕夜的鞭炮聲中，在殺死阿鳳的新公園現場做了最後一次的敘述（頁 388），然後平靜的、理性的分手。是否說明他們經歷過這半年的風風雨雨，已經檢驗過內心的「真愛」？

當李青轉過頭來，發現孤單的羅平，與他說話，並且帶他回到居所；這與趙的貪婪無極，郭老的隔岸觀火，楊教頭的網羅結黨，龍子的瘋狂佔有，大有差別。是否他在傅

---

歲》（台北：遠景，1984），頁 61）這樣的形象，竟與納西斯月下湖面鏡照，同出一轍。

<sup>13</sup> 白先勇在〈青春〉中描寫老畫家在海邊為少年畫裸體畫時：「他看到了少年腹下纖細的陰莖。十六歲少男的陰莖，在陽光下天真的豎著，像春天種子剛露出來的嫩芽，幼稚無邪，但卻充滿了青春活力。他心中的慾望驟然膨脹，向體外迸擠了出來。他踉蹌的向少年奔去，少年朝他天真的笑著。他看見少年優美的頸項完全暴露在他眼前，微微凸出的喉骨靈活地上下顫動著。他舉起了雙手，向少年的頸端一把掐去。」（《寂寞的十七歲》（台北：遠景，1984），頁 173）夏志清指出此角色的塑造，屬希臘神話中阿宕尼斯的基型。（見前書書序）

<sup>14</sup> 文中藝術大師未見名姓，但他在「安樂鄉」開幕時借給懸掛的油畫《野性的呼喚》，少年的狂野，華西街龍山寺的黯淡黃昏，顯然就是阿鳳的畫像。白先勇云：「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畫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半面是白得熔化了了的太陽，下面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徵，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驀然回首——《寂寞十七歲》後記》頁 333）畫作內容風格雖不合，卻是白先勇創造這幕景象的靈感。

老爺子的身上，看見了自覺、懺悔、諒解與奉獻的精神？

傅崇山，傅老爺子，並不是圈子裡的人，卻是「公園裡的孩子」和靈光育幼院孤兒們的「活菩薩」（頁 227）。第三部〈安樂鄉〉的開始，交代他那二十六歲的獨生子少尉排長傅衛是手槍走火，意外死亡。可是在第二十節，卻花了一整節的篇幅來說明傅衛的同性戀事蹟。一念之間，沒有伸出援手，讓傅衛在他五十八歲的生日夜晚，舉槍自殺（頁 308）。這是傅老爺子的悲痛。然而，兩年後除夕夜的前晚，他經過新公園遇見阿鳳，靈光育幼院逃出來的孩子，動了惻隱之心。阿鳳終究難逃一死，再次撞擊了他<sup>15</sup>。阿鳳的悲劇啓發了他，讓他諒解自己的孩子阿衛，連流落公園裡所有的人，他都願意伸出援手。這與動不動就開派對的萬年青電影公司盛董事長，以及收容孩子領他們走入皮肉市場的楊教頭，有天壤之別。談過話以後，李青開始諒解父親的難處，感覺到了父親「那沉重如山的痛苦」（頁 314）。

安排「李青接受傅崇山的啓示」，是不是白先勇不自覺的回到「父權架構」下，試圖與「社會秩序」重啓和解的大門？不過，我寧可相信「人性的善良」與「信念的再生」，會是人類共有的福祉。

在那個孤絕的時代，人被集體禁錮，性別、思想、行爲，均受嚴苛的控制，爲什麼還可以聽到「自覺」的呼聲呢？青春的力量、善良的人性、悲憫的神佛仍在，並未遠離我們。電影《侏儸紀公園》中，述說生命總會自己找出口；那只是一種蒙昧的生命力，會吞噬其他的生靈、自己的族群，甚至是自己！再生的力量，應該帶有省思的能力。

#### 四、劇作家陳世杰對《孽子》的改寫

《孽子》的主題受到讀者注意，至於寫作技巧，較少人討論。樂牧說：《孽子》的結構，是個「不均勻的陀螺型布局」，像陀尖、陀肚、陀身、陀尾端。而袁良駿則云：全書仿倣《水滸傳》式的結構方式<sup>16</sup>。這兩種說法，其實只看到了表象而已。《孽子》不像一

---

<sup>15</sup> 傅老爺子說：「自阿衛死亡後，我那顆枯竭的心，如同死灰復燃，又重新燃起了生機。也是在公園裡遇見阿鳳那苦命兒，看到他那種悲慘的下場我才發下宏願，伸手去援救你們這一群在公園裡的浮沉的孩子——」。《孽子》頁 312

<sup>16</sup> 樂牧的說法，同時引自袁良駿《白先勇論》（台北：爾雅，1991.6），頁 293。



般單線發展的故事，而是以故事主題籠蓋全局。人物各自獨立，事件各自發展，一旦抓在一起，又能夠縱橫交錯，波瀾反覆。西洋近現代小說似乎都採取這樣繁複的架構。這樣的故事多線軸並置，古今時空交錯，也正合乎拍攝現代電影、電視劇的必要。

要挑白先勇這部作品的缺點，「時間焦迫」應該是讓人緊張的問題。《孽子》用遲開進點的策略很好，可以讓故事開端馬上叩抵戲劇高潮。然則，退學公告的發生在 1970 年 5 月 5 日，往後推三個月零十天，就撞上了 8 月 16 日，也就是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節。以這天為故事敘述的開進點，又在這天讓李青去南機場看母親，第二天母親亡故。一個月後的 9 月 15 日，恰好是農曆中秋節，就是「安樂鄉」的開幕天。再加一個月，10 月 17 日（農曆九月十八），是傅老爺子七十壽辰。12 月初冬，葬了傅老爺子。12 月 20 日小玉動身到日本。12 月 30 日，小玉第一次來信。2 月 1 日，第二次來信，云再過十天就是農曆過年。事實上，1970 年的除夕，在 1 月 26 日，小玉的來信已經超過了時間。何來央求李青十天後為母親送年貨？離家八個月，認識傅老爺子、幫助楊教頭開設安樂鄉也僅四個月。竟然就可以讓李青閱歷衆生群相，了解世事，平復心情，還具有經濟獨立能力？

白先勇接受蔡克健專訪時，曾說：「時間的流逝」是他作品中最關心的主題<sup>17</sup>。只是，《孽子》這段時間的流程，未免過於急促了。

當《孽子》交到劇作家陳世杰手中，花了兩年時間改寫。小說與影劇的文體類型不同，表現手法自有不同；甚至連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也有顯著不同的要求。儘管白先勇的原作結構，已經具備了鮮明的場景分隔，但作為單篇電影，嫌素材過多；作為二十集的電視劇，又得重新調整結構。

陳世杰說：曹導演很謙虛，不想凌駕，不想超越原著。但他個人想要「在不違背原著精神的原則下，依然可以擁有改編者該有的空間，並灌注自己的觀點與情感<sup>18</sup>。」曹瑞原也說：「改編過程中，交雜著各式各樣的情愫：有對原著的景仰、尊敬；有陳世杰對改編的看法與堅持；有彼此迂迴的表白與豁達的體恤——，當然最重要的是，有對作品

<sup>17</sup> 蔡克健〈訪問白先勇〉，《PlayBoy》中文版，1988.7，文亦收入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11）第五輯，頁 441-475。

<sup>18</sup> 陳世杰〈不在高處，同等位置〉，《孽子劇本書》（台北：公共電視，2004.1），序三，上冊頁 6-8。以下引述陳世杰劇本序文或「編劇筆記」時，若無必要，僅註明「劇」字，上、下冊，並加頁碼。若為劇本內容，則標註原劇 20 集之序，並加註場次，如（劇 9：17）。

完美的堅持。——三人不離不棄的情感，也完成了如今堪稱美好的結局<sup>19</sup>。」確實如此，這部作品的完成，作者、編劇、導演之間的磨合，也可以稱作國內文學作品改編戲劇最好的榜樣。

陳世杰對白先勇作品的重大修訂，就落在「時間」與「人物」的確定。他首先將故事時間，延後四年，也就是定在「1974年」。為什麼要改動時間呢？我想可能與場景的佈置、道具的取得有關，或者為了是調整阿青與弟娃年紀的差距。阿青與弟娃原本相差兩、三歲，但為了使阿青能夠「兄代母職」，所以將兄弟年紀差距拉大為六歲<sup>20</sup>。

查閱 1974 年年曆，因為有閏四月的關係，在時間節奏上寬鬆了半個月，比較好「透氣」。學校發公告的時間仍是 5 月 5 日，是星期天呢，有辦公嗎？算是個沒有問題的問題。9 月 1 日是中元節，9 月 30 日是中秋節，陳世杰把「安樂鄉」的開幕，從中秋節改到 10 月 25 日光復節；傅老爺子的壽辰是 11 月 1 日（農曆九月十八）；12 月初傅老爺子病逝時，小玉已經去了日本，未曾參加出殯；王小玉第二次來信是 2 月 1 日，果然，十天後為 2 月 10 日，是除夕。或許陳世杰翻過了農民曆，所以將時間向後挪動了四年。

然而為了交代弟娃感冒轉成肺炎而死，造成李青心智昏亂的原因，把「前年黛西颱風」（頁 141）搬到「今年四月」，而使李青在五月初的實驗室裡發生事情為因果關係。四月中旬未必不會有颱風，卻也不會聽過重大災情。在季節發展的時序處理，就有個小遺憾。

其次是增減人物，歸納陳世杰做了以下的調整：

1. 改變實驗室管理員趙武勝的身分為同學趙英，使「同性情欲」成為美麗的故事。  
刪去原恆毅中學初三生趙英。（劇上頁 107）
2. 刪掉原始人阿雄的角色，弱智、無家眷，不易發展情節。（劇上 201）
3. 增加小東寶歌舞團吳團長，使李青有了線索找到母親。（劇上 203）
4. 增加銀馬車領班的角色，來表達一般人對同性戀者充滿偏見的看法。（劇上 221）
5. 增加露西，麗月的同行，表現對同性戀者的輕蔑。（劇上 251）
6. 增加楊教頭妻子、女兒小真、女兒男友小許的角色，使楊教頭具有同性戀的特質曝光，卻也願意負起「父親」的責任。（劇上 397、下 251）

<sup>19</sup> 曹瑞原〈一種三角的親密關係〉，劇上，頁 4-5。

<sup>20</sup> 陳世杰〈編劇筆記〉，劇上，頁 63。

7. 增加原住民女孩 FUMI，寫出山花流落都市，老鼠偷偷放人。（劇上 407、下 11、下 221）
8. 增加龍子的母親，和父親侍衛馮副官，屬於諒解而不理解的角色。溫柔的龍母使「龍鳳戀」雪上加霜（劇下 67）。馮副官使「龍鳳戀」（劇下 57）、「龍青戀」（劇下 52）在觀眾前透明。
9. 增加老鼠的急診醫生吳春暉，以使日本華僑林茂雄得已找到失聯已久的帝大醫學院同學。（劇下 229）
10. 增加麗月的美國佬來台探視母子，向麗月索討金錢。（劇下 257）
11. 增加張先生姊妹出場，在張先生中風之後，接納吳敏。（劇下 377）

這些角色的出現，是白先勇原作中所沒有的。增加的多，刪減的很少。加入的情節，也「潤滑」了原本的故事情韻。

趙英角色的改變，對白先勇而言，是最不能接受的<sup>21</sup>。但如果不這麼更改，李青的「同性戀」的身份始終隱藏，老管理員趙武勝的身分，也必然被讀者唾棄。在「公告」中，並沒有「趙英」的名字，因為他是市議員的孩子，受到特殊關照。在第九集中，李青與小玉到牯嶺街舊書攤去買化學參考書時，巧遇下個月準備出國讀書的趙英（劇 9：17），與王夔龍因殺阿鳳獲判緩刑送往紐約的情節，也可以算是類比呼應吧。在那個時代男孩可以免除兵役、出國讀書，是高官富商子弟的權利。

李青家庭是故事的主軸線。父親的形象固定。母親離家出走，賦予較多的女性自覺，追求情愛，而不是物質。所以她帶走了李父因為陪罪而買給她「細麻紗連衣裙，豆綠底子，起著大團大團的紅芍藥」的衣裳（頁 52），被改換成掛在半敞衣櫃前，隨風擺盪著「那件綠底的花洋裝」（劇 1：33），用來表現女性的抗議<sup>22</sup>。弟娃死後，增加阿青回去照料母親的情節，並前往六張犁公墓探視弟娃墳墓（劇 6：21），讓母親說出當年離家動機，與心中悔恨。增加吳敏為李青送信給父親（劇 6：24）。增加父親前來探望，卻無法掀開布簾，進入室內，以至於生死相隔（劇上 293）。增加李青親自火化母親的遺體，而不是從大龍峒大悲寺取回（劇 7：26）。增加第二十集傅老爺子前往龍江街探望李父（劇 20：3）。增加李父寄鑰匙給李青（劇 20：16）。增加李青為傅老爺子守靈時，恍惚中看見父親的身

<sup>21</sup> 陳世杰編劇筆記中，曾指出不斷與白先勇磨合，並且「感謝白老師的寬宏氣度」。（劇上 107）

<sup>22</sup> 這件裙子在電視劇裡被改成米黃點的連身洋裝。

影（劇 20：20）。增加李青為父親買本全新的《三國演義》，掏出鑰匙，聽見屋內動靜，轉身逃走（劇 20：37）。

王夔龍與阿鳳，可以算是故事的第二軸線。在第三集開端，導演加入郭老的旁白，介紹這個黑暗王國（劇 3：5）以及「龍鳳戀」<sup>23</sup>的傳奇。劇情大抵忠於白先勇的原作。但增加了龍子父母介入，安排相親，以至於阿鳳登門公開兩人的情事（劇 10：27）。龍子的母親以溫柔的態度，軟化了阿鳳（劇 12：19）。

「龍青戀」這段情節，也大大跳脫白先勇原作試圖「召喚」的關係。在阿青喪母心情痛苦的時候，轟轟烈烈的上場（劇 7：33）；在第八、十、十二集，又與「龍鳳戀」糾結難分。影劇中，也減少龍子敘述流亡紐約的經歷，只著墨與少年哥樂士的相處，更減少了在台北與小金寶相處的描寫。

楊教頭及其成員，屬第三軸線。楊教頭同性戀的傾向曝光了，自責因此虧待了妻女，因此介入女兒小真未婚懷孕的事件，而與事主小許懇談。他更能坐定同性戀集團的龍頭寶位。他關心屬下，阻止「龍鳳戀」，當然也不同意「龍青配」，因為他已經看到了悲劇的收場。對吳敏的痴戀也是，他帶著阿青、小玉，去向張先生討公道（劇 9：4）。

王小玉，是楊教頭手下的大牌，勢利，有手段。他對客人一點也不用情，老周送他襯衫、項鍊，都被他任意棄置、變賣。甚至故意去激老周翻臉。老周是個老實人，也肯用情。陳世杰因此增加了老周在妻子忌日，帶小玉回家，請求王妻保佑（劇 5：20），也使「同性愛戀」透明化了。最後增加小玉將金鍊子還給周先生，告知將前往日本發展，珍重道別，顯示小玉仍有善良的本質。也增加小玉母親去拜訪林茂雄，接納林茂雄與小玉的關係。小玉搭上船長龍王爺，搭便船去日本，說走就走，倒是處理俐落，合乎小玉的性格（劇 19：15）。唯一的困惑是，小玉才開始讀化學，又去學中華廚藝，又去割盲腸，又陪林茂雄，又招呼龍王爺，他怎麼有三頭六臂的本領呢？

王小玉衍生的故事可真多。他的母親也是「性工作者」，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過？小玉的親生父親是個日本華僑，姓中島，名正雄，這是她母親口裡說出來，能做準嗎？「亂拜乾爹」、「天涯尋父」，是他人生最大的目標。那也是他逃離困境，試圖得到外界的認同，而回到「父權社會」的藉口吧。自我放逐，仍是他行為的本質吧。他的表姊麗月也是，做著美國大兵眷屬的美夢，最終也要破滅。

---

<sup>23</sup> 從第十集起，「龍鳳血戀」回憶的部分，是王詞仰幫忙寫的。見陳世杰編劇筆記，劇上 476。

老鼠，愛偷竊，也是以出賣皮肉為生，常常受到恩客的虐待。當他遇見了十二歲的原住民女孩 FUMI，感受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哀，表現出無比的同情心。當他放走 FUMI，遭受到哥哥烏鴉毒打。事後，哥哥烏鴉給了老鼠一根雞腿，那是和解嗎？

吳敏的戲份不多，他鍾情於「刀疤王五」張先生。因為蕭勤快的介入，讓他飽受痛苦。陳世杰讓張先生的姊姊出場，來認同吳敏的身分，而導演在播出帶中改成了妹妹（劇下 401）。至於他的父親，因為販毒坐牢，出獄後還是得依賴吳敏生活。

傅崇山老爺子與兒子傅衛的衝突情事，與王夔龍、李青的「父子衝突」，宛如相對反的平行線，揭示「父親」與「兒子」角色的對立面，也暗示著對換立場思考問題的可能。但更是個穿梭眾人家務的橫軸線，他介入楊教頭、王夔龍、阿鳳、李青、吳敏、老鼠、小玉、傅天賜、安樂鄉、靈光育幼院，把整個故事緊緊的扣在一起。傅崇山的形象明晰確定，陳世杰沒有作較大的更動。

其他的改寫，其實不重要了。從十六集，陳世杰漸漸結束了副角的戲，集中火力於主要角色，也讓「安樂鄉」開張。十七集，以小玉釣到龍王爺，來陪襯李青與俞先生的君子之交。後半部讓傅老爺子說出心中的悔恨，也讓李青思考自己與父親的關聯。十八集，寫吳敏的退縮，操起賤業；張先生反而心回意轉。而李青與王夔龍、俞先生溫和分手。十九集，寫《春申晚報》的記者報導「安樂鄉」內幕，太保、太妹前來鬧事，引起警察注意，「安樂鄉」面臨關閉命運。這與《紅樓夢》大觀園之起落相似，只是更顯慌張緊迫。眾人家務爭紛仍然不減，王夔龍與傅老爺子對話，宛如「父子大對決」。二十集，寫傅老爺子前往龍江街與李青父親見面談話，歸來時昏絕倒地，送醫院急診。放棄了龍子在除夕夜與阿青見面的場景。刪去了「青春鳥的行旅」中的書信，僅留阿青寫給小玉的那封，在陪伴羅平跑步時，用旁白的方法托出。有許多旁白的場景被刪去，留給讀者比較大的思考空間。

## 五、導演曹瑞原的鏡頭詮釋

電視劇的基調與原作當然不同，尤其是以「公共電視八點檔連續劇」的姿態重現。陳世杰說：「與白老師溝通的第一天，他就曾提出，希望能夠淡化阿青等人出賣肉體的細節，這一點，正好與我和導演的想法不謀而合也化解了我們原先的憂慮：因此，在戲劇

版中，性不再是交易，不再是求生的工具，而是回歸人性的基本層面，渴望與慰藉。」（劇上 201）這個改變，也是使得《孽子》能夠出現在一般的客廳裡，成為家庭成員的談話議題，也標誌了「性別教育」的新頁，絕對比一齣「影痴級」賞玩的藝術片重要。

曹瑞原使《孽子》成為真正的「同性戀」電視劇。所有隱性的同性戀者，都被攤在陽光底下了，李青是，楊教頭是，林茂雄是，連被新加進來的角色吳春暉也是。所有的劇情都指向「同性情欲」受到諒解與認可，也證明了九零年代以後，「同性戀」的議題不再是禁忌，絕不像白先勇寫作時代的壓抑、隱晦。

曹瑞原也使《孽子》成為非止於「同性戀」的電視劇，而是一整個時代的糾葛。無奈的親情、悲憤的愛情與數不盡的萍水相逢，交織成一篇篇詩篇。曹瑞原指出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的情感是一致的，劇中添加的親情，更讓人們見識到了血脈中濃厚的情感。他試圖向大眾靠近，說出觀眾的情感與困惑，凸顯人性的自覺，使觀眾開始思考，學會同情與諒解，而不再持顛覆、鄙夷的態度。

爲了要復現一九七零年代的眷村、戲院，曹瑞原費了半年時間找景物，重塑多達九十二個場景，也特別留意演員國、台語與日語、英語的交雜使用。他找來國內老中青三代逾四十名的演員演出，起用年輕新銳擔綱，如范植偉飾演李青，庹宗華演龍子，馬志翔演阿鳳，金勤演小玉，張孝全演吳敏，吳懷中演老鼠；而陪襯的人物竟一個比一個老練，柯俊雄演李父，柯淑勤演李母，丁強演楊教頭，王孫演盛公，王珣演傅老爺子，李昆演老周，勾鋒演龍子之父<sup>24</sup>。

好的演員，也要有好的導演手法。曹瑞原能掌握個人風格化的運鏡，以及獨特的影像美學，依然可以保有寫實、質樸的情調，而不流於煽情或假意。他讓我們讀到角色深層的個性與心理狀態，而不只流於表面的白描。

曹瑞原也容許演員以自身的感受，去詮釋角色，表現了人性的本貌。他讓不同世代的演員，表現了不同世代的精神和魅力。譬如：范植偉把阿青那種陰晴不定的敏感與憂鬱，表達得很完整。而飾演阿鳳的馬志翔，哭到涕泗縱橫的模樣，像極了一隻色彩絢爛的野鳳凰。這些新生代演員的表演，表現了一種純真無華與青澀自然，帶來一種原始的

---

<sup>24</sup> 早期虞堪平也曾拍過《孽子》電影版，群龍電影公司發行，由邵昕演阿青、姜厚任演龍子、孫越演楊教頭、李黛玲演楊教頭之妻，管管演李父、蘇明明演李母、馬邵君演老鼠、曹健演盛公，刪去了龍子的父親，還有傅老爺子的角色。還成了第一屆洛杉磯影展的開幕片。與曹瑞原的作品，可資比較。

魅力，是激醒的生命力所致嗎？

曹瑞原「剪輯」的劇情能力，也是高明的。他讓金士傑扮演郭老，以低沉而富磁性的旁白，來揭開黑暗王國的面紗，神秘而幽邃的傳說活過來了。他讓讀者在二十集的演出中，看見二十一次（有二十次是片頭）李父追逐李青的畫面，也並列了好幾次巷口追逐的景況。《孽子》的象徵意象，深深的刻在觀眾的心坎了<sup>25</sup>。

而李青與俞先生的關係，吳敏的挫敗墮落，智障的小弟，礙眼的小金寶，說是限於篇幅而大大縮減嗎？曹瑞原著眼於人性的深切，也時刻考慮到劇情的邏輯性，如果妨礙了「向陽面主題」的發展，儘管與白先勇與陳世杰的意見相左，他還是敢於刪去，以追求「劇情統一」的可能。

音樂的搭配，也是此劇成功的原因之一。音樂家范宗沛的夜舞，以一種巴洛克式的典雅與沈靜，描寫漫漫長夜裏，無止無境的追尋。〈青春鳥集〉則是回鄉的變奏，以一種輕漫的情調，淡淡速寫黑暗王國裏的眾生相。舖寫了那一群在夜林裏盲目飛舞，血裏帶著無可抗拒的宿命。除了范宗沛的原著音樂以及部份林海的舊作以外，也包括了許多不同背景的當代歌曲，如西洋歌曲，日文歌曲，國台語老歌與口琴吹奏的國台語民謠等。曹瑞原十分巧妙的運用這些音樂來塑造人物，強化故事的情調，以及呈現特殊的時代背景。

## 六、結論

這是一個影視媒體取勝的時代，絕多數讀者，比較了小說原著與電視劇之後，都傾向接納曹瑞原的改編之作。看過小說的人多半感覺不到「李青的存在」，因為李青是敘述者，用一種悲抑、隱晦的語調，帶領讀者進入故事，他的個性、外表，幾乎讓人不察。戲劇裡的李青，有流動的光影，生動的扮演，以及戲劇性的結構，已經是成功轉型的《孽

---

<sup>25</sup> 「阿青赤腳被逐的畫面，鏡頭由柯俊雄所扮演的李父背影帶著，往前壓迫著阿青，父子兩人困在長巷中，擠壓在近景的鏡頭裡，我隨著李父那不斷重重踹下的腳步，同步感受著阿青的恐懼與無助。而阿青起身喊了“不要打了”的最後回望，曹導演用了慢動作和一個極為短暫的停格，表達了那個突然鼓起勇氣的反抗，以及那父子倆之間同時靜止的短暫驚愕。然後阿青奔逃出困住他的長巷，此時導演與音效師卻將李父的咒罵聲轉為無聲。這樣的處理極為高明，讓我們集中凝視著李父臉上的失落與悲悵，竟如同被消音的叫罵聲一樣，雖然力竭卻困頓，頹然而無力。」這是網路上一位觀劇者的描述，貼切而動人。

子》。

然則白先勇原作，就沒有了意義嗎？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 (Hugo Marsan)讚美《孽子》說：「有傳奇故事的緊張、強烈，卻無強加的樂觀結局；雖然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蹂躪的一面，但並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拯救者和懺悔者之間的界線，而且不挑起任何報復的慾望。——《孽子》的成功，其威力更多是來自作者的文筆，豐富而又令人不安，像上漲的江河那樣；他詩意地把真實的氛圍記錄下來，又以黑夜如夢一般的面紗使它改觀<sup>26</sup>。」在那孤絕的時代，白先勇其實已經醞釀著人性再生的力量。

《孽子》的文學價值，是無法磨滅的，任何改編的戲劇或電影，都無法取代。但是陳世杰的劇本、曹瑞原的鏡頭底下，卻有另外一種魅力，讓普羅大眾也能夠欣賞白先勇創作的部分精神，而把眼光放遠一些。「同性戀」世界是個客觀存在的議題，而「新公園」的存在，也庇護著許多弱勢族群。曹瑞原能以冷峻的手法將之呈現人們的面前。也強調「除了諒解，理解也是必要條件」。

不喜歡曹瑞原改編的人，他們反對白先勇的作品被大肆更動，認為沒有抓到原作的真精神，該有父權壓迫、人性衝突，在戲劇中沒有呈現出來。曹瑞原從始至終，並沒有要處理書中暗沉的宿命，他自己說過，想要的表達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一種人際上的和諧，彼此了解、體會。他採用與原著不同精神面貌呈現，同樣能感人，能發人思想，也有不可抹滅的價值。

我們或許會認為普羅大眾要的不多，平安、幸福、長壽，就是他們美好的人生境界；而道德、紀律、秩序，則是他們感到和諧溫暖的基礎。大眾文學抓住「道德教誨」的議題，不離不棄，就文學藝術的結構而言，或許是敗筆，或許是畫蛇添足；但對於大眾讀者而言，是安慰，是依憑，也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蔡康永說：「曹瑞原改編的劇本顯現了（李青）這個家庭，原本也想幸福和樂的願望和努力。」這個故事讓人看見了特殊群體中的平易、苦難，但與常人的努力與心願完全相同。他還說：「曹瑞原輕手輕腳的，解下了孽子頸上沈重的枷，他讓這些孽子在成為孽子之前，先得到了做兒子的機會。<sup>27</sup>」

---

<sup>26</sup> 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於一九九五年三月的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評介白先勇的《孽子》，讚譽這部小說是一齣「將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劇」。見尹玲〈研悲情為金粉的歌劇——白先勇小說在歐洲〉，收在《孽子》附錄，頁 392-398。

<sup>27</sup> 以上所引兩段蔡康永文字，來自蔡康永〈謝謝曹瑞原〉，收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



曹瑞原拍完《孽子》以後，引述《新約聖經·歌林多後書》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將白先勇的名著重新搬上電視螢幕，描述的又是敏感的「父權意識」、「同性戀圈子」等社會議題，重新以「人」的角度，來思考人，思考文學，除了感謝主的加持，其實也可以看見了台灣民主的發展，社會的溫暖、寬容，以及人的品格的進步了！

---

2004年2月24日。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245-28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245-282

# 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中的 「國家是父親」隱喻

陳瓊婷\*

## On “NATION IS FATHER” Metaphor in Huang Fan’s 1980s’ Political Novels

by  
Ai-ting Chen

關鍵詞：黃凡、政治小說、概念隱喻

**Keywords:** Huang Fan, political novel, conceptual metaphor

---

\*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學科副教授

## 〔提要〕

黃凡是 1980 年代台灣文壇的重要作家，1991 年退隱，於 2002 年復出，「政治小說」為其創作的主要文類；自 1979 年起至 1989 年止，計有長篇 3 本，中、短篇 8 篇。值得注意的是「威權父親壓制、強力操縱兒子的言行，父子溝通斷裂」的情節，重複出現在《傷心城》、《反對者》、〈大時代〉、〈夢斷亞美利加〉等作品中。再者，這些文本的背景，非特殊的政治時空，即統治者壓制被統治者的政治訴求。至於〈賴索〉、〈自由鬥士〉，雖無「父子關係」的情節，然其著墨於黨國機器藉由媒體掌控被統治者的言行，所鋪敘的統治者治理情況，正與家庭中父親對待兒子的情狀相似。借助美國認知語言家 G. Lakoff、M.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本文認為「國家(統治者)」與「父親」是互為來源域和目標域的二個概念範疇，故合併「國家統治者是父親」、「父親是國家統治者」二個概念隱喻，探討黃凡政治小說的意涵。本文從「『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的索隱」、「『中國父親』與他的兒子」、「『中國父親』的操控、庇護、壓制及其影響」三方面探討，得出「兒子」對主體性的追求，隱喻台灣人民對民主政治的追求，欲藉此達到主宰自己命運的目的，此為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的關懷。

## Abstract

Huang Fan is a major writer in 1980s' Taiwan, retiring for a time in 1991, and appearing on the literary stage again in 2002. The "political novel" is his main kind of genre. From 1979 to 1989, there were Huang Fan's 11 political novels to publish. What worth paying attention is the same kind of plot appearing in *Shang Xing Cheng* 《傷心城》, *Fan Dui Zhe* 《反對者》, *Da Shi Dai* 〈大時代〉, and *Meng Duan Ya Mei Li Jia* 〈夢斷亞美利加〉 repeatedly. It is an authoritative father that is always suppressing and forcefully manipulating his son's words and deeds through his brutal force, and there is almost no dialogue between father and son. Moreover, the setting of these texts is invariably the ruler KMT suppressing the political appeals of the populace. Although there is no plo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n

*Lai Sou*〈賴索〉 and *Zi You Dou Shi*〈自由鬥士〉, in these texts, the ruler controls the populace's words and deeds through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by way of the media. As the similar script of the father dominating his son and the ruler governing the populace, we know that the "FATHER IS RULER" and "RULER IS FATHER," that is,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predominate the writing of Huang Fan's 1980s' political novels. Furthermore, on one hand, the ruler is standing for nation from the metonymy viewpoi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ler and the nation combine into one in terms of 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ruling period of KMT. Therefore, we take "NATION IS FATHER" conceptual metaphor as the caption of this article, then inquiring into meanings of Huang Fan's 1980s' political novels.

## 一、前言

1980年黃凡以短篇小說〈賴索〉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首獎，聲譽鵲起，至1991年暫時告別文壇為止<sup>1</sup>，十餘年間的作品普獲國內外、海峽兩岸，不同立場報社文學獎，評論家、文學史撰述者、「台灣年度小說」和國際「台灣當代小說」選文者的推崇<sup>2</sup>。推究他備受矚目的原因有四：1、作品量豐。自1980至1992年，計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選集、散文集22本出版<sup>3</sup>。2、題材涵蓋面廣。八十年代小說次文類約有「政治文學」、「都市文學」、「後現代小說」、「女性文學」、「科幻小說」等五種，除「女性文學」之外，黃凡都曾涉及<sup>4</sup>。3、觀察敏銳，批判力強。高天生認為，黃凡小說的特點是「社會意識強烈和批判性特深」<sup>5</sup>。英文版大英百科全書論及〈賴索〉時指出，黃凡不但批判了共產黨、台獨，也批判了執政的國民黨<sup>6</sup>。朱雙一認為這種「超然中立」的批判態度，正得力於黃凡敏銳的觀察。他「有意避開具體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型態的糾結，轉而注重政治的運作形式——台灣政治機器運行的特點、它對社會生活發生作用的方式及其利弊得失等」，「這是一種嶄新、獨特的觀照角度<sup>7</sup>。」4、寫作技巧突破窠臼。白先勇讚許，黃凡運用時空交錯意識流的技巧，表現外在社會理念的分歧，及其影響之下人物的「內心支離破碎，

---

<sup>1</sup> 1991年《冰淇淋》出版之後黃凡暫時告別文壇，於2002年復出。

<sup>2</sup> 除了「時報文學獎」之外，黃凡也得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傷心城》、《反對者》曾進入自立報系百萬小說獎決選。自1979年起，作品連續三年受到年度小說選集的青睞。德國漢學家馬漢茂（Helmut Martin）表示，在年輕作家中最推崇黃凡的作品，大陸文學史撰述者古繼堂、評論家朱雙一同樣推崇。台灣方面，季季、詹宏志、高天生、林耀德、呂正惠、葉石濤、彭瑞金、施淑對黃凡都有正面的評價。

<sup>3</sup> 黃凡，《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27-8。

<sup>4</sup>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86學年度碩士論文，1998年），頁2。

<sup>5</sup> 高天生，〈曖昧的戰鬥——試論黃凡的小說〉，收於施淑《台灣小說與小說家》，高天生主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287。

<sup>6</sup> 參見黃凡，《寵物》，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12。

<sup>7</sup> 朱雙一，〈台灣社會運作形式的省思——黃凡作品論〉，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268。

混亂迷失<sup>8</sup>。」王德威認為，《反對者》打破了以往政治小說僅就時事做表面文章的侷限<sup>9</sup>。施淑指出，黃凡的寫作實驗色彩濃厚，以黑色幽默、科幻、專欄、後設小說等形式，試探學院成規和讀者的知覺能力，並以滑稽的筆調，陳列出帶著嘲弄、冷漠、偏執，以致於虛無氣味的人物，挑釁臺灣嚴肅、追求正面意義的文學信條<sup>10</sup>。

本文以黃凡的政治小說為討論對象，除了他以此一文類進入文壇之外，主要視黃凡的作品為 70 年代中期至 1987 年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為止，政治小說書寫歷史的參照點<sup>11</sup>，其中〈賴索〉為這段歷史揭開序幕，是批判、反抗國民黨統治創作潮流的開端<sup>12</sup>。筆者認為，較諸統、獨意識形態鮮明的陳映真、宋澤萊，他的作品更貼近社會現實，呂正惠亦曾指出：「黃凡大概是近二十多年來台灣小說家中最能掌握台灣社會整體『動態』的人<sup>13</sup>。」又指出，有別前代與同時代作家站在特定政治立場，批判執政當局、政治現狀，刻畫特務和政客的嘴臉，黃凡比較像社會學家，「要探索動盪不安台灣社會的種種面相<sup>14</sup>」。黃凡此一創作特點和他所採取的寫作位置相關，他自認為是一個觀察者，不去妄加批判，最多加入一點幽默感而已<sup>15</sup>。「觀察者」的自我定位，使得黃凡能聆聽發自各個階層，各種不同特點人物的聲音。有屬於結構龐大、組成成分複雜的威權體制本身的，也

<sup>8</sup> 白先勇，〈邊際人—賴索〉，《中國時報》，第 8 版，1979 年 10 月 3 日。

<sup>9</sup> 王德威，〈突顯了一則政治神話黃凡的反對者〉，《聯合文學》第 4 期，1985 年，頁 204。

<sup>10</sup> 施淑，〈反叛的受害者—黃凡集序〉，收錄於施淑、高天生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頁 9。

<sup>11</sup> 呂正惠指出，自七十年代中期、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台灣小說家開始重視寫實性、社會性、與政治性（參見呂正惠，〈政治小說三論〉，《文星》第 103 期，1987 年，86-92 頁），是故做此說。

<sup>12</sup> 林耀德認為 1979 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不但影響了政治生態，也連帶影響了政治小說的創作，他分別引述彭瑞金和宋澤萊的說法來印證。彭瑞金認為：「政治文學的出現，與美麗島事件後，言論空間的擴大有直接的關係。……從小說家、詩人到政治受害者的現身說法，結合了戰前代到 80 年代新出現的作家，可謂在極短的時間裡鼓起了一股強大的政治文學風潮。」而宋澤萊相信美麗島事件是新世代再啟蒙的關鍵。林耀德也指出，總是和宋澤萊相提並論的林雙不，在 80 年代結束他「柔情似水」的「碧竹時期」開始「講真話」，係受到 70 年代政治事件的啟示；停筆多年的葉石濤也在美麗島事件後不久，重新開始創作小說。參見林耀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頁 144-5。從這個時間點向前推，黃凡的經典之作〈賴索〉發表於 1979 年 10 月，雖早於美麗島事件二個月，但視它為 80 年台灣政治小說書寫歷史揭幕之作仍是恰當的。

<sup>13</sup> 呂正惠，〈我們都是眼中人〉，收於黃凡著《大學之賊》，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6。

<sup>14</sup>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81。

<sup>15</sup> 丁琬，〈文壇新銳—黃凡〉，《明道文藝》第 54 期，1980 年，頁 81。

有來自知識分子、政客、反共義士、小販、無名無姓小人物的，他兼容並蓄，讓這些人物以自身獨特腔調說話，反映了兩岸威權對立時期單一的意識形態，或者台灣社會轉型時期（解嚴前後）的百家爭鳴。在吸收並反射這些聲音之時，黃凡也以獨特的寫作方式，成為挑戰政治權威喧嘩的眾聲之一。他敏銳觀察到，政治權力不再是控制台灣社會唯一的力量，國民黨政府很難再壓制因經濟發展而帶動的政治改革呼聲。此外，他也看到了媒體在政權攻防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執政者、政治異議分子利用媒體發聲，參與政治運動的群眾亦然。由於群眾的加入，帶進各種不同的訴求，政治運動因此與各種社會改革相互激盪，呈現變革之前的騷動、混亂。黃凡 80 年代的政治小說，正以各種頻道的聲音形塑台灣社會的變貌。

為便於題旨的探討，擬先界定「政治小說」。它是由意識型態主導，涉及政治事件、政治活動、政治訴求、權力分配與運作，一定程度觸及當局政策，以藝術技巧安排人物和故事的虛構文字作品<sup>16</sup>。符合以上定義的有：〈賴索〉（1979），〈青州車站〉（1980），〈大時代〉（1981），《傷心城》（1982），〈夢斷亞美利加〉、〈自由鬥士〉、〈一個乾淨的地方〉（1983），《反對者》（1984），〈聰明人〉（1987），《解謎人》（與林耀德合著）、〈示威〉（1989）。值得注意的是，「威權父親壓制、強力操縱兒子的言行，父子溝通斷裂」的情節，重複出現在《傷心城》、《反對者》、〈大時代〉、〈夢斷亞美利加〉等作品中<sup>17</sup>。至於〈賴索〉、〈自

<sup>16</sup> 誠如彭瑞金所言，「政治文學」是一個寬泛難以界說的名詞，參見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219。林耀德則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先驗、絕對、萬世不變的文類，任何文類與次文類的定義往往受創作、評論的影響而伸縮其範圍，也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而產生時代的特質，參見林耀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頁 138。由此可見為「政治小說」下定義的困難，然而這是無法迴避問題。除彭、林二人之外，本文也參考了呂正惠（〈政治小說三論〉，《文星》第 103 期，1987 年，86-92 頁）、白少帆等（《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881）、朱雙一（〈台灣社會運作形式的省思—黃凡作品論〉，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頁 268）、Howe（Howe, I. (1967). *Politics and the Novel. A Fawcett premier book, T358.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p22.）的見解，綜合之後，對政治小說作一個較具彈性的界說。又，《傷心城》的敘述者葉欣將政治解釋為「社會資源的權威分配」（見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 年，頁 92），所以本文將「權力的分配與運作」放在廣義的政治範圍，也討論媒體政治的運作。

<sup>17</sup> 〈大時代〉、《傷心城》實為二而一的作品，後者是長篇，係在前者的基礎上敷演而成。前者偏重財閥使用金錢控制社會，後者偏重財閥的女婿的政治態度與反叛，大部分情節雷同。人物方面，〈大時代〉中的霍雲程、蔣穎超、希波，就是《傷心城》中陶慶甫、范錫華、葉欣。由於《傷心城》晚出，



由鬥士) , 雖無「父子關係」的情節, 然其著墨於黨國機器藉由媒體掌控被統治者的言行, 所鋪敘的統治者治理情況, 正與家庭中父親對待兒子的情狀相似, 二者是可以互為來源域與目標域的範疇, 是故合併「國家統治者是父親」、「父親是國家統治者」二個概念隱喻, 探討黃凡政治小說的意涵。為反映國民黨統治時期統治者、黨、國合一的實況, 在此以「國家」指代「統治者」, 故形諸「國家是父親」之標題。

本文主要根據美國認知語言家 G. Lakoff、M.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撰述, 在簡要說此一理論的內容之後, 析論「國家是父親」隱喻的意涵。

## 二、「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的索隱

由 Lakoff、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 以認知科學研究成果為基礎, 提出人思考過程 (thought processes) 大多是隱喻性的看法, 即人類概念系統的建構與定義是隱喻性的。而語言層面的隱喻表述, 極可能是因為人的概念系統中有隱喻性思考存在<sup>18</sup>。據此, 「隱喻」的意義可以從二個層面來瞭解: 深層的隱喻思考和表層的隱喻語言表述, 從這二個意義來看文學作品, 它就是隱喻思考的語言藝術表現。「概念隱喻理論」以隱喻運作原理解釋思考現象, 也提出從語言表述索隱思考現象的方法, 且將二者運用在詩歌分析<sup>19</sup>。據此, 本文先索隱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的隱喻思維, 再依照隱喻運作的原理

---

政治意味又較濃厚, 是故以下行文僅提及陶、范、葉, 但亦指霍、蔣、希。

<sup>18</sup>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6.

<sup>19</sup> Lakoff 先與 Johnson 共同提出「概念隱喻理論」, 後再與文學研究者 Turner, M. 合作以隱喻運作的原理解析西洋詩歌, 二人指出詩隱喻 (poetic metaphor) 與日常的慣用隱喻 (conventional metaphor 或稱 basic metaphor) 共享相同的隱喻性思考, 惟語言表述的方式不同。二人也指出, 慣用隱喻的四種映射賦予隱喻四種創造的能力/力量, 提供「詩隱喻」誕生的條件, 而「延伸」(extending)、「精練」(elaborating)、「提問」(questioning)、「整合」(composing) 四個手法, 則點化平凡的想法為詩思, 使「慣用隱喻」蛻變成「詩隱喻」。而所謂慣用隱喻的四種映射是: 1. 來源域「基模要素填充格」映向目標域基模要素填充格 (slots in the source domain schema, which get mapped onto slots in the target domain)。2. 來源域「關係」映向目標域關係 (relations in the source domain, which get mapped onto relations in the target domain)。3. 來源域「特性」映向目標域特性 (properties in the source domain, which get mapped onto properties in the target domain)。4. 來源域「知識」映向目標域知識 (knowledge in the

詮釋、探討作品的涵意。

「隱喻思考」為「概念隱喻理論」的核心概念，它是一種「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以一個概念範疇，去瞭解另一個概念範疇。這種跨領域的認知運作，稱為「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進一步說，其運作方式是以一個概念範疇的「知識」、「特性」、「知識結構之間的關係」、「推理模式」、「評估方式」去瞭解另一個概念範疇。用來瞭解另一概念範疇之所在稱為「來源域」(source domain)，被理解的概念範疇之所在稱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是」，表來源域向目標域映射的方向，經此運作而產生的意義稱為「隱喻蘊涵」(entailment)。概念隱喻以“S”是“P”的形式表達，例如「思維是食物」(IDEAS ARE FOOD)，係以「食」「物」的歷程：「咀嚼」、「品嚐」、「享用」「消化」、「吸收」(「來源域」)來瞭解思考的過程(「目標域」)。

日常生活依賴隱喻表達的情形普遍，匯集相似的句子可以索隱出節制表達的概念隱喻。例如：

- (1) 他的想法令人反覆回味、再三咀嚼。
- (2) 這個作者的描寫手法相當不錯，很容易理解，不會令讀者消化不良。
- (3) 與國文專題同學們相遇於美麗的初秋，期望與你們一齊品嚐文學的多種滋味，讓我們烹調出奇妙的文學美味<sup>20</sup>。

從以上句子群的「回味」、「咀嚼」、「消化」，「品嚐」、「烹調」與「滋味」、「美味」語彙的運用可以看出，表述者係借用「食物」範疇的動詞、名詞系統，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將「想法」、「文學表現手法」與「文學的內涵」比喻為「食物」，藉此來掌握、理解它們。

文學作品表述的複雜程度遠甚於日常生活表達，特別是篇幅長的小說作品，實難以透過歸納語彙系統的方式索隱節制作者表述的隱喻思維，唯有從反覆出現的情節構思才可能索隱出來。

黃凡政治小說中「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的「父親」究竟是何人？此一概念隱喻意涵如何？探討的入手處是黃凡作品中一再出現的父子、翁婿、兄弟關係，這些家庭範疇

---

source domain, which gets mapped onto knowledge in the target domain)。參見 Lakoff, G. & Turner, M.(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up>20</sup> (1)、(2) 二句轉引自蘇以文，《隱喻與認知》(國立台灣大學通識課程教學參考資叢書 8)，台北：台大出版中心，頁 30。(3) 引自洪華穗，〈續一場文學的因緣〉，[http://blog.xuite.net/sinica\\_2000/blog/16896873](http://blog.xuite.net/sinica_2000/blog/16896873)，瀏覽於 2008 年 6 月 8 日。

的次範疇每是結構文本的骨幹。它們值得注意之處有二，一是倫常序階居於上位的父親／岳父／兄長（《反對者》中的羅瑞琪），若非是新、舊黨國的大老，便是有能力在商界、政壇、媒體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們或操縱、或庇蔭、或保護兒子／半子／幼弟。鮮有例外，被操縱或被庇護者，大多是知識分子。二是父親／岳父背後還有一個操縱他們的國家領導人。關於領導人，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中的威權總統，借用《寵物》裡私生子魏英才的話來說最為貼切：「他（父親）在我心中，永遠是個模糊的影像<sup>21</sup>。」因為「模糊」，所以必須藉由「黨國大老父親」的描寫使黨國機器的操縱者浮出檯面。

受「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節制最明顯的表述是《傷心城》的范錫華將自己與台灣等同，再以自己私生子的身分將台灣隱喻為「中國的私生子」（「台灣是中國的私生子」，下稱「私生子」），並聲明他與台灣力爭上游的目的都在找回私生子的尊嚴，更希望能進一步掌握自己的命運<sup>22</sup>。第二條線索是范錫華那位既是財閥又「身居黨內要職」的岳父陶慶甫，對著與范錫華形同手足的葉欣說：「錫華是我的女婿，你也是家族的一分子，葉欣，你認為我有沒有資格知道子女間的爭執？<sup>23</sup>」顯然，這位外省籍的資本家兼黨國大老將范、葉二個「台灣之子」納入他的家庭，認為自己是他們的父親。這個人物堪為黃凡政治小說裏「中國父親」範疇的原型。他之所以是典型成員，乃在於他的身分，及其在台灣擁有無可匹敵的政治、經濟勢力，也擁有國際外交能力，而且更接近台灣經濟發達後威權的形貌。另外也必須提及「中國父親」範疇的其他成員，有〈夢斷〉裏那位代表中國法統的魏紀南的父親，《反對者》中羅秋南那位在丈夫死後繼承其黨內地位的外省岳母（著眼於權力的掌握而非性別）。或出於避忌，或由於小說技巧之講求，集黨、國權力於一身的蔣氏父子的名字並未出現在紙面上，做為也不多，「蔣政權」的名與實由「中國父親」範疇的典型成員隱喻。一旦聯繫「私生子」隱喻與「中國父親」範疇，則可以瞭解黃凡係藉父子關係映射（mapping）國民黨之治理台灣。但是，要掌握黃凡「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的表述，也必須論及「父親」「大陸元配」所出的「中國嫡子」（下稱「嫡子」）。

承上之分析，「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中的「中國父親」，係由在特殊的歷史時刻失

<sup>21</sup> 黃凡，《寵物》，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59。

<sup>22</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50-2。葉樺，〈黃凡眼中的世界〉，收於黃凡著《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49。

<sup>23</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17。

去大陸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表徵，該政權又由《傷心城》、《反對者》、〈大時代〉、〈夢斷亞美利加〉等文本的外省籍黨政要員父親／岳父隱喻。根據這些文本，「父親」這個來源域的結構點包括了父親的「性格」，「擁有威權」、「肩負教養子女的責任」，後二者含有上位者對下為者的庇護或操縱的內涵。而在下位被庇護、操縱的兒子對父親的做為必然有所反應，對此，本文聚焦於黃凡關注的「聲音的發抒—被壓抑—再發聲」。聲音傳達內在的心理狀態，外化為反抗的一種形式，更證成發話主體的存在。總結來說，黃凡係以廣義的父子關係為來源域，映射目標域國民黨之統治台灣；反之，國民黨之治理台灣也是來源域，映射目標域家庭中的父子關係，對此本文以「中國父親與他的兒子」、「中國父親的庇護、操縱、壓制及其影響」二個結構點分疏，並作為詮釋、探討黃凡 80 年代政治小說的綱要。

### 三、「中國父親」與他的兒子

「倉皇辭廟」來到台灣的「中國父親」是一個集合體，代表法統的魏紀南之父，表現「他」無法忘懷大陸江山的那一面。羅秋南的黨國大老岳母，表現「他」庇護知識分子，無形中弱化了彼等心智的一面。范錫華的岳父陶慶甫，表現了「他」既保守又現代的一面，保守是政治上維護威權體制，現代則是以資本主義的手段進行操控，也無所不收買。但不能忽略的是「他」的軀殼裡藏著儒家的靈魂，這縷數千年不散的陰魂，被范錫華視為民主化的絆腳石。「中國父親」的兒子也是一個集合體，有「嫡子」「魏紀南」，還有「台灣私生子」「羅秋南」、「范錫華」、「葉欣」。威權父親對待嫡子和私生子的態度無別，但他們面對父親的表現截然不同。「嫡子」由於土地認同被擾亂，所以找不到反叛的立足點。「私生子」因為清楚的意識到，自己的地位終究不可能被「正統中國」所承認，所以力主以現有的成就為基礎建立自主／民主機制，確立主體性，務求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

#### (一)「中國父親」的三種面貌與儒家性格

隱喻閱讀在掌握「中國父親」的三種面貌方面，發揮了相當程度的作用，透過這個方式，可以掌握「他」面貌的階段變化，以及「他」如何以權威干涉學術界、文化界。

一個堪稱經典的場景開了一道窺看，失去大陸江山來到台灣之「中國父親」的縫隙：

他們駐足於故宮博物院大門前，……他父親飛快地登上臺階。紀南望著他的背影，直到他整個人溶入這座宮殿式建築的陰影裏<sup>24</sup>。

是應該聚焦在魏父／魏委員的背影溶入宮殿建築陰影這一幕，但是這二個影像的融合之所以經典，乃在於有「故宮博物院在台灣重建」豐厚的意義為基底。「故宮博物院」輕易就是「中國父親」在倉皇之間所辭的那一座「廟」。從符碼的轉喻功能來看，「宮殿式建築」的涵義絕對不如收藏在其內的文物。而文物收藏的文化保存意義又不敵政治目的，收藏者意圖以歷史文物的收藏，宣告他繼承了中國的正朔。在這個觀照之下，撤退來台的「中國父親」重建「故宮博物院」，形同以中國文物為磚瓦重構「他」的政治堡壘，身在其中，「他」或許有份版圖再度鞏固，江山依舊在的安心。所以不僅是魏委員，他的黨國，乃至於他的領袖都願意溶入這座「故宮」之中。但是，看在「嫡子」魏紀南的眼裡，父親溶入的是「中國的陰影」，在它的籠罩下，父親失去了時空座標，既無法區別記憶與現實，也無從分辨虛幻與真實。

魏父／「中國父親」之喪失時空感覺，轉由他與嫡子／魏紀南的對談披露。對談由父親真實的發言，和兒子內心虛擬的回答交錯而成，這種「超現實」的對談的確是小說的藝術手法，意圖和盤托出兒子面對威權父親的膽怯、龜縮，對兒子而言，父親也是一個陰影。魏家父子「實問」、「虛答」的第一個話題是「身分」：

「你得顧到自己的身分，你是個名門公子。」

「名門公子」？可是父親，那是在北平，在…魏家大宅院裡，佣人對著你的背影說的話<sup>25</sup>。

兒子口中的「北平」是地點，雖不能說它隱喻了時間，但父親從北平來到台灣的確牽涉時間的推移，時移事往「名門公子」已成過去。主導對談的父親，接著將話題帶到兒子缺乏大志向上，為了數落兒子，他滔滔不絕敘述他那個「抗日」、「反共」，青年熱血滿腔，

<sup>24</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35。

<sup>25</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1。

有理想、有目標的時代。對此，禁錮在魏紀南內心不敢形諸言語的回答是：「你們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們有志向是因為日本人和共產黨丟給你們許多事情做<sup>26</sup>。如此的「虛答」儘管消極，但指出了父親不敢面對的事實：時空變異，你已經不是你所認為的你，既不是過去北平的「名門公子」，當下在台灣更不是延續中華民國的「法統」，你只是立法院一個小委員會裡，許多下棋、談論公家配給和社會版新聞的老人之一。你甚或是思想封建、作風官僚的黨的化身，甚或是一則歷史神話<sup>27</sup>。

此外，揭露「中國父親」之虛幻和「嫡子」揮之不去疑惑的，是以「去美國」為話題的對談：

「可是我究竟到美國幹什麼？」

「你到現在還不明白，中國的未來在中國，不在台灣，台灣只是收復大陸的基地。」

可是我到美國去幹什麼？可是我來美國做什麼？可是我拿美國居留證做什麼？

可是我究竟是誰<sup>28</sup>？

這段對話是相連續的，然而父親所答並非兒子所問，這種落差呈現了父親思考的矛盾與荒謬：中國的未來既然在中國，台灣既然是收復大陸的基地，那與美國何干？何以要去美國？何以魏紀南不需要留在台灣肩負起「哥哥爸爸」收復失土的神聖任務？說穿了，父親在中國、台灣之間兜圈子，最終的目的是要兒子去美國。通常兒子是未來希望的隱喻，父親此舉便有了寄希望於美國的意涵。如此一來，「父親」不僅親手推倒自己以中國五千年文物重建的政治堡壘，也突顯了這座堡壘虛幻不實，遑論帶來安全感。再者，寄希望於美國雖是現實的考量，但此中又含藏極端的不現實與虛妄，美國何以要為撤退來台灣的「中國父親」鞏固政權，並且收復失土？

在「中國父親」的幻想、矛盾、荒謬之中，看見了「他」棲身台灣，心繫大陸失土，卻將未來寄託於美國的第一種面貌。

「中國父親」的第二種面貌由一對外省岳父母體現，其形象曖昧於正面與負面之間，

---

<sup>26</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2。

<sup>27</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0。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98。

<sup>28</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3。

不過在台籍女婿羅秋南的眼中「他」是庇護者。據羅秋南的描述，岳父曾任黨部主委，縣市政府的預算都要他過目；也當過國營事業董事長，有張威嚴的臉，上面佈滿代表智慧和權勢的皺紋，是一個盛氣凌人的老人，一種權力的典型<sup>29</sup>。至於岳母是國大代表，敢說實話批評黨，因此被政治立場相左的雜誌編輯恭維為是二百萬國民黨員中，少數值得敬重的幾位<sup>30</sup>。他又提到，岳父母曾有意提拔他這個本省籍的留美博士，讓他進入「國家經濟研究院」，後因岳父過世，岳母在黨內地位衰退而作罷<sup>31</sup>。從羅秋南的描述清楚看到，因為他的外省岳父母在黨、國佔有地位，握有分配資源的權力，或者至少可以參與分配，才有條件成為他這個本省女婿的庇護者。

在羅秋南被控「非禮女學生」疑案上，岳母方才展現她具體的庇護作為。為兼顧岳母的身分、地位及其作為的合理，並突顯政黨勢力介入高等學府事務的運作，和知識分子在政治壓力下的表現，黃凡將這個疑案處理成政治陰謀，是一場由黨高層派系傾軋而引發的學校人事大風暴<sup>32</sup>。身為被指控的對象，羅秋南以「大學是座屠宰場」隱喻，說明自己已是一塊溫體豬肉，復又以「強暴未遂」的罪名再次被校內高層的「政治陰謀」宰割<sup>33</sup>，並假設他的岳父還在世，副校長一定不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壓迫他。隨後他以事端不宜擴大，已經遞上辭呈為理由，力勸岳母放棄追究疑案的真相<sup>34</sup>。這樣一個期待被政治勢力保護，軟弱的知識分子，注定要被政治勢力宰制，無論宰制者是欲去他而後快的校內高層，或者是愛護他的長者。羅秋南的外省岳母如何庇護他？岳母將他當成一個孩子，將整件事攬在自己身上，讓羅秋南置身事外<sup>35</sup>。最後這位黨政要員岳母所以能洗刷女婿的冤屈，乃在於她深諳此案是「結構性」的問題。依循教育、政、黨一條鞭的節制結構，她先問過主持調查的副校長，再拜訪教育部，最後到中央黨部跑了幾趟，就

<sup>29</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0、107。

<sup>30</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24。

<sup>31</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42-3。

<sup>32</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95。

<sup>33</sup> 黃凡創造的「大學是屠宰場」概念隱喻索隱自：「教授們則以文明的方式互毆，以更文明的方式廝殺，講壇上充滿了理論和哀號，知識的血則從教科書內滴下來——這是一座全自動化、衛生、無血的屠宰場——而我呢，我是輸送帶上準備滑入冰庫的那塊有博士頭銜的溫體豬肉。現在這塊豬肉正以『強暴未遂』接受調查。」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4。

<sup>34</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16、108。

<sup>35</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27、224。

摸清楚疑案的原委，於是向學校施壓，讓女婿復職<sup>36</sup>。從外省岳母不遺餘力護衛台籍女婿這一面來看「中國父親」，「他」像是在保護知識分子，形象是正面的，實則不然。何以黨政要員岳母能夠庇護女婿？豈不是因為黨的勢力已經介入大學的運作，她才有著力點。從隱喻的角度來看岳母插手，而女婿無法、無能自行處理己身的問題，便是知識分子抵抗政治壓力的能力被削弱，學術無法獨立於政治運作之外<sup>37</sup>。

從具有隱喻功能的外省岳母之庇護台籍知識子女婿，看到了「中國父親」如何以愛為名，以盡責任照顧的方式，在學術界施展權威於無形，這是「他」的第二種面貌。

「中國父親」的第三種面貌，由另一個留美博士范錫華的外省岳父陶慶甫呈現，在范錫華尚未觸怒他之前，他扮演了保護者和恩人的角色。這個外省岳父也是黨政要員，更耀眼的是他的財閥身分。他擁有一個數百億的王國，根部深入各階層、各個行業，在台灣經濟起飛那幾年，他賺的錢足以買下一座城市，人稱「台灣的洛克菲勒」<sup>38</sup>。陶慶甫高踞財富金字塔的頂端彷彿法老，以金錢鑄成的權力指揮每個人搬運石頭。他擅長政治經濟操作，曾利用中日貿易逆差和交好參議員獲得私人利益，並以雄厚的財力送兒子進國會插手政治。高明的是成立「基金會」，不露骨地收買想要的一切。他通常以慈善家的面目示人，簽一張支票給畫家，或幫知識分子在中央機關、國營事業謀差事。葉欣認為，他把在門口排隊等候召喚的學者、教授、作家、藝人、政客當成一堆幼稚園大班學生，十分樂意買餅乾給他們吃，因而也就贏得了「這群孩子」的信任<sup>39</sup>。

葉欣使用的「發餅乾」意象頗能與「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配合，他除了旁觀「父

---

<sup>36</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25-6、233。

<sup>37</sup> 承匿名審查人指出，本文探討「『中國父親』的第二種面貌，以外省岳母為例：『中國父親』的庇護亦然。雖非絕對不可，但該外省岳母的庇護行爲，與操控、壓制的父式威權面貌，實難等而論之。」這或許是筆者使用「庇護」一詞引起了誤解。在本文的脈絡中「庇護」有二個涵意，其一是表面的「外省岳母」對台灣半子的愛護，另一個涵意則從隱喻閱讀的角度得出，指涉「外省岳母」，即國民黨政權，（因為「外省岳母」在丈夫死後繼承了他在黨內的地位與權力）對知識份子軟性的操控。再者，筆者認為在黃凡1980年代的政治小說中，「中國父親」之施展「操控」、「壓制」、「庇護」這三種手段，都離不開「威權」的心態；「中國父親」或操控或庇護也都有愛和克盡「父職」的意味在，二者的界線並不明顯。而本文在「庇護」方面所要突顯的是，此一舉措削弱了台灣半子/知識份子的心智。

<sup>38</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70、75。

<sup>39</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69、70、88、118。黃凡，〈大時代〉，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73-4、75、78、80-1、95。



親」給「孩子」甜點／甜頭之外，還看到「他」將成立的「基金會」當成「免費餐廳」來經營，好餵養他的「孩子們」／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偏偏掌管基金會的他的女婿范錫華不想當「餐廳的酒保」，卻想讓聚集在此的海內外專家、學者，「有效地貢獻他們的學識和力量」，做有意義的事。此事就是組織反對黨與開放報禁。此外，范錫華還要拆掉「父親」的銅像，以他的反對者雷震的來置換（范自命為雷氏的接棒人）<sup>40</sup>。對此，震怒的父親像維護地盤的幫派老大一樣咆哮：「基金會就是我，我就是基金會」，「我絕不容許任何人把他的髒手伸進來，想利用基金會搞點花樣，任何人，包括我的兒子在內。」面對要求主體發言權的女婿，「中國父親」，請來律師對付他，另一方面也不改幫派老大的作風，「發動各界對他算總帳」。

由財閥來具現的「中國父親」，在外界的眼中是成功的事業家、政治家、慈善家，而在他親近的「兒子」葉欣意識的底層，卻是「埃及法老」、「發餅乾和給飯吃的父親」、「幫派老大」三者的綜合體。這三個屬於不同概念範疇的來源域，在映射「中國父親」行為轉折方面呈現整體呼應的情形。本質上「他」是以財富金字塔堆疊出權力的「法老王」，

<sup>40</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70、119。黃凡，〈大時代〉，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77、119。雷震曾是國民黨員，歷任黨政要職。1949年1月雷氏在上海與胡適、傅斯年、杭立武等人頻繁往來，析論時局，商議創辦刊物「以言論督促政府改造」，得到下野的蔣中正首肯。同年11月《自由中國》在臺北創刊，編務由雷氏主持。該雜誌初期站在「擁蔣反共」立場發言，與蔣中正關係良好。1951年6月該雜誌刊登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之後，雙方關係惡化。1954底由於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引發國民黨不滿，雷震被註銷黨籍。此後該雜誌轉以「民主反共」立論，以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檢視蔣政權的施政，屢屢提出批評，與蔣的關係日趨緊張。1956年10月該刊出版「祝壽專號」，以「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全面討論國是。第一篇是由殷海光執筆之「反攻大陸問題」，末篇是「反對黨問題」，均觸動政治禁忌，引發黨、政、軍媒體圍剿。1960年該雜誌與台港在野人士連署反對蔣違憲三次連任總統。雷氏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並主張成立新政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雷氏籌辦「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並舉行了四次分區座談會，遭到情治單位監控，稍後他與劉子英、馬之驢、傅正被逮捕。雷氏被軍事法庭以「散播無稽謠言，打擊國軍士氣，煽惑流血暴動，蓄意製造變亂，勾通匪諜份子，從事於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罪名判處十年徒刑。1970年出獄。1979年病逝台北。以上參見金陵，〈撫今追昔〉，收於雷震著、林淇瀆校註《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頁5-13；林淇瀆，〈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收於雷震著、林淇瀆校註《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頁23-66。

好以金錢進行權力的操作，其中一種方式是成立基金會「豢養」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此時他變身為提供子女生活之資的父親。在面對不服從其意志，又想另立門戶的被豢養者，他立時翻臉成為幫派老大。先找來其他手下，打擊不服從者，再將之驅離。這「三變」是「他」的第三種面貌。

「中國父親」的「他」的儒家性格從何而來？什麼是他的「儒家性格」？范錫華曾說：「假如中國以法家思想為傳統的話，那麼今天的世局可能完全改觀」（葉欣補註：「范的不滿和憤怒，則屬於『非儒家』的」）。「台灣未來的領導階層需要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只讀過《論語》、《孟子》的老傢伙們，對這個急遽發展的社會，反應遲鈍。」羅秋南則想像老白愷聽到他這一段可怕的遭遇時（按，指因「非禮疑案」遭學校調查之事），一定會把小鬍子笑掉。因為「我的天！難道台灣還在獨尊儒術不成<sup>41</sup>。」儘管這些言語片段、零星，且帶有濃厚的嘲弄成分，卻能反映在留美知識分子眼中，台灣的統治階層滿腦袋的儒家思想。另外，葉欣轉述的夏浩文的看法：「在民主國家裡，接班人根本不存在，因為總統是民選的，決定下任領導者是老百姓的事，而非政黨的內部的作業。」並說：「這種論調頗為接近范錫華的口氣<sup>42</sup>。」這種論調直指台灣不是民主國家，因為它的新領導者由特定政黨的內部作業產生，而且由掌管黨國的威權授意，挑明說這就是人治。如此這般，儒家思想就與治理台灣的威權／「中國父親」發生關聯，也證成黃凡政治小說中「中國父親儒家性格」的存在。

「中國父親」擁有儒家性格並非范錫華自己的見解，他承襲的是美籍「中國通」理查·威爾遜對中國政治觀察。威氏的觀察最重要的一點是深化威權體制和儒家思想的關係，並認為由儒家思想主導的政治文化無法產生「忠誠的反對」。他的整體觀察始於以下這個觀點：

在中國社會，順從的對象並非抽象的道德觀念而是仿效某一時人或先賢的特定榜樣。這些榜樣被視為適當德性的具體化身，他的行為正足以闡示這些道德條目，

---

<sup>41</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頁27。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90。黃凡，〈大時代〉，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77。

<sup>42</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70。

個人只有藉模仿始能自我學習正確的行為<sup>43</sup>。

威氏話語並未出現「德治」的字眼，但他所描述正是儒家「以德化民」的政治主張。而何以威氏的觀察會和威權政治掛勾，並成為本文所謂的「在台灣中國父親的儒家性格」之內涵，在於他將「德性的尊師」與「團體領袖」等同，又將儒家的德化政體與威權體制等同<sup>44</sup>。他的思考理路是：領導者即團體的縮影，他的行為被當成榜樣，被團體成員模仿，一個價值相同的「高度一元化團體」因而形成。繼之指出：

在中國，領袖也是團體成員的榜樣，提示成員們哪些是正確的行為。另一方面，追隨者推崇領袖為德性的尊師即團體價值的表率，以表達他們對領袖的赤誠之心。效忠事實上變成領袖與追隨者間的典型，在這種威權下，領袖即代表了團體，因此他們的行為也代表了團體的行為<sup>45</sup>。

從這個論述看到的「中國父親」是一個極端的自我主義者，認為他就是家庭／帶領的團體本身。至於他的「儒家性格」是，認定自我的行為是家庭成員／被領導者的典範，也是家庭／團體的價值，家庭成員／被領導者必須透過模仿他的行為認同他所標舉的價值，並表達效忠之忱。如果威氏的說法能成立，那麼擁有儒家性格的「中國父親」不是個威權，而根本是個專制帝王，或是獨裁者。威氏鋪陳他對儒家德治／人治的觀察，最終要導出的結論是：在中國，普遍認為「政治權威之領袖與他的政策是一體之兩面。當反對者攻擊政策時，即被視為對政策制定者的攻訐<sup>46</sup>。」因為中國人無法將當權者的政策與他的領導地位分開，所以中國無法產生「忠誠的反對」。

## （二）心繫台灣的「嫡子」與胸懷中國的「私生子」

「中國父親」的三種面貌分別對應三種人格或行為殊異的兒子，二者的對應是探討「父親操控兒子」、「兒子反叛」內涵的基礎，按照寫作的邏輯，應該從這些對應來認識

<sup>43</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71。

<sup>44</sup> 筆者認為這只是儒家建構的理想政體，應該不曾存在過。

<sup>45</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71。

<sup>46</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71。

「兒子們」，然鑑於黃凡的創作意圖，擬從「嫡子」、「私生子」二種身分，及其對「台灣」、「中國」的態度來認識他們。這是了解他們反叛行為的前提。黃凡嘗言：「傷心城具有強烈的隱喻和象徵，它是台灣卅年來的縮影，主角葉欣和范錫華象徵了台灣人的迷惘和掙扎<sup>47</sup>。」而台灣之於「嫡子」魏紀南雖非傷心之地，但身在此處他也有迷惘和掙扎，與葉欣和范錫華一樣，他也藉由反叛來清掃「迷『網』」。此外，要重申「私生子」是一個集合體，由知識分子羅秋南、范錫華、葉欣群集而成，聚焦在范錫華、葉欣身上，係因范、葉又各自表徵一種台灣人的典型。范出身低微，苦讀有成獲得哈佛博士學位，是「中國父親」有意栽培的台籍菁英。葉為台籍政治受難者遺族。暫且不討論羅秋南的原因是，在面對「中國父親」或其他權威，他只處於「如夢初醒」的階段：「而我——一個謙卑的、自我的、被權威嚇壞的漫遊者，正在逃離它，逃離那場夢<sup>48</sup>。」他的行動偏重在「逃避—面對—意志自由—建立尊嚴」的歷程，並未像范、葉那樣思考「父子」間的關係，自我的定位與未來的命運。

黃凡將「嫡子」與「台灣」配對，從土地認同的面向呈現他的迷惘，這個安排饒有興味，緣於一種對照，即黃凡另將「私生子」與「中國」配對來呈現他的國族認同。身處台灣的魏紀南究竟迷惘些什麼，和他對這片土地的態度相關。「魏紀南被迫赴美多年之後，未告知父親便自行回到台灣」這個富於象徵意義情節，是理解的入手處。第三人稱敘述者披露了他返台那一刻的心情：「他從中興號的車窗望出去，看到了燈火輝煌的城市，這是他的家，他的故鄉，如果可能，還是他的終老之地<sup>49</sup>。」這段話語的訊息是：「嫡子」將台灣當成「家」與故鄉，並認定此處就是他永恆的回歸之地，此語可謂是一槌定音的心聲。如響斯應的還有：「你對中國既失望，又滿懷希望。不像我，只有失望與痛苦。」「我愛你，我當然也愛你所重視的那些東西，……你的北平，可是我始終無法真正觸及你們<sup>50</sup>。」這一連串禁錮在內心，又相互呼應的獨白，披露發話主體——「嫡子」對「家」的熟悉和情感，是他選擇回到台灣，排拒隔閡、陌生中國的主因，也說明了無法去擁抱中國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根本與愛不愛「他」無關。

黃凡之書寫「魏紀南」等同於他對外省第二代土地認同和情感態度的觀察，頗能與

<sup>47</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49。

<sup>48</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36。

<sup>49</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4。

<sup>50</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29、35。

「台生」苦苓的《外省故鄉》——台灣是外省人的共同故鄉呼應<sup>51</sup>。果若如此，魏紀南這個「身處台灣如同在家」的「嫡子」應該不會有「我是誰」的迷惘才對，他的迷惘實由「父親」的操控造成（下詳）。

至於「私生子」的迷惘主要來自，他對自己身分的敏感與未來地位的覺察。葉欣特意向同屬華語華人社團，但已成爲獨立國家子民的新加坡人說：「我是台灣人，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台灣人？你不知道<sup>52</sup>。」這句帶有「應答控制」性質的話語<sup>53</sup>，自指台灣人其實無法肯定自己是誰。葉欣十分焦慮。至於范錫華，他認爲，未來中國無論由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當家」（主政），中心都在大陸，然後「我們這卅年來被塑造成『新中國人』，在自卑與自傲夾纏中的台灣人將何以自處<sup>54</sup>。」范錫華迷惘了，係由邊緣化的焦慮所引發。

「私生子」范錫華和葉欣，以自行建構的政治論述來化解焦慮。此一論述的核心是，台灣前途由住民自決：「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決不能淪爲任何政權的犧牲品。」目標是建立主體性，扭轉邊緣台灣爲中國的中心，並以強化台灣的民主體質，即以國民黨的民主化爲執行手段。這番主張在「中國父親」看來卻是反叛，並據此認定「私生子」是「台獨在台灣的應聲蟲」。但是「中國父親」不知道他的「私生子」是這麼想的：「自始至終，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份<sup>55</sup>。」也不知道「私生子」的現代史觀、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乃至於人生意義，的的確確都是承襲「他」一貫的「立足台灣，胸懷中國」的「庭訓」。

「私生子」的「現代史觀」、「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人生意義」主要由葉欣透露。葉欣是政治受難者家屬，機緣湊巧使他得以待在「父親」身邊，得此之便他觀察了「父親」對「兄弟」范錫華從愛護到壓制，再到放逐的轉變。他冷眼旁觀「兄弟」追求自主的歷程，小心翼翼避免觸怒「父親」。後來他的態度轉變了，這與一趟東南亞旅行有關。

<sup>51</sup> 轉引自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年，頁46。

<sup>52</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75。

<sup>53</sup> 簡單說「應答控制」（response-controlling）是，發話人（utterer）發話之後，在釋話人（interpreter）做出可能的解釋之前再次發話，搶先對可能出現的解釋做出反應。參見耶夫·維索爾倫（Jef Verschueren）著，錢冠連、霍永壽譯，《語用學詮釋》*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25。

<sup>54</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50。

<sup>55</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52。

這段旅程的功能很容易被忽略和誤解。實際上，這是一趟從疏離政治到投身民主運動的思考之旅，而不是論者所認為的性冒險<sup>56</sup>。葉欣的「思考之旅」，以敘述「兄弟」的政治抱負和生命歷程的方式進行。通過敘述，葉欣重新認識了他的兄弟，同時被他啓發，然後認同於他。這一方面去除了他政治受難者遺族的陰影，願意繼承生父反抗「威權父親」的道路；另一方面接受了范錫華的史觀和政治理念。此外，在思考生命價值之時，葉欣也曾一度提到了「黃凡花崗七十二烈士對生命的看法，必定異於現代年輕人」<sup>57</sup>，即使這是他思考「什麼是對我有價值的事」的引子，但「七十二烈士」自他的意識冒出絕非偶然，由此可見他現代史觀的端倪。

「私生子」的現代史觀與「中國父親」所建立的，即國民黨黨史史觀相去不遠。他們接納孫中山是「我們的國父」，推崇他建立「民主」國家，同樣為中國無法統一抱憾，而對他倡導的「博愛」情有獨鍾，懷想的方式十分奇異。當葉欣在巴達雅看著各種不同膚色的人種，以不同的姿勢躍入海中時，他看到的是一片「湛藍、和平、博愛的海洋」。浮想聯翩，隨後也能從給泰國人小費憶及看過的國父手澤「博愛」，接著喟嘆：「國父啊國父，為什麼您不能長命百歲？為什麼我們的內亂紛爭永無止期？為什麼我們沒有餘力去愛其他民族<sup>58</sup>？」此語不無只要孫中山活得夠久，中國就不會分裂，也能博愛四鄰的意味。或許葉欣沒能瞭解孫中山的人格特質，以及他日漸衰敗的血肉之軀並不足以「行『道』天涯」，統一中國<sup>59</sup>，是故無法知曉，自己的期盼只是「中國父親」建構的「國父神話」的投射。葉欣其生也晚，未能趕上孫中山號召的革命，成為黃凡花崗的第七十三名烈士。在民國已經建立的第七十二個年頭，他轉以帶著客死美國的「台灣民主鬥士」范錫華的骨灰，搭乘直昇機飛臨「國父紀念館」上空的方式，宣告他們是國父的追隨者，踵繼的是國父未完成的統一中國，和建立民主中國的遺願。「向國父致敬」本即范錫華的遺願。被放逐到美國的范錫華，曾以美籍台灣同胞的身分受邀到北平，在共產黨的場子，他以國父繼承人的高姿態，譴責了國、共雙方態度都不誠懇，還說，「如果彼此的『軍閥心態』不根除的話，和平統一根本不可能<sup>60</sup>。」范錫華此言，雖然暫時跳脫國民黨／威

---

<sup>56</sup> 葉樺，〈黃凡眼中的世界〉，收於黃凡著《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49。

<sup>57</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09。

<sup>58</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16。

<sup>59</sup>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年。

<sup>60</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01。

權父親的自我定位框架，但是他看待國共鬥爭的方式，好似中國現代史已經停格。

葉欣在得知范錫華於北平的發言後，他揣想兄弟的內心一定吶喊著：「啊！偉大的中國，動亂的中國，分裂的中國，爲什麼我們的民主遙遙無期？爲什麼我們還有內戰<sup>61</sup>？」葉欣的這番揣想，正與他見到「博愛」二字所發的喟嘆互指。由此來看葉欣嘲笑他的兄弟連台灣問題都解決不了，還想解決「中國問題」，就有意思了。葉欣所謂的「台灣問題」就是民主化的問題，「中國問題」基本上是二岸的統一問題，他把二者聯結，反映的似乎是，「只要台灣先民主化，就能以此制度影響大陸完成現代中國的統一」。進一步言，這就是「私生子」自願肩負中國前途的使命感。「他」的思考理路和與「父親」「中國的希望在台灣」、「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調門神似。而父子二人的根本差異是，彼此爲「民主」所下定義不同，終極目標也不同。「父親」意在收復失土，恢復政權，「私生子」則企圖轉邊緣爲中心，建立主體地位。

說葉欣、范錫華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是誤解。他們認爲，二岸是同一個「民族」（不然爲什麼要談統一？）台灣「民生」已經富裕，剩下的惟有「民主／民權」的問題。葉、范兄弟二人的政治論述，其實就建立在肯定「中國父親」的政績之上：

三百年來，台灣就被有意無意地隔離於「正統中國」之外。假如繼續這種情形也好，但不幸的，在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經營下，台灣人突然地從中國歷史上冒出來，他們憑雙手創造了五千年來最富裕的環境，他們的教育程度、現代知識、民主觀念、科技知識、生活水準，都超出歷代的中國人<sup>62</sup>……。

《反對者》中的經濟學者羅秋南的看法也完全相同<sup>63</sup>。至於創造葉、范、羅這三個人物的黃凡，則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他的肯定：「福爾摩莎，……這堅韌的年輕母親，這孕育了有史以來最特出一代的土地 教育水準和經濟成就實爲五千年來所僅見<sup>64</sup>。」各種「五千年之最」，讓「私生子」認爲「台灣是偉大的中國中心」，「是中國的新希望，在各種混亂的選擇中（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大中國主義、大台灣主義）的

<sup>61</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02。

<sup>62</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152。

<sup>63</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190。

<sup>64</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45。

最後選擇」、「福爾摩莎的未來就是全中國的未來」<sup>65</sup>。爲了不讓「我／台灣」的奮鬥成爲幻影，「私生子」決定自己告訴全世界、全中國：「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意即台灣全體住民要自己當家做主。

范錫華的「民權初步」是，在「中國父親」建立的體制內從事改革。一度傳言他將被延攬入閣，於是他準備告訴「父親」要面對的現實，和一些「治國方略」。例如中美斷交，共產黨的主權被承認，對外應採彈性外交，對內則要接受反對意見、黨政分家、準備接受多黨時代的來臨<sup>66</sup>。知識分子的愚昧常在其天真之處顯現，范錫華的建言就是一個例子。他昧於認識威權父親的真面目，天真的以爲父親會聽從他的書生之見。想要進入體制從事改革也是迷思。進入體制即表示認同它的論述，只有與它同調發聲，以另類觀點進行對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晉見取消之後，范錫華終於醒悟，伸張民權才是正途，隨即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認真唱起了「反調」。黨禁開，反對的力量集結，報禁開，帶動言論自由，都將挑戰威權治理的正當性。民生富裕但心靈空虛的台灣，前途如何未可知，但要求民權／民主的范錫華的命運已定。和中國歷代觸怒專制帝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被放逐了，去了他的國——傷心城台北，也離了他的鄉——台灣。在去國離鄉之際，他必然認清了威權父親的真面目：奉行總理遺教是喊假的，要乖乖聽話才是玩真的。

「中國父親」滿腦子的儒家思想，抑或復興中華文化也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范錫華的投射。就葉欣的觀察，范錫華之投身政治運動是出於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關懷，但是非儒家式的。他不贊成傳統知識分子「進則仕、退則隱」的保守態度，也曾經說過「假如中國以法家思想爲傳統的話，那麼今天的世局可能完全改觀。」葉欣又轉述，在一次的花東之旅，面對台灣的好山好水，范錫華眉飛色舞，侃侃而談，話題貫通古今，是「從呂不韋到文化大革命」；一下論王莽被推舉爲皇帝，是現代民主的雛形；一下要朱熹對中國近代的悲劇負責（還拉了閻若璩來陪榜）<sup>67</sup>。看來，不管范錫華贊同九流十家當中的哪一個派別，有意或無意以「春秋之筆」褒貶人物和歷代史家別苗頭，他都很「中國知識分子」。而葉欣，和他的兄弟一樣都很「三民主義」，二人堪稱爲「孫文學說」的忠實信徒。

<sup>65</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36。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45、246。

<sup>66</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97。

<sup>67</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7。



無論「嫡子」要心繫台灣，抑或「私生子」要胸懷中國都無法自主。「嫡子」對土地的情感態度與父親相違背，愛台灣不得。「私生子」與父親追隨相同的精神領袖，全盤繼承領袖的政治理念；完全接受父親教導的文化，肯定父親的治績，並視之為收復失土的資本，更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惟因要求尊嚴和自主權，便遭受到流放的懲罰。暫離「台灣是私生子」隱喻，來看國民黨威權加諸於范錫華之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它應該是：認同該黨的執政，接受該黨的政治理念，讚揚該黨的政績，卻因倡言該黨應該民主化——本意在擴大其治理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而被剝奪在故鄉台灣自由發言和居住的權利，乃至於成為「中國未來的希望」之期盼。范錫華的下場，澄清了威權的本質：見此也不免要問，難道真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言：「正義是只能等，民主則從不存在」<sup>68</sup>？

## 四、「中國父親」的操控、庇護、壓制及其影響

「中國父親」操控、庇護、壓制「他的兒子」，與前述的他的三種面貌關聯，這三種手段和施展的動機容或有別，但都離不了權威的心態。也應該注意到，除了壓制之外，「父親」操控或庇護兒子，也有愛和克盡「父職」的意味在，因而操控與庇護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操控和壓制也只有程度的差異。由於「操控」等三種手段的部分內容和施展過程，已見於前開析論的「中國父親的面貌」，以下主要討論這三種手段之施展，分別對「嫡子」和「私生子」造成哪些影響。「嫡子」以〈夢斷〉中的魏紀南為典型，「私生子」這個集合體有《反對者》中的羅秋南，《傷心城》中的葉欣。

### （一）操縱與人格分裂

以愛為名的操縱出自於「中國父親」，「棲身台灣，心繫中國，寄希望於美國」第一種面貌。心態上，他將台灣當成收復失土的訓練基地。情感方面，他的愛悉數在中國之上。這份年輕一代很難理解的愛，讓他出言干擾「嫡子」對台灣的認同。因恐懼美國人

---

<sup>68</sup> 馬克·里拉（Mark Lilla）著，閻紀宇譯，《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台北：雅言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頁151。

遲早會放棄台灣而生的不安全感，促使他將財產和愛子都送到美國去受保護。他「愛中國」和「寄希望於美國」的心態，操控了「嫡子」的土地和國家認同，導致「嫡子」「人格」分裂。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國人；再者，父子之間因溝通斷裂而造成的隔閡，也間接造成此一分裂。

「中國父親」對「嫡子」國家和土地認同的操控，主要以聲音的型態出現。他殘存著舊山河印象的腦，和不甘國土被竊據的心，指揮嘴巴反覆唱著：「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故鄉……」「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這些不斷傳入「嫡子」耳朵，單一又權威的聲音，一再衝突他「台灣是我家」的真／現實感。但是同樣的聲音對〈示威〉中，那些「親愛的民進黨父老兄弟姊妹們」絲毫不起作用，他們既不認中國做父親，更徹底否認自己是中國家庭的一份子。接著到「嫡子」的「家」繞一圈，看見四面牆上寫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無疑這是「中國父親」的手諭，意在提醒在台灣的「嫡子」莫忘解救猶在鐵幕內的「手足」。「父親」的手諭，和他將台灣當成復興基地的態度頗為相合，但如果聯結他執意送「嫡子」到美國的舉動，則這些手諭就詭異了。「嫡子」都到美國去了，那由誰來反攻大陸解救他的「手足」？再者，送他去美國不也就剝奪了他被期待承擔的時代使命嗎？儘管「父親」留在牆上的手諭早已風化斑駁難以辨識，但他操控「嫡子」赴美的舉措，卻撞擊出停止不了的疑惑：「我到美國去幹什麼？可是我來美國做什麼？可是我拿美國居留證做什麼？可是我究竟是誰<sup>69</sup>？」

心在台灣，被迫擁抱中國，最終被送到美國的「嫡子」魏紀南，不像〈聰明人〉中的楊台生那樣春風得意遊走於美、中、台三地<sup>70</sup>，他始終無法發現在這三個空間轉換的意義，以致自我認知錯亂，以身分和存在價值二種最為嚴重。錯亂的根源既然來自父親的操控，父親的權威又阻斷了對談的可能，那麼「嫡子」只有靠自己釐清，對此「嫡子」的創造者黃凡選擇「獨白」言語體裁來承載。值得注意的是，黃凡也選擇了「書信」這個傳輸管道。訊息傳遞本即始於個人的獨白，在過程的起點，書寫者自身也是讀者，他的寫與讀都是在喃喃自語。在訊息傳遞出去之後，另外一個讀者出現，此人回信了，獨白便轉為對談。但是如果收訊者並未收到、未閱讀訊息，或者不回應，則書寫者還是停留在喃喃自語的獨白階段。

<sup>69</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13。

<sup>70</sup> 黃凡，〈聰明人〉，收於《你只能活兩次》，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89年，頁179-191。

在美國寫信的「嫡子」便處在喃喃自語的階段。他的書寫主題，已經從「爲什麼要我來美國」，改爲「寂寞、孤單、思親」；起首的稱謂和問候的對象雖然還是父親，但收信者其實是他自己。然而從他孤寂的字裡行間滲透出來卻是「迷亂」，這可從語意銜接的斷裂得知：「有一陣子沒接到你的信，我以爲你病了，因此很著急，因此我到了拉斯維加斯繞了一圈<sup>71</sup>。」如果到「拉斯維加斯繞了一圈」才是重點，那就更顯得他迷亂了。「嫡子」是有意將「繞了一圈」和賭場的「輪盤」以及他所謂的「人生雛形」「◎」等表徵環狀的符號整合在一起。在他這麼整合之時，就先行排除了可能由「輪盤」去索隱的「人生是賭局」概念隱喻。他思考所依賴的應該是兩端點兜起來的「源頭—路徑—目標」基模。在美國無所事事，使他領悟到自己是沒有人生「目標／終點」地在繞圈圈。歸根究柢，人生沒有目標全因他找不到安頓身心的所在。被擺放美國，他不曉得自己究竟立足在「出發」或「回歸」中的哪一點上，意即他不知道此處是他人生的出發點，抑或是折返點。這份「迷亂」，又爲「機場」意象隱喻所強調。「機場」意象先被突顯的是「各色人種的往來之地」<sup>72</sup>，似乎來搭飛機的各色人種都非常清楚自己將航向何方。在各色人種之間徘徊，「嫡子」更有不知鄉關何處是的茫然。直截了當來說，「嫡子」的人生被尋找家鄉所定義，家鄉同時也定義了他是誰，而只要搭上航向家鄉的飛機他便篤定了。「機場」意象再被突顯的是「轉運站」意涵。「嫡子」將交通的點定位在「過去」和「未來」，還有「台灣」和「中國」<sup>73</sup>。他不知道搭哪班飛機的茫然，不正意味著，不知道究竟是何者可以交通／銜接台灣、中國的過去與未來嗎？

這份發生在特殊時空，既是個人也是國族命運的茫然，把「嫡子」推向分裂的邊緣，黃凡以三段符號與文字交錯的獨白呈現。

…你們有沒有過……歸根究底我們都被這個時代壓碎了、撕裂了、腐蝕了、分解了……分解了……啊<sup>74</sup>—

分解了、徹底分解了…一個中國人……一個台灣人……一個符號……一個符號；  
一個符號……許多……許多人……許多後代……許多淋病患者……許多文

<sup>71</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28。

<sup>72</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29。

<sup>73</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29。

<sup>74</sup> 「…」爲本文使用的省略符號；歸根究「底」，原文如此。

學……許多經濟…我想吼叫…我的聲音將在這個房間裡爆炸……爆—炸—  
啊—就像這樣，炸成碎片、炸成粉末…把一切都吼叫出來—就像這樣—嘿—哇—  
啊—…△▽★★??!!#…。75

這三段獨白的表述形式類似：完整的語詞或句子被斷裂開來，言語斷斷續續，運用「…」、「△▽★★??!!#」二組符號，整體看來象似分裂之狀。微觀其動詞和量詞的處理，也充滿強調「分裂」的企圖。在動詞方面，特意挑選含有分裂語義的「分解」、「爆炸」來裂解，象徵台灣與中國的分離，台灣人與中國人身分的分離。數詞方面被挑出來裂解的是「許多」（而不是「很『少』」），以象徵國族、身分、人生的粉碎。由「…」運用之多所產生的支離破碎的視覺效果，可以想見，國族分裂是「嫡子」身分、人生問題的引爆點，威力也驚人，原因無他，「台灣人」和「中國人」都不是符號，而是不能被裂解的實體。

國族分裂也是「嫡子」被「父親」安置在美國的間接原因，「父親」此舉雖然導致他「人格」分裂，但倒也讓他確定了自己的認同對象。他下定決心回到台灣，這除了挽救自己免於崩潰之外，也反抗了父親的意志，建立了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雖然如此，他依舊認為自己「只是個溫順的、不知所措的孩子」，並進一步以「放學後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前張望」，比喻自己迷失於這個無法理解的時代<sup>76</sup>。這毋寧是拒絕長大或尋找存在價值的遁辭，表明了他既無意挑起「哥哥爸爸」的神聖任務，也無從意識到身處於台灣的使命。換言之，在「中國統一」和「台灣民主化」方面，他選擇缺席。

## （二）庇護與心智退化

愛的庇護來自「中國父親」的第二種面貌，由台籍知識分子羅秋南的外省岳母展現，她的庇護係透過學府內的黨機器來進行。學府內的黨機器一方面複製黨國機器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充當黨國機器的神經末梢，掌控知識分子的活動。本文重視高等學府黨機器運作對於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影響，附帶提及羅秋南的其他的二個庇護者，他們同樣影響了知識分子羅秋南的心智狀態。

岳母、兄長、朋友庇護羅秋南起於他被壓迫，壓迫者是高等學府內的黨機器，壓迫

<sup>75</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24。

<sup>76</sup>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35。

的原因是羅秋南批評當局的經濟政策和學府的政治化，壓迫的目的在使羅秋南噤聲。壓迫羅秋南的學府內黨機器，由討厭年輕歸國學人的校長、曾入政界的副校長、穿「中山裝」的訓導長、著「長衫」的所長，和一身「戎裝」總教官組成。這股守舊勢力和黨、政、軍脫離不了干係。他們在高等學府從事的主要政治活動，是培養黨員學生和職業學生充當「打手」，伺機攻擊批判當局的「知識分子」，羅秋南被控非禮女學生疑案，就是典型的事例。羅秋南的好友政論雜誌主編戴宏軒，將這樣的操作解釋為「政治迫害」，並認為這是較諸抓到警總更為殘酷的迫害，「長期的陰影、精神壓力、威脅，有時更加（令人）害怕<sup>77</sup>。」郭強生從這種操作中看到：「政治意識如何『內化』成為知識分子生命經驗與道德尺度，形成了集體意識<sup>78</sup>。」這是十分深刻的評論，直指政治力的滲透力，以及知識分子極為薄弱的反省力、抵抗力，彼等甚至是主動迎合，樂於被當局收編。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很難出現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特立獨行，能向權力說真話，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世間的權勢是龐大、壯觀到不可以批評、直截了當責難的<sup>79</sup>。」

羅秋南充其量只是一個具有經濟學知識的專業人士，空有以知識報國的熱情，還處在摸索正義、真理的階段，更不可能挺身「斥責腐敗、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sup>80</sup>」；他連探查「非禮疑案」的真相，面對校內壓迫他的保守勢力都不敢，他選擇逃避。反觀他的岳母、兄長、朋友卻為了他的清譽和工作出來對抗這股勢力，協力庇護他。從人倫關係來看，岳母、兄長、朋友出面「相挺」，均由於私領域的情感牽絆，他們關心的是女婿、弟弟、朋友「羅秋南」這個個體的私人事務，不是整個知識階層的處境問題，遑論杜絕「政治污染校園」維護學術自由。關於岳母、兄長、朋友的庇護也可從轉喻的角度閱讀。羅秋南轉喻知識階層，他的黨政要員岳母本即體現「中國父親」的面貌，轉喻黨政勢力，即使這個勢力的其中一股庇護了知識階層，但庇護的本質還是介入高等學府的運作，為

<sup>77</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26。

<sup>78</sup> 郭強生，〈從超載到失重《大學之賊》中的政治隱喻〉，《文訊》第230期，2004年，頁18。

<sup>79</sup>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46。

<sup>80</sup>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43。

羅秋南暴發建商兄長所轉喻的商業勢力亦然<sup>81</sup>。另由羅秋南雜誌編輯朋友所轉喻媒體，看似關心黨、政、教育一體的龐大組織迫害知識分子，但仍以政治批判為本位，甚至有利用知識分子處境炒作新聞的嫌疑<sup>82</sup>。由「岳母」、「兄長」、「朋友」等三人所轉喻的勢力均有各自不同庇護知識分子的動機，惟其所關切的都不是知識分子的自主問題。

羅秋南到底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哪一面？並非他自認為的懦弱，雖然在面對黨政勢力的壓迫時的確如此。與其說羅秋南「性格」懦弱，倒不如說他是大腦發達，極端自我中心，心智不成熟的孩童，這全因被岳母／一部份的黨政勢力、兄長／商業勢力、朋友／媒體庇護所致。羅秋南幸福地感嘆：「我這個被衆人所愛的孩子」。從羅秋南決定逃避到澎湖去的心態也可見其心智孱弱：「他要昭告世人一件事，即使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他也能夠使問題更糟<sup>83</sup>。」且不提此人是「知識分子」，一個成年人打算用這種近乎小孩子賭氣、取鬧的方式來「重新塑造自我」，也夠匪夷所思的。所幸去了澎湖，抽離自我，隔著距離，遙望台北那個叫羅秋南的經濟學教授的種種行徑，他終於看見了自己被擺佈的可笑復可憐。儘管他仍然很孩子氣的想著自己的失蹤：「至少能提醒這些人，他羅秋南才是問題的核心，是解答之鑰，是絕對的存在<sup>84</sup>，起碼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主體。循此，他進一步思考了面對壓迫，乃至於擺脫庇護，以重建人格，恢復尊嚴，做個自由人的問題。

創造「羅秋南」這角色的黃凡將他定位為「反對者」，以此為主題，並以長篇小說的篇幅來描述他。至於這部「知識分子羅秋南」寄身的《反對者》，龍應台、蔡英俊、呂正惠都提出，野心太大，想在一部小說裡容納當時台灣所有社會問題的看法<sup>85</sup>。白先勇卻認為這是寫知識分子最成功的小說<sup>86</sup>。本文認為若去掉此文本的許多枝節<sup>87</sup>，再從隱喻的

<sup>81</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75-6。

<sup>82</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97。

<sup>83</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151。

<sup>84</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151。

<sup>85</sup> 龍應台，〈很累人的一本小說——評黃凡「反對者」〉，收於《龍應台評小說》，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頁83-94。蔡英俊，〈主題與呈現——試論黃凡《反對者》的兩難〉，《文星》第103期，1987年，頁98-103。呂正惠，〈政治小說三論〉，《文星》第103期，1987年，頁86-92。

<sup>86</sup> 白先勇，〈寫知識分子最成功的小說〉，收於《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4。

<sup>87</sup> 龍、呂、蔡三人是以嚴肅的文學創作態度求全責備，意在期待真正的政治小說的誕生。本文並非認為《反對者》的寫作態度不嚴肅，而是認為黃凡囿於在報紙寫連載小說的習性，使得這部作品減色。他以情節發展到哪裡就扯進一些相關話題的方式，架構長篇小說，讓《反對者》很像需要不斷製造

角度來閱讀，白氏的評價或更為恰切。從隱喻的角度閱讀這個文本，發現國民黨主政下的知識分子心智退化一如兒童，知識分子也樂於被當成兒童一樣來餵養和庇護。兒童般的知識分子最終還是覺悟自己必須獨立自主，不過「他」只做了「向法院控告大學和新聞周刊」的決定<sup>88</sup>，並未進一步加入反抗威權「父親」的行列。

### （三）壓制與反叛

壓制是比操控更為強勢的作為，在被操控者、被庇護者不再聽命之後展開。「壓制」是「中國父親」的第三種面貌，被壓制的對象為不再服從的被參養者，以強烈渴望建立主體性，擁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范錫華為典型。「父親」的壓制手段大多見於上文「中國父親的三種面貌」之分析，以下補充「他」對「兒子們」聲音的壓制，之後，擬將析論的重心移到他對發聲管道的控制。析論這一點的另一個原因是，兒子之一的葉欣，係以仿效「父親」操控媒體的手段來完成他的反叛，他跟威權「父親」斡旋，讓「被放逐的兄弟／異議人士返台」。

發聲證明個體的存在，但是，唯有個體發出自己真正的聲音才能證成主體性。相對地，威權之「威」也就建立在消除雜音讓所有會發聲的個體都「聽」命於他之上，「一言堂」是威權最想營造的。要談論「中國父親」的性格，更應該強調「他」壓制「兒子們」表達「異」見。前有「嫡子」魏紀南認同台灣的心聲，和「私生子」之一的羅秋南健全台灣經濟體質的建言被壓制。至於范錫華，被壓制的有他以「明日專家」姿態提出的環境污染、人口膨脹壓力等方面的預言，最刺耳的雜音就屬開放黨禁、報禁。「父親」對異

---

高潮，以吸引讀者的副刊連載偵探小說。篇首，黃凡布了一條羅秋南疑似因寫文章得罪當局的線索，又用《前衛》戴宏軒的看法，加強這個可能。後來布了岳母在黨內人事鬥爭失利，牽連羅秋南的線索，戴宏軒又認同這個看法。最後謎底揭曉，是副校長個人揣測上意的「傑作」。這很像黃凡的另一部「新聞體小說」《解謎人》。筆者的這個推測，可以張大春對黃凡寫作態度的說明做佐證。他說黃凡強調寫作是為了好玩，所以用寫雜文的方式訓練寫小說的筆調，另外也摻雜胡說八道的雜文枝蔓，它和主題、結構統一無關，只在加強對讀者的吸引力、說服力、趣味性（轉引自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92）。或許是這樣的態度，使得作品的主题撲朔迷離，讓人難以確定這是一篇描寫懦弱的知識分子覺醒，尋找主體性的作品。而張大春所謂的「趣味性」，表現在《反對者》是作者聲音的介入，過分的嘲弄人物，以致出現不適當的幽默，也使作品減色。

<sup>88</sup>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年，頁272。

議的恐懼，來自於他對多音共鳴的敏感與誤解，對「他」而言那是分裂團結，瓦解穩定，家園即將傾頹的不祥之兆<sup>89</sup>。因而「父親」逼迫異議者「離家」，兼收消滅雜音聲源，並使其他異議者噤聲之效，「父親」以為「他」的「家庭」將因此復歸於寧靜、和諧。

與壓制異議同體的另外一面是掌控傳播聲音的媒介。由於媒體是現代社會重要的傳播管道，也是取得資訊的主要途徑，是故，獨裁或威權政府無不掌控傳媒，做為掩蓋事實、炮製消息、塑造形象、形塑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之用（事實上任何一種體制的政府都如此）。鑑於「私生子」之一的葉欣，係以模仿「中國父親」操縱媒體的手法達成「被放逐的兄弟／異議人士返台」的目的，因此必須解析「中國父親」如何操縱媒體，就從一則 1980 年釋放國、共戰爭戰俘的報導開始。

「中國父親」的宣傳機器「中央社」，對釋放戰俘的報導如下：

「十位受盡折磨的反共義士，在全世界譴責共產主義暴行聲中，終於踏上自由土地，準備前往復興基地<sup>90</sup>。」

第三人稱敘述者描述的其他記者對這則消息的報導是：

香港電視台記者…大聲說：「這是最後一批中共釋放的戰俘，他們被羈押了卅年……。」

美聯社記者…打開錄音機說：「中共特赦的十名前國民黨官員，終於抵達羅湖檢查站，他們共同的目的地是台灣。」

新華社駐港特派員在他的拍紙簿記下：「寬宏大量的中國共產黨特赦的十名戰犯，在全世界注目下，帶著祖國人民的祝福和期望，前往台灣，傳播中國統一的訊息<sup>91</sup>。」

比較中央社新聞稿的用字遣詞、敘述策略和其他三方報導的差異，即可瞭解在台灣「中國父親」意圖操作的內容。對於這個事件，香港、美國記者的報導符合客觀報導的原則，其「中立」的態度是觀察操縱的準繩。香港、美國記者分別以「前國民黨官員」、

---

<sup>89</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98。

<sup>90</sup> 黃凡，〈自由鬥士〉，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64。

<sup>91</sup> 黃凡，〈自由鬥士〉，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64。



「戰俘」稱呼人物，並只做時間、地點的陳述，對國、共二黨與人物未使用形容詞，此外，也無「全世界」這樣的字眼。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一樣，中央社也使用了「全世界」一詞，它指涉「自我誇大」的心態，「全世界都在譴責」是說給資訊封閉的子民聽的，意在對內宣傳。再者，中央社不同於其他三方以「中共」做為釋放戰俘的施動者，而改以「受盡折磨的反共義士」為主詞，這個策略，首先操作了被釋放的這些「人」，連帶操縱了新聞閱聽者對事件的認知。「受盡折磨」的狀態描述，使得這些人成為譴責共產黨暴行的工具。再者，參考美聯社使用「前國民黨官員」——只描述余新田的政黨屬性，或者香港記者使用的「戰俘」——只敘述他是戰爭的俘虜，「反共義士」的頭銜就帶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判斷。使用此一頭銜的在台灣的「中國父親」，也有意藉此宣示主權。站在這個立場，「他」自然將來歸的共產黨俘虜視為反共義士，順理成章，也就將他暫時棲身的台灣稱為反攻共產黨，收復失土的「復興基地」。中國共產黨，一樣站在宣示主權的立場，將這些人在內戰中被俘虜的國民黨軍人稱為「戰犯」。

國、共二黨在香港，以「反共義士」或「戰犯」的名稱繼續進行宣傳戰爭，而被稱呼的當事人是這麼說的：「『戰俘』和『戰犯』基本上是不同的。『戰俘』只是被動的戰爭工具，……因此，我俞新田，一名微不足道的戰俘，居然被中國共產黨判處無期徒刑，實在是人類尊嚴的一大諷刺<sup>92</sup>。」這是俞新田站在人權的立場為自己所做的定位，他想要突顯的只有他是戰爭工具的事實，被標上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同樣也非他所願。此外，俞新田也控訴共產黨將他關在「戰犯收容所」，以剝奪自由的方式傷害了他的尊嚴。然而在台灣「中國父親」，也就是將他所在之地命名為「自由中國」的那個人，是否就比較重視人類的自由？在控訴共產黨的晚會上，台北來的官員／「父親」的手下語氣堅定的告訴俞新田：「當然可以（不說話），這是自由地區，每個人都有沉默和說話的權利，您想說什麼都可以，甚至可以公開批評政府。」但是，終於還是輪到俞新田上台了<sup>93</sup>。在宣傳共產黨暴政的目的下，被命名為「反共義士」的工具，絕對沒有不公開批評共產黨的自由。同樣的，閱聽者也喪失認識共產黨的自主性，在「父親」掌控的宣傳機器媒介之下，它必然是一個暴虐的、侵害自由的政權，更重要的是它被全世界譴責。

另外的操縱透過電視進行，利用此一媒體能夠傳播聲音和影像的特性，宣傳機器安

<sup>92</sup> 黃凡，〈自由鬥士〉，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71。

<sup>93</sup> 黃凡，〈自由鬥士〉，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年，頁70。

排了，台灣光復初期左翼分子韓志遠向各方懺悔的激情演出。這個「懺悔」劇本（scenario）的參與者，除了韓志遠之外，還有宣傳機器的另一個零件，僑委會的楊先生，他也是這齣戲的「導演」。這齣懺悔戲以「訪談」的言語體裁進行，由楊先生以「歡迎韓先生您重歸祖國的懷抱，參加反共陣營」開端，配合祖國張開雙臂「歡迎」，「叛亂分子」韓志遠也就「衷心感激政府寬大為懷」，「無時無刻不在悔恨之中」，「對不起我的祖先、對不起全國同胞」了，更激憤的怪罪：「共產黨害了我<sup>94</sup>。」隨後，僑委楊先生問了幾個看似開放，其實已預設答案的問題：

「…那麼，韓先生，您能不能告訴我們您一踏上祖國的觀感？」

「您去過大陸，您對那邊的觀感如何？」

「您怎麼發現共產黨的陰謀<sup>95</sup>？」

問題中的「韓先生」和「您」的尊稱銜接「踏上祖國」、「去過大陸」、「怎麼發現」等短語都內隱，應答者將說出他「親身經歷」的意義。換言之，訪問者已經在暗示潛在的受話人電視觀眾：「你將聽到的是當事人的親眼見證，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此外，「陰謀」一詞，也早就決定了韓志遠「祖國」和「匪區」狀況的二分敘述：國民黨／講道理／正派，共產黨／不講理／邪惡。承接這個答案，宣傳機器對著觀眾說出他準備好的結論：卅年前左翼分子的反國府行動係受「共產黨欺騙」，目的在驅使他們「解放台灣」。

在瞭解「中國父親」掌控的宣傳機器，如何操弄語言完成「他」交付的政治任務之後，就可以來看葉欣如何掌握其操控手法的精髓，完成對威權「父親」的反抗。范錫華既是兄弟又是政治異議分子的雙重身分，提供了葉欣操作的空間。葉欣選擇「父親」精神領袖孫中山所言的「政治乃眾人之事」做為指導原則，在它的指導之下，葉欣將范錫華個人的屍骨運回台灣安葬之事，操作成眾所矚目的異議分子歸鄉政治大戲。出於對威權父親社會控制形式獨到的觀察，他利用「媒體」而非「選舉」使政治成為眾人之事，也輕而易舉地轉個人之事為眾人之事。葉欣先在報紙發佈范錫華的訃聞，這顯示他已經將潛在的受話人，例如威權「父親」，政治上保守或進步各方的反應都納入考量，他認為「這是對所有人的一個考驗」。對於葉欣讓「兄弟回家」的試探，「父親」緘默。親近「他」

<sup>94</sup> 黃凡，〈賴索〉，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4。

<sup>95</sup> 黃凡，〈賴索〉，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5-6。

的政治刊物代為發言，將范錫華的歸葬解釋成：「異議分子已經有悔意」，並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上了軌道，歧異分子……，若能自承錯誤，我們應該重開方便之門，這有助於政府對海外的統戰工作和增進執政黨的形象<sup>96</sup>。」外界則將歸葬一事視為「平反」。揆諸「回歸」、「有悔意」、「自承錯誤」、「平反」等用語都是從威權赦罪的角度所發出的，發話主體所考慮的，也僅及於威權寬容形象的塑造。至於「歧異分子……若能自承錯誤」，並非「重開方便之門」的條件，而是威權父親已經讓步的宣告，這是「他」周圍的傳聲筒為「他」搭的下台階。

在機場迎接范錫華屍骨的葉欣，對「父親」的讓步有一個給足面子的回應，面對攝影機他說：

他（范錫華）的遺骸能順利回歸，…都證明了這一點——台灣正在進步之中，這種進步是漸進的、無形的、是歷史潮流的、是人類善意的終極表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得住，沒有，絕對沒有<sup>97</sup>。

這段公開發言採取頌揚的策略，但是「進步」、「符合歷史潮流」、「善意的表現」等語卻隱藏諷刺之意：你的善意表現乃來自於潮流的推動，並非自發的。也不無警告之意：民主潮流難以抵擋，任何逆反潮流的舉措終將被淹沒。另一方面，他對兄弟／異議分子的表彰是隱晦的，他小心翼翼地說：

他（范錫華）對台灣的執著和感情是不能簡單的一兩句話抹滅的。這是一個價值系統紊亂的時代，我們再也無法使用傳統的道德規範來給范錫華下結論，……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在處理這類事情的態度，尤其是我，一度和他親如兄弟的我<sup>98</sup>……。

在這段話語，為范錫華所推動的，與眾人有關的政治改革已被轉為范私人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情感。而葉欣內心懸念的「眾人之事」，外顯之後也成了他和范錫華的「兄弟之事」。

<sup>96</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37。

<sup>97</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38。

<sup>98</sup>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年，頁239。

他的敘述運用了易被受話人接受的修辭策略，意在測度「父親」開放的程度而非引爆衝突。至於「傳統的道德規範」短語所指不明，但是，無論所指為何，都在呼籲：重估異議分子的地位吧！

黃凡以范錫華屍骨返抵故鄉象徵「異議人士的返鄉」，他筆下操作此事的葉欣，藉此達到反抗威權「父親」的目的，黃凡政治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也完成了他們階段性的任務。

## 五、結論

黃凡 1980 年代小說值得注意之處有三，分別敘述如下。1. 作品中的外省籍父親／岳父與國民黨統治集團，在他們活動的領域——家庭與國家扮演治理者的角色；外省父親／岳父以其經濟或黨政力量庇護，同時也壓制、操縱兒子／女婿，國民黨統治集團係藉媒體控制人民。外省籍父親／岳父的壓制與操縱固然造成兒子／女婿，或鄉土認同錯亂，精神瀕於崩潰，或心智退化一如兒童，然而兒子／女婿，仍以消極的態度或以積極的行動反叛父親／岳父，展現他們對主體性的追求，隱喻地這是人民對政治民主的追求。2. 黃凡關心統治集團在社會制度層面的控制：透過黨國機器或資本主義的某些運作型態操控知識分子於無形，以及利用媒體塑造意識形態。3. 不同於陳映真視國民黨為黨國資本主義暴力集團，意圖回歸社會主義中國，宋澤萊視國民黨為惡魔般的外來政權，企圖推翻它獨立建國，黃凡接受國民黨治理，並視「中國」為血脈相連的「父親」，他追究「中國父親」的儒家性格（政治思想），罪其為培育獨裁或威權政體的溫床，阻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

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的寫作始終受到「國家是父親」概念隱喻的支配，在此支配下，他表述的都是父親／統治者始終在操控兒子／被統治者，兒子／被統治者也始終渴望擺脫操控擁有自主權。誰能說這不是彼時台灣政治的實相！

2002 年黃凡重返文壇，復出後的作品是政治小說《躁鬱的國家》，2006 年《寵物》問世，這二部作品的觀察對象換成了新當家的「台灣之子」。《寵物》仍然含有黃凡 1980 年代政治小說的要素，例如「父子關係」、「透過基金會進行政治操作」，但節制表述的深層思維除了「國家是父親」之外還有「被治者是寵物」，內涵自然有異。黃凡創作思維的延續性，對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溝通斷裂」、「上對下的庇護或操縱」議題的持續關注，

以及台灣已經歷了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民主化過程，黃凡為何還在炒冷飯，在在引發筆者的興趣，凡此他日專文再探討。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

#### (一) 小說

1.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年。
2. 黃凡，〈夢斷亞美利加〉，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 年。
3. 黃凡，〈自由鬥士〉，收於《自由鬥士》，台北：前衛出版社，1983 年。
4. 黃凡，《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 年。
5. 黃凡，《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 年。
6. 黃凡，《都市生活》，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88 年。
7. 黃凡，《東區連環泡》，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89 年。
8. 黃凡，〈聰明人〉，收於《你只能活兩次》，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89 年。
9. 黃凡，《財閥》，台北：希代出版公司，1990 年。
10. 黃凡，《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
11. 黃凡，《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12. 黃凡，〈賴索〉，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13. 黃凡，〈大時代〉，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14. 黃凡，〈示威〉，收於《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15. 黃凡，《躁鬱的國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 年。
16. 黃凡，《大學之賊》，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 年。
17. 黃凡，《貓之猜想》，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5 年。
18. 黃凡，《寵物》，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 年。

#### (二) 專書

1.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2. 白少帆、王玉斌、張恆春、武治純，《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
3. 布斯（Wayne C. Booth）著，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4. 朱雙一，《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
5.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6.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
7. 耶夫·維索爾倫（Jef Verschueren）著，錢冠連、霍永壽譯，《語用學詮釋》*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8. 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年。
9. 馬克·里拉（Mark Lilla）著，閻紀宇譯，《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台北：雅言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10. 黃凡，《黃凡專欄》，台北：蘭亭書店，1983年。
11. 黃凡，《我批判》，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
12. 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
1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
1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6年。
15. 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
16.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86學年度碩士論文，1998年。
17. 羅杰·福勒（Roger Fowler）著，於寧、徐平、昌切譯，《語言學與小說》*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

### （三）期刊

1. 丁琬，〈文壇新銳——黃凡〉，《明道文藝》第54期，1980年。

2. 王德威，〈突顯了一則政治神話黃凡的反對者〉，《聯合文學》第 4 期，1985 年。
3. 白先勇，〈邊際人——賴索〉，《中國時報》，第 8 版，1979 年 10 月 3 日。
4. 白先勇，〈寫知識分子最成功的小說〉，收於《反對者》，台北：自立晚報社，1984 年。
5. 朱雙一，〈廣角鏡對準臺灣都市叢林——黃凡論〉，收於黃凡著《黃凡小說精選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年。
6. 朱雙一，〈台灣社會運作形式的省思——黃凡作品論〉，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7. 呂正惠，〈政治小說三論〉，《文星》第 103 期，1987 年。
8. 呂正惠，〈我們都是眼中人〉，收於黃凡著《大學之賊》，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 年。
9. 李爽學，〈何索的離騷——評黃凡著《躁鬱的國家》〉，收於《書話台灣 1991-2003 文學印象》，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 年。
10. 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的「賴索」〉，《書評書目》第 80 期，1979 年。
11. 林耀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收於鄭明姍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12. 范銘如，〈歡迎歸隊，然後〉，《聯合報》E4 版，2005 年 7 月 31 日。
13. 高天生，〈曖昧的戰鬥——試論黃凡的小說〉，收於施淑《台灣小說與小說家》，高天生主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14. 施淑，〈反叛的受害者——黃凡集序〉，收錄於施淑、高天生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15. 郭強生，〈從超載到失重《大學之賊》中的政治隱喻〉，《文訊》第 230 期，2004 年。
16. 陳希林，〈小說家黃凡用荒謬刻畫躁鬱的國家〉，《中國時報》D8 版，2004 年 10 月 28 日。
17. 陳澄州，〈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黃凡的小說及其時代〉，《台灣文學館通訊》第 6 期，2004 年。
18. 葉樺，〈黃凡眼中的世界〉，收於黃凡著《傷心城》，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 年。
19. 詹宏志，〈晦黯的飄搖的希望——試析黃凡的「青州車站」〉，《書評書目》第 88 期，1980 年。
20. 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書評書目》第 93 期，1981 年。

年。

21. 劉紀蕙，〈故宮博物院VS.超現實拼貼——台灣現代詩中兩種文化認同建構之圖像模式〉，收於《孤女·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
22. 蔡英俊，〈主題與呈現——試論黃凡《反對者》的兩難〉，《文星》第103期，1987年。
23. 雷震著、林淇瀟校註，《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
24. 龍應台，〈很累人的一本小說——評黃凡「反對者」〉，收於《龍應台評小說》，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

## 二、英文

Clowers, M. L. & Letendre, L.(1973).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Fi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Howe, I.(1967). *Politics and the Novel*. A Fawcett premier book, T358.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In A. Ortony (Eds.),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2-251).

Lakoff, G. & Johnson, M.(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 Turner, M.(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283-310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283-310

# 霹靂布袋戲特殊人物之造形符號探析

黃敬欽\*

## Research on Pi-li Puppet's Character Sculpts and their Symbolic Meaning

by  
Jing-qin Wang

關鍵詞：符號、霹靂布袋戲、造形、服裝

**Keywords:** Symbol, Pi-li Puppet show, character sculpt , costume

---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提要〕

戲劇是一種充滿符號語言的表演，不論是演員的表情動作，舞台布景的安置，人物造形的設計，語言道白的隱示，在在皆以異於生活的藝術方式呈現，符號語言在戲劇表演中便異常重要。本文擬以傳統戲劇中最受歡迎的霹靂布袋戲為例，探討其新登場的令人驚豔的戲劇人物，到底傳遞了那些符號訊息。其中或是情緒符號，或是心理符號，或是造形效果的符號。本文擬以舉隅方式，就權勢、凶暴、死亡、驚悚、神秘、超現實、憂鬱、速度、醜陋、邪惡十個方向探討，尋覓出部份特殊人物造形符號的理則。

## Abstract

The theater contains many ways of symbolic expressions and performing languag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a theater performance. To sculpt a character needs various artistic expressions like the acts of the performers, the staging, the character sculpts, the reference of actors' lines. My essay focus on recent popular Pi-li Puppet show and takes the hand- puppet characters newly appearing on stage as an analysis example of symbolic expressions in Puppet Theater. I makes observations on some subjects or types of characters' expressions like ascendancy, violence, death, horror, misery, surrealism, depression, speed, ugliness, evil.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some principles of understanding the symbols of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expressions wish the costume dosigns of Puppets.

## 一、前言

霹靂布袋戲於 2006 年行政院新聞局舉辦之「SHOW 台灣!尋找台灣意象系列活動」票選為最具臺灣形象之代表<sup>1</sup>，一個走過舊時代的劇種，不但以苟活的姿態僅求倖存，更拓展其疆土，深耕年輕族群，呈顯其頑強之生命力，為布袋戲發展開啓寬闊的視野。值得關注的是霹靂布袋戲如何以舊傳統微弱的養份，成功注入新文化的血液？如何舊瓶新裝，以帶著濃濃舊時代氣息的戲偶，攫取現代人的心靈，蛻變出嶄新的面貌？其間涉及複雜的文化傳播與企業經營問題，而最基本的則是戲劇本質的創新。想理解霹靂布袋戲何以作為最具臺灣形象之代表，從「形象」二字入手，自是最佳的途徑。而戲偶造形則又是凸顯「形象」以及廣泛造成流行的最基本的元素。一齣感人的掌中戲劇，必須藉充滿感情的表演者來傳達豐富的情感，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劇本的感動力。一是操演師細膩表達技巧所作的人物詮釋。一是戲偶本身所透發的造形魅力。三者共同架構出有血有肉的戲劇人物。本文擬從戲劇人物造形一端切入，了解戲劇人物，如何單純的從外部造形呈顯所要表達的深層意涵。

造形訴諸視覺，是最為直接的表象語言，霹靂布袋戲廣泛結合現代年輕人超炫扮裝方式，漫畫奇特的想像。塑造出新一代的古裝人物風格，加強不少戲劇幻象，同時又因 cosplay 的流行，觀眾大量的參與表演的行列。戲劇與生活距離拉近，現實與虛擬世界混淆不清，戲劇幻像更形幻像化。

為了拉開藝術與生活的距離，戲劇創作者以簡潔的符號語言，詮釋人生百態，以隱喻的方式，誇張的指涉塑造戲劇幻象<sup>2</sup>。弔詭的是，刻意拉開觀眾心理的幻象造形，因廣受觀眾喜愛，又被真實的納入現實與虛幻不分的年輕人的世界中，因此霹靂布袋戲的流行，有一半也要拜電腦虛擬世界流行之賜。

---

<sup>1</sup> 行政院新聞局舉辦「SHOW 台灣!尋找台灣意象系列活動」，於 2006 年 2 月 23 日正式公布票選結果，前五大意象分別為霹靂布袋戲、玉山、台北 101、台灣美食及櫻花鉤紋鮭，霹靂布袋戲得票數為十三萬二百八十五票。網路投票時間為 2005/12/16-2006/2/15。資料來源為行政院新聞局全球資訊網。  
<http://info.gio.gov.tw/>

<sup>2</sup> 參見《情感與形式》第二部份符號的創造，第十七章戲劇幻象。蘇珊朗格著，劉大基譯，台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369。

人物為戲劇的主軸，人物造形直接影響到戲劇故事情節的搬演，布袋戲是將真實世界濃縮的表演，人物比真人小，在擬人過程中，勢必有所減縮。在有限的舞台中，有限的場景中，有限的人物中，不能不有一些符號性的表意方式，以各種不同類型的代碼呈現<sup>3</sup>。有時以隱喻有時以轉喻的方式表達，要在於以最簡短的內容，表達深長的內涵<sup>4</sup>。以「敘事」之舞台表現而言，只須將鏡頭拉遠再拉近，所敘述之內容，一語未道，卻已說盡。而符號在戲劇表演中又非常複雜，隨不同時間場合，又會不斷的轉義。亦即有些符號指涉常因表演內涵之不同，意義亦有所不同。以服裝顏色符號而言，顏色有顏色的表情。東方鼎立、吞佛童子、業火紅蓮的紅與火有關，是明顯的火躁的符號。然而《萬里征途》中青陽子的幾個部下樂真子、廣寒子、威臨子、璇璣子同時出現，紅、青、黃、黑，各著一色。當所有成員以不同顏色出現時，有如平劇中的曹營八將般，其顏色本身表情的符號義已十分薄弱，而共同塑造的美觀義，以及「群」的概念，則彰顯出來。服裝符號，可藉顏色呈顯，也可藉形狀呈顯。如地位之高，可以髮式或高帽呈顯，如仙靈地界之主女媧娘娘之高髻，紫耀皇朝之六禍蒼龍的雉羽，以及策衍、金犀、白靈三法座的高帽，均有其符號意旨。本文擬以較受忽視的特殊人物造形符號為題，以舉隅之方式，列舉其中數端之造形符號作說明，有的是情緒的符號，有的是心理的符號，有的是造形效果的符號，希望藉此一探服飾裝扮符號之一端。

## 二、霹靂布袋戲造形符號舉隅

### (一) 權勢的符號

權勢是內在欲求的力量與外向的武力的結合，它以人物的造形、服飾與身體姿態為媒介，呈顯此一人格特質。而服飾這種媒介在展露權力欲求的過程中，是以仿同/搭配體格或姿態方式向人暗示它的媒介義，以及象徵的相關影響力<sup>5</sup>。因此分析權勢的符號不只是從服飾裝扮著手，如能深入的體會人物的聲貌、動作、行為，尤能使服飾的符號義更

<sup>3</sup> 參見《符號學與戲劇理論》第三章戲劇交流：代碼、系統與表演文本，Keir Elam 基爾伊拉姆著，王坤譯，台灣，駱駝出版社。1998年11月。頁32-99。

<sup>4</sup> 同上註，第二章基礎理論：劇場符號。頁28。

<sup>5</sup> 參見《身體權力學》，周慶華，台灣，弘智文化事業，民94年5月。頁72、103。

為彰顯。

戲劇人物有主從之分，主要人物裝扮必須特別用心，以顯示其地位之重要。從實際歷史圖像觀察，帝王如趙匡胤所戴的展角幞頭，長長的向左右橫伸，區隔出自己與周邊人物的距離，凸顯出自己地位的重要，轉入戲劇裝扮之後成為地位尊貴的相貂。皇后華麗的頭飾京劇則以點翠頭面呈現，戲劇攫取生活中炫耀的服飾特徵融入裝扮，成為一種戲劇符號，用以顯示主要人物的權勢與重要性。

以京劇為例，為凸顯人物之重要性與權勢，最擅用向外張揚的符號，擴大人物的面寬與高度，以壯大的面寬與高度撐出人物威猛的效果。武將的雉尾與靠旗，肩膀所襯之墊肩，花羅帽、紮巾、七星額子之絨球，皆是壯大氣勢的裝扮方式。以武戲為主軸的霹靂布袋戲，承襲大戲張揚的符號語言，而加以變化，藉更為細膩的誇大形象，彰顯重要人物的特殊風格。京戲的靠旗觀念在霹靂布袋戲中《霹靂刀鋒》的蟲尊（圖 1）（彩圖 1）以及經天子（彩圖 2）的背飾，可見承襲的痕跡。只不過二者皆為惡之首者。因此後面的背飾是以昆蟲的節肢造型為訴求，一方面承襲靠旗的威猛精神，一方面融入西洋電影以蟑螂、甲蟲變形的異形特色，以節肢影射邪惡的存在，於是向外張揚的節肢，成了大邪大惡的特徵。昆蟲取象的造形尚有背飾略作網狀，以蛛網隱示為喻的九曲邪君（彩圖 3）與九幽（圖 2），蝙蝠造形的有《刀戟戡魔錄》中的歿惑之眼（彩圖 4）。《霹靂兵燹》的牟尼上師雖然出場時間極短，但畢竟亦是天獄之主，而且始終是正邪難分的角色，因此以一身銀白與宛如水晶吊燈般繁複的垂飾為裝扮，無法立刻區分其正邪，卻能闡示出莊重華麗的身份，多一分華貴，少一分威猛氣勢，所勾勒出來的權勢意味亦較為淡薄，也因為權勢的意味較淡，所以天獄之主只是曇花一現，權力地位為軍師四無君所取代。

權勢的符號除外揚的造形外，還有幾種基本的特徵，兩肩最外緣上揚為弦月形，或增加一些犬牙狀突起裝飾，如《萬里征途》之九幽，血邪滅輪迴（彩圖 5），《霹靂刀鋒》之蟲尊，不是邪惡之主的身份，就是足以左右戰局的悍將。《霹靂奇象》之九禍、《霹靂劍蹤》之東方鼎立、《九皇座》之覆天殤（圖 3）、《萬里征途》之凌羅寐影、邪卷殺魂（彩圖 6），均是以怒髮外揚的造形塑造強者的氣勢，加上外伸的肩領，加強其強者地位。而以肩領外揚的造形尚有《霹靂奇象》之芙蓉骨（圖 4）（彩圖 7）與《九皇座》之冥輪法魁（彩圖 8），而此二者之面容以異域異類為造形特色，愈添加其不可知之神秘性。大抵而言，張揚的符號運用，以邪主為主，外揚的標幟集中於肩膀以上。亦即以頭部為核心，輻射出外揚的氣勢，邪主多半需要足夠的氣勢以收到恫嚇敵人的作用。京劇《龍鳳呈祥》

中賈化將靠旗繫於腰間，如同公雞，凡此諧謔造形，足以說明張揚符號必須置於肩上方能以醒目的氣勢，襯托出有權勢有地位者的身份。《刀戟戡魔錄》中異度魔界之主閻魔早魘（圖 5）（彩圖 9），肩揚髮揚甚至臉型取自機器人造形。黃泉之都之夜重生（圖 6、圖 7），臉罩黑幕四向張揚，皆有不死的隱示，愈添加邪惡勢力難以消滅的困難度。《龍圖霸業》之白衣劍少（彩圖 10）盛裝時，與《霹靂皇龍紀》之六禍蒼龍（彩圖 11），皆取形於京劇之雉尾小生，髮上插有羽飾，所不同者六禍蒼龍肩飾較為張揚，「肩寬八面威」其權力之大，亦可自造形窺知一二，羽飾除了標示權勢的符號義之外，在許多民族的觀念中還帶有通靈、威嚴、勇猛、好鬥的內涵<sup>6</sup>。

## （二）凶暴的符號

齊如山《國劇藝術匯考》詮釋國劇臉譜顏色時，對藍色臉、綠色臉分別認為是殘暴的徵兆，藍色與綠色不只是青筋暴露與冷血動物的抽象化，更由於寒冷滯重的色調，與肉色產生強烈的差異，其反常的凶暴性格特質，尤能透過沉重的顏色展開。因此霹靂布袋戲中凶暴個性的造型，亦常以此色調作為設計的重點。如《刀戟戡魔錄》之狂龍一聲笑（圖 8）（彩圖 12）以食眼珠為點心，動輒置人於死地的凶暴個性，透過綠髮及一身綠鱗裝扮，加強其獸性特徵，以象徵原始的爬蟲類取象，襯托野蠻、殘忍與凶暴的心性。當然凶暴的符號除了顏色基調，原始與野性動物的比擬之外，還有許多輔助的符號，加強人物的深度刻劃，以狂龍一聲笑為例，臉部胸部的刺青，帶著濃厚的警告意味<sup>7</sup>，具有恫嚇敵人的訊息，凶暴狂亂性格上，兼有操控脅迫的符徵。上吊的眼神有如鷹般的銳利，再加上纏身的重金屬武器鐵鍊，象徵力量的胸肌，以及隨劇情變幻莫測，陰晴不定難以捉摸的想法，組合成凶暴無比的人物，狂龍一聲笑就像一顆不定時的炸彈，不知何時要引爆，引爆時卻又六親不認，他與閻魔早魘合力狙殺親姐姐練峨眉，就是此一特徵的呈現。狂龍一聲笑的爬蟲類造型特色亦見於變裔天邪（圖 9）與半君邪，暗紫與墨綠的色澤，呈現幽暗世界的體質。若此殺人眨眼的惡魔，皆以幽暗的色澤呈現。如果說狂龍一聲笑是綠色凶暴人物的代表，霹靂九皇座中的凶流道（彩圖 13）就是藍色凶暴人物的代表，

<sup>6</sup> 參見《符號與象徵》，楊錕國，北京出版社，2000年8月，頁87。

<sup>7</sup> Daniel McNeill 認為「刺青為符號系統，傳達多種訊息。在男人身上，刺青向來代表警告。」《臉》 Daniel McNeill 著，黃中憲譯，藍鯨出版，2004年，頁329。

紫紫色而近乎深咖啡的臉，外加藍色濃眉藍色鬍子滿頭藍色的散髮，上吊的眼睛，以及在幽暗色澤臉龐中，外露的一排白牙，正如京劇盜御馬中的山寨寨主竇爾墩，除了紅鬍子之外，臉部及全身都是深藍，洋溢著濃濃的亂賊流寇的氣息。

霹靂布袋戲之所以足為臺灣形象的代表，乃是因為它在視如荒誕的表演藝術中，融入當代的社會現象，其所設計的符號，具有繁複的符號語言。外在造形的符號，是視覺直接的表達方式，凶暴、原始、野蠻符號之外還有更深層的心理投射。狂龍一聲笑所居住的罪惡坑，是罪惡的淵藪，他所代表的是一股難以推翻的霸權勢力。象徵霸權的他陰晴不定以及不講理的個性，讓對手形同面對神經分裂的敵手一般。偏偏這位敵手城府甚深，非僅止於草寇之魯莽性格，加深了對付的困難度，而且與代表正義的領導人物復有糾纏不清的血緣糾葛，凡此諸般現象深深投射當代臺灣所面臨難纏對手的困境，狂龍一聲笑所持的武器逆鱗，繫上長長的鐵鍊，正是對手難以掙脫的枷鎖。

### （三）死亡的符號

為了展衍更為寬闊的表演空間，霹靂布袋戲經常設計許多虛無荒誕的空間，作多維的思考，當然充滿妖魔與死亡的空間，也成為設計的重點。而存在於此一空間的妖魔邪道，也要配合森冷的死亡世界，作造形的設計。其中最常見的是以與死亡有關的物件，融入造形之中，成為死亡的符號暗示，使敵手心生死亡的恐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鬼王棺(彩圖 14)與鬼隱(圖 10)二人，鬼王棺直接以象徵死亡的棺材作為頭顱，設計十分大膽。鬼隱面如死灰的臉龐，包裹於血色的大袍中，心窩還多伸出兩隻手，手捧棺木。甚至鬢邊，鞋子都有紙紮的死亡暗示。此兩人直接以象徵死亡的棺木作造形設計，係最為直接的死亡符號。另外還有一種以陰府王爺出巡作為死亡的前兆，《龍圖霸業》中的異端神、鬼神將、夜叉鬼出現時的死亡之舞，正祭告著死亡的來臨。案異端神、夜叉鬼、鬼神將的造形都是模仿廟會的鬼使神差，穿著與負責捉拿惡鬼的使者相同，但是臉龐卻作奇怪的拼合。異端神臉龐分別是京劇的張飛與姜維，鬼神將則分別為典韋與張郃。奇怪的拼合與奇怪的舞步，增添不少詭譎的死亡暗示。同樣的造形特色亦見於《霹靂劍蹤》中的幽泉與非影，出手金銀鄧九五出現時，總是隱於轎中，前導的是報馬猴與幽泉非影，報馬猴(彩圖 15)造型是京劇中的孫悟空，負責宣讀判決對手死亡的意旨，另外幽泉與非影則取象於黑白無常造形，同時亦踩踏著死亡的舞步。《刀戟戡魔錄》中的寰宇奇藏出

現時身隱車內，車夫（彩圖 16）則全身纏滿繃帶，彷彿木乃伊一般，也是為營造死亡氣息而設計，只是催命的意味沒有前者濃重。至於拖著棺木行走的慘綠色、冷豔色出現時也是充滿死亡的暗示，北川飛鴿就是被棺木中的怪物吞噬而死。

#### （四）驚悚的符號

布袋戲為收到驚心動魄的效果，不只故事情節需要精心編排，偶頭造形也要有驚心動魄的驚悚設計。一般而言，驚悚的造形符號經常採用骨肉撕裂剝離，皮膚潰爛等傷痕的暴現作為訴求，《霹靂兵燹》的鄒縱天（彩圖 17）一個掙扎於死亡邊緣的人，九死一生，死後復成為糾纏不去的惡魂。以頭額滿是潰爛的傷痕，呈現在死亡邊緣徘徊的驚悚效果。此一特色亦見於《刀戟戡魔錄》之蟠凶，臉部多處潰爛，呈現青紅二色的疤痕，疤痕週邊還帶著一條條的血絲。《霹靂劍蹤》的五人組之首地理司（圖 11）（彩圖 18），平時白髮如簾幕下垂般遮住整個面龐，有風吹動時則出現五官內陷的反常造型，荒誕神秘之外還夾著濃濃的驚悚氛圍。《龍城聖影》的皮鼓師（圖 12）以山豬臉作造形，配合故事情節中剝下山豬臉皮作為自己臉皮，加上以剝人皮製鼓的職業特色，其驚悚效果即凸顯出來。而他最後對付仇人骨簫的手段，尤其血腥，失去面皮的骨簫血淋淋的臉龐，說明造形設計師以撕離為手段的驚悚符號語言。同樣的手段亦見於《霹靂奇象》的天來眼（圖 13）

（彩圖 19），天來眼與遊戲軟體的漫畫造形有異曲同工之妙，顯然是造形師有所取法，遮掩的頭套中隱隱露出有如被剝過面皮似的，猶帶血意的頭顱骨，凡此血肉骨骸的呈現皆是以駭人耳目為目的。《龍圖霸業》的骨刀曼九骸（彩圖 20），雖然沒有到血肉剝離的地步，但是滿臉皺皮包著近乎髑髏的造型，也是以驚悚目的為造形取向。《霹靂奇象》的臥龍行（彩圖 21）掀開的頭蓋骨，還可以清楚的看到腦髓的蠕動，幕幕驚悚。《霹靂奇象》的芙蓉骨接近外星人的頭顱，以及缺乏血色的紫棠面龐充分作異類的隱示。而《霹靂奇象》的占卜師詭卦血斷機（圖 14、圖 15）（彩圖 22），手持骨頭，背著飾有死人髑髏的鏡面，在已經深陷的眼窩外更戴上一副具有獠牙與眼珠子的眼鏡，乍看之下猶如眼珠外露一般，此一帶驚悚性的造形，顯然多少受到大戲的影響。京劇有戴上眼珠與吐牙表演，詭卦血斷機造型特色與之頗為接近。要言之，五官肉體的易位離析是引起驚悚情緒的重要造形符號。另外《刀戟戡魔錄》之魔刺兒臉上長滿尖刺，彷彿自殘一般，雖然沒有骨肉析離的現象，卻有骨肉析離的傷痛感，其驚悚效果亦是相同的。



## (五) 神秘的符號

戲劇情節發展過程中，懸疑是導入高潮的重要條件，霹靂布袋戲以長篇連續性的方式演出，尤須以懸疑緊緊扣住前後集之間，觀眾觀賞的空隙，引發持續觀賞的樂趣。因此必須設計許多懸疑的情節，釀造神秘的氛圍，懸疑不只是情節設計一方的責任而已，神秘人物的造形設計，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視覺訴求。欲使人物神秘最重要的設計策略是隱藏，亦即神秘的符號是依恃隱藏為重要的符徵，隱藏本身就是一種異常的行為方式，會引起疑惑和不舒服、不安、不快的情緒，光明磊落的人是不須掩頭遮臉的。「隱以致疑」「隱以掩惡」，隱藏的臉也隱藏著惡意陰謀，或可怕的形象，會使人陷入不安<sup>8</sup>。

霹靂布袋戲充分運用神秘的符號，以遮掩保持私密，想辦法不讓有關自己的訊息外露<sup>9</sup>。期使觀眾藉長期猜疑，將神秘人物的武功能量推向無限，一旦神秘人物真面目揭露，大致也是其武功消竭之時。隱藏的神秘性失去作用，如果還想持續保有深不可測的武功，只好利用不斷的變身來增添神秘的氣息。黃俊雄布袋戲中赫赫有名的反派人物藏鏡人，就是藉著掩藏真面目的神秘造形，持續其大惡的生命。

霹靂布袋戲中隱藏臉的方式有幾種，其中之一是面具，王爾德認為「面具比臉能傳達更多意涵」<sup>10</sup>，面具是凍結住的表情，令人不寒而慄，面具的「不言」，隱藏深沉的心機，傳達出神秘的氣息。《霹靂圖騰》中的毒蠍女（圖 16），《闍城血印》中的解龍形（彩圖 23），《刀戟戡魔錄》的五色妖姬，《霹靂兵燹》中的兵燹（圖 17），《霹靂九皇座》之地獄人形師（圖 18）等，或以面具掩飾本有之身份；或故示面具引起不安情緒。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長期帶著面具的地獄人形師，雖然中間有短暫的時間去除面具，卻發現解開面具的地獄人形師神秘感一消失，人物的靈魂亦隨之消失。因此《霹靂謎城》重新出現之地獄人形師仍然戴著面具，人物與面具已結合而為一，面具賦予人物神秘的靈魂。

<sup>8</sup> 日本學者春日武彥認為隱藏的臉會使他人無法安心，是因為其中含有幾個因素。(1) 無法確定對方是誰而產生的疑惑。(2) 可疑的外表，令人聯想到對方可能做了「不便讓人看到長相」的壞事。(3) 對方不讓人看到臉，是不是存有惡意或計謀？(4) 眼前或許存在著自己無法理解的重大因素——對於這種「非日常性」的困惑和不安。(5) 猜測對方臉上有因疾病或事故而受損的殘缺或畸形。(6) 懷疑遮蔽臉孔這個怪異行為本身就是瘋狂的徵兆。參見《顏面考》，春日武彥著，李毓昭譯，晨星出版，2001 初版。頁 13。

<sup>9</sup> 參見《臉》，Daniel McNeill 著，黃中憲譯，藍鯨出版，2004 年，頁 265。

<sup>10</sup> 同上註，頁 289。

面具的運用除地獄人形師與南柯補夢等人，一齊受制於面具，曾大量出現同型面具外，《霹靂謎城》之天殘哭麻衣、劍尋千步痕、刀影不留蹤、梁堂百迴槍亦出現大量同型面具。同型面具的出現一來可以省卻不同面具的設計心思與時間，一來因面具之雷同，可以塑造出群體概念，強調組織的聯繫功能。面具加在劍君臉上，便是劍尋千步痕，面具加在亂世狂刀臉上，便是刀影不留蹤。面具加在燕歸人臉上，便是梁堂百迴槍。不但省卻面具設計，亦可省卻偶的設計，平白增加許多人物出現，復可藉原有人物的個性武功，加持於新塑造人物身上。面具不但具有隱藏功能，也間接解決了不少製偶的困擾，甚且為新塑造人物添加不少神秘的色彩，但是此種簡易處理的人物設計，畢竟沒有精心設計長期經營的偶像人物個性鮮明，因此生命力也比較薄弱，多半短暫的出現，短暫的結束。

面具有全型半型之分，以上所舉皆是全型，另一種局部遮住臉部的半型面具，亦有隱藏的功能。例如《霹靂刀鋒》的傲刀蒼龍（彩圖 24），戴著半截鐵面具，露出嘴部以下部份。《刀戟戡魔錄》中之練峨眉（圖 19）以鐵面具遮住左半臉，神秘的符號背後皆隱藏著深不可測的武功。《刀戟戡魔錄》中的鬼見、冥知，真正登場前，臉部模糊鑲嵌於石崖之中，似乎主掌著異度魔界龐大雄厚的黑暗勢力。二人一旦現臉，隨著神秘感之消失，功力即大不如前。而異度魔界之神秘力量除鬼見、冥知外，同時出現之三名悍將，別見狂華（圖 20）（彩圖 25）只瞶隻眼的遮臉方式，赦生童子（圖 21）以布條遮住雙眼，元禍天荒（圖 22）（彩圖 26）遮住雙眼的面具，不約而同的以神秘的隱藏臉部出現。隱藏符號呈顯其神秘性，三人現臉之後，亦難以避免的面臨退場的命運。別見狂華、赦生童子透露面具之外的不同遮臉方式。不同的遮掩方式，皆有著神秘的意涵，例如《霹靂刀鋒》中的冷月心，掩藏於斗笠內的人，也掩藏著千變萬化難以捉摸的心機。《闍城血印》與《刀戟戡魔錄》中不肯洩露真實身份的獨夜人與天險刀藏，加上掩藏的神秘符號後，的確也能收到來歷不明的效果。《霹靂奇象》中的蠱醫罩上一層黑紗掩住面目後，加深了蠱毒的神秘性。《霹靂奇象》中的夜重生罩上黑幕後，甚且引起異類生物的聯想。《萬里征途》中的夜岸鬼僧（彩圖 27、28），斗笠內的頭顱尚繪有難懂的藏文彩繪，增加雙重的神秘氣息，會引起來自異域的聯想亦不難理解。

遮掩隱藏是神秘氛圍的策略使用，一般而言，運用神秘符號的目的包括以下幾點：1、隱身份，劇中人物身份不欲人知，如解龍形、傲刀蒼龍。2、增能力，加持劇中人物的武功，發揮深不可測的聯想。3、呈詭譎，透過神秘製造詭譎的性格，如地獄人形師。4、藏邪機，強化邪惡幽暗的潛伏功能，如蠱皇。5、遮醜惡，遮掩醜陋之臉，以免引起嫌惡，

如五色妖姬。隱面目的同時，亦可能兼具兩種以上的不同目的，正如神秘本身的不可知一般，神秘符號的多樣功能，正是試圖開啓龐大的不可知的世界。

## （六）超現實的符號

霹靂布袋戲人物造形為期海闊天空，盡力馳騁想像，以及接軌新時代潮流，充分運用了超現實的符號。傳統的寫實的以角色為類型化核心的布袋戲偶，早已無法滿足當年年輕木偶設計師多元的表現慾望，他們除了接繼傳統之外，更廣泛的參考電腦遊戲軟體、漫畫、電影、電視劇等材料，將不同性能，不同時空的材料，大膽的融入霹靂人物造形設計中。從現實世界既有的成相中，拓展想像視野，以光怪陸離，新奇荒誕的的造形，充分運用超現實的手法，打破既有的人體限制，呈顯更多樣化的人物變化。

霹靂布袋戲偶超現實符號的運用，大體是依循著以下幾種主要的設計原則：

1. 異類同體：所謂異類同體是指現實世界中無法同體共生的異類，荒誕的同體存在，人獸共體的造形比比皆是。霹靂布袋戲的造形設計者雖十分現代，但是現代人內心深處仍潛藏者簡單素樸的原始想法，他們的原始心靈中仍是與原始人的想法一樣，「相信一切無意識的心靈活動都是具體的，客觀性的，他自然是不懷疑，一位被描繪成一頭豹的人確具有豹之靈魂的說法」<sup>11</sup>。物皆有靈，有靈的動植物與人是一體的存在的觀念深植於心。如擁有豹頭的夜凌（彩圖 29），虎頭的虎帥，蝙蝠造形的驚雷狂梟（彩圖 30），貓頭鷹頭並加掛一副眼鏡的神梟。具有爬蟲類軀體的變裔天邪與半君邪，以山豬皮縫臉的皮鼓師。以及植物造形的苦瓜頭醉不醒，黑霧森林中的金瓜。以器物為造形的鬼王棺的棺材頭。昆蟲為造形的蟲尊與蒼蠅頭鬼祚師（彩圖 31）。大自然千變萬化的題材，豐富了霹靂戲偶人物的造形。而異類同體中的異類其實就是一種符號說明，夜凌幽守淒厲的洞窟，深藏黑豹的冷峻。虎帥如虎是九幽一員兇惡粗暴的猛將，驚雷狂梟猶如一隻帶菌的蝙蝠，以自爆的死亡方式散布毒菌。神梟有著的沉靜，變裔天邪、半君邪帶有爬蟲類的原始野性，皮鼓師深居瀚海森林融合山豬的蠻性與自衛特色，醉不醒與金瓜充滿瓜類吸收陽光的樸實快樂的個性，鬼王棺以索命為宗旨的棺木頭設計，鬼祚師奉事

<sup>11</sup> 精神分析師楊格（C.Jung1875-1961）之說法。參見《尋求靈魂的現代人》楊格著，黃奇銘譯，志文出版社，民 73 年 5 月再版。頁 171。

陰類之主夜重生的蒼蠅頭設計，在在透發半人半獸，半人半物的魔幻魅力，吳明德從人類的神話思維一端，詮釋半人半獸所透發的超自然力量，極為允當<sup>12</sup>。

2. 時空錯置：不同的地理條件，不同的時代因素，塑造了不同風格的族群特色。霹靂布袋戲充分發揮了臺灣特有的多元文化特色，不論古今中外，人物衣著皆可融於一體。具有現代感的四分之三拉起小提琴（圖 23），半分之間袖起步鎗，虛無神獸（彩圖 32）不但是人獸異體同生，還留著龐克頭抽起煙來，穿著西洋宮廷服飾的西蒙、茶理王、地獄人形師、柳湘音，蘇格蘭格子裙裝扮的紅寅。現代畫家裝扮有著電視節目主持人豬哥亮與澎恰恰綜合體的弄三平，戴現代廚師帽的蚵仔煎杜一葦。美國西部牛仔裝的秦假仙，日本髮式與家居服的業途靈。以及 SARS 期間所創造出來散播鱗菌的反派人物覆天殤，隨時口覆一只口罩，更具時代意義。
3. 肢體出位：現實世界人物，肢體各有其位，超現實表現之人物則肢體出其位，以反常之位態呈現不合常理的存在。如地理司以凹凸相反之造形，臉部作不合理之凹陷。腦還顛則頭顛上下倒位，嘴在眼上眉居眼下（圖 24）。蔭屍人（彩圖 33）裝扮之腹中蔭造形，頭生腹中。鬼隱另一雙駢枝之手捧棺材安置於胸口，彷彿掏心狀。夜重生駢生四手於耳際。至於邯鄲補夢的無頭造形，以「無」顯示肢體的不合理消失，皆屬此一現象。
4. 陰陽共生：如同肢體各有其位一般，男女陰陽各有性徵，霹靂布袋戲偶設計，大膽的突破陰陽性徵之差異，將之同時呈現於一體之中，使陰陽共生，悖離陰陽各體各有性徵之界線。最明顯的是彷彿連體嬰般的陰無獨陽有偶，女性造形的陰無獨與男性造形的陽有偶同體共生，以鬥嘴鼓的形態呈顯同體共生中亦有其各別的性格屬性，後來連體一分為二。《封靈島》中的大魔頭魔佛波旬三體一身，分別由惡體閻達，女體女琊，智體迷達（圖 25），合體為三頭六臂（圖 26），分化時則各自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意識個體。《萬里征途》中的北無君（彩圖 34）作女性丫鬟裝扮卻留有鬍鬚，蒙上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還有可作男體女體變化的陰陽師，《萬里征途》中以男體呈現，《闍城血印》中以女體呈現。

---

<sup>12</sup> 吳明德認為「一個人有非凡的、超人的能力，於是在人的形體上添加獸的部份形體，讓人獸合一的神異造型呈現出不存在於真實世界的心理視象，只有超自然形態的形象才可能象徵神靈的超自然的力量。也只有實有物象與幻想的物象的多種綜合互滲形象，才能象徵渾沌思維創造的神秘觀念。」見《臺灣布袋戲表演藝術之美》吳明德，臺灣 學生書局出版，2005 年 7 月，頁 450。

5. 靈體實生：生命由靈魂與肉體構築而成，一虛一實，各居其位，靈魂雖虛，許多民族皆深信其存在，甚至有三魂的說法。霹靂布袋戲則進而將虛魂實體化，其基本造形與實體差異不大。如靛羽風蓮、業火紅蓮、墨淵水蓮分別為素還真「俱神凝體」之化身，以水青、紅與黑三色裝扮，實寫素還真之意識，將飄逸風趣之個性、憤怒激動之情緒、沉著冷靜之處事態度作實體的呈現，其中顏色的符號義特別明顯。又如一步蓮華與其惡體襲滅天來，一白一黑，分其善惡，再於襲滅天來略加彩繪，作黥臉的罪惡暗示，他如四無君的紅藍兩體也是以顏色作區分。一劍封禪與吞佛童子，以白色與紅色作善惡之別，唯此二人造形差異較大，但是臉龐上沉鬱的精神特質卻是一致的，以抽象的精神特質連繫善惡兩體，是極為成功的造形設計。靈體實生的現象在《霹靂劍蹤》之後，大量運用，造形變化，亦漸趨複雜，甚且為造成懸疑，達到混淆觀眾耳目效果，故意破壞造形設計理則，符號義亦從而不彰。如六禍蒼龍與其化體寰宰識能龍、一品皇綬、神魁戰武，造形之懸殊即是。而吞佛童子所持之朱厭劍，竟因物靈化為實體之朱厭劍靈，造形則取法於主人吞佛童子，高髻，紅白裝扮，紅多於白，眉與眉間作紅綠配色，有著業火紅蓮般之火躁特質。

## （七）憂鬱的符號

「欲知一點心中事，請看纖纖兩道眉」，容顏可以讀寫一個人的內心狀態，而憂鬱的呈顯多集中於眉間。霹靂布袋戲刻偶師掌握此一心情符號，在左右眉骨上端略作凹陷處理，望之有如皺眉一般。羽人非獍（彩圖 35）心中埋藏難以化解的家庭悲劇，沉重的心事集結眉間，再搭配一把胡琴，拉出悠揚哀淒的曲調，似有無限的哀怨等待傾吐。出場即吟詠人間十二恨的劍君十二恨，滿懷的怨恨，也是以眉間的凹陷作為表徵。苦苦追尋自我的人邪，以及帶魔性的吞佛童子，整張臉龐的特徵集中於眉間，凝住極為複雜的內心狀態。滿腹韜略為六禍蒼龍運籌帷幄的寂寞侯，名字已透露出內心遼闊如海的寂寞，臉部亦多有憂鬱的符徵。而羽人非獍與寂寞侯臉色與衣服皆以蒼白為主調，寂寞侯（彩圖 36）蒼白中寒帶著灰慘，這是憂鬱的色澤。因為憂鬱是複雜心事的積淀，所以以此符徵所塑造出來的人物，都有一定的感情深度，常常是劇集中深度刻寫的重要人物。劇情發展過程中經常花很多篇幅化解其潛藏深處的心結。此類人物，話不多，時常處於孤獨狀態，

用於營造其深思自省的特色。

## （八）速度的符號

布袋戲的武鬥場面是吸引觀眾的賣點，而武鬥又以速度與力量為決定勝敗的兩大要素。早期的演出，武鬥到激烈處，經常以拋偶來表現動作之快速，熟練靈活的演師動作，讓觀眾目不暇及。現代霹靂布袋戲運用各種電腦動畫技巧，已能輕易的呈現戰鬥的激烈，與行動之快速。本文所要探討的不在動作的符號，而是希望直接透過造形，即能嗅聞到戲劇人物的速度特質。以物象觀察，羽毛為速度最重要之符號象徵。欲求其速，必須載體本身輕盈，羽毛因質輕而成為速度的重要符號。同時羽毛又為飛翔之重要特徵，自然順理成章的成為速度的代言人。為達到輕的要求，視覺上自然以白色最能體現質輕的感覺。所以羽質與白色的造形，成為速度的符號特徵。霹靂布袋戲中以速度聞名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為羽人非獍、風之痕（彩圖 37）、銀狐（彩圖 38）。羽人非獍取名羽人，直接運用羽之符徵，使用其六翼刀法武功時，更長出翼翅輔助，速度形象極為明朗。衣服裝扮亦一身雪白，邊緣以綠色薄邊略加點綴而已。風之痕武功特色亦是速度，取象於風，髮形作飛揚狀，裝扮以白為主色。同樣的身形倏忽一身白裘之銀狐，狐耳造形，與風之痕飛揚的髮式類似。他如疾鷹、天之翼髮揚如翼，皆為此類符徵。只是限於角色的重要性，無法作充分的發揮。

## （九）醜陋的符號

醜陋雖是人心排斥的對象，不過在藝術設計過程中卻又不斷的出現，藝術家以醜陋為素材，充分發揮藝術創造的功能，化腐朽為神奇。也說明了美醜之間的差距，並非想像中的遙遠，甚至近至一線之隔而已。因此以醜為美成為藝術創造的重要手段，美醜之間亦存在者彼此可以相互取代的可能。<sup>13</sup>同一形體，青春可以使之凝聚為最高的自然美，但當時間之刀暗地將青春鮮麗漸漸磨滅時，衰敗的容顏便揭露醜陋的來臨<sup>14</sup>。

傳統戲劇腳色以生、旦、淨、末、丑為主，小戲則以小生、小旦、小丑為主，丑即

---

<sup>13</sup> 葉航認為「美與醜之間並沒有界線，也不存邏輯關係，所以就享有相互取代的可能性。」見《美的探索》，葉航，志文出版社，民 77 年 4 月初版，頁 110。

<sup>14</sup> 同上註，頁 205。

醜字，專寫人間之醜陋，或勾勒世俗醜態，或嘲諷市井醜狀，此一腳色，不避醜陋，甚且反其理以之為人物塑造指標。傳統布袋戲的七醜常佔有相當的戲份<sup>15</sup>，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風靡一時的電視布袋戲，班主黃俊雄創造了不少醜陋的角色，如兩齒、秘雕、秦假仙，仍然秉持傳統布袋戲七醜的創作原則，以傷殘作為醜陋的特徵，於是兔唇缺嘴、凸目、凹鼻、大頭等頭顱顏面的傷殘成為醜陋的要件，黃俊雄將之擴充為肢體殘缺。

霹靂布袋戲亦不離此原則，如《霹靂劍蹤》中的六醜（彩圖 39）即是以莊子書中所描述的支離疏為藍本塑造的人物，但是霹靂布袋戲更著重於顏面的傷殘，例如蟠凶、鄒縱天之爛瘡，聶求刑皮膚嚴重傷殘，隱約帶著傳統布袋戲狐狸怪、狐狸母的形徵，文字春也有皮膚傷殘的符號，不過為了劇情需要醜陋中仍保留了女性的嫵媚。震天蒼壁（彩圖 40）滿臉鑲滿碎鐵，魔刺兒顏面佈滿針刺，都是以傷害顏面作為醜陋的符徵。然而霹靂布袋戲對於醜陋的設計是多元的，除了以傷殘作為人物設計的策略外，尚有許多巧思，如仇無恩左右臉失衡的設計，一半正常，另一半臉頰骨塊作鋸齒狀。凌威、吳了然則是左右不平均，大小眼兼爆牙的醜陋特色，從秩序中衍生無秩序，非但不因失序失衡而帶來混亂，反而增加不少情趣，從不協調中催生的不協調美感情趣<sup>16</sup>。醜俠無人愛，半蓋的眼皮醜陋中還帶著笨拙。秦假仙凹槽紅鼻子開其端，至驚雷狂鼻則充分發揮，取象於蝙蝠，鼻子凹陷得更為透徹。姥無豔的醜，則是以巫婆為基型，鷹鉤鼻與疏落的牙齒，珠婆婆很明顯的翻版自神隱少女中的金、銀婆婆，強調老化的臉孔。因此老化也是潛藏著醜陋的符徵，百足毒仙、揆九命栩栩如生的皺紋，配合傷殘的手臂，藉老化亦達到醜陋的效果。傲刀纓鶯從美麗而醜陋，是以潰爛的臉皮作為符徵。當他以九幽帶領一群超現實的葉口月人時，則臉上勾勒雙層的鉤眉，肩背撐起權力的象徵，儼然異世界的女霸主，最後變成姜嫫時則是以老化作為醜陋的形徵，傲刀纓鶯多變的一生中多變的造形，這可以清楚的看出醜陋的符號特色。《開疆紀》中的沙伯偃偻身子，臉上隆起的顱骨與六醜相似，而外帶拉鍊般的疤痕，包藏於布巾中，醜陋中復夾帶幾分神秘，比之夜瀧月漩渦，沙伯醜陋多於神秘，月漩渦則神秘多於醜陋。

<sup>15</sup> 七醜為大頭、臭頭、人上、憨童、缺嘴、溪頭慶、大舌貴。見沈平山《布袋戲》頁 235。

<sup>16</sup> 同註 10。

## (十) 邪惡的符號

戲劇情節以衝突引起高潮，衝突變離不開正邪的對立。傳統戲劇在腳色分類上已大致將正邪腳色規範出來。現代布袋戲則已脫離腳色之規範，甚而故意顛覆傳統腳色觀念以造成懸疑效果。霹靂布袋戲出現一些游離於正邪之間的人物，保有戲劇情節大轉變的空間，因此人物造形如欲明確理出邪惡的符號實有困難，然人物千變，觀眾不變。畢竟觀眾仍有潛在的邪惡符號，運用邪惡符號作為造形準則，能從觀眾的思想習慣中，快速達成戲劇效果。以顏色言，最易區別正邪的顏色是黑白兩色，白衣劍少與黑衣劍少兄弟同時出現，一白一黑，黑衣劍少的躁暴與狠野瘋狂就比較帶有邪惡的氣質。除黑白兩色不同外，二人服飾設計，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彰顯出黑白雙少深厚的兄弟情感<sup>17</sup>。有意的黑白設計，就是想藉著白顏色的差異勾勒出二者心性的不同。以裝扮言，犬牙造形為邪惡的代表，為便利觀眾認識，犬牙多醒目的安置於肩領之間。例如《九皇座》的戰天戟（彩圖 41），《霹靂劍蹤》中的天蠶蝕月夜重生，《刀戟戡魔錄》中的閻魔早魘，《霹靂奇象》中的九禍，《霹靂開疆紀》中地獄島島主聖閻羅（彩圖 42）。千篇一律，肩領造形作犬牙狀者多為數一數二之大魔頭，此一造形現象在《霹靂兵燹》中的橫千秋開始呈現，橫千秋的蠻氣藉牛角成作象徵，劇中狂妖神亦有角狀造形，然此一邪惡符號訊息尚十分薄弱，橫千秋只是蠻橫並不邪惡，自戰天戟出現後犬牙造形開始頻繁出現。昭穆尊、鬼梁天下、六禍蒼龍的大惡，因其偽善，並沒有呈現出犬牙造形中。地獄島的聖閻羅，也是先善後惡，不過卻早早藉犬牙造形露出邪惡的端倪。

除顏色與裝扮外，顛骨的造形亦常是邪惡的符徵，《九皇座》中的雲濤夢筆（彩圖 43）沐流塵，前期與後期造形不同，前期造形青筋外暴，額頭糾結，靈感可能來自電影的《星際迷航記》，極道天權（彩圖 44）也有相同的額。《封靈島》中的鬼隱，飽滿外突的額，若有若無的眉，白色的臉色，塑造出陰冷的邪惡<sup>18</sup>。《霹靂刀鋒》中的望月天狼，《霹靂謎城》中的昆非笑（圖 27），《霹靂皇龍紀》的八津蠻（圖 28），都有類似的邪惡特色。

<sup>17</sup> 參見《霹靂造型達人書》，黃強華，台灣，霹靂新潮社，2007年。頁100。

<sup>18</sup> 拔光眉毛會呈現失去表情的冷酷。參見《臉》，Daniel McNeill 著，黃中憲譯，台灣，藍鯨出版社，2004年。頁218。



### 三、結語

透過以上人物造形舉例，吾人可以理解，霹靂造形師從事造形設計時，有極為清楚的造形理念。不論偶頭雕刻，服飾裝扮，均有其特定的符號語言。藉各種符徵，鮮明的勾勒人物性格、情緒，使人物甫出場即能呈現出性格特質，加速融入所鋪設之劇情當中。霹靂布袋戲最可貴的精神是不斷的求新求變，打破角色的迷思，追求個人風格，一人一風格，是造形的一大突破。過去因經濟壓力，以有限的偶頭，寫盡人生百態，難免諸多限制，造成個性塑造的模糊。然而，一人一風格的造形方式，對造形師而言，是一大負擔，在時間壓力下如何再塑造全新的人物，實是一大考驗。造形師在求新求變的造形過程中，也會不自主的遵循舊軌作設計，從而固定成具體的符號象徵。例如《風起雲湧》的天魔，戴著日本風格的戰盔，《霹靂謎城》的勾皇彝燦天（圖 29），《霹靂開疆紀》的軍神（彩圖 45），以及白狐君宇犬若丸（彩圖 46），亦多是以同一的符號呈現其理念。霹靂布袋戲目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傳統劇種，隨時代潮流不斷注入新的營養，新的造形理念。本文從造形一端，窺看其符號設計理念與符號設計方式，企圖理出萬變不離其宗的理則，也意識到傳統布袋戲的腳色分類，其實也有相當的符號依據，諸如紅花與黑花的顏色情感差異，文目與圓目的人相學說法，亦即這些被霹靂布袋戲否定的腳色分類，背後的符號義是不容易消逝的。霹靂布袋戲所運用的符號象徵，當他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勢必又會走向它所推翻的腳色分類，另外統整出另類的腳色分類，名稱儘管有差異，或稱雜或稱龍套，或稱上下手，或稱路人甲，或稱小囉嘍，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符號是抽象理念外顯的語言，全然因觀眾之心理現象而凝聚，人心對外界事物變化，有固定的反應方式。因此符號本身亦會因反覆呈現而僵化，而程式化。當戲劇建立完整的程式化表演符號系統時，戲劇的生命力必然喪失，同時也宣佈該劇種的結束，這是無可避免的宿命輪迴。如果為了求新求變而大膽作違逆人心反應的造形，其滅更速。

「附圖」為筆者以線條勾勒，使易辨其形構，「彩圖」則見整體造形之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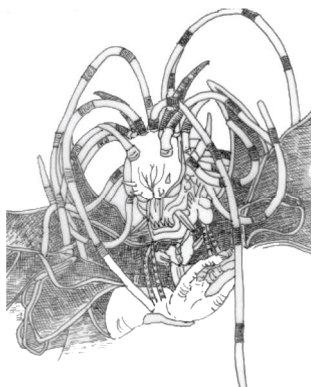


圖 1 蟲尊



圖 2 九幽



圖 3 覆天殤



圖 4 芙蓉骨



圖 5 閻魔早魁



圖 6 夜重生



圖 7 夜重生



圖 8 狂龍一聲笑



圖 9 變裔天邪



圖 10 鬼隱



圖 11 地理司



圖 12 皮鼓師



圖 13 天來眼



圖 14 詭卦血斷機



圖 15 詭卦血斷機



圖 16 毒蠍女



圖 17 兵燹



圖 18 人形師



圖 19 練峨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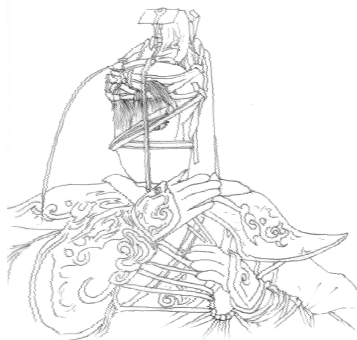


圖 20 別見狂華



圖 21 赦生童子



圖 22 元禍天荒



圖 23 四分之三



圖 24 腦還顛



圖 25 迷達



圖 26 魔佛波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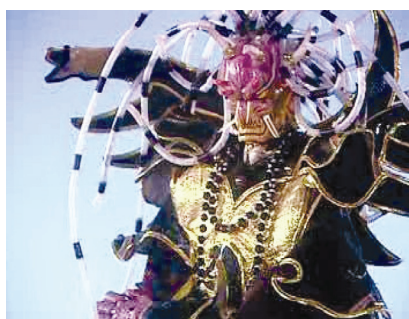
圖 27 毘非笑



圖 28 八津蠻



圖 29 勾皇彝燦天



彩圖 1 蟲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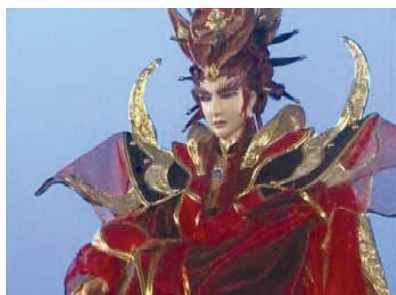
彩圖 2 經天子



彩圖 3 九曲邪君



彩圖 4 殒惑之眼



彩圖 5 血邪滅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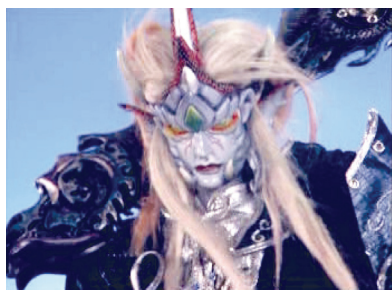
彩圖 6 邪卷殺魂



彩圖 7 芙蓉骨



彩圖 8 冥輪法魁



彩圖 9 閻魔早魁



彩圖 10 白衣劍少



彩圖 11 六禍蒼龍



彩圖 12 狂龍一聲笑



彩圖 13 凶流道



彩圖 14 鬼王棺



彩圖 15 報馬猴



彩圖 16 車夫





彩圖 17 鄒縱天



彩圖 18 地理司



彩圖 19 天來眼



彩圖 20 骨刀曼九骸



彩圖 21 臥龍行腦髓



彩圖 22 詭卦血斷機



彩圖 23 解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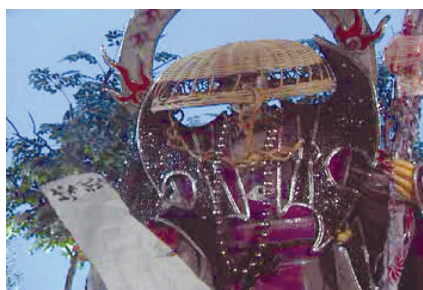
彩圖 24 傲刀蒼龍



彩圖 25 別見狂華



彩圖 26 元禍天荒



彩圖 27 夜岸鬼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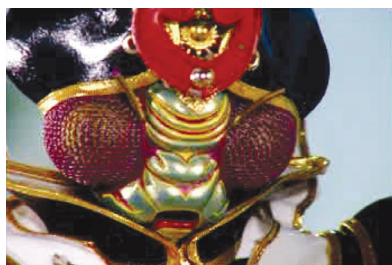
彩圖 28 夜岸鬼僧



彩圖 29 夜凌



彩圖 30 驚雷狂梟



彩圖 31 鬼祚師



彩圖 32 虛無神獸



彩圖 33 陰屍人



彩圖 34 北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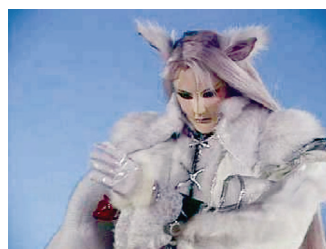
彩圖 35 羽人非獍



彩圖 36 寂寞侯



彩圖 37 風之痕



彩圖 38 銀狐



彩圖 39 六醜



彩圖 40 震天蒼壁



彩圖 41 戰天戟



彩圖 42 聖閻羅



彩圖 43 雲濤夢筆



彩圖 44 極道天權



彩圖 45 軍神



彩圖 46 犬若丸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11-33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11-332

# 索爾·貝婁與摩西·何索格：《何索格》 中含混不清的話語

吳品湘\*

## Saul Bellow and Moses Herzog: Vague and Problematic Discourses in *Herzog*

by  
Wu, Pin-hsiang Natalie

關鍵詞：雙聲敘述、對話、作者話語、角色話語、多音

**Keywords:** double narration, dialogue, authorial discourse, character's discourse, polyphony

---

\* 建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 〔提要〕

閱讀索爾·貝婁的名著《何索格》時，評論家與讀者時常發現難以區分作者與主角摩西·何索格的話語，部份評論家與讀者甚至將兩人的話語混為一談，認為具有大學歷史系教授身份的小說主角在《何索格》中時常為作者發聲。事實上，將貝婁與摩西·何索格的話語混為一談，不僅忽視貝婁對小說創作的主張，也拒絕承認摩西·何索格為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小說主角。本論文修正俄國語言與文學評論家巴赫金的「雙聲敘述」理論，釐清並區分《何索格》中作者與小說主角話語，包括一些搖擺於作者與主角之間，定位不清的話語，指出小說中作者話語出現的目的在於藝術性地建構摩西·何索格的故事，換言之，貝婁的話語主要為小說的敘述架構而存在，而摩西·何索格的話語則相當自主性，全然顯示他個人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並未為作者傳達訊息。

## Abstract

Critics and readers of *Herzog* are oft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when trying to distinguish Moses Herzog's voice from that of Saul Bellow's. Many of them even mix up the voices of the two, taking it for granted that Moses Herzog serves as a mouthpiece for Bellow. The mixing up of character's and author's voices not only ignores Bellow's artistic asser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but may possibly cause such misunderstanding as not to see Moses Herzog as a character of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ose problematic and blurred discourses in the novel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at Bellow's discourse sets primarily upon his artistic design for the story of Moses Herzog. The Russian linguistic / literary critic M. M. Bakhtin's proposals for "double narration," with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revisions of his propositions, have been used as criteria to investigate the novelistic discourses in *Herzog* since Bakhtin is an ardent believer in the necessary separation of the author's discourse from the hero's. Examined under the frame of the researcher's revisions of Bakhtin'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 reader discovers that Moses' discourse exposes his individual worldviews while Bellow's discourse serves to fulfill the hierarchy of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A general problem with the critics of *Herzog*, and also with the reader, is that they encounter much ambiguity in trying to distinguish Moses' voice from that of Saul Bellow's. Outside the use of direct quotation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peech of the hero, indirect present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words in the novel sometimes obliterates the delimita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hero. Many of those critics and readers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Moses, especially in displaying his philosophical, intellectual, ethical, and philanthropic viewpoints, serves as a mouthpiece for Bellow and thu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resides in the optimistic moralistic values proposed by Bellow to act as a counterweight against the prevalent pessimistic attitudes or cultural nihilism of the modern West. Brigitte Scheer-Schaezler, in a speech delivered to students of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86, obviously mixed Moses Herzog's identity with Saul Bellow's. In her speech she conveyed ideas such as "one of Bellow's most explicit passages refuting cultural pessimism is contained in *Herzog* in which Bellow allows himself to become really temperamental, angry, witty, and sharply ironical" (5). Suzanne Evertsen Lundquist, another critic of Bellow, wrote that "Bellow, through the mouth of Herzog, has demonstrated the paradox of the textual metaphor" (38). Andrea Mannis presupposed that Moses' definition of Nietzsche's words equals Bellow's own: "Herzog admires these men as well, particularly Nietzsche, in whom Herzog recognizes the courage to question as has never been questioned before. Thus Bellow's opinion of Nietzsche is mixed . . ." (28). M. A. Quayum similarly notices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discourse of the hero and that of the author when he make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despite the separate identity Herzog enjoys in the fictive world of the novel, he also shares temperamental affinities with his author and comes to represent the latter's voice and sentiment in many ways" (44). Such mixing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author's voices not only ignores Bellow's artistic asser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but may possibly cause such misunderstanding as not to see Moses as a character of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In his 1976 Nobel speech, Bellow observed that "human types have become false and boring;" and that those "identifiable personalities" which we derived from many famous European novels actually represent "an awful phenomenon" (Bellow "Nobel Lecture" 80). Bellow agreed with Elizabeth Bowen's definition that "characters . . . are not created by writers.

They preexist and they have to be found” (Bellow “Nobel Lecture” 82). Clearly, Bellow refuted the notion that he spoke through the mouth of Moses to convey his own philosophy; thus the reader might be misled if he blurs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discourses of the hero and the author. As readers, we should clarify that Bellow’s discourse sets primarily upon his artistic design for the story of Moses as the author seeks to make all parts contribute to the final message of the novel. The author’s speech and the hero’s discourse thus must both be defined spherically to make clear the interactions, agreement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m.

Mikhail M. Bakhtin’s (1895-1975) proposition of “double narration”<sup>1</sup> serves as criteria for clarifying those vague and problematic discourses in *Herzog* because the notions of “double narration” involve a fundamental belief in which the author’s discourse and the character’s discourse should be separated. The author and the hero must b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identities. The hero must create his own field of vision and unique perspective, define himself, design his own life, decide his own fate and thus “the real-life definition” of the hero and “the artistic dominant of his image are fused into one”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51). However, Bakhtin’s linguistic proposals serve only partially a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this paper. In spite of his prominent contributions, I maintain that there is a further break down of his “authorial discourse” into two subdivisions: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and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sup>2</sup>.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refers to the author’s depictions of the

---

<sup>1</sup> “Double narration” is a term proposed by Bakhtin who is strongly against belief in the surpassing and encompassing role of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him,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author to allow the “automatic” developments of his characters since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 levels and possess divergent social languages. In the writing process the author extensively engages in a form of dialogue with his character and no longer can he take control of their languages as well as ideologies. For details, see 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Texas: U of Texas, P. 1981.

<sup>2</sup> I made up those two terms,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and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to further explore Bakhtin’s linguistic definition of the authorial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many situations, authorial discourse is largely invisible in the work of fiction whereby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may cover what Bakhtin defines for novelistic prose: (a) direct, unmediated discourse directed exclusively towards its referential object,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speaker’s ultimate semantic authority; (b) Objectified discourse or discourse of a represented person; and (c) Discourse with an orientation towards someone else’s discourse



character, the plot, with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hat implies all of which are discernible in the text. In his examinations of the novelistic discourses Bakhtin focuses mainly on what I call the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and this leads to an unsatisfactory disappointment because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is never sufficient in transmitting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e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covers all elements on the structural plane of a novel and can express the author’s real intention in a more complete way to reach a better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The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includes the author’s arrangement of the life of a character—how it is to be presented, the way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character, the points of focus, and the focused philosophy or horizon. Put simply,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or “the author’s aesthetic activity,” (Bonetskaia 87)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 of the novel<sup>3</sup>. To completely perceive Bellow’s artistic design for *Herzog*, bo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authorial

---

(Denith 46). On the other hand, “invisible” means the discourse is in concealed form. The 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includes the author’s arrangement of the sequence of the story, the author’s decision as to what events about the hero are to be portrayed and what aspect of the hero to be exaggerated. It also includes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of the hero, the author’s determination as to how much the past, the hidden life, and the inner thoughts of the hero are to be revealed.

<sup>3</sup> Bakhtin’s earliest writing about the author-hero subject is a long essay, namely,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 later collected in *Art and Answerability*, which describes how and on what principle the author aesthetically creates his hero. “Author and Hero”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written before “The Hero,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Author with Regard to the Hero,” 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and hence readers can see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se essays, centering upon the author-hero relation, do not satisfyingly resolve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controvers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hero, as Natal’ia Bonetskaia identified. She pointed out that in his previous essays, Bakhtin associated the form of the novel with the author’s aesthetic activity and it is clear that Bakhtin is bewildered that the “liberated meaning of the hero still does not become a thing in itself, but is still open to authorial intentions” (Bonetskaia 89). Although later, in *Problems*, it seemed that Dostoevsky’s works “offere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spirit” (Bonetskaia 89), actually Bakhtin did not continue in his dilemma over the author’s “giving form” and the hero’s “gradually recovering autonomy”—Bakhtin just stopped talking about the authorial intentions upon the hero—“Bu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onsummation’ in Dostoevsky” (Bonetskaia 90). Instead, the theorist suggested a new form of art—the “polyphonic novel” which “transcend the bounds of literature to become an autonomous type of art” (Bonetskaia 90).

discourse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ovelistic discourses in *Herzog*.

Moses' first sentence "If I am out of my mind"<sup>4</sup> serves as a marker of stress and anxiety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s busy nervous system triggers ceaseless brai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vent and relax, to ease the physic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neurotic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and to finally reach the tranquility of heart. Moses' discourse is characterized by a prejudice against womenfolk produced principally because of his unhappy memory of Madeleine, frequent visits and revisits to his memories of the past, and scholarly proclamations on mankind-saving reasonability caused by a phobia toward Madeleine's upcoming academic position and also Gersbach's increasing popularity. A sense of torture and painful betrayal together with a mixture of unhappy memories compulsively take hold of him at any moment and even lead him to a misdirected stereotyping of other people. Indeed, we find that Moses thinks like an abnormal person who frequently and forcefully shapes the people around him in the image of evildoers, and conspirators with, particularly, Madeleine. Many passages in the novel serve purely as an extension of the hero's inner world. Moses' views, therefore, are always dangerous because most of them are narcissistic. Take the scene that describes Moses' car-rental as an example, Moses evokes his own image—an untidy, disordered, distracted man, in the eyes of others. But the car-rental official's indifference proves that the hero's self-depiction does not correspond to hers. In her eyes, Moses appears to be just an ordinary customer. Unfortunately, throughout the novel Moses persists in giving credence to this mental image. He constantly calls for a self-created image of himself—always pitiable and wretched in the eyes of not others around him, but himself. In the scene where he complains to Zelda about Madeleine, again his own image arises before his eyes: "He tried to get a grip on himself. Half buttoned, red-eyed, unshaved, he looked disgraceful. Indecent" (*H* 42). Such a unique discourse typically represents Moses' thinking style and at the same time directly speaks of his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ero's autonomous speech, we can say that Bellow triumphantly presents the hero's peculiar perspective without

---

<sup>4</sup> Saul Bellow, *Herzog* (New York: Penguin, 2003), 3. Hereafter, page numbers will be cited in the text with the abbreviation *H*.

adding any distortion of his own.

Other places which apparently allow the reader to see Moses' individual worldviews exist in numerous passages in which the hero's prejudice against women is uncovered. Moses' mistaken belief in women as negative forces is clearly derived from his unhappy memories of Madeleine. During the five days he repeatedly recalls how proudly she has displayed the masculine quality of retorting and finding fault with him, and how humiliatingly he has laid himself open, like a woman accepting the criticism she offers. He loses sight of his male dignity to his own, vulnerably when she successfully becomes the "aggressor and oppressor" (Mannis 39). After he is deeply and strongly fluctuated by her deception as well as disloyalty, his distrust toward women is fortified by an agitated mind and troubled memories. Such bigotry is responsible for his delusive, misapprehensive, and seclusive discourse, especially evident when the situation is clear to the reader. Thus, Moses' vision of women is generally negative and at odds with reality. The following passage best exemplifies his misdirected views of women:

In the crowds of Grand Central Station, Herzog.....saw twenty paces away the white soft face and independent look of a woman in a shining black straw hat which held her head in depth and eyes . . . Those eyes might be blue, perhaps green, even gray—he would never know. But they were bitch eyes, that was certain. They expressed a sort of female arrogance which had an immediate sexual power over him; he experienced it again that very moment—a round face, the clear gaze of pale bitch eyes, a pair of proud legs. (*H* 39)

What we see here is more the inner Moses than the woman in the station. Everything in that woman becomes a symbol of his inner state—a round soft face, independent look, bitch eyes and proud legs that will surely subjugate him or relegate him to a subordinate position. The view is actually an extension of his inner world instead of an indifferent description by the author. Obviously Moses is captive to the incorrigible determination that those female relatives of Madeleine, or even women who bear absolutely no relationship with her, will never

have mercy on his wretched plight. Nor will they become good folk to him in any circumstances. His confirmation of this, however, is not an outcome of accumulated facts by way of any scientific method but pure sentimentality established upon individual memory.

In Mose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the reader sometimes witnesses the discourses of other characters. On the one hand, those discourses are nevertheless presented in fragmented and in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other, Moses may be remembering only the scenes he desires to recall or fails to repress, or he may be participating only the sentences he wants to remember based on his present condition. He frequently brings up the scenes that involve a ferocious Madeleine and a pitiable, obedient husband, if only to stress his wife's unreasonable demands and his pitiable subordination. Those scenes, in his reminiscence, do not exist in any extended context. The discourses of other characters, which exist only disjointedly in Moses' individual memory, are distorted but functional as they are disconnected, incoherent and cannot offer a complete frame for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Thus Marcel Proust reminded us of the instability of personal memory in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as he discovered that human beings sometimes involuntarily remember a certain moment "as it actually occurred" while at other times they voluntarily recall the past but "instantiate a worked-ov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that is not equivalent to re-experiencing the event" (qtd. in Epstein 5-6). Consciously Moses is quite aware of such danger in his recollections: "But I, with *my* [italics in original] memory—all the dead and the mad are in my custody, and I am the nemesis of the would-be forgotten. I bind others to my feeling, and oppress them" (*H* 147). Therefore, Moses' memory does not give a truthful account of other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because h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in a tense and repressive mood. His wrath toward other characters piles up bit by bit, and he frequently links all the male characters, including Dr. Edvig, Shapiro and Father Monsignor sexually with Madeleine. But this is all based on exaggerated self-fabricated speculation.

The most eye-catching feature of Herzog's discourse is the unsent letters, sixty-five in total, "that spread throughout the novel like a spiderweb" (Quayum 61). Two points are ostensibly important in Moses' discourse revealed in the letters—first, no matter whether he is writing to academic figures or non-academic people, Moses always quotes part of his

addressees' words in order to rebut or reject them. Moses' quotations of the discourse of those people, usually integrated into his unstable individual memories of other characters, are again fragmentary and incomplete. Second, most of the time Moses does not dialogize with the quotations of other characters; instead, he evaluates those quotations, denies them and ultimately justifies his position by offering his own perspectives. His tone is scolding and accusatory, which all speak for his intolerance of diverse voices.

The sixty-five letters all reveal Moses' arbitrary habit of mind—he takes one point or another to be the topic of his letters, often in broken sentences or sometimes even in phrases, which immediately triggers his own criticism of the others' words. This explains why in those letters we witness his incessant quarrels with others, and mostly his accusations and corrections rather than discussions, of the addressees' thoughts. Many of his letters are constituted upon the theme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speech of others. He intemperately distorts and questions others' speech,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he makes himself sound authoritative and convincing. I use the following three letters to exemplify such a frame of mind:

1. Dear Professor Byzhkovsky……hope you will forgive me. I have now had an opportunity to read your study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West Germany. Many of the facts are disagreeable……I must confess I haven't examined the German question as closely as I should. None of the governments are truthful, in my opinion. There is also an East German question not even touched upon in your monograph [*italics in original*]. (H 51-2)
2. Dear Father Teilhard de Chardin, I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your notion of the inward aspect of the elements. That sense organs, even rudimentary sense organs, could not evolve from molecules described by mechanists as inert. Thus matter itself should perhaps be studied as evolving consciousness……is the carbon molecule lined with thought? [*italics in original*] (H 174)
3. Dear M. de Jouvenel, If the ai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e as you say to civilize power, to impress the brute, to improve his manners and harness his energy to constructive tasks, I would like to say……that the sight of James Hoffa on your television show the other night made me realize how terrible a force angry

single-mindedness can be [*italics in original*]. (H 237)

Moses' written style divulges the fact that he adopts a tone of reproach and disapproval as if he were the center of evaluation of others' discourse. The worst thing is that Moses alone decides what content is to be presented and how it will be presente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reader. The first letter involves an academic evaluation in which Moses instantly assumes the role of a critic by attacking Byzhkovsky's book as based on his previous monologue. Though in this letter Moses regrets his own deficiency of knowledge about the topic Byzhkovsky was writing about, the reader nevertheless has again been deprived of the chance to know the professor's academic product based on a clearer vision.

The second letter mentions Teilhard de Chardin's notion of the inward aspect of the elements. The language in this letter is even more handicapped since neither Chardin's notion, which seems to argue against the idea that living matter evolved from non-living matter, nor Moses' question and accusation have been expressed clearly to the reader.

In the last example Moses writes a lengthy sentence to describe Jouvenel's declaration upon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gain, one single sentence is totally insufficient for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Jouvenel's belief. Besides, Moses' attack of Jouvenel's statement is unsatisfactorily incomplete.

The three examples all include fragmentary words of others as well as the hero's disconnected logic and disjointed reasoning. The most noticeable point is that Moses' chain of thought resides within the skull of an egomaniac as revealed in his habitual interpretation of others' words out of context. Though it is a truth that *Herzog* presents multifarious and multileveled thoughts, ranging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hat have sprung from the Western mind, tho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unfortunately exist as the hero's biased and deliberate selections from the original texts. Those disconnected and incoherent philosophical statements, reappearing in Moses' unsent letters, can never form a logical and sensible dialogue with the hero. Moses garbles other people's discourse, curtails the parts which he believes unnecessary, and so fails to make himself a dialogist.

Moses' discourse is also marked by the spirit of "the house of imprisonment" (Lundquist 38). Secondary realities is a theme proposed by Plato when attacking the obliteration of the

original, the authentic, and also a denial to the true in the mimetic process of writing literary works. Yet this secondary and derivative imitation of truth, realized in billions of books and texts, has become a hallmark of the postmodern world. We live in a world of “texts”—texts removed and transmitted fragmentarily and incompletely by computer files, media programs, newspaper stories, books, magazines, advertising leaflets and TV commercials, only to create more illusion and hallucination.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seen the facts (reality) through texts, but those texts, usually products of power-struggle games, often include traces of the unreal. Richard Harland explains such a situation: “The modern poet . . . think[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text as a transaction between her- / himself and the words on the page” (1). Lundquist also echoes Frederic Jameson’s coined term 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in which the prison “is made up of texts; and every text must be interpreted by another text in an endless chain of texts that cut humans off from the nonverbal world and the intensity of being” (38). Yet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people cannot be deprived of texts. Both Moses and Madeleine are intellectuals who must dedicate themselves to producing more glamorous texts based on the approval or rejection of other texts. They are all product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are confused about what is real and what seems real. They, the educational products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of texts, search for truth through writing but ultimately are blocked and sequestered from reality because of the multitudinous plurality of texts.

Moses’ 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strongly displays the quality of an intellectual who “makes a claim upon the world which is personal in a way no one else can” (Walden 1). His habit of “mind is predominantly verbal; because he experiences the world as a text, he seeks to represent it as a text” (Corner 372). He is compulsively but also inevitably a “prisoner of perception” (*H* 80) who attaches the world to his unreliable inner sight. Just as in his making the world an extension of his inner view, so his study of great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inker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ultimately results in a grand synthesis that seeks to exaggerate, to glorify, and to make unique his own ideas, which he believes are fresh new, and beneficial to mankind. He inherits the spirit of Romanticism especially from Germany in which philosophers like Herder, Schiller, Schlegel and Hegel approached the world through sequentially historical views but all based on an individual stance. Like Schiller and other

German romantic critics of the time, Moses continues to “hover between the irrecoverable ideal of the integrated past and the unattainable ideal of the spiritual present” (Harland 64). Therefore we see the hero struggling as well as stumbling painstakingly among numerous text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 mind works sequentially; he looks for a narrative that will set the history of developing human consciousness in clear order” (Corner 371). It is not the extension of texts that frees Moses; quite to the contrary, it is the termination of texts that liberates the hero. Moses also recognizes this toward the end;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worse his vision of the past” (*H* 255)! In fact, only when the hero gives up grouping and relying upon text making and text interpreting to create layers of reality can he break out of the prison of false perception and regain the ability to see reality as it is. The stupendous arguments between Moses and the philosophical views that underlie Western thinking is Bellow’s resolution to show to the reader that Moses’ intellectual work is just another piece of monologue that encloses the scholar within his own thinking.

As an intellectual, Moses falsely applies his scholarly state of mind to real life conditions, which bring forth only more confusion and obscurity. He obviously believes that by means of writing, the compulsive habit of an intellectual, he can restore a sense of order out of irrelevant ideas and a chaotic state of mind. Here indeed is Saul Bellow’s own mockery of the result of education in which an academic figure like Moses giving himself over to purely theoretical and speculative issues in the hope that he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his real life. In writing his personal letters, Moses always lapses into the habit of citing and quoting from other references as if he were composing a real thesis. In thinking of people he knows, he simultaneously recalls those philosophers whose works he has read. His discourse shows such a way of thinking:

1. He was thinking of Marco, Daisy, Sono Oguki, Madeleine, the Pontritters, and now and the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ragedy according to Hegel,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the heart and the deepening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in the modern age. (*H* 117)
2. Living amid great ideas and concepts, insufficiently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ay-by-day, American conditions. (*H* 116)



3. Moses wanted to do what he could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at last taking a sleeping pill, to preserve himself. (*H* 117)
4. Thus I want you to see how I, Moses E. Herzog, am changing. I ask you to witness the miracle of his altered heart—how . . . he communicates with the mighty of this world, or speaks words of understanding and prophecy, having arranged at the time a comfortable and entertaining evening—food, music, wine, conversation, and sexual intercourse. (*H* 181)

Moses' comic mix-up of personal life events with his scholarly works continues until his meeting with the lawyer Simkin, who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any critics as a "reality instructor" (McCoy 76) or a symbolic counselor to Moses. When Moses inexhaustibly pours out his bias toward Gersbach, he admits that he has tried to figure out Gersbach's real personalit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igures he knows: "Is he an Ivan the Terrible? Is he a would be Rasputin? Or the poor man's Cagliostro. Or a politician, orator, demagogue, rhapsode? Or some kind of Siberian shaman" (*H* 234), Simkin instantly perceives what bewilders Moses: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those philosophers you've studied for so many years are all frustrated by one Valentine Gersbach . . . All those years of Spinoza—Hegel?" (*H* 234) Those words point to the uselessness of Moses' high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false application of his academic knowledg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around him who may not at all resemble aspects of humanity discussed by the dead great ones. Although it may not be recognized by Moses, Simkin indeed functions as a catalyst "teaching the hero the dangers of introspection and withdrawal, awakening him to the real world" (Pauwels de la Ronciere 32). He makes an appointment with Moses at the court; even though he fails to show up, Moses decides to move outward (to Chicago) after days of reminiscence and letter writing. He no longer wishes to probe reality through brain activity but intends to see things with his own eyes. It is this seeing of reality that helps him break through the "prison of perception" which actually was based on perception of the mind rather than perception of the eye. Self trust, dependence upon his intuition, and abandonment of the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pedantry ultimately liberates Moses from his inner monologues.

It is clear that in the short span of the novel the author's language does not reign over that

of the hero. What the reader encounters is a subjective view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the hero rather than the author's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him. To be more specific, those previously discussed features of Moses' discourse have truthfully established his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ndividual philosophical views, including "turning a deaf ear to others," "arbitrarily enclosing or distorting other's words," "being falsely enclosed in the house of prison," and "always enunciating a bias toward beautiful blue-stockings." This also means that Bellow did not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Moses' discourse, at least in the readable part of the text. Consequently, in many places in *Herzog*, the reader witnesses what Bakhtin identifies as "double narration," in which the voice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voice of the character "appear in many different mutual relations—of stylization, parody, hidden polemic, and so on" (Denith 47).

The visible authorial speech and the hero's one thus are distanced from each other in *Herzog*. As for authorial discourse, Bellow's narrative tone in *Herzog* is in "an exaggerated, often comical form" (Varvogli 158). His explanation and evaluative words about Moses' conducts are often jeering and mocking.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autonomous discourse of the hero, yet inserted authorial discourse to display the author's sneering position toward the ideology of the hero. Such hybrid construction i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whole novel. This most noticeable style of hybrid construction in *Herzog* is such that readers come across sentences in which parts of them are in Moses' language, and other parts of them make up Bellow's judgments and innuendos (the underlined sentences below), often ironic and humorous:

1. "She's a violent, hysterical woman," he told Emmerich. He saw from the old man's lips that he was about to answer; but then Emmerich decided to say nothing, *and Moses, who had an odd habit of completing people's sentences for them* [emphasis mine], made a mental note about his own perplexing personality. *A strange heart. I myself can't account for it* [italics in original]. (*H* 17)
2. Not everyone threatened with a crackup can manage to go to Europe for relief. Most people have to keep on working; they report daily, they still ride the subway. Or else they drink, they go to the movies and sit there suffering. Herzog ought to have been

- grateful [emphasis mine]. (H 9)
3. Justice—Look who wants justice……People by the billions and for ages sweated, gyped, enslaved, suffocated, bled to death, buried with no more justice than cattle. But Moses E. Herzog,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bellowing with pain and anger, has to have justice [emphasis mine]. (H 270)
  4.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tory, a trait of Western culture, rooted in the Testaments, Old and New, the idea of the continual improvement of human life on this earth. What else explained Herzog’s ridiculous intensity?) [italics in original] (H 141)
  5. On Lexington Avenue he [Moses] got out with her [Ramona] and they embraced on the sidewalk (*since when did middle-aged men behave so passionately in public places* [emphasis mine]?) (H 224)
  6. “Herzog *tragically* sipping milk in Philadelphia, *a frail hopeful lunatic* [emphasis mine], tipping the carton to quiet his stomach and drown his unquiet mind, courting sleep.” (H 117)

In close reading, many of the above sentences contain two separate straight or mixed narrations—partially from the hero and partially added comments or innuendo from the author. Apparently Bellow, sharing the position of the reader, feels rather amused about the hero’s nonsensical sufferings in private life and public affairs as well as his self-invested big project for mankind. Thus Bellow’s discourse impresses the reader as one of seeing the hero as a trivial, weak human being struggling for a meaningful life, meaningful not only to his soul but to the whole human race. As the author, Bellow does not see eye to eye with his hero in many occasions; instead, he acts as a commentator on the actions and speeches of his hero. Such authorial speech strengthens the hero as a comic figure in the eyes of the reader. However, it does not dominate over the hero’s voice and therefore the reader can independently make his / her own judgment on either the hero’s or the author’s speech. Bakhtin clearly favors such novelistic prose because it is his everlasting belief that the hero should not serve as the mouthpiece of his author.

Even though Moses constantly makes fun of many of his situations, Bellow’s discourse allows the reader to witness just another series of laughing episodes which, unquestionably,

impress upon the reader the idea that the hero is interweaving fanciful projections to his “grand, wonderfully nutty dream” (Pinsker “Saul Bellow: Going Everywhere” 49), i.e., his revenge on Madeleine and the rival, his sexual desire for attractive women, his weaknesses, and his farcical behavior when using Ramona’s lavatory. Intentionally Bellow arranges to present his hero as an urban comedian by divulging more laughable hidden propensities of Moses and fewer serious or dignified aspects of Moses. In other words, much of Moses’ funny behavior, most of it in concealment before being brought to the surface by Bellow,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what the reader expects from his scholarly title--a respected, distinguished, published professor. He thinks clumsily according to his mental discourse as manifested in the purposefully-formed authorial speech. This authorial discourse is clearly filled with attitudes.

Bellow’s invisible discourse in *Herzog* is shown mostly in the author’s artistic design for the novel. It is obvious that Bellow selects only five days in depicting the protagonist with the last scene repeating the first one of the novel. Aliko Varvogli observed that when Moses “makes his first, short-lived exit from the city to Vineyard Haven, he catches a first glimps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will by the end of the narrative restore him to tranquility and comparative sanity” (160). Likewise, many critics, such as Kathleen McCoy, Martin Corner, and Daniel Walden,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lmost a full-circle in Bellow’s narration of Moses’ story in which the end reproduce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especially in scene and the gestures of the hero. Indeed Bellow seeks to emphasize the repetition because he wants to show to the reader that all Moses’ high education is useless or worse, counterproductive in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the hero must return to where he begins. Therefore, like “a mythical bird that feeds its young with its own blood” (Furman 34) Bellow decides to present Moses Herzog’s story over a very short span. The result is a five-day version of the hero. He shows a down-and-out moment in Moses’ lifetime, a crisis with which he amplifies the hero’s wincing and even the neurotic condition caused mostly by his beautiful but neurotic ex-wife’s wrongdoing against him.

Quite a bit of the novel is concerned with Moses’ childhood memories of living in the slums on Napoleon Street, Montreal. The reader may wonder why, over such a short span of his life, the author must describe more of Moses’ past and less his present actions. Of course

we can explain this by saying that Moses' psyche is in such a tense and oppressive condition that he unconsciously recalls many scenes from the past. Madeleine's lavish behavior triggers the hero's memory of Father Herzog's hard-earned money as well as the family's hardships. His second wife as a feminist activator brings back the image of his domestic, long-suffering, self-effacing mother, while Gersbach's betrayal of their friendship reminds him, conversely, of the reciprocal support among the Herzog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e other hand, Bellow's answer in the Robert Boyers's interview provides the reader with a clue that the idea of adding a considerable part of childhood memories and compressing them into the short chronological span of the novel actually came from the author. In the 1995 interview, Bellow mentioned his own ideas about childhood memory. He compared human life to the process of throwing a stone into the air which "has to overcome gravity, so its rise is slow, and that is why the days of childhood are so long and leisurely" (Boyers 53). This talk explains Bellow's central belief as to why "the days of childhood seem to last for years" (Boyers 53) and that a person frequently revisits his / her childhood through memory, and therefore, in his five-day account of Moses' story, Moses' repeated revisit to his past on Napoleon Street seems inevitable and purposeful. Bellow obviously believes that when a person is situated in an abnormal position,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she) will lapse into memories of his childhood past is likely higher than a person leading a normal life.

The structure of *Herzog* clearly reveals Bellow's manipulation of the way how Moses' life is presented. In other words, he exerts his influence over the story of the hero not only by presenting it within a shortened period but also by revealing the hero's repeated reminiscence of childhood simply becaus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quite natural for a downtrodden man to frequently recall his early past. The structure of *Herzog* serves as one aspect of Bellow's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and in this aspect the reader see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visible discourse, which exerts almost no influence over the hero's one, and the author's invisible speech, which strongly dominates the way how the story of the hero is told.

Undeniably during the five-day portrayal Bellow allows ample space for his hero to utter his own voice.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Moses is the subject of the extensive depiction. What the reader sees is that the world has actually become an extension of Moses'

inner voice, and the reader also witnesses vehement confrontations of the hero's mind, but the author finalizes the novel as well as the hero's discourse by denying the continuation of such a mind in the future. Usually at the end of a polyphonic novel, as identified by Bakhtin, there exist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novel and the unfinalizability of the hero's discourse. In other words, the reader closes the book still hearing the incessant quarrels or ongoing confrontations. The end of *Herzog* denies such a phenomenon. Even though the reader doubts if Moses' frenetic mind has actually been relieved, is suspicious as to whether he has satisfactorily stopped arguing with those imaginary addressees, and distrusts Moses'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the afflictions of his second divorce, the author arbitrarily terminates the hero's driven state of mind by hinting in the last sentence that Moses has regained his sanity. Such an arrangement finalizes Moses' discourse. At the outset, the reader comes to suspect that Moses is a man full of frivolous mental arguments and is unable to move into real actions.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novel disapproves such a belief and tells the reader that all the hero's discourse described in the novel appears to have been of temporary, import and largely inconsequential, being functional only during the span of the novel. By arranging the story to become a full circle in order to serve certain artistic intentions, Bellow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Moses' five-day struggle is to restore order to the formidable chaos. The author's truth speaks louder than the hero's one, as if the author has spoken the final word, not that the phrase "not a single word" is narrated by Bellow but that the author arbitrarily determines this phrase to be the last one from the hero. Because of the author's intervention, the story of Moses has been told in an enclosed frame and thus is inadequate in presenting the hero as a figure of autonomous discourse.

Harold Bloom praises Moses as "a persuasiv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est ongoing Western tradition of moral wisdom and familial compassion" (qtd. in Schaezler 12), since the hero represents the afflicted and suffering modern humanit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n Bloom's open celebration of what Moses represents is: it is Bellow who seeks to enlarge certain aspects of his hero who thereby qualifies for the category of "the oldest ongoing Western tradition." Bloom's speech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visible authorial discourse, or the author's gift and talent in story-telling, in *Herzog*. It especially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an authorial artistic device for this prose work. It reveals the author's intention in arranging the hero's story according to the coherent whole of the novel. The discourse of Moses Herzog does not equal that of Bellow as suggested by numerous scholars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per. A clarification of the problematic and blurring discourses in *Herzog* helps readers see Moses' true color and Bellow's artistic device for the hierarchy of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 Works Cited

1. Anderson, David D. "The Novelist as Playwright: Saul Bellow on Broadway." *Saul Bellow Journal* 5.1 (1986): 48-62.
2. ---. "Saul Bellow and the Midwestern Myth of the Search." *Saul Bellow Journal* 14.1 (1996): 19-26.
3. Bach, Gerhard. "Saul Bellow and the Dialectic of Being Contemporary." *Saul Bellow Journal* 10.1 (1991): 3-12.
4.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Texas: U of Texas P, 1981.
5. ---.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And Trans. Caryl Emers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1984.
6. Bellow, Saul. *Herzog*. New York: Penguin, 1992.
7. ---. "Nobel Lecture, 12 December 1976." *The Georgia Review* 49.1 (1995): 79-88.
8. Bloom, Harold. *Saul Bellow*.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9. Bonetskaia, Natal'ia. "Bakhtin's Aesthetics as a Logic of Form." *Shepherd* 83-94.
10. Boyers, Robert. "Moving Quickly: An Interview with Saul Bellow." *Salmagundi* 106 (1995): 31-53.
11. Chavkin, Allan. "The Middle and Later Fiction of Saul Bellow." *Saul Bellow Journal* 10.2 (1992): 72-75.
12. ---.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in the Fiction of Saul Bello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1.2 (1984): 164-172.

13. Corner, Martin. "Moving Outwards, Consciousness, Discourse and Attention in Saul Bellow's Fiction." *Studies in the Novels* 32.3 (2000): 369-385.
14. Denith, Simon.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5. Epstein, Russel. "Consciousness, art and the brain: Lessons from Marcel Proust." 20 May, 2008 <[http://ccn.upenn.edu/epstein\\_web/epstein\\_proust\\_prepub.pdf](http://ccn.upenn.edu/epstein_web/epstein_proust_prepub.pdf)>
16. Franza, August. "Saul Bellow: A Turning Point." *Saul Bellow Journal* 9.1 (1990): 36-48.
17. Furman, Andrew. "Ethnicity in Saul Bellow's *Herzog*: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poleon Street, Montreal, Memories." *Saul Bellow Journal* 13.1 (1995): 41-51.
18. Hardy, Barbara. *The Appropriate Form: An Essay on the Novel*. London: Univ. of London, the Athlone P., 1971.
19. Harland, Richar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Hong Kong: Macmillian, 1999.
20. Lee, Soo-Hynn. "Jewish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 and Saul Bellow's *The Victim, Herzog*, and *Mr. Sammler's Planet*." *Saul Bellow Journal* 18.1 (2002): 55-65.
21. Lundquist, Suzanne Evertsen. "The Ontic, Epistemic, and Semantic Nature of Saul Bellow's *Herzog*." *Saul Bellow Journal* 9.2 (1990): 38-53.
22. Mannis, Andrea. "Beyond the Death of God: Saul Bellow's Critique of Suffering in *Herzog*." *Saul Bellow Journal* 15.1 (1997): 25-54.
23. McCoy, Kathleen. "Dangling Man and *Herzog*: First Novel as Ur/Text." *Saul Bellow Journal* 13.2 (1995): 66-80.
24. Quayum, M. A. "Quest for Equilibrium: Transcendental Ideas in Bellow's *Herzog*." *Saul Bellow Journal* 14.2 (1996): 43-68.
25. Pauwels de la Ronciere, Marie-Christine. "Bellow's Hero and the 'Reality Instructors': Just a Punch and Judy Show?" *Saul Bellow Journal* 9.2 (1990): 29-37.
26. Pinsker, Sanford. "Saul Bellow, Going Everywhere: History, American Letters, and the Transcendental Itch." *Saul Bellow Journal* 3.2 (1994): 47-52.



27. ---. "Saul Bellow: What, in All of This, Speaks for Man?" *The Georgia Review* 49.1 (1995): 89-95.
28. ---. "How Maxie Pinsker Got His Name." 30 May, 2006  
<[http://www.jbooks.com/interviews/index/IP\\_Pinsker\\_Bellow.htm](http://www.jbooks.com/interviews/index/IP_Pinsker_Bellow.htm)>.
29. Samet, Donna Mary. "Saul Bellow's *Herzog*: Exposure to the Elements." *Saul Bellow Journal* 10.2 (1992): 37-41.
30. Scheer-Schaezler, Brigitte. "Saul Bellow and the Values of the Western World." *Saul Bellow Journal* 8.2 (1989): 1-13.
31. Shepherd, David, Ed. *The Contexts of Bakhtin: Philosophy, Authorship, Aesthetics*.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1998.
32. Varvogli, Alik. "The Corrupting Disease of Being White: Notions of Selfhood in *Mr. Sammler's Planet* and *Herzog*." *Saul Bellow Journal* 17.2 (2001): 150-164.
33. Walden, Daniel. "Urbanism and the Artist: Saul Bellow and the Age of Technology." *Saul Bellow Journal* 2.2 (1983): 1-14.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33-35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33-352

# 沒有語言參數重設的語言轉換： 對中文虛主詞的解讀

江丕賢\*

Transfer with no parameter resett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ubjects

by  
Stano Kong

關鍵詞：原則與參數，參數重設，虛主詞

*Key words:*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parameter resetting, null subject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 〔提要〕

在眾多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文獻中，其中 Hawkins 和 Chan 在 1997 年所提出「語言功能性表徵失能」假設對於後孩童時期學習者的後期文法學習的本質看法是：第二語言的功能性範疇在學習者錯過關鍵期後便無法習得。而這份研究旨在探討這個假設若從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角度，學習者對中文虛主詞在主要與從屬子句中的解讀之關係。

研究中，有 18 位中文語文程度極佳的英文母語人士被邀請來做中文虛主詞的解讀。他們的解讀將被拿來和中文母語人士做比對。在這份研究發現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表現會隨著其語言程度而有成比例的表現(程度越好表現越佳)。這些語言學習者也認定，在從屬子句中的虛主詞較主要子句的虛主詞難學會。這樣的結果使「主題冠」：這個以「普遍性語法」為框架下之「原則與參數」理論中的普遍化語言屬性，被認為是較佳的詮釋來解釋此語言現象。

## Abstract

One competing theory in the literatur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has been the 'failed functional features' hypothesis made by Hawkins and Chan (1997) about the nature of post-childhood learners' end-state grammars: parameter values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categories are inaccessible to L2 learners after the critical period.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is hypothesis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ll matrix-embedded subjects in L2 Chinese. 18 highly proficient speakers of Chinese whose native language was English were asked to interpret null subjects in Chinese. Their respons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a group of native speakers. Findings in the current study show that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use of null arguments increased with proficiency. They also suggest that null embedded subjects were persistently more difficult to acquire than null matrix subjec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opichood' being a generalised property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2 divergence found in the study and that the divergence fal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of Universal Grammar (UG).

## 1. Introduction

The pilot study reported i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version of Universal Grammar (UG) i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Second Language (L2) syntactic knowledge. It addresses some interesting divergences found in the way adult English speakers establish in L2 Chinese that null matrix subjects are possible but null embedded subjects are unacceptable in most contexts. This article will test a hypothesis of Kong (2005) who speculates that ‘topichood’ may be a generalized property in Chinese and what appears to look like parameter resetting is in fact a mapping of L2 data into L1 setting. The L1-L2 data mismatch hypothesis is in line with a claim made by Hawkins and Chan (1997) about the nature of end-state grammars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unctional categories related features which have not been selected during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will cease to operat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ssue that syntactic or non-syntactic aspects contributing to adult L2 learners’ failure in establishing full native-like representations for null subjects has a theoretical interest in the current debate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ers about the availability of UG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The current study intends to address two questions:

1. Will divergence be an issu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ll matrix-embedded subjects in L2 Chinese? If yes, is the native nonnative divergence significant?
2. Will the divergence be best addressed by using the *full access* to UG or the *partial access* to UG hypothesis?

The article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presents two competing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tion 3 reviews a ‘topichood’ account put forward by Kong (2005) and discusses ways in which the proposed account could have in explaining learners’ grammar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Sections 4 and 5 present the study and its results, which will then be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session in Section 6.

## 2. Two theories of L2 acquisition

### 2.1 Partial Access to UG Accounts

A position that has been taken in explaining non-native and native grammar divergence is that adult L2 learners have only partial access to UG. One version of the *partial access to UG* account is captured in Hawkins & Chan (1997), following Smith & Tsimpli (1995), in assuming parametrically varied functional categories are subject to maturation. The *failed functional features* hypothesis of Hawkins & Chan (1997) postulates that beyond a critical period, functional categories such as *Complementiser*, *Agreement*, and *Determiner* are unavailable to L2 learners for the reason that these features are language-varied and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found in the L1.

The example that Hawkins & Chan use to illustrate this idea is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strictive clauses by native speakers of Cantonese. In English,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can be introduced by a *wh*-phrase (e.g. The boy *who* she hates.), by the complementiser *that* (e.g. The boy *that* she hates.), or even without any explicit indicator (e.g. The boy she hates.). However, an overt *wh*-operator cannot co-occur with the complementiser *that* in English (e.g. \*The boy *who that* she hates.). Neither can a resumptive pronoun co-occur with an overt *wh*-operator (e.g. \*The boy *who* she hates *him*.). Relative clauses in Cantonese or Chinese languages in general, on the other hand, are introduced by either an overt (e.g. Ni xihuan *ta* de neige nuhai.) or a covert (e.g. Ni xihuan de neige nuhai.) resumptive pronoun. In contrast to English, Chinese C is assumed to lack the [+/- *wh*] feature (Huang 1984, Xu and Langendoen 1985). That is to say, a weak feature in C does not motivate a *wh*-operator to move to Spec CP for feature checking in Chinese. The Cantonese speakers in Hawkins and Chan (1997)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resumptive pronouns and Subjacency violations are ungrammatical in English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derive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by means of operator movement. Hawkins and Chan (1997) argue that movement-triggering features in relative clauses are available only for a limited period in early life; participants in their study were all post-childhood learners of L2 English who had missed the period when features triggering

operator movement were still available.

## 2.2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to UG Accounts

A second view is that adult L2 learners are in theory able to develop native-like grammars like those of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have full access to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of UG. However, if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pretable cues in the input, divergence occurs due to a difficulty in mapping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nto overt morphology/phonology or a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forms in the lexicon, and not to reasons associated with UG. That is to say, highly proficient learners have access to the abstract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the language but may fail to associate these properties with the correct morphological or phonological forms.

One version of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to UG* Accounts (FT/FA) is illustrated in Prevost and White (2000a, 2000b). They propose that adult L2 learners have full access to the syntactic options made available by UG. Variability in their performance, however, lies not in a lack of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tense and agreement or functional categories. Rather, adult L2 learners have problems realising morphology; specifically, they have difficulty accessing the lexicon.

Prevost and White's argument is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spontaneous production data from two adult learners of French and two adult learners of German. The two learners of L2 French were native speakers of Moroccan Arabic, while the two learners of L2 German were native speakers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 respectively.

The properties that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study were related to verbal functional projections. Languages like French and German have strong Verb (V) features which have to be checked in Infl, resulting in finite verb raising and the nonfinite verb remaining in the VP (Chomsky 1995). With a few exceptions, learners of L2 French and L2 German wer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inite and nonfinite morphology and they did not substitute finite forms for nonfinite forms. The results lead Prevost and White to argue that L2 learners' problems are related to accessing the correct forms from the lexicon; the L2 learners have a long period of

variability because they have difficulty retrieving inflected forms from the lexicon.

To sum up, two views concerning SLA have been discussed. Hawkins & Chan (1997) assume that certain aspects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are subject to maturation, and therefore are unacquirable for post-childhood L2 learners. Prevost & White (2000a, 2000b) are in favour of the claim that learners tend to fully transfer the structure in the initial state a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L1 is crucial in SLA. The debate on whether there is a critical period affec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cquiring L2 native-like grammatical competence has been the focus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ers. Both views assume that the principles of UG constrain the way that L2 speakers build mental grammars for the L2. They differ in explaining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establishing new syntactic knowledge. Hawkins and Chan hold the view that if older L2 learners either cannot reset parameters or have persistent difficulty accessing some subsets of parameters determined by the formal features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t might suggest that those subsets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are subject to maturation.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hypothesis, on the other hand, maintains that the presence of already established L1 features in older learners may hinder them from interpreting positive evidence from target language input for appropriate L2 settings. It implies that any changes which take place betwee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re outside the domain of critical period.

### 3. *Topic-hood and null objects as pro in Chinese assumption (Kong 2005)*

Kong (2005), in modification of Li and Thompson (1976) and Yip's (1995) *topic-prominent* account, argues that Chinese is an obligatory topic language and topic-hood i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in Chinese.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never appear in sentence-initial positions in Chinese. So sentences like (1)a are ungrammati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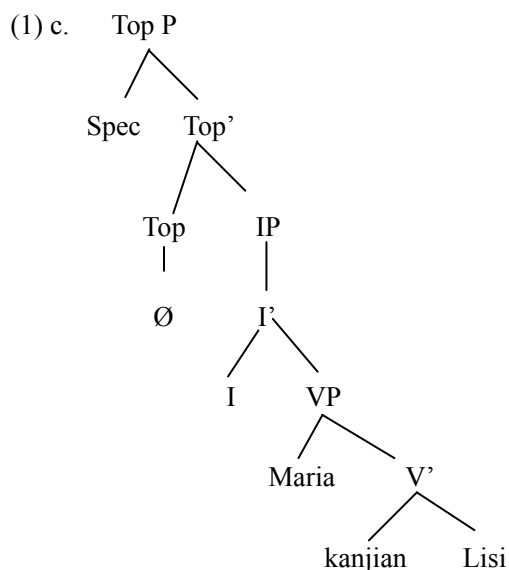
- (1) a. \*Yi            ge            xiaohai   lai            le.  
         one   CL(assfier)   child            come   PFV(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A child has come. (as (48) in Yip 1995: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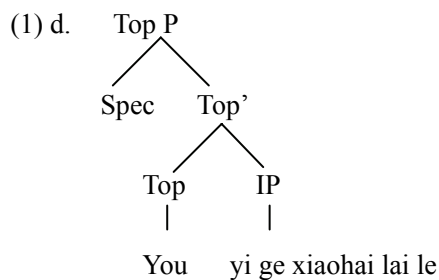
An existential verb *you* ‘there be’ needs to fill the topic position. A grammatical version of (1) a would be:

- (1) b. You            yi        ge        xiaohai   lai        le.  
                           There be one    CL(assfier)   child            come   PFV(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A child has come. (as (5) b in Kong 2005)

What Kong (2005) postulates is that clauses in Chinese are headed by a category which requires that some constituent in the clause move into the Spec position of that category:



In (1) c either *Maria* or *Lisi* would have to move to the Specifier of TopP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for a topic. If the only available NP is an indefinite, as in (1) a, and hence not a possible topic, the only way to rescue the sentence is to introduce an existential verb, possibly as a spell-out of the Top category:



What it implies is that the *topic-prominent* nature of Chinese is a normal consequence of

the syntax of Chinese – every sentence has a topic-comment structure, because every sentence is headed by an obligatory TopP (Kong 2005).

In addition to proposing the *topichood a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of Chinese*, Kong (2005) further argues that null objects in Chinese may also be *pro*. This is contrary to Huang (1984) who assumes that Chinese, like all other natural languages, does not allow genuine zero object pronouns, as a result of *Generalized Control Rule (GCR)* and *Disjoint Reference (DJR)*. An example in support of Kong's claim is illustrated in (2)a Chinese construction:

John and Peter met Lee on the street. (context) (as (4) b in Kong 2005)

(2) a. Johni shuo [Lee bu renshi ei].

\*Johni said that Lee didn't know ei

(2) a is a well-formed structure in Chinese but its equivalent in English is not. According to Huang, neither *John* nor *Lee* in (2) a can act as the antecedent for the empty pronominal *ei*, only the one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discourse topic can. Kong questions the explanatory effect of the GCR account in relation to the (2): there are only two participants, *John* and *Lee*, in the discourse; it would be contradictory if on the one hand none of them can be the antecedent for the *ei*,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both constitute the discourse topic. *John*, not *Lee*, should be the antecedent of the empty pronominal for the reason that *ei* being an empty pronominal cannot be bound by the nearest antecedent *Lee* in the same clause. Therefore, its closest antecedent should be *John* instead.

Topic structures in English further support Kong's argument that null objects in Chinese are *pro*. In

(2) b. As for Billi, John thinks that Mary likes himi. (as (2) b in Kong 2005)

Kong speculates that the embedded object *him* can only be bound by *Bill* of the topic for the reason that *Bill* needs an interpretation and that neither *John* nor *Mary* can be the binder. By impl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nouns may be bound as long as they are free in their governing categories and that topics need to bind an argument position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as the English example shows. All these point to the direction that the *GCR* may not

be a necessary component in the licensing of null objects in Chinese, which renders null objects in Chinese being *pro* possible (Rizzi 1986):

(2) c. [Top *ei* [John thinks [that [Mary likes *Pro<sub>i</sub>]]]]. (as (2) c in Kong 2005)*

*Pro* has to refer to the topic as in (2) c.

While in subject position, Kong follows Huang (1984) in assuming that null embedded subjects in Chinese can refer either to the matrix subject or to someone else mentioned before.

For example:

(3) a. John shuo *e* kanjian Bill.

\*John said that *e* saw Bill. (As (65) d in Huang 1984: 553)

According to Huang, *e* is a pronoun in Chinese which should be free within its binding category as a rule of Binding Principle B (Haegeman 1994). It cannot be bound within its clause, instead it has to coindex either with *John* or someone in the discourse, resulting in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3) b. John shuo *pro<sub>i</sub>/j* kanjian Bill.

John<sub>i</sub> said that [*pro<sub>i</sub>/j* saw Bill]

The ‘*topichood a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null objects as pro in Chinese*’ assumption accounts for a divergence observed in Kong (2005) where Chinese speakers of L2 English appeared to have more trouble unlearning null embedded subjects than unlearning null matrix subjects. In other words, learners in Kong (2005) allowed null embedded subjects but rarely null matrix subjects in their interlanguage. Kong speculates that learners transferred the ‘*topichood*’ parameter setting of Chinese and made a small adjustment to the use of topic chains: as long as one topic at the head of each sentence is overt so that the sentence is not headed by a verb, null embedded subjects are allowed in th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The ‘*topichood a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of Chinese language*’ might provide a tentative explan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made in the current study, which is on the discrepancy in interpreting null matrix and embedded subjects of L2 Chinese by adult English speakers. We return to this part later.

## 4. The Study

### 4.1 Informants

A group of 18 English speakers of L2 Chinese and a group of 5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took the test. All the English participants were 18 or above and had never been exposed to Chinese while growing up. The participants were chosen based on a class-allocation placement test administered by a Chinese language centre in Taiwan where the participants we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The five informants from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from a university in Taiwan. Table 1 displays the distribution of informants in the study.

Table 1 Informants involved in the study

Group	English 1 Group 1	English 2 Group 2	Native Chinese Group 3
Proficiency Level	Intermediate	Advanced	Native Control
Number of Informants	10	8	5

### 4.2 Task

Two topic-related syntactic structures namely, *overt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and *overt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were chosen to tes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opichood’ account proposed by Kong (2005) could explain learners’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Each sentence structure included matrix and embedded subject sentences. The sentences were presented bot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Pinyin form in a randomised fashion. Table 2 illustrates tokens of the two syntactic structures (see Appendix I for the tested sentences). A control task was chosen over a spontaneous task for the current study to minimize possibilities where informants are more likely to avoid certain syntactic aspects which they are not confident of.

Subjects’ performance was scored on a boolean scale of either 1 or 0, where 1 is the score for a deletion of overt subject and 0 is the score for leaving an overt subject undeleted whereas the same subject is deleted by native speakers. For example, in (4):

- (4). *Tai zai dasao chufang yihou, tai zhonghui kan baozi.*  
 She in clean kitchen after she always read newspaper  
 After she has finished cleaning the kitchen, she usually reads newspaper.

(as Adjuncts (6) in the Appendix I)

there are 2 tokens of overt subjects referring to the same antecedent in (4). If an informant deletes the matrix subject *ta* of the second clause as native speakers do, he/she will get 1; if, however, the property concerned is not deleted, 0 is given to the informant. If the control group deletes a high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where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delete only a low percentage of them, we can thus conclude that the learners' native-like interpretation is low. In fac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ative-like interpretation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deletion of overt subjects: the lower the deletion rate of overt subjects is, the lower the native-like interpretation is. In other words, native speakers' judgment is an indicator to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he L2 speakers' interpretation of null subjects is native-like. Table 2 below summarises test items contributing to the scoring system for each sentence type in the test.

Table 2 Tokens of Overt subjects in the Preference Test

Preference Test	OAdj MSub	OAdj ESub	OTop MSub	OTop ESub
Tokens*	7	5	6	4

\*Note: Tokens = the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in each sentence type; e.g. there are in total 7 counts of overt matrix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in the sentence type concerned.

Key:

OAdj MSub = Overt Matrix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OAdj ESub =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OTop MSub = Overt Matrix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OTop ESub =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 4.3 Procedure

The task was presented as a paper-and-pencil test and was given separately to the experimental informants an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English speakers took the test in-class at the language centre. They were asked to read some randomised sentences and delete all the subjects that could be omitted. Instructions were given prior to the test that neither discussion

nor answer-checking was allowed during the test. The test was untimed.

## 5. Results

Informants were scored both as a subgroup and individually for their performance in deleting overt subjects in the two contexts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average scores were then calculated.

### 5.1 Overt Matrix- Embedded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Table 3 Mean scores on deleting overt matrix and embedded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Group 1 (n=10) Intermediate Learners	Group 2 (n=8) Advanced Learners	Group 3 (n=5) Native Control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OAdj MSub	57/70 (81.43%)*	45/56 (80.36%)	30/35 (85.71%)
OAdj ESub	27/50 (54%)	26/40 (65%)	22/25 (88%)

\*Note: 57/70: 70 = the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in each sentence type x number of informants (7 tokens of overt matrix subjects x 10 informants = 70); 57 = total number of deleted overt subjects;

45% = the percentage of deleted items

Key:

OIniAdj MSub = Overt Matrix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OIniAdj ESub =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n Adjunct Clauses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experimental learners' interpretation of null matrix subjects seems to be native-like; all three groups fall in the 80% range.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both experimental groups perform better at deleting overt matrix subjects than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mbedded subjects seems to be developmental.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dvanced speakers are more likely to perform better in deleting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but still lag behind the native speakers.

## 5.2 Overt Matrix-Embedded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Topic Structure

Table 4 Mean scores on deleting overt matrix and embedded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topic structure

	Group 1 (n=10) Intermediate Learners	Group 2 (n=8) Advanced Learners	Group 3 (n=5) Native Control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percentage of overt subjects deleted)
O <sub>Top</sub> M <sub>Sub</sub>	50/60 (83.33%)*	39/48 (81.25%)	26/30 (86.67%)
O <sub>Top</sub> E <sub>Sub</sub>	25/40 (62.5%)	23/32 (71.88%)	17/20 (85%)

\*Note: 50/60: 50 = the total number of overt subjects in each sentence type x number of informants (6 tokens of overt matrix subjects x 10 informants = 60); 50 = total number of deleted overt subjects; 83.33% = the percentage of deleted items

Key:

O<sub>Top</sub> M<sub>Sub</sub> = Overt Matrix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O<sub>Top</sub> E<sub>Sub</sub> =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Results from Table 4 above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ive control and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but not on the overt matrix subjects. As far as the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are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is gradual. A consistent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vert embedded clauses is found even between the advanced learners and the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What can be said about the results is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experimental learners diverge from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n L2 Chinese. There is also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the learners' interpretation of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is developmental as opposed to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overt matrix subjects.

## 6. Discussion

### 6.1 Matrix subjects

8 out of 10 informants in the intermediate group and 5 out of 8 informants in the advanced group showed awareness of the redundancy of the matrix subject *ta* ‘he’ in the second clause in (5) (as sentence (2) in *Adjunct Clauses*) by deleting it in the same way as most of the native control group.

(5). *Zai Xiaowang<sub>i</sub> xiewan baogao yiho, tai zhonghui he bei kafei.*

In Xiaowang finish report after he always will drink coffee

After Xiaowang has finished his reports, he usually drinks a cup of coffee.

A similar observation emerges in (6): (as sentence (1)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6). *Xiaoming<sub>i</sub> guoqu xiguan chi gezhong butong de shiwu. Rou,*

Xiaoming past used to eat variety different de food meat

*tai jinlai bijiao shaochi.*

he recently relatively seldom eat

Xiaoming used to eat various types of food. Meat, he seldom eats it now.

The matrix subject *ta* ‘he’ in the second clause was deleted from most of the informants’ text.

### 6.2 Embedded subjects

The experimental informants tended to retain the overt embedded subject positions to the English setting, which were dispreferred by the native control. Consider (7) (as sentence (4) in *Adjunct Clauses*):

(7). *Xiaomin<sub>i</sub> zai xiewan baogao yiho, tai dou shuo tai yao xian xie zhaiyao.*

Xiaomin in finish report after he all say he must first write abstract

After Xiaowang has finished his reports, he usually says he has to abstract them first.

The subject *ta* in the embedded clause of (7) became abundant in the native controls’ text. The



majority of the experimental informants, on the other hand, did not delete the subject concerned.

Another example showing native nonnative discrepancy in null embedded subjects comes from (8) (as sentence (3) in *Clauses with Initial Overt Topics*):

(8). Xiaoming<sub>i</sub> guoqu xiguan chi gezhong butong de shiwu. Wo xiang, rou, *ta* jinlai

Xiaoming past used to eat variety different food I think meat he recently  
bijiao shaochi.

relatively seldom eat

Xiaoming used to eat various types of food. As far as meat is concerned, I think he  
seldom eats it now.

The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ta* ‘he’ in (8) was preferred by most experimental informants, unlike the native speakers’ response.

Native nonnative divergence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despite the awareness of the English speakers that overt matrix subjects are droppable in L2 Chinese, learners are nevertheless less willing to drop overt embedded subjects, rendering asymmetrical null matrix-embedded subject interpretation possible. The other question that the study intends to address is whether it can be maintained that adult L2 learners fail to establish full native-lik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for Chinese, or that they do establish full representation but divergence is the effect of difficulties with non-syntactic aspects of L2 acquisition.

The *FT/FA* account holds the view that UG is available in SLA and guides grammar-building. It would mean English speakers in the study start from an L2 grammar which is basically English in its property; Chinese will provide evidence to eliminate overt matrix-embedded subjects from that grammar.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view would predict that English speakers have no trouble acquiring null subjects in Chinese on the whole for an obvious reason that there should be enough positive evidence available in Chinese to tell English speakers that null matrix-embedded subjects are possible in Chinese. Judging from the results, unfortunately, it is unlikely that input alone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symmet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s.

If we eliminate the *FT/FA* account but retain the UG framework, then the one account left for consideration is the *partial access to UG* hypothesis. One can speculate that the principles of UG constrain the way L2 grammars are built, and that L2 speakers either have trouble assessing some functional categories related parameters, or they simply cannot reset these parameters, as in the theories of Hawkins & Chan (1997), and adopted by Kong (2005).

One tentative suggestion to accounting for the divergence would be a transfer of the type of null subject sentence allowed by L1 ‘diary context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specifier position of IP in tensed clauses in English has to be overtly realized. Howeve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specifier of IP can be null, as observed in Haegeman (1991). For instance, subjects can be null in ‘diary contexts’:

(9). Got up, had a shower and went to the office.

But a sentence becomes ungrammatical when the subject is null in the embedded clause, or when the null subject is a second person or when there is an overt CP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clause:

(10). a \*D dreamed that got up (versus D dreamed that I got up)

b. \*After got up, had a shower.

c. \*Where did go after breakfast?

d. \*got up, had a shower and went to the office (where the intended reference is:

You got up, you had a shower...’) (as (42) a-d in Hawkins 2001).

Suppose that the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in the study have transferred the grammar which allows null matrix subjects in diary contexts, this might account for the observed behaviour where only matrix subjects, not embedded subjects, are allowed to drop.

An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o contemplate the notion that English speakers in the study restructure their grammars for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positive evidence in the input, but without resetting the overt arguments and zero topic-chain parameters. In particular, we examine the assumption made by Kong (2005) that topic-hood i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of Chinese and that as long as one topic position is filled, other argument positions can be covert.

Assuming topic-hood is a generalized property of Chinese and input is sufficient enough to tell English speakers that topics bind arguments in other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English

speakers will then allow English matrix subject pronouns to drop as long as they are adjacent to topics. Such an omission under licensing by a topic is local in that only matrix subjects adjacent to initial adverbs and topics are allowed to drop. In this regard, English speakers of L2 Chinese seem to have reset the non-topic and overt argument settings of English as they allow null matrix subjects, which can be identified by a topic. Nevertheless,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examples with embedded subjects prove otherwise. In fact, they reflect how a difficulty that L2 Chinese speakers have trouble resetting the overt argument parameter. Learners retain embedded subjects to their English value rendering matrix subject and embedded subject divergence possible. It could maintain that learners are i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topichood in Chinese but have trouble resetting English feature values. This is an extremely tentative suggestion<sup>1</sup>. Before we can say that learners have trouble resetting the overt argument parameter, subtle testing of properties in relation to the domain, e.g. topic-related null matrix-embedded objects, would be crucial.

### 6.3. Concluding remark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focus of the paper has been on native-nonnative grammar divergence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ll subjects in L2 Chinese. The study was intended to be a pilot study of its kind. It is noted tha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task design, and the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call for some larger scale studies to be conducted before a strong claim can be made. Nevertheless, results from the study have pointed tentatively to how the diverg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ll matrix and embedded subject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partial access to UG* framework. It is argued that, following Hawkins and Chan (1997) and Kong (2005), parametric varied functional categories (subject pronouns in this case) not selected in L1 within the critical period become inaccessible to post-childhood

---

<sup>1</sup> A reviewer suggests that the Specifier of TopP in Chinese has to be overtly realised because the TopP feature (including [+def] in the feature matrix) in Chinese is strong (Chomsky 1995). This asymmetry of matrix and embedded null subjects observed in the study could be the result of learners being unable to reset the Chinese topichood parameter.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reviewer for the suggestion and explore the assumption that topichood is PF obligatory in Chinese in further research.

L2 learners. What seems to be a parameter resetting scenario is probably a misinterpretation of L2 input for L1 properties.

## Acknowledgement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resented at the *Fifth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Leipzig. I would like to thank participants, James Huang and Virginia Yip in particular,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s to two anonymous *THJH*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 Appendix I

### Adjuncts

1. Zai Xiaowang wancheng zoupin hou, ta zhongshuo ta yao pao hu nong cha.
2. Zai Xiaowang xiewan baogao yiho, ta zhonghui he bei kafei.
3. Zai nimen jian guo Xiao-ming hou, kefou chuanhua gei ta.
4. Xiaomin zai xiewan baogao yiho, ta dou shuo ta yao xian xie zhaiyao.
5. Wo zai chucan yihou, wo zhongshi hui dasao fangzi.
6. Ta zai dasao chufang yihou, ta zhonghui kan baozi.
7. Zai wo kanwan zheben shu yihou, wo juede nimen keyi qu jie zheben shu qu kankan.
8. Zai women kanwan zhebu dianying yihou, women keyi taolun yixia women dui zhebu dianying de ganxiang.

### Topics:

1. Xiaoming guoqu xiguan chi gezhong butong de shiwu. Rou, ta jinlai bijiao shaochi.
2. Haizimen hui xuanze sheme chi ne? Tang-a , tamen jinlai henshao he.
3. Xiaoming guoqu xiguan chi gezhong butong de shiwu. Wo xiang, rou,ta jinlai bijiao

shaochi.

4. Wo ba wode jiaju he shu dou yiqi maile. Keshi wode pengyou shuo, nasheshu, wo shizai bugai maidiao.
5. Meidao Xiaohua de shengri, ta ningke qu kan dianying, ye bu mai shengri dangao. Shengri dangao, ta tibuqi shenme tebie de xingqu qu mai.
6. Xiaowang hui ba chezi jiegei Laoli hai shi Xiaochen ne? Laoli, ta zhongshi mei xinxin ba tade che chujie gei ta.
7. Meidao Xiao-hua de shengri, ta ningke qu kan dianyin, ye bu mai shengri dangao. Wo xiang, shengri dangao, ta tibuqi shenme tebie de xiingqu qu mai.
8. Xiaozhang yao Wenhua tongzhi guke he shangjiamen tade gongsi jiang zhanshi guanbi. Ta juide, guke, ta yinggai yao youxian tongzhi tamen.

## References

1.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 Haegeman, Liliane. 199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3. \_\_\_\_\_. 1994.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2<sup>nd</sup>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4. Hawkins, Roger. & Chan, Cecilia. Yuet-hung. 1997. 'The partial availa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failed functional features hypothesi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3, 3:187-226.
5.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6. Kong, Stano. 2005. 'The partial access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English subjects by L1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4: 227-265.
7. Li, Chalres. & Thompson, Sandr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 In Li, C.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8. Prevost, Philippe, & White, Lydia. 2000a. 'Accounting for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 L2 acquisition: truncation or missing inflection?' in M.A. Friedemann and L. Rizzi (eds.),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London: Longman.
  9. \_\_\_\_\_. 2000b. 'Missing surface inflection or impair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tense and agreement.'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6: 103-133.
  10. Rizzi, Luigi. 1986. 'Null objects in Italian and the theory of "pro"'. *Linguistic Inquiry* 17: 501-557.
  11. Tsimpli, Ianthi-maria. & Roussou, Anna. 1991. 'Parameter-resetting in L2?'.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149-170.
  12. Xu, Liejiong, & Langendoen, Terence. 1985. 'Topic struc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61: 1-27.
  13. Yip, Virginia. 1995. *Interlanguage and Learnability: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53-37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53-374

# 從理論到成功：東海大學大一英文課程

幸雅各\*

## Tunghai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 Program

by  
James Sims

關鍵詞：語言教學、外語課程、大一英文

**Keywords:**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 〔提要〕

東海大學大一英文課程為全台灣組織架構最嚴謹與最有系統的課程，然而，針對學生如何從此語言課程中獲益之研究極少。此篇論文將簡短介紹本課程的理念、目標、教學及評量措施，同時以本校九十四學年度大一新生能力分班測驗結果，與大一下學期末同一測驗之平均分數，作比較分析。本校大一英文分班測驗與全民英檢中高級測驗之相關性測試呈現高度顯著性，證明其具有高信度及效度，故視其能有效測量出學生語言能力。共計約有三千位學生於新生訓練日及下學期末接受本分班測驗。

變異數分析可就文法、閱讀、聽力三部分的平均分數作比較，結果指出本校修習大一英文課程的學生其語言能力在各方面均明顯地進步。相較於語言之精確度，本課程較注重語言流暢度，在此產生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即使文法並無直接地教授或測驗，但學生的文法成績分數確有進步。閱讀得分在微觀與鉅觀兩方面亦均有明顯的增長，尤其在判定文章段落主旨的鉅觀技巧上更是大幅進步。學生在閱讀方面的進步，因為本課程始終強調該如何在密集與廣泛閱讀中找出章節段落的主旨。學生進步最多的部分在於聽力，學生的立即反應與聽力能力之延伸皆明顯進步。本校大一英文課程全程以英語授課，同時提供學生多元化之聽力訓練，研究結果顯示對增進學生聽力幫助極大。

## Abstract

Tunghai University has a well organized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s (FENM) program.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actually measure how students benefit from i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hilosophy, goals and approach of the program. The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rovement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FENM students at Tunghai University for the 2005-2006 academic year by comparing the mean scores of the Tunghai English Placement Exam (TEPE) in a pre- and post-design. The TEPE was judged to be a valid measure of language comprehension because of its high reliability, appropriate validity and strong correlation to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A paired sample t test design allowed the comparison of mean scores of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unghai FENM students' proficienc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all measured areas. The program's emphasis on fluency rather than accuracy produced a surprising result. Students' grammar scores improved even though grammar was not explicitly taught or tested. Students' reading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both macros and micros skills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the macro skill of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 of paragraphs. The overall largest increase was on the listening section of the TEPE with measures of students' immediate and extended listening ability both show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 1.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wo-fold. The first goal is to introduce a task-based FENM program that uses skills rather than content to foster independ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The second goal is to examine how students improved based on this method.

Tunghai University has one of the best structured and organized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s (FENM) programs in Taiwan. Each year approximately 3,300 students are instructed by 22 full-time and 38 part-time teachers in this four-skill program.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actually measure how students benefit from this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 After introducing the philosophy, goals and approach of the progra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rovement in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FENM students at Tunghai University for the 2005-2006 academic year.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t Tunghai aims to help stud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English, discover mor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become more able to explain themselves and their cultures, and gain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futures in an increasingly multilingual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of the program work with the students in a cooperative effort, seeking to meet the demands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mmunity of which they are all sustaining members.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pursues this vis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curricula, teaching methodologies, and class materials, and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collaboration, consultation, and review that sustain a profess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FLLD Constitution passed June 1994).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this constitution.

Numerous researchers in Taiwan have conducted surveys to find out what students, teachers, and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 expect from FENM programs (Huang, 1996, 1997a, 1997b, 1998; Yang, 1985, Kuo, 1990). These studies reported consistent results: students see verbal communication, oral and aural skills, as most important. Sinc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re highly valued in learner-centered program,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was designed with these results in mind.

Students at Tunghai as well as Chung Y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ien, Ching, & Kao, 2002), Feng Chia University (Luo, 2005), and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Chen, Lin, & Feng, 2003) are assigned to FENM classes based a placement exam. During freshman orientation at Tunghai, all incoming students take the Tunghai English Placement Exam (TEPE),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sections: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exam, students are placed into one of 106 sections of FENM. Sections ar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high, high-mid, low-mid and low. High-level classes have approximately 35 students, mid-level classes have 32, and low-level classes have approximately 28 students.

First-year students attend FENM classes based on their college. In other words, all students in the same college attend FENM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in FENM are required to take five hours of English each week for two semesters. However, students only receive 3 credits per semester for FENM. Students in the top ten percent of the placement exam can opt to take one year of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German, French, or Spanish).

## 2. Overview of Tunghai FENM

The following overview of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is from the FENM Teachers' Handbook, which was first drafted in 1994. Over the last decade, this handbook has been revised and edited by teachers within the program, but the main focus of the program remains unchanged.

### 2.1 Goals of FENM

FENM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he majority of freshmen at Tunghai University. It is not the intent of this course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for such specific language use as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ES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It is intended rather as a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course emphasizing fluency in a general context (i.e.,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se their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he general goals of the FENM program are to provide an atmosphere that will increas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a non-threatening environment,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speaking contexts, and increase their ability to apply the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y have acquired in high school.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se general goals, the emphasis is on fluency rather than accuracy. Creativity is encouraged, but language errors that impede comprehension are corrected with sensitivity. What follows i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goals, methods for each of the four skill areas, and the grading policy in the FENM program.

### 2.1.1 Speaking

The main goal in speaking is to maximiz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in class.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use of pair work, group work, role-plays, dialogues, speeches, skits, and plays about everyday life, school, family, feelings, and any other topics the classroom teachers feel are appropriate. Through the use of these activities in class, students feel more comfortable using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upon completion of the FENM program.

The oral component of FENM is task-based. In task-based instruction,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is a series of purposeful tasks that the students want or need to perform in English (Brown, 2001).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sk is approached as a way to develop language ability (Krahnke, 1987). Oral assignments comprise 15% of the total FENM grade.

### 2.1.2 Listening

The main goal in listening is to maximiz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listen to English as spoken by peopl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This is done through,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 use of videotapes such as *Connect with English*, movies, television programs, audiotapes, and other material that the classroom teachers feel are appropriate. Through the use of these material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authentic Englishes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comprehend English-language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day

topics.

The purpose of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in FENM i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verbal messages in real-life situations. Although it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hon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language, the emphasis of the FENM listening component is on communication. By the end of the FENM program,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isten to and comprehend short (5 minutes or less), simple oral passages and conversations on familiar topics.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ain ideas and details of aural passages. According to Richards (1985), way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re to build up students' abilities to: (1) retain chunks of language of different lengths for short periods; (2) use real-worl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infer purposes, goals, settings, and procedures; (3) predict outcomes from events described; (4) infer lin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events; and (5) deduce causes and effects from events. These listening skills have been adopted as the focus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ese goals are achieved by listening to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ho are speaking English in class, listening to audiotapes appropriate to their abilities in and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and working in the language lab.

### 2.1.3 Reading

The main goal in reading is to maximiz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use basic reading skills such as skimming, scanning, reading for main idea, inferencing, and guessing vocabulary in context. Upon completing the FENM program,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pply these skills to clearly written academic, authentic, and simplified articles that have a clear thesis statement, body paragraphs with a topic sentence and supporting details, and conclusions.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use of both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includes the reading of articles in the reading textbooks that are recommended for FENM and other supplemental readings chosen by classroom teacher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reading skills. Extensive reading includes the use of simplified readers of an interesting nature to apply basic reading skills and foster students' appreciation of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reading component of the FENM program is skill-based. According to Krahnke, "a

skill-based approach is one in which the content of the language teaching is a collection of specific abilities that may play a part in using language. Skills are things that people must be able to do to be competent in a language,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of the situation or setting in which the language use can occur" (p. 11, 1987). A skill-based approach allows FENM students to apply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English they have learned in high school as well a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rea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These skills include reading for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and of individual paragraphs, reading for general comprehension and for details, guessing vocabulary in context, inferencing, and pronoun referencing. Intensive reading and extensive reading are two important and inter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reading program.

#### 2.1.4 Writing

The main goal in writing is to maximiz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use written English for formal communication. Upon completing the FENM program requirements,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a number of rhetorical structures of expository writing including informative report, cause and effect,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and narration, and be able to write an introductory or summary paragraph that is comprehensible, cohesive, contains an introduction, supporting details, and a conclusion, and is written in an appropriate rhetorical structure (chosen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options). The focus here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well-structured, comprehensible, and cohesive expository writings as well as the goals and purposes of formal written communic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them with a repertoire of strategies for composing texts. Moving from topic sentence stating to paragraph constructing,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processes for each selected rhetorical structure: modeling, drafting, and revising.

The purpose of the writing component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bine and apply 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ey learned in high school in written form and to help them become aware of academic writing styles in English. For topic sentence stating, students are taught to state clearly written topic sentences to express their main ideas. For paragraph constructing, students are taught to provide sufficient relevant details to support the main ideas, and to

complete the paragraphs with logically inferred conclusions. At teachers' discretion, higher level students can be taught to expand their paragraph constructing skills to develop a three-to-five paragraph expository essay that consists of an introductory paragraph, one-to-three main-body paragraphs, and a conclusive paragraph in a given or chosen rhetorical structure.

## 2.2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Skills

The four skills, though described separately, are not taught in isolation.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incorporate them in everyday classroom activities.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discuss what they have read, write about what they have discussed, and listen to what others have to say about what they have read or written. Through this cycle of language use,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will build up thei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will continue to us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Freshman English.

## 2.3 Testing and Grading

Each semester, two achievement tests--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s--are prepared by the FENM test-writing committees. These tests are designed to measure how much a student has learned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 FENM stud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study. Individual teachers also prepare quizzes as progress tests to be given at the end of a unit. These progress tests are much more specific in scope to individual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an 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Since students' English grades on the official transcript do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high-, mid-, and low-level classes, this program has a semi-unified grading policy. This grading policy requires that students take two program-wide exams each semester and be evaluated based on similar criteria. They are also required to perform similar tasks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Likewise, students at all levels must attain the same standard of proficiency to pass each semester of Freshman English. Students who cannot attain this level receive a failing grade. For these students, repetition of the semester is required.

### 3. Purpose of the Study

FENM at Tunghai University is well-organized and structured, but do students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 Does their English ability improve? What do they learn? In what areas do they improv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English-language proficiency of freshmen at Tunghai University for the 2005-2006 academic year. In short, have there been any changes in freshmen's English language abil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program?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as there an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scores in term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measured by the Tunghai English Placement Exam (TEPE) in a pre-and post-design?
2. Was there an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grammar scores in term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measured by the TEPE in a pre-and post-design?
3. Was there an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reading scores in term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measured by the TEPE in a pre-and post-design?
4. Was there an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listening scores in term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measured by the TEPE in a pre-and post-design?

## 4. Method

### 4.1 Subjects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were 2,625 Freshman English for Non-majors students at Tunghai University for the 2005-2006 academic year. Transfer students, who are only required to take the fall semester of FENM, and students who dropped out of school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Only those students who took both the fall and spring semest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unghai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institution with both graduate (2,200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12,500 students) programs and 850 teachers.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is extremely homogeneous: 99.9% are Chinese (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verage age is 20 with 96% between 18 and 23 years old with an approximately equal number of males and females, a majority are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have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about 94% have graduated from public high schools, and a majority come from middle-income families.

## 4.2 Instruments

The Tunghai English Placement Exam (TEPE)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s the pre- and post-test to compare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the subjects. The TEPE is a multiple-choice exam composed of 60 questions (Sims, 2006). Each question had four plausible distractors, but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The Grammar Section (20%) was composed of two cloze paragraphs with 10 questions each for a total of 20 points. The Reading Section (40%) was composed of two passages with 1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per passage for a total of 40 points. The Listening Section (40%) wa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Story (7 questions), Dialogue (7 questions), and Appropriate Response (6 questions).

The TEPE is a placement exam. Hughes (2003)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 grammar component in a placement exam in order to place students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class level. In addition, the knowledge of students' grammatical ability i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termining what gaps exist in their grammatical repertoire. With this in mind, the grammar section of the TEPE focused on subject-verb agreement, count and non-count nouns, prepositions, adjective clauses, gerunds and infinitives. These test specifications were judged sufficient to give adequate separation between grammar scores so that students could be placed into appropriate class levels.

According to Hughes, reading exams should ask both macro questions, which are questions that require some integration or generalization from specific sentences, and micro questions, which are questions that focus directly on specific sentences or parts of sentences. Thus, each reading passage of the TEPE included macro questions: main idea of article, main

idea of paragraphs, and inferencing; micro questions included: general comprehension/details, vocabulary in context, and pronoun reference. The reading texts were factual, informative, and descriptive as suggested by Meyer and Freedle (1984) and Alderson (2000). The passages were expository and represented the genre of discourse that ESL students often encounter in their academic studies (Eskey, 1986).

Brindley (1998) suggested that a listening test is more likely to provide a balanced assessment by us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asks. Hence, the listening component of the TEPE was composed of three sections: story, dialogue, and appropriate response. The purpose of the story and dialogue was to test general comprehension of extended listening texts. The goal of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was to test students' immediate listening skills through the use of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within the context of what students heard.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the listening assessment study by Buck (2001), the listening texts were of a suitable nature.

Test committees composed of five to seven experienced Freshman English teachers developed each section of the exam. Furthermore, each portion had been used on midterm or final exams during previous years. Clozes, reading passages, scripts, and questions were modifi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est analysis from thes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Item difficulty, item discriminability, and item variance were all determined to be appropriate based on item analysis methods suggested by Henning (1987), Hughes (2003), and Bachman and Palmer (1997).

As suggested by Alderson, Clapham, and Wall (2002), Cohen (1994), Hughes (2003), and Tuckman (1988), the exam was determined to be valid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est specifications and test content. The test specifications, or skill meant to be covered, were presented above. Following Hughes' recommendations, these comparisons were made by four Freshman English teachers who were trained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but were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exam. These four teachers concluded that the exam was a valid measure of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for Taiwanese students.

Brown (2004) suggests that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with other similar independent exams is another widely accepted form of evidence for a test's validity (p. 22). Such a study was conducted between the TEPE and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During the fall 2005

semester, 359 Tunghai students took both the TEPE and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The result of a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EPE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 $r=0.765$ ) to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In short, the strong correlation to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implies that the TEPE has validit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igh Intermediate GEPT. In other words, the TEPE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a valid measure of language comprehension to an exten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A detailed study in Chines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PE and the High-Intermediate GEPT is posted at: <http://www2.thu.edu.tw/~langexam/>.

A split-half method was used to estimate 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Each section of the exam was divided into two equivalent halves, one containing the even-numbered questions, the other the odd-numbered questions. Each test item was carefully matched with a similar type of question from the other half.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r=0.88$ . According to Hughes (2003), language exams should have a reliability of at least 0.85. The TEPE was thus considered a reliable instrument with which to measur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 4.3 Procedures

During freshman orientation, all incoming freshmen at Tunghai University took the first TEPE (pre-t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exam, students were placed into one of 106 sections of FENM. The purpose of the placement exam was to divide students into classes based on their language ability.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 purpose of the exam and took the exam with this in mind.

All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took the first TEPE on September 14, 2005, in the Tunghai Chiang Kai-Shek Auditorium/T-Building. Students were seated in the Chiang Kai-Shek Auditorium (CKS) according to their departments. All students of the same department sat in the same section or area of CKS. The exam was proctored by teachers and staff memb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fter eight months of instruction, FENM students took the same TEPE (post-test) on May 29 and 30, 2006. Students took the second TEPE in CKS during class time and were seated

according to their FENM classes. The exam was proctored by their FENM teacher. Students had 70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exam (same time limit for both the pre- and post-tests).

The Listening Section was played over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A sound-test was done before each test to check for sound quality. There appeared to b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the sound in CKS for the two different times the students took the TEPE. The same recording (CD) was used for each administration of the exam.

For both the pre- and post-tests, each student used a 2-B pencil to enter answers on a computer card. The computer cards were scanned on a SCANMARK 2000 and the scores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ame EXCEL program.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house, using the same equipment and software for each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exam.

#### 4.4 Data Analysi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The alpha level, or probability, of falsely rejecting a true null hypothesis, was set at the .05 level. The threshold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was set at .50 standard deviations.

A paired sample t test design allowed a comparison of the means of dependent variables across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first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TEPE. The total score was the combined score of all three sections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of the TEPE. The second t test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grammar scores. The third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reading scores. The last t test compared listening scores for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 5. Results

The sampl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the two TEPEs are shown in Table 1. The results of the four paired sample t test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2.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scor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the TEPE after eight months of instruction. Students improved in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is increase can clearly be seen in the

comparison of mean scores for each skill area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presented in Figure 1.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TEPE

	<u>Fall (Pre-Test)</u>			<u>Spring (Post-Test)</u>		
	<u>Raw Mean</u>	<u>Mean%</u>	<u>SD</u>	<u>Raw Mean</u>	<u>Mean%</u>	<u>SD</u>
Grammar	13.19	65.96	3.04	14.12	70.60	2.97
Reading	20.60	51.49	6.85	23.66	59.11	7.41
Listening	27.40	68.50	8.32	31.41	78.52	7.46
Total	61.18	61.18	14.97	69.19	69.13	15.13

Note: n=2625

Table 2. T-Test for TEPE

<u>Paired Samples</u>	<u>N</u>	<u>R</u>	<u>T</u>	<u>Sig.</u>
Grammar Pre-Post	2625	0.612	17.98	.000*
Reading Pre-Post	2625	0.597	24.40	.000*
Listening Pre-Post	2625	0.740	35.79	.000*
Total Pre-Post	2625	0.784	41.52	.000*

\*Comparison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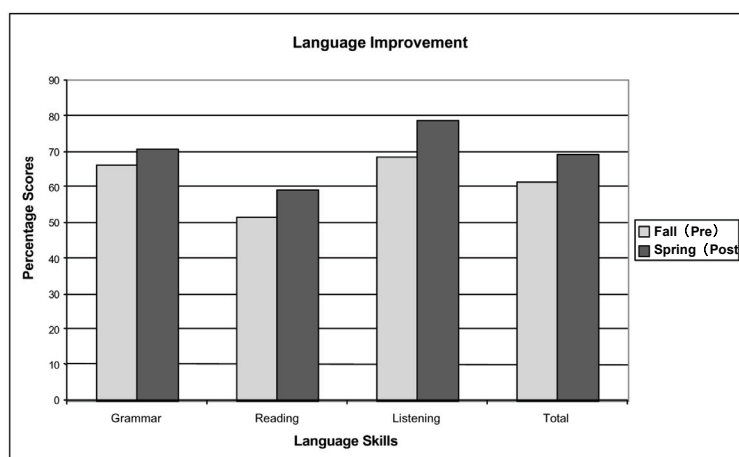


Figure 1. TEPE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Mean Scores  
 Note: Grammar 20%, Reading 40%, and Listening 40% comprise the Total Sc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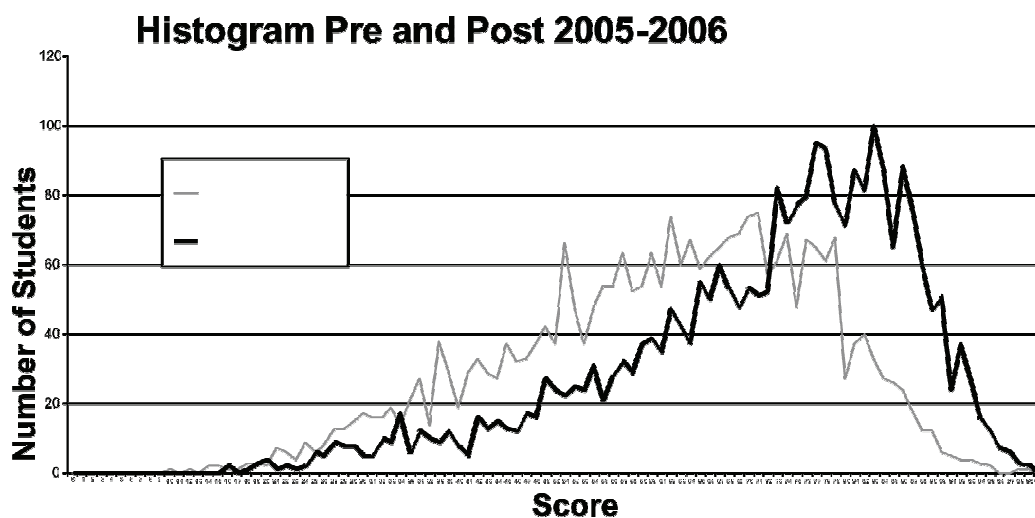


Figure 2. Histogram of Pre- and Post-Total Scores

The Total Score for the TEPE increased 8.0 percent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his overall improvement for the total score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the histogram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shown in Figure 2. This figure shows the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graph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indicating students' improvement on the TEPE.

There was a 4.6 percent increase in scores on the Grammar Section and there was a 7.5 percent increase on the Reading Section. The Listening Section had the largest increase at 9.9 percen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the Listening Section and Reading Section are reported in Table 3 and Table 4, respectively. These tables show the increase in each skill area that was taught in the FENM program.

Table 3. Increase in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Reading Scores\_\_\_\_\_

	<u>Fall % Correct</u>	<u>Spring % Correct</u>	<u>Increase %</u>
Main Idea of Passage	40.2	47.2	7.0
Main Idea of Paragraph	55.4	64.7	9.3
General Comprehension/Details	52.0	58.5	6.5
Vocabulary in Context	53.2	59.3	6.1
Pronoun Reference	51.3	60.0	8.7
Inference	39.2	46.4	7.1
Total Reading	51.0	58.5	7.5

Table 4. Increase in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Listening Scores

	<u>Fall % Correct</u>	<u>Spring % Correct</u>	<u>Increase %</u>
Story	58.4	71.6	13.2
Dialogue	74.6	80.4	5.8
Appropriate Response	70.9	81.6	10.7
Total Listening	67.8	77.7	9.9

## 6.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In a task-based language program a series of tasks, rather than a set of linguistics items, are taken in the design process (Nunan, 2001). Thus, FENM at Tunghai incorporated tasks into the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 As previously presented, these tasks were done through the use of pair work, role-play, dialogues, and plays. Also, in this FENM program, skills, rather than content, ar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foster learners' independe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improved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all measured area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all areas covered by the TEPE. Grammar, reading and listening scores al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program's emphasis on fluency rather than accuracy produced a rather surprising result. One would expect that if grammar was not taught or covered, the students' grammar scores might not improve. However, students improved in grammar even though this is an area that is not explicitly taught or tested in the program. An explanation of this may be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internalize the target language.

Students' reading scores increased in all areas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e being in the macro skill of identifying the main idea of paragraphs. Finding the main idea of both the passage and paragraphs are skills that are emphasized in both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 Likewise, the micro skills of guessing vocabulary in context and pronoun referencing are skills that the program emphasizes. Students' ability increased in these areas as well as in finding details and general comprehension. Overall, the results of the

Reading Section help to validate the Tunghai FENM method.

The largest increase was in listening. This i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Not only is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t is also the means by which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municate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peak English to both their teacher and classmates.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measure of students' immediate listening skills, as measured by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Section on the listening exa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Likewise, students' extended listening skills as measured by the Story and Dialogue Section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unghai's FENM approach of using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and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multiple opportunities to listen to English has helpe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helps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unghai FENM, but readers should bear in mind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One of the limitations is the use of the same test for both a pre-test and post-test because the participants might have remembered some of the items when they took the post-test. However since students only saw the TEPE once and given that there was an 8-month time laps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exam, it was felt that students' recall of the material they were exposed to the first time would be negligible the second time.

Another limitation is that the four skill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emphasized in Tunghai FENM; however, the TEPE does not have writing or speaking component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students' overall language improvement. Futu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changes in students' writing and speaking proficiency.

In an ideal study, a control group should be used to compare test results of this nature. A control group could have controlled for factors like improvement due to students' natural cognitive maturization and exposure to other English input. Since Tunghai freshmen are required to take FENM a control group design was not feasible. However, this study could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use of a control group.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introduce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and to find out if students benefit from this progra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do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 but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need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factors not covered by this study. Future studies might investigate what effect(s) the Tunghai FENM program has on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motivation and affective factors like risk-taking and self-confidence. Likewise, future studies might examine learner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nd major.

## References

1. Alderson, J. C. (2000). *Assessing rea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Alderson, J. C., Clapham, C., & Wall, D. (2002). *Language test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Bachman, L. F., & Palmer, A. S. (1997).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Brindley, G. (1998). Assessing listening abiliti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8, 171-191.
5. Brown, H. D. (2001).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White Plains, N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6. Brown, H. D. (2004). *Language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classroom practices*. White Plains, NY: Pearson Education.
7. Buck, G. (2001). *Assessing liste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Chien, C. N., Ching, H. L., & Kao, L. H. (2002). Study on a different leveling English instruction policy for Freshman English i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ung Yuan Journal*, 30, 505-516.
9. Chien, Ching-ning (1987). A study on different level instruction in Freshman English classes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ung Yuan Journal*, 16, 74-79.
10. Chien, Ching-ning (1989). A study on material and methods for Freshman English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ung Yuan Journal*, 18, 78-91.
11. Cohen, A. D. (1994). *Assessing language ability in the classroom*. Boston: Heinle & Heinle.

12. Eskey, D. E. (1986).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F. Dubin, D. E. Eskey, & W. Grabe (Eds.),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pp. 3-33).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3. Henning, G. (1987). *A guide to language testing*. Los Angeles: Newbury House.
14. Huang, S. Y. (1996). English programs for non-English majors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03757)
15. Huang, S. Y. (1997a). English curricula and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for non-English majors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06836)
16. Huang, S. Y. (1997b). The ESP components in English programs for non-English majors at universities at Taiwa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03758)
17. Huang, S. Y. (1998). Freshman English programs for non-English majors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ap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Tunghai Journal*, 39, 129-153.
18. Hughes, A. (2003). *Testing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Krahnke, K. (1987). *Approaches to syllabus design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20. Kuo, C. H. (1990). Freshman English desig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1, 44-51.
21. Luo, B. (2005). Achievement grouping and students' progress in freshman English classes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253-279.
22. Meyer, B. F., & Freedle, R. O. (1984). Effects of discourse type on recall.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1, 121-143.
23. Nunan, D. (2001).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Boston: Heinle & Heinle.
24. Richards, J. C. (1985). *The context of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Sims, J. M. (2006). The creation of a valid and reliable university proficiency exam.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47, 323-342.
26. Tuckman, B. W. (1988). *Testing for teacher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7. Yang, Y.L. (1985). *Freshman English programs*. Papers from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OC, 27-58, Taipei, Taiwan: Crane.
28. A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entitled *A Language Program in Theory, Practice*,

*and Success* at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nglish Teachers' Association  
Conference-Republic of China (ETA 2006), Taipei, Taiwan, November 10-12, 2006.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75-390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75-390

# 論字辭翻譯對應之複雜性

卓志誠 陳曉靚\*

## On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Word Correspondence in Translation

by

Chuo, Chih-Cheng Chen, Hsiao-Ching

關鍵詞：複雜性、來源語言、目標語言、對應

**Keywords:** Inherent complexity; Source language; Target language; Word correspondence

---

Chuo, Chih-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 Chen, Hsiao-Ch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en 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 〔提要〕

將來源語言之某一單字翻譯成目標語言之對應單字絕非是容易的。本研究以中英文為例，探討單字翻譯之複雜性。根據本研究，翻譯涉及兩範疇：一為來源語單字意義之釐定；其次為目標語言對應字之釐定。本研究旨在探討第二階段。有關於目標語言中之對應字之釐定，本研究詳細討論四種對應，亦即一對零對應、一對一對應、一對二、及一對三對應。一對一對應對於譯者來說，當然是最省時、最簡單的，也較不易造成問題。一對二或一對三對應蘊含問題為：(一)此兩三個對應字為同義字，但可使用於同一脈絡；(二)此兩三個對應字為同義字，但其中某字接受度較高；(三)此兩三個對應字既非同義字也非相似字，但卻使用於同一脈絡。一對零對應蘊含問題甚多，主要與語言相對性有關。根據此論點，某一情境出現於來源語言，卻沒出現於目標語言，目標語言當然就不可能有對應字來敘述此情境。特有辭彙 (Obligatory categories) 為語言相對性最佳例子。

## Abstract

Word translation involves identifying (1) the meaning of a content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2) a corresponding wor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second step of word translation. With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s as examples,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aims to discuss the complex problems inherent in word correspondence. This study discusses in detail four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namely one-to-one, one-to-two, one-to-three, and one to- $\Phi$  correspondence. Admittedly,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is by far the least time and energy-consuming in word translation, thus causing fewer problems.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one-to-two and one-to-three correspondence are (1)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synonyms and they are mutually interchangeable in a specific context, (2) the two or three expressions are synonyms and one of them i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e other in a specific context., and (3)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not synonymous or similar in meaning in terms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one-to- $\Phi$

correspondence are mainly related to linguistic relativity, which implies that while a specific social or cultural situation or setting may exist in a source language, it may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a target language.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wor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Obligatory categories are good exampl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 I.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guage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semantics undoubtedly constitutes more complicated problems than phonology and syntax. The phonological and syntactical aspects of a source and a target language, which are more rule-oriented and regarded less meaning-related, are less problematic, as most problems related to them may be approached in terms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or resorted to base or underlying structures and transformational rul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language-universal (Chomsky, 1964). Experientially, translators spend more time and effort identifying the meaning of a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looking for its counterpar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dmittedly, the process is far from being easy, and in some cases even unattainable. Translators may need to refer to som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he word meaning and judging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wor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focuses on the second step, endeavors to provide a theory-based model to which translators may ref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corresponding words. Based on the researcher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the researchers will provide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s as examples.

## II. Identifying the corresponding word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mentioned above, translators need to undergo two steps in word translation: (1) meaning identification of a specific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2) the postulation of a corresponding wor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dentifying the meaning of a specific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is far from being easy. Chuo & Chen (2008) mentioned that translators need to refer to 13 criteria to attain an optim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 a word. According to them, postulating the meaning of a content word in a source language involves 3 characteristics pertaining to the nature of words and 10 factors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meaning of a word in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3 characteristics are:

1. Words are always in a process of change.
2. Words seldom exist alone.
3. Words have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of acceptance.

The 10 factors are:

1. Words have their definitions in dictionaries.
2. Dictionaries may provid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a word.
3. Words may develop into a semantic world.
4. Words may be used for rhetoric purposes, thus enriching and animating languages.
5. Usages may overrule traditional etymology.
6. English is abundant in synonyms.
8. Different dictionaries provide different semantic differentials.
9. Non-similar or non-synonymous words may occur in the same context.
10. Personal preference may be at work.

The thirteen criteria are respectively related to context, word development, semantic world, dictionary definition, synonym differentiation, rhetoric purpose, co-existence of non-similar words. They may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exert influence on the meaning identification of a specific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ssuming that translators have identified the meaning of a specific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hey will be immediately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problem: Does the target language have a corresponding word which bears the same or similar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four types of word correspondence are frequently found to exist in word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 1.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 would be much easier if there were a one-to-one syntactic, semantic or even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That is, for any feature, semantic or syntactic especially, in a source language, there is one and only one corresponding feature in a target language. In such a circumstance, identifying a corresponding syntactic or semantic

featu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ould suffice. With respect to whether there is any corresponding wor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ors are faced with various possibilities. First, there is one and only one corresponding wor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shown by Fig1):

Source language word A       $\longrightarrow$       Target language word  $\alpha$

Fig. 1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Admittedly,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is by far the least time and energy-consuming in word translation. For example, English words such as *water*, *computer*, *airplane*, *taxi*, *linguistics*, *professor*, *newspaper*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respectively all have only one corresponding word, namely 電腦, 飛機, 計程車, 語言學, 教授, 報紙, and 水 and in written or spoken, formal or informal Chinese.

- a. He is an expert in *computer* technology.
- b. I saw an *airplane* taxiing in the runway.
- c. He is a *taxi* driver.
- d. *Linguis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 e. My father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 f. *Newspapers* provide us with updated international issues.
- g. The *water* in the river is very dirty.

Take *computer* and 電腦 for instance. When users of English are shown a photograph or picture of a computer, they will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utter the word *computer*. Likewise, once users of Chinese a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name of the same object, they will call it 電腦. The two words may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having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 English word *computer*, no matter who uses it, where and when and how it is used, has only one corresponding word in Chinese, that is, 電腦. Translators need not bother to look for other corresponding words. Therefore, in the cases where there is one-to-one word correspondence, it would be neither necessary nor appropriate for translators to select other words to replace any of them. These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s in principle carry the same meaning, regardless of context, and are situation-free.

Most translations of words, however, are far from being so simple, as linguistic relativity

(Whorf, 1957)<sup>1</sup> is found to exert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every aspect of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Huang (1978), it is empirically impossible for a translator to find an identical counterpart in a target language which is completely identical to a specific feature in a source language. Lin (1972, p. vii) pointed out that identifying a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 which is not only close to the English word in meaning but also adherent to Chinese usage poses tremendous difficulty for translators. Chen also mentioned that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frequently encounter a certain English word which has no listed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 in any dictionary. As a result, translators may adopt literal (or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thus turning out awkward or meaningless Chinese (p.153)<sup>2</sup>.

## 2. One-to- $\Phi$ correspondence

Empirically speaking, various possibilities may be found in actual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there are cases where a word in a source language has no corresponding word in a target language at all (Fig. 2):

---

<sup>1</sup> Whorf suggested that language is the grid through which people look at the world. To this notion Lyon added “. . . the actualization of particular phonological,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distinctions in different language-systems is completely arbitrary. Since its best known proponent, in recent times, was Whorf (1956), it is commonly known as Whorfianism, or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p. 245). *Quine (1960) also mentioned that one frequently hears it urged that deep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carry with them ultimat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ne thinks or looks upon the world* (p. 77).

<sup>2</sup> Linguistic borrowing usually occurs where two forms of speech are quite different (Gleason, 1961). Typically the flow is greater in one direction than in the other. The speaker of a language regarded for any reason socially or culturally superior does not feel under any compulsion to learn a language regarded as inferior, though he may condescend to pick up an occasional word that serves him in the trouble of inventing one himself. When two languages are in contact, words are affected first, grammar last. The commonest form of borrowing is that of direct borrowing of words, which are called loanwords (Bolinger, 1975;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2000). More than 75% of the words in English, for example, are technically loanwords (Zeiger, 1977). Lexical borrowing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where contact is most intense.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 the field nowadays, with sports and tourism close behind (Bolinger, 1975).

Source language word A  $\longrightarrow$   $\Phi$

Fig. 2: one-to- $\Phi$  correspondence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implies that given a specific context, situation or category, words applied in one language may not have corresponding words in another language.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has solid support from words related to social customs, beliefs and practices, religious usages and professional terms. Take the following Chinese sentences for examples.

- a. 我們要孝順父母
- b. 對人要講義氣
- c. 這位大德往生極樂世界
- d. 他卯時出生
- e. 對方不要聘金
- f. 兩人陷入不倫
- g. 他在大陸包二奶
- h. 我們班導即將結婚

Strictly speaking, the underlined words in these sentences do not have corresponding English words. For instance, 孝順 and 義氣 are two words which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 Just as 孝順 is more than *respect* or *piety* 義氣 is more than *justice* or *honesty*. Both of them are concepts unfamiliar to western people, and naturally there is no English word bearing the same meaning.

往生, which is a Buddhist word, means much more than rebirth or afterlife. A person may 往生 if and only if he or she keeps on praying AMITOFU and enters into an eternal sphere. This is also a concept foreign to the western culture. 不倫, which refers to an extramarital affair, has an implication of “immorality.” In English, romantic and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rried man and a woman who is not his wife is dismissed as an extramarital affair, and the husband is said to be unfaithful. The Chinese 不倫 and “affair” or “extramarital affair” are not identical in meaning. Lack of correspondence may also be found in other examples. The so-called corresponding words provided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can only partially

reflect the reality.

With respect to English-Chinese word correspondence, the English language also witnesses a lot of words which have no corresponding words in Chinese<sup>3</sup>. Take the word *enterprise* for example. Unlike *business*, which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sells goods or services, an *enterprise* emphasizes the adventurous, risking qualities (Mascull, 2003). The Chinese words 事業 or 企業, whose corresponding words in English is *business*, do not carry the meaning inherent in *enterprise*. In Chinese, 事業經營 or 企業經營 do not necessarily imply adventurous, risking qualities. The two words, nevertheless, have become widely accepted corresponding words for *enterprise*.

Other cases may be seen in the Chinese word 老鼠. 老鼠 in “我看見一隻老鼠” has no corresponding English word, because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ither a *rat* or a *mouse*. Neither does 聲音 in “教室裡不要有任何聲音” have any single corresponding English word because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sound*, *voice*, or *noise*. In these two cases, Chinese utilizes more general terms, while English applies more specific term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lack of word correspondence.

English is also abundant in words which have no corresponding words in Chinese. The English word *fathering*, for example, does not have a Chinese counterpart, a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t is up to the mother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Some translators may use 撫育 or 養育, but strictly speaking, neither of them carries the sense *fathering* implies. The English word *acronym*, which means a word formed from the initial letters or groups of letters of the words in a name or phrase, has no corresponding word in Chinese as Chinese does not have such word formation. The Chinese word or Ci 縮寫 is by no means its corresponding word. To translate this term, translators may need to use several words so readers may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

<sup>3</sup> This paper deals mainly with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ords, not phrases.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dictionaries and translators have conventionally used phrases, and not words or compounds, to serve as the counterpart of a specific English word. For instance, Chinese does not have any corresponding word for million. As a result, dictionaries and translators adopt the phrase 一百萬, a combination of the number 100, meaning one hundred, and a character wan, meaning ten thousand.

Obligatory categories are also good examples. It is frequently found that while a language may apply a specific obligatory category or word in a certain situation or setting, another language may not contain a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 For instance, the English word *married* in “They got married yesterday” has no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 either. In Chinese, it has to be either 娶 or 嫁, depending on who marries whom. The English *cousin* is a comprehensive term, while in Chinese a cousin has to be either male or female, on one’s father’s side or on one’s mother’s side, older or younger than oneself. The Chinese category includes 表兄、表弟、表姊、表妹、堂兄、堂弟、堂姊, and 堂妹<sup>4</sup>, all of which have one and the same corresponding English word *cousin*. Therefore, Chinese does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term corresponding to *cousin* (Chao, 1968, pp.154-5). Since *cousin* has no corresponding word in Chinese, translators have to identify who the *cousin* is, and then refer to the category for the appropriate one. In cases in which the context provides no clue for translators to identify who the cousin is, translators are stranded in a dilemma. Similar cases may be found in the English words *uncle* and *aunt*. The Chinese category for *uncle* includes 伯伯, 叔叔, 舅舅, and 姨丈, and the Chinese category for *aunt* includes 姑姑, 嬸嬸, 伯母 and 姨媽. According to Chao (1968), translating such categories explicitly into a language in which they are not obligatory will lead to over-translation.

### 3. One-to-two and one-to-three correspondence

There are also cases where a word in a source language may have two or more than two corresponding words (Fig. 3 & 4):

---

<sup>4</sup> 表兄 biao xiung (male older cousin from the mother’s side); 表弟 biao di (male younger cousin from the mother’s side); 表姊 biao jie (female elder cousin from the mother’s side); 表妹 biao mei (female younger cousin from the mother’s side); 堂兄 tang xiung (male older cousin from the father’s side); 堂弟 tang di (male older cousin from the father’s side); 堂姊 tang jie (female elder cousin from the father’s side); and 堂妹 tang mei (female younger cousin from the father’s s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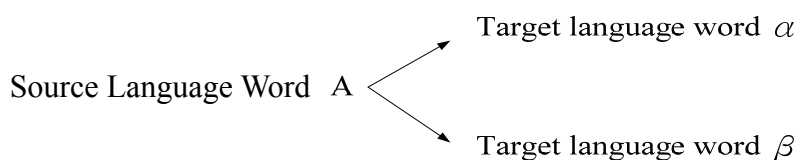


Fig. 3 one-to-two correspond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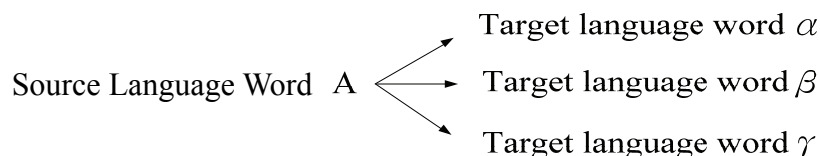


Fig. 4 one-to-three correspondences

In situations 3 and 4, the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has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wo or three coexisting words may or may not be the variant of each other. Three possibilities may exist between the two or three words:

- (1)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synonyms, and they are mutually interchangeable in a specific context. For instance, the English word *goal* in the sentence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educational goal” may have three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s 目的 and 目標, and 宗旨, which are interchangeable synonyms in this context. The Chinese word 國家 in 人口眾多的國家 has two corresponding words in English, namely *nation* and *country*, which are interchangeable synonyms in this context.
- (2) The two or three expressions are synonyms and one of them i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e other in a specific context. For instance, *nation* is a more acceptable word than *country* for 國家 in 參加京都協議的國家, because it is more formal than *country* in this context<sup>5</sup>. Similarly, the Chinese word 性別 has two corresponding English words, i.e., *sex* and *gender*, which may be either interchangeable or distinguishable depending on contexts. The English corresponding word for 性別 in 德文名詞依性

<sup>5</sup> That the Chinese word 國家 may have one or two corresponding words in English points to the complexity of identify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a source language and finding its corresponding word.

別區分 is gender rather than sex. While the translations for the 性別 in 請標明性別 may either be sex or gender.

- (3)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not synonymous or similar in meaning in terms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 For instance, the English word make love in “a study of how frequently people make love” may have three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s 做愛, 炒飯 and 嘿咻, which are, according to dictionaries, neither synonymous or similar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dictionary definition. However, they are now frequently used in informal colloquial Chinese, although in some situations or contexts the applications of 炒飯 and 嘿咻 may make others feel uneasy.

Situations (1) and (2) clearly indicate that wher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exis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ors need to discriminate their applications. The subtle seman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words, once ignored, might result in misuse of words and may be frowned upon by language purists.

Translators are faced with much more difficult and complex problems when the target language possesses a lot of words whose meanings are hard to differentiate. These words, despite being seemingly similar or synonymous in practical usages, are actually never or seldom considered to be interchangeable<sup>6</sup>. According to Chuo et al (2005), some English words may be found to occur in the same context; however, neither dictionaries nor dictionaries of synonyms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either similar or synonymous in meaning. There exists discrepancy between dictionary groupings of synonyms and users' selections of words for a specific context. English, for instance, makes use of 17 fall-related words namely fall, down, drop, slip, decline, sink, hit, lose, hover, sag, slumped, off, dip,

---

<sup>6</sup> Hayakawa (1969) pointed out that English has the largest vocabulary and the most synonymous of any language in the world. This richnes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English has grown over the centuries by constantly incorporating words from other languages. For instance, there are, according to Fernald (1980), 19 synonyms for the verb *agree*, 34 for the adjective *base*, 19 for the conjunctive *but*, 28 for the noun *end*, 36 for the adjective *pure*. These and other ample lists of synonyms reveal unsuspected rich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riters and readers therefore ne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group of words which are either synonymous or similar.



easing, retreat, slid, and pullback to describe the index of the day. Mackenzi (2004) also listed 10 fall-related words, i.e. go down, fall, fall off, drop, slump, decline, decrease, slip, plummet, and shrink for the same context. Obviously, most of the rise or fall related words occurring in the news reports of the stock market are neither synonymous nor similar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s provided in dictionaries.

Fig. 1 through 4 imply translators may hav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1)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2) what techniques translators may apply to truly convey the intended message convey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f no corresponding feature is found to exist, (3) whether translating certain words explicitly into a language in which they are not obligatory will lead to over-translation<sup>7</sup>, (4) whether translating literally may enrich the vocabulary or syntax of a target language or turn out awkward expressions<sup>8</sup>, and (5) whether translation should be mor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oriented, and whether translation should be more target language usage-oriented, thus ignoring some message conveyed by a source language. This means that translation needs to b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usage and culture of a target language<sup>9</sup>.

In fact, translators are inevitably in a dilemma, being stranded between retaining everything conveyed by a source language and meeting the standards of a target language.

---

<sup>7</sup> Sometimes a translator uses a form in the original without noticing that it is superfluous because it is obligatory. Thus a sentence like: I put on my hat and went my way is translated by many inexperienced translators by including the possessive pronoun my into language where it is not used except for explicit distinction of possession (Chao, 1968, p. 155).

<sup>8</sup> Chen (1996) mentioned that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frequently encounter a certain English word which has no listed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 in any dictionary. As a result translators may adopt literal or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thus turning out awkward or meaningless Chinese (p.153).

<sup>9</sup> Translation theory began to undergo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translation began to involve a conscious manipulation to “move the author toward the reader,” to make literary texts as palatabl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they were i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culture (Fogel, 2003, p.2).

## IV.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 Conclusions

By drawing examples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present study unveils the complexity inherent in the postulation of corresponding word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oncerning identifying a corresponding word, the researchers discuss in detail four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one-to-two correspondence, one-to-three correspondence, and one-to- $\Phi$  correspondence. Admittedly,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is by far the least time and energy-consuming in word translation, thus causing fewer problems.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one-to-two and one-to-three correspondence are (1)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synonyms and are mutually interchangeable in a specific context, (2) the two or three words are synonyms and one of them i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e other in a specific context, and (3) the two or three corresponding words are neither synonymous nor similar in meaning in terms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one-to- $\Phi$  correspondence mostly result from linguistic relativity, which implies that while a specific social or cultural situation or setting may exist in a source language, it may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a target language.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wor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Obligatory categories are good exampl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 Discussions

The 4 kinds of wor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 source and a target language evince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word translation. Theoretically, it is by no means easy to find a corresponding word in a target language, give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4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Obviously, translators may not have all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t their command, thus finding a word not entirely corresponding to the specific wor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he whole process of word translation and above all the result of word translation

may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proximity and guess work. In many cases, translators may be forced to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A precise translation of a word is in practice hard to attain.

## References

1. Bolinger, D. (1975). *Aspects of Languag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2. Chao, Yen-ren 趙元任. (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4. Chuo, C. C., Chen H. C., & Wu, C. L. (2005).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ise and Fall-similar Words Used i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Stock Repor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Journal of Chang Lung University*, Vol. 9-2, pp. 111-128.
5. Chuo, C C., & Chen, H. C. (2008). On the Difficulty of Word meaning Postulation. Paper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 Fernald, J. C. (1980). *Standard Handbooks of Synonyms, Antonyms and Prepositions*. Funk & Wagnall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revised ed.
7. Fogel, J. A. (2003). Recen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 Borrowing in the Modern Sino-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8. WWW. Indiana.edu/-ease/resources/working-paper/noframe\_\_2b\_recen.htm\_32k
9. Gleason, H.A.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NY: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Inc.
10. Hayakawa. S. I. editor in chief. (1969). *How to Use the Right Word: Modern Guide to Synonyms and Related Words*. Funk & Wagnall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1. Lyons, J. (1977). *Semantics 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Mackenzi, Ian. (2004). *Financial English*. Taipei: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3. Mascul, B. (2003). *Key Words in Business: Helping Learners with Real English*. Taipei: Bookman Publishing Company.

14. Quine, W. (1960). *Word and Object*. MIT Press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5.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2000).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Inc.
16. Whorf, B. (1957).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ding*. Carroll, J. ed. Cambridge, Mass: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IT.
17. Zeiger, A. (1973). *Encyclopedia of English*. New York, NY: Arco Publishing Co., Inc. 4<sup>th</sup> ed.

## 中文參考書目

1. 林語堂 Lin Yu-tang ° (1972) ° *當代漢英詞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 ° 香港中文大學辭典部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 黃宣範 Huang, Hsien-fan ° (1978) ° *中英翻譯：理論與實踐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 台北：文鶴書局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
3. 陳安定 Chen An-ding ° (1996) ° *英漢修辭與翻譯 English and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 台北：書林出版社 Taipei: Bookman publishing Company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391-43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391-434

# 實在與幻化——《蛙氏奧義書》與 《喬氏釋義》的實有論分析

鄭芷人

## Reality and Illusion :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ion of Being in the *Māndūkya* *Upanishad* and Guadapāda's *kārikā*

by  
Kuang Zhiren

關鍵詞：喬荼波陀、不二吠檀多、《喬氏釋義》、《蛙氏奧義書》、無創論、唵（*Aum*）清醒  
狀態、作夢狀態、深眠狀態、超覺狀態

**Key words:** Guadapāda *Advaita Vedānta* Guadapāda's *Kārika* *Māndūkya Upanishad*  
non-origination *Aum* *vaisvanara* *taijasa* *prājñā* *turiya*

## 〔提要〕

本文之目的是分析與重構喬荼波陀在《喬氏釋義》一書中的「不二」哲學理念，《喬氏釋義》乃喬荼波陀藉著詮釋《蛙氏奧義書》而闡述其「幻化形上學」，他也是第一位「不二吠檀多」的哲學家。西方的形上學傳統探討「實有」，印度傳統則探討「幻化」與「性空」，在這兩種不同的形上學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觀、文化與觀人生觀。《蛙氏奧義書》與喬荼波陀的《喬氏釋義》，乃「幻化形上學」的典範，下開商羯羅的「不二吠檀多」之先河。《蛙氏奧義書》全文只有 12 偈頌，闡述從個體認識而達至了悟「至上意識」，並視之為人類之本性。然則吾人如何了悟人之本性就是「至上意識」呢？《蛙氏奧義書》從分析意識的清醒、作夢、深眠狀態等各種層次，作為理論的進路，以達最後本源的超越境界，那是一種超覺狀態，也就是絕對的本體。《蛙氏奧義書》從“Aum”（唵）音來闡述這個問題，其中，A 表示清醒狀態，U 表示作夢狀態，而 M 表示深眠狀態。《喬氏釋義》藉著詮釋《蛙氏奧義書》，說明現象界或經驗世界的相對性，以及阿特曼乃現象界背後之唯一的實在性。喬荼波陀本著婆羅門教的「實有神學」，強調「一切即一」或「一切是梵」，這是一種「萬有在神論」。不少學者認為《喬氏釋義》引用佛教親世與龍樹的概念，從而認為喬氏是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本文撰者則認為喬氏此舉乃企圖將大乘佛教收攝於正統吠檀多之中。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be a contribution to analyze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 esoteric meaning in the *Māndūkya Upanishad*, one of the shortest but profound *Upanishads*, and to reconstruct Guadapāda's theory of the so-called non-dualism, *Advaita Vedānta*.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Vedas is in the Upanishad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Upanishads is in the *Māndūkya Upanishad* which consists of only twelve verses and outlines the philosophy of the *Aum* mantra of *vedic* tradition. The *Māndūkya Upanishad* says that the word *Aum* represents four state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mātrās 'a' stands for the first stage of

wakefulness, *vaisvanara*, in which one experiences the external experiences through his sense organs . The mātrās ‘u’ stands for the dream state , *taijasa*, in which mental experiences are available , though erratically. The sound ‘m’ represent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any experience in the state of deep sleep , *prājñā* .The fourth state, *turiya* , is the state of no mātrās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ilence consciousness and is the substratum of the other three states of experience. Guadapāda’s *kārikā*, 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 is the earliest known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Advaita Vedānta* . Guadapāda deals with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such as perception, causality, the doctrine of non-origination , truth, and reality. He argues that the non-dual absolute is to be realized by pure knowledge in the state of *turiya* which transcends the positive wrong knowledge in the waking and dream state and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in the deep sleep state. Duality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llect and when the intellect is transcended , duality disappears. What’s left is pur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non-dual Atman. For Guadapāda , *Atman*, the universal self , is like space and *jivas*, the individual self , are like space in jars. When the jar is destroyed , the space in the jar merges into the open space. Some commentators emphasize that Guadapāda not merely built his theory of non-dualism on the Mahayana Buddhism, but also quoted freely from Vāsubandhu and Nargarjuna.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ake the view that Guadapāda tried actually to reconcile the *advaita* teaching of the Upanishads with its prime opponent of the day , Buddhism. The last chapter of his *kārikā* , the quenching of the firebrand , was perhaps an indication of the attempt to extinguish the firebrand of Buddhism into Vedanta.

## 引言

哲學上所謂實有 (Being)，是指存在界的真實性 (reality) 而言，因此，在吾人討論實有之前，可先注意存在的問題。由於人們自懂事以來，便知道存在著事事物物，自然界中存在著山河大地與花草樹木，更重要的是存在著我、你、他。於是，一般人似乎對「存在」感到平淡無奇，一切存在好像都是理所當然的。對於自己，常人也罕有思考自己為何存在？哲學家則不然，《論語》中提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孔子看到川流不息而深感天地造化，與天道運行，不分晝夜。亞里士多德謂哲學起於驚訝<sup>1</sup>，而世界的存在是非常讓古來的思想們感非常驚訝。萊布尼茲 (Leibnitz) 有句名言，就是「為甚麼是『有』而非無？」(Why is there being rather than nothingness?) 實有問題不但是本體論問題，而且也是世界觀問題，而世界觀又影響了一個人的人生觀。這些問題正是《蛙氏奧義書》與《喬氏釋義》所要展示的吠檀多 (Vedānta) 哲學，其基本要旨如下：

(1) 吠檀多乃印度的六大正統哲學體系 (Darshanas) 之一，出現於公元六、七世紀之間。吠檀多之經典是以《奧義書》、《梵經》及《薄伽梵歌》為本，稱為吠檀多三經，其中又以《梵經》為最根本。其哲學觀是建基於對上述典籍的文本作解釋，將這些文本視為永恆、絕對、與來自大梵的真理。

(2) 印度正統哲學有所謂「彌曼差學派」，字義上是指「探討吠陀與奧義書知識的學派」。其中又分為「業 (前) 彌曼差」及「智 (後) 彌曼差」(Jñānamimāṃsā)，「吠檀多學派」就是指「智彌曼差學派」。「業彌曼差」或「前彌曼差」是以《彌曼差經》為據，強調祭祀與瑜珈。「智彌曼差」或「後彌曼差」則以各種《奧義書》、《梵經》(又稱《吠檀多經》) 及《薄伽梵歌》為據，強調藉著正確的知識而証知梵天及個體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3) 喬荼波陀 (Guṇapāda) 是第一位企圖建立「不二吠檀多」(Advaita Vedānta)

---

<sup>1</sup> 原文：“διὰ γὰρ τὸ θαυμάζειν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καὶ νῦν καὶ τὸ πρῶτον ἤρξαντο φιλοσοφεῖν.”

譯文：「現在，人們是藉著驚訝開始哲學思維。」引自亞里士多德《形上學》(Τὼν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ὰ Α) 卷 A，ii，9。



的哲學家，其思想見於《喬氏釋義》（*Māndūkya-Upanishad -kārikās*）。「不二吠檀多」的「不二」（*Advaita*）就是「一」。故「不二吠檀多」是一種「一元論」的哲學體系，這種哲學是把世界還原到「一」的終極原則。「不二吠檀多」的特殊處是將梵天與個體靈魂視為一體，人的真正認知是認識這種「一體性」，因為這種認知同時就是解脫（*moksha*）。與此相對，「不一」乃出於「無知」（*avidya*），一般譯作「無明」。「不二吠檀多」與所謂「知識瑜伽」（*Jñāna-Yoga*）關係密切，因而也與 108 種奧義書的哲學不可分。

（4）在西方哲學中，史賓諾莎（Spinoza）提出實體一元論，可作為吾人理解「不二吠檀多」哲學的一個途徑，兩者既存在著相似之處，但也有相異之處。史氏所謂的「實體」，又稱為上帝（God）或「自然」。他不將上帝視為造物主，因為「造物主」與「被造之物」是相對的，而這種相對性限制了上帝的無限性。他把「自然」分為「所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與「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前者是指在任何瞬間所生成的事物，它們是被動的。後者是主動與創生的。「能生的自然」使事物依據齊一與恆常的原則而起落。史氏又把世界的無限量的個別狀況，稱為事件發生時的「宇宙之面相」。在萬象之流中，世界有如洪流，不斷地變換著它的面相（變現）。從神學的意義上說，萬物皆在神之中，神是萬物的內在原因。神是非人格的，它具有無限多的屬性。愛因斯坦也認為上帝乃非人格性的，他的上帝觀與史賓諾莎的上帝觀一樣，就是「大自然」<sup>2</sup>。愛因斯坦的宇宙觀，也像史賓諾莎一樣是一種決定論，所有的事物皆遵行一定的因果法則，上帝只在和諧的規律和秩序裡顯露出來。人類的思想、情感和行動，完全是「自然」的產物，有如天上的星宿一樣沒有自由<sup>3</sup>。愛因斯坦持絕對決定論，不過，德國物理學玻恩（Max Born）則以「機率波」的觀點，排除決定論<sup>4</sup>。在「不二吠檀多」哲學中，將史氏的「所生的自然」視為幻現，而把「能生的自然」視為本體。

<sup>2</sup> 見 Spinoza , *Ethics Demonstrated in the Manner of Geometry* , Part I , Concerning God & Part II, 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Mind.

<sup>3</sup> 愛因斯坦的論點見所著 *Ideas and Opinions* (Bonanza Books, 1988)及 *The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4</sup> 參閱馬文蔚等主編：物理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凡異，民國 85 年），頁 365-372。

## 一、《蛙氏奧義書》論「虛幻」與「實有」

(1) 古希臘人所謂的“ἀρχή”（基質），相當於小乘佛教所謂“dharma”（धर्म，法），這在小乘佛教原指「最終實有」之意，因而“dharmatā”便指「最終實在性」(ultimate reality)。但是，大乘佛教則否定所謂「法」的實在性（不管是有為法或無為法）。古希臘人對「實有」(τὸ ὄν, Being) 的研究，這在西方哲學中成了形上學的核心問題。古代印度哲學一方面研究「幻」(माया, māyā)，另一方面也研究「實有」(sat)。

(2) 《蛙氏奧義書》屬於《阿闍婆吠陀》，其目的是闡述「唵」這個音的哲學意義。《蛙氏奧義書》全文只有十二章（偈頌），闡述從個體認識而達至了悟「至上意識」的過程。「你就是那個——至上意識」這個命題，是一切奧義書的共同基礎。然則吾人如何了悟人之本性就是「至上意識」呢？《蛙氏奧義書》從意識的清醒 (vaisvanara)、作夢 (taijasa)、深眠狀態 (prājña) 等各種層次，作為理論的進路，分析本源與超越境界，指出「至上意識」是一種純意識的超覺狀態 (turiya)，也就是絕對的本體。「至上意識」就是「梵天」(Brahman) 或阿特曼 (Ātman)。“Brahman”一字在梵文是個中性字<sup>5</sup>，具有超出陰陽的相對意義的終極本體之意，藉以表明整體絕對不二 (advaita) 的哲學觀。

(3) 《蛙氏奧義書》從“Aum”（唵）音來闡述這些問題。在《奧義書》中，“Aum”具有特殊意義，譬如，“Aum”代表梵的符號，又代表整體，代表肯定，也代表一切真理之音。在古代印度的宗教生活中，宗教儀軌要唸“Aum”，教師開始授課時要唸“Aum”，學生開始上課時要唸“Aum”。對於“Aum”的解釋有多種，例如，視“A”代表創造，“U”代表保持，“M”代表毀滅。又譬如，A、U、M，可分別代表過去、現在及未來。在修持上，人們認為長期唸誦“Aum”能調整呼吸，也能使人心神歸於平靜，並且漸漸進入三摩地。《蛙氏奧義書》一方面將“Aum”視為自我或梵，另一方面又將“Aum”視為代表意識的四種狀態，即：A表示清醒狀態，在此狀態中，吾人藉著感官而經驗到粗糙事物。U表示睡覺時的作夢狀態，它表徵吾人不必藉著感官而獲得的心智經驗。M雖然表示深眠狀態。(4) 由於《蛙氏奧義書》全文雖然甚短，但其內涵則頗為豐富，故吾人將引用天城體梵文文本，再譯成羅馬體及中文，以便閱讀比對。以下展示《蛙氏奧義書》的全文內容：

<sup>5</sup> 在印歐語系中，名詞一般可分為陽性、陰性及中性三種。

〔1〕《蛙氏奧義書》第一偈頌：宇宙整體是喻

ॐ इत्येतदक्षरमिदं सर्वं तस्योपव्याख्यानं  
भूतं भवद् भविष्यदिति सर्वमोङ्कार एव  
यच्चान्यत् त्रिकालातीतं तदप्योङ्कार एव ॥ १ ॥<sup>6</sup>

（羅馬化：Om-ity-etad-aksharam-idam sarvam, tasyopavyākhyānam bhūtam bhavad  
bhavishyaditi sarvam-omkāra eva. Yaccānyat trikālātītam tadapy omkāra  
eva.）

〔中譯：宇宙整體是喻，其說明如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其實就是喻。  
那個超越的時間、空間、和因果作用的也是喻。〕

這是《蛙氏奧義書》的第一偈頌，“Aum”（ॐ）是梵天的名字或絕對的本體，代表過去、現在、未來所朗現的世界，也代表沒有朗現出來的絕對體。「喻」代表所有潛在、有形無形、一切存在。「喻」也是絕對本體之名，也是永恆之聲、整個世界是「喻」的波動，也是它的註腳。在靜坐時冥想“ॐ”，有助於吾人了解絕對的真理。《奧義書》的全部義理可用“ॐ”來表示，那是源自意識的最深層次。

〔2〕《蛙氏奧義書》第二偈頌：一切都是梵

सर्वं ह्येतद् ब्रह्मायमात्मा ब्रह्म सोऽयमात्मा चतुष्पात् ॥ २ ॥<sup>7</sup>

（本節的羅馬化：Sarvam hyetad brahmāyam-ātmā brahma soḥayamātmā catuspāt.）

〔中譯：所有的一切，無論在何處所看到的，都是梵天。阿特曼（自性），就是梵天，這阿特曼有四個狀態。〕

無論在何處，所見到的一切，都是至上意識的梵之朗現。梵是宇宙大我，是大道，也是自性或宇宙的絕對本體。「我就是那個」，在四個層面中皆可體驗大我，因有意識有四種狀態，即清醒，作夢狀態，深眠及超覺的四種境界。前三種所體驗到的狀態是個體自我（*apara Brahman*, *ātman*）。第四種狀態為絕對本體（*para Brahman*），它也包含了前

<sup>6</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19.

<sup>7</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19.

三種狀態，稱為「至上意識」。這一方面表示宇宙意識周遍一切，另一方面又表示「個體自我」(ātman) 與「宇宙大我」(Ātman) 是一體的，而宇宙大我就是「梵天」。個體自我從清醒進入夢中，從夢中進入深眠，再從深眠進入超覺的「至上意識」。當「個體自我」體悟到自我就是「宇宙大我」時，便不但除去無明遮蔽與幻現 (māyā) 的執著，同時體認個體自性與宇宙大我是一體的，這就是所謂「你就是那個」，個體原是至上意識。在這裡，清醒代表一般所謂意識 (consciousness)，作夢狀態代表無意識 (unconsciousness) 或靈魂，深眠代表個體自我 (jivatman)，而超覺則代表不朽部份。人的形軀生命結束後，無意識仍存在。當它 (無意識) 遠離執著，將自身安住在自性上，便去除無明，體悟圓明的自性就是「至上意識」，這就是超覺，也就是解脫狀態。但是，當修行者無法體悟自性與至上本體是同一時，便只停留在二元對立之中而仍待努力修持。

[3] 《蛙氏奧義書》第三偈頌：清醒的狀態

जागरितस्थानो बहिष्प्रज्ञः सप्ताङ्ग एकोनविंशतिमुखः स्थूल  
भुग्वैश्वानरः प्रथमः पादः ॥ ३ ॥<sup>8</sup>

(本節的羅馬化：Jāgarita-sthāno bahish- prājñasaptāṅga ekonavimsatimukhah  
sthūla-bhug vaiśvānarah prathamah pādah.)

[中譯：第一是清醒的狀態 (vaisvanara)，在此狀態中，意識藉著七工具和十九個管道，認知外在的事物。它能經驗到粗糙的物質世界。]

這裡指出經驗或經驗世界乃清醒狀態的意識所經驗到的粗糙之現象世界。所謂「七工具」是指頭、目、氣息、體、足、心、口等七部份，而所謂十九個管道」乃指五個運動器官 (聲帶、手、腳、生殖器、肛門)，五種感覺器官 (眼、耳、鼻、舌、皮膚)，五種氣，這是指命根氣 (prājña)、下行氣 (apana)、平行氣 (samana)、上行氣 (udana)、遍行氣 (vyana)，及四種內在工具 (antah-karana)，這是指心靈、自我、智力和貯藏記憶之處 (chitta)。《蛙氏奧義書》無疑是以意識的「清醒狀態」為主體，並設定外在世界的存在，這是主客二元對立的，故謂「意識傾向外在的世界」。但是，《蛙氏奧義書》並沒有對意識主體作進一步的分析<sup>9</sup>。自我所了解的世界是有限的，且受到時空的限制，導致

<sup>8</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19.

<sup>9</sup> 人文精神是人類本能之外的自覺表現，就是自覺「意識」的發展，「意識」有其發展的歷程。黑格爾

自我與客體分離。在這種經驗的意識狀態中，吾人無法展開自我與超越。相對於「清醒狀態」，《蛙氏奧義書》較強調夢中的狀態，認為對夢的了解較對清醒狀態的了解更能認識吾人之「意識」。所以，《蛙氏奧義書》接著便講及夢的問題。

〔4〕《蛙氏奧義書》第四偈頌：夢的狀態

स्वप्नस्थानोऽन्तः प्रजाः ससाङ्ग एकोनविंशतिमुखः

प्रविविक्तभुक्तैजसो द्वितीयः पादः ॥ ४ ॥<sup>10</sup>

（本節的羅馬化：Svapna-sthāno'tnah-prājñah saptāṅga ekonavimsatimukhah  
praviviktabhuk taijaso dvitīyah pādah.）

〔中譯：第二方面是作夢的狀態（taijasa）。在此狀態中，它認知內在事物，它也有七工具和十九個管道，能體驗精細的事物〕。

弗洛伊德重視夢的分析，他相信這種分析有助於對潛意識的了解。《蛙氏奧義書》大抵把夢境視為是一些曾經驗過，而貯存於心靈中的（無意識之）印象，將夢境視作是這些印象的重現。《蛙氏奧義書》不是在強調夢境的重要性，而是強調把心靈從「清醒狀態」，提昇或轉移到如夢如幻的非物理狀態，再從夢的概念導入無夢與「超覺」的狀態中。

〔5〕《蛙氏奧義書》第五偈頌：深眠狀態

因而有《精神現象學》之作，並視之為「一般科學或知識的形成過程」。對德國理念論來說，認知過程就意識發展的過程。意識活動從最低級的感性知識，辯証地過渡到其《邏輯學》所研究的「絕對知識」的過程。更適當地說，《精神現象學》要闡述的，是從意識發展的進路，詮釋歐洲歷史中，每個歷史階段的精神意識及其發展。歷史上每一個時期的「精神」或「意識」皆有其特殊的「型態」，稱之為「意識型態」（Ideologie）。「意識型態」就是「精神現象」，也就是從分析「文化現象」來掌握「精神的本質」。由於「精神」乃人類作為生命「主體」的表現，故《精神現象學》也就是詮釋歐洲「人文精神」的發展史。他把意識發展分為三個大環節，第一個大環節是「主觀精神」，其中包括三個發展的階段：〔1〕意識，〔2〕自我意識，〔3〕理性。第二個大環節是〔4〕「客觀精神」（他在此只稱為「精神」）。第三個大環節是〔5〕「絕對精神」，這個環節原來包括藝術、宗教及哲學三個階段，但在《精神現象學》中，他只論及宗教及絕對知識。

對於這個問題的詳細闡述，可參閱鄭芷人：〈哲學思維與人文關懷〉，《弘光技術學院·技職校院人文精神教育研討會會議資料》（2002），pp.14-60。

<sup>10</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19.

यत्र सुप्तो न कञ्चन कामं कामयते न कञ्चन स्वप्नं पश्यति तत्  
सुषुप्तम् . सुषुप्तस्थान एकीभूतः प्रज्ञानघन एवानन्दमयो  
ह्यानन्दभुक् चेतो मुखः प्राज्ञस्तृतीयः पादः ॥ ५ ॥<sup>11</sup>

(本節的羅馬化：Yatra supto na kancana kāmam kāmāyate na kancana svapnam  
pasyati tat sushuptam. Sushupta-āsthāna ekībhūtah prajñānaghana  
evānandamayo hyānandabhuk chetomukhah prājnastrityah pādah.)

「中譯：第三是深眠 (prājña) 狀態，這是無欲，也不會在夢中見到甚麼。所有的經驗、體驗，皆沉浸於無分別的整體裡，充滿喜悅與歡樂。它是夢與醒的知識之門」。<sup>12</sup>

「深眠」是導入超覺狀態的另一概念，在深眠的狀態中，吾人可經驗到「空」。這可視為一種無意識，但不是指弗洛伊德所謂被壓抑的那種無意識狀態。「深眠的無意識狀態」這個概念，在瑜珈理論中是非常重要的。瑜珈修行者，從清醒及夢的狀態進入「深眠的無意識狀態」之中。於是，心靈從現象世界中收攝回來，不僅離開了各種物理現象，也離開了各種心智現象，停留在不知物，不作夢，無欲無求的境界之中。深睡而無夢的狀態是一種「空境」，是一種充滿生命能量、喜悅和諧的心靈狀態。因此，瑜珈非常重視這種深眠狀態。不過，這裡所謂深眠狀態只是一種讓人易於了解的比喻而已，並非指真正睡眠時的「深眠」，因為在真正的深眠狀態中，吾人對外在環境毫無所悉，而瑜珈行者的深眠狀態則完全覺知外在環境的狀況，甚至比清醒狀態時更清楚。瑜珈修行方法之一，是如何使自己進入這種深眠狀態，這種方法稱為「瑜珈睡眠法 (yoga-nidra)」。

[6] 《蛙氏奧義書》第六偈頌：超覺狀態

एष सर्वधरः एष सर्वज्ञ एषोऽन्तर्याम्येष योनिः सर्वस्य

<sup>11</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19.

<sup>12</sup> 孫晶依巫白慧的譯文作「其中睡，無所欲，不見夢，此為熟睡。熟睡位，成一，惟慧蜜，喜造，食喜，心為口，有慧，第三足」。其中，「睡者充滿喜悅」譯作「惟慧蜜」，把「體驗到喜悅」譯作「喜造」，把「並且知道如何去瞭解前述兩種狀態的方法」譯作「食喜，心為口，有慧」。真不知何故要將原意成如此玄不可？見《印度吠檀多不二論哲學》（東方出版社，2002年），p.19。

प्रभवाप्ययौ हि भूतानाम् ॥ ६ ॥<sup>13</sup>

（本節的羅馬化：Esha sarvesvara esha sarvajña esho'ntaryāmy-esha yonih sarvasya prabhavāpyayau hi bhūtānām.）

〔中譯：在此狀態中，了知一切，是內在的管控者，是萬有之源，是萬有之始，也是萬有之終。〕<sup>14</sup>

這是針對超覺狀態（*turiya*）而言，若要體驗「了知一切」的狀態，就必須進入超覺，這是意識的第四種狀態。進一步來說，若要達至第四種狀態，可藉「瑜伽睡眠法」中的攤屍法（*savasabna*）修練<sup>15</sup>。

〔7〕《蛙氏奧義書》第七偈頌：超覺的認知

नान्तःप्रज्ञं न बहिष्प्रज्ञं नोभयतःप्रज्ञं न प्रज्ञानघनं  
न प्रज्ञं नाप्रज्ञम् । अदृष्टमव्यवहार्यमग्राह्यमलक्षणं  
अचिन्त्यमव्यपदेश्यमेकात्मप्रत्ययसारं प्रपञ्चोपशमं  
शान्तं शिवमद्वैतं चतुर्थं मन्यन्ते स आत्मा स विज्ञेयः ॥७ ॥<sup>16</sup>

（本節之羅馬化：Nāntaḥ-prājñam , na bahis-prājñam, nobhayataḥ-prājñam na prājñana-ghanam , na prājñam naprajñam., adṛiṣṭam-avyavahāryam-agrāhyam- alakshanam-acintyam- avyapadesyam-ekātma- pratyayasāram, prapañcōpaśarnam śantam śivam-advaitam caturtham manyante sa ātma sa vijñeyah.）

〔中譯：（超覺）不是那朝內之認知，也不是那朝外之認知<sup>17</sup>，也不是對內外兩者之認知。它不是大量認知，它不是認知的，也是非認知的。這是不可見、不可說、是無法描述的，沒有任何明顯的特徵。它是不可思議，無法以

<sup>13</sup> Sri Aurobindo , *The Upanishads* , p.320.

<sup>14</sup> 此義釋也可譯作：「這是全能，全知；這是內在靈魂，這是宇宙之源，這是萬物的生與毀」。

<sup>15</sup> 攤屍法：仰臥，兩手兩足張開。頭墊軟枕頭。先用小腹呼吸二十次，吸氣時觀想海潮一波一波進來。吐氣時，海潮回歸大海，並空掉自身。接著再呼吸十五次，練習內照形軀法，此時把意念放在心輪。吐氣時，心氣合一，呼吸不緩不急，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時。

<sup>16</sup> Sri Aurobindo , *The Upanishads* , p.320.

<sup>17</sup> 認知（*cognition*）可譯作智慧（*wisdom*），也可譯作意識（*consciousness*）。

言語表達。它是個體知識的本質，世界消融於其中。它是寂靜，它是喜悅，它是唯一不二的，這是第四肢。它是自我，吾人必須了悟它」<sup>18</sup>。

吾人若欲達至超覺狀態，可藉瑜伽靜坐法而先進入三摩地 (*samadhi*)。超覺狀態更超越了三摩地，在這種狀態中，意識既不朝內亦不朝外，心靈脫離一切狀態，沒有任何屬性，超越知見與非知見，這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它體驗了至上意識，這是純意識，或者說：它是意識的真正本質、是絕對本體，也是宇宙的大我。

[8] 《蛙氏奧義書》第八偈頌：A，U，M

सोयमात्माध्यक्षरमोङ्करोऽधिमात्रं पादा मात्रा मात्राश्च पादा  
अकार उकारो मकार इति ॥ ८ ॥<sup>19</sup>.

(本節的羅馬化：So'yam-ātmā adhyaksharam-omkaro dhimātram pādā mātrā  
mātrāśca pādā akāra ukāro makāra iti.)

[中譯：這是阿特曼，從其要素說，它就是 aum 音的本質。肢就是要素，要素就是肢，也就是字母 A，U，M。]

如前所述，意識具有四種狀態，即清醒、夢、深睡及超覺。前三種狀態可用 *aum* 音的三個字母 A，U，M 來表示，這代表個體自我的三種狀態。在 A，U，M 三個元音之後，是寂靜或空寂的狀態。A，U，M 又分別代表創造、保存及毀滅，而毀滅之後便是空寂，故 *aum* 也代表宇宙中的成、住、壞、空的各個層次。

[9] 《蛙氏奧義書》第九偈頌：元音 A

जागरितस्थानो वैश्वानरोऽकारः प्रथमा मात्राऽऽसेरादिमत्त्वाद्

<sup>18</sup> 巫白慧將這段文字譯作：「非內慧，非外慧，非內外慧，非慧密，非慧，非非慧。不可見，不可施，不可取，無相，不可思，不可名，一我緣精髓，息戲論，寂，善，不二，以為第四。是為我，是應知」。這譯文中所謂「非內慧，非外慧，非內外慧，非慧密，非慧，非非慧。」不知何故將譯文弄得如此玄虛，以致無法卒讀？見巫白慧譯《聖教論》（北京商務，2002年），頁188。孫晶也採用巫白慧譯文，見所著《印度吠檀多不二論哲學》（東方出版社，2002年），頁19。

<sup>19</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20.



वाऽऽप्नोति ह वै सर्वान् कामानादिश्च भवति य एवं वेद ॥ ९ ॥<sup>20</sup>

（本節的羅馬化：Jagarita-sthāno vaiśvānaro'kārah prathamā mātrā.

āpterādīmatvād-vāpnoti ha vai sarvān kāmānādisca bhavati ya evam veda.）

〔中譯：vaisvanara 是意識體的清醒狀態，是字母 A（ah），這是第一個要素。這是由於它是遍在<sup>21</sup>，也由於它是第一個音<sup>22</sup>。誰了解此真相，即可實現其所有欲求而達至首位。〕

第一個元音 A 代表清醒狀態（vaisvanara），它是單純的母音，且一切音聲中皆有 ah（A）音。由於吾人是在清醒狀態下才認識到現像世界，故 A（ah）也比擬為宇宙。心靈在清醒狀態下，藉著感官而與外在世界接觸。但是，修行者當知如何利用外在世界的事物，作為修行的輔助條件，而不為外物所役。當修行者了悟清醒狀態下的世界只是幻像世界，便可進而探究深層意識，體悟宇宙本體的真相，才能真正達至永恆的幸福。

〔10〕《蛙氏奧義書》第十偈頌：元音 U

स्वप्नस्थानस्तेजस उकारो द्वितीया मात्रोत्कर्षात्

उभयत्वाद्दोत्कर्षति ह वै ज्ञानसन्ततिं समानश्च भवति

नास्याब्रह्मवित्कुले भवति य एवं वेद ॥ १० ॥<sup>23</sup>

（本節的羅馬化：Svapna-stāhnaś taijasa ukāro dvitīyā mātrotkarshādu-ubhayatvād-

votkarsāti ha vai jñāna-santatim samānasca bhavati

nāsyābrahmavit kule bhavati ya evam veda.）

〔中譯：Taijasa 的活動範域是夢的狀態，這是字母 U，也是第二個要素，它是由於其優越性與居間性。了悟此者，能獲得優越的知識，得到其他人超乎平等的看待。在其中誕生的人，無不了悟梵。〕

“Aum”的第二個字母是 U，可比擬夢中之狀況（taijasa）。元音 U 介乎 A 與 M，有

<sup>20</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20.

<sup>21</sup> 這是指 A 遍在一切音聲之中。

<sup>22</sup> 這是說，若沒有第一個音節 A，吾人便無法發出 aum 聲。

<sup>23</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21.

如介於睡眠與清醒狀況的夢境。夢境可視為貯存於無意識層次的記憶之浮現，在這種狀況下，各種感官與思維皆處於休息狀態之中，而根深蒂固的慾望遂出現於夢中，這些慾望可能是吾人在清醒狀態時無法表達的。《蛙氏奧義書》認為，一個人若能了解夢境，則他便優於其他人。又認為若要了解夢，就必須要澈底了解“aum”音，也就是要走向更高的意識層面。

〔11〕《蛙氏奧義書》第十一偈頌：元音 M

सुषुप्तस्थानः प्राज्ञो मकारस्तृतीया मात्रा मितेरपीतेर्वा  
मिनोति ह वा इदं सर्वमपीतिश्च भवति य एवं वेद ॥ ११ ॥<sup>24</sup>

（本節的羅馬化：Sushupta-sthnaḥ prājño makras tritīya mtr miterapīter va minoti ha  
va idam sarvam-apītisca bhavati ya evam veda.）

〔中譯：prājñō (prājña) 是深沉的睡眠狀態，這是 aum 的第三個字母 M。它是  
來自字根 mi，有量度之意，或是合而為一。了悟此便能量度一切，也能  
了解自己內在的一切。〕

這裡所謂「深沈的睡眠」(prājña)，乃指修「瑜珈睡眠法」之睡眠。這種睡眠與一般的睡眠不同，修行者修習瑜珈睡眠法，用自己的意識控制睡眠。吾人的心靈，無論是在清醒、夢境、或睡眠，均無時無刻都在活動著，心靈不是完全處於無意識狀況之中。因此，真正的「深沈的睡眠」則是意識完全一片空白，這就得靠深沈的禪定 (dhyana)，使意識處於完全鬆弛和完全休息狀態。

〔12〕《蛙氏奧義書》第十二偈頌：Aum 比擬對立的消融

अमात्रश्चतुर्थोऽव्यवहार्यः प्रपञ्चोपशमः शिवोऽद्वैत  
एवमोङ्कार आत्मैव संविशत्यात्मना य एवं वेद य एवं वेद ॥ १२ ॥<sup>25</sup>

（本節的羅馬化：Amātras-caturtho'vyavahāryah prapancopasamah sivo'dvaita  
evamomkara ātmaiva samvisaty-ātman-ātmānam ya evam veda.）

〔中譯：第四狀態沒有任何要素，也不可以言說表述。世界消融於其中，甚至連

<sup>24</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21.

<sup>25</sup> Sri Aurobindo, *The Upanishads*, p.321.

喜悅也停止，這是一種沒有二元對立的狀態<sup>26</sup>。因此，它是 aum 音。了悟這個自我者便是將個體自我投入大自我<sup>27</sup>之中。了悟此的人呀，了悟此的人呀」。〕

“Aum”聲代表超覺，這是一種超越語言與超越一般心靈和感官所能認知的狀態。能証悟這個狀態的人，便是將自身擴至宇宙意識。這是說，他便能體証自身即真正宇宙的「大自我」，也就是「宇宙意識」。証悟「宇宙意識」，便體証存在界是無差別的唯不一二。

## 二、《蛙氏奧義書》的哲學要旨

(1) 《蛙氏奧義書》是分析意識的四種狀態，吾人在此不妨一提弗洛伊德對意識及夢的理論。弗洛伊德從臨床觀察，認為精神病是起於患者因受到一些痛苦往事（包括感情及本能）的壓抑所造成，而精神治療是在於：讓受壓抑的感情與本能，藉著談話及自由聯想，而得到充分渲泄，從而恢復健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病因說」是以其意識理論為基礎，而意識理論又與「自我結構」有關。

(2)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意識分為三層：

中層為「前意識」(preconscious, Pcs)，上層為「意識」(Cs)，下層為「無意識」(unconscious, Ucs 或作潛意識)<sup>28</sup>，無意識是其精神分析學說的核心<sup>29</sup>。「意識」就是觀念，而觀念是剎那剎那滅的。「前意識」指已消逝的意識，它可藉記憶而重現。「無意識」乃指本能、欲望、衝動、內驅力等，它們受到壓抑且被棄置於意識之外。弗洛伊德把「無意識」的本能欲望稱為「本我」(id)，它是依「快樂原則」而活動的。「意識」可視為「自我」，這是在出生後，在幼年時期受到父母的教誨，以及與外界接觸後所形成的人格，它並且是依「現實原則」而活動（遵守現實規則、符合社會需求、依理性而活動），因而它是人格的「行政機構」。人格的第三部份是「超自我」(super-ego)，它專司理想與

---

<sup>26</sup> 指唯一不二。

<sup>27</sup> 指宇宙意識。

<sup>28</sup> 〈自我與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p.137。

<sup>29</sup> 《論潛意識》，見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長春出版社，1998）第二卷 pp.465-500。

道德，控制本能欲望的衝動<sup>30</sup>。對於夢，弗洛伊德也以「無意識」來解釋，在睡眠時，「無意識」的欲望，闖進意識中而成。他認為夢並非被壓抑的「無意識」之本來面貌，故必須加以分析。夢可分為「顯意」(manifest content) 與「隱意」(latent content) <sup>31</sup>，有如謎語。「顯夢」是謎語，「隱義」是謎底。他又認為夢的活動方式有四：其一是「壓縮作用」<sup>32</sup>，使夢境的內容較其潛在意義表現得簡略多了。其二是「轉移作用」，把被壓抑的意識變成不重要的概念<sup>33</sup>。其三是「視像化」(visual images)，以具體形像來表示抽象的欲望<sup>34</sup>。其四是「潤飾作用」<sup>35</sup>，在睡眠將醒之時，把夢境加以條理化，以便掩飾其真相。

(3) 《蛙氏奧義書》的要旨，可用“अयम् आत्मा ब्रह्म”<sup>36</sup> (*Ayam Atma Brahma*) 一語來綜述。“अयम्” (*Ayam*) 是「此」(this 或 thisness)，指「自我的光明本性」，且這樣的自我就是萬物本體的梵。梵是遍在(無所不在)，也內在於吾人心中。由於「自我的光明本性」是絕對與普遍的，因而自我與絕對的梵沒有差別。所謂「此自我就是梵」這個命題，這在屬於《夜柔吠陀》的《廣林奧義書》，就是所謂“अहं ब्रह्मास्मि” (*Aham Brahmasmi*) <sup>37</sup>，這也相當於屬於《沙摩吠陀》的《歌者奧義書》所謂“तत् त्वं असि।” (*Tat Tvam Asi*) <sup>38</sup>。梵是充實於空間，分佈於所有的存在物之中，並且超離在感官知覺之外。

(4) 《蛙氏奧義書》乃介於缺乏系統性的前期奧義書，與從事系統論述的吠檀多形上學之間的橋樑。本奧義書指出自我是梵，祂具有四種狀態，也是「唯一的真實性」之四個面相。這四個面相分別是有關客觀存在，主觀存在，意識存在與超驗絕對存在。清醒狀態能認知外物，夢的狀態則認知內在事物。清醒與夢的狀態代表二種經驗，它們可

<sup>30</sup> 〈自我和超自我〉及〈兩類本能〉，《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pp.150-168。

<sup>31</sup> 《弗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長春出版社，1998)第一卷 p.357。又見〈夢的顯意與隱意〉，《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 pp.190-200。

<sup>32</sup> 《弗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長春出版社，1998)第一卷 pp.716-732。

<sup>33</sup> 《弗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長春出版社，1998)第一卷 pp.493-496。

<sup>34</sup> 〈夢的工作〉，《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車文博主編，p242。

<sup>35</sup> 《弗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長春出版社，1998)第一卷 pp.638-653。

<sup>36</sup> 唸作“*Ayam Atma Brahma*”，意即「此自我就是梵」。

<sup>37</sup> 意即「我是梵」。見〔I.4.10〕。

<sup>38</sup> 意即「你就是那個」(Thou art that)，見《歌者奧義書》〔VI.8.7〕。*Tat*，是 That；*Tvam*，是 the real I；*Asi*，是 are)。

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在清醒時（*vaishvanara*）吃飽而睡，但在夢中（*tajasa*）卻會覺得飢餓。至於在深眠狀態（*prājñā*）中，雖然不再出現經驗意識，但是卻有睡眠的記憶。超覺狀態（*Turiya*）相應於唸誦“*Aum*”音之後而出現的寧靜，此時泯絕一切認知與覺識活動。此乃梵的意識，是具有絕對的真實性（*absolute Reality*）。

綜上所言，吾人已對《蛙氏奧義書》的全文作了文字詮釋。全文以“*Aum*”音的 A-U-M 及第四種寂靜狀態，以比喻意識的清醒（*vaisvanara*）、作夢（*tajasa*）、深眠狀態（*prājñā*）及超覺（*turiya*）等四種層次。「深眠」是導入超覺狀態的重要一步。瑜伽修行者使自己從清醒及夢的狀態進入「深眠的無意識狀態」，讓心靈從現象世界中返回來。這樣，心靈不但遠離各種物理現象，也離開了各種心智現象，並停留在不知物，不作夢，無欲無求的境界之中。不過，這裡所謂深眠狀態只是比喻，並非指真正睡眠時的「深眠」。瑜伽修行者的深眠狀態，完全覺知外在環境的狀況，甚至比清醒狀態時更清楚。從深眠狀態再進入超覺狀態，心靈脫離一切意向活動，超越了是非知見，是言語所無法表達的。這是意識的真正本質，是絕對本體，也是宇宙的大我。在公元第七、八世紀之間，喬荼波陀便藉著詮釋《蛙氏奧義書》而提出「無差別不二論」，他的著作稱為《喬氏釋義》<sup>39</sup>，約書成於公元七世紀中葉，乃吠檀多哲學的先驅。

### 三、喬荼波陀的「無差別不二論」

(1) 喬荼波陀（*Guadapāda*）是「不二吠檀多」的鼻祖，也是商羯羅的祖師，他是第一位企圖建立「不二吠檀多」的哲學家。商羯羅在其《喬荼波陀頌注》的注文中<sup>40</sup>，稱喬荼波陀為祖師，因而，喬荼波陀乃哥文達（*Govinda*）之師，後者是商羯羅（700A.D-750）的老師。由此推算，則喬荼波陀當為七世紀末或八世紀末時人<sup>41</sup>。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他乃六世紀時期的，理由是西藏方面所譯的清辨（*Bhāvaviveka*）之《思擇炎論》（*Tarkajāvlā*）

<sup>39</sup> 又名《蛙氏義釋》（*Maṇḍūkya-Kārikā*）或《阿笈摩論》（*Āgama-Zāstra*）。有人將“*Kārikā*”譯作「偈頌」，但是，「偈頌」另有“*Gāthā*”一字。巫白慧把《喬氏義釋》譯作《聖教論》。

<sup>40</sup> 商羯羅著有《喬荼波陀頌注》（*Guadapādīyabhāṣya Vyākhyā*）。

<sup>41</sup> 這是最流行的觀點，實則喬氏的生卒時間不詳，故《喬氏義釋》的成書的準確年代也無法確定。King, Richard, *Early Advaita Vedānta and Buddhism: The Mahāyāna Context of* 參閱：*the Gaudapadiya-Kārikā* (State Univ of New York, 1995), pp.15-21。

一書，已引述《喬氏釋義》之言，而清辨又早於玄奘<sup>42</sup>。據說喬荼波陀的論著甚多，但一般只有《喬氏釋義》被公認為是他的著作<sup>43</sup>。《蛙氏奧義書》雖是最短的「奧義書」，但卻深富哲學意義。喬氏藉著詮釋而提出一種哲學理論，成為吠檀多學派的鼻祖。以下，吾人分析《蛙氏奧釋義》的文本之哲學意義。

(2)《喬氏釋義》共分四章，第一章指出「不二論」(一元論)乃《蛙氏奧義書》之理論基礎，第二章闡述現象界不真實，第三章是企圖在理論上建立「不二論」，第四章說明現象界或經驗世界的相對性，以及阿特曼(Ātman)乃現象界背後之唯一的實在性。《喬氏釋義》的另一特色是，企圖統一正統派與大乘佛教之間的分歧，認為大乘佛教的思想可達至「不二論」。以下吾人先分析《喬氏釋義》的內涵，並進一步說明《喬氏釋義》與大乘佛教的同異。

現在，吾人據多種英譯文本，將之分析展示如下：

### 3.1 第一章〈阿笈摩章〉

〈阿笈摩章〉(*Āgama-prakarana*)共 29 頌。本章基本上是詮釋《蛙氏奧義書》有關意識的四種狀態。即：

1. 第一是清醒的狀態(*vaiśvanara*)，在此狀態中，意識傾向感官的世界。這也可視為「最高我」朗現為外在世界的一切事像(*viśva*)。
2. 第二是作夢的狀態，梵文名為 *taijasa*。在此狀態中，意識轉向內在，能體驗精細的「心靈的印象」。換言之，此時的「自我」朗現為精神意識，並擺脫與感官世界的關係。但是，就真實性而言，夢的內容或對象是做夢者本身所造，並無真實性。由此可推，醒時所看到的一切事像，是由無明心的妄動所造成，因而也沒有真實性。然而，從實相方面說，此二者卻是沒有差異的。

<sup>42</sup> S.Radhakrishnan 謂：“He must be much earlier, since Walleiser states that that *Kārikā* is quoted i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Bhavaviveka’s *Tarajvālā*. The latter author is earlier than Yuan Chwang, and Gaudapāda must be therefore about A.D. 550.” 見所著 *Indian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vol.2, p.452.

<sup>43</sup> 其他著作尚有《自在黑數論頌疏》(*Samkhya-kārikā-bhāya*)、《人獅子精要奧義疏》(*Nrsimhatapanīya-Upanishad-bhāya*)、《後聖歌》(*Uttaragītā*)、《難近母七百頌》(*Durgā-saptaśati*)、《善施牛經》(*Subhagodaya*)、《吉祥明寶經》(*Śrividya-ratna-sūtra*) 等。

3. 第三是深眠 (*prājñā*)，此狀態無欲亦無夢。所有的經驗、體驗，都沉浸到無分別意識的整體裡。深眠者體驗到喜悅。因此，此時的「自我」不但擺脫了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同時也擺脫了與內在精神世界的關係<sup>44</sup>。
4. 第四個狀態是超覺，意識在這個狀態既不朝內亦不朝外，超越知見與非知見。此狀態無法由感官來體驗，它是不可思議，超越想像，並且無法以言語表達。這是純意識，這是真正的大我。它斷絕了一切外在的現象，它是寂靜、完全的喜悅、唯一不二的。吾人必須了悟這個真正的大我。這是說，此時「自我」是處於超覺狀態。這種超覺狀態具特殊意義，因為前三種狀態均受到不同的因果關係的束縛，身處無明之中，故未能認識真理與「自我」的本質。而當自我處於超覺狀態時，才能真正擺脫無明<sup>45</sup>。
5. 綜合言之，喬荼波陀在《喬氏釋義》第一章中，指出夢中狀況與醒時狀況，在各自的層面上說皆具其真實性。就以夢來說，夢的狀況雖然與吾人的現實經驗不同，但是，夢可視之為另一層面的經驗，且在這層次上，夢的內容仍具相容性或一致性。例如，在夢中的水可解除夢中的口渴，可見夢具其真實性，只是這種真實性與經驗層的真实性的層次上的不同而已。其不同之處在於：經驗層的真实性的對各個體來說具客觀性，而夢則屬於個別私人的。但是，若從絕對層面上說，則兩者皆不真實。進一步來說，熟睡 (*dreamless sleep*) 視為對內外對象皆無認知作用，但是，這個層次也沒有真實性<sup>46</sup>。喬荼波陀把這三個層次視作梵天三種有限性的朗現。
6. 第一章從 19 至 29 節，喬氏闡述“Aum”與意識的四種狀態之間的關係。他說：「藉著 A 音可達至清醒的狀態，藉著 U 音可達至作夢的狀態，藉著 M 音可達至深睡狀態，而在存想無音時便無所達」<sup>47</sup>。然則何故「無所達」呢？這是由於“Aum”

<sup>44</sup> *Gaudapada's Karika* [I · 15] : “Dream is erroneous cognition, sleep the absence of awareness of reality. When these two errors are removed, Turiya is attained.”

<sup>45</sup> *Gaudapada's Karika* [I · 14] : “Both the first two {Visva and Taijasa} are both associated with dream and sleep, Prajna is the state of dreamless sleep. Those who know see neither sleep nor dream in Turiya.”

<sup>46</sup> *Guadapada's Karika* , [I · 16] : “When the soul slee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eginningless Maya is awakened, it realises the unoriginated, sleepless, dreamless non-duality.”

<sup>47</sup> *Guadapada's Karika* , [I · 23] : “By the sound "A" one attains Visva, by the sound "U" one attains Taijasa, the sound "M" one attains Prajna. In the soundless there is no attainment.”

是無因、是整體、是獨一無二、是沒有效應與不變的<sup>48</sup>。

## 3.2 第二章〈虛妄章〉

《喬氏釋義》第二章名〈虛妄章〉(Vaitathya Prakarana.)，共 38 頌，主要闡述經驗世界乃虛妄不實。本章闡述吾人在日常經驗（醒時），及在夢中之見聞，皆不真實。強調吾人醒時之所見，由心動而起，是不真實的。醒時經驗和夢中經驗二者，只有時間和空間形式的區別，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二者都是由心的妄動所生。傳統上稱為幻現 (māyā，摩耶)<sup>49</sup>，否定經驗世界的實在性。此外，第一章承認有上梵與下梵之分<sup>50</sup>，但是在第二章則又批評這種區分的觀點<sup>51</sup>。關於這個問題，吾人分析闡述如下：

### 3.2.1 經驗世界為虛妄不實

喬荼波陀指出，無論是夢境或醒境，皆非實在，藉此說明經驗世界為虛妄不實。故謂：

「夢裡認為內心所想像的是虛幻，而以為心對外界的認知是真實。但是，兩者其實皆非實在」<sup>52</sup>。

---

<sup>48</sup> *Guadapada's Karika*, "AUM is indeed the Lower Brahman. AUM is also admitted to be the Supreme Brahman. AUM is uncaused, integral, unique, free from effects, changeless."

<sup>49</sup> 其後的商羯羅卻指出此二者的差異，認為醒時之所見，具有相對的真實性。

<sup>50</sup> *Gaudapada's Karika* [I · 26] : "AUM is verily the Lower Brahman. It is also stated to be the Higher Brahman. AUM is beginningless and unique.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it. It is unrelated to any effect and is immutable." 見 e-book, translated by Vidyavachaspati V. Panoli 見 <http://www.shiningworld.com/Home%20Page%20Links/Source%20Texts%20in%20HTML/MANDUKYA%20KARIKA.htm>，以下相同。

<sup>51</sup> *Gaudapada's Karika* [II · 27] : "Those who know how to gratify others call Atman gratification; those who are conversant with the asramas call It the asramas. The grammarians call It the masculine, feminine and neuter genders; and still others, the Higher Brahman and the Lower Brahman." 這是順著本章 [II · 19] 節而來，即："Atman is imagined as prana and other numberless ideas. All this is due to maya, belonging to the effulgent Atman, by which It appears, Itself, to be deluded."

<sup>52</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9] : "Even in dream what is imagined by the mind (chitta) within is unreal, while



這是說：在夢中，由意識內部所構思的夢境固然不真實，而夢境中所接觸到的外境也不真實。又謂：

「醒時內心所想像的是虛幻，而心對外界的認知是真實。但是，從合理的理由上說，兩者皆虛妄」<sup>53</sup>。

這是說：醒時所見二種境界，包括由意識內部所產生的現象固然不真實，而其在心外所接觸到的外境也不真實。這種觀點，乃奧義書哲學家的共識，經驗世界的一切，皆是如夢如幻（*māyā*，幻現）。故又謂：

「正如夢境與虛幻，以及空中樓閣，吠檀多的智者也如此觀看世界（不實在）。」<sup>54</sup>。

《奧義書》強調現象世界如夢如幻。關於乾達婆（*Gandharva*），印度神話對它們的說法不一。《梨俱吠陀》有的地方謂乾達婆的乃蘇摩的守護者<sup>55</sup>，有的地方把乾達婆視為與因陀羅敵對的魔怪<sup>56</sup>。《阿闍婆吠陀》謂乾達婆有數千之眾，它們生活在空界中<sup>57</sup>，其宮室建築在空中，彷彿海市蜃樓般，空中樓閣。故所謂「如見乾達婆城樓（*gandharyanagara*）」，乃以此比喻經驗世界的虛幻不實。

### 3.2.2 幻現出於心

首先，喬荼波陀謂現象界起於「心」，而「心」也就是代表主體的自我。《喬氏釋義》謂：

---

what is grasped outside by the mind is real. But both these are seen to be unreal..”

<sup>53</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10]: “Even in the waking state what is imagined by the mind within is unreal, while what is grasped by the mind outside is real. It is reasonable to hold both these to be unreal..”

<sup>54</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31]: “Just as dream and magic, as well as a city in the sky, are seen (to be unreal), so too, is this universe seen (to be unreal) from the Vedanta-texts by the wise.”

<sup>55</sup> *Rig Veda*, [IX · 86 · 36]。

<sup>56</sup> *Rig Veda*, [VIII · 11 · 66]。

<sup>57</sup> 《百道梵書》、《毗濕奴往世書》等，也有提及乾達婆。

「阿特曼心轉向外，以各種不同型態想像種種事物，永恆（如大地）的與非永恆的（如閃電），這一切皆以不同的欲望的形式存在心中。再者，阿特曼又心轉向內，想像各種不同的觀念」<sup>58</sup>。

這裡所謂阿特曼，是指「主體」或「自我」（Ātman）而言，以形容自我具有強大的幻力，強調一切存在皆起自心中，這些存在可分為二。其一是出於內在的想像，其二是心向外在世界所見的種種事物。這些現象都是由「心」所造的。一切現象皆因心的活動而起，故謂：

「內在事物所停留的時間，僅與對此事物的思維一樣持久。同樣地，對應於兩個時間點的那些被知覺到的外物，皆只是想像而已。此外是沒有事可對它們作分別的」<sup>59</sup>。

「兩個時間點」指從開始感知外境與停止感知外境之間的時區。全頌謂心理意識的各種意像，以及各種外境，皆起於具「分別」作用的心能。各種現象皆起於「心」的作用。接下來便是「妄執」的作用，《喬氏釋義》謂：

「猶如在黑暗處見到繩子，但卻不知是繩子，誤以為是蛇或流水之物。妄執自我也是如此」<sup>60</sup>。

---

<sup>58</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13] : “The Lord (Atman), with His mind turned outward, imagines in diverse forms various objects either permanent, such as the earth, or impermanent, such as lightning, which are already in His mind in the form of vasanās, or desires. Again, He turns His mind within and imagines various ideas.” 見 *The Upanishads - A New 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 巫白慧的《聖教論》譯作「一切存在心中起，內在不穩定諸有。及餘外在穩定者，如是最勝尊分別」。可見巫譯與英譯相差甚遠。

<sup>59</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14] : “Things that exist within as long as the thought lasts and things that are external and conform to two points of time, are all imaginations alo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s caused by nothing else.” 見 e-book , translated by Vidyavachaspati V. Panoli.

<sup>60</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17] : “As a rope lying in darkness, about whose nature one remains uncertain, is imagined to be a snake or a line of water, so Atman is imagined in various ways.” 見 *The Upanishads - A*

「見繩以爲蛇」，乃佛家用語，如《掌中論》謂：「論曰：『如於非遠不分明處，唯見繩蛇相似之事。未了彼差別自性，被惑亂故。定執爲蛇，後時了彼差別法已。知由妄執誑亂生故，但是錯解無有實事，復於繩處支分差別。善觀察時，繩之自體，亦不可得。如是知己，所有繩解。猶如蛇覺，唯有妄識』」<sup>61</sup>。在黑暗處，「妄執」繩而以爲蛇，或見繩而以爲是流水，這就是錯誤的「妄執」。執著個體自我，也是「妄執」。因此，必須破除妄執，捨妄而歸真。這種觀點，與大乘佛教的空宗，有相似之處，且中觀派也以繩、蛇等作申論，比喻現象世界的虛幻不實。佛教的龍樹從「衆因緣生法」來闡述「空」，婆羅門教則把「妄執」歸於「幻現」（幻現、摩耶，maya）。「幻現」是梵藉其幻力所創造出來的，而個體則因無明而誤認幻現爲實有。個體自我與梵之間的差別也是一種「幻現」，因爲二者是同體同源，是無差別的。

### 3.2.3 經驗世界的一切是無差別

「不二」的問題原是《喬氏釋義》第三章的主題，喬荼波陀在《喬氏釋義》第二章末處提出「不二」的概念，其用意可能就在於從第二章轉入第三章，亦即從「虛妄」的議題轉入「不二」的議題。「不二」就是「無分別」，而一切有關「分別」或「差異」的論點，都是「戲論」：

「《吠陀》中稱頌的那些遠離欲望、驚恐、憤怒的聖者，他們從遠離幻想、遠離現像的虛幻而成就自我，了悟不二」<sup>62</sup>。

精通吠陀知識的修行者，他們已脫離貪欲、恐怖、瞋恨之心。牟尼聖者徹底明瞭經驗世界的一切是無差別的，故棄絕所有語言文字來論辯，而謂「不二息滅諸戲論」，這是由於一切語言文字來的論辯，都只是文字遊戲而已。故又謂：

---

*New 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

<sup>61</sup> 《掌中論》，陳那菩薩造，三藏法師義淨譯。

<sup>62</sup> *Guadapada's Karika*, [II·35]: "The wise, who are free from attachment, fear and anger and are well versed in the Vedas, have realized Atman as devoid of all phantasms and free from the illusion of the manifold and as non—dual." 見 *The Upanishads - A New 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

「因此，既有此知，當牢記不二。既達不二之境，則行爲當如一愚者」<sup>63</sup>。

這裡所謂「愚者」，是大智若愚之意。智者認識「不二」(non-duality)之後，便要時刻存心於不二境界。心處於此境界中，生與死已不足慮，靈魂超脫了經驗無明的桎梏，認識自性即梵天，遂得解脫。

### 3.3 第三章〈不二〉

《喬氏釋義》第三章強調「不二」，共 48 頌，在此提出「不二論」(advaita theory)。喬荼波陀在本章主要從「無生」及「梵我不二」兩方面來闡述「不二論」。吾人現在將之分析展示如下：

#### 3.3.1 無生

此處所謂無生及所謂梵我不二，其論旨是相互關聯的。其中第一頌謂：

「致力於崇拜的自我，停留於有待的梵天之中。彼當知在創世之前，一切如無生的實在性。故持此見者，其智短小」<sup>64</sup>。

「無生」在此指梵天創世前，世界空無一物。然而，此語也涵蘊著梵天創世後，世界雖然羅森萬像，看似有生，但從實有的情況下考察，則萬物是無生。因為無生，故一切平等，即生只是一種幻現而已。《喬氏釋義》中講及「無生」之處甚多<sup>65</sup>，可見「無生」概念在《喬氏釋義》中之重要性。「生」乃事物的幻現（幻現）。這是說，常人說有生乃

---

<sup>63</sup> *Guadapada's Karika*, [II · 36]: "Therefore, having known it thus, one should fix one's memory on non-duality. Having attained the non-dual, one should conduct oneself as though one were a dullard." 見 e-book, translated by Vidyavachaspati V. Panoli.

<sup>64</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1]: "The aspirant, resorting himself to devotion, remains in the conditioned Brahman. Prior to creation all this was of the nature of the birthless Brahman. Hence the man (with such a view) is considered to be of narrow outlook." 見 e-book, translated by Vidyavachaspati V. Panoli.  
巫白慧的《聖教論》譯作：「優婆散那法生起，是在梵之出現時。此前一切皆無生，應記斯爲一憾事」。其義與英譯有差距。

<sup>65</sup> 例如 [I · 16], [II · 32], [III · 2, 20, 38, 48], [IV · 5, 71] 等。

出於幻現。首先，由於梵是整體，是無限與無生，一切皆是同質的。在這意義下，事物看似有變現（Nothing comes into existence），其實是沒有變現的。存在的事物沒有變現，因為梵是沒有理由變現的<sup>66</sup>。喬氏哲學強調「無生」，而所謂「生」只是一種幻現。梵既然是不生不滅的，而世界就是梵，故事物不會有生滅。這其實是說，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從實相（reality）方面說，若謂生成是真實的，這就等於說「既生成者是生成」（what has already come to be comes to be.）<sup>67</sup>，但是，這是毫無新義之說。喬氏很可能認為這句話是「重言」「tautology」，重言是指述詞（或副句）只是重覆主詞（或主句）之意旨，故其實並沒有多說了些甚麼。真正的問題是出於所執的主詞（或主句），而這種執持是起於幻現。從另一方面說，不實在的事物也無所謂「生」，他認為這就有如說一個不孕的婦人生孩子一樣<sup>68</sup>。

### 3.3.2 幻現

從「幻現」方面說，他認為人心原是一體的，但是在夢中卻徘徊在兩個主客的面相中。同理，吾人在醒時，也徘徊在真實與幻現的兩個面相中<sup>69</sup>。世界上所謂繽紛的事物（all the multiple objects），皆現起於心識（mental percept），因此，當心識停止活動時，繽紛的事物或真實的狀況與幻現便消失<sup>70</sup>。所謂心識停止活動，乃指它停止幻現。而所

<sup>66</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2], Vidyavachaspati V. Panoli 譯作：“I shall therefore describe the infinite, birthless and homogeneous. Listen! Nothing comes into existence, though it may well seem to come into existence.” 巫白慧譯作「我將因此說無憾，是中無生及平等。正如無有一法生，有生之法皆平等」。依巫譯，則喬氏的論據是：「有生」之見是一種遺憾，而真正「無憾」的則是「無有一法生」及「有生之法皆平等」。「無生」與「平等」這兩個概念是互補的，從實相的觀點說，萬物是無生，因為無生，故一切平等。Swami Nikhilananda 譯作：“Therefore I shall now describe Brahman, which is unborn, the same throughout and free from narrowness. From this one can understand that Brahman does not in reality pass into birth even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hough It appears to be manifest everywhere.” 可見巫譯與英譯的語意相差頗大。

<sup>67</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27]：“That the existent should come into being is only possible in an illusory manner. Anyone who claims it really happens is saying that what has already come to be comes to be.”

<sup>68</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28] .

<sup>69</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29]：“In a dream, the mind gives the illusion of oscillating between two aspects, in the waking state too, the mind gives the illusion of oscillating between two aspects.”

<sup>70</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1]：“This duality - everything whether moving or immobile - is a mental percept. When the mind ceases from mental activity no duality is perceived”.

謂停止幻現，乃在於認識真實的狀況。喬氏認為，真實的狀況是「梵乃唯一的真實性」，當心識遠離感官知覺時，便不再有認知對象，心識的活動便因而停止<sup>71</sup>。心識的活動在於起「分別心」，因此，只要吾人將「心」進入深眠狀態<sup>72</sup>，則「分別心」便消失。不過，深眠狀態中的心卻不如自我調控的心，後者是無懼的大梵，且是無所不知<sup>73</sup>。大梵是「是無生、無眠、無夢、無名相、永遠燦爛與全知，沒有動作」<sup>74</sup>。因此，大梵不變現，故一切變現皆屬幻現。總言之，喬氏哲學強調「無生」，而所謂「生」乃是一種幻現。梵既然是不生不滅的，而世界就是梵，故事物不會有生滅。這其實是說，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

### 3.3.3 梵我不二

《喬氏釋義》第三章強調「不二」(Advaita)，不二就是一元論，共 48 頌。喬荼波陀主要從「無生」及「梵我不二」兩方面，來闡述「不二論」。事實上，他是從「梵我不二」來闡述「無生」。他以「無限空間」比喻阿特曼 (Ātman, 大自我)，並以瓶中的空間比喻個體自我 (jiva)。在這個意義下，梵存在於個體自我中，有如空間存在於瓶中<sup>75</sup>。當瓶子被打破後，瓶的空間便與整體空間合而為一，個體靈魂與大自我之間的關係亦然。他又認為瓶子的空間既非創造之物，也不是空間的一部份，因為一切空間皆是同質的 (homogeneous)，個體靈魂與大自我 (梵) 之關係亦然<sup>76</sup>。總言之，「大自我」與「個體

---

<sup>71</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2]: "On realisation that the Self is the Real, thinking ceases: it becomes Non-mind; in the absence of anything to perceive there is no perception."

<sup>72</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4]: "One should take particular note of the mind's behaviour when it is under control, it is free of all conceptions but endowed with discrimination: the mind's condition in deep sleep 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sup>73</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5]: "In deep sleep the mind loses itself, - not so when under control; in that state it is the fearless Brahman, the light of knowledge shining on all sides."

<sup>74</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6]: "(Brahman is) birthless, sleepless, dreamless, nameless, formless, ever-resplendent and omniscient. (As regards That) there can be no routine practice of any kind."

<sup>75</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3-4]: "Here is an image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The Self is spoken of as existing in individual souls just as space exists encompassed by a pot. Its existence in composite things is like the space in pots. When the pot is smashed, the pot-space merges totally with Space - in the same way souls merge in the Self."

<sup>76</sup> *Guadapada's Karika*, [III · 7]: "The pot-space is neither a product nor a part of Space. The soul is neither

我」之間的關係，是一而非二，有如大瓶的空間與小瓶的空間那樣，是沒有差異的。當眾瓶破碎之時，小瓶的小空間便立刻與大的空間合而為一，沒有差別。

### 3.4 第四章〈熄滅火把章〉

《喬氏釋義》第四章名〈熄滅火把章〉(*Alātaśānti*)，共 100 頌。此處所謂「熄滅火把」，意謂將火把 (*alāta*) 在空中旋轉揮舞。以火把比喻意識體，揮舞火把而出現閃爍的火圈，又將火圈比喻為存在界的萬物。在這比喻下，火圈是虛幻的。這種比喻原來也是出於佛典，所謂「癡故見我，如於幻夢乾闥婆城火輪等中，而生有想」<sup>77</sup>。當火把寂靜時，有如吾人的心棄除各種執著，恆守安住於平等、不二的境界中。喬荼波陀在本章論及下述各問題：

#### 3.4.1 破因果

第四章從 11-23 節講及因果問題：

- (1) 其一是「因即果說」。喬荼波陀謂此說以為因即是果，則因是被生，這樣就不是無生，也不是永恆<sup>78</sup>。
- (2) 其二是「果與因無異說」，這樣，果既被生，則其因也非永恆<sup>79</sup>。
- (3) 其三是有關「果生於無生之因」(*an unborn cause*)，他認為一方面在現實上沒有此種例子，另一方面，倘若其果是出於其他事物，則在理論上將是無窮後退<sup>80</sup>。
- (4) 其四是有關「果出於因且因出於果說」，他認為這種論點涵蘊「生起」(*birth*) 的可能性<sup>81</sup>，但是，此說卻又無法說明何者先生起<sup>82</sup>
- (5) 其五是有關「肯定因果說」，他認為這種論點表明因果相繼，否則不可稱為具

---

a product nor a part of the Self.” [III · 9] : “With regard to Its birth, Its death, Its going and Its coming, the Self is quite like Space.”

<sup>77</sup> 見《成實論》卷十。

<sup>78</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1]。

<sup>79</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2]。

<sup>80</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3]。

<sup>81</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5]。

<sup>82</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8]。

有因果關係。

(6) 其六是有關「因不出於果說」，他質疑這樣無法確立的因，又如何能生果？

總言之，喬荼波陀批評「由因生果」、「果中有因」、「自生」、「他生」等，企圖說明「有生」、「無生」皆不成立。《十二門論宗致義記》謂：「先敘所破：一外道，謂僧佉計因中有果、衛世計因中無果、尼撻計因中亦有果亦無果、若提計因中非有果非無果。二小乘，薩婆多計因中有果性，經部計因中無果體，又大眾部計過未是無，則是中無果也，犢子部計亦有亦無」<sup>83</sup>。此中所謂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因中亦有果亦無果、因中非有果非無果等，乃當時印度各學派有關因果問題，而喬荼波陀針對這些觀點提出質疑。他的觀點是：物不生，也無所生<sup>84</sup>。「因」不出於沒有開端之「果」，「果」也不出於沒有開端之「因」。由於沒有開端者，故是無生。

### 3.4.2 關於認知對象

喬荼波陀謂二元論者認為主觀知識 (subjective knowledge) 有其外因，但喬氏則認為，從物性方面看是無因。這是由於心識與外物無關。同時，呈現外物的那些觀念，也不是獨立於心識<sup>85</sup>。他認為外物不存在，一般所謂存在，乃出於一種他稱為「被想像出來的經驗觀點」(being an imagined empirical view)，這種存在其實不是實在 (reality) <sup>86</sup>。心識在時間上 (不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 並沒有參予因果關係之中，所以，心識與對象物皆無生。他指出一般所謂「有生」，不但並非是實在意義下的「生」，而且根本上是「摩耶」(माया, māyā)，而「摩耶」是非存在的<sup>87</sup>。他的結論是：意識 (心，自我) 乃無生，吾人所知覺到的事物也無生<sup>88</sup>。他嘲笑那認為觀察到事物是已生的人，他們其實有如看

<sup>83</sup> 釋法藏述，《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下，〈觀有果無果門第二〉。

<sup>84</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22]。

<sup>85</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26]。

<sup>86</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7]: "That which exists by virtue of being an imagined empirical view, does not exist in reality. Again, that which exists on the basis of the empirical view brought about by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does not really exist." 巫白慧譯作「分別俗諦說為有，勝義真諦則非有。俗諦說有依他起，真諦理上實非有」。見《聖教論》，p.174。英譯文沒有所謂「分別俗諦」、「勝義真諦」，更沒有唯識宗所謂的「依他起」等概，與英譯文義相去甚遠。巫譯文採用佛教用語，易於扭曲原義。

<sup>87</sup> *Guadapada's Karika*, [IV · 58]: "The souls that are thus born are not born in reality. Their birth is like that of an object through Maya. And that Maya again is non-existent."

<sup>88</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27]。



到天空中有足跡一樣，那是不可能的<sup>89</sup>。總言之，喬荼波陀的觀點，可稱為「絕對一元論」或「無差別不二論」(*nirviśesa-advaita*)，這是強調無生，而生滅只是「摩耶」。不過，在喬荼波陀的《喬氏釋義》中，具有佛教的色彩。其後的商羯羅，另撰《蛙氏奧義書註》(*Māndūky -upanishadbhāṣya*)及《喬荼波陀頌註》(*Gaudapādiyahāṣya Vyakhya*)，藉以恢復吠檀多的哲學論述，而排除佛教的色彩。

### 3.4.3：意識與幻現

喬荼波陀認為意識（心，*Vijñāna*，*विज्ञान*）也無生滅，因而一切存在物也無生滅。他認為了悟此原理的人，便不致陷入「假知識」之中<sup>90</sup>。他以火把作比喻，火把在被揮舞時呈現直線或圓圈，但是，一旦停止揮舞，則直線或圓圈便消失。同理，當意識停止活動時，情況也如此<sup>91</sup>。當火把在處於活動中，其光圈不是來自他方；而當火把停止活動，其光圈也不會跑到別處。光圈離不開火把，這是因為光圈不是一種實物。意識所呈現的情形亦然。當意識處於活動中時，其所呈現的不是來自他方。當意識停止活動，其所呈現的也不會跑到別處<sup>92</sup>。意識所呈現的離不開意識本身，這是因為它不是一種實物，意識甚且不可被視作一物。在這種情形下，外物不是意識活動之結果，而意識也不是外物之結果，故智者當持「因果的無創論」<sup>93</sup>。在這個意義下，輪迴（*samsāra*，*संसार*）也不存在<sup>94</sup>。世界乃由錯誤的知識（無明）所造，其中沒有永恆之物。若吾人從實相（實有，*Ultimate Reality*）上看，則一切皆無生，因而也無滅，生滅之事乃出於個體自我（*jivas*）。但是，這種生滅卻非實相，而是幻現（幻現）。在實相的意義下，幻現是不存在的（此語其實是謂幻現不眞著）<sup>95</sup>。總言之，喬荼波陀以火炬作比喻，當火炬處於搖動時，火勢不從其他處生。當火炬滅時，火勢不會停留在其他地方，也不會停留在火炬中。現在，他以火炬比擬心識，又以火勢比擬對象界的影像。這是說，對象界的影像沒有實在性，

<sup>89</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28]。

<sup>90</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46]。

<sup>91</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47-8]。

<sup>92</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50-51]。

<sup>93</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54]: “Thus external objects are not born of Consciousness; nor is Consciousness born of external objects. Thus have the wise settled the birthlessness of cause and effect.”

<sup>94</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56] .

<sup>95</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58-60] .

完全是依心識而起滅，一切唯心所造。認識到這一點，便可達「婆羅門位」，這是指「靜寂」境界（佛教稱為涅槃）。

#### 3.4.4 意識與梵的境界

正如在夢中，意識是一種幻現，在清醒時也是如此。做夢者在夢中徘徊於十方，看見不同的生命體從卵或隙處而生。這些所謂生命體，其實只是做夢者的意識所能感知到的，它們無法獨立於意識而存在。同理，做夢者的意識只是做夢者的知覺對象。由此可見，醒時徘徊於十方，看見不同的生命體從卵或隙處而生。這些所謂生命體，其實無法獨立於醒時的意識而存的，而這些醒時的意識只是其感知吧了。這些在醒時所感知到的對象，是無法獨立於其意識而存的。在夢中，個體自我出現又消失；在醒時，個體自我生生滅滅。實則沒有生滅，這是最高的真理<sup>96</sup>。吾人所見到的主客二元關係的世界，只是意識活動的結果，而非真實的存在。由於意識受到不真實的事物所惑，便追求這些事物。當它不受所惑，回到純粹狀態時，便了悟其虛假不實。因果關係也是不真實的，能了悟此真理，則遠離一切苦厄<sup>97</sup>。這說明當意識在脫離感官欲望時，自己便不會陷於虛妄之中而回到清靜之境（a state of stillness）。這是無分別心（the state on non-distinction）、無生與唯一不二的境界。這就是自我的無生滅、無眠、無夢與光明本性<sup>98</sup>。人性（humility，vinaya）本來具有梵的本質，能控制感官（dama），而達至梵的清靜之境（tranquility，sama）<sup>99</sup>，這是全知、唯一而不二，與無始無終的境界<sup>100</sup>。

#### 3.4.5 心性的本質

（1）喬荼波陀提出「沒有對象」及「沒有感知」的遠離經驗的境界，並認為境界可

---

<sup>96</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58-60]: “No creature whichsoever is born, nor is there any source for it. This is that supreme truth where nothing is born whatsoever.”

<sup>97</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78]。

<sup>98</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81]: “This is birthless, sleepless, dreamless, and self-luminous. For this Entity (the Self) is ever luminous by Its very nature.”

<sup>99</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86]: “This is the humility of the Brahmanas; this is said to be their natural control. Since, by nature, they have conquered the senses, this is their restraint. Having known thus, the enlightened one becomes rooted in tranquility.”

<sup>100</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86]: “Having attained omniscience in its entirety, as well as the non-dual state of Brahmanhood that is devoid of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does anyone wish anything thereafter?”

分爲「知」、「知之對象」及「最高的可知」，而後者即最終實在<sup>101</sup>。人心（靈魂，自我，Ātman）在本質上如同空間（ether, akasa），且是永恆不滅、無始無終，及毫無變易的<sup>102</sup>。個體靈魂自無始以來，便是燦爛光明，故吾人不必尋求其他知識，便能達至不朽之境<sup>103</sup>。

- (2) 自我在本質上是本來清靜的（tranquil）、無生與自在（自由）、平等、沒有分別。無生的自我是真實、獨一無二且純淨<sup>104</sup>。至於那些徘徊於「分別境」（the realm of separateness）的人，無法認識自我的清靜性。他們執著差異性與個體之間的分別，這是短見的表現。對於自我是無生滅之知，是與物無關，不涉及他物。自我本來沒有枷鎖，自由自在，在本質上是清靜不雜的。自我本性光明，無始無終<sup>105</sup>。《喬氏釋義》的末句，強調最終極的實在性（the Supreme Reality）是難以觸摸的，它是深遠、無生、平等、清靜。因而要向此「最終極的實在性」的境界致最崇高的敬意<sup>106</sup>。

- (3) 以上說明自我本無生滅、無始無終、獨立自在，且本性原是開悟與光耀。

### 3.4.6 無差別不二論

一般將喬荼波陀的哲學，稱爲「無創論」（Ajātivāda, non-creation）。「無創論」有時又解釋作「沒有事情發生過」，或謂「創造現象界的事從沒發生過」，甚且連幻現也不存

---

<sup>101</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88]: “The wise recognize another state, in which there exist neither objects nor ideas regarding them. This state is beyond all empirical experiences. They describe the three: knowledge, the objects of knowledge i.e. the three states and the supremely knowable i.e. Ultimate Reality.” Translation by Swami Nikhilananda.

<sup>102</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91]: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all souls are, by nature, similar to ether, and eternal. There is no diversity anywhere among them, even an iota of it.”

<sup>103</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92].

<sup>104</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93]: “All souls a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ranquil, unborn and, by nature, entirely detached, equal, and non-different, and inasmuch as Reality is thus unborn, unique, and pure.”

<sup>105</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98]: “All souls are devoid of any covering and are by nature pure. They are illumined as well as free from the beginning. Thus they are said to be masters since they are capable of knowing.”

<sup>106</sup> *Guadapada's Karika*, [VI · 100]: “Having realised the non-dual state that is hard to perceive, deep, unborn, uniform and serene, we offer our salutations to It, as best as we can.”

在<sup>107</sup>。其要旨是說：從絕對的觀點說，創造（創世）是不可能的。換言之，「無創論」指出世界是幻現，本無創造。一切企圖從創世的觀點，來說明世界之根源，皆是徒勞的。從絕對的觀點說，是無生與死、沒有成或毀、沒有所謂朗現與消失、沒有一與多之分、沒有統一性與雜多性、也沒有枷鎖與解脫之別。二元或多元只是現象，只有阿特曼是唯一的，這被視為最終極的真理。吾人現在把《喬氏釋義》中所展示的「無差別不二論」的要旨，總結如下：

- (1) 「自我」有三種朗現方式，其一是朗現為外在世界的一切事像（*viśva*）。其二是相應於睡夢狀態，此時的「自我」擺脫清醒狀態的束縛，朗現為精神意識，並擺脫與外在世界關係。其三是相應於熟睡而無夢的狀態，此時的「自我」不但擺脫了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同時也擺脫了與內在精神世界的關係。其四是「自我」處於超覺狀態，前三種狀態均受到不同的因果關係的束縛，身處無明之中，故未能認識真理與「自我」的本質。當自我處於超覺狀態時，才真正擺脫無明。
- (2) 世界是一種幻現，而人生也猶如清醒之夢（*a waking dream*）。吾人之所以認經驗世界（即清醒時所接觸之世界）是客觀真實，理由乃在於相信經驗世界具有客觀架構，即相信時間、空間及因果關係的真實性，特別是因果關係。喬荼波陀認為因果關係只是知識之條件，其本身並沒有真實性。在這意義上，沒有事件是自因的，也不可能由他因而成<sup>108</sup>。吾人也不宜謂梵乃世界之因，因此，無論是主觀或客觀事物、靈魂與世界，皆不真實<sup>109</sup>。
- (3) 幻現（摩耶）乃起於「心」，包括心理的、精神的，以及醒時所見的「外在」世界。這些現象都是由「心的分別」活動而起，心的活動指「能執」的主觀意識與「所執」的外境二者。心理的各種意像，以及各種外境，皆起於具「分別」作用的心能。再則是心的「妄執」的作用，猶如在黑暗之處，見繩而以為蛇，並執著為蛇。當吾人做夢時，視夢中的一切為真；當吾人在清醒時，便視清醒中的一切為真。
- (4) 幻現是從現象界說，而若從實相方面說，則是「無生」。現象界乃梵天本質之朗現，也是祂的能力之顯現，喬荼波陀將這種能力稱為幻現。換言之，幻現蒙

---

<sup>107</sup> 參考 Gaudapada : <http://www.answers.com/topic/gaudapada>.

<sup>108</sup> *Guadapada's Karika* , [IV · 16-21] 。

<sup>109</sup> *Guadapada's Karika* , [IV · 39] 。

蔽了人心，使人心無法了解真相。喬茶波陀爲了強調無生，遂否定因果關係的客觀性。經驗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皆不實在，而唯一的實在就是大我的梵天。喬茶波陀反對把梵天分爲上梵與下梵，認爲這種劃分是不存在的。

- (5) 大我與個體自我之間，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個體自我有如瓶中的虛空部份，而大我則有如太虛。當瓶破碎之時，如瓶中的虛空便與太虛毫無差別。同理，個體自我與大我之間的情形也是一樣。其次，個體自我原本又可分爲「真我」(Ātman) 與「個體自我」(jiva)，「個體自我」乃指在輪迴圈中流轉的自我而言，而且後者源於前者。然而，喬茶波陀卻認爲，「個體自我」即「真我」，且「真我」即大我。梵天個體化而成爲許多「個體自我」，但是，這只是表相而已。梵天有如普遍空間 (mahākāśa)，而「個體自我」則有如花瓶中的有限空間，其差別只是表現在容量與名稱而已。當花瓶破碎之後，花瓶中之空間便與普遍空間合而爲一，其差別只是表面的<sup>110</sup>。個體自我一旦突破無明，便能體悟大我與個體自我毫無差別。
- (6) 吾人在清醒及在夢的狀態下，個體自我具有不同層次的知覺。在熟睡而無夢的狀態下，個體自我才相對地消除對外及內在的知覺，一切事物皆消融於「無分別心」。再則是達至超覺 (turya) 的境界時，消除主客對立。若要達至超覺的境界，則必須修持「無觸瑜伽」，一方面控制意識活動，使意識不起分別心。另一方面，不對幻境起執著，體悟大我與個體自我不二。
- (7) 喬茶波陀把「真實」視爲永恆不變，一切變遷中的事物皆不實在。在清醒、夢及睡眠的三種相對狀態之上是「絕對」，它是一切之基礎，也就是唯一真實的梵天。經驗世界的複雜性不等於梵天，但也不是與梵天有差別。

## 四、喬茶波陀的《喬氏釋義》與大乘佛學

有些學者認爲喬茶波陀受到佛教的影響，但是，這種論斷是待商榷的。以下，吾人將指出喬茶波陀的《喬氏釋義》與大乘佛教之間的差異。

<sup>110</sup> 參閱 S.Radhakrishnan : *Indian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vol.2 , p.461.

## 4.1 幻現與性空

- (1) 闡述經驗世界（醒時），及在夢中之見聞，二者只有時間和空間形式的區別，然而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皆是由心的妄動所生。傳統上稱為幻現（*māyā*，摩耶），否定經驗世界的實在性。喬荼波陀把這三個層次視作梵天三種有限的幻現。《喬氏釋義》以「見蛇以為繩」之喻，此原乃佛教中觀派與唯識宗的典籍中所常見的。強調乃出於心之妄喬荼波陀也強調必須破除妄執，他依婆羅門教傳統，把「妄執」歸於「幻現」（幻現、摩耶，*māyā*）。「幻現」一方面是梵藉其幻力所創造出來的，另一方面是個體因無明而誤認幻現為實有。
- (2) 瑜伽行派（*Yogācāra*）或唯識派<sup>111</sup>，提出所謂「阿賴耶識」（*आलयविज्ञान*，*ālayavijñāna*）。「阿賴耶」一名，源出《增壹阿含經》<sup>112</sup>，其後演變為心識，這在字義則有「藏識」或「異熟識」（*vipāka*）之意，認為過去及未來的一切觀念種子（*bīja*），皆含藏於其中。因此，「阿賴耶識」被視為是展現現象世界的根據，因而也是萬有及自我在將來所要變現的根源。瑜伽行派（唯識派）將阿賴耶識視為由善惡業所薰習，又以業種子為增上緣而招感異熟果，因而被視為因果業報的主體。阿賴耶識為一切諸法所依，是根本識，眼、耳、鼻、舌、

---

<sup>111</sup> 傳統上分馬鳴、及陳那（約 400-480）三系。馬鳴（*Asvaghosa*），約為公元二世紀初人，《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0 冊有《鳴菩薩傳》。無著約公元四至五世紀的人。但漢藏及日本佛教則均以彌勒為初祖，而以無著為二祖，世親為三祖。彌勒在世約為公元 270-350 年，故馬鳴乃彌勒之前輩。又有將瑜伽行派分為古學與今學兩家，古學又稱為前期瑜伽行派或無相唯識派，以世親的繼承者安慧（約公元 470-550 年的人）與難陀（約六世紀）為代表。今學以世親的另一繼承者陳那為代表，從因明方面論述瑜伽學說，被視為後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識派的先驅，其後繼者有護法（*Dharmapala*，約 6 世紀中葉）、戒賢（*Śīlabhadra*，約 528-651）、法稱（*Dharmakīrti*，約 6-7 世紀）等。此外，又有依強調修持與強調理論的不同而分別有「瑜伽行派」與「唯識」之分。至 7-8 世紀，密教興起後，兩派逐漸融合為「瑜伽行中觀派」或稱「中觀瑜伽行派」。我國南北朝的北魏時代，唯識思想就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傳入，並在當時成立了「地論學派」。在南朝的梁陳時期，真諦在南方形成了「攝論學派」。當時這些唯識思想基本上都屬於印度前期瑜伽行派或唯識古學。其後唐玄奘傳護法一系的唯識學，建立了法相宗，可稱之為唯識新學。

<sup>112</sup> 漢譯《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勸請品〉第十九謂：「人不信受，亦不奉行」。但此句巴利為“*Alayarama kho panayam paja alayarata alayasamudita*”，若將此句譯為中文，就是：「又彼諸人是樂阿賴耶、喜阿賴耶、悅阿賴耶」。

身、意、末那等七識皆生於「阿賴耶識」，其中就有淨、染的種子。倘若吾人不明瞭萬物乃待緣而起，便是「無明」，故又稱為「無始無明」或「根本無明」。吾人由此無明而產生人、法二我的妄執等煩惱，稱為「枝末無明」。瑜伽行派認為，當阿賴耶識破除無明之後，便脫離一切虛妄而證得不生不滅、不垢不染、無性無相的法性真實境界，阿賴耶識也因而轉染成淨，得顯真如<sup>113</sup>。

- (3) 從以上可見，喬荼波陀與瑜伽行派，二者皆以無明的妄執看待經驗世界，否認外在世界的真實性。前者以夢中之見聞作比喻，後者以「阿賴耶識」之阿變現來說明。論者或認為喬荼波陀的「幻現」說，是受瑜伽行派的影響<sup>114</sup>，其實，幻現或摩耶（*माया māyā*）之說，已見於《梨俱吠陀》<sup>115</sup>與《薄伽梵歌》<sup>116</sup>。《白驢氏奧義書》中指出世界的呈現只是一種幻現（*visva-maya-nivrttih*）<sup>117</sup>，也可視為是一種呈現（*a manifestation*），其呈現原因是「幻力」（*the power of maya*）。「幻力」乃出於「大主宰」（*the great Lord*），整個宇宙乃出於最高主宰的幻力。《奧義書》把「無明」（*avidya*）視作迷惑或謬見的根源，例如《石氏奧義書》把「無明」視為瞎子跟隨著瞎子。「無明」是知識性與主體性的，而「幻」或「幻現」則是本體論的概念。這其實表明：「無明」的人是無法認識本體，因而也就不能認識世界的「幻現」，並且對世界作錯誤的認知，其所見只是「幻現」。與「無明」相對立的是智慧（*vidya*），《疑問奧義書》認為現實世界既然只是一種「現象」。那麼，現象世界就是歪曲、錯誤與欺詐（「幻現」）。《薄伽梵歌》認為現實的宇宙萬有是幻現，這種幻現出於「宇宙幻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悅性（*sattvāt*），變性（*rajaso*）及惰性（*tamaso*）。喬荼波

<sup>113</sup> 唐代玄奘（公元 600-664 年）訪印時，年事最高，為那爛陀寺大長老，受人崇敬。玄奘拜戒賢為師，從學《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主張五種姓說，認為眾生先天具有的本性有五種，其中有一種「無性有情」，永遠達不到解脫。

<sup>114</sup> 例如孫晶在其《印度吠檀多不二論哲學》（東方出版社，2002），頁 26-27。

<sup>115</sup> *Rig Veda*, tr. by Ralph T.H. Griffith (1896), Book VI, Hymn XLVII, 18: "Indra moves multiform by his illusions (Maya)".

<sup>116</sup> *Bhagavad Gita*, Ch.18, Verse 61: "The sovereign Lord dwells in the heart space of beings and moves them to act by his divine Maya, as though mounted on a machine".

<sup>117</sup> 梵文“*visva-maya-nivrttih*”，英譯作“*illusion of the world*”。*Svetatsvatara- Upanishad* [I · 10] · In S. Radhakrishnan 的英譯 *The Principle Upanishads*, p.715.

陀在其《喬氏釋義》中，是據《蛙氏奧義書》的四種狀態來解釋世界，其中一些用語參酌佛教，但不宜視為受佛教的影響。更何況，瑜伽行派的「藏識」，與數論（Samkhya）派所謂「原初物質」（pradhana 或 prakriti, original matter）有關。數論認為觀念及對像皆為「原初物質」所變現（parināma），差別只在於數論所謂變現，乃指原初物質與心靈接觸後，便開始演化，並經過若干階段後而創造實在的物質世界，而瑜伽行派所謂的變現被視為不實在的。

## 4.2 無創論與無生

- (1) 「無生」概念在《喬氏釋義》中至為重要。他將「生」視為事物的幻現（幻現）。事物看似有變現，但是，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且世界就是梵，所以事物不會有生滅。喬荼波陀以火炬比擬心識，又以火勢比擬對象界的影像。這是說，對象界的影像沒有實在性，完全是依心識而起滅，一切唯心所造。此外，喬荼波陀在《喬氏釋義》第四章，也企圖從六方面批評因果問題，其一是「因即果說」，其二是「果與因無異說」，其三是有關「果生於無生之因」，其四是有關「果出於因且因出於果說」，其五是有關「肯定因果說」，這種論點表明因果相繼，其六是有關「因不出於果說」。
- (2) 龍樹的《中觀論》<sup>118</sup>也主張「無生」，故謂「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又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sup>119</sup>。中觀論強謂空（शून्य, Śūnya）與（शून्यता, Śūnyatā），故其哲學稱為「空宗」（Śūnyavāda）。「空」是指「無自性」（niḥsva-bhāva），或「自性空」（svabhāva-śūnyā）。而「自性」（svabhāva）則指「自己的實有性」。月稱（Candrakīrti）<sup>120</sup>在其《明句論》中，謂「自性」有二義，其一指事物的本質，例如熱是火的「自性」，其一指相對於「他性」（parabhāva）而言。總之，

<sup>118</sup> 龍樹菩薩著，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sup>119</sup> 〈觀因緣品第一〉。

<sup>120</sup> 大乘中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約 7 世紀中葉的人。他歸謬論證法批評論敵的觀點，發揚了佛護的傳統。嚴格地只破不立，以破顯宗，故稱為「隨應破派」或「應成派」，不僅與瑜伽行派相對立，也與中觀自立量派相抗衡，其學說通過阿底峽完整地傳入西藏。著有《入中論》、《中觀根本明句論》（又名《明句論》）、《六十道理論釋》、《七十空性論釋》、《菩薩瑜伽行四百論廣釋》等。



「自性」乃指真正屬於事物自己的本質，故「無自性」乃意指事物沒有屬於其自己的本質。《中觀論》從一切事物皆由各種條件所生，來說明事物「無自性」。換言之，一切事物皆由「他性」所組成。這些由「他性」所組成的事物，稱為「緣生」(pratītya -samutpanna) 故謂：「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sup>121</sup>。「緣生」又稱作「空」，又由於「緣生」則沒有實在性(自性)，故也稱之為「假名」，有名而無實。《喬氏釋義》主張「無生」，龍樹亦然。《中觀論》謂：「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龍樹從「八不中道」講不生不，所謂「八不」乃指「不生」(anutpādam)，「不滅」(anirōdham)，「不常」(aśāsvatam)，「不斷」(anucchedam)，「不一」(anekartham)，「不異」(anānārtham)，「不來」(anāgamam)，「不去」(anirgamam)。龍樹又以「不生」作為「八不」之基礎，因為若「不生」，則自然「不滅」。至於龍樹所謂「不生」之理由，乃在於一般現象界之「生」乃「因緣所生」，問題在於「因緣生」三字。從「因緣」所生，便是「無自性」，而「無自性」則無「實在性」(非實有)。「不生」是「無生」，龍樹又從批評因果律來闡述「無生」，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sup>122</sup>。

他認為「因果律」可有四種解釋，即：

- (a) 其一是自生，這其實是針對數論的「因中有果論」(satkūryavūda)，故謂「諸法不自生」。
- (b) 其二是他生，意指原因與結果相異，這其實是針對「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的「因中無果論」(asatkūryavūda)，故謂「亦不從他生」。
- (c) 其三是由上述二者(自生與他生)而生，這是指「因中有果」與「因中無果」的結合，故視之為「不共」(生)。
- (d) 其四是無因生，這其實是指「偶然而生」，故謂「不無因」。
- (e) 喬荼波陀與龍樹雖然均主張「無生」，但二者立論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前者以大梵為絕對本體，永恆不變，且世界就是梵，故事物不會有生滅。這其實是說，

<sup>121</sup> 《觀四諦品》第二十四，〔18，19〕。

<sup>122</sup> 《觀因緣品第一》。

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而變只是幻現。後者所謂「無生」，是從「自性實有」的面向，並指出根本不存在「自性實有」之事物。故無所謂「生」，因而謂「無生」。喬荼波陀卻肯定「實有」，這就是「阿特曼」，而「阿特曼」的實在性正是中觀論者所反對的。大乘佛學則不但堅持「補特伽羅無我」(pudgalanairāt) (個體自我沒有實在性)，也強調所謂「法無我」(dharma-nairātmya)。

### 4.3 自我的清靜性與涅槃

- (1) 喬荼波陀認為自我本來（本質）是清靜的、無生與自在（自由）、平等、沒有分別。那些徘徊於「分別境」的人，無法認識自我的清靜性。自我本來沒有枷鎖，自由自在，在本質上是清靜不雜的。自我本性光明，無始無終。他認為「智者不涉於對象，自我也不涉於對象」，這是佛所未講及的。《喬氏釋義》的末句，強調最終極的實在性是難以觸摸的，它是深遠、無生、平等、清靜。因而要向此「最終極的實在性」的境界致最崇高的敬意。
- (2) 佛教各派對涅槃之真實性各有堅持，例如，毗婆沙師（Vibhasika）<sup>123</sup>及瑜伽行派（唯識派）主張涅槃是實有，而中觀派及經量派則主張涅槃為非實有。《中觀論》：

「若一切法空，無生無滅者，何斷何所滅，而稱為涅槃」。

「無得亦無至，不斷亦不常，不生亦不滅，是說名涅槃」。

「如佛經中說，斷有斷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無」。

可見中觀派認為，涅槃不是對存在事物的獲得，涅槃乃非有亦非無，它是一種境界或狀態，這種境界是無生無滅、不斷亦不常、不生亦不滅。進一步而言，吾人對涅槃與世間，不可存分別心，故又謂：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

---

<sup>123</sup> 毗婆沙師乃上座部中說一切有部的繼承者，致力於注釋經論，而「毗婆沙」乃是指對有部阿含經注疏的總稱。

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sup>124</sup>

所謂「世間與涅槃無分別」，這是指吾人必須要去除分別心，才能體會涅槃的境界。此境界是超乎世間與非世間、超乎存在與非存在、超乎相對與絕對。吾人也可以這樣說，當吾人的主觀心境消除世間與涅槃之對立，及消除相對與絕對之間的對立時，便是涅槃的境界。

## 4.4 自我的真實性

### 4.4.1 自我與頓超

1. 喬荼波陀認為，現象界乃梵天的幻現。幻現蒙蔽了人心，使人無法了解真相。個體自我有如瓶中的虛空部份，而大我則有如太虛，其差別只是表現在容量與名稱而已。當花瓶破碎之後，花瓶中之空間便與普遍空間合而為一，個體自我一旦突破無明，便能體悟大我與個體自我之間其實是毫無差別。不對幻境起執著，進而體悟大我與個體自我不二。
2. 佛教徒的自我超升的理想各有不同，這從「乘」(yāna)這個概念便可見一斑。“Yāna”原指道路或車輛，大乘佛學早期將佛教大成就者分為聲聞乘 (Śrāvakayāna)、緣覺乘 (Pratyekabuddhayāna) 及菩薩乘 (Bodhisattvayāna)。聲聞乘指佛陀弟子企求成就阿羅漢 (Arhat) 果，意為覺悟的聖者；緣覺乘原指修行者在沒有覺者的指導下，個人獨自成就阿羅漢果，但不將解脫之道告訴他人；菩薩乘之目的在於獲得「完滿智慧」(bodhi)，彼在每一世，本著菩提心 (bodhi-citta) <sup>125</sup>與願力而修「十地」<sup>126</sup>與「六度」<sup>127</sup>。「十地」是指：

(1) 歡喜地 (pramuditā)，指修行者能達成自利及利他之無上功德，因而產生大

<sup>124</sup> 〈觀涅槃品〉第二十五。

<sup>125</sup> 菩提心指智慧 (prajñā) 與慈悲 (karunā)，且慈悲又是菩提心的本質。

<sup>126</sup> 自《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指菩薩修行的個階段。

<sup>127</sup> 六度或六波羅蜜，(1) 布施：財施、法施、無畏施 (度慳貪)。(2) 持戒：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度毀犯)。(3) 忍辱：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度瞋恚)。(4) 精進：斷精進、修精進、求化精進 (度懈怠)。(5) 禪定：身定、口定、意定 (度散亂)。(6) 智慧 (般若) 生空智、法空智、一切智智 (度愚癡)。

歡喜之心。

- (2) 淨地（或稱：離垢地，vimalā），指修行者身心達至清淨，因而能遠離煩惱垢染之境地。
- (3) 明地（發光地，prabhākārī），指修行者進行禪定修持，遂得智慧光明，漸悟真理。
- (4) 焰地（arcismatī，或稱：吉地），指修行者用其修得的智慧之火焰，燒去煩惱之薪。
- (5) 難勝地（sudurjayā），指修行者達至平等性（samata），體悟真理，教化衆生等。
- (6) 現前地（abhimukhi），指修行者從觀十二因緣而遠離三種相〔即：離彼我之相，離作者受者之相，及離有無之相〕，得知一切皆具同一性的大般若智，又以大悲爲首，教化衆生。
- (7) 深遠地（dūrangamā，或稱：遠行地），指修行者體證實相無相，得殊勝三昧，超過聲聞緣覺，他致力於衆生解脫。
- (8) 不動地（acalā），指安忍於一切現象不生之境，稱爲「無生法忍」（anupattika-dharma-ksānti）。<sup>128</sup>
- (9) 善慧地（sādhumatī），指修行者以無礙智力，教化衆生，使之獲得解脫。
- (10) 法雲地（dharmameghā），指修行者已達功德圓滿，得無上神通力，並已成佛。

#### 4.4.2 大梵與法身佛

- (1) 大乘佛教有所謂「佛三身」(trayaḥkāyah)之說，各經論所舉三身之名稱與解釋不一，通常指法身(dharmakāya)、報身(sambhogakāya)<sup>129</sup>及應身(nirmanakāya)，應身又譯作化身或應化身<sup>130</sup>。但是，中觀派則只講法身與化身。三身又稱法身佛、報身佛及應身佛。天臺宗稱法身佛爲毗盧遮那佛，稱報身佛爲盧舍那佛、

<sup>128</sup> 《六十華嚴經》卷二十五〈十地品〉謂：「第七地之菩薩，三業清淨，修無相行，得無生法忍，照明諸法」。《寶積經》26日：「無生法忍者，一切諸法無生無滅忍故」。《大般若經》卷四四九〈轉不轉品〉：「如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以自相空，觀一切法，已入菩薩正性離生，乃至不見少法可得。不可得故，無所造作。無所造作故，畢竟不生。畢竟不生故，名無生法忍。由得如是無生法忍故，名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大乘義章》卷十二：「從境爲名，理寂不起，稱曰無生；慧安此理，名無生忍」。

<sup>129</sup> 指經過修行而獲得佛果位之身，顯示了佛智慧的佛身。

<sup>130</sup> 指佛爲了救度衆生，隨應三界六道之需要而變現之身，隨緣教化，釋迦牟尼佛即是應身佛。

化身佛為釋迦牟尼佛。法相宗以毗盧遮那佛為「自性身」，以盧舍那為「受用身」，釋迦牟尼為「變化身」。密宗視毗盧遮那即「大日如來」（摩訶毗盧遮那，梵文 Mahavairocana）。就「法身」來說，是自性的本體，不生也不滅，不來也不去，不死也不生，它是永恆，好像永遠是常在。從字源上說，“dharmakāya”（法身）與“dharm”（法）及“dharmatā”（法性）有關。首先，“dharm”一字原指「終極的實在」，而“dharmatā”（法性）則指非人格的終極原理。因此，則大乘佛教所謂「法身」是指萬法的本體。《大乘義章》謂：「法身佛者，就體彰名。法者，所謂無始法性。此法是其衆生體實，妄想覆纏，於己無用。後息妄想，彼法顯了，便為佛體。顯法成身，名為法身。如《勝鬘經》說：『隱如來藏，顯成法身。法身體有覺照之義，名法身佛』」<sup>131</sup>。法相宗又將法身視為自性身<sup>132</sup>，法相宗認為吾人若能將「阿賴耶識」，轉化為「大圓鏡智」，便證得法身，而法身就是「自性身」<sup>133</sup>。在這個意義下，「法身」就是自己真正的本性，並演變成「如來藏」的自性清淨心（佛性），由此可進一步展開「見性成佛」的思想，如禪宗所標榜的「明心見性」。

(2) 佛教的應化身與婆羅門教的化身說

佛教所謂應化身，基本上是指釋迦牟尼應所化的衆生而化現，生身王宮，度化世間衆。婆羅門教有「化身」，例如，原屬於《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的《薄伽梵歌》中的黑天，乃毗濕奴的化身。從時序方面說，《摩訶婆羅多》之作比大乘佛教早，故大乘佛教所謂法身及應身之說，有可能是受到婆羅門教的影響。

(3) 綜上所述，則大乘佛教有所謂「法身佛」，與喬荼波陀所謂「阿特曼」（Ātman）之意義極為相似。且法相宗所謂「大圓鏡智」，與喬荼波陀所謂「超覺狀態」也相頗相近。進一步而言，大乘佛教如《大乘義章》所謂「後息妄想，彼法顯了，便為佛體」，此說又與喬荼波陀認為在「超覺狀態」下，吾人便能體認「個體自我」即真我「阿特曼」之說非常接近。

<sup>131</sup> 慧遠《大乘義章》〈三佛義〉。

<sup>132</sup> 見窺基《法苑義林章》卷七。

<sup>133</sup> 法相宗認為意識轉化為妙觀察智，其佛果便是報身（受用身），前五識轉化為成所作智，其佛果便是化身（變化身）。

## 五、結語

- (1) 《喬氏釋義》乃喬荼波陀藉著詮釋《蛙氏奧義書》而提出其「幻化形上學」與實有論，他也是第一位提出「不二吠檀多」的哲學家。經驗世界的一切，皆視為因心的活動而起，因此，必須破除妄執。當心識停止活動時，繽紛的事物或真實的狀況與幻現之分便消失。
- (2) 喬荼波陀的立論，是要達至超覺 (turya)。在超覺狀態中，體現靈魂自無始以來的清靜、自在 (自由)、平等、燦爛與光明。消除對外在及內在的知覺，一切事物皆消融於「無分別心」，消除主客對立。自我本來沒有枷鎖，至於那些徘徊於「分別境」的人，無法認識自我的清靜性。他們執著差異性與個體之間的分別，又不明對於自我是無生滅及與物無關。
- (3) 喬荼波陀與瑜伽行派，二者皆以無明的妄執看待經驗世界。喬荼波陀以夢中之見聞作比喻，後者則以「阿賴耶識」之變現來說明。論者或認為喬荼波陀「幻現」說是受瑜伽行派的影響。但是，幻現或摩耶之說，已見於《梨俱吠陀》、《薄伽梵歌》與《奧義書》。《薄伽梵歌》認為現實的宇宙萬有是幻現，這種幻現出於「宇宙幻化的力量」。「無明」是知識性與主體性的，而「幻」或「幻現」則是本體論的概念。龍樹的《中觀論》也主張「無生」與空，一切事物皆由「他性」所組成。這些由「他性」所組成的事物，稱為「緣生」。「緣生」便沒有實在性，是有名而無實的。喬荼波陀與龍樹雖然均主張「無生」，但二者立論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前者以大梵為絕對本體，永恆不變。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而變只是幻現。後者所謂「無生」，則從「眾因緣生法」來闡述「無實在性」。大乘佛教針對「無明」而提出所謂「正覺」(sammaa-sambuddha)，甚或「無上正等覺」(anuttara-sammaa-sambodhi) 之菩提 (bodhi) 或三菩提 (sambodhi) 是「成道」之途徑，這原是指對法 (Dharma) 的開悟，並且體驗涅槃 (Nirvana，指解脫)。
- (4) 喬荼波陀認為，現象界乃梵天的幻現。個體自我一旦突破無明，不對幻境起執著，便能體悟大我與個體之間是毫無差別的，故謂大我與個體自我不二。大乘佛教有所謂「佛三身」，中觀派則只講法身與化身，天臺宗稱法身佛為毗盧遮那佛，法相宗以毗盧遮那佛為「自性身」，密宗視毗盧遮那即「大日如來」。「法

身」是自性的本體，不生也不滅，不來也不去，不死也不生，它是永恆，好像永遠是常在。「法身」是真正的本性，由此可進一步展開如來藏的「見性成佛」之論述。大乘佛教有所謂「法身佛」，與喬茶波陀所謂「阿特曼」(Ātman)之意義極為相似。且法相宗所謂「大圓鏡智」，與喬茶波陀所謂「超覺狀態」也相頗相近。進一步而言，大乘佛教如《大乘義章》所謂「後息妄想，彼法顯了，便為佛體」，此說又與喬茶波陀認為在「超覺狀態」下，吾人便能體認「個體自我」即真我「阿特曼」之說也非常接近。不過，大乘佛教的「法身」說與喬茶波陀所謂大我「阿特曼」也有差異之處，其中，最明顯的是「阿特曼」或「大自在天」以其摩耶(māyā)之力幻現萬有，而「法身」則否。

- (5) 佛教所謂應化身，基本上是指釋迦牟尼應所化的衆生而化現，生身王宮，度化世間衆。婆羅門教有「化身」之說，此說比佛教應化身更早。例如，原屬於《摩訶婆羅多》的《薄伽梵歌》中的黑天，乃毗濕奴的「化身」。從時序方面說，《摩訶婆羅多》約成書於公元前四至五世紀，較大乘佛教約早五百年，故大乘佛教所謂「法身」及「應身」之說，可能源自婆羅門教的本體實有論(onto-theo-logy)與「化身」說。
- (6) 喬氏認為，真實的狀況是「梵」，也是唯一的真實性。大梵是無生、無眠、無夢、無名相、永遠燦爛與全知、沒有動作與不變現。梵既然是不生不滅的，而世界就是梵，故事物不會有生滅。這其實是說，絕對本體是永恆不變的。他以「無限空間」比喻阿特曼(Ātman,大自我)，並以瓶中的空間比喻個體自我。在這個意義下，梵存在於個體自我中，有如空間存在於瓶中。當瓶子被打破後，瓶的空間便與整體空間合而為一，個體靈魂與大自我之關係亦然。
- (7) 《奧義書》將梵天定義為「真實、知識與無限」，有時又將梵天稱作“Sacchidānanda”(सच्चिदानंद) <sup>134</sup>，這是由「實有」、「意識」及「福樂」所組

<sup>134</sup> 「奧義書時代」，以「實在、知識及無限」(satyaṁ jñānam anantam)來表述梵天的本性(本質)，這句名言有時也稱作「真理·意識·幸福」(又被簡稱為 सच्चिदानंद, Satchitananda)，它是由三個梵字組成，即“सत्”(Sat, 真正, 實有; “चित्”, Chit 及 “आनंद”, Ānanda)。其中, “Chit”指純粹意識體, “Ānanda”指快樂幸福, 而“Sat”則指「真正實有」(True Being), 相當於柏拉圖對話錄中的“ontos on”, 而永恆且無限的「真正實有」就是「真理」, 故“Sat”也可譯作「真理」。由“Bráhmaṇ”一字又演變出 “brahmán”一字(陽性), 是指祭司, 表示與“Bráhmaṇ”有關的人。

成。梵天是不變、無限、內在與超越的實在體，祂是一切物質、能量、時間、空間、及宇宙內外任何事物之根基。梵天又分別被不同的《奧義書》視為具人格、非人格或超越人格。《奧義書》的開悟者深信解脫者的靈魂能實現梵我合一之境。《薄伽梵歌》是藉黑天與般度家族的王子阿周那之間的對話，闡述達至完美或最高的境地，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喬荼波陀本者婆羅門教的「實有神學」，是一種「萬有在神論」，所謂「一切即一」或「一切是梵」，其意義即指不同途徑皆能達至梵。世界是梵之身體，而個體自我又與梵沒有差別，因而被視為「不二吠檀多」的先驅。<sup>135</sup>

- (8) 一般論者認為《喬氏釋義》是受大乘佛教的影響，撰者則認為喬氏企圖統一正統派與大乘佛教之間的分歧，認為大乘佛教的思想可達至「不二論」。喬荼波陀肯定「實有」，這就是「梵天」，而「梵天」的實在性正是原始佛教及「中觀論」者所反對的。但是，大乘佛教的《華嚴經》卻提出毗盧遮那法身佛作為世界本體<sup>136</sup>。毗盧遮那意指光明遍照，在佛為清淨法身，在人為本覺妙性，此其實即「梵我不二」。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華嚴經》的編撰，大約在公元 2-4 世紀中葉之間，最早流傳于南印度，以後傳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但是，「梵我不二」乃奧義書的基本概念，其出現的時間是在公元 2-4 世紀之前，較《華嚴經》的編撰更早。這不但說明《喬氏釋義》不是受大乘佛教的影響，而是大乘佛教受到婆羅門教的經論所影響。更有甚者，既然大乘佛教強調「眾生皆有佛性」，但此義又已涵蓋於「梵我不二」之中，則大乘佛教根本思想便不外於婆羅門教之中，這也可能是佛教自七、八世紀期間，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喬氏釋義》的〈熄滅火把章〉中所謂「熄滅火把」，可能暗指熄滅佛教，並將之納入吠檀多之中。

<sup>135</sup> 關於「梵」的概念，詳見撰者之〈婆羅門教的「本體神學」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Onto-theology of the Concept of Brahman in Brahmanism)，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卷，pp.357-428。

<sup>136</sup> 《八十華嚴》，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普賢三昧品第三〉謂：「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坐蓮華藏師子之座，承佛神力，入于三昧。此三昧名：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眾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漩，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435-46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435-462

# 日本における失語症者の言語回復過程 の一考察

紀朝榮\*

## 日本失語症者語言復原過程之考察

##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Recovery Process of Japanese Aphasics

by  
Chi Chao Lung

キーワード：失語症，運動失語，Bilingual aphasics

關鍵詞：失語症、運動失語、雙語失語症者

**Keywords:** Aphasia, motor aphasia, Bilingual aphasics

---

\*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專任講師

## 〔要旨〕

高齢化社会に伴い失語症にかかる人が増え続けている。国際化と言われる社会になってから 2 カ国語使用者の失語症に対して、どう扱うのかを重要視している。先行研究を調べた結果、近年、特に中国語と日本語の両言語使用者の失語症例が殆ど見られなかった。そのため、本稿を症例の 1 つとして報告することにする。

## 〔提要〕

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失語症者持續的增加著。尤其在國際化社會的當今，如何面對使用雙語的失語症者，更值得重視。經查閱文獻後發現，近年來使用華語與日語「雙語失語症者」的案例幾乎沒有，於此就其中一個案例加以報告。

## Abstract

In an increasingly ageing society,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aphasia continues to grow. In the context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society,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bilingual aphasics becomes especially importan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documentation of cases involving aphasics who use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This report presents a study of such a case.

## 一、序論

### (一) 失語症とは

失語症とは大脳の優位半球に損傷を受けた結果、それまで正常に働いていた言語符号の操作機能に破綻が生じた状態をいう。最近、高齢化社会になって老人が増加してきたので、失語患者も増加の傾向にある。なお、失語患者にとっての最大の問題は言語を用いて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障害である。この障害は、その人の家庭生活や職業生活、あるいは精神心理的状态など、生活のあらゆる側面に多大な影響を及ぼすものである。従って、近年は失語とそれに関連する分野の研究が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

失語症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これまで数多くの優れた研究がなされ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今なお、幾多の未解決の問題が残されている。

最近では、国際交流が盛んになりつつあり、二つ以上の言語に精通した人もかなり増えてきた。一方、こうした人達が失語症にかかった場合、その回復の機序は普通の人とはどう異なるのかは注目されてきた。

Bilingual aphasics の研究は主として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圏でなされ、初期の研究者達は Bilingual aphasics の二つの言語のうち、どちらが先に回復されるかという点に興味を抱いていた。そして、自分の症例に当てはまる法則を提唱した。例えば、Ribot 法則、Pitres 法則、Minkowski 法則などがある。

### (二) 本研究の目的

日本では、綿森・笹沼(1976)の報告を始め、Bilingual aphasics に関する論文がいくつか発表されており、いずれも日本語・英語型の研究である。

筆者は日本語・中国語型の Bilingual aphasics の症例を見る機会を得たため、本研究では、このケースの言語理解面（音声言語と文字言語の理解）に重点を置いて、いったい中日二ヶ国語の回復側面はどう違うのか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する。

## 二、Bilingual aphasics に関する研究法則

前に述べたように、Bilingual aphasics についての研究は主として英語圏に属する国でなされているが、今までいくつかの法則が考えられてきた。

### (一) Ribot 法則

2つの言語のうち、最初に獲得された言語は、その後獲得された言語より失語症に対する抵抗力が強く、回復されるのも容易である。

### (二) Pitres 法則

失語になる前に、その患者が最も多く用いていた言語が最も早く回復するという習慣の強さの原理である。

### (三) Minkowski 法則

Ribot 法則にも、Pitres 法則にも当てはまらない患者がいることから、特定の言語に対する患者の情緒的、感情的価値観が、失語症からの回復に際して重要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原則が、実際の失語症患者にどう当てはまるのか、また、言語習得の状況と失語症の本質との間に何らかの関連があるのかという点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Lambert と Fillenbaum はカナダのフランス語・英語の Bilingual aphasics と、これまで報告されているヨーロッパの Bilingual aphasics を比較研究した。彼らは Bilingual の人の言語習得に関して、Osgood と Ervin が提唱した理論的仮説を取り上げている。すなわち、言語習得の状況によって、Compound Bilingual（時間的にも、環境的にも同じ状況下で2つの記号体系を等価なものとして習得する場合）と Coordinate Bilingual（時間的あるいは環境的に異なった状況下で2つの記号体系を習得する場合）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失語になったとき、Compound Bilingual では、2つの言語がほぼ均等に侵されているが、Coordinate Bilingual では、いずれか1つの言語がより選択的に侵されている可能性を含むと考えられる。Lambert と Fillenbaum の研究結果

は、この仮説を支持し、また、言語習得の状況が失語症による言語機能の障害のされ方とかなり関わりの深いもので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 三、研究対象

### (一) 症例の紹介

本研究の対象となるケースは、脳出血によって運動失語を呈している2カ国語（日本語・中国語）使用者の男性である。右片麻痺が見られ、上肢機能は右手の作業が不可能で、左手を使用している。一方、下肢機能は室内移動は杖なしで可能であり、短時期であれば移動作業ができる。また、杖にすがれば、階段（2階まで）を上ったり、下り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二) 入院経過

本ケースは、脳出血後、直ちに病院まで運ばれ、手術を受けた。1ヵ月後に別の病院に転院し、リハビリを続けて受け、5ヶ月後に再び転院した。その後9ヶ月間同病院でリハビリを受け、現在自宅で療養中である。

### (三) 生活史

本ケースは日本で生まれ、二歳の時（1940年）に両親と一緒に中国の東北地方に渡って、35歳までずっと中国に在住していた。家族の話によると、中国の小学校で教育を受け、小学校に3年ぐらい通ったようである。家族構成は、上に姉が2人おり、現在上の姉は日本国の永住権をとって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いる。また、姉の子どもも一緒に戻ってきているので、現在3人で暮らしている。家庭では主に中国語で話している。

患者の言語様式について言えば、幼い時に父母とも亡くなったため、中国人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た。当時の環境では日本語を話すことは禁じられていたので、家庭での共通語は中国語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患者は日本人といっても、中国語を母国語と

し、かつ最も流暢に話した。35歳の時点で、患者は日本に戻ってくる機会を得て、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から日本語を習い始めた。最初は小学校に1年間通って、後は独学で日本語を覚えた。病変まで12年間の日本社会生活の経験を持ったから、日本語はある程度達しているようだ。上に述べたように、この症例は *Coordinate Bilingual* 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る。病変が起こるまで、患者の中国語と日本語は両方とも達者といえるが、失語症にかかったため、現在2カ国語とも話せない状態である。一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手段は主として身振りや手で行うのである。

職歴については、中国にいた時、ある工場の管理職を務めることがある。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から通訳などの職を転々とし、最後に食堂経営を決め、発病までコックをやっていた。話によると、発病前の患者は酒が大好きだったようだ。他に特別な趣味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彼の性格は人に使われるのが嫌いなので、管理職を務めるのは一番ふさわしいと思われる。しかし、今の本人は前とは別の観がある。情緒の面はかなり落ち込んでいるようだ。

#### (四) 退院直後の行動（発症後1年2ヶ月）

長期の入院生活から解放され、精神的な面においては、割合穏やかだと感じられた。しかし、家庭生活を送りながら、自分のハンディキャップをつくづく感じたらしく、前よりももっと暴れるという話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精神的な変化はどう変わるのかも注目すべき課題だと考えられるが、本研究では主として言語の回復について検討しようと思うから、この問題を省略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う。

ところで、患者の退院直後の行動はどうなるのかをまとめて見ると、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見られる。

1. 家庭で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一方通行なのに、笑い話を聞いたとき笑う行動が見られる。
2. 欲しいものがあれば、指で物を指す行動が見られる。
3. 家に戻ってきてから、一語も話さない。ただ一回ぐらい自分の名前を書いただけである。
4. テレビを見る時間は大幅に増え、行動が不便なため、テレビを楽しむしか仕方

がない。

5. 家は二階にあるため、散歩に出かけるとき、杖によって移動することが可能だが、散歩の範囲はアパートのまわりに留まっている。
6. 食事の時間には、用意されたご飯とおかずを左手で食べ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が、自炊の能力はない。

以上述べたように、患者には付き添いが必要な状態である。もし、看護者がいないと生活できないだろうと考えられる。一口に言えば、現状では自立することは非常に困難なのである。

## 四、言語訓練の経過と言語症状

### (一) 患者とのかかわり

筆者がこの事例を研究し始めたのは、患者が入院して1年2ヵ月後のことである。入院期間の治療語は日本語であった。後半に入って発症1年4ヶ月から1年8ヶ月まで治療語は中国語を中心にして実施した。発症後1年4ヶ月からの3ヶ月間は週一回、一回40分間程関わりを持ち、その後は週三回、30分間程度をもつことになった。

### (二) 言語症状

#### 1. その1（発症後5ヶ月）

日本語によるSLTA検査の成績は次の通りである（表1参照）。

表1：発症後5ヶ月の言語症状（SLTAの成績）

聴く	単語の理解 7/10 正解
	短文の理解 4/10 正解
	口頭命令に従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読む	漢字単語の理解 7/10 正解
	仮名单語の理解 1/10 正解
	短文の理解に従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書字命令に従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話す	呼称 (名詞) 1/10 正解
	動作の説明・語の列挙はできない
	まんがの説明はできない
書く	漢字単語の書字はできない
	仮名单語の書字はできない
	まんがの説明はできない
計算	加減算 1/10 正解
	乗除算はできない
復唱	単語の復唱 2/10 可能であった
	文の復唱はできない
音読	できない
書き取り	できない

表 1 で示したようにすべての言語様式にわたって重度の障害が認められた。特に発話面の障害が強いため、ブローカ失語と判定された。一方、患者の言語受容系（聞く・読む）のほうは表出系（話す・書く）より良いことがわかった。そして、発症後 1 年 8 ヶ月ごろの言語症状はどうだろうか。

## 2. その 2 (発症後 1 年 8 ヶ月)

今度は中国語で実施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 SLTA は次のように示している (表 2)。

ここに、言語症状 I と II を比較してみると、全般的に言えば、言語症状は回復に向か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ただし、急テンポで進むことではない。その両方の得点を表で示せば、表 3 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表 2 : SLTA の成績、発症後 1 年 8 ヶ月の言語症状

聴く	単語の理解 9/10 正解
	短文の理解 5/10 正解
	口頭命令に従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読む	漢字単語の理解 10/10 正解
	仮名单語の理解 (実施しなかった)
	短文の理解に従うことは 5/10 正解
	書字命令に従うことはできない
話す	呼称 (名詞) 3/10 可能



	動作の説明・語の列挙はできない
	まんの説明はできない
書く	漢字単語の書字はできない
	仮名单語の書字は実施しなかった
	まんの説明はできない
計算	加減算 6/10
	乗除算 3/10
復唱	単語の復唱 6/10
	文の復唱はできない
音読	できない
書き取り	できない

表1・2・3から見たように、全19項目の中で8項目の成績が向上し、特に計算と短文の理解（読む）の部分での改善が目立った。計算能力が良くなった理由は自然回復のほうが大きいと考えられた。というのは、筆者との関わりの間に計算能力の訓練は一つもやら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もちろん、計算能力は言語の表出と同一視さ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計算能力の増進は知能回復の証拠とも言えるだろう。なお、短文の理解という項目は大きな躍進を見せているが、2回目のテストは中国語で実施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ゆえに、患者にとって、仮名プラス漢語からなる日本語への理解は、すべて漢語からなる中国語の文より劣るといえる。

また、より分かりやすくするために、両検査の成績を図1のグラフで示すことにする。全般的に見れば、患者の回復振りは日本語より中国語のほうが良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が、もしSLTAを使わないで検査すれば、どのような成績がでるのかを検討してみようと思う。

表3：言語症状ⅠとⅡとの得点比較

	項目	得点		結果
		5ヶ月	1年8ヶ月	
聴く	単語の理解	7	9	△
	短文の理解	4	5	△
	口頭命令に従うこと	0	0	
読む	漢字単語の理解	7	10	△
	仮名单語の理解	1	※	

	短文の理解に従うこと	0	5	△
	書字命令に従うこと	0	0	
話す	呼称（名詞）	1	3	△
	動作の説明・語の列挙	0	0	
	まんがの説明	0	0	
書く	漢字単語の書字	0	0	
	仮名单語の書字	0		
	まんがの説明	0	0	
計算	加減算	1	6	△
	乗除算	0	3	△
復唱	単語の復唱	2	6	△
	文の復唱	0	0	
音読		0	0	
書き取り		0	0	

注) △：改善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す ※：実施しなかったことを示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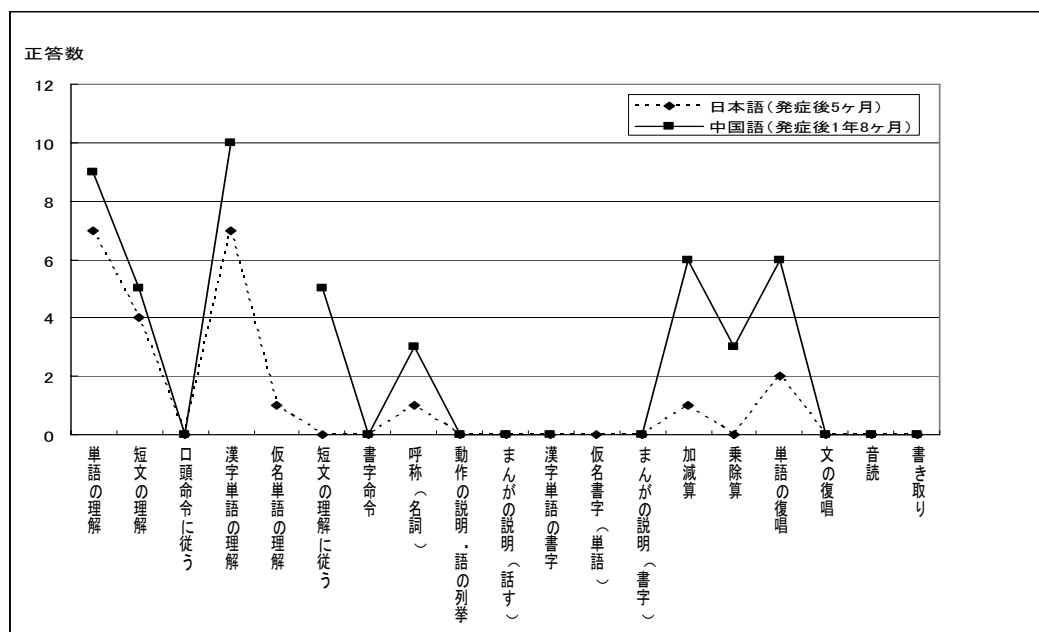


図1 言語症状ⅠとⅡとの比較

### (三) 聴認知と視認知との比較

患者の言語の回復過程がどのように現れてくるのかをみるために、単語の視認知と聴認知の比較をすることにした。同じ単語を提示した場合、聴認知と視認知とが同じレベルで回復するかどうかを検討するのが目的である。

#### 1. 検査用語

##### (1) 日本語 計 10 単語

りんご・たまご・すいか・とけい・じてんしゃ・バナナ・いちご・かき・ぶどう  
・パイナップル等

##### (2) 中国語 上と同じ計 10 単語

píngguǒ dān xīguā biāo jiàotāchē xiānjiāo cǎoméi shìzi pútāo bōluó  
蘋果・蛋・西瓜・錶・脚踏車・香蕉・草莓・柿子・葡萄・菠蘿

#### 2. 方法と検査時期

##### (1) 聴認知

りんごなどの用語を聞かせてから、絵カードにより回答を指し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る。聞かせるとき 1 語 1 回に限り、回答の認定については、すみやかに返答してきたのを正解と認める。そして、日本語の検査が終わったから引き続き中国語を聞かせてから返答をもらうという形で進めていった。

##### (2) 視認知

りんごなどの用語を 1 語ずつカード化にしておく。そして 1 枚ずつ見せたから絵カードにより正解を返答してもらう。見せる時間は 5 秒ぐらいとする。日本語の文字カードを見せたあと、中国語の文字カードを見せるわけである。

##### (3) 検査時期

検査時期を 2 回に分けて行ったが、1 回目は発症後 1 年 1 ヶ月半ごろに実施し、2 回目は発症後 1 年 2 ヶ月ごろに実施したも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して、検査した結果はつぎの通りである（表 4 と図 2 を参照）。

①中国語の聴認知と視認知はそれぞれ日本語より良好であった。

②中国語の視認知は聴認知より良好だし、日本語の視認知も聴認知より良好なこ

とがわかった。したがって、中国語と日本語を問わず、患者にとって視認知能力は聴認知より良好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また、検査時期をおいて検査した場合、成績のほうはどうなるのか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する。筆者は上と同じ材料を使用し、発症後7ヶ月と1年1ヶ月の両時期に検査を行ったが、聴認知の面において（言語音を聞かせてから絵カードの中から正解を指してもらおうという形で行ったものを言う）、明らかに1年1ヶ月現在の成績は7ヶ月ごろのそれより良好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表5と図3参照）。

表4：聴認知と視認知の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1年1ヶ月	発症後1年2ヶ月
項目	聴認知	視認知
中国語	7/10	8/10
日本語	3/10	5/10

注)分母は満点、分子は得点に表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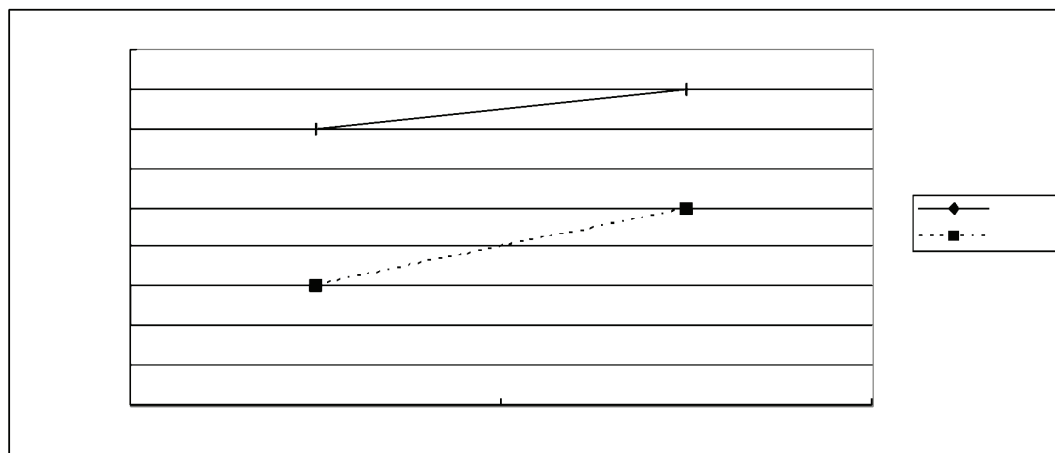


図2 聴認知と視認知との比較

表5：聴認知のみの検査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7ヶ月	発症後1年1ヶ月
中国語	4/10	7/10
日本語	2/10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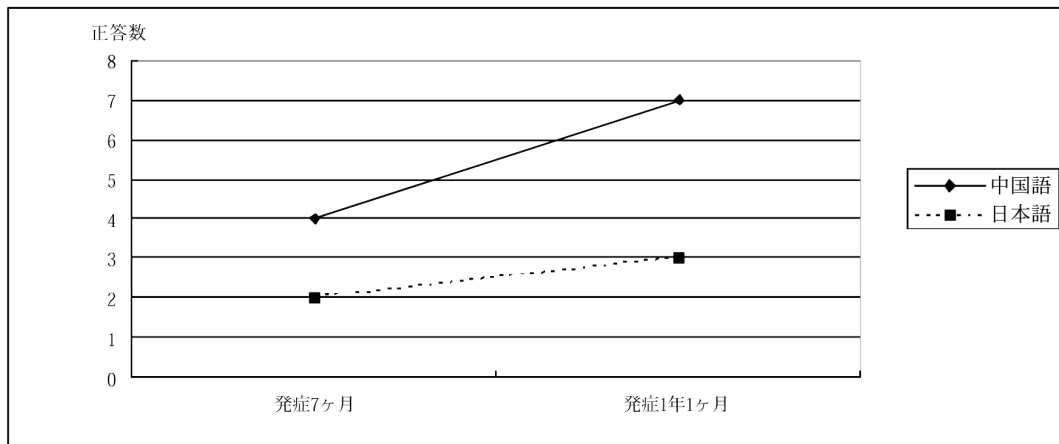


図3 聴認知のみの比較

#### (四) 単語別からみた聴認知と視認知

今まで述べられてきたデータから分かるように、患者の中国語の成績は日本語より全般的に良好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次に、検査用語を細かく分類して提示しても、上のような傾向が見られるかどうかを検討してみようとする。

原則として、筆者は次のカテゴリーを設定して、検査用語を選ぶことにした。

1. 動詞の用語
2. 数字の用語
3. 形容詞の用語
4. 体に関する用語
5. 動物の名前
6. 食べ物の名前
7. 交通機関用語
8. 果物の用語
9. 品物の用語
10. 色の用語

以下では、それぞれのカテゴリー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いこうとする。

## 1. 動詞用語の場合

筆者は表 6 のような動詞を選び出して、中国語と日本語でそれぞれの聴認知と視認知を検査した結果は表 7 と表 8 のように示している。また、図 4 と図 5 を参照とする。

この結果から分かるように、動詞の用語に関する聴認知と視認知はともに中国語のほうが日本語より良好であった、一方、言語ごとに検討してみると、中国語のほうは視認知より聴認知のほうがやや良好であるのに対して、日本語のほうは聴認知よりも、視認知のほうが良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また、視認知に関する回復様子を調べるために、筆者は時間をおいて発症後 1 年 2 ヶ月と 1 年半ごろに同じ用語で検査した。その結果をまとめたものが表 9 である。この結果より、視認知についての成績はあまり動きが見られない一方、日本語の成績は落ちてい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図 6 参照)。

表 6 : 語彙リスト

	日本語		中国語
1	立つ	1	站着
2	寝る	2	睡
3	起きる	3	起来
4	飲む	4	喝
5	降りる	5	下来
6	昇る	6	上来
7	書く	7	寫
8	笑う	8	笑
9	痛い	9	痛
10	泣く	10	哭
11	考える	11	想
12	歌う	12	唱
13	叩く	13	打
14	読む	14	唸
15	座る	15	坐
16	沈む	16	沈
17	食べる	17	吃
18	転ぶ	18	跌倒
19	歩く	19	走
20	怒る	20	生氣

表 7：動詞用語の聴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中国語	13/20
日本語	7/20

表 8：動詞用語の視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中国語	10/20
日本語	9/20

表 9：動詞用語の視認知得点（時間を置いた方）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発症後 1 年 6 ヶ月
中国語	10/20	11/20
日本語	9/20	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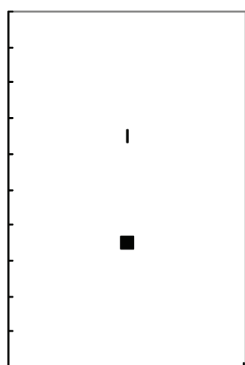


図 4 動詞用語の聴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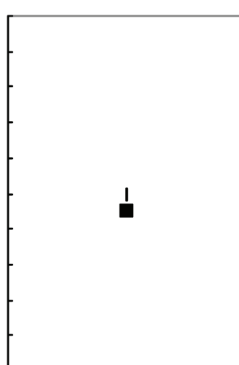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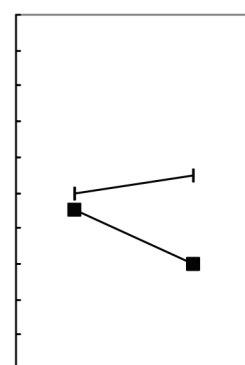


図 5 動詞用語の視認知

図 6 動詞用語の視認知  
(時間を置いた方)

## 2. 数字の場合

筆者は数字の 1 から 10 までを用いて検査をおこなった。この検査で聴認知と視認知に関する検査ともに実施した。

### (1) 数字の聴認知

筆者は 1 枚の紙に 1 から 10 までのアラビア数字を書き入れ、そして患者の前の机に置く。聴認知の検査は中国語と日本語と別にして行った。結果は次の通りである（表 10 参照）。表 10 から分かるように、数字に関する聴認知は中国語と日本語とも悪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表 10：数字の聴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発症後 1 年 6 ヶ月	発症後 1 年 7 ヶ月
中国語	1/10	1/10	0/10
日本語	1/10	0/10	0/10

(2) 数字の視認知

視認知を実施する際、筆者は上に述べられた紙を患者の机の上に置いていく。そして、筆者は自分の指を見せてから回答を求める形で進んでいった。結果は、患者がかなり良い回答をした、その得点は表 11 の通りである。

表 11：数字の視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5 ヶ月	発症後 1 年 6 ヶ月	発症後 1 年 7 ヶ月
成績	10/10	10/10	10/10



図 7 数字の聴認知得点



図 8 数字の視認知得点

上の図 7 と図 8 からみると、数字に関する視認知はかなり好成績を得たが、聴認知は対照的に低い結果となった。

なお、筆者は 1 から 10 までの文字カードをばらばらにしてから、患者に順番に並べてもらったところ、1 つも間違えなく並べた。つまり、患者の数字概念はある程度保っているが、聴覚による音声の入力は重度の障害があると言える。

視認知について、筆者は数字のカード（1 枚の紙にそれぞれ 1 から 10 までの数字が書いてある）と 1 から 10 までの数字の入ってある紙との対応検査は実施しなかったが、2 枚の文字カードを用いて見せたあと、“これはいくらになるか”と質問するとほとんど正解であった。例えば、1 と書いてあるカードと 2 の書いてあるカードを見せてから“いくらになるか”と聞けば、紙（1 から 10 まで書いてある）の上の数-3 を指



してもらった。あとは、2と3は5、2と8は10、6と5は11、11と5は16、20と5は25。

### 3. 形容詞の場合

筆者は検査用語として、12単語の形容詞を選んだ（表12参照）。

表12：形容詞検査用語のリスト

中国語	粗	細	大	小	長	短	多	少	圓	正方形	三角形	長方形
日本語	ふとい	ほそい	大きい	小さい	長い	短い	多い	少ない	丸い	正方形	三角形	長方形

形容詞用語の検査は聴認知を中心にして実施したものである。絵カードとの対応検査を2回にわたっておこなったが、その結果は表13に示した（図9も参照）。

表13：形容詞用語の聴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1年2ヶ月	発症後1年7ヶ月
中国語	2/12	5/12
日本語	2/12	8/12

上の表から見たように、中国語と日本語ともに伸びを見せているが、特に日本語の伸びは著しかった。残念なことに、形容詞の視認知はどうなるのかは都合により検査を行わなかったが、将来の課題の1つと考え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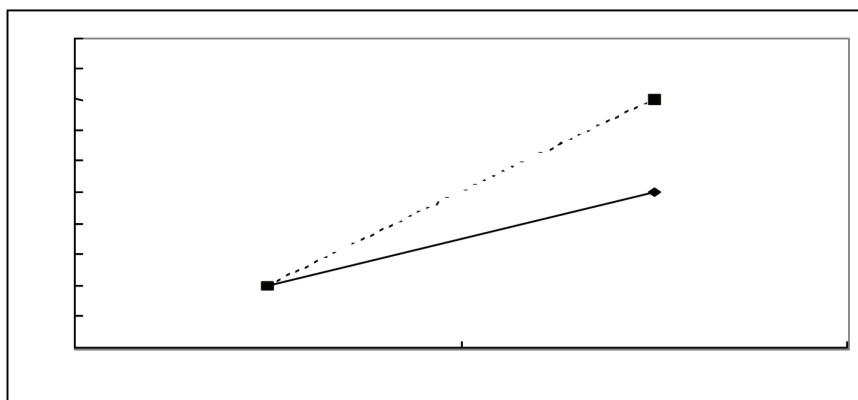


図9 形容詞用語の聴認知

#### 4. 体に関する用語

この項目も聴認知を中心にして実施した。全般的に、この項目の成績は悪かった。合計3回にわたって検査を実施した。その結果は表14に示した。

この項目を実施する際、筆者は人間の形を紙に書きいれ、そして見せながら正しい回答を指してもらった形をとって実施した。

め／<sup>yanjing</sup>眼睛、 歯／<sup>yachǐ</sup>牙齒、 あし／<sup>jiao</sup>脚、 はな／<sup>bizi</sup>鼻子、 顔／<sup>lian</sup>臉、 あたま／<sup>tou</sup>頭、  
くち／<sup>zui</sup>嘴、 むね／<sup>xiong</sup>胸、 まゆ／<sup>meimao</sup>眉毛、 耳／<sup>erduo</sup>耳朵、 手／<sup>shou</sup>手

表14：体に関する聴認知得点

検査日時	発症後1年2ヶ月	発症後1年6ヶ月	発症後1年8ヶ月
中国語	3/10	0/10	3/10
日本語	1/10	2/10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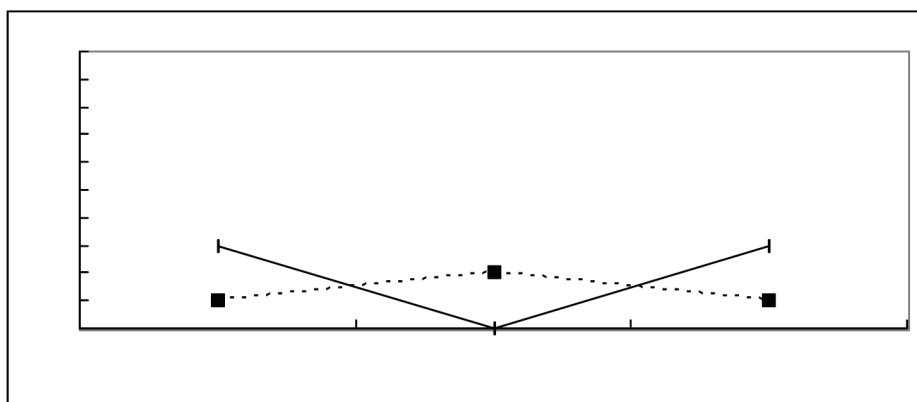


図10 体に関する用語の聴認知

上の表14と図10から見たとおり、体に関する用語の聴認知はかなり障害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改善の動きは感じられなかった。

#### 5. 動物の名前

動物用語について、2回にわたって行ったが、1回目の提示語は3単語、2回目の提示後は4単語であり、なお提示語は2回とも同じ用語を使用しなかったため、この項目についての成績はパーセントで示すことにした、

検査用語は 1 回目のときに（中国語）<sup>t u z i</sup> 兔子、<sup>chan</sup> 蟬、<sup>hou zi</sup> 猴子（日本語）兎、蟬、さるといった言葉を使用し、2 回目のときに（中国語）<sup>laoshu</sup> 老鼠、<sup>xiaoji</sup> 小鶏、<sup>ya zi</sup> 鴨子、<sup>xiang</sup> 象（日本語）ねずみ、ひよこ、あひる、象を使用した。その結果を表 15 と図 11 に表した。

表 15：動物の名前に関する聴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6 ヶ月	発症後 7 ヶ月
中国語	100	100
日本語	10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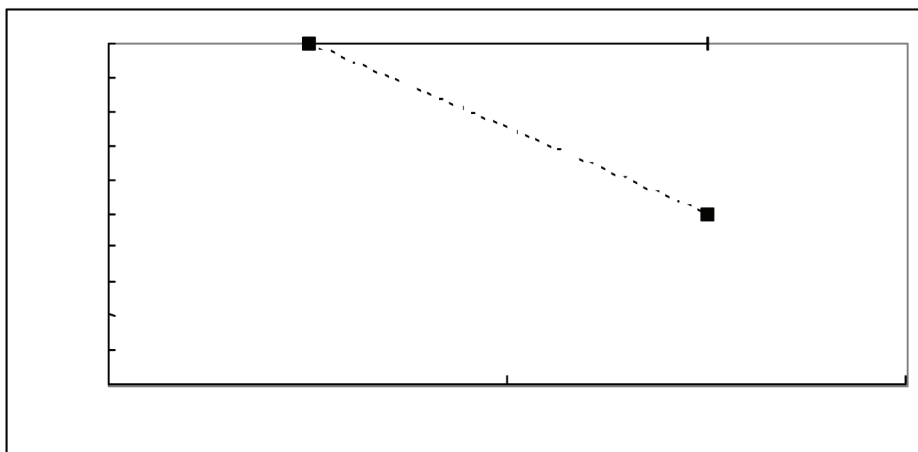


図 11 動物の名前に関する聴認知

この項目は好成績を見せているが、2 回にわたって実施するのに使用された用語は少ないので、客観性が乏しいと思う。もっと用語を増やして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 6. 食べ物の名前

この項目では、発症後 7 ヶ月の検査成績と 1 年 2 ヶ月半ごろの成績を取り上げて比較する。中国語と日本語をそれぞれ聞かせてから、絵カードにより回答を指してもらった。一回目と二回目の検査用語が違うので、それぞれの得点をパーセントに換算して示すことにする。その結果は表 16 と図 12 で示した通りである。

表 16：食べ物用語の聴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7 ヶ月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中国語	30	90
日本語	4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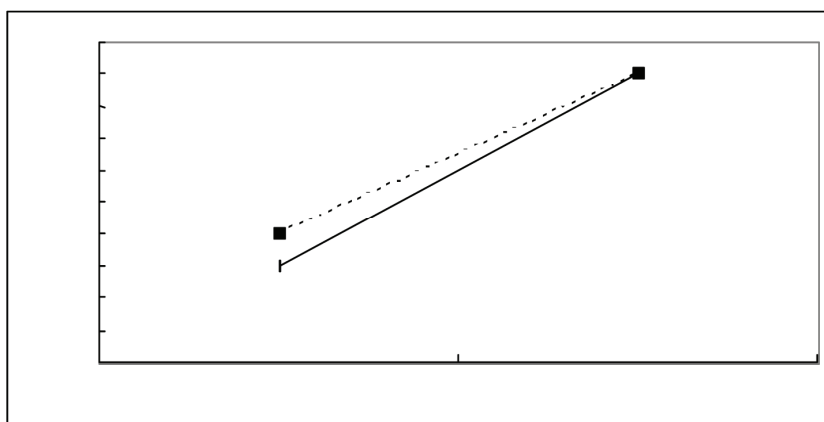


図 12：食べ物用語の聴認知

## 7. 交通機関用語

この項目では、発症後 6 ヶ月半の成績と発症後 1 年 2 ヶ月の成績を比較して検討してみた。

6 ヶ月半ごろの検査用語は（中国語）<sup>q i c h e</sup> 汽車、<sup>d i a n c h e</sup> 電車、<sup>x i a o f a n g c h e</sup> 消防車（日本語）自動車、電車、消防車、1 年 2 ヶ月ごろの検査用語は（中国語）<sup>c h u a n</sup> 船、<sup>h o u c h e</sup> 火車、<sup>d i a n c h e</sup> 電車、<sup>q i c h e</sup> 自動車、<sup>j i a o t a c h e</sup> 脚踏車、<sup>f e i</sup> 飛行機、<sup>j i g o n g g o n g q i c h e</sup> 公共汽車、<sup>x i a o c h u a n</sup> 小船、<sup>k a c h e</sup> 卡车、<sup>m o t u o c h e</sup> 摩托车（日本語）船、汽車、電車、自動車、自転車、飛行機、バス、ボート、トラック、オートバイ等である。

検査結果は次の通りである（表 17、18、図 13、14）。

表 17：交通機関用語の聴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6 ヶ月半
中国語	100
日本語	70

表 18：交通機関用語の視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中国語	80
日本語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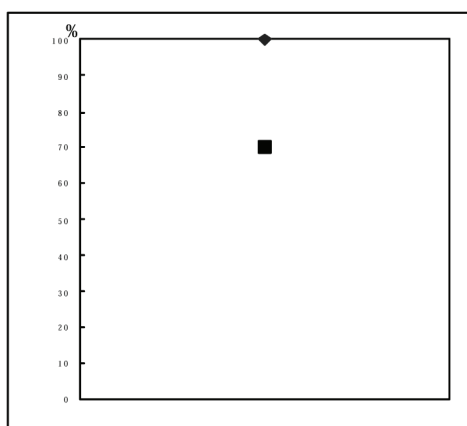


図 13 交通機関用語の聴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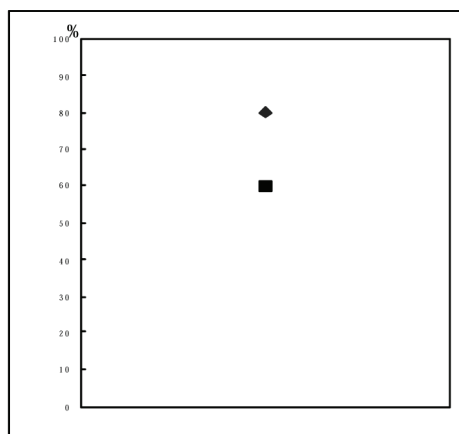


図 14 交通機関用語の視認知

上の表から見て分かるように、聴認知にしても、視認知にしても中国語のほうは優位に立っている。

## 8. 果物用語

筆者は発症後7ヶ月と1年6ヶ月の検査成績を述べることにする。

7ヶ月の検査用語はバナナ、西瓜、いちご、柿、葡萄、パイナップル等である。

1年6ヶ月の検査用語は

- ① 中国語の sī zǐ 柿子、táo zi 桃子、lǐ zi 栗子、jú zi 橘子、pú táo 葡萄、xiāng jiāo 香蕉、bō luó 波蘿、xī guā 西瓜を選んだ。
- ② 日本語のかき、くり、りんご、ぶどう、パイナップル、バナナ、すいかを選んだ。

筆者は上の用語を使用し、患者の聴認知能力を検査した結果は次の通りである（表 19、図 15 参照）。一方、視認知の回復様子はどうかを調査したところ、次のような結果がでた（表 20、図 16 参照）。視認知の検査用語は中国語と日本語の両検査は同じ用語を使用した。検査用語は、かき、もも、くり、いちご、みかん、すいか、ぶどう、りんご、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である。

表 19：果物用語の聴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7ヶ月	発症後1年6ヶ月
中国語	30	40
日本語	10	50

表 20：果物用語の視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発症後 1 年 6 ヶ月
中国語	80	60
日本語	3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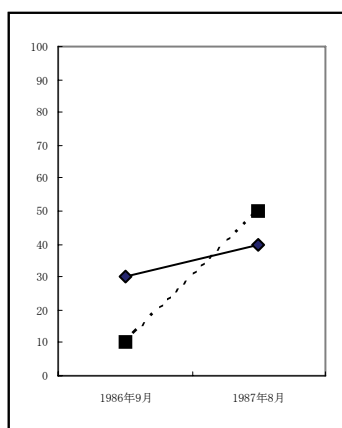


図 15 聴認知（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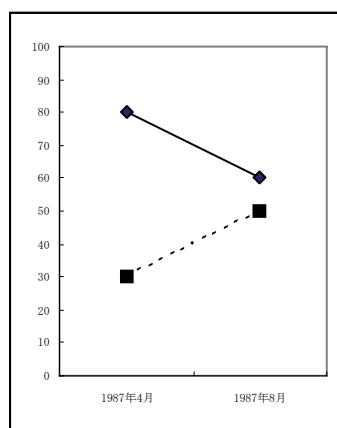


図 16 視認知（果物）

## 9. 品物の用語

品物用語についての回復過程について、発症後 7 ヶ月と 1 年 2 ヶ月と 1 年 8 ヶ月の 3 回に分けて検討する。その 3 回の検査に使われた検査用語はそれぞれ違うため、結果はパーセントで示すことにする（表 21、図 17 参照）。

表 21 から分かるように、品物用語の回復は進んでいるが、動きは穏やかである。なお、中国語のほうはやはり優位に立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表 21：品物用語の聴認知（単位%）

検査日時	発症後 7 ヶ月	発症後 1 年 2 ヶ月	発症後 1 年 8 ヶ月
中国語	45	55	70
日本語	30	40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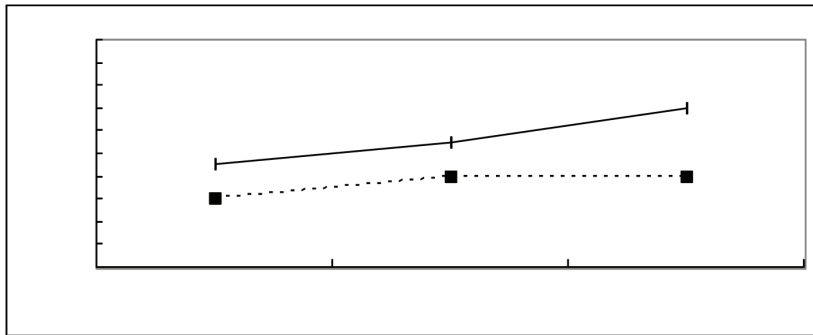


図 17 : 品物用語の聴認知

### 10. 色の用語

筆者は（中国語）<sup>hongse</sup>紅色、<sup>huangse</sup>黄色、<sup>luse</sup>綠色、<sup>heise</sup>黒色、<sup>lanse</sup>藍色（日本語）あか、きいろ、みどり、くろ、あおの色用語を使用し、検査した結果は表 22、図 18 に示した。この結果から、色の用語は2カ国語ともにひどく障害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表 22 ; 色用語の聴認知(単位 ; 個)

検査日時	発症1年8ヶ月（一回目）	発症1年8ヶ月（二回目）
中国語	1/5	0/5
日本語	2/5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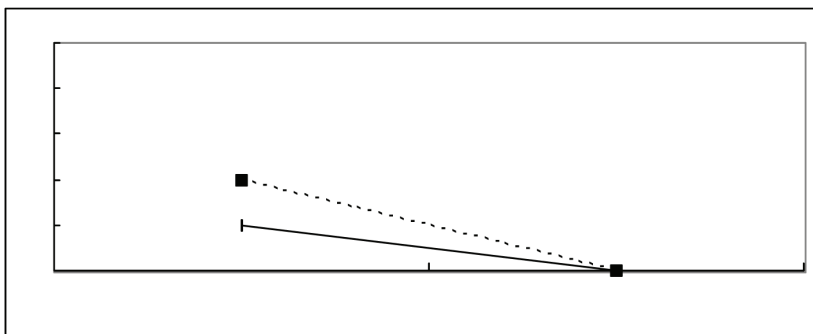


図 18 色用語の聴認知得点

### (五) まとめ

以上のように、筆者が設定したカテゴリによって検査語を設定し、検査用語の

それぞれの結果について、聴認知と視認知を同時に検査していくのは回復過程をみていくことを原則とした。この10項目のカテゴリについてのデータを見たところ、次のようなことがわかった。

1. 全般的に言えば、母国語である中国語の認知能力は後に習得した日本語より良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2. 視認知と聴認知とに分けて検討してみると、
  - (1) 動詞の場合には、視認知と聴認知はあまり差が認められなかった。
  - (2) 数字の場合には、視認知は聴認知よりかなり良好であった。
  - (3) 果物と交通機関用語の場合、果物では視認知が優位に立っているが、交通機関であまり差が認められなかった。
3. 聴認知のみまとめてみると、食べ物用語はトップに立っているが、それ以外の成績は順番に述べると、交通機関・物品・果物・動物・体・数字という順番になっている。
4. 漢字の視認知は仮名より良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5. 数字についての認知能力は、聴認知では数字の成績が一番悪かったが、視認知では逆に一番良好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

日本語の重症度は中国語より大きい、病気直前の12年間、日本語は生活用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たが、最初に獲得された言語の中国語は失語症に対する抵抗力が強いため、回復されるのも容易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のことはRibot法則に当てはまる。

## 五、結語

この症例はいわゆるCoordinate Bilingualであり、異なった状況下で二つの言語習得は獲得している。現在、患者は日本に在住しており、日本社会の中で生活を送っているが、脳卒中の後遺症による行動の不便により、ほとんど一日中家にいるため、社会との接触はテレビの日本語情報だけだと言える。家庭では中国語を中心として生活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彼の思考メカニズムはやはり中国語的な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従って、中国語による刺激のほうが患者の言語の回復に役立つと考えられる。



このことを考慮して、患者の訓練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Bilingual の場合、その2カ国語をともに使用するためのメカニズムは大変複雑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Bilingual の失語者にとっては、その二つの言語をともに使用する量はかなり負荷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この患者が現在の生活環境の中で、日本語の刺激と中国語の刺激をともに受けることが、幸いなのか不幸なのかをよく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二つの言語を使用することが患者にとって負担が大きければ、やはり一つの言語にしぼってその言語での環境作りを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患者は母国語として中国語を覚えている。従って、言語の理解と表出の改善のためには中国語に力を入れたほうがいいだろうと筆者は考えた。様々な試みの結果、患者の理解面においてはある程度の改善があり、今後の回復の望みがあるが、表出面においてはまったく改善が認められず見通しが立たない状態である。上の検査結果は、教育的な効果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うよりも、自然回復の結果である可能性が強いと考えられる。というのは、患者の学習態度が消極的であって、得られた訓練時間以外に自分で自己訓練をしようとする気持ちもまったくない状態だからである。この患者は重症であり、学習効果（特に表出面の効果）がなかなか認められないので、学習すればするほど学習意欲がおち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自分の状態は自分自身一番わか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れであればこそ彼にとって生きる意味は何であるかを自分自身に問う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るし、この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た彼自身の悔しさも理解できる。もし家族や周囲の人が特に面倒を見てあげなければこのケースに限らず、おそらく生きていく勇気を失うだろうと考えられる。したがって、失語症を扱うときには援助方法として、医学的なレベル以外に、教育的・社会福祉的・心理学的な視点をそろって考慮しなければ完璧な回復（精神的および生理的の両方の回復）を図ろうとするのは難しいと考えられる。

## 六、残された課題

### (一) 言語の側面

患者は発症後現在に至るまで2年経過したが、言語表出面においてはゼロの状態にある。このような事実を踏まえて、言語表出を促進することは非常に難しいと考えられる。上に述べたように、もし本人の学習意欲が薄いとか、発声器官の麻痺による制限があるなどの心理的な要素と生理的な要素を取り除くことができない場合には、言語の表出を望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思う。したがって、今後心理的な励みとなるものを何よりも大切なことであろう。

書字による言語表出は、障害はされていてもある程度は残っているので、今後これにしばって学習を進めて行く方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 (二) 環境的な側面

#### 1. 言語環境について

現在、家庭で使用されている言語は中国語が中心であるが、周りの人々や中国語のできる友人から話しかけられる機会が少ないため、言語環境として良好であるとはいえない。したがって、家庭内での会話の量や、内容が限られている以上に、中国語のテープなどを補助教材として聞かせれば、聴認知の回復に役立つだろうと考えられる。

#### 2. 生活環境について

患者は現在アパートの2階に住んでいるが、運動失語によって日常動作に不便を生じている。また、このアパートには風呂場がついていないので、銭湯へ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のための行動に支障がある。ゆえに、生活環境の改善は目下問題として留意するべき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失語症は本人にとって不幸であ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が、その家庭に対する影響も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われる。家庭の破壊はすなわち社会の破壊とも

言えるので、国がそのような人達にどのような援助を提供したらよいかということは、社会問題として提起されるべきことであると思われる。従って、こうした人達に対する国の援助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は今後の研究課題として注目し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いる。

## 参考文献

1. 永渕正昭：『言語障害概説』 大修館 東京 1985
2. 綿森淑子、笹沼澄子：『Bilingual 失語症 2 例の言語治療経過』 脳と神経 28 1976
3. 大橋博司：『失語症』 虫害医学双書 東京 1976
4. 大橋博司：『神経心理学の最近の話題から—二言語併用の失語をめぐって—』 臨床精神医学,8 1979
5. 渡辺修三他：『博言家の失語症について—神経心理学的考察』 神経進歩 26 1982
6. 渡辺俊三訳、M・ミンコフスキー：『博言家の失語症への臨床的寄与、とくにスイス訛のドイツ語についての考察 神経心理学の源流、下』 創造出版 東京
7. 杉本啓子、宮下孟士、山口武典、峰松一夫、里美真美子：『純粹失語を呈した polyglot の一例』 失語症研究 Vol.2 No2 1982.9
8. 三宅徳嘉：『言語学辞典』 大修館 1972
9. 田中春美：『言語学のすすめ』 大修館 1978
10. 岩田誠：『脳とことば』 東京大学公開講座 37 1983
11. 笹沼澄子：『失語症の言語治療』 医学書院 1978
12. 大橋博司：『失語・失行・失認』 金原出版会社 1982
13. 長谷川恒雄：『失語症の基礎と臨床』 金原出版会社 1980
14. 笹沼澄子、永江和之訳：『成人の失語症』 医学書院 1971
15. 笹沼澄子編：『失語症とその治療、ことばの障害 2』 大修館 1979
16. 上田敏：『リハビリステーションを考える』 青木書店 1983
17. 小島美都子：『身体障害者福祉』 ミネルヴァ書房 1980
18. 小島蓉子：『社会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 誠信書房 1979

19. 大川嗣雄：『障害者の医療と療育』 光生館 1987
20. 杉木守弘：『脳とこころの対話』 青土社 1986
21. 笹沼澄子他編：『失語症の記録』 大修館 1985
22. 長谷川恒雄他：『失語症全国実態調査報告』 失語症研究 Vol 1 1981

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  
学習者が使い続ける日本語の意義——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  
の母語定義の観点から—

松尾 慎 横川 彰\*

日本語對日本殖民時期受日本語教育的  
台灣人而言意義為何？

What's the meaning of Japanese to those  
Taiwanese who got Japanese education  
under Japan's colonial rule?——  
From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s definition of mother tongue

by

Shin Matsuo Akira Yokokawa

キーワード：母語、日本植民地時代、日本語教育経験者、言語接触

關鍵詞：母語、日本殖民時期、受日本語教育的台灣人、語言接觸

**Keywords:** mother tongue, Japan's colonial rule, Taiwanese who got Japanese education,  
language contact

---

\* 松尾慎，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横川彰，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 〔要旨〕

戦前の台湾においては、日本統治下での国語教育、そして戦後の国民党政府による北京語の国語化などの度重なる言語接触が行なわれ、人びとの生活に欠かせない言語の使用状況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した。現在においても若年層の郷土言語教育、英語教育の推進の影響で言語に対する意識に変化が起り続けているとも考えられる。

本稿では、そのたび重なる言語の接触を経験した世代、所謂、日本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経験者に注目し、彼ら、彼女らにとっての「母語」とは何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調査の協力をしてもらった上で、アンケート、及び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実施した。そして彼ら彼女らの「母語」が時代ごとによって、どのような転換を成し遂げてきたのかを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 の 1989 年の論文、『‘Mother Tongue’ : the Theoret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にある母語の定義、概念と照らし合わせながら考察をした。

Kangas&Phillipson は、「母語」の定義の基準を「起源」「能力」「機能」そして「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 4 つに大別している。この定義に基づくと調査協力者が持つ「母語」とは一つに限らないことが分かった。また、「母語」は人の生涯のなかで変わりうることも明らかになった。

## 〔提要〕

二次大戦前日本統治下の台湾，以日本語爲國語教育人民；二次大戦後國民黨政府則以北京話爲國語。語言接觸的變化使人們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使用有重大的變化。現在郷土語言教育及英語教育爲學校教育的一部份，語言意識的變化也影響著年輕的一代。本文專注於日本殖民時期受日本語教育的台灣人，在經過多次語言接觸的經驗後，對於母語的認同爲何？本文使用訪談及問卷的方式來驗證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 1998 年的論文“Mother Tongue: the Theoret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中對母語的定義及概念。根據 Kangas 及 Phillipson 對母語的定義準繩爲「起源」

「能力」、「機能」及「認同」四類。經分析後得知受訪者的母語不只一種，而且一生中母語會有所改變。

## 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I, education was taught in Japanese under Japan colonial rule, but it was changed into Mandarin after World War II under Kuomintang (KMT) governorship. Taiwan had to face new language contact more than one time; i.e., the language people used for daily life had changed a lot. Nowadays,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to school system and English educ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required subjects in Taiwan. Therefore, language conscious also has influence over young gene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who got Japanese education under Japan's colonial rule and had language contact more than one time and investigates what they think their mother tongue is after interviewing them and conducting a surve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efinition and concept of mother tongue according to the thesis of Tove Skutnabb-Kangas/Robert Phillipson, "Mother Tongue": the Theoret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1989) According to Kangas & Phillipson, criteria for defining mother tongue include Origin, Competence, Fun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es have more than one mother tongues, and the interviewees' mother tongue can change during their life-time.

## 1. 研究の背景と目的

一家三代二国語光復節<sup>1</sup> 頼天河 司馬 (1997:92)

上の句は台湾においての一家の言語事情を表しているが、祖父母は日本語を、孫の世代は北京語<sup>2</sup>を国語とし、その両世代に間に挟まれる世代は余り流暢ではない北京語を使用するというのだが、この一世紀に渡る台湾での言語の遍歴は二度に渡る大規模な国語政策で大きな変化を遂げ続けた。

1895年から1945年の50年間に渡り日本政府によって日本語が国語として推進された。この政策により、本来の使用され続けていたことばであるホーロー語<sup>3</sup>、客家語、原住民諸語などは軽視された。日本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敗戦により、日本政府と入れ替わるような形で中国大陸から来た国民党政府が台湾を統治することになる。人びとの移動と共に北京語が流入し、台湾の新たな国語として強要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ただ政治的に翻弄され、日本と中国の「国語」のために、台湾方言は百年間に近く抑圧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る」蔡(2008:1-2)。これら当時の政治の力、及び人の移動などによってその土地のことばの環境は大きく変化をする。国語は政府、学校教育の場、そしてメディアなどで幅広く普及されるために本来の人びとが持つことばの使用が制限される。ただ、国語の普及が進む一方、使用の制限がされ続けていることばは家庭を通じて引き継がれてもいる。近年、「母語」＝「母国語」という考えを持つ人が少なくない。そうした考え方は、国家による民族意識と国家イデオロギーを定着するために、一国家＝一言語を理想とし、言語マイノリティを造りだすシステムに起因している。しかし、冒頭に挙げた句のように同じ家族間の会話でもお互いの「母語」を使うことが出来ない例も多々、見られる。土地を管轄しているその時代の政府の政策などで人びとの使用言語が別のことばに移り変わることは少なくない。これらの変化は人びと

---

<sup>1</sup> 台湾において光復と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台湾が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から解放されたことを指す。中華民国政府は、1945年10月25日に台北市の中山堂で日本の降伏式典を行った。

<sup>2</sup> 本稿では現在の台湾の「国語」を北京語と称する。

<sup>3</sup> 台湾語、閩南語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が本稿ではホーロー語（河洛語）と記述することにする。



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なのであろうか。人びとが日常の生活を通じてどのようにことばと接し、また接することにより、自分のことば、または他者が使うことばを認識していくのだろうか。

人が携える「母語」の一つの側面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本稿では先に述べたように台湾に住む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語教育を経験者した人びとの言語使用背景、歴史的背景を考察するにあたり、調査協力者にアンケートの質問に沿う形で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実施した。具体的な研究の目的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 (一) 人が持つ「母語」は人の一生のなかで不変的なもの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
- (二) 人が持つ「母語」は一つだけに限られるのかを考えること
- (三) 台湾において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人びとの言語使用状況の遍歴を考察すること

## 2. 母語に関する先行研究

1981年に出版された『ことばと国家』のなかで著者の田中克彦は、「母語」とは、「生まれてはじめて出会い、それなしには人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たひとたび身につけてしまえばそれから離れることのできない、このような根源のことばは、ふつう母から受けとるのであるから、「母のことば」、短く言って「母語」と呼ぶことにする」田中（1981:29）と母語に対しての考えを述べている。

一方、山本他(2004)は、前述した田中の「母語」に関する考えに対して、「人間と言語との関係を表すのに、<母>という文字を使うのは、単に赤ん坊が母親のおっぱいを飲みながら聞くことばだから、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は説明がつかないであろう」山本他（2004：145）と「母語」の概念をより深く、そして厳密に定義する必然性を指摘している。

「母語」とは一人の人間に対して一つだけのことばと言うよう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だろうか。また、田中が述べたとおりに一度身につけたことばは人びとが生きていく上で一生、変わることはない不変的なものといえるのだろうか。そこで本稿ではKangas&Phillipsonが1989年に発表した論文における母語の定義に基づき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人びとの「母語」について考察をしていく。

Kangas&Phillipson は、「母語」の定義の基準を4つに大別している。最初の定義は「人が最初に習得した言語」、つまり「起源」に関わる定義である。2番目の定義は「人がもっともよく知っている言語」、つまり「能力」に関わる定義である。3番目の定義は「人がもっともよく使用する言語」、つまり「機能」に関わる定義である。4番目の定義は「人がその言語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感じ、その言語共同体の他の構成員からその話し手として認知されている言語」、要する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わる定義である。この4番目の定義に関しては2つに分けられる。一つは、自分自身が自分の言語として認めるかどうかという「内的同一性」に関するもの、そして、もう一つは、他者がある人がある言語の母語話者であると認めるかどうかという「外的同一性」に関するものである。

Kangas&Phillipson は、さらに、「人は複数の母語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る」こと、「用いる定義によって、同一人物が違う母語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る」こと、「定義1の『起源』を除く、他の定義に応じて、一生の間で母語は変わりうる」こと、「母語の定義は、社会的言語権の地位に応じて、階層的に編成される」ことを述べている。

この定義に基づいて、Kangas 自身の母語の遍歴を論文上で紹介をしているのだが、定義の(1)である起源から見ると彼女の母語はスウェーデン語になる。これは彼女の両親共にバイリンガルであり、彼女が幼少の頃は両親がスウェーデン語を使用して接していたことが要因であるが、彼女自身はフィンランド語も一緒に用いていた事もあり、ここから考えると結果的にスウェーデン語とフィンランド語が起源からみた母語となりうる。(2)の能力では、Kangas の母語はフィンランド語であり、これは彼女の母親の能力の最も高い言語がフィンランド語であることが影響しているという。スウェーデン語の使用もしているのだが、彼女自身はフィンランドが最も能力が高いと感じている。そして(3)の機能の基準から見ると、英語となる。彼女は同時にスウェーデン語、デンマーク語も使用をするのだが、その中で英語を使用する割合(例えば家での読み書き)が大半を占めることから機能においては英語が母語になる。最後のアイデンティフィケーションになると、フィンランド語、そしてスウェーデン語が母語に位置づけられる。ただし、一生の間で母語は変わりうることを考えた場合、移住もしくは結婚などの結果、英語とデンマーク語が母語に変わることもなる。

このように Kangas&Phillipson が考案した「母語」の定義では、人の生活環境によ

って変化する言語状況をさまざまな角度から触れると同時に、一人の人間が持つ「母語」は、人の生涯で決して一つではないことが伺える。前述した田中の「母語」に対する考えだと、人は、たった一つの「母語」を母親から得て、それは生涯を通して不変的なものとなる。確かに田中の言う「母語」が人の生活の中で他の言語に接触することなく生き続ける場合もあるだろう。しかし、移動、通婚、または政治などの変化により外部からの力により生活が変化することも十分に考えられる。更に、Kangas の家庭環境のように、同じ家族でも違った言語背景がある場合が少なくない。本稿では Kangas & Phillipson の「母語」の定義に従い人びとの「母語」の遍歴が実際にどのような起こりうるのかを、度重なる言語接触がもたらされた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人びとから収集したデータに基に考察していく。

### 3. 調査

#### 3.1 調査協力者

調査は、台中市、彰化県、南投県、そして新竹市に住む日本植民地時代に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人を対象に実施した。調査協力者は筆者自身の知り合いの他に、筆者の知り合いの友人、知人である。知り合い関係を調査協力者としたのはインタビュー内容が極めて私的な内容に及ぶので、調査者と調査協力者との間に信頼関係を築く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調査協力者に大きな心理的負担を与えてしまう可能性があるからである。

#### 3.2 調査方法とその内容

主な調査方法はアンケートの質問項目に沿うかたちで、筆者が一人一人の調査協力者へ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なった。調査を依頼するにあたり、筆者、または通訳を通じて調査協力者に連絡をし、調査の趣旨を説明してから自宅などを訪問した。ただ、知人からの紹介を受けた調査協力者については知人から事前に訪問の内容を説明してもらった。調査協力者は 20 名である。そのうち、男性が 12 名、女性は 8 名である。以下は調査協力者の簡単なプロフィールである。

表1 調査協力者プロフィール<sup>4</sup>

	出身地・現住所	生年	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年数
Aさん 男性	嘉義・台中市	1924年（大正13年）	12年
	仕事の関係で嘉義、台中市以外の街の移動があった。学生時代は日本人、原住民と一緒に野球に励む。		
Bさん 女性	嘉義・台中市	1925年（大正14年）	12年
	Aさんの妻。幼い頃から父親の仕事の関係で日本語に接していた。現在も書き物に日本語を使用している一方、北京語の習得にも励む。		
Cさん 男性	屏東・台中市	1927年（昭和2年）	11年
	幼い頃から南部、東部、そして西部への移動を経験する。NHKの鑑賞、日本語の歌でのカラオケなど日本語に関わる趣味が多い。		
Dさん 男性	台南県・台中県、台北市	1929年（昭和4年）	13年
	毎日、孫の学校への送り迎えなどで車の運転をおこなっている。テレビでニュースを観るときはNHK専門だと言う。旅行が好きで、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そして日本にも一人で行くこともある。		
Eさん 女性	新竹・台中市	1933年（昭和8年）	2年
	幼少の時に客家系家族とホーロー <sup>5</sup> 系家族と住む機会があったため、客家語、ホーロー語の使用ができる。また、外省人 <sup>6</sup> と結婚をした関係で流暢な北京語も話す。		
Fさん 女性	埔里・台中市	1936年（昭和11年）	2年
	幼少の頃は埔里に住んでいた関係で原住民が使用する言語も使用した。また、原住民の人びととの共通言語で日本語を主に使用していた。アメリカにも3年ほど滞在経験有り。		
Gさん 男性	南投県・台中市	1929年（昭和4年）	13年
	戦中には兵員の経験を持つ。戦後は北京語の習得に励んだ。		
Hさん 男性	彰化・台中市	1938年（昭和13年）	1年
	日本語は殆ど忘れてしまったが、米国留学の経験を生かし英語を習得した。		
Iさん 男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32年（昭和7年）	5年
	戦前では日本語の使用が多かったが、終戦を境に日本語の使用は殆ど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sup>4</sup> 表1においての調査協力者の並べ方は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なった順番によるものである。

<sup>5</sup> 閩南系と称される場合もあるが本稿ではホーロー（河洛）系と記述する。

<sup>6</sup> 第2次世界大戦後、国民党政権とともに大陸各地から渡台した人びと。

Jさん 男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29年（昭和4年）	9年
	Iさんの兄。Iさん同様、戦後は殆ど日本語の使用が無い生活を送っている。		
Kさん 男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26年（大正15年）	12年
	現在も趣味の俳句を書くときなどに日本語を使用している。週に一度、友人たちとカラオケを行うため、日本語の歌も良く知っている。		
Lさん 女性	台南県・彰化県	1928年（昭和3年）	9年
	18歳から約40年間ずっと学校の先生をしていた。現在も日本語を用いて俳句を作る。		
Mさん 男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36年（昭和11年）	2年
	日本語教育年数は短い、現在も週に一度、日本語のクラスで日本語の勉強を続けている。		
Nさん 男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30年（昭和5年）	8年
	家で友人と日本語の歌をカラオケで歌うのが楽しみ。子どもとは日本語を使用して会話をする機会がある。		
Oさん 女性	彰化県・彰化県	1930年（昭和5年）	6年
	Nさんの妻。Nさんと子どもとの家での会話はホーロー語と日本語を使用する。		
Pさん 男性	彰化・台中市	1924年（大正13年）	不明 <sup>7</sup>
	日本に留学経験もあり、流暢な日本語を使う。普段はホーロー語の使用を好み、孫と話すときもホーロー語を使用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る。		
Qさん 男性	台中県・台中市	1936年（昭和11年）	2年
	公務員の仕事をしていた関係もあり、北京語の使用も早くから覚えた。また、英語を独自で勉強し、インタビュー時も英語の使用が多かった。		
Rさん 女性	台北市・台中市	1932年（昭和7年）	5年
	たくさんの移動を経験した結果、ホーロー語、日本語、客家語、そして北京語を習得した。また、早い時期から北京語の勉強を始めたこともあり北京語に愛着を感じる。		
Sさん 女性	台北県・台中市	1927年（昭和2年）	14年
	幼稚園から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家庭内では幼少、成人してからも日本語中心の生活を送る。長期に渡り欧米での生活も経験する。		
Tさん	南投県・南投県	1933年（昭和8年）	5年
	以前、日本に住んでいた経験もあり、現在も台湾、日本の友人とは日本語を使用して会話をする機会がある。		

<sup>7</sup> 調査協力者からの要望があり非公開としたい。

調査で使用した言語は日本語が中心である。日本語以外で用いた言語は北京語、及び英語である。ホーロー語、北京語の使用を望む調査協力者には通訳を同行して調査を行なった。なお、インタビュー中の会話は同意を得た上で録音を行なった。

調査の期間は2007年9月から2008年2月にかけて実施した。調査時間は調査協力者によって異なり、短い人では一度だけの訪問で約1時間程度の長さで終了したが、長い人では5回以上の訪問をし、インタビュー時間も結果的に10時間を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た。

アンケート調査の項目としては、最初に現在と過去の言語使用状況を尋ねた。家族の中で、または友人などとの会話に分けて質問をした。過去の状況においては、当時の思い出などと照らし合わせながら質問に答えてもらった。過去、現在においても言えることなのだが、話し相手が兄弟であってもどの兄弟が話し相手になるかによって言語使用状況が異なることがあった。例えば、兄、姉との会話は日本語が中心でも、弟、妹との会話は日本語学習期間の違いでホーロー語、或いは北京語を使用する場合も見られた。このような場合は兄弟間で使用された全ての言語を言語選択として記録することにした。

表2 質問例<sup>8</sup>

過去（光復以前）・現在の使用言語について質問します。次の場面・相手に対して主にどの言語を使用していますか。以下の選択肢の中から選んでください。				
過去				
(1) ホーロー語 (2) 客家語 (3) 原住民諸語 (4) 日本語 (5) 北京語 (5) その他				
家の外で同世代の友だちと	家の中で配偶者と	家の中で兄弟と	家の中で両親と	家の中で祖父と母と

ここでの質疑応答により、Kangas&Phillipsonの母語定義(1)「起源」における考察が出来ると共に、(2)「能力」(3)「機能」、そして(4)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する「母語」の遍歴を裏付ける評価ができると考える。特に、幼少時代に両親、

<sup>8</sup> ここでは「過去」の質問例だけを載せる事とした。

祖父母と接するとき使用した言語は他者との言語接触が少ないなかで (1) 「起源」に当てはめられる。勿論、ここでも同じ話者が同じ相手と会話をするときに二つ以上の言語を用いる場合もある。例えば、調査協力者からのインタビューで度々、耳にしたのが「チャンポン」と言うことばである。場面によって二つ以上の言語の使い分けを行っていたのである。また、同じ相手との会話でもコード切り替え<sup>9</sup>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も十分に考えられる。このような場合には複数の言語を選択した事実として記録した。一方、学校へ上がってから日本語の使用が増えた場合には言語シフト<sup>10</sup>が起こりうるとも考えられるが、このような場合は学校へ上がる前の家庭内で使用していた言語を「起源」の言語とする。

現在においての言語使用に関する調査項目の一つとしてメディアに関する質問を用意した。人が何かの情報を得るときには人と人との会話を通じて取得する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が、本稿の対象は高齢者が中心である。個人差もあるが普段は家で過ごす時間が多い。その時間を利用し、テレビの観賞、新聞の閲覧などメディアを通しての情報収集、または本、雑誌などの書物から何か新しい情報を得ると考えた。その情報を得る手段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言語が使われているかを探ることによって「母語」の定義 (3) 「機能」の内容をより深く考察できる。例えば、現在においてニュースをみるときに、何語のニュースを視聴するか、例えば北京語の放送を選ぶか日本語の放送を好むかによっては、どのような言語が情報を得る手段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るかの認識が可能になる。

メディア使用に引き続いては、「カラオケ」で日本の歌を歌うか、「日本へ」何回くらい足を運んだか、そして「日本人」に間違えられた事<sup>11</sup>で生じた感情などに関する質問も行なった。これらの質問は過去から現在においての日本に関する意識を理解するために質問項目に入れた。調査協力者の日本に対する意識、経験などの語りをこ

---

<sup>9</sup> 「社会言語学者の間では、二言語話者が、文章の中であるいは談話の中で二言語を交互にあやつりながら話す話し方をコードスイッチング(code-switching)あるいはコードミクシング(code-mixing)とよんでいる」東 (1997:25)。

<sup>10</sup> 「人々、そして言語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って接触し、何らかの要因によって言語選択に変化が生じること」松尾 (2006:10)。

<sup>11</sup> 調査協力者が日本での滞在時、もしくは台湾で日本人と接したときに生じた経験を基に尋ねた。

ここで聞く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ある。この結果、母語定義の(2)「能力」と(3)「機能」を重ねて考察すると共に、「日本人」に間違えられた時に生じた意識からは(4)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関する意識も窺える。

アンケートの最後の質問では、過去と現在の国語である日本語と北京語についての9つの質問(表3)を行った。質問時にはアンケートを筆者が読み上げる形で行い、調査協力者が答えを選択したのだが、インタビューを通じて質問、及び回答をしてもらったので、回答を選んだ経緯などを聞きながら実施した。今回の調査協力者の方々は戦前、戦後のたくさんの出来事を経験した人ばかりである。調査協力者の中には当時の写真、記念の品などの物品、また現在において日記などで身の回りの記録などを行っている人もいた。個人の経験をしたこと、感じ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にはインタビューを通して人びとの語りを聞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木村(2007)は、「過去のことや、わざわざ記録には残されないような種類の事柄をデータとして得たいときは、人々の記憶という記録媒体に頼るしかない」木村(2007:201)とし、「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は、ドキュメント化されていない経験や主観に、さまざまに接近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木村(2007:201)と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の必然性を説いている。

表3 過去と現在の国語である日本語と北京語についての9つの質問例一覧

以下の質問に答えてください。	
(1) まったくそう思わない (2) そう思わない (3) 中間的意見 (4) そう思う (5) まったくそう思う	
質問	回答
日本語は忘れたくない言語である。	
日本語は最も感情を表せる言語である。	
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は教養の証である。	
日本語はいろいろな情報を得る手段である。	
日本語は孫に勉強してほしい言語である。	
日本語は難しいことを考えるときに使用する言語である。	
日本語は子どもや孫に聞かれたくない話をするときに使用する言語である。	
日本語は学校において更に学習されるべき言語である。	
北京語はできればあまり使いたくない言語である。	



その他の質問事項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 生年
- 出生地、現在の居住地
- (学校で) 日本語教育による教育を受けた年数
- 出身校 (公学校か小学校)

## 4. 調査結果及び考察

### 4.1 起源

Kangas&Phillipson が考案した4つの「母語」の定義で最初に掲げられているのが、「人が最初に習得した言語」所謂、「起源」である。本節では調査協力者の戦前、戦中における家族との言語使用の状況に基づき、調査協力者の「起源」としての「母語」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表4は戦前、戦中における言語使用状況をインタビューの結果に基づいて表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表4で明らかのように、Fさん、Tさんを除いた調査協力者全てが幼少の頃に母親と接したことばの中心がホーロー語であった。また、祖父母が当時、生存していた場合にもホーロー語が主に使用された。

表4 過去における言語使用状況

調査協力者	過 去				
	友達	兄弟	父親	母親	祖父母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E	●○	●○□	●○□	●○□	●
F	●□△	□	□●	□●	●□
G	□●	●□	●□	●	●
H	●□	●	●	●	●
I	□●	●□	●	●	
J	□●	●□	□●	●	
K	●□	●□	●	●	●
L	●□	●	●	●	●
M	●□	●	●	●	●
N	●□	●	●	●	●
O	●□	●□	●	●	●
P	●□	●	●	●	●
Q	●□	●□	●	●	
R	●□○	●	●	●	●
S	□	●□	□	●□○	●
T	●□	●□	●	□●	●

凡例 ホーロー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日本語=□ 北京語=☆ 英語=★  
 \*注 言語使用状況で複数の回答がみられた場合は、使用の比重を記号の大きさで表した。  
 \*注 空欄の箇所は調査協力者と対象者との接触がなかったことを表す。  
 \*注 現在の配偶者、または兄弟との言語使用は対象者が既に亡くなっている場合、生前の使用言語を選択した。

もしも「母語」というものが母親から授かるものであるのなら今回の調査協力者たちの大半は、ホーロー語が彼ら彼女らの「母語」となりうる。ただ、A、B、E、F、そしてJさんのように国語常用家庭で育った調査協力者は父親との使用言語は日本語が中心であった。幼少の頃はホーロー語も理解はしていたが、日本語はそれ以上に理解、また使用の頻度も高かったのである。物心がついた同時期に父親と母親が別々の言語を子どもに対して使うことによって子どもは両方の言語を習得する。この場合には「人が最初に習得した言語」所謂、「起源」の視点からみた「母語」は1つだけに限らないことになる。

幼少の頃から、祖父母、また両親と日本語を使用していたFさんの場合は家庭が国語常用家庭であり、家庭内においても日本語が中心で使用されていたという。そして、兄弟で末っ子だったFさんは物心がついた時から上の兄弟たちが使用していた日本語を家庭内で学んだと記憶している。実際、Fさんは学校において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た年数が2年にも関わらず、流暢な日本語を現在においても使用する。従って、Fさんの場合からみられる「起源」の言語は日本語となる。

また特別な例としてEさんの場合がある。Eさんは物心がつくかつかない内にホーロー語使用家庭から客家語使用家庭へ養女となった。養女先になった家庭は親戚ということもあり、当時は頻繁に実の両親に会うことが出来たという。両親と会うときにはホーロー語の使用、一方、新しい家庭において、叔父、叔母、または新しい兄弟と話をするときには客家語を使用していた。最初に習得をした言語となると、ホーロー語になると考えられるが、ほぼ同時期に客家語も習得をしている。更に、叔父叔母の家は日本語常用家庭であった為に日本語も家庭での生活によって学んだ。このような場合はホーロー語と客家語という複数の言語がEさんにとっての「起源」においての言語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 4.2 能力

「人がもっともよく知っている言語」として Kangas&Phillipson の第二の「母語」定義、「能力」が挙げられるのだが、ホーロー語と共に日本語が「能力」としての「母語」に挙げられる人が多い。特に、日本語は学校において使用を強制された言語でもあるので学校で学んだ事は日本語を連想しながら考える事が多い。また、過去の友人

との会話では表4で示したように大半の調査協力者がホーロー語と並んで日本語の使用を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戦前は学校での日本語教育の影響で日本語が一番多く使用する言語であったと複数の調査協力者が述べている。そのため、日本語能力がホーロー語能力並みに向上し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しかし、Tさんによると光復後に国民党政権が台湾を統治してからは次第に公の場では勿論、家庭内でも訪問者などが居る場合は日本語の使用が躊躇された。例えばTさんは「こういうことばがあるんです。三人集まって話をするときには日本語を使うなって。家でもね。誰が警察に告げるかわからない」。日本語を使うことによって、第三者から政府関係者への密告を恐れていたのだ。Tさんは、当時、ホーロー語の使用は余り咎められなかったが、日本語の使用には非常に厳しく制限があったと記憶しており、日本語の使用が激減した為に「よく知っている言語」としての「能力」は下がるばかりだ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つまり、Tさんの場合、日本語の使用領域の急激な減少がその能力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一方、日本語を使用する機会が減少しても、Dさんは「日本語は非常に美しい。それに子どもの時に覚えた言葉だから・・・日本語だけは忘れることがない」と日本語の能力が以前に比べて衰えることが無いと強調する。このように、戦後の言語政策の影響が自身の日本語能力に与えた影響に関する評価は調査協力者によって異なるのである。

「能力」に関しては読み書きの能力からも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特に日本語教育を長く受けた調査協力者は学校において日本語以外の読み書きを学習していない為に現在においても自分が一番良く知っている言語である日本語を使い情報などを収集する。AさんとBさんは夫婦であり、一緒にテレビのニュースをみる。主に日本語放送であるNHKを視聴するのだが、Aさん曰く、「一番しっくりくる」のだという。妻であるBさんは自身の北京語能力を伸ばすために、ときどき北京語放送のニュースをみるのだが、主人のAさんは半分ほどしか内容を理解しないために興味があることをニュースで扱っている場合には妻に翻訳を頼むことがある。NさんOさんも夫婦であり、前述のAさんBさん夫妻と同じくNHK放送を好んで鑑賞するが、北京語放送のニュースをみるときは、アナウンサーの話は理解できないので字幕だけを追って理解をするのだという。

Aさん、Bさん、Nさん、そしてOさんは日本語教育を長く受け、そこで学習し

た言語を夫婦間の共通言語として使用し、個人で何かを考え連想するときにおいても日本語を用いており現在でも一番、知っている言語と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能力の観点から「母語」をとらえたとき A さん、B さん、N さん、O さんにとっての「母語」は日本語であるともいえるのである。

### 4.3 機能

本節では調査協力者の戦後における言語使用の状況に基づき、調査協力者の「機能」としての「母語」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表 5 は戦後における言語使用状況をインタビューの結果に基づいて表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

1945 年に台湾の統治権が日本から国民党政府に移った後には次第に日本語の使用が禁じられ北京語の使用が求められた<sup>12</sup>。特に兄である J さんは日本語教育年数も多く、父との会話にも日本語を中心にしていたのだが、表 5 で明らかのように日本の敗戦後は日本語の使用をする機会が殆どなくなった。日本語は戦前においてはもっとも使用する言語、所謂「機能」での「母語」であったが、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影響で終戦を境に「母語」はおろか使用することが無くなっていった。弟の I さんも戦後の約 60 年は日本語を使わない生活を送ってきたと言い、インタビュー時もホーロー語の通訳を使用することもあった。I さんに日本語に対する思いを尋ねたところ「昔の日本人は厳しかった。そして怖かった。いつも威張っている。今のほうがずっと平和で良い」と植民地時代の日本人に対する印象は良くない。このような感情が戦後の日本語使用の減少に大きく関わりを持つとも考えられる。その I さん、J さんの現在においてももっともよく使う言語は北京語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特に I さんは友人と使用する言語にも北京語が多い。J さんは現在の台湾における言語状況は「社会では全部、北京語をつかっている」と言語を取り巻く環境が大きな要素だと表現している。実際に学校において北京語教育を受けている孫の世代との使用言語は殆どの調査協力者が北京語であると答えている。孫はホーロー語を聞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ても話すことが

---

<sup>12</sup> ただし、活字メディアにおいては戦後、1950 年になっても日本語の使用が見られ「また当時、新聞や雑誌における日本語の掲載に対する取り締まりは厳密に行なわれ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何 (2007:70) という見方もある。

苦手な場合が多く、会話においての返答が北京語になることが多いのである。

表 5 現在における言語使用状況

調査協力者	現 在				
	友達	配偶者	兄弟	子ども	孫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E	●☆□	☆	●○☆	☆●	☆
F	●☆□	□●	□●	●☆□	☆●
G	●□☆	●□☆	●□☆	●☆	☆●
H	●☆★	●	●	☆●	☆
I	●☆	●	●	☆●	☆●
J	●	●	●	☆●	☆●
K	●□☆	●	●	●☆	●□
L	●□☆	●□☆	●☆	●☆	●☆
M	●☆□	●	●	●☆	●☆
N	●□	●□	●	●□	●
O	●□	●□	●	●□	●
P	●□	●□	●□	●	●☆
Q	●□☆	●	●☆	●★	☆★
R	☆●	☆	●	☆●	☆
S	□☆	□●	●□☆	●☆□	●☆
T	●□	●	●□	●	☆●

凡例 ホーロー語=● 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 日本語=□ 北京語=☆ 英語=★  
 \*注 言語使用状況で複数の回答がみられた場合は、使用の比重を記号の大きさと表した。  
 \*注 空欄の箇所は調査協力者と対象者との接触がなかったことを表す。  
 \*注 現在での配偶者、または兄弟との言語使用は対象者が既に亡くなっている場合、生前の使用言語を選択した。

一方、戦前に国語として扱われた日本語を現在においても戦前の言語状況と同様に使用しているケースも本調査では見受けられた。先述したAさん、Bさん夫妻、またNさん、Oさん夫妻は夫婦の共通言語として日本語をホーロー語と同様に使っている他、Aさんは在宅の場合、日本語のテレビ鑑賞、読書などをし、妻のBさんは日本語を使って出来事などをノートに記述している。Kさんは友人と週に一回、カラオケ会を開いている以外にも俳句の会などにも参加をして同年代の人びとと日本語を使用しながら接している。また、友人などに手紙を書くときも日本語の使用が多い。家族、友人の会話はホーロー語が主であっても、読み書きには日本語の使用が多くみられるKさんのようなケースは日本語も「機能」における「母語」になりうると考える。そして今回の調査では日本語放送、主に台湾で放映されているNHK放送に関する視聴の有無も調べた。結果はIさんを除く全ての調査協力者が毎日、NHK放送を視聴すると答えた。台湾のNHK放送には北京語の字幕は無い為に、ニュースを見る場合はアナウンサーの声に耳を傾け、「歌謡コンサート」という番組で流れる歌と一緒に日本語を口ずさむ。日本語放送のテレビの視聴も言語の読み書き同様に人びとの「機

能」の一つ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

#### 4.4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Kangas&Phillipsonによると「母語」定義の4であ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内的同一性と外的同一性が存在すると述べている。今回の調査では調査協力者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の過程で内的同一性、つまり自分自身が認める言語について質問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が、外的同一性での他者から自分の言語が自身の「母語」と認められることに関しては第三者からの聞き取りも必要な為今回の調査では断念をした。

内的同一性だが、Kさんからはホーロー語、日本語に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感じるという。ホーロー語に関しては、筆者からの質問で孫はホーロー語を理解するのかとの問いに「ええ、みんな台湾に生まれたのですから。分からないのが不思議ですよ」と台湾人＝ホーロー語の言語意識がみられた。そして以前、日本人からKさんが日本人に間違えられたことに対しては、「嬉しいです。大体、日本の教育を受けてきたから。二十歳までは日本人だったのだから！」と強い日本人意識が窺える。Kさんは幼少からホーロー語と日本語の二言語併用を続け、自分が使い続けた言語から得た経験を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して認めている。

一方、配偶者と生活を共有、経験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ある言語が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して認識されることもある。Eさんはホーロー語、客家語、そして日本語を幼少の頃に家庭、学校教育などによって習得したが、1945年の日本の敗戦を境に学校では北京語を習い、その後は外省系の男性と結婚をした。家庭では北京語だけの使用となり、家庭外でも北京語の使用が殆どである。現在、Kさんが一番、自分の感情を表す言葉として北京語を選択した。

Sさんは幼少の頃から使い続けている日本語、そして戦後に習得した北京語が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認識する言語となっている。国語常用家庭で育ったKさんは現在においても多くの友人との会話は日本語を使用する。日本の文献にも目を通し、読み書きにおいても日本語の使用割合が高いとも言う。一方、北京語は学校教育が終了してから学んだ。最初は子どもが学校で学んだ教科書を見たり、子どもから発音などを教わったりしたと言う。現在も夜7時からの北京語のニュースで映し出される字

幕を見ながら北京語の習得を続けている。子ども、孫と接するうちに若い世代との共通言語として北京語を用い、今ではその北京語にも愛着を覚えるという。

## 5. まとめと今後の課題

本稿の調査により、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植民地時代に日本語教育経験者の人びとが持つ「母語」は複数に及ぶ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幼少の頃に母親から語りかけられた言語の他にも父親からは違う言語の使用が認められた。調査協力者によっては両親から二言語を習得した後に違う言語を使用する家庭への養子となり、そこで新たに違う言語を習得する場合もあった。Rさんによると当時、養子として他の家族に預けられる事はそんなに珍しい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と言う。

台湾においては日本の統治が開始された時と同じくらい大きな言語接触が1945年の光復後に行なわれた。国民党の台湾統治によって、北京語が新たな国語として人びとの共通言語として指定され、学校教育の場でも日本語から北京語に一変された。また外省系の人びととの通婚で北京語を「母語」として認識する人の例もあり、人びとの「母語」が決して一生、不変的なものでないこともわかった。

更に今回、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た人びとのなかでは家族の一員が海外、特に欧米に移住し、移住先の言語を新たに習得して生活をしている話が多く語られた。近年、台湾では英語教育が盛んであり、調査協力者が孫との会話で英語を使用するQさんのような例もある。このまま英語教育が盛んな状況が続くのであれば、今回のQさんのような例は将来、更に増えると予測も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させられる。

最後に、ある調査協力者と「母語」についての話をしていた時に、調査協力者からは「母語」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は良く分からないが、「一番しっくりすることば」だったらあると言われた。その「一番しっくりすることば」とは「チャンポン」だそうだ。日本語とホーロー語、または、北京語とホーロー語のように言語の切り替えを行なう事によって他者との意思を通じ合わせることである。

本研究では「母語」を単一のことばに特定していこうという試みがいかに困難を伴うものであるか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が、そもそも一つのことばとは何であるのか、明

確な境界線を持ったことばが存在し得るのか、まず、ここから議論を始める必要が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を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 参考文献

### (日本語文献)

1. 東照ニ (1997). 『社会言語学入門』 研究社
2. 何義麟 (2007).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 古川ちかし・林珠雪・川口隆行編、『台湾・韓国・沖縄で日本語は何をしたのか』、三元社、pp58-83.
3. 簡月真 (2002). 「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接触」、『社会言語科学』第4巻・第2号、pp.3-20.
4. 木村涼子 (2007). 「インタビュー法」、『実践的研究のすすめ 人間科学のリアリティ』、小泉潤二、志水宏吉編、有斐閣 pp198-210.
5. 蔡茂豊 (2008). 「『国語』強制の下における方言抑圧—台湾の場合—」『ことば・ひと・越境 論文集』、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学系、pp1-8.
6. 司馬遼太郎 (1997). 『台湾紀行 街道をゆく 40』 朝日文庫.
7. 田中克彦 (1981). 『ことばと国家』 岩波新書.
8. 津田勤子 (2005). 『台湾日治世代的親日態度與自我概念』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9. 藤井久美子 (2007). 「1990年代以降の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転換--『教育部公報』の分析を主として」、『宮崎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紀要. 人文科学』、第16号、宮崎大学教育文化学部 pp.67-79.
10. 松尾慎 (2006). 『台湾における言語選択と言語意識の実態』 群學出版.
11. 松尾慎 (2007). 「台湾・客家系住民にとってのホーロー語と客家語」、『静宜大学日本語文学系 紀要』 日本学と台湾学第六号 pp.25-43.
12. 山本真弓編著 (2004). 『言語的近代を超えて <多言語状況>を生きるために』、明石書店.



(英語文献)

1. Holmes, J.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Longman.
2. Skutnabb-Kangas, Tove and Robert Phillipson. (1989). "Mother Tongue' the Theoret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In Ammon, U (ed).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Berlin, pp.450-477.



##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 《中國考古學·兩周卷》評介

劉慶柱\*

多卷本《中國考古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啓動的重大科研專案，至今已歷時十餘年，現已出版了《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中國考古學·兩周卷》<sup>1</sup>，今年之內可望出版《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和《中國考古學·秦漢卷》。《中國考古學》的「總序」由劉慶柱撰寫。

在世紀之交，基於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編著多卷本《中國考古學》。從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至今已近百年，考古學在中國從無到有，從過去的不爲人知，發展到當今享譽世界、成爲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面臨世界考古學的迅猛發展，在新世紀中國的考古學家如何使考古學能夠更好、更快的發展，已經提到日程上來。要想使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健康發展，爭取走在世界考古學的前列，對中國考古學百年來的歷程，進行回顧與總結是十分必要的。爲此編著的多卷本《中國考古學》，承擔著總結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的前進歷程，瞻望今後中國考古學發展方向，提出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新任務，探索學科發展新方法、新理論。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三代」歷史，一直是學術界十分關注的課題。20 世紀 20 年代以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sup>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3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4 年。

來，特別是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大量夏商周時代的考古發現，使歷史學家一再改變著對先秦史的看法。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費正清和崔瑞德教授主編出版《康橋中國史》時，仍不得不把《康橋中國秦漢史》列為其第一卷出版<sup>2</sup>。當今先秦史的研究與突破，已經取決於夏商周考古的新發現與新研究。近 20 多年來，先秦考古發現，使許多傳統的學術觀點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它們直接影響著先秦考古及先秦史。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對近七十多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三代」考古發現與研究進行了全面總結，開闢了夏商周歷史研究的新時期、新階段。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中國考古學·兩周卷》與以往同類著作的最大不同在於，該書以現在中國國家空間為地理範圍、以夏商周「三代」為其時間對象，全面、系統研究了這一時空範圍中的考古學發現，重點探索「三代」王朝的考古學文化。以此為基礎，構建起全新的夏商周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由楊錫璋、高煒主編，16 開精裝本，「總序」6 頁，目錄 14 頁，圖版 32 版，插圖 153 幅，正文 668 頁。長達 3 萬字的「緒論」涉及了「夏商考古的發現與研究」、「關於夏文化與商文化」、「關於夏商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關係」和「啓示與思考」四個方面問題。全書分成「夏文化探索」、「二里頭文化」、「先商文化探索及相關問題」、「商代早期文化」、「商代中期文化」、「商代晚期文化」、「商代的經濟、技術文字和藝術」、「夏商王朝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八章，書後附錄的 10 個表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有關夏商年代的測定資料。本書闡述了夏商考古學的特點、方法、任務，展望了夏商考古學發展的前景。介紹了考古學上「夏文化」，探索了早期「夏文化」，提出了「夏文化」與「商文化」的界定理論、方法問題。對夏商時代都城田野考古，如夏代都

<sup>2</sup> 李學勤《康橋中國秦漢史》序：「這部《康橋中國秦漢史》，原為費正清、崔瑞德共任全書主編的《康橋中國史》的第 1 卷，於 1986 年在康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崔瑞德的《康橋中國史》總編輯〈序〉：「當十多年前開始計劃編寫《康橋中國史》時，本來當然打算從中國歷史的最早時期寫起。但是，在我們著手寫這部叢書的幾年時期中，我們不論對中國史前史的知識，或是對西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大部分時期的知識，都因大量的考古發現而發生了變化；這些發現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而自 70 年代以來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勢頭。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變了我們對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還沒有對這些新的證據和傳統的文字記載作出任何普遍公認的綜合。……因此，出於無奈，我們在編寫《康橋中國史》時就從秦漢這兩個最早的帝國政體的建立開始。」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康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北京。

城二里頭遺址，商代都城偃師商城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及洹北商城遺址等進行了綜述與研究。對黃淮下游、長江中游、四川盆地、關中地區、甘青地區、長城沿線、閩粵桂地區等夏商王朝時代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進行了系統探討。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以「偃師商城之始建為夏、商王朝交替界標」，建立了夏商王朝年代學的分界，論證了夏、商文化的關係。在此基礎之上，追溯了二里頭文化之前的早期夏文化，研究了早於二里頭遺址的早期夏王朝都城遺址。

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重點是都城考古，古代都城考古是歷史時代考古的「龍頭」課題<sup>3</sup>，夏商時代考古也不例外。學術界長期以來，十分關注的是夏商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問題。但是關於夏商都城的考古研究，從時空兩個方面來說，都存在著若干懸而未決的重大學術問題，如作為早期都城的夏商時代都城是否必須具備「城牆」問題、宮城的佈局形制問題、作為血緣政治象徵的宗廟與地緣政治象徵的宮殿二者空間關係問題等<sup>4</sup>。夏商時代都城遺址考古發現，確立了夏商時代的都城、宮城必須具有城牆；在都城的宮城之中，宮殿與宗廟是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建築存在的，二者同時存在於宮城之中；二里頭遺址的宮城遺址及其周圍路網遺跡的發現，宮城之中宮廟建築群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宮城附近綠松石、鑄銅等官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現，宮城周圍大量貴族居址及貴族墓葬的發掘和一批高等級遺物（最早的青銅禮器、玉石禮器、飾有龍或蛇紋的遺物等）出土，這些無疑將國際學術界傳統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即早期國家）始於安陽殷墟的傳統看法，上溯至夏代。

商代考古學中的商代早中期遺存——偃師商城遺址和殷墟洹北商城遺址，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佔有突出重要地位。偃師商城遺址的都城及宮城遺址佈局形制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在「三代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承上啓下學術意義。洹北商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與中商文化的確立，將商代考古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開闢了殷墟考古的新階段。

《中國考古學·兩周卷》由張長壽、殷璋璋主編，16開精裝本，總序6頁，目錄8頁，圖版32版，插圖284幅，正文563頁。全書由「緒論」和「先周文化探索」、「西周文化的分期、年代和都邑」、「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墓地」、「江南地區的西周文化」、「西周

<sup>3</sup> 田垣：《中國考古學的「龍頭」——記院重大課題「中國古代都城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第一版，2003年8月21日，北京。

<sup>4</sup> 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史述論》，《考古學集刊》第16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10月，北京。

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西周時期的文化」、「東周時期的城市發展」、「東周時期南方地區的墓葬」、「東周時期的生產技術」、「東周時期的社會生活」、「兩周時期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十二章組成。本書主要介紹了 20 世紀兩周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它們從多方面再現了兩周歷史。兩周都城遺址及其墓地考古發現，是兩周考古的重點。兩周時代周邊地區考古發現與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兩周卷》的重要特點。

兩周都城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尤以東周都城考古最為突出，在中國古代歷史從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轉變中，都城考古學文化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標識性學術意義。東周都城考古發現揭示出，作為國家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的都城，它們上承夏商和西周都城制度，下啓秦漢帝國都城規制。

《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介紹了西北地區的辛店文化、寺窪文化、沙井文化、楊郎文化，北方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桃紅巴拉文化、毛慶溝文化、玉皇廟文化，西南地區的巴蜀文化和雲南先秦文化等，人們通過對兩周時期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發現與研究成果，看到其地域文化的特性與共性。這種特性是由於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所制約而形成，其共性則反映了他們長期以來與中原地區的頻繁交往。兩周時期這種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特點，尤其是其與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共性特點，成為先秦時代以後，形成以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為主、包括以夏商時代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基礎。

中國古代青銅文明是享譽世界的古代文明之一，兩周時代是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巔峰時期。《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對兩周的青銅文明的考古發現、研究，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深入的介紹。從銅礦的開採與冶煉，青銅製品的鑄造與使用，探討了兩周八百年間青銅文明發展所反映的禮制變化。兩周的青銅文明，開啓了中國古代鐵器時代，為秦漢帝國時代的到來奠定了「物質」（「科學技術」）基礎。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實際上已經不僅僅是考古學的專著，它們也是利用新的考古學資料研究夏商周王朝的重要歷史專著。

## 奇文解楚騷，妙理注宋賦——吳廣平 《宋玉研究》、《楚辭全解》評介

蘇慧霜\*

楚辭研究是一門孤獨而快樂的學問，文字古奧，艱澀隱晦<sup>1</sup>，然而，春夜秋雨孤燈下讀楚辭，瀟瀟入夢，醒來悠然意解，逍遙兮容與，則心境灑然。

我與吳廣平先生相識於 2004 年四川成都楚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先生博聞多學，會議上旁徵博引，精闢入理的學養風采，令人驚豔。先生潛心宋玉研究十餘年，積雄厚功力，2001 年 8 月完成 42 萬字的《宋玉集》<sup>2</sup>，校注精密，考證嚴謹。2004 年 9 月完成 30 萬字的《宋玉研究》<sup>3</sup>，對於宋玉的文學成就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作了系統的梳理與深入的論述。2008 年 1 月出版《楚辭全解》<sup>4</sup>，全面而完整地收錄屈原、宋玉作品，是現今研讀楚辭最完整的注本。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sup>1</sup> 陳子展《楚辭直解》凡例中引述元吾衍《閒居錄》中記載的一段趣聞：越地人王榮仲讀屈辭嘆道：「作文如此艱澀，宜乎投水死也。」可見楚辭文詞艱澀的普遍看法，自古即然。

<sup>2</sup> 吳廣平校注《宋玉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 年 8 月版。

<sup>3</sup> 吳廣平著《宋玉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4 年 9 月版。

<sup>4</sup> 吳廣平撰《楚辭全解》，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 1 月版。

## 一、妙理注賦

《宋玉研究》一書結合了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的新材料，在大陸學者湯漳平、譚家健、香港鄭良樹、台灣高秋鳳等先生考證的基礎上，對宋玉著述的真偽作了完整的補證與詮釋工作，研究成果斐然，不但直接糾正楚辭研究的訛誤與偏差，更補充大量新證據，運用語言學、文化學、神話學、宗教學、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重解巫山高唐神女的神話原型，對於宋玉生平及作品研究提供富有價值的學術見解，深解宋玉之學。

全書共十六章，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生平與著述」集中考證了宋玉的姓名、字號、生年、卒年、故里、墳墓、行止、交遊與著述真偽，根據大量文獻材料，結合實地調查，斷定宋玉故里，並從歷代方志、碑刻、史傳及其他地方文獻記載考證宋玉宅、宋玉墓等二十餘處宋玉遺跡，對於宋玉身世的解讀有許多實證。中編「繼承與融會」從屈原到宋玉，論述由楚辭向楚賦的轉移、嬗變與發展過程，並就宋玉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縱橫家文化、神巫文化的融會貫通處進行考證，證明宋玉在思想與藝術上注重廣采博收、轉益多師，因而其思想與藝術顯得豐富多姿，斑斕駁雜。他師無常師，學無所主，因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成為人格上卓立不群、藝術上獨樹一幟的偉大作家。下編「成就與地位」運用美學、藝術學、主題學、形象學、文類學、女性主義等現代文學論題，多角度發微宋玉辭賦獨特的審美價值；並結合文獻研究和審美研究，從歷史、客觀的角度，根據宋玉賦體文學創作的年代、成就與影響，大膽論證，實事求是地確定宋玉「賦祖」和「賦聖」的文學地位，顛破歷來以荀子為「賦祖」和司馬相如為「賦聖」的看法。研究深入與創新的觀點，是近年來「多維視角下作家個案研究的新創獲<sup>5</sup>」，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此書最顯著的特色，是使用傳統考據方法和文本分析，同時運用語言學、神話學、宗教學、原型批評等現代西方理論與方法解讀宋玉及其作品，完整收集整理《宋玉研究論著索引》，書末附錄收錄了1900年至2004年6月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日本、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國家和地區的宋玉研究論著27本，已發表的宋玉研究

---

<sup>5</sup> 鄧新躍《多維視角下古代作家個案研究的新創獲——評吳廣平先生著〈宋玉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05年03月。



論文 615 篇，是目前最完備的宋玉研究論著索引。索引的編撰分類詳盡縝密，除凡例外，第一「著作類」收錄包括英、美、港、台等地的博碩士論文與出版專書；第二「文章類」收錄 615 篇，依主題內容細分為 21 類，每一類大致依時間先後為序，分別是：（一）宋玉研究史，（二）宋玉辭賦，（三）宋玉集，（四）屈宋，（五）九辯，（六）招魂，（七）風賦，（八）高唐賦、神女賦，（九）登徒子好色賦，（十）笛賦，（十一）大言賦、小言賦，（十二）諷賦，（十三）釣賦，（十四）舞賦，（十五）微詠賦，（十六）禦賦，（十七）對楚王問，（十八）報友人書，（十九）招隱士，（二十）宋玉接受史，（二十一）宋玉作品的西文譯著。分類鉅細靡遺，備註詳盡，對於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整理功夫。

宋玉是戰國晚期的辭賦作家，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sup>6</sup>。」宋玉是屈原的追隨者，好辭而以賦見稱，歷來雖與屈原並稱「屈宋」，但與歷代文人情深於屈騷大量研究屈原的情況比起來，宋玉研究專著少之又少，宋玉相關研究大都散見於單篇論文，以研究宋玉單篇作品為多，甚少宋玉研究之專著。

從 1935 年以來，以宋玉作品單篇研究的專著如：蕭平編注《風賦及其他》<sup>7</sup>、王愛國《楚辭招魂篇研究》<sup>8</sup>、鄭坦《申論楚辭九歌二招之存疑》<sup>9</sup>、張春榮《楚辭二招析論》<sup>10</sup>、魯瑞菁《高唐賦的民俗神話底蘊研究》<sup>11</sup>、徐泉聲《楚辭招魂與大招研究》<sup>12</sup>、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化中的愛與美主題》<sup>13</sup>、金式武《楚辭招魂新解》<sup>14</sup>、程地宇、任桂園《巫山神女論·巫山文化論》<sup>15</sup>，都是以單篇作品延伸主題的研究居多。

<sup>6</sup>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台北：新象書店，1985 年，頁 2491。

<sup>7</sup> 蕭平編注《風賦及其他》，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sup>8</sup> 王愛國《楚辭招魂篇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年。

<sup>9</sup> 鄭坦《申論楚辭九歌二招之存疑》，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 9 月第 1 版。

<sup>10</sup> 張春榮《楚辭二招析論》，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3 年碩士論文。

<sup>11</sup> 魯瑞菁《高唐賦的民俗神話底蘊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 年。（按：《宋玉研究》誤植為魯瑞菁。）

<sup>12</sup> 徐泉聲《楚辭招魂與大招研究》，花蓮：真義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sup>13</sup> 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化中的愛與美主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sup>14</sup> 金式武《楚辭招魂新解》，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

<sup>15</sup> 程地宇、任桂園《巫山神女論·巫山文化論》，萬州：重慶三峽學院三峽文化研究所，2000 年。

以宋玉其人或作品為研究的專書有：袁梅譯注《宋玉辭賦今讀》<sup>16</sup>、朱碧蓮編注《宋玉辭賦譯解》<sup>17</sup>、金榮權《宋玉辭賦箋評》<sup>18</sup>、張端彬《楚國大詩人宋玉》<sup>19</sup>、謝瑾《宋玉研究》<sup>20</sup>、許多澍《論宋玉及其作品》<sup>21</sup>、高秋鳳《宋玉作品真偽考》<sup>22</sup>、余建東、何全國《宋玉風采錄》<sup>23</sup>、吳廣平《宋玉集》<sup>24</sup>、吳廣平《宋玉研究》<sup>25</sup>。

20 世紀受到疑古思潮影響，宋玉的作品幾乎全部被視為偽作，本書的價值在於精確掌握宋玉研究的歷史脈絡，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後出轉精，全面且深入宋玉研究的層面，並開拓宋玉研究的視野，以求真、求善的治學態度，論述了上古時期辭賦文學由屈原到宋玉的嬗變，並且提出文學上的創新見解，具體論證辭賦文學四個方面的轉型，即「由楚辭向楚賦的轉移」，「由緣情向體物的嬗變」，「由直諫向曲諫的發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作者指出，楚賦的創作雖然自屈原發端，但一直要到宋玉繼起，宋玉開創的散體賦成為後代賦家競相模仿的對象，宋玉開創的「傷春」、「悲秋」、「登高心悴」、「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等主題成為中國文學恒久的主題<sup>26</sup>，才終於完成了賦體文學的定型，就這一點成就而言，宋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應給予肯定的。是以《湖北社會科學》、《貴州文史叢刊》、《理論月刊》、《船山學刊》、《懷化學院學報》、《風雅》、《長江日報》、《湖南日報》、《古籍新書報》、《古籍整理研究情況簡報》以及國學網、中華古籍網、中國文學網、荊楚文化網等眾多媒體，都分別發表書評給予此書極高評價<sup>27</sup>。

<sup>16</sup> 袁梅譯注《宋玉辭賦今讀》，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8月第1版。

<sup>17</sup> 朱碧蓮編注《宋玉辭賦譯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sup>18</sup> 金榮權《宋玉辭賦箋評》，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sup>19</sup> 張端彬《楚國大詩人宋玉》，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sup>20</sup> 謝瑾《宋玉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論文，1992年。

<sup>21</sup> 許多澍《論宋玉及其作品》，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1995年。

<sup>22</sup> 高秋鳳《宋玉作品真偽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sup>23</sup> 余建東、何全國《宋玉風采錄》，宜城：宜城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2年。

<sup>24</sup> 吳廣平校注《宋玉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8月版。

<sup>25</sup> 吳廣平《宋玉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9月版。

<sup>26</sup> 吳廣平《宋玉研究》下編〈成就與地位〉，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9月，頁191。

<sup>27</sup> 相關書評如：

(1) 李德輝〈看似尋常最奇崛——評吳廣平先生注譯《楚辭》〉，《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1月。

(2) 張晚林〈才子之所以為才子——吳廣平先生《宋玉研究》讀後〉，《懷化學院學報》，2005年6月。

## 二、奇文解騷

先生以豐富的學養，紮實的功力，在《宋玉研究》基礎上，慎思明辨，博觀約取，2008年1月出版的《楚辭全解》<sup>28</sup>，是一部屈原、宋玉全集校注匯評本，全書分題解、原文、註釋、韻部、譯文、集評六大結構，融會古今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對傳世和出土的屈宋作品作了精要的詮解。

此書不但收錄了《楚辭章句》中的全部屈宋作品，並將傳世文獻和地下發掘出土的所有宋玉作品（包括偽作）作為附錄通通收入，是一部屈原、宋玉兩人的全集。其中，首次校勘、注釋、翻譯了《微詠賦》、《禦賦》、《對友人問》、《對或人問》、《高唐對》、《郢中對》、《報友人書》等作品。尤其是《微詠賦》一篇，文字雖不太古奧，但卻十分晦澀，自古至今無解人，唐代陸龜蒙提到宋玉《微詠賦》，頗多感慨：「月淡花閑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先生以獨到的見解和實證破譯了此賦，細心為《微詠賦》一篇題解、校勘、注釋與集評，是古今第一人。

尤其透過六大層面分析解讀屈宋作品，既是本書的特色，亦彰顯作者嚴謹的學風，各章「題解」簡明扼要，清楚論析題名要旨，是各篇入門必讀的導引。「原文」最見梳理之功，除了殷實校勘的基本功夫之外，標點句逗分明，對於幫助文本閱讀有很大的助益。「韻部」的整理更是一般注本中少見，詳解各篇辭賦的用韻，對於擴大楚辭學研究視野，居功匪淺。而以白話翻譯的「譯文」等於現代版楚辭，為這個時代的楚辭學留下閱讀的

---

(3) 鄧新躍〈多維視角下古代作家個案研究的新創獲——評吳廣平先生著《宋玉研究》〉，《貴州文史叢刊》，2005年3月。

(4) 李德輝〈一部全面系統、宏富精深的學術力作——評吳廣平先生著《宋玉研究》〉，《理論月刊》，2005年6月。

(5) 鄧新躍〈多維觀照靈氣充盈——評吳廣平先生的《宋玉研究》〉，《湖北社會科學》，2005年5月。

(6) 陳靖武〈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古籍整理著作——評吳廣平先生校注的《宋玉集》〉，《船山學刊》，2002年4月。

(7) 陳靖武〈國學研究的又一豐碩成果——評吳廣平注譯的《楚辭》〉，《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6月。

(8) 吳投文〈青年楚辭學者吳廣平訪談錄〉，《湘潭研究》，2007年1月。

<sup>28</sup> 吳廣平《楚辭全解》，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月第1版。

印證。「集評」則匯集歷代評點資料，系統而全面地觀照各家學說名著之補注、集解、精義、辨體、異說，深入屈宋的楚辭研究，更方便治學者索引。

「註釋」是本書最精華之所在，除了採用傳統的訓詁學方法進行分析外，還大量地運用了文化人類學、音韻學、民俗學、訓詁學、美學、歷史、地理、天文、生物等等的知識闡釋文本，還原遠古時代楚社會的習尚，見解新穎，頗具見地。如：

《離騷》：「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句，書注：「屈原名平字原，小時名正則字靈均，屈原先祖與家人給他起如此名字似乎反映了對平原的嚮往，對土地的崇拜，對公平、公開、公正的處事原則的召喚。」（第6頁）

《九歌·雲中君》解題對「雲中君」的解釋：「雲行雨施、電閃雷鳴本是極常見的自然現象，雲、雨、雷、電四者本就密不可分，因此在原始神話思維中，雲神、雨神、雷神、電神也往往互相轉化、互相替代、互相混淆。雲神雲中君又叫豐隆（雷神、電神）、屏翳（雲神、雨神），道理就在這裏。屈原的〈雲中君〉正是祠祀雲雨雷電之神的祭歌。」（第63-64頁）

《九歌·山鬼》中「公子」的解釋：「公子，等於說『公主』，指巫山神女，在神話傳說中她是天帝的『季女』（少女），女兒在古代也可稱『子』。巫稱巫山神女為『公子』，就像〈湘夫人〉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巫稱湘夫人為『公子』。」（第98頁、第99頁）

以豐富的地理知識考證〈九章·涉江〉「入溁浦余遭徊兮」句，關於「溁浦」的解釋：「溁浦，地名，即溁水之濱，指的是屈原入溁處，即今湖南省溁浦縣城西三十公里的江口鎮溁水入沅的會合處犁頭咀。溁水，古名序水、敘水，又名中河、雙龍江，發源于溁浦縣南黃茅園鎮境內的廊梁山，西北流，至溁浦縣城東南，又折向西，流入沅江。溁水沿岸至今有招屈亭、屈原廟、三閭大夫祠、屈子峽、三閭灘、屈壇、屈原入溁處等遺跡與風景名勝。」（第181頁）

運用「氣象物候」的觀點來解釋〈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釋「萍」為金龜子：『萍號起雨』指金龜子鳴叫則有雨。古人或以『蜚螿』連稱，故雨神之名為『屏翳』。」「『萍號起雨，何以興之？』這兩句是說：蜚蟲鳴叫則起雨，它是怎樣把雨引起來的呢？本來是有氣候的變化，蟲鳥感之則鳴，這現代科學知識叫做『氣象物候』。但在古人對自然規律尚未掌握以前，卻倒果為因，把這類自然現象神秘化了，認為昆蟲、飛鳥等動物具有『第六感』（即直覺，亦即常人沒有的感官天生功能），能預感風雨陰晴

的自然變化。故屈原在這裏對此傳統觀念提出詰問。」（第 134 頁）

引天文志釋〈九辯〉「願寄言夫流星兮」中的「流星」：「流星，即奔星，古代傳說是尊貴的使者，此處象徵使臣。」並援引《漢書·天文志》曰：「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第 325 頁）

從民俗文化的觀點深入解釋〈招魂〉的儀式背景，突顯南方文學的特色，如「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解釋：「雕題：用丹青在額上雕刻花紋，屬於紋身中的紋面。題，額。黑齒：用生漆或黑色染料將牙齒塗黑，或嚼某種草藥將牙齒染黑。雕題、黑齒均為南方初民的習俗。《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又《山海經·海外東經》有『黑齒國』。」（第 337 頁）以南方部落民族紋面黑齒，割食人肉的習俗，招誘靈魂來歸，呼籲南方不可以久留。釋義新穎，具有深厚的民俗觀點。

又如〈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句，兼採傳統對植物「楓」的解釋與文化的釋義：「楓，即楓木，又名楓香樹，乃南楚的神樹。《太平廣記》卷四〇七有『楓生人』的傳說。在江西一帶仍有『樟樹惹鬼，楓樹出人』的諺語。……〈招魂〉的結尾招楚頃襄王的魂回到『上有楓』的江畔（或江南），可能與宋玉受南方苗族的文化影響有關。因為在苗族信仰中，楓木崇拜與始祖崇拜是疊合在一起的，所以這裏招魂回歸楓林，就是回歸祖林，在原始信仰中，回歸祖林就意味著能得到祖先的保佑，能祛病消禍，逢凶化吉。」（第 360 頁）

不畏成說，大膽駁斥前人立說，並指證歷歷，如解釋〈九辯〉「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嘆」句，駁錢鍾書「無澤」說：「錢鍾書《管錘編》第二冊《楚辭洪興祖補注》卷第一六則論〈九辯〉『雨露不均』……按：錢先生此解純依王逸說立論，是將『無澤』之『無』讀如字，若將『無』讀作『蕪』，則疑義頓消。」（第 313-314 頁）

或廣採音譯解釋，並引《淮南子》以證，如〈遠游〉「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中的「於微閭」的解釋：「山名，又名醫巫閭山、醫毋閭山、微閭山、無慮山、醫無慮山等，今通稱醫巫閭山，簡稱閭山，地處遼寧省中部，為陰山山脈餘脈，自東北向西南走向，……為東北三大名山（醫巫閭山、千山、長白山）之首，屬於中國古代名山五岳五鎮中五鎮之北鎮。關於醫巫閭山（于微閭山）名稱的由來，或說是東胡語『伊克奧利』即『大山』的譯音，或說是滿語『翠綠的山』的譯音，或說系由古句麗人一部族之稱謂音譯而成。《淮南子·地形》：『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玞琪焉。』」（第 262-263

頁)

又以審美觀點與歷史發展還原詞義真相，印證楚國的古俗和社會美學觀點，如〈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小腰：細腰。據文獻記載，楚俗以細腰為美，而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9年在位的楚靈王更是一位大力提倡以細腰為美的君王。如《墨子·兼愛中》：『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楚文化研究專家張正明認為楚俗好細腰，反映了楚人對於相貌和身材的審美意識與諸夏是不大一樣的，男子以威嚴精悍為美，女子以苗條纖柔為美。他進而認為，楚靈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倡導減肥的人。……人類學家潘光旦則據英國靈理士《性心理學》認為：『楚王好女子細腰，宮中竟有餓死的女子，其實所好並不在腰，而在腰的上下兩頭，和數十年前西洋所流行的以緊身裙束腰以突出乳部和臀部是一件事。』我個人認為楚靈王好男女細腰，導致男女節食餓死，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審美心理的反映。」（第292-293頁）

釋「鮮卑」一語更見精彩，首先引證各家之說：「《楚辭·招魂》作『犀比』，《戰國策·趙策》作『師比』，《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匈奴傳》作『犀毗』，《淮南子·主術》高誘注作『私紕』，均一語之轉，指『帶鈎』。帶鈎之稱鮮卑，有如《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所說：『（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稱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又從語源學角度駁斥前人對〈大招〉偽作之說，書中舉證：「梁啟超《屈原研究》、劉永濟《屈賦通箋》以為鮮卑出現在漢代，疑〈大招〉為漢人偽作，實是不瞭解鮮卑一詞的語源關係所致。其實《國語·晉語》就曾記載：『昔周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楚人曾與鮮卑一起『守燎』有過接觸，〈大招〉提到『鮮卑』絕非偶然。」（第293-294頁）

如果不是對屈原文本的語法習慣有深刻認識，便無以精確地解釋文本轉語的運用之妙，如《卜居》「將呶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中「喔咿儒兒」的解釋：「喔咿：……指言語方面所表露的諂媚之態。一作『偃伊』。……怪鳥幽鶻（喔伊）『善笑』，怪獸獯儿（儒儿）『見人則笑』，屈原將這兩個名詞轉化為形容詞，以此形容諂諛小人強作笑顏，諂諛獻媚的醜態。」（第275-276頁）

或從生物學與神話原型分析物種，如《天問》「鮫魚何所」中「鮫魚」的解釋：「……鮫魚的神話原型為穿山甲。王逸《楚辭章句》：『鮫魚，鮫鯉也。』《本草綱目·鱗部·鮫鯉》：『鮫鯉，其形肖鯉，穴陵而居，故曰鮫鯉，而俗稱為穿山甲，郭璞賦謂之龍鯉。』

何所：『所』字洪興祖《楚辭考異》引一本作『居』。鮫魚雖然叫做『魚』，卻不居住在水中，反而生活在陸地，所以詩人提出疑問『鮫何所居』。」（第123頁）

或多識草木，如《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中的「梧楸」：「『梧楸』當從《說文·艸部》所引作『莫蕭』。段玉裁注：『按今《楚辭》無莫蕭，惟宋玉《九辯》云：『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莫蕭。蓋許慎所見作莫蕭，正『百草』之二也。『莫，草名，似艾。《玉篇·艸部》：『莫，草似艾。』蕭，草名，香蒿。《爾雅·釋草》：『蕭，荻。』郭璞注：『即蒿』。』」（第309頁）

旁徵博引，從音韻訓詁到古史印證，正確理解字義，如〈招魂〉「九侯淑女，多迅眾些」中對「九侯」的解釋：「九侯：即鬼侯，北邊鬼方部落首長。《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正義》引《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九侯』之九，疑非數目字之九，讀音亦非『紀有切』。『九侯』之九，應讀為『舉洧切』，就是鬼的別體字。古從九得聲之字，今音多讀作鬼，如軌、宄、枕。『馗』字從九得聲，其音也近鬼。這些均是『九』字古音有讀作『鬼』者之證。九，古國名，其地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字彙·乙部》：『九，國名。即甲骨文、金文和《竹書紀年》中常常提及的『鬼方』。淑：美善。《史記·殷本紀》：『紂以九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九侯淑女即九侯好女也。』（第347頁）

宋玉辭賦作品在兩千多年的流傳、抄寫和刻印過程中，文字訛誤、脫落、衍羨、顛倒的情況較為嚴重，本書比對眾本，並利用前賢的研究成果，進行糾訛、補脫、刪衍、乙倒，認真的校勘，正本清源，以盡可能恢復宋玉作品原有的真實面貌。

糾正訛誤，如：據清代學者趙曦明、張惠言、民國學者黃侃、臺灣學者李景濂以及作者自己和復旦大學楊明教授的觀點，糾正了宋人沈括、姚寬所謂《神女賦》是「玉夢」而非「王夢」說（第409-414頁）<sup>29</sup>；據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朱珔《文選集釋》，指出《高唐賦》「當年邀游」之「當年」乃「尙羊（同徜徉）」之訛（第397-398頁）。

<sup>29</sup> 參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卷一；清孫志祖《文選考異》卷一〈神女賦〉『其夜王寢』條引趙曦明說；黃侃平點、黃焯編次《文選平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73-74頁；李景濂〈宋玉〈神女賦〉『王、玉』辨〉，《殷都學刊》，1997年4月；吳廣平〈宋玉〈神女賦〉夢主考辨〉，《雲夢學刊》，2005年2月；楊明〈是誰夢見了巫山神女——關於宋玉〈神女賦〉的異文〉，《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2月。

補充脫漏，如：據趙氏培蔭堂藏本《宋玉集》和《渚宮舊事》卷三，於〈大言賦〉末尾補「若此之大也，何如？楚王曰：善」十一字（第 460 頁、第 464 頁）；據《宋大夫集》本和趙氏培蔭堂藏本《宋玉集》，於〈諷賦〉「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兩句後補「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兩句（第 476 頁、第 477 頁注 12）。

刪除衍羨，如：據王念孫《讀書雜誌》和簡宗梧《漢賦史論》，刪〈高唐賦〉「若浮海而望碣石」句之「石」字（第 388 頁和第 390-391 頁注 16）；據王念孫《讀書雜誌》，刪〈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句之「滯」字（第 401 頁和第 404 頁注 38）。

乙轉顛倒，如：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指出〈風賦〉「憊淒憊憊」乃「憊憊淒淒」之誤倒（第 371 頁和第 373 頁注 33）。

### 三、千古知音

楚辭浪漫瑰麗的創作基調和淒美絕艷的辭采，長於幽婉哀怨的抒情模式，自屈原以滿懷悲憤寫下 25 篇辭作之後，宋玉師承屈原，「無愁亦自悲」（李商隱詩），〈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激越而強烈的悲劇色彩，憂鬱情結惆悵的傷嘆，與貧士失職的咏嘆，繼楚辭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典範。

從屈原到宋玉，是辭賦文學發展的重要關鍵，誠如李炳海〈辭賦研究的視角轉換〉<sup>30</sup>一文所言：「從屈原到宋玉，從辭到賦，是由泛文學到純文學的演變過程，只是到了宋玉那裏，文學才真正以獨立的型態出現。」如果說騷起於屈原，那麼賦的完成則有待於宋玉，是以《文心雕龍·時序》以「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譽之，可見一斑。

漢代從淮南王劉安之後，以屈原為主的研究開始，歷代研究評論者眾，蔚成楚辭研究之主流，惟對宋玉的研究不多。最早簡略記載宋玉生平的是西漢的司馬遷，他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提出：「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讚許宋玉等人擅長辭賦，為屈原之後繼者，但對於宋玉身世則隻字未提。其後，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九辯序》中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辯〉以述其志。」是現存文獻中最早記載宋玉身份，以為宋玉是屈原弟子的資料。後來，《隋書·經籍志》：「楚辭者，

<sup>30</sup> 李炳海〈辭賦研究的視角轉換〉，《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4 期。



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則持續王逸的說法，以為宋玉是屈原弟子。

關於宋玉的生卒年，歷史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宋玉研究》則全面地綜合相關史事資料，結合宋玉佚賦的發掘與作品自述，修正並補充諸家觀點與說法，斷定宋玉一生經歷了楚頃襄王、考烈王、幽王、楚王負當四朝，大約生於楚頃襄王元年（公元前 298 年），卒於楚亡之時（公元前 222 年），享年七十六歲。進而否定了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與《隋書·經籍志》說宋玉是屈原弟子的說法，但肯定宋玉為景仰屈原道德、文章之後學。考證詳實，立論公正。

歷史對宋玉的評價不一，杜甫顯然是心儀且推崇宋玉者之一，他對屈原與宋玉的戀慕，屢屢出現在詩文中，如：

「竊攀屈宋宜方駕」（《戲為六絕句》之五）<sup>31</sup>

「有才繼騷雅」（《陳拾遺故宅》）<sup>32</sup>

「羈離交屈宋」（《贈鄭十八賁》）<sup>33</sup>

「氣劇屈賈壘」（《壯遊》）<sup>34</sup>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sup>35</sup>

「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送覃二判官》）<sup>36</sup>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秋興八首》）<sup>37</sup>

如此風流儒雅的文人，近世紀受到疑古思潮影響，面臨被質疑的命運，從 1949 年開始，關於宋玉的評價主要受到三個人影響，首先是郭沫若貶抑宋玉；其後劉大白質疑傳世作品中，除了《九辯》、《招魂》兩篇為宋玉所作外，其餘均屬偽作；最後連毛澤東都將宋玉作品賦予政治宣傳目的。宋玉文學的價值一時被忽略，直到 80 年代以後，隨著宋玉佚

<sup>31</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1，頁 585。

<sup>32</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1，頁 612。

<sup>33</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4，頁 774。

<sup>34</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6，頁 867。

<sup>35</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21，頁 1117。

<sup>36</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22，頁 1132。

<sup>37</sup>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 17，頁 899。

賦〈御賦〉的出土發現，宋玉研究出現新的熱潮，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高唐〉、〈神女〉賦；或從主題學角度研究傷春、悲秋、不遇等主題，特別是〈九辯〉的悲秋意識。宋玉研究再度面臨研究新局。

近年來研究楚辭的學者日多，但能夠翔實地從屈原到宋玉的辭賦發展作全面觀察的可謂絕無僅有，從《宋玉研究》到《楚辭全解》，「文獻研究與審美研究相結合」、「考古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淵源研究與接受研究相結合」、「精深研究與通俗普及相結合」四大面向的通盤整理，為楚辭愛好者提供了歷史的、客觀的文獻研究，尤其整理歷代對於屈原、宋玉辭賦的評價，亦反映了中國辭賦文學發展的變遷，書中評論不僅有著傳統的理論觀點，也有超越時代深具前瞻性的創獲與卓見，在近代文學史上具有承先啓後之功，先生真真是屈宋千古知音。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501-508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501-508

## 普及與提高兼顧，繼承與創新並重 ——吳福助《楚辭註釋》評介

張玉金 王 琨\*

書 名：《楚辭註釋》  
著 者：吳福助  
出 版 者：臺北，里仁書局  
出版時間：2007 年 3 月 5 日初版

《楚辭註釋》的著者吳福助先生，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臺灣文學館《全臺詩》編纂計劃研究員、《全臺賦》編纂計劃協同主持人，並兼任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研究專長包括「史記與傳記文學」、「秦簡與秦文化」、「楚辭與楚文化」、「中國文學文獻學」、「臺灣漢語傳統文學」等，著有多部專著。吳先生平生崇尚屈原完美的人格和堅貞的情操，潛心研究《楚辭》與楚文化十餘年，本書正是他研究多年之後的力作，是他研究心得和深厚功力的具體體現。

《楚辭註釋》收錄了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南楚作家群的作品九篇，排列依照漢代王逸《楚辭章句》的順序，悉數刪去《章句》中所收漢代作品。全書以宋洪興祖《楚辭

---

\* 張玉金，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琨，華南師範大學碩士生

補注》為校勘底本。每篇作品均作「解題」，用以概括講解、提示閱讀。原作分層註釋，每一層次先列原作，次列註文，再列釋文，清晰明瞭。尤其針對〈九歌〉這一作品中的對唱，著者進行了角色分配並加以提示語，如「主祭者唱」、「女巫唱」、「雲中君唱」、「湘夫人唱」等等，以清晰的條理給讀者以閱讀的便利。

全書共兩冊，上冊收錄〈離騷〉、〈九歌〉、〈天問〉，下冊收錄〈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上下兩冊書前均附有多幅表現楚文化之文物的精美圖片，第二冊書後附有四篇附錄，為楚辭、楚文化的延伸閱讀作品及書目。

縱觀全書，本書的特點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 一、針對性強，引導研讀

本書每篇作品前均有解題。解題根據篇章不同而有不同設計，形式多樣。有些作品有一個解題，如〈離騷〉、〈天問〉；有些作品有總解題和分解題，如〈九歌〉、〈九章〉。解題對作品的創作背景、寫作年代、思想命意、藝術特色等方面作出客觀公允的總括說明，內容涵蓋全面，豐富而精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引領性，從而提綱挈領地引導讀者研讀作品。另外，解題多處體現出對前人時賢研究成果的繼承，對諸家之新見的採納，而且並非簡單地予以肯定認同，而是進行科學嚴謹的考證，並在此基礎上闡釋了自己的獨特創見。解題的大致內容有以下幾點：

### （一）介紹作品的基本資訊

在解題中，著者往往先高屋建瓴，對作品加以總體評價和定位，如〈離騷〉的解題：「〈離騷〉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居於概括和總領的地位，是詩人屈原一生尋求愛國真理，並為之奮鬥不息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宏偉、震古鑠今的，具有自傳性質的長篇政治抒情詩。」

其次，對篇名的涵義也有細緻的解釋。如〈哀郢〉，引用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的觀點：「本篇以〈哀郢〉名篇，實質上是對危亡前夕的祖國的無比哀歎和沈痛悼念。」再如〈天問〉，從游國恩《天問纂義》的說解：「客觀世界的問難」。對〈遠遊〉篇名的解釋是：「篇名取自首句：『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內容也切合題意。這種名篇方

法，正與〈九章〉中的〈惜誦〉、〈思美人〉、〈惜往日〉同例。」不僅交待了篇名來由，而且聯繫屈原其他作品說明了「篇名取自首句」的名篇方法。這種細微周到的指導和提示隨處可見，讓讀者受益匪淺。

另外，對某些作品的創作年代作出分析判斷。如著者通過詩中流露的情緒和一些感歎年華易逝的詩句推斷〈離騷〉的寫作年代是楚懷王末年；通過引用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及金開誠《屈原楚辭研究》的研究成果作出判斷：「〈涉江〉寫作的具體時間，是緊接在〈哀郢〉之後，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

還有對作品層次和構架的分析。著者重視揭示層次之間的聯繫和作品的章法，如對〈離騷〉的層次分析、對〈九歌〉的整體構架的描畫，都清晰地展示了作品的線索和框架，從而幫助讀者分析和鑒賞作品。

最後，對作品的思想特點和藝術特色客觀地解讀與闡釋。如作者認為〈離騷〉的思想特色是：「進步的政治觀點，熱愛祖國、堅持真理的激情，忠於現實的藝術良心」，這種概括全面而精湛。再如〈天問〉，著者引用蕭兵的評論指出，作為哲理詩，〈天問〉的哲學價值高於美學價值，在藝術性上比〈離騷〉等作品稍有遜色。

## （二）從社會、文化、民俗角度解讀作品

最典型的當屬〈九歌〉的解題。由於〈九歌〉是楚地祭神樂歌的歌詞，反映了大量楚文化、巫文化的資訊，因此深入理解作品的前提是對作品的文化底蘊和民俗背景有所瞭解。本書在這一方面為讀者呈現了大量資訊。如〈雲中君〉介紹了南方民族中流傳的雷神神話；〈湘君〉、〈湘夫人〉反映了人類婚制由群婚制走向對偶婚過程中的愛情故事，指出湘君和湘夫人是對偶婚時代的一對臨時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中見於典籍文獻的「司命神」和他們的神職；〈東君〉所附麗的太陽神神話；〈河伯〉中對「河伯」究竟是黃河之神還是楚邦水神的考證；〈山鬼〉中關於山間精靈——山鬼的傳說；〈國殤〉反映的沅、湘間少數民族與中原民族不同的喪俗；〈禮魂〉描述的楚人「禮拜花魂」的儀式等等。正如著者所說：「〈九歌〉是研究古代南方文化的極其豐富的文化寶庫。」而讀者也正是在通過解題的介紹得以對這座寶庫初窺端倪，從而更感性透徹地讀懂《楚辭》。

### (三) 詮釋眾說紛紜的疑難問題

如〈九歌〉的解題中，著者依照林河《九歌與沅湘民俗》中的觀點將此作品的特質概括為：〈九歌〉所禮祀的是男神；〈九歌〉是人們以絕色女巫取悅男神的祀神辭；〈九歌〉是女巫與男神的情歌對唱。千百年來，衆多研究者對〈九歌〉的內容爭論不休，塵埃難定。如以上述三點特質為主線來區別角色，劃分唱段，確能將作品以清晰的整體面貌示人，給讀者展示原汁原味、風情並茂的楚地巫文化畫卷。爲了支撐這一理論，著者還舉沈從文〈神巫之愛〉這一描寫湘西雲石鎮花帕族婦女的巫師崇拜的作品爲例，說明原始宗教以身祀神的信仰習俗，並建議讀者參看，以助於對〈九歌〉特質的理解。著者在此理論基礎上對原文角色唱段逐一劃分，原作中許多疑難問題千古謎案迎刃而解，讀者看到的仿佛是一幕幕原始的戲劇。舞臺上人神對唱，女巫取悅男神，對不同的男神表現出或恭敬、或親和、或輕佻的態度，借由情歌傳達人們祈神求福的懇切願望。神秘原始的風俗、盛大詭異的儀式，如畫卷般在讀者面前緩緩展開。

再如〈遠遊〉的作者問題、〈招魂〉的對象問題，著者或列舉理由加以歸結，或引用原著作爲支撐，或搜集材料闡釋新見，充分體現了本書的閱讀價值和學術價值。

### (四) 指導讀者的延伸性閱讀和研究

如〈離騷〉解題中指出，後世一些仿效〈離騷〉而作，帶有自傳性質和史詩般畫面的巨作也值得讀者深入分析比較。再如〈天問〉解題中提到，唐柳宗元的〈天對〉正是對屈原所提問題作出回答的作品。還有〈遠遊〉解題中建議讀者將作品與中國歷代的遊仙詩和西方的神遊詩作比較閱讀，體會這類作品的共同特點。這些難能可貴的指導和建議，不論對閱讀者還是研究者來說，都是有益有助的。

### (五) 說明和探討同類著作沒有涉及的問題

如關於〈天問〉的錯簡問題，解釋了造成錯簡的原因，並以孫作雲《天問研究》爲依據列出了重新編排後的順序，使讀者對這一艱奧棘手的問題有了清晰的瞭解和認識。

總而言之，著者所作解題的豐富內容，不一而足，難以備列。即使不言譯註內容，

僅就解題而說，這已經是對《楚辭》較全面深刻的研究，值得學習者和研究者細細品讀。

## 二、詳備深入，創新詮釋

### (一) 註文詳備深入，從多方面還原作品原貌

#### 1. 註解詳盡、全面、準確，是本書的顯著特色

《楚辭》的語言形式、思想立意、藝術手法等方面都烙有楚地楚風的特殊印記，基於這個原因，註文註釋詞語、說明典故、考證史實，務求詳盡完備，全面準確，不留疑難。對字詞，注音釋義；對典故，追根溯源；對疑點，條分縷析。熔文字、訓詁、考證於一爐，從多個方面全面深入地還原作品原貌。

註文對難字、僻字、易錯字、方言字均標注讀音，一目了然。在註釋體例上，先釋字詞，難句疑句串講大意，清晰明瞭。如〈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褸兮醴浦」（頁172）中的「捐」字、「褸」字，先注讀音，再釋字義，並引《字林》、《方言》、《說文》及段注之解。對全句之意，加以按語，介紹古代女子在愛情生活中把自己的衣服送給情人這一習慣舉動，並舉《左傳》、明張宗昉《黔記》、清陸次雲《峒溪織志》、《紅樓夢》中所記此類行為為例。最後通釋此二句是說湘君因失望而氣憤，拋棄了湘夫人所贈的信物。講解透徹，使文從字順，意義顯豁，令人信服。這樣細密詳實的註文俯拾皆是，此類深入細緻的分析尤顯可貴。

凡有用典之處，註文一一追根溯源，詳細註明出處，如神話中的「黑水」（頁303）、「鯀魚」（頁305），《左傳》所記「伯林雉經」、「感天抑墜」（頁383），都有詳實註解。

凡有特殊語法現象和修辭手法，註文都給以清晰解說，無論似「紛吾既有此內美兮」（頁16）此類《楚辭》的特殊句例，還是「夕餐秋菊之落英」（頁31）中「餐」用為動詞等常見語法現象，均具體交待。再如指出「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頁58）二句互文，申明上句之意；揭示用「斲冰積雪」（頁153）比喻船飛駛時劈開水流，激起白色浪花，形容船行迅速，藉以表示湘君覓求湘夫人的焦慮心情。

凡出現楚地方言，均標注讀音，詳釋意義，如「汨」（頁18）、「齋」（頁25）、「遭」（頁151）等。

另外，對衍文脫字之處也一一交待，決不因循苟且。

## 2. 註解重視深刻性、啟發性，便於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和理解

《楚辭》既是一部文學巨著，又是一部民俗字典，更是一座文化寶藏，因此著者在對文本所反映的沅湘民俗、古代文化的介紹方面著力尤多。如對「體解」、「菹醢」等古代酷刑，「望舒」、「飛廉」、「雷師」等神話人物，「箏」、「瑟」等傳統樂器，「弭節」、「疏麻」、「椎髻」等古語詞的註解，還有對盟誓用語、「探情歌」、臺桑之通等民俗活動的介紹，都為讀者掃除了文化和語言的閱讀障礙，比起三言兩語的敷衍，本書細緻詳盡的註解是非常可貴的。在註釋神話民俗時，更有一些深入細緻的考辨。如用人類原始社會從母系過渡到父系的「產翁制」解釋「伯禹復鯀」（頁 286）的奇異傳說，考證女媧故事流傳至今的三個主要版本等等。這些考辨增加了本書的學術含量和文化含量。

釋義的全面深刻並未使著者忽視對作品的文學研究和啟發，如「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頁 60）四句，註文引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加以解讀：「這四句詩『就重華而陳詞』的結束語，重申自己堅定的立場，作為對女嬃的答復。與女嬃所勸誡的『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針鋒相對，遙相呼應，態度鮮明地作了否定。」再如「命天閹其開關兮，排闥闔而望予」（頁 647），註文引蘇雪林《楚騷新詁》描繪天閹神態、心理，活靈活現，生動逼真。這樣從文學角度對文本的解讀，對讀者更透徹全面地理解《楚辭》給出了有益的啟示。

在註文中，著者多處加按語補充遺漏的資訊，力求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把關於文本的資訊傳達給讀者。如釋「彭咸」（頁 117），按語指出他是屈原理想的標準人物；「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頁 44）二句，按語指出是在申明上文，以製衣裳喻修身，以香草喻美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頁 83）中之「二姚」，按語解釋為第三次追求的具體對象，並引林河說介紹了行歌走寨的婚俗；「子魂魄兮為鬼雄」（頁 245），按語考證當作「魂魄毅」，「為鬼雄」是「為鬼以雄」的省語；「忽忘身之賤貧」（頁 420），按語通過歷史背景分析了屈原自稱「賤貧」之因；更有《遠遊》一篇的層次分析都是由按語揭示提出。從這些點點滴滴細微之處，可以窺見著者傳播、給予的良苦用心。

## 3. 註解廣徵文獻，採納眾說，使註文呈現豐富厚重的面貌

註文廣泛參考了前賢時修的研究成果，融裁諸家之說並擇善而從，並力求以精練的語言將資訊傳達給讀者。如引《楚辭章句》釋楚方言「憑」為滿，並引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解釋了「憑」放於句首這一特殊的地域性的語法現象；引蕭繼宗〈湘君湘夫人



及大司命少司命四篇結構之研究〉的考證認為文本所描寫湘君所乘的船並非完全虛擬等等。本書不但採納舊說，而且對當代學界的新見地旁徵博引，全面吸收反映了古今楚辭研究的成果。據粗略統計，本書所徵引有關《楚辭》的文獻達到二十餘種，另據作者告知，本書所據以融裁的重要專著及論文，實際有百種以上，可見著者視野之廣，用力之勤。

尤為可貴的是，註文在援引成說時，以切實中肯的眼光對不同見解取捨精嚴又擇優而從，去偽存真而刪繁就簡，既不僅僅照抄舊注，又不只是援引成說，而是結合作品求深求真，提出自己的觀點和創見，對讀者從深層次品味詩歌內蘊助益甚多。如〈惜誦〉：「所作忠而言之兮」（頁413），「作」字洪興祖《楚辭補注》云：「一作『非』。」著者認為此句「所」字係「倘若、假設」之意，「古盟誓用成語之一種，與『非』、『不』連用。」因此斷定此句當從洪注所引異文，作「所非忠而言之兮」。取捨之間，反復斟酌，孰是孰非，說明原因，不做含糊之辭，給讀者一個明白交待，表現出著者對學術、對讀者負責任、盡心力的態度。

本書還十分重視對新材料、新證據的使用，一些出土文物、考古材料，都在著者的視線之內。如註文釋「高冠」時，提及長沙子彈庫楚墓人物御龍帛畫、包山楚墓漆奩漆畫中男子高冠形象；推測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戰國楚墓記載楚人所祭祀的神靈有所謂「雲君」，應即是「雲中君」的省稱。通過真實的材料提供旁證，結論是令人信服的，也由此可見著者寬闊的眼界，敏銳的目光。

總之，註文採納眾說，取捨精嚴，善於最大限度地使用資料，吸收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正是著者辛勤的工作和深厚的功力，使得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含量和學術價值。

## （二）釋文不拘傳統，形式創新，立足現代意識對文本整體再現

釋文形式的創新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釋文並未遵循傳統採用文言句式，或以整飭的詩句對應原作，而是改用通曉流暢的現代文學語言翻譯原作大意，並力求口語化、通俗化，顯示了著者深厚的語言根底。釋文忠於原作又跳出形式，用現代文學語言詮釋原作，新解讀、再創造與原作本身魅力完美結合。楚辭是地域性較強，表現手法多樣的作品，比起其他楚辭譯注作品過於追求形式的整飭，本書的釋文擺脫了字字對譯、照顧文體的

拘束，更傾向於注重揭示內在主旨情感，進一步開掘楚辭底蘊。書名用「繹」而非「譯」，似乎正在強調這種創新性的整理和演繹。對於普通讀者而言，本書通曉明白的繹文是一種親和的人文關懷，有利於楚辭文化的普及傳承。

除上述特點之外，本書為讀者考慮周到、設計細緻，確可稱得上是楚辭學入門者的奠基讀物。兩冊書前均附有多幅精美圖片，展示了反映楚文化的畫作、樂器、玉器、兵器、禮器、人俑等等，表現了絢爛多姿的久遠文化，給予讀者直觀、感性的認識。如展示圖片中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戰國中期〈人物御龍帛畫〉，畫中表現一男子逍遙御龍的生動形態，正可為〈離騷〉「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作出形象直觀的詮釋。第二冊書後還附有四篇附錄：賈誼〈吊屈原賦〉、司馬遷〈屈原列傳〉、漢人擬作〈招隱士〉和著者所列延伸閱讀書目。延伸閱讀書目包括兩岸各地出版、時跨四十餘年中對屈原、楚辭、楚文化、中國神話等深入探討研究的二十部著作，部部份量重、力道足。著者以細緻的設計周到的考慮引領讀者進入神秘奧妙、多彩絢爛的楚辭文化，其大家胸懷、導引姿態值得稱道。另外，本書紙質堅韌光滑，裝襯精美考究，捧書細讀，墨香悠然，令人愛不釋手。

當然，完美無瑕只能是理想化的追求，本書也不免有稍許瑕疵。筆者竊以為，以大陸人的眼光看來，註解中的注音全部採用注音字母，雖注音準確，但欠缺了普及性；有些標點似乎並無必要，如 438、439 頁〈涉江〉的解題中談到作品的藝術特色，「景物描寫與情感抒發，互相融合」，「音節、句法，最為錯綜」兩句中間的逗號皆可省去；個別語句仍待修改，如 617 頁《遠遊》解題中「〈遠遊〉可與中國歷代的遊仙詩，以及西方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密爾頓《失樂園》這類神遊詩作比較，從而窺探中西詩人如何共同創造出理想的天國世界，並幻想在天國世界裏遨遊，尋找理想的目標與歸宿」一句，似乎應在句末添加「的心理」，構成「窺探……的心理」結構。

但是瑕不掩瑜，總而言之，本書兼顧通俗性和學術性，無論對《楚辭》初學者還是研究者來說都是難得的精湛之作。對前者而言，是入門的奠基讀本，對後者而言，是優秀的參考著作，稱得上是極具學術含量和學術品味的國學精湛之作。

## 楚辭研究中的夜光珠 ——吳福助《楚辭註釋》評介

方 銘\*

李白《江上吟》詩曰：「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屈原楚辭，是戰國時期產生的不朽的作品，歷經兩千餘年的歲月滄桑，恒久地散發著璀璨光芒，如日月一般照耀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家園，在情感、思想、藝術、風格等多方面持續地影響後人，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著中國文學史燦爛華章的鋪展。並且，楚辭作品是對當時楚國文化、政治、民俗、地理等領域的精彩藝術表現，它為我們記錄了一個充滿特色的時代和地域，不僅給了我們極大的美感享受，還因為其中強烈的神秘感吸引著後人的不斷探索咀嚼。

對屈原作品的學習和研究，在〈離騷〉等作品一出現就開始了。和屈原同時的楚地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承襲屈原作品風格，創作了〈九辯〉等作品，這些作品，是在學習和模仿屈原作品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而宋玉等人開創的賦體文學，也孕育於楚辭之中。西漢初年劉安、司馬遷等對屈原及〈離騷〉的評價，今天還為我們所推崇。漢成帝時，劉向編纂《楚辭》，對《楚辭》文本的注解便為歷代學者所重視，傳世注本以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為最早，後世洪興祖、朱熹、王夫之、蔣驥等人具有創造力和影響性的研究，以浸染了不同時代、不同學術風格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觀點，把屈原及《楚辭》研究，不斷推向高潮。近代以來，隨著資料的豐富，方法的進步，觀念的維新，前人豐

---

\*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楚辭學》主編

富的研究成果和創作實踐，給了我們研究楚辭前所未有的基礎，楚文化的風貌、楚辭作者的人生，也因為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和多學科視角，更加清晰、完整地展現出來。而中國近代以來遭受的磨難、曲折，也為我們從深刻的心理層面理解屈原等楚辭作者，提供了心理契合的機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雖然大陸和臺灣學者信息隔絕，但是，兩地學者的楚辭研究，並沒有因此停頓。如前輩學者蘇雪林教授的楚辭研究，固然已經成為歷史豐碑，而如東海大學教授吳福助先生的《楚辭注釋》等著作的誕生，也說明臺灣學者對於屈原及楚辭的研究，仍然在不斷地前進。

吳福助先生的《楚辭注釋》，2007年由臺灣里仁書局出版。吳先生在該書，以「楚辭學奠基入門讀本」為定位，註釋屈原等戰國時期南楚作家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以至〈招魂〉等多篇作品，並附錄西漢時期的三篇文章：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賈誼〈吊屈原賦〉、淮南小山〈招隱士〉。另外在書中，還收錄了一些與楚辭作品相關的出土文物的圖片，後附「楚辭學」延伸閱讀書目，深入淺出，渾然一體。吳先生精煉地總結了前人的成果，討論了各篇目的主要爭論問題，生動地運用了出土文獻的佐證，恰當地採納了相關學科的研究，對具體字句的注解，做到博採眾長，而又通俗易懂。《楚辭註釋》不僅是一部出色的《楚辭》注本，可以引導讀者讀懂楚辭，理解楚辭，也是一部楚辭研究的入門書，可以為初學者打開「楚辭學」的研究門徑，同時，《楚辭注釋》也是蘊涵了吳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關於屈原及楚辭研究的學術著作，從其中我們可以領悟到吳先生關於屈原及楚辭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思索。

楚辭是戰國時期在楚國山水的滋養下產生的詩歌。楚國的文化發展，具有與中原地區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正是楚辭作品藝術魅力的重要組成元素。吳先生對楚文化有著非常全面、深入的瞭解，他對《楚辭》的註解往往立足於楚文化的特質。《楚辭注釋》上下兩冊前的出土文物圖片，形象地展示了楚辭作品中涉及的相關文物，吳先生結合作品加以解釋，有助於我們對楚辭作品的內涵和美感的認知。基於楚辭作品中楚地方言的特性，吳先生還揭示其韻律特點，像《九歌》這樣的與民俗關係緊密的作品，吳先生結合了沅、湘間少數民族保留至今的民歌來揭示其深層的文化特徵。針對〈河伯〉一篇所祭之神的爭議，吳先生則結合楚國的地理情況，認為並非祭祀黃河之神，而是楚邦的水神。基於楚文化對楚辭的解讀，當代學者雖然已經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吳先生的解讀，仍然可以給我們耳目一新的感覺。隨著我們對楚文化的瞭解的不斷加深，楚辭中的地域文

化特質一定會在以後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揭示。

基於對楚國歷史、文化的廣泛瞭解，以及吳先生深厚的學術素養，吳先生注《楚辭》，頗得「知人論世」之旨。註本中的作品排序全依王逸《楚辭章句》，但又在〈例言〉中總結諸家研究的結論，列舉作品創作年代的先後順序，建議讀者最好按照創作年代，依序研讀。結合作者的生平、時代，按照創作年代來細讀作品，確實能夠從一個既包含遞進關係，又有完整視野的立場，加深理解屈原曲折的一生。在〈國殤〉的解題中，吳先生結合當時楚國的具體情況分析了此篇的客觀歷史意義，並解釋了祭神組曲〈九歌〉中為什麼要加入一篇祭祀人鬼的作品的原因。而〈天問〉，作為一篇奇特的詩歌，吳先生側重從哲學、思想的層面的解讀，幫助讀者系統地瞭解屈原的思想。閱讀吳先生的註本，能夠強烈地感受到註者與這些詩歌的作者之間的情感共鳴，屈原生活的時代，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但透過這部註釋，他的精神，他的作品，他的人格，卻依然與我們很近。

吳先生對楚辭藝術性的分析特別突出。各篇前皆有解題，分條總結各篇作品的藝術特色，註釋中又分段、分節總結大義，明晰地表達出作品中的意義邏輯。吳先生從「〈九歌〉是人們以絕色女巫取悅男神的祀神辭」的角度出發，將〈九歌〉各篇皆區分出女巫、男神各自的唱段，以及合唱的唱段，發明楚辭的歌唱性，並使讀者可以合理地想像出祭祀中的歌舞場面的一些細節，對〈九歌〉文本的理解，也會因此更進一層。〈湘君〉、〈湘夫人〉這兩篇，更是綜合在一起來分析它們的藝術成就，認為這兩篇在〈九歌〉各篇中顯得特別突出，具有強烈的戲劇性和悲劇氣氛。在〈大司命〉與〈少司命〉這兩篇的解題中，吳先生認為屈原「把大司命描繪成一位年老冷酷、嚴肅認真而又公正無私，不輕易為女巫美色動心的男神」，而少司命則是「一位風流倜儻、備受婦女崇拜的壯年男神」，並且認為「〈少司命〉描寫人神戀愛，氣氛歡愉熱烈，與〈大司命〉的認真不苟，迥然有別」。這樣生動傳神的描述使得〈九歌〉祭神曲中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會幫助讀者達到很好的閱讀效果。而像〈河伯〉的解題中「女巫與河伯的情歌對唱比較親昵而隨便，沒有與大神相處的拘束感」，〈山鬼〉的解題中「女巫們以聲色去取媚山鬼時，是比較輕佻並且不恭敬的。而山鬼在接近女巫時，也顯得可憐巴巴和受寵若驚」，這樣的神態動作的描寫，則更是能夠增強讀者的帶入感。對〈東君〉的解讀，結合太陽神崇拜，又使該篇莊嚴熱烈的氛圍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屈原創作的組詩之間，有明確的整體性，他一生的創作，也是有明顯的連續性的。這一點，吳先生也有精到的解析。例如，突出〈九歌〉「戰國晚期楚國朝廷國定祀典所使

用的一套完整的祭神樂歌的歌詞」這樣的整體特性，各篇之間的解讀分析都可以互相參照，合在一起，頗能看出當時楚國的祭祀歌詞的整體特點。對〈九章〉的注解，儘管篇目的順序仍然是依照王逸的注本，但是吳先生根據寫作的先後順序來分述各篇的內容旨趣，按此閱讀，仿佛掌握了瞭解屈原的一生的一條線索。〈惜誦〉一篇，吳先生從文體和主題兩個角度，認為它既是「騷體詩」的開端，也是屈原悲劇一生最早的「憂愁幽思」之作，將之稱作「小離騷」或「前離騷」，可謂精妙的總結，一語道盡了〈惜誦〉與〈離騷〉的關係。

吳先生對楚辭作品在文體上和主題上的起承特別重視。在分析〈國殤〉時，吳先生比較《詩經》和《楚辭》中的戰爭詩，表明〈國殤〉對激烈戰鬥的場面描寫，是《詩經》中的同題材詩歌所不具備的，譜寫了戰爭詩的全新一頁，也為後代戰爭詩，特別是為唐代邊塞詩開了先河。〈橘頌〉作為屈原的早期作品，已可窺見屈原性情和思想的端倪，吳先生也分析了它的主題思想與屈原後來其他作品的關係，又點明〈橘頌〉是今存最早的詠物詩篇，開後世一體，並且比較了〈橘頌〉的詠物手法與《詩經》的比興手法和荀卿賦的同異。解讀〈遠遊〉時，則揭示了該篇對後世歷代遊仙詩主題的開創作用，並提出它可與西方文學經典中的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密爾頓《失樂園》等神遊主題的詩作比較，達到「窺探中西詩人如何共同創造出理想的天國世界，並幻想在天國世界裏遨遊，尋找理想的目標與歸宿」的目標。將〈漁父〉和〈卜居〉看作是楚辭的變體，與戰國時期主客問答體相聯繫，分析這種體式在辭賦文體發展中的作用。而附錄中的賈誼〈吊屈原賦〉，則作為「騷體賦」，上承屈原，下啟漢賦其中一脈；淮南小山〈招隱士〉，開啓了招隱題材。這種對文體發展的清晰勾勒，在註本中多有表現，可見吳先生不僅僅在研究楚辭，同時，也是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文體的發展梳理線索。

屈原是楚辭最重要的作家，但是形成楚辭恒久的藝術魅力和影響力的，不只是屈原，也包括了屈原之後的衆多作家。宋玉的作品，承繼屈原，又能別開生面，對後世也有深遠影響。吳先生對宋玉和〈九辯〉亦詳加解讀，認為〈九辯〉是宋玉借古樂曲名為題，表達自己的內心情感，將個人的遭遇與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具有深廣的思想內容和很高的藝術價值，並且分析了〈九辯〉突破〈離騷〉表現手法之各種優長。

吳先生對附錄的三篇文章也詳加闡釋，點出《史記·屈原列傳》與《史記》中其他篇目所不同的敘事與議論相結合的寫作特色，指出〈吊屈原賦〉讚頌悼念屈原的首出之作的地位，認為〈招隱士〉是「漢人擬作中最富於創造性和藝術性的佳作」。

對《楚辭》作品的采擇，一向是註解《楚辭》時特別重要的問題，不少註家是沿用劉向輯本，或在劉向本的基礎上增加後世作品的篇目，而吳先生則減少了劉向輯本的篇目數量，將眼光集中在戰國時代的作品，輔之以西漢時期的幾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個「減法」，也做得很好，使讀者對屈原的理解，更加集中、緊湊。

對文學史上經典作品的傳承，註解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註釋在我國的學術史上，一向與經學有著最為緊密的關係，而集部中的經典文本，也一直被人們以註釋的方式加以解讀，成為註釋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楚辭》作為一部文學作品，註本層出不窮，這也證明了其中可以闡釋、也需要闡釋的廣闊空間。《楚辭》作品涉及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屈原、宋玉等多位作家的生平，各篇作品的具體創作年代，多篇作品的真實作者，這些基本的問題都還存在著很多爭議。楚辭作品與楚地文化的具體關係，對楚地民歌的繼承，與楚地原始神話、宗教、祭祀的關聯，對中原文化的吸收借鑒，其中的人物、典故的所指，以及這些詩歌與吟唱、樂舞、戲劇化表演等相結合的真正表現方式，都有待進一步的出土文物的證實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並且，楚辭作品在後世，還形成了一個漫長的接受史。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都離不開楚辭的源頭性影響。楚辭所具有的獨特文體形式，對後世多種文體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楚辭作者對多種題材、環境、情感的開拓，大大拓展了詩歌的表現力；並且，在詩人主體與客觀事物的關係上，在象徵性與想像力上，楚辭也比之前的詩歌另有新變，從而在詩歌的創作手法上推動了中國詩歌的全面發展。另外，楚辭作品不僅具有高超的藝術性，還具有深厚的思想性，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在精神層面對後世的影響，與藝術層面同樣重要而且深遠。在戰國後期的時代背景下，屈原作為一個有著鮮明的政治理念的宗族朝臣，他的主張與楚懷王、頃襄王和其他重要臣子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衝突，他究竟在楚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鬥爭中起到過什麼樣的作用，戰國時期思想者的百家爭鳴與屈原的思想有著怎樣的內在關係，屈原的自盡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意義和影響，他又因何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被廣泛的民衆紀念的詩人之一，而在另一方面，為何屈原的性格和幾乎他所有的行為都曾經並且仍然在引起巨大的對與錯的爭議。這種種問題，是每一個屈原和楚辭的研究者都必然要思索的，也從各個層面指引著學者們展開研究的視野。吳先生對許多問題都進行了縝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雖然其中的一些觀點，與我的觀點尚有出入，而我一時之間，也還不能完全體會吳先生觀點的深旨，但是，吳先生宏觀與微觀、客觀與主觀、思想與情感結合的探求方法，卻讓我深感敬佩。

《楚辭註釋》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作者的釋文，自由奔放，美麗而具有詩感。相信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時刻體會到。

經典的文學作品，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血脈傳承，構築著炎黃子孫的精神家園。美麗的詩語，悠遠的詩境，醉人的詩意，高蹈的風骨，生動的形象，搖曳的韻律，仿佛一條紐帶，連接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閱讀吳先生的《楚辭註釋》時，我不僅經歷了與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的又一次情感共鳴，也仿佛與身處寶島的吳先生經歷了一次心心相印的促膝長談。我因此更加明白，屈原與楚辭不僅在兩千餘年來影響著中華民族的藝術與性情，也拉近了所有喜愛他們的人的心靈。屈原與楚辭表達了人們對藝術、對自然、對祖國誠摯的共通情感，這種情感從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和地域的阻隔而變化，因此，這些經典的詩歌，也必然不會在現今這個愈加全球化的新時代裏被淡忘，它們依然撫摸著每個人身體裏那顆或隱或顯的詩心，幽然不絕地釋放著迷人的詩意光彩。而我們在繁忙的物質生活之外，終將在詩心詩境中，尋覓到古人的共鳴，尋覓到現世的知音。

吳福助先生是我的前輩，但我與吳先生緣吝一面。多年以前，先師北京大學褚斌傑教授曾經給我介紹過吳先生的學術成就，知道吳先生在先秦秦漢研究方面，著作頗豐。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一直無由拜讀到吳先生的大作。今年年初，承蒙吳先生厚愛，惠賜《楚辭註釋》一書，捧讀之後，深受教益。吳先生嘗以 2008 年 4 月 12 日遊日月潭後見夜光珠而作〈日月潭夜光珠〉詩賜我，詩云：「明潭孕育夜光珠，輝耀青龍脈色殊。皓質殷勤長護愛，佛心對映一塵無。」我曾有緣在 2006 年參觀過日月潭，湖光山色映照下的日月潭的寧靜秀麗，更讓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我沒有見到日月潭的夜光珠。在我看來，吳福助先生的《楚辭註釋》，就是湖光山色的楚辭研究中，發出奪目光彩的夜光珠。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515-52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515-522

## 雅俗共賞的楚辭學佳作 ——《楚辭註釋》評介

張顯成\*

書 名：《楚辭註釋》

作 者：吳福助

出 版 者：里仁書局

出版時間：2007 年 5 月初版

《詩經》與《楚辭》是中國先秦韻文的雙璧，從《漢書·藝文志》可知，劉向編的《七略》，其〈詩賦略〉著錄的是繼〈六藝略〉、〈諸子略〉之後的第三類文獻，而〈詩賦略〉首列的就是「屈原賦之屬」，可知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在西漢就已經具有很高的地位了。從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開始，不知有多少學人沈迷於《楚辭》的研讀，更不知有多少文人志士，被《楚辭》所張顯的屈原人格魅力所激勵。屈原是《楚辭》的創始人，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發展影響最為深遠、並且激蕩中國傳統士大夫產生強烈心理共鳴的具有錚錚傲骨忠貞人格的政治家和文學家。難怪近世以來屈原被列入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之列，1953 年還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推舉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楚辭》也隨之進入了世界文學寶庫，所以，從世界文學史的角度來說，它的影響和地位已超過《詩

---

\* 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

經》。

在楚辭學發展到空前高峰的今天，有關的新作不斷湧現，而吳福助教授的新著《楚辭註釋》，無疑是近世楚辭學中開放的又一朵奇葩，粗讀一進，再次被作者著作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被作者深厚的功力所折服，覺得有必要將該書予以評介，以曉學界。

《楚辭註釋》為上下兩冊，精裝，大 32 開，計 800 多頁，上下冊正文前各有精美彩圖 14 頁，上冊有〈本書提要〉、〈作者小傳〉、〈例言〉各一篇。

《楚辭》作品之所指，自古以來就有廣狹不同，該書指「戰國時期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南楚作家的作品集」，即「採用劉向之前原始的《楚辭》觀，不包括漢代以下後人的仿作<sup>1</sup>」，凡九篇：屈原六篇，宋玉一篇，佚名二篇。該書對《楚辭》篇目的排列順序，悉依王逸《楚辭章句》舊貌，即依次為：屈原〈離騷〉、屈原〈九歌〉、屈原〈天問〉、屈原〈九章〉、屈原〈遠遊〉、佚名〈卜居〉、佚名〈漁父〉、宋玉〈九辯〉、屈原〈招魂〉。

為了讓讀者更深入全面解讀《楚辭》及屈原，下冊正文後還有四個附錄，依次為：關於屈原最早的傳記——司馬遷〈屈原列傳〉，弔念屈原的首出之作——賈誼〈弔屈原賦〉，漢人擬作中最富創造性和藝術性的作品——佚名〈招隱士〉，以及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楚辭學的代表性著作目錄——〈延伸閱讀書目〉（共列書目 20 種，並逐一簡介之）。

由該書的結構可知，在謀篇佈局上，作者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既渾然一體、融合無縫，又充分兼顧了學術性與可讀性。

縱觀全書，最突出的特色是學術性與可讀性並重，堪稱雅俗共賞的楚辭學佳作。

誰都知道，《楚辭》比《詩經》難讀，因為屈原既是充滿活力的政治家，又是極度浪漫的文學家，其作品反映出的高度清醒之理智與狂熱迷亂之情感的矛盾交融，鮮明的個體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奇特交融，以及篇章結構的大起大落，原始而神秘的巫風和濃郁的楚方言色彩，都遠比《詩經》難以理解。所以，要撰寫一部真正體味原作思想的雅俗共賞的《楚辭》作品，其難度是頗大的，對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這就要求作者首先必須要具有堅實的功底、深厚的功力。就研究對象而言，越是前人研究得多的文獻，其研究成果就越多，其研究的難度就越大，因為，不光這類研究可拓展的空間小，而且首先需要全面掌握系統瞭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有在此基礎上，才

---

<sup>1</sup> 見該書上冊〈例言〉。

有可能進行研究。自王逸《楚辭章句》近兩千年來，研治《楚辭》的作品汗牛充棟<sup>2</sup>，要寫一部高質量的《楚辭》校註或註譯類作品，光掌握前人成果，進行綜合、排比、分析，以擇善而從，就已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還更是非版本、目錄、校勘之學，與文學、史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等兼通的飽學之士不能為的工作。吳教授學識宏富路數寬廣<sup>3</sup>，且「平生最愛慕屈原終其一生修身潔行，孤芳傲世，追求完美人格的堅貞情操，潛心《楚辭》與楚文化研究已十有餘年<sup>4</sup>」，故著成《楚辭註釋》一書，自是順理成章、情理之中之事。下面來看看該書是怎樣體現濃厚的學術性，並努力做到雅俗共賞的。

《楚辭註釋》採用的校勘底本是 2002 年北京中華書局白文化等點校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的重印修訂本。眾所周知，洪本是一個較好的註本，中華書局的點校修訂本是目前洪本之佳者。作者以此本為底本，「凡遇洪興祖《楚辭補注》文本之疑義未安處，除參考該書所徵引諸家異文外，另又參考 1996 年 8 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金開誠等著之《屈原集校注》所引其他各種重要版本異文<sup>5</sup>」。如是，便首先在版本和材料的搜集、運用、掌控上佔據了制高點，為下一步的註釋的展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有了掌控材料和版本的基礎，接下來便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斟酌判斷取捨，這是繼承和發展一門學問最重要的工作，《楚辭註釋》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好，例如：〈涉江〉的「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湘」兩句，其中的「江湘」不好理解而有多說。一般認為指「長江」和「湘水」；但這裏是「且余濟乎江湘」，一個早上就要渡過「長江」和「湘水」一般是不可能的，故有不少人認為此說不妥。有的人為了證明屈原一個早上渡

<sup>2</sup> 據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為崔富章主編《楚辭學文庫》其中一種，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至上個世紀末，僅歷代楚辭學與楚文化的專著就達二百多種，故有關論文就更不計其數了。

<sup>3</sup> 吳教授的治學路子是十分寬廣的，他的研究專長包括「楚辭與楚文化」、「中國文學文獻學」、「秦簡與秦文化」、「史記與傳記文學」、「臺灣漢語傳統文學」等諸多方面，其獨撰著作除《楚辭註釋》外，主要還有《史漢關係》（文史哲）、《史記解題》（河洛）、《漢書探錄西漢文章探討》（文津）、《秦始皇刻石考》（文史哲）、《睡虎地秦簡考論》（文津）、《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文津）等，另獨編和合編專書數種，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數項，詳見謝鶯興〈吳福助先生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81 期，2008 年 6 月 15 日。我們僅從這些著作目錄，即可知其學識之廣博和深厚。此絕非溢美！

<sup>4</sup> 詳該書上冊〈作者小傳〉。

<sup>5</sup> 詳該書上冊〈例言〉。

過了「長江」和「湘水」二江，便設法去考證屈原的渡江路線，企圖為之找一條最近的一個早上可以渡過的路線<sup>6</sup>。有的學人認為這裏的「江湘」是上古漢語的「大名冠小名」語法形式，「江」是大名，「湘」是小名，當理解為「湘江」，所以屈原才可能一個早上渡過去。關於「江湘」的解釋還有一些說法，茲不贅舉，僅就這些不同說法就已使人難以抉擇了。我們來看看《楚辭註釋》是怎樣處理這一難題的，該書是這樣詮釋的<sup>7</sup>：

〔旦〕清晨。〔濟〕渡水。〔江〕長江。〔湘〕湘水，是湖南省境內流入洞庭湖的大河。清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屈）原自陵陽至辰湫，必濟大江而歷洞庭。」清戴震《屈原賦注》：「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以下，得兼江、湘之目矣。」

從以上幾句簡短的詮語可知，作者的意思是：「旦余濟乎江湘」一句，字面意思是「早晨我渡過了長江和湘水」，而實指「早晨我渡過了長江」。即「江湘」字面意思是指「長江」和「湘水」，實際上是指「長江」。因為「（屈）原自陵陽至辰湫，必濟大江而歷洞庭」，「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以下，可兼稱「江湘」。這裏，作者並沒有作任何考論，更沒有作大段的考論，而是巧妙地將清蔣驥和戴震的詮語組合起來，貼切地詮釋了詩句的真意，不可不謂之妙！當然，還有一點就是作者未明說的話，即這是詩歌，要講求用字與音韻的和諧、意境的美異，所以屈原言「旦余濟乎江湘」，自然深得賦文之妙。試設想，如果屈原把這兩句賦文寫成「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還有賦文的用字音樂美和意境美嗎？我們僅就此兩句賦文的精彩註釋，就可看出該書強烈的學術性和可讀性，看到其雅俗共賞的鮮明特色。

《楚辭註釋》每篇賦正文前都有「解題」，總括前人研究成果，擷取正確結論，說明篇題命意、創作背景、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這些「解題」，行文平實，但都具有很強的學術性，閱讀這些解題，極便於讀者理解賦文，例如〈離騷〉前的「解題」，長達 12 頁多，對〈離騷〉作了簡明而透徹的介紹，主要闡述了篇名的涵義、詩的寫作背景、詩的內容、詩的思想特色、詩的藝術特徵等。其中，「思想特色」闡述了如下三大點：（一）進步的政治觀點，（二）熱愛祖國、堅持真理的激情，（三）忠於現實的藝術良心；「藝術特徵」闡述了如下四大點：（一）戲劇化的情節刻畫，（二）空前宏偉的意象系統，（三）

<sup>6</sup> 筆者二十年前便遇見過這樣的先生，且是不遺餘力撰文考證。

<sup>7</sup> 以下詳該書下冊頁 442 註⑬。

強烈的自我意識（下分三小點：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肯定、對自我的不斷完善），（四）昂揚激蕩的韻律<sup>8</sup>。由此可知，此「解題」簡直就是一篇分量十足的學術論文，閱讀這些「解題」，對詩文的理解自然非常有益。

《楚辭註釋》每篇賦正文前是「解題」，然後是正文，即賦文和「今註」、「今釋」。作者依詩意將正文劃分成若干段落，每段先出賦文，接著是「今註」，最後是「今釋」。「今註」主要「包括詞語的解釋、典故用事的說明和史實的考證等」，作者努力做到「融裁諸家之說，擇優而從，力求詳備」，並且繁簡得當，對前人時賢議論「凡有特殊可貴見解者，選擇其最簡切精當之說加以援引」，「部分分歧說法，擇要附說」，「至於謬誤見解，則一律省略」，以避免讀者無所適從<sup>9</sup>。上文所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湘」兩句的註釋文字，即已充分體現了該書「今註」的學術性與通俗性之並重，體現了作者集大成的巧妙手法。

「今釋」是對賦文的譯述，作者之所以不稱「今譯」而稱「今釋」，理由正如作者所說：「《楚辭》『書楚語，作楚聲』，且又大量運用雙聲、疊韻詞和疊字。如此具有楚地方言的地域性，又富於特殊表現形式和音樂性的詩歌語言，要用現代文學語言重新予以翻譯創作，並且要求照顧文體，字字對譯，忠實於原作，絕對是成效不佳而又意義不大的。本書對原作放棄直接翻譯，改採演繹大意方式，稱為『今釋』。釋文不拘泥原作體式，力求詳盡發揮內容旨趣，對於其中大量的比喻、比擬、象徵藝術手法背後所表現的主觀思想感情，也盡量加以揭示說明，俾便幫助讀者深入瞭解作品奧義<sup>10</sup>。」我們下面來具體看看作者是怎樣「今釋」〈離騷〉中我們都很熟悉的「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四句的<sup>11</sup>：

我既擁有不尋常的世系、生辰、名字，具有天地賦予的眾多內在的美質，再加上不斷努力，進修鍛煉得來的優秀才能。我身上披服著芬芳的江離和幽潔的白芷，又將秋蘭貫聯成串作為佩飾。我講求自我修養，通體芳潔，要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sup>8</sup> 詳該書上冊頁 1—13。

<sup>9</sup> 詳該書上冊〈例言〉。

<sup>10</sup> 詳該書上冊〈例言〉。

<sup>11</sup> 以下詳該書上冊頁 18。

以上釋文可謂真正做到了未拘泥原作，而又充分詳盡發揮了原作的內容旨趣，充分揭示了原作的思想感情，完全起到了幫助讀者深入瞭解作品奧義的作用。

爲了充分做到雅俗共賞，深入淺出，幫助讀者盡快深入瞭解「戰國南楚文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屈原一生創作的系統過程」，作者建議：「最好依據作家產生及作品創作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有系統的閱讀。」並在「綜合諸家考證所獲結論」的基礎上，開出了《楚辭》研讀順序篇目表：「(一)〈橘頌〉，(二)〈九歌〉，(三)〈惜頌〉，(四)〈離騷〉，(五)〈思美人〉，(六)〈抽思〉，(七)〈天問〉，(八)〈卜居〉，(九)〈招魂〉，(十)〈遠遊〉，(十一)〈哀郢〉，(十二)〈涉江〉，(十三)〈悲回風〉，(十四)〈漁父〉，(十五)〈懷沙〉，(十六)〈惜往日〉，(十七)〈九辯〉<sup>12</sup>。」由此可知，作者爲了努力做到學術性與可讀性的統一，可謂匠心獨運、用心良苦，充分考慮到了研治《楚辭》的邏輯性，實乃初治楚辭學人的極好引導。

上文簡介該書結構時曾說過，該書正文後還有四個附錄，即司馬遷〈屈原列傳〉、賈誼〈弔屈原賦〉、佚名〈招隱士〉、〈延伸閱讀書目〉。這些附錄，對於讀者更深入全面解讀《楚辭》及屈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不謂雅俗共賞的又一巧妙設計。

上文簡介該書結構時還曾說過，該書上下冊正文前各有精美彩圖 14 頁。這些彩圖，大都是出土楚地文物，少部分是出土中原文物和一幅春秋戰國戰車乘戰復原圖；並且，作者還給每幅彩圖配了說解文字。例如：

上冊的第一幅彩圖：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的戰國漆畫「迎賓出行圖」。所配說解文字云：「『迎賓出行圖』是已知中國最早的一幅通景畫，它如實地表現戰國晚期貴族朝聘的禮節。由使者所乘之車爲飾車，所用挽爲革挽，車後飄拂的旌旗，知是大夫以上享用。屈原曾做過楚國的左徒、三閭大夫，應該也經歷過這種場面。讀者可睹物思人，設想屈原生活的時代風貌。」

上冊的第三幅彩圖：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戰國中期的「人物御龍帛畫」。所配說解文字云：「畫中男子峨冠博帶，廣袖曲裾，頭頂革蓋，馭龍而行。御龍凌虛，逍遙徜徉，相信是當時很多楚人精神情態的生動體現。〈離騷〉：『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

<sup>12</sup> 詳該書上冊〈例言〉。

下冊的最後兩幅彩圖：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矛狀車害、春秋戰國戰車乘戰復原圖<sup>13</sup>。所配說解文字云：「車戰雖盛行於殷商至西周，但到戰國晚年仍為軍隊主力兵種之一。戰車一車四馬，乘員三名。車軸兩端用害來保護輪轂，害也具有撞擊穿削的功能。〈九歌·國殤〉：『車錯轂兮短兵接』，生動地描寫這種車兵交戰的情況。」

由此可知，這些彩圖和所配的說解文字，對於幫助讀者解讀《楚辭》及其時代的有關歷史文化，具有極大的裨益，不可不謂該書雅俗共賞的又一大亮點。

總之，《楚辭註釋》是實實在在的楚辭學奇葩，是近年來少見的楚辭學佳作，此書最大的特色，就是雅俗共賞，學術性與可讀性並重。上文曾言，研治《楚辭》的作品汗牛充棟；但是，雅俗共賞的楚辭學作品太少，特別是能善於吸收古今研究成果的學術與可讀性並重的楚辭學作品更是難尋，長期以來學界都在呼喚著一部高質量的雅俗共賞的楚辭讀本的問世。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了吳教授《楚辭註釋》的梓行，我們不光為作者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而且要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吳教授為楚辭學所作的貢獻；同時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批研讀楚辭的後起之秀，在這部《楚辭註釋》的引領下，以堅實的步伐、最短的時間，走進楚辭學的神聖殿堂。

《楚辭註釋》註解詮釋的準則是盡量選擇平正不怪之說，對有不同說法者，不展開討論，這對於該書「作為『楚辭學』奠基的入門讀物<sup>14</sup>」之定位是很合適的。上文曾言，該書的四個附錄之一是〈延伸閱讀書目〉，因為「讀者詳讀本書，獲得基礎知識與能力後，自可進一步攻讀『楚辭學』相關重要著作，作更為深入詳瞻的探索」，故「列舉延伸閱讀書目作為附錄，以供參考」。受篇幅之限，該附錄只列了研治《楚辭》的書目 20 種，若能再列一些代表性的著作，特別是持有不同解讀意見的著作，可能會更有利於讀者進一步研讀《楚辭》。因為對《楚辭》的理解見仁見智者太多，不同的分歧意見太多，故若今後再版，建議作者考慮再增列一些延伸閱讀著作，特別是增列那些持有不同解讀意見的代表性著作。

據作者相告，該書本打算要附大量相關圖片，但因顧慮出版行銷成本，只好由書局編輯代勞選印了少量圖片，這自然是一憾事。從該書所附的 28 頁圖片即可知，這些圖片對於幫助解讀《楚辭》有極大的好處，建議作者另撰一部《圖說楚辭》（或《楚辭圖說》），

<sup>13</sup> 這兩幅圖同置於一頁（彩圖第 14 頁），前者置於頁上方，後者置於頁下方。

<sup>14</sup> 見該書上冊〈例言〉，下同。

與《楚辭註釋》相輔相成，相配而行，若如是，相信一定會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

近兩年，陸續拜讀到吳教授的大著，繼三巨冊《全臺賦》之後<sup>15</sup>，新近又讀到這兩大冊《楚辭註釋》，我為吳教授的功力與高產所折服，真乃可欽可佩，也可喜可賀。祝願吳教授在治學的道路上永葆充沛的精力、永駐時代的青春，為學界奉獻更多的精品佳作。

---

<sup>15</sup> 《全臺賦》，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2月出版。



## 人性眼光，史家情懷 ——《中國文學史新著》評介

馬世年\*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關於中國文學史的重寫，不僅是一個理論上的焦點話題，更是實踐中的熱點領域。各種文學史著作層出不窮，文學通史、斷代史、分體文學史、文學編年史、地域文學史等等，形式不一而足。而在不同的形式背後，根本性的差異在於文學觀念，不同的文學觀念產生出不同的文學史著作。不過，就以往的文學史著作而言，文學觀念的更新與突破在本質上並不多見。正因為如此，章培恆、駱玉明二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新著》及其增訂本<sup>1</sup>，既預此「文學史重寫」之洪流，又一空依傍、獨創體系而自成一家，在文學觀念、學術思想、撰述方式與具體內容等方面，都對中國文學史的既有模式作了全面突破，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性著作，極具學術個性與創新精神。其中 2007 年 9 月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以下簡稱《新著》），尤為集中地反映了章培恆先生對於整個中國文學史系統、深入的思考<sup>2</sup>，最能凸顯其創新

---

\*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sup>1</sup>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中國文學史新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該書計畫為三卷本，但僅出版上、中二卷）；《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總社聯合出版，2007 年 9 月。按：從《中國文學史》到《新著》及其增訂本，這之中既有著前後承接、貫穿始終的學術思想、理念以及學術成果，更有著學術的發展與創新。故本文如無特別說明，則所稱「《新著》」即指此增訂本。

<sup>2</sup> 按：《新著》共 170 萬餘字，其中章培恆先生撰寫（包括合撰）的篇幅達到三分之二以上。這由書末

性來。在我看來，這種突破與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用人性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強調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進而改變舊有的文學史分期模式；特立獨行、多立新說，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注重實證、追求創新。梁啓超說：「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又說：「做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sup>3</sup>。」本書便是兼具此「專門學素養」與「通識」之作。

## 一、文學史中的「人性」眼光

本書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將人性納入到中國文學的發展、演變之中，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進的基本線索。這在文學觀念的更新上無疑是有著開創意義的，因而被諸多的評論者所關注。將人性與文學聯繫起來，或者宣導文學中的人性、「人的文學」，儘管並不是全新的命題，但將人性作為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與基本的動力，並將其貫穿在整個文學史之中，以人性的眼光來撰寫中國文學史，這卻無疑是著者的創見。因此，1996年《中國文學史》甫一面世，即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評價，被錢伯城先生譽之為「石破天驚」之作（見《中國文學史新著·原序》，以下簡稱「〈原序〉」）；孫明君先生則說該書「開創了文學史研究的新境界，它的出版標誌著古典文學研究打破了舊的思維定勢，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擾的時代<sup>4</sup>」。不過，著者卻並不滿足於1996版的成績，而是認為：「如果從學科更新的高度來看，則那部書在這方面至少存在著兩項明顯的不足：第一，人性的發展呈現怎樣的樣相和態勢？第二，這種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和美學特徵的演變的關係又如何？只有對此作了較為具體的、哪怕是初步的闡述，才能把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原序〉），因而對其作了全面的修訂。《新著》不僅將人性的發展徹底貫穿於其中，使其真正成了全書的靈魂，更是為它與文學的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找到了合理依據，那就是文學中所體現出來的美感。這樣，全書的基本思想就體現為：「著眼於人性的發展制約下的文學的美感及其發展。這既牽涉到文學與人性的關係，也離不開文學的藝術形式。」（《中國文學史新著·導論》，以下簡稱「〈導論〉」）。

---

所附撰寫分工可知。

<sup>3</sup>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sup>4</sup> 孫明君〈追尋遙遠的理想——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換言之，「人性本身就並不是凝固不變的，它一直處在發展的過程中，而文學的發展又通過美感的媒介而與人性的發展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導論〉），這就使得人性的發展與文學的演進之間更具有邏輯性。而所謂人性的發展，「是不斷地發現、肯定個體的需要並為其實現而努力，在這樣的過程中，人性就日益完善，個性也日益豐富，具體人性與『人的一般本性』的差別則日益縮小」（〈導論〉），說到底，就是對人的個性的充分肯定與張揚。以此為視點來反觀中國文學的發展，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從群體意識向個體意識發展的脈絡來，也可明白中國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發展的根本原因與基本動力，就在於人性的發展。

與此一致，《新著》在內容的取捨、文學史評判以及作家作品的解讀上便主要立足於人性的視角。本書對以往許多被忽視的作家予以重視與重新發現，譬如南朝文學總集《玉台新詠》、北朝作家李諧、唐代詩人韓偓、明末詩人王彥泓、清人沈復《浮生六記》等作家作品，《新著》便是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又如在講到兩漢的散文時，涉及到很多的書信，包括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楊惲〈報孫會宗書〉、班嗣〈報桓譚書〉、李固〈遺黃瓊書〉〈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朱穆〈與劉伯宗絕交書〉、張奐〈與延篤書〉、秦嘉〈與妻徐淑書〉〈重報妻書〉、臧洪〈答陳琳書〉等，著者將目光投注到作者的內心世界裏，關注著他們人生的歡樂、哀愁、苦痛、悲憤以及挑戰與反抗，也關注著他們情感的真摯與懇切，這在以往的文學史中是很少見的。我們想，《新著》之所以選用如此多的書信，當是以此更為真實地反映著個人的真情、反映著人性與美感，而較少掩飾與遮蔽。另一方面，一些在傳統視野中被重點關注的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因為其中對人性與美感表現的不足而被有意識地加以淡化，這一點也是閱讀時不可忽視的。如《荀子》只講其〈賦篇〉與〈成相篇〉而忽略其他，《韓非子》則強調其專制獨裁理論背後的個人的「悲哀」，強調〈孤憤〉等幾篇「隱含感情的作品」，而沒有涉及人們耳熟能詳的《五蠹》等內容；《文心雕龍》著重探討劉勰對「美」的認識而不關注其「原道」、「徵聖」、「宗經」、「正緯」的體系建構；唐宋古文運動因其思想政治意圖過多而只是簡略提及，等等。

如果進一步追問：著者——尤其是章培恆先生——為何執著於以人性的眼光來解讀中國文學？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著者的現代意識與人性關懷。誠如陳思和先生所說：

章先生是「五四」新文學精神培養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的頭腦裏沒有現在那些流行於世的鼓吹國學、企圖讓中國重返傳統的亂七八糟想法……所以他對於傳統

中儒家文化道德的批判非常嚴厲，直接把它視為壓制人性、破壞藝術的對立面；甚至連溫良恭儉讓的審美範疇也需要重新檢討，因為其傷害了詩人的藝術表現力<sup>5</sup>。

也就是說，這種人文精神是根源於「五四」精神的。郜元寶先生在其〈讀《新著》〉，想「二周」一文中也說：

章先生《新著》汲取大量文學史研究成果，以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和現代形式論美學做經緯，但論其對中國文學本身的認識，以我的淺見，恐怕與「五四」因緣更深。具體來說，就是頗采「周氏兄弟」成說，對胡適則時有反動。學術統系上，《新著》是對「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新文學內部一系文學史觀念與方法的再發揮<sup>6</sup>。

他從魯迅、周作人等啓蒙者的思想中探尋章培恒先生文學史理念的來源，這見解無疑是有道理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便能理解章先生為何執著於人性的關懷，也便在讀《新著》時每每被其中體現出來的這種關懷感動著。

## 二、「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

「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是章培恒先生作為文學史家多年來非常關注並且認真探索的學術命題，也是他關於中國文學發展所持有的基本思想。他曾說：

至於「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的確是我多年來的研究中很關注的一個問題。正如前面我所說自己的學術經歷，我在研究古代文學的時候，對於現代文學始終飽含興趣與熱情。這種興趣與熱情反映在我對中國文學的整體思考中，便是想儘量就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做一些探索與描述。而要探索文學發展的過程，光從古代

---

<sup>5</sup> 陳思和評〈中國文學史新著〉，《文匯讀書週報》，2007年12月21日。

<sup>6</sup> 郜元寶〈讀《新著》〉，想「二周」，《文學報》2008年2月1日。

文學談是談不清楚的，所以需要把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關聯起來考察<sup>7</sup>。

《新著》對此思想予以全面的貫徹，詳盡勾勒了中國文學如何從上古開始，在文學精神與文學形式等方面經歷中古與近世，一步步發展、演變為現代文學，從而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乃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二者之間本為「相通」而非「斷裂」——章先生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五四斷裂說」的。這也是本書極具學術個性與創新精神的一個方面。

從本質上說，「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內在動因就是著者所主張的「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演進的基本線索」，同時，它又有著鮮明的外在體現：一方面表現為對中國文學史傳統分期模式的突破；另一方面表現為對文學形式演變的重視。

就文學史的分期而言，《新著》對傳統文學史觀念中以朝代作為分期標誌的結構模式作了顛覆，把現代以前的整個中國文學劃分為上古文學、中世文學、近世文學三個階段，中世文學又分發軔、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學則分萌生、受挫、復興、徘徊、嬗變五期。這就完全回歸到了文學本體，強調從文學自身出發來思考文學發展的線索，也即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所說「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準來制定」。需要指出的是，《新著》不只是在理論上提出了新的文學史分期方式，並深入闡述了新的分期的依據（人性與文學的關係、文學形式的演進等），更是將此理論融會在全書中，使其成為整部著作「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如果將此與 20 世紀 90 年代末出版的另一部影響很大的文學史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sup>8</sup>——作一比較的話，我們不難看出這種做法的積極意義來。袁先生在其《中國文學史·總緒論》中也談到中國文學的分期問題，並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的「三古七段」說<sup>9</sup>，體現出著者對於舊有模式的反思與創新，不過其最終的分期卻依然採用了朝代分期模式。——自然，這種回歸傳統的分法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但總體看來，相對於「三古七段雙視角」的說法，《新著》卻要走得更徹底、更具有文學的本體意識。

就文學形式而言，《新著》充分吸收了西方形式美學的成果，對於文學形式的內涵作了新的理解，提出「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語言所構成的體系……作品的內容（包括感情）

<sup>7</sup> 章培恆、馬世年〈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章培恆先生學術訪談錄〉，《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1期。

<sup>8</sup> 該書 1999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修訂後出版第二版。

<sup>9</sup>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頁11-16。

則不但是由形式所體現，而且形式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內容本身」(〈導論〉)，因而，《新著》將文學形式(包括作品的語言、風格、體裁、敘事方式、由各種藝術手法所構成的相關特色等)作為考察的重點，對此進行了相應的藝術分析。另一方面，《新著》系統分析了文學形式的演進軌跡與態勢，指出「文學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文學內容的演進是通過形式的演進而體現出來的」(〈增訂本序〉)。如果結合清代焦循所說文學「一代之所勝」(《易餘齋錄》卷十五)、王國維所說「一代之文學」(《宋元戲曲考》)等論斷，則可更深入地理解我國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獨有的航向。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這一命題所具有的現代意義與價值。上面提到了「斷裂」的說法，「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就是要反對「五四斷裂說」，要證明「五四」新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歸宿。因此，《新著》無論是從人性的發展來看中國文學的發展，還是對中國文學史所作的重新分期，乃至對文學形式演進的重視，其現代指向非常明確。章先生說：

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如果不只是在前人的框架內作些修補或發揚的工作，那就只能以現代文學為座標重新進行思考。為此必須對現代文學或者當代文學做出我們的評價……也只有我們在對現當代文學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後，然後才能夠把我們認為其中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作為座標，再往上推。所以我剛才所說的以現當代文學作為座標，實際上首先是把我們認為現當代文學裏面的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作為座標；當然，也要考察現當代文學中負面的東西與古代文學之間的聯繫<sup>10</sup>。

從中可以明確地看到，他所強調的「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其根本目的便是以現代文學為其歸宿與指向的。

正是強調中國文學從古到今的「自身」的演變，因此，本書也體現出強烈的民族自信心，「中國文學從上古至近世的整個演進過程原是必然要導致這種追求『人性的解放』的文學的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只是加速了它的出現而已」(〈增訂本序〉)。這對於過度看注「五四」以來西方思想文化對我國現代文學的影響、甚至主張「西化」的觀點來說，無疑有著矯枉糾弊的意義。

---

<sup>10</sup> 章培恆、馬世年〈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章培恆先生學術訪談錄〉，《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1期。

不過，《新著》儘管強調對現代文學的重視，卻並未能將其囊括進來。這或許與作者精力、著述體例等因素有關，但總令人有些許遺憾。其實，關於現代文學，章先生是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的，並且計畫撰寫一部打通古今界限的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他曾說：

我認為從 20 世紀開始中國文學就進入了現代時期；但現代文學之奠定堅實的基礎是在新文學的階段，也就是從文學革命開始，一直到 1936 年魯迅逝世的這一階段，這是為現代文學確定方向的時期……就我自己的文學史而言，對於文學演進的歸宿的 20 世紀文學，我會更注意它跟以前文學的聯繫，比如以前的文學中消極的方面跟現代文學中的消極現象的關係等。這些方面我可能會說得多一些<sup>11</sup>。

我們也期盼著章先生理解下的現代文學史早日面世。

### 三、實證與創新

「實證與創新」主要是就《新著》在具體學術問題上所體現出「特立獨行」的個性特點而言的。可以說，重視實證、自成新說是《新著》之「新」的另一體現。關於具體學術觀點上的創新，著者曾在〈原序〉中自舉例說：

本書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採取了新的做法，提出了新的見解。舉例而言：（一）以《詩經》為依據，探討我國詩歌從周初到春秋時的發展過程，這是以前的文學史著作所沒有進行過的工作；（二）肯定〈大招〉作于秦末，這是本書的新說；（三）認為五言詩在漢武帝太初改曆以前已經出現，並已達到較高藝術水準，這雖本於前人之說，但卻與建國以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異趣；（四）以為四聲和平仄的區分、八病的發現和聲律的形成是受梵文的影響，此說雖由陳寅恪先生發其端，並為最近二十餘年來之海外學者的研究所證實，但將此種研究成果引入中國文學史卻自本書始。

---

<sup>11</sup> 同上。

「增訂本注」又補充舉例：

(一) 肯定〈神女賦〉、〈高唐賦〉至遲是漢代前期的作品，並對漢代的敘事賦作了較具體的介紹；(二) 指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並不是漢末的作品，而是南朝寫定的，從漢末到南朝有一個演化過程；(三) 說明《玉台新詠》並非徐陵所編，而是南朝陳代的一個宮中妃子（很可能是張麗華）所編，它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四) 闡明唐代詩歌從盛唐發展到中、晚唐並不是成就的減弱，而是符合於文學前進趨勢的演化；(五) 著重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演變，強調宋詞、元曲、明代傳奇、明清小說和抒寫真情的散文與五四新文學之間存在著的內在聯繫，這在對〈近世文學·嬗變期〉——本書的最後一部分——的描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這樣的新見在全書中確是隨處可見。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來，譬如：關於《詩經》編者為魯國人的推斷、《大雅》中〈生民〉〈公劉〉等五首詩的抒情性特徵定位與史詩說的質疑、對李陵〈與蘇武詩〉、〈答蘇武書〉著作權的肯定、對出土漢簡〈神烏傳（賦）〉在文學通史中首作專述、對《西遊記》作者的審慎辨析、關於《儒林外史》原書為五十回的考證，等等。而在這些創見背後，我們所看到的是著者重文獻、重實證的學術態度。本書在引文底本的選擇上，堅持不用輕易刪改古書的《四庫全書》；而確知被改變了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讀者中有很大大影響，仍不採用，如李白的〈靜夜思〉，便是用《四部叢刊》影印明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既出人意表，又言之有據、不架空立說。這已不僅僅是一個底本的採用問題，更體現著嚴謹的學風與實證精神。

另一方面，《新著》在理清文學史脈絡的同時，更側重於對文學作品的文本解讀，在作品分析中體現出關於文學史的宏大思考。如在「西漢前期與中期的辭賦」一節論及賈誼〈鵬鳥賦〉時說：「賈誼的遭遇，與屈原在被楚懷王疏遠時的處境有類似之處，但他的上述作品不但沒有屈原的抗爭精神，而且也沒有宋玉那樣的『自憐』。這說明了文學史上的屈宋時代已經結束，也顯示了中世文學有異於上古文學的特色。」（《新著》上卷第 142 頁）將文學的發展融入其中。尤其是在評騭鑒賞之中，能夠從文本入手揭示出原作——即使是公認的傳世名篇——所固有的缺失及其成因。這便不是一般的作品賞析所能達到



的高度了，因而更能給人以學術震撼與啓示，發人深省。譬如，關於《詩經·芣苢》詩意的不足<sup>12</sup>、〈七月〉結構的枝蔓、〈綿〉在敘事方面的欠缺（故而將其作為抒情詩看待），《論語》「侍坐」章敘事的不完善、《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章言辭誇飾的內在矛盾等；再如阮籍〈詠懷詩〉所存的「弊病」、杜甫「三別」內容上的「前後矛盾或者離開了真實」、歐陽修〈秋聲賦〉當中的「敗筆」、宋濂〈桃花澗修禊詩序〉結尾處的「大煞風景」、李攀龍律詩中的「一個重大缺陷」、方苞〈左忠毅公軼事〉中間一段的「矯誣之筆」……此類文字，非有超群之識力不能為之。而細究起來，對於作品的評判又總是與全書注重真情、注重美感的標準相統一的。這種不拘陳說、獨出機杼的解讀所流露出來的，便是著者長於邏輯思辨的分析能力，及其「不媚俗、反舊論、立新說」的學術個性。

當然，這種學術創新對於讀者知識層次的期待也是較高的：倘若沒有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較為系統的瞭解，那麼在閱讀本書時便不易產生深刻的思考、引起共鳴，或是將創新處忽視過去。換言之，閱讀者如果能具有相關的文學史知識，則本書的啓迪意義無疑是巨大的。

此外，作為一部文學史的「新」著，本書的文字也令人耳目一新：優美雅致、感情濃郁，親切動人，極具可讀性。隨手舉出幾段來：如《史記·項羽本紀》寫到項羽的末路：「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新著》評論：「這一段話也很能顯示出英雄末路的悲涼和強烈的自尊，尤其是那一『笑』，更蘊含著無限的痛苦、心酸和寧死也不能接受屈辱的堅強<sup>13</sup>！」（《新著》上卷第 173 頁）；〈高祖本紀〉寫到劉邦臨死前：「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新著》評論：「所以，他實在是不想再活下去了，『命乃在天』云云，不過是為掩蓋其拒絕治療的真實動機的門面話。在他對醫生『嫚罵』的背後，隱藏著生不如死的深重的悲哀、痛苦。就這一點說，他的『嫚罵』與項羽自殺之前的『笑』實可謂前後輝映，他臨死前的心情，大概也未必比項羽自殺前好多少。」（《新著》上卷第 174 頁）。如此筆觸、如此感慨！充滿著對千古人情的理解與文辭之美的把握，讀來令人回味再三。又如，關於《紅樓夢》，《新著》寫道：「在

<sup>12</sup> 方玉潤《詩經原始》對此詩之藝術水準評價甚高，徐北文《先秦文學史》曾批評方氏的「拔高」。《新著》則將其作為西周前期「素樸的歌」，指出其在藝術上尚未成熟。

<sup>13</sup> 從此角度說，杜牧《題烏江亭》「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的感慨，並沒有真正從精神上理解項羽；且其「包羞忍恥是男兒」也過於功利而忽視了一位英雄做人的尊嚴。

寶玉身上所體現的，乃是『任性恣情』所導致的個人與環境的劇烈衝突及其無盡的痛苦——人性在環境壓抑下的深刻悲哀。」「《紅樓夢》的顯示人性與環境的衝突、人性被壓抑的痛苦以及在壓抑下的掙扎、反抗，跟以文學革命為開端的新文學的要求人性解放顯然是相同的：既然已感到了被壓抑的痛苦而且在掙扎與反抗，接下來的自然是解放的要求。」（《新著》下卷第 425 頁）從中既可以見出關於人性解放的理想，也依稀流露出著者深沉的人生感喟！

20 世紀初，「中國文學史」開始了它的本土化寫作：1904 年，林傳甲出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席，為授課編了一部《中國文學史》講義；1905 年，黃人在蘇州的東吳大學也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自此，文學史作為一種文學闡釋著作進入 20 世紀學術史行列，並進行著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百年以來，文學史的編寫既給予我們豐碩的成果與範式意義，也要求著新的突破與深化，包括文學觀念、撰寫模式、學術個性等——所謂「史識、體例與趣味<sup>14</sup>」。從這層意義來說，如何從更深廣、通透的角度去書寫中國文學史，《新著》既是一種回答，也是一種期待。因而，它所帶給我們的啟發與思考也就更為深遠。

---

<sup>14</sup> 陳平原〈史識、體例與趣味：文學史編寫斷想〉，《南京師大學報》2007 年 3 期。

## 史華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中譯商榷

張端穗\*

西方漢學界在上個世紀的後期相繼出版了兩部有關中國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鉅作，第一部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Benjamin Schwartz（史華慈）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二部是英國漢學家 A. C. Graham（葛瑞漢）教授所撰 *Disputo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這兩部著作都是體大思精的鉅作，因之值得國人參照；但也因為同樣理由，兩書都不易閱讀。幸好中國大陸學者在過去數年中相繼將兩書譯成中文出版。葛瑞漢之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海晏教授翻譯，書名為《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8 月 1 版 1 刷；史華茲教授之書由清華大學歷史系程鋼教授翻譯，由劉樂教授校定，書名《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1 版 1 刷。兩部鉅著之中譯，對學界貢獻甚大，對所有主事者，我們應表達最真誠之謝意。但兩書之中譯，都有不可忽略之瑕疵在。關於《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譯文中的瑕疵，本人已撰文發表<sup>1</sup>。至於有關《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譯文中之問題，筆者先試就所曾細讀之第 6 章〈道家之道〉中有關莊子一段（中譯頁 223-244）舉例說明，就教於主事者及方家：

1. 頁 223 倒數第 2 段 6 行：「大部分作品中或多或少保留下來的文字特性成爲后人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sup>1</sup> 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報》第 47 卷（95 年 7 月），頁 439-446。整體而言，《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的中譯可讀性遠高過《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一書。

們判別前朝選編者的主要依據」。原文作：“and the more or less sustained literary quality of much of the work may be mainly a tribute to the judgment of later selectors and editors.” 中譯當作：「大部分作品中一貫的文學特質可能主要是源自後期選、編者的卓越判斷。」

2. 頁 225 第 1 行：《莊子·知我遊》中之「我」當作「北」，係手民之誤。
3. 頁 225 第 3 行：「存在著某個存在（a being），不存在者存在（being）。存在著不存在，然而它一開始呈現為非存在（non-being），……」。原文作：“There is a being. There is not being. There is a not yet beginning to be non-being，……” 中譯當為：「存在著某個存在。不存在著存在。存在著尚未開始成為不存在，……。」但就下文所引《莊子·齊物論》中「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一句而言，「有無也者」之英譯似有誤。
4. 頁 225 第 2 段倒數第 1-2 行：「只有從根本上動搖我們的經驗主義的常識觀點，……」。其中「經驗主義」一辭太專門，易引起誤解。原文作：“It is only when our ordinary perspectives on experience are shaken to the foundation that…….” 中譯當為：「只有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對經驗的常識性觀點，……。」
5. 頁 226 第 2 段第 7 行：「虛空就是使得心靈堅定起來」。原文作：“Emptiness is the fasting of the mind.” 英文 fast 有齋戒意。因此譯文當改為：「虛空就是心靈的齋戒（心齋）」。正符合莊子「虛者心齋也」之原意。
6. 頁 226 第 2 段倒數第 2 行：「存在著眾多專論「冥想」技巧的文獻，我們在其中找見它們。」原文作：“which we find in so much literature on “meditational” techniques.” 中譯改為「在眾多專論『冥想』技巧的文獻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它們」，似較明白。
7. 頁 226 第 3 段第 1 行：「在討論技巧或技藝的段落中，還涉及到另一類事例（不過它們不太像是真的），人們在其中刻可以發現……討論」。原文作：“One other seemingly unlikely area in which one finds discussions of “mystical” techniques is in passages dealing with skills or crafts.” 中譯當作：「在討論技藝或技巧的段落中，我們也發現了有關“神秘”的技術的討論，這看起來似乎是較不可能出現的領域。」
8. 頁 227 第 2 段第 15 行，「庄子試圖努力顛覆……持有否定的態度」一句之後，漏譯相當關鍵一句。原文為“It involves, however, a rejection of the absolute categories

- of predication which we bring to our perceptions.” 中譯當作：「然而，它涉及對我們帶入我們知覺中的絕對賓語範疇的否定。」句意與第 230 頁倒數第 4 行者相類。
9. 頁 227 第 2 段倒數第 6 行：「它不包含偏，……」。「偏」字之後補一「好」字較宜。
  10. 頁 227 最後一段第 2 行：「更能受到人們深切的欣賞」一句，衡諸原文“is more deeply appreciated than. ……”。「能」字多餘。
  11. 頁 228 第 1 段最後第 1-2 行中之「輕快的」一辭，原文為“delightfully”，當譯作「令人喜悅地」。
  12. 頁 229 第 2 段第 4 行：「是一種實証主義的積極命令」。原文作“a positive injunction.” 當譯為：「是一種確定的指令。」說莊子是實証主義者是大謬。
  13. 頁 231 第 2 段第 2 行：「我們稱為具有……」。「稱為」之中補一「其」字，較明確。
  14. 頁 231 第 2 段第 12 行：「但就分類的視角而言……」。原文是“again in the matter of……”。「但」字改作「同樣地」較正確。
  15. 頁 232 第 6 行：「我們的日常理智是能夠理解相對性的」。此句減損原文意思太多。原文作“The relativity belongs to the world of our ordinary understanding, which sees things wholly in their specific relatedness to each other.” 當譯為「相對性屬於我們日常理解的範圍，這種理解完全從事物彼此之間的特殊相關性來看待它們。」
  16. 頁 232 第 7 行：「惠施似乎為“事物”賦予了過份牢固的存在」。「似乎」兩字原文為“even”，當譯為更肯定的「甚至」一辭。
  17. 頁 233 第 1-2 行：「萬物的實體可以是諸如此類的質料，甚至連“夢也是由它們組成的”。」原文作“There is even a hint that the reality of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may be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f.” 中譯當作：「萬物的實體可以說是諸如此類構成夢境的質料」。
  18. 頁 233 第 3 行：「然而，這樣的想法有可能是錯的，它類似于主體主義個人的唯我主義迷夢。」原文作“Yet it is probably wrong to think of this, as we might be inclined to do, as the solipsistic dream of an individual subject.” 中譯當為：「我們可能有意會認為這樣的想法是個個別主體的唯我主義的迷夢，但我們的想法可能是錯誤的。」

19. 頁 233 第 4 行，有關莊周夢蝶的一段：「莊子想知道，究竟他是夢見變成蝴蝶的莊子，還是夢見變成莊子的蝴蝶，因為從根本上講，莊子和蝴蝶的“實體”都是夢一般的東西，人們就會不得不設想莊子的夢和蝴蝶的夢都是“道”自身的投影。」原文作“*When Chuang-tzu wonders whether he is Chuang-tzu who has dreamed that he is a butterfly or a butterfly who has dreamed that he is Chuang-tzu, since the reality of both Chuang-tzu and the butterfly is essentially dreamlike, one would have to suppose that both the dream of Chuang-tzu and of the butterfly are projections of the tao itself*”。漢譯當作：「因為從本質上來說，莊子和蝴蝶的實體都是夢一般的東西，因此，當莊子疑惑究竟他是夢見變成蝴蝶的莊子，還是夢到變成了莊子的蝴蝶，人們就會不得不設想莊子的夢和蝴蝶的夢都是道自身的投影。」
20. 頁 234 第 7 行：「然而這種想像……」。其中「想像」一辭，原文作：“*imagery*”當譯作「意像」。
21. 頁 233 第 2 段第 2 行，「相對現實性」，改為「相對真實性」(*relative actuality*) 似較精確。
22. 頁 233 倒數第 4 行：「莊子也許可能會說，構成一把椅子的基本粒子和椅子本身是同樣“真實”的」。原文作“*are no more or less “real” than*”。中譯當為：「莊子也許很可能會說，構成一把椅子的基本粒子比起椅子本身不會更真實或也不會更不真實。」這句話不如此譯，就不能與下文所提佛教緣起性空思想相關連。
23. 頁 234 倒數第 8 行：「特別偏愛的有機體嗎？」。「有機體」一辭，原文作“*organ*”，當譯為「器官」。第 235 頁第 2 行之有機體一辭亦當改為器官。其實本書譯者在下句中就用了此辭。
24. 頁 235 第 3 行所提及的「物者的伙伴」，宜譯為「與造物者為偶」。
25. 頁 235 最後一行及頁 236 第 1 行，「語言能夠適用的領域」，原文作“*pertains only to the realm of being (yu) where language can be applied.*” 中譯當作：「語言能適用的存在領域」。
26. 頁 236 第 2 段第 14-15 行：「這種「道」——是「造物者」或「創造力」，而不知由於什麼緣故，這種能力與事物的獨特個性是關聯在一起的——的喻象終於浮現到腦海。」原文作：“*the metaphor of the tao as creator or creating power somehow involved with the discrete particularity of things comes to mind.*” 中譯當作：「道，作

- 為造物者或創造力的喻象多少涉及到了事物的獨特性，這個想法浮現在腦海中。」
- 27.頁 239 第 8 行，「知性思想上的威力」一段，原文作“intellectual prowess”，當譯為：「知性上的能力」。
- 28.頁 240 倒數第 8 行，「而且，他的感覺非常良好」一句，原文作“Instead, he is full of self-righteousness and probably bent on achieving fame.” 中譯當作：「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他滿心自以為是，並且可能志在博取名譽。」
- 29.頁 241 第 1 段第 1 行：「催促顏回“堅定他的心靈”」。原文“fast his mind”，就是心齋之意。以下“堅定心靈”之譯皆誤。
- 30.頁 241 倒數第 4 行，「囚禁于“只具有微乎其微的理解力”的世界之中」，當譯為「囚禁于“少知”的世界之中」。「少知」一辭，第 203 頁第 2 行已出現過。
- 31.頁 242 第 4 行：「存在著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終極層次。」不確定性，英文作“indeterminacy”，改為「未限定性」似較具正面意義。
- 32.頁 242 倒數第 12 行，「他對生與死都冷漠無情」一句中，「冷漠無情」(indifferent) 改為「無動於衷」或「漠不關心」似較佳，否則就會與下句「像春天一般溫暖」一句抵觸。
- 33.頁 242 最後一行，「看來“真人”也有可能認同普通人的所有感情，但他並不完全贊同它們」，原文作“It would appear as suggested that ‘true men’ may share all the emo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do not become identified with them.” 中譯當為：「看來“真人”也可能享有一般人的所有情緒，但他並不會與之融為一體」。
- 34.頁 244 倒數第 4 行：「即便是暴露出高水平的精神啓蒙之中，也可以看到芸芸衆生之中十分常見的喜愛的搬弄是非的特點(a tell-tale, quite human sense of superior enlightenment)。」原文當譯為：「又暴露出人類樂於洩密的些許痕跡，這些都是具有相當人類意義上的高度的啓蒙。」

以上所舉例證或有吹毛求疵之嫌，但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的其他篇章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較為明顯的誤譯：

- 35.頁 2，最後一段倒數第 3 行：「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此譯看似十分典雅，但原文作“a kind of 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 林同奇先生則翻譯作：「一

種後退一步並遠眺彼方<sup>2</sup>。」林譯更信實。

- 36.頁 4，第 2 段第 2 行：「“心—物”問題」。原文作：“mind-body” problem.當譯作：「“心—身”問題。」
- 37.頁 22，第 2 段最後 1 行：「爲了他們的生存與福利，他們每一個人都高度重視所從屬的那個個譜系中的適當的禮儀行爲。」原文作：“They in turn are much dependent for their sustenance and welfare on the proper ritual behavior of the lineages to which they belong.” 當譯作：「但就他們自身的生計及福祉而言，他們接著相當依賴他們所從屬的血統（成員）的適當禮儀行爲。」
- 38 頁 23，第 1 段第 2 行：「“鬼神”在祖先崇拜中……。」原文作：“the “spirit” of ancestor worship.”。中譯當作：「祖先崇拜的“神靈”。」
- 39 頁 25，最後 1 段第 1 行、第 3 行，“祖”字。據下文，當作“族”字。
- 40.頁 30，最後 1 段第 4 行：「和諧的鬼神」。原文作：“a spirit of peace.”當譯作：「一種和諧的精神。」
- 41.頁 30，最後一段最後一行：「神的體系」。原文作：“a system of ritual.”當譯作：「一種神聖的禮儀體系。」
- 42.頁 47，第 2 段第 1 行：「無論如何，我都不再……」。原文作：“Whatever may be the case, I shall nevertheless dwell here on…….” 當譯作：「無論如何，我仍然將……。」原譯意思正相反。
- 43.頁 47，第 4 段第 2 行：「處于少數派的地位。」原文作：“is in his minority.” 當譯作：「處於未成年階段。」
- 44.頁 142，第 2 段第 1 行：自由民（plebian），當譯作：「平民」。頁 141，最後一段倒數第 2 行即以平民一詞譯 plebian。
- 45.頁 144，第 2 段第 17 行：「似乎起源于孔子本人的深深的絕望感是緊密相關的。」原文作：“seems to be closely linked to a deep despair……arising out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fate of Confucius himself.” 當譯作：「似乎與源起于對孔子本人的命運的沈思而產生的深深的絕望感是緊密相關的。」
- 46.頁 155，第段第 1 行：「要使得……的創議就包含在上面所說的內容之中。」原文

---

<sup>2</sup> 林同奇，《人文尋求錄：當代中美著名學者思想辨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75 腳注 1。



- 作：“the initiative for enabling……lie with those above.” 當譯作：「要使得……的動源在於上位者是否有心。」
- 47.頁 162，最後一斷第 9 行：「成功並不必然是靠努力取得的。」原文作：“success is not necessarily achieved.” 當譯作：「成功並不必然是可獲致的。」
- 48 頁 163 第 1 段第 4 行：「回避了“行”善時，必然發生越界衝突（overriding）。」原文作：“to avoid the overriding necessity of doing good.” Overriding 之意為最重要的。因此中譯當作：「迴避了“行”善之最重要的必要性。」
- 49 頁 302，第 1 段第 5 行：「而當著名法家大臣商鞅在秦國當政並且推行改革時，他（荀子）還訪問過秦國」。原文作：“a visit is mentioned to the state of Ch'in where the reform of the famous Legalist minister Lord Shang were already in place.” 商鞅是戰國中期人（390-338 B.C.），荀子訪問秦國時，商鞅已死。原文當譯作：「當著名法家大臣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已經行之有年之時，他還訪問過秦國。」
- 50.頁 305，第 3 段第 4 「被用來包括家庭和政治秩序……」。原文作：“embracing all the status and roles of familial and political order.” 中譯少了家庭和政治秩序中的「身分」及「角色」兩個辭彙。
- 51.頁 312，第 1 段第 4 「另一種是建立于“禮”的殘餘基礎上的限制」。原文作：“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traints based on force and constraints based on li remains.” Remains 當動詞用，意指仍然存在之意。原文意指「以力與禮為基礎的兩種約束有其質上之不同，此不同仍然存在。」中譯中之殘餘兩字當刪，保留「禮的基礎」即可。
- 52.頁 321，第 3 段第 1 行「很顯然，與其說荀子的思想取自墨家，無寧說他的思想取自古代的聖賢—君王。」原文作：“It is apparent that Hsun-tzu owes much more to the Mohist than he does to the sage-kings of old.” 原文之意與上引中譯正好相反，當作：「很顯然，與其說荀子的思想取自古代的聖賢—君王，無寧說他的思想取自墨家。」
- 53 頁 338，第 2 段倒數第 5 行：「要忠誠遵守周朝的法典」。原文作：“to adhere faithfully to the penal code of the Shang dynasty.” 要忠誠遵守的是「商朝」法典，而非「周朝」法典。
- 54.頁 341，第 1 行：「它們都有兩個多少有點矛盾的假設（overriding premises）」。當

- 譯作：「他們共享兩個重要的假設。」
- 55.頁 341，第 3 段第 1 行：「有趣的是，無論叔向還是孔子都在以下兩者之中選擇或是強調“人治”的“仁慈”，或是強調刑法制度的殘酷壓迫。」原文作：“It is interesting that neither Shu Hsiang nor Confucius chooses to stress here the…….” 原文之意與中譯正相反，「他們都沒有在兩者之中作選擇。」
- 56.頁 346，第 3 段第 2 行：「措施」一句之後漏譯一句：“The Legalist program as he conceives of it makes harsh demands.” 中譯作：「他所構想的法家藍圖向人民提出最嚴厲的要求。」
- 57.頁 347，第 3 段第 3 行：「如施堅雅 (Skinner) 所說」。原文作：“Like Skinner…….”，中譯當作：「如施堅雅一樣。」施堅雅 (斯金納) 是美國主張極端行為主義的心理學家。似不曾對中國法家發表看法。
- 58.頁 352，第 3 段第 4 行：「古希臘的觀念是“城邦祖國” (polis-fatherland)，……在那裏古代城市一國家(city-state)是抽象的觀念，……。」原文作：“The abstract notion of the ancient city-state in Greece as a “polis-fatherland” which might in its history actually undergo the rule of various types of government and which could therefore be considered apart from the specific structures of polity did not emerge as an option any more than it did in the universal kingships of Egypt or the ancient Persian empire…….” 中譯當作：「在希臘，作為一“城邦祖國”的古代城邦國家的抽象觀念——此城邦國家在其歷史中事實上可能經歷了多種不同型態的政府統治，並且此種城邦國家可以因此被認定是與特殊的政體結構分開——並未作為一種抉擇而湧現……。」
- 59.頁 352，第 4 段最後 1 行：「慎到的權威概念假設權威必須落實到個體統治者的身上，但不論怎麼說，人們事實上仍然把重點放在統治權 (rulership) 的權威要素這一抽象的契機上，而不是落在統治者的人格上。」原文作：“Nevertheless, while Shen Tao’s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assumes that authority must have its locus in individual rulers, in fact the accent falls on the abstract mo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rulership and not on the person of the ruler.” 中文當譯作：「然而，雖說慎到的權威觀念假設權威必須落實到個體統治者的身上，但事實上，重點是放在放在統治權 (rulership) 的權威要素這一抽象的契機上，而不是落在統治者的人格上。」

- 把重點放在統治權的權威要素這一抽象契機上的是慎到本人，而非其他人們。
- 60.頁 352，第 3 段最後 1 行：「權威真正來源是“威”（kingship）。」「kingship」當譯作「(王)位」，而非威。
- 61.頁 355，第 4 段第 2 行：「“無為”社會的誕生，事實上必須倚靠……的行動，但這個事實絲毫不比如下的事實更容易阻礙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自然性”……」原文作：“The fact that this *wu-wei* society must be brought into being by the deliberate actions of……presumably does not preclude its “naturalness” any more than the fact that legislators who are committed to a free marketed economy must fir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move the “artificial” in situational obstacles which impede a free market economy precludes the “naturalness” of such an economy or the fact that “socialism” must be “built” by a Leninist vanguard precludes the ultimate “naturalnes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中譯當作：「“無為”社會的誕生，事實上必須倚靠……的行動，但這個事實想必不會影響（妨礙）它的“自然性”；就如同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立法者，必須先採取行動消除阻礙自由市場經濟的“人為的”制度性障礙，此一事實不會影響（妨礙）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自然性”；也如同社會主義必須依賴信奉列寧主義的先鋒隊，才能得以建立，此一事實也不會影響（妨礙）“社會主義”制度的終極的“自然性”。」
- 62.頁 367，第 3 段第 4 行：「傑出的二元對立原則。」原文作：“the promin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duality……” 中譯當作：「明顯的二元對立性。」
- 63.頁 367，第 3 段第 10 行：「在《老子》，無論是運用于自然界還是人事界，陰／陽觀念都處於核心地位，因而要以如上所述的特殊的“非對稱”的方式加以處理。」原文作：“In the Lao -tzu., as we have seen, the notion of ying/yang is central both in relation to natural and human affairs and is treated in the peculiarly “asymmetrical” manner described above.” 中譯當作：「在《老子》中，如我們已見到的，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人事界，陰／陽觀念都處於核心地位，並且是以上述的特殊的“非對稱”的方式加以對待。」
- 64.頁 369，第 1 段第 7 行：「李約瑟恰切地評論說：假如鄒衍手中掌握了原子彈技術，他簡直就不敢面見那些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統治者。」原文作：“In the apt words of Joseph Needham:”If Tsou Yen had had the ‘know-how’ of the atomic bomb in his

passion , he could hardly have faced the rulers of the states with a steadier eye.” 中譯當作：「即使鄒衍當時知道了原子彈的製作法，他也幾乎不能以更堅定的眼光來面對那些諸侯國君們。」

65.頁 411，最後 1 段倒數第 2 行：「積極法律（positive law）」。當譯作：「實證法」、「制定法」，與「自然法」（natural law）相對。

史華慈教授有關中國文化及思想的研究似乎日漸受到大陸學界的重視。2006 年是史華慈教授誕辰 90 周年。據報載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為此特於該年 12 月中旬在華東師大舉辦了“史華慈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華東師範大學的兩位教授許紀霖先生和宋宏先生則編輯整理了已有中譯的史華慈論中國的重要文章以及研究和追憶史華慈的文獻，出版了《史華慈論中國》一書，2006 年 11 月北京新星出版發行；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也同時完成《史華慈學譜》一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 2006 年 12 月出版。就《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而言，江蘇人民出版社於 2004 年 1 月 1 版 1 刷，到 2007 年 5 月即有 3 刷上市，史華慈的著作受到大陸學界重視的情形亦由此可得進一步的證實。為使廣大讀者都能正確的理解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這一部鉅著的內容，筆著希望江蘇人民出版社再印時，能參照本文及其他學讀者的意見，對全書譯文作適當之修正。

## 葉嘉瑩的詩詞道路軌跡

徐志嘯\*

葉嘉瑩說自己一生走著一條詩詞的道路，她的一本相當於自傳性的集子，書名就定為《我的詩詞道路》，內中十多篇文章（包括「前言」和附錄），記錄了她幾十年人生走過的詩詞之路，其事業的成就和夾雜其間的酸甜苦辣、坎坷波折，於字裡行間充分流露。可見，對葉嘉瑩來說，她這幾十年的生涯，始終圍繞著中國古典詩詞——早年興趣所致，創作詩、詞、曲（這個興趣後來一直未斷，持續到年逾八旬的今天），繼而因生活和工作所需走上教書講壇，所講內容也主要是中國古典詩詞，而後由教學之需撰寫詩詞的評賞文章，再由評賞發展為對詩詞的評論和理論研究，乃至引進西方理論和方法闡釋與解析中國古典詩詞，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成為海內外著名的詩詞研究大家。可以說，這一切都表明，她始終在走著一條詩詞的道路，這道路既是她的人生之路，也是她畢生追求學術發展之路——創作、評賞、評論、研究，從十五歲一直走到了今天八十多歲還在繼續走，熱情不減，矢志不渝。

我們如果將上述葉嘉瑩走過的詩詞道路按階段作一粗略劃分，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創作起步到評賞時期，時間為 1939 年到 1958 年，這個階段比較長，大約近二十年，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創作，評賞則始於 1956 年，係應約而先後撰寫的生平第一篇分別評賞詩和詞的文章；第二階段，開始由評賞轉向評論和理論研究，1958 年寫了第一篇純客觀評論溫庭筠詞的論文，這以後到 1968 年擬定研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的

---

\*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計畫，大約十年左右，寫了一系列的評論和理論研究的論文和著作；第三階段，自 1968 年後結合研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引進西方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古典詩詞作中西比較相結合的詮釋和解析，需強調的是，這個階段她其實同時也撰寫評論和研究古典詩詞的論著，與第二階段的研究可謂齊頭並進，這個狀況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當然，必須說明，這三個階段的劃分不是絕對的，僅為大致傾向而已，實際上，葉嘉瑩的詩詞創作、評賞和理論批評與研究很多時候甚至是同步進行的——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後，其間很難說有多少嚴格的區分。

## 一、從創作到評賞

如果按最早誕生問世的詩詞作品計，葉嘉瑩詩詞道路的起步應該是在她十五歲時——《迦陵詩詞稿》載錄的作品告訴我們，1939 年，她寫下了保存至今最早的詩篇〈秋蝶〉，這是一首七言絕句。需要說明的是，她的這一起步階段，為時較長，大約有十六、七年，這個時期是她創作的多產時期，大約留下了近 200 首詩、詞、曲作品，占了她至今為止創作總量的三分之一多，其中詩 63 題 104 首，詞 43 題 52 首，曲小令 13 首、套曲 8 組。這些詩、詞、曲作品，形式上包括五七言絕句、律詩、排律、詞、小令、套曲等多種，內容上則寫景抒情、詠物感時、歎今懷古、喪母悲悼、師友唱和等兼具，種種式式展示了青春期的作者生活的多側面和感情的多層面。毫無疑問，從十五歲開始的詩詞曲創作，表現了葉嘉瑩超人的詩詞創作能力和天賦才氣，她不僅能自如地駕馭詩、詞、曲的各種格律規則，且作品所表露的情趣與韻味充分體現了她豐富的閱歷和深邃的觀察力，讀之不得不令人嘆服。例如〈高中畢業聚餐會後口占三絕〉之三寫道：「握別燈闌夜已分，一彎斜月送歸人。他年若作兒時憶，回夢春風此最真。」詩篇抒發了其時其地人物的真情實感，語言真切，描畫形象，特別是「一彎斜月送歸人」極富情意，須知這是她十六歲的習作。同年寫下的第一首詞〈如夢令〉也十分值得擊賞：「山似眉峰愁聚，水送春隨人去。一棹剪江行，多少綠楊迷路。何處？何處？不見桃源前渡。」一讀這樣的詞作，便知作者一定有著相當的詞學功底，至少熟讀過相當多的古詞，否則決寫不出，而其時的葉嘉瑩才只有十六歲。十七歲時她寫下的詩句，則幾可讓人誤以為是飽經生活滄桑之老人筆端所流出的：「少年何苦學忘機，不待人非己自非。老盡秋光無一事，坐看

黃葉下階飛。」(〈晚秋偶占〉) 類似這種情調的詩句在葉嘉瑩早期作品中不乏其例，諸如：「萬里征帆孤枕上，夢隨明月到揚州。」(〈昨夜〉)「分明夢到蓬山路，尙隔蓬山幾萬重。」(〈寒假讀詩偶得〉其二) 十七歲的少女，儼然李清照再世，筆下所流出的似已有豐富複雜的情感經歷了。十八歲時寫下的〈故都懷古十詠〉(及序)，倘無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對歷史的深刻認識，決計寫不出來。怪不得她將自己所作的〈晚秋雜詩五首〉呈奉顧隨先生後，顧隨先生會高興地步其韻而作和詩六首，師生間的一唱一和，自然大大激發了葉嘉瑩的詩興，促勵她奔湧出了更多佳作，但才女本身流貫於詩篇間的才氣，則是促成這種唱和毫無疑問的前提。這個時期，她的詞作寫了不少，相對來說，以〈浣溪沙〉詞牌寫得多一些，曲作中，小令或許因其短小而會讓人感到容易把握些，但套曲就不那末容易了，葉嘉瑩二十歲前後寫了多組套曲，如〈正宮端正好〉〈仙呂賞花時〉〈雙調新水令〉等，體現了她已完全能自如地掌握套曲的規則和格律，以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顯示了不同於凡人的出眾才能<sup>1</sup>。

葉嘉瑩詩詞道路的起端是詩詞創作，這是她的天性和興趣所致，它們陪伴了她幾十年，她藉此源源不斷湧現出了各種形式的詩詞曲作品(以詩詞為主)，抒寫了人生的喜怒哀樂，寄託了豐富複雜的情感世界，給讀者留下了記錄其生平經歷和時代社會的真實寫照。

假如不是因為生活之需而教書，或許葉嘉瑩不會由創作詩詞轉向撰寫評賞詩詞的文章，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恐怕又是不可能的——因為葉嘉瑩自己多次說過，她這一生的大部分和主要的工作便是教書，她前幾十年的人生始終圍繞著教書——從北京到臺北，從中學到大學，從中國到美國、加拿大，幾乎沒有離開過三尺講臺，直到在加拿大退休後，每次探親來到中國，也還是教書——應邀到祖國各地作詩詞演講。她離不開講臺，離不開教書崗位，她似乎天生就喜歡教書，教書是她的天職，正由於教書，使她由創作詩詞而邁入了評賞詩詞，這是自然而然，也是教學的需要，當然，創作依然在持續，始終未斷，只是不那末單一了。

1956年夏天，臺灣教育部舉辦了一個文藝講座，邀請她講了幾次五代和北宋的詞，並函邀約稿，於是，葉嘉瑩寫下了第一篇關於詞的評賞文章〈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這是她從創作轉入評賞的開端，接著又寫了第一篇關於詩的評賞文章〈從義山「嫦娥」

<sup>1</sup> 凡引述之詩詞作品，均參見葉嘉瑩《迦陵詩詞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詩談起)。這兩篇文章都是從主觀欣賞態度出發，屬於純主觀的以感發為主的說詩方式，這種說詩方式繼承了顧隨先生的路子，一方面，對詩歌要有正確深刻的認識和感受，另一方面，要能透過自己的感受，傳達表明屬於詩歌本身普遍而又真實的感發之本質。因為葉嘉瑩是在讀了王靜安和李義山的詩詞作品後引起共鳴的條件下，寫這兩篇評賞文章的，她感到自己當時的寂寞悲苦心情與他們倆人詩詞中的悲觀寂寞心境有某種暗合之處，故而評賞時探觸到了他們詩詞中真正的感發之本質，而評賞文章的字裡行間，又多少帶有些她自己心靈的投影，這就形成了她早期寫作評賞類文章的特徵——在從創作轉入評賞的開始階段，寫評賞文章，常懷有一種創作的心態和情趣，行文造句也追求一種美。說靜安詞一文，用淺易雅潔的文言體，一則賞愛王國維的寫作風格，另則感到比用白話多了一份安全的距離感；說李義山詩一文，用富含詩之情調的白話文寫，因為畢竟白話更近時代，更為實用。這以後，她又陸續寫了〈幾首詠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從「豪華落盡見真淳」論陶淵明之任真與固窮〉、〈說杜甫贈李白詩一首——談李杜之交誼與天才之寂寞〉等文章，它們都屬於以一己之感發為主的早期評賞文章。繆鉞先生在《迦陵論詩叢稿》「題記」中對她的這幾篇評賞文章予以了高度肯定，說論陶淵明一文，能獨探陶淵明為人及其詩作之精微，對陶淵明的評述不僅是欣賞詩作，更能進而收興發感動之功，說談李杜交誼一文，能探索詩人之用心，並寄託自己尚友古人之遠慕遐思，這是對感發作用乃葉嘉瑩評賞詩詞之重要基礎的肯定。對於感發作用，葉嘉瑩確實認為，它是詩歌評賞的重要基礎，它源於中國古典詩歌「興於詩」的重要傳統，她自己之所以能做到從感發角度評賞詩詞，一是早年家庭教育所受到的吟誦和創作的訓練結果，二是大學讀書時顧隨先生的啟發和教導的關係，這兩方面原因，導致了她在直感之外培養起了對詩詞的興發和聯想的能力，這為她以後幾十年的詩詞道路奠下了厚實的基礎，且因此終生受用不盡。相對來說，在她早期所寫的評賞文章中，〈舊詩新演——李義山「燕台四首」〉一文，葉嘉瑩自己感覺寫得比較深入細膩，對李商隱（義山）這四首「春、夏、秋、冬」詩均能剖析到位，從而給讀者留下較深刻的印象。

在評賞方面，葉嘉瑩早年最欣賞和喜愛的著作有二部，一部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部是繆鉞的《詩詞散論》。這二部書在葉嘉瑩看來頗有共同特色——不只訴之於人之頭腦，且訴之於人之心靈，兩書中都充滿了熟讀深思的體會和靈心銳感的興發，可給人以極大之感悟與啟發：前者是為她開啓評賞古典詩詞門戶的鑰匙，標舉了評賞體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準則（她為此專門寫過〈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和〈談詩歌的欣



賞與《人間詞話》的三種境界))；後者是她已逐步養成評賞能力後獲得更多靈感與共鳴的一種光照，它對不同體制不同風格的韻文和作者作了本質上的精微探討。也因此，她對這兩本書的作者早就產生了欽仰敬慕之心。

這裡，順便應說及葉嘉瑩對「批評之批評」的態度與看法，這與她的評賞關係密切，與其後的評論與理論研究也有關係。從根子上來說，葉嘉瑩其實是喜歡詩詞作品本身——她由早年的欣賞和喜愛而致親手提筆創作，又由創作而對之熱心評賞，這評賞乃是談對詩詞作品的體會和欣賞，這是她發自內心的喜好，也是她十分樂意做的。而對那些已有的詩詞批評理論作批評、研究、探討——葉嘉瑩謂之為「批評的批評」，她實在興趣不大，因為在她看來，唯有對詩歌本身的評賞，才能使讀者真正體會到詩人所欲傳達的生命脈搏的躍動，從而在精神和心靈方面得到一種光照和啟發，而「批評之批評」則往往只會形成一種對文字障的糾纏和遊戲。這是葉嘉瑩發自內心的真實看法，她後來之所以會從事「批評之批評」，完全是出於不得已，或者說實在是勉為其難——因受邀參加學術會議，不能不寫指定範圍的論文；但她又發覺，自己一旦上了手，寫了這方面的文章，居然感到這雖非自己的興趣所在，卻對讀者會有幫助，能讓他們在紛歧的道路中識別一條正確的途徑。由是，葉嘉瑩開始逐步由評賞走上了評論和理論研究——所謂「批評之批評」之路。

這裡，有必要說及葉嘉瑩從早期一直延續至晚期所一貫堅持的對詩歌中興發感動作用的認識與重視，這是她特別宣導並貫徹於她的評賞和評論乃至理論研究始終的問題。她認為，對詩歌的評賞，不管是出於主觀角度還是客觀角度，都必須緊緊抓住自己本人的感受這一出發點，去探求詩歌中興發感動的生命，並將之傳達出來，使讀者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動，從而完成詩歌興發感動的創作生命。由此，她指出，興發感動之作用實乃詩歌之基本生命力，依據這個生命力，她評賞剖析了從唐五代到清代乃至近人王國維等數十位元詩人詞人及其作品，而所運用的標準即是詩詞中感發生命之品質與作用。在葉嘉瑩看來，中國文學史從《論語》到《人間詞話》，歷來有重視感發作用的傳統，而中國詩歌之所以成就獨盛，也就是因為有著生生不已的感發作用。正由於此，葉嘉瑩在講授古典詩歌時，除了對文字典故作理性的解釋說明、對內容和技巧作必要的分析批評外，更看重的是能對詩歌中感發之生命的美好品質作感性的傳達，使讀者從中獲得心靈上的激勵和感發，從而振奮起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藉詩歌而傳承的精神力量。這是葉嘉瑩由評賞而連及的對詩歌內在生命力的挖掘和探索，它雖已屬於理論的層面，但因其與

評賞直接有關，我們有必要在此順帶述及，葉嘉瑩後來寫的涉及這方面內容的論文有：〈不可以貌求的感發生命——談詞的評賞〉、〈多年來評說古典詩歌之體驗及感性與知性的結合〉、〈談古典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等。

## 二、轉為評論和研究

1958年為淡江學報專門撰寫的〈溫庭筠詞概說〉一文，是葉嘉瑩由評賞轉向純客觀評論的開始，這是她從主觀轉向客觀的標誌。不過儘管如此，對葉嘉瑩本人來說，除了極少數純理論文章和純考證作品，她的一般評說詩詞的文章，也仍會多少帶有心靈與感情的感發力量，這是她的特色，或者說是她難以改變的詩詞情結。話雖這麼說，但上述的轉變則是客觀的事實。從這時開始，她的詩詞道路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轉向，即由原先純為自己個人賞心自娛的評賞，逐步轉為了為他人的對傳承之責任的反思。她之所以動筆寫這類評論文章，多少是有見於詩詞評賞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機，從而出於一種不能自己的關懷之情而寫的。這類文章包括60年代寫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一書，及書前的長篇序文〈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啓後之成就〉——此乃有見於當時臺灣現代詩興起後所造成的反傳統與反現代的爭執和困惑，她在《集說》一書中對歷代評說這八首詩的各種詮釋與說法作了逐字逐句的比較和論定；70年代寫的〈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關於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長文，則是有見於臺灣和西方青年學者在西方文論衝擊下以新理論和新方法詮釋評說中國舊詩所產生的各種荒謬，對此她一一作了說明和辨誤。可以看出，這些文章中融入了葉嘉瑩自己在詩詞道路探索過程中所親身體驗的甘苦和經歷，它們表明，她已開始轉向了文學理論探討的路子，這方面最早的一篇論文，便是50年代末期所寫的〈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這篇文章真正擺脫了個人悲喜好惡的投影，純以客觀態度為詩歌評賞而寫，這為她以後撰寫探討《人間詞話》的系列論文打下了基礎。

1970年，葉嘉瑩為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寫了一篇純學術性的探討文學理論的文章〈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寫這篇文章使她感到，批評的批評雖非她的興趣所在，但對中國舊日傳統批評加以整理，使現代讀者能在紛歧的道路中識別一條正確的途徑，這實在也是甚為有益的工作。之後，葉嘉瑩在撰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時，便

對《人間詞話》的批評理論與實踐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且十分重視理論分析，隨之產生的一系列論文，應該都屬於純理論的範疇了。

從葉嘉瑩為數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她對詞和詞學有著特別的興趣，這不僅因為這方面的成果占著相當大的比重，而且她對歷代詞的發展和詞家及其詞作有著鞭辟入裡的見解，顯示了她在詞學上的特別功力。此乃因著她早年曾受王國維《人間詞話》和顧隨先生教學之影響，特別喜歡讀詞，加上後來多年從事教學工作，興趣日增，便陸續寫下了讀詞心得，並進而結合中西理論，完成了多部詞學著作，其中，《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是典型代表，其他論詞及詞家的著作是具體體現，如：《迦陵論詞叢稿》、《清詞叢論》、《唐宋詞名家論稿》、《唐宋詞十七講》、《詞學新詮》、《靈溪詞說》、《詞學古今談》（末二種系與繆鉞先生合著），以及《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等。當然，這些著作的撰寫時間有先後，但它們大多應屬評論和理論研究範疇，我們為敘述方便在此一併述及。

葉嘉瑩曾專門寫過《論詞絕句五十首》組詩，前三首專論詞的起源，繼之分論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周邦彥、陸游、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等詞家，幾乎每三首七言絕句即勾勒出一個詞家的風格特點，並聯及其在詞史上的沿襲承繼和推進發展，其功力之深，剖解之切，令人歎為觀止。不僅如此，她對詞史從晚唐到清末的歷史演變及其發展脈絡，以及各種風格流派代表詞家的創作特點和作品價值地位等的具體評價，均十分到位，能以極為精到的簡明語句點出他們各自的神髓：

溫庭筠，為《花間集》所輯選的第一位詞人，在早期從事於詞之創作的唐代詩人中，溫氏所留存的詞作數量最多，所使用的詞調也最廣，是奠定了詞之美感特質的第一位詞人。

馮延巳，較溫庭筠的意境更為深美，極富言外之感發，故正如《人間詞話》所言：「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拓開北宋一代風氣。

南唐二主，中主李璟，詞亦富興發之感，有言外之遠韻，後主詞則始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是使得詞體自歌辭之詞轉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個重要突破。

柳永詞則以其對俗曲音樂之嫻熟，及其鋪陳敘寫之才能，不僅為詞之長調的寫作

開出了廣大的途徑，而且更以其落拓的身世，一變五代令詞中所寫的春女善懷之思，而寫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對詞之形式與內容都作出了重要的拓展。

晏殊（大晏）及歐陽修詞，一方面受南唐詞風影響，另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和修養自開境界，大晏明麗和婉，歐陽修豪宕沉著，他們分別使五代以來之令詞，在北宋初期獲致更為豐美之成就。

晏幾道為歌辭之詞的一種回流及新變，不似大晏和歐陽修以意境勝，而以秀氣勝韻超越乎教坊豔曲之外，固正如黃庭堅氏所云「可謂狹邪之大雅」。

蘇軾詞以其詩文餘事，為小詞別開天地，一洗綺羅薜澤之態，表現了天風海雨般的逸懷浩氣。

秦觀雖為蘇門才士，然其為詞未受蘇氏影響，以其個人所獨具的纖銳善感之心性，寫出了既不同於《花間》又不同於北宋其他各家的別具淒婉之致的詞篇。

賀鑄，與秦觀時代相近，是個有爭議的詞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對其大加讚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極力貶抑，其詞是否具屈宋楚騷深意，需深入探討。

周邦彥詞，富豔精工，集北宋之大成，且其妙解音律，既可製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勾勒鋪陳之妙，為南宋詞開出無限法門，是關係詞之演化的重要作者。

李清照，生於婦女不敢為詞之時代，卻獨以其才情勇氣專意於詞，不僅足以與男性作者相頡頏，更能於芬馨之中露神駿之致。

陸游詞驛騎於蘇、秦之間，頗具沉鬱之慨，風格獨具。

辛棄疾，以英雄豪傑壯志不遂之悲慨發而為詞，故能於豪放中獨具沉鬱頓挫之致，周濟稱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

姜夔，以江西詩法入詞，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在詞中別開宗派。

劉克莊頗有豪氣，學辛詞而卻少沉鬱之致，但其「以文為詞」之作風，不失為詞中之一派。

吳文英詞，意境幽邃，詞筆麗密，周濟稱其「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之穠摯。」

王沂孫身歷南宋之亡，為詞常不免麥秀黍離之感，托意深婉，遣辭工雅，周濟稱其「思筆」、「雙絕」，可為「入門階陛」，其詞可謂宋季之代表作者。

以上為晚唐五代迄南宋之末的代表詞人，元明兩代，名家極少，唯元好問，無論抒情、寫景、懷古、感事，皆能於其所賦之情事以外，別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

約之致。降及清代，號稱詞之中興，作者既眾，流派紛起，其代表者為五家——納蘭性德，獨具純情銳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頗能擺脫傳統舊習；徐燦，女性詞人，才情雖不及李清照馨逸，然詞中所寫興亡之感，其悲慨蒼涼之致，李氏所無，為女性詞之意境作出極大開拓；史承謙原屬陽羨一派，卻能於陽羨之豪健之外，別具幽淒之感，其詞頗可見陽羨與浙西兩派詞風流變之一斑；顧太清詞意境不及徐燦蒼涼悲慨，卻感覺敏銳，用筆深細，常能於日常景物情事中表現出人意外、入人意中之致，為女詞人之一大作手；一代學人王國維，生於激變之時代，從事詞之創作與評賞為時雖短，卻成就突出，於詞中蘊含哲理之思致，在詞的傳統中獨闢蹊徑，可為結舊開新之啓示<sup>2</sup>。

以上所錄，乃葉嘉瑩作為《歷代名家詞新釋輯評叢書》總編而為該套叢書所撰《總序》中的內容，它雖然寫於較晚的2000年，卻是葉嘉瑩多年研究詞學的集中概括論述，體現了她對詞史和詞家一以貫之的見解，錄之於此，也可見葉嘉瑩評論和理論研究階段之軌跡。值得重視的是葉嘉瑩對中國古代詞史發展流變所作的四個階段的概括總結，她認為，縱觀詞史，可知其在千年之中有過「四變」，它們是：「一變」——唐五代詞人所作多為應歌之小令，北宋初歐晏諸公猶承其餘風，雖醞藉幽美，而內涵未豐，柳耆卿流連坊曲，采掇新聲，大作慢詞，開展鋪敘之法，使繁複之景物情事能容納於詞中；「二變」——蘇東坡具超卓之才華，曠逸之襟抱，以詩法入詞，擴展內涵，更新境界；「三變」——周清真才情富豔，精通音律，以辭賦之法作詞，安排鉤勒，敘寫情事，密麗精工；「四變」——王靜安讀康得、叔本華之書，融會西方哲學、美學思想於詞中，以小喻大，思致深邃，開古人未有之境。葉嘉瑩所作的這「四變」總結，是她在充分熟悉把握詞的發展流變基礎上的高度概括，這「四變」的四位代表詞人——柳永、蘇東坡、周邦彥、王國維，正是中國詞史四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流派代表，也是中國詞史上四位極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詞人，他們雖然風格和作品數量不一，成就的側重也不同，但對詞學的貢獻卻都是不可忽視的<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葉嘉瑩特別對詞與詩的同異關係作了透闢的闡述。她指出，詞與詩，

<sup>2</sup> 參見葉嘉瑩、安易編著《王國維詞新釋輯評》之〈總序〉，葉嘉瑩撰，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

<sup>3</sup> 參見《迦陵詩詞稿》繆鉞〈序〉，該書第六頁。

廣義上都屬於詩，但兩者既有同也有異：同者，詩歌創作首要在於其有「情動於中」的感發動機，這種感發既可以得之於「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的大自然之現象，也可以得之於離合悲歡慨時感事的人事界之現象，在此基礎上，還需有能將其「形之於言」的表達能力，然後可將其寫之於詩（詞），這「能感之」與「能寫之」實為詩詞創作所同應具備的重要質素，而對詩詞的評賞，則要對此二種質素作出精密正確的衡量——此二者，詩與詞都具備了，因而也即其相同之處；異者，詩很早就形成了「言志」為主的傳統，且詩題往往已明白提示了詩篇的內容主旨，因而對詩的衡量評賞較多「貌」的方面，詞則不然，開始並沒有「言志」成分，只是詞作者後來無意中留下了心靈感發的幽微活動的痕跡，讓詞具有了一種潛在的感發力，使讀者讀之產生了激勵感發；再者，兩者主要是形式之不同和性質之不同，詞篇幅短小，即便長調，也不能與詩之五七言長古相比，且詞每句字數不同，音律曲折多變，無法有象杜甫〈北征〉的質樸宏偉或白居易〈長恨歌〉的委曲詳盡這樣的作品，然而詞也有詩所不能達到的意境，如馮延巳〈鵲踏枝〉的盤旋頓挫、秦觀〈八六子〉的清麗芊綿，詩在傳統中歷來重視「詩言志」，而詞在文人詞客眼中不過是歌筵酒席之豔曲而已，所寫內容均為傷春怨別、閨閣園亭之類，與詩人抒發胸襟懷抱不可同日而語，但詞也有其特色，它能以其幽微婉約之情景給讀者心魂深處以難言之觸動，從而生髮無窮之感發與聯想，這是詞的一大特質，而到蘇東坡、辛棄疾出現後，以詞之體式抒寫志意襟懷，以詩境入詞而仍具詞之特質，一改詞之狀貌，使詞與詩在文學上獲得了同等地位，這使得詞與詩在不同之中又顯出了相同<sup>4</sup>。

值得重視的是，在中國詞學的發展軌道上，曾發生了詞的體式的演變——即詞在其自身的演化過程中出現了三個階段，也即三種類型：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賦化之詞。歌辭之詞——其下者，固在不免有淺俗柔靡之病，而其佳者則往往能在寫閨閣兒女之詞中具含一種深請遠韻，且時時能引起讀者豐富之感發與聯想；詩化之詞——其下者固在不免有浮率叫囂之病，而其佳者則往往能在天風海濤之曲中蘊含有幽咽怨斷之音，且能於豪邁中見沉鬱，是以雖屬豪放之詞，而仍能具有曲折含蘊之美；賦化之詞——其下者固在不免有堆砌晦澀而內容空乏之病，而其佳者則往往能於勾勒中見渾厚，隱曲中見深思，別有幽微耐人尋味之意致。這是葉嘉瑩對詞的演進所作的分類和命名：第一階段，歌辭之詞，比如溫庭筠和歐陽修的詞，殆純為歌舞而作，繼之慢慢演化，由潛意識流露

<sup>4</sup> 參見《迦陵詩詞稿》「代序」〈學詞自述〉。

心態到顯意識表現情志，便演化成了第二階段的詩化之詞，但它與詩顯然有別，蘇東坡和辛棄疾的詞是這方面的典型，之後是第三階段的賦化之詞，代表者是周邦彥，他的詞表現了詞演化過程中的轉折，並帶動了南宋一批詞人，另外，蘇、周之間還有位柳永，他貢獻獨特，與三種類型都有關係，詞的內容境界和表現形式均開拓了，開了詞的新路子，既影響了蘇東坡也影響了周邦彥。葉嘉瑩指出，這三類不同性質的詞，清代張惠言和近人王國維都未能予以注意和指出，以致張惠言以評賞賦化之詞的觀點評賞歌辭之詞，王國維以評賞歌辭之詞態度評賞賦化之詞，都不免牽強比附、不得門徑之失，而葉嘉瑩不僅注意到了這三大分類，且對其作了精微的論述分辨，顯出了深厚的功力與銳敏的分辨力，這是葉嘉瑩對詞學研究的重要貢獻。不僅如此，她還就這三種類型的型式，以王國維詞為典型，分析了王詞的意蘊特點。她指出，王國維詞兼有了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賦化之詞的多種因素，而又不屬於簡單化的某一類。具體來說，王詞多以短小令詞為主，且富直接的感發，這與歌辭之詞相近，但它又不是無意於抒寫自我情志的應歌之作，而是在顯意識中具有強烈的言志抒情之用心，這就與詩化之詞相近了，然而王氏對自己的情志又並不作直言的敘寫，往往仍藉第一類歌辭之詞所常用的形象與情事來表達，故其性質又仍近於第一類詞而並不完全屬於第二類詞，但從第三類詞的角度言，王氏對自己的情志往往不作直接的敘寫，而常取象喻方式表述，則其便與第三類賦化之詞的有心安排為托喻之作相近了，但實際上又並不完全一致。為此，葉嘉瑩提出，王國維的詞從詞的演進角度說，其所開拓的詞境，或可稱為「哲化之詞」，它是一種超越於現實情事之外、經由沉思默想而將一種人生哲理轉為意象化的寫作方式，其對舊傳統乃是一種大膽的躍進和突破<sup>5</sup>。

從葉嘉瑩整個評論和理論研究的範疇看，都圍繞著中國古典詩詞，其大致範圍包括漢魏六朝詩（古詩十九首、阮籍、陶淵明等）、唐五代詞（溫庭筠、李煜等）、唐宋詩詞（杜甫、李商隱、柳永、蘇東坡、周邦彥、辛棄疾等）、清詞（朱彝尊、張惠言等）及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應該說，這個範圍幾乎囊括了中國古代詩歌史的大部分（除了先秦時代外），且以詞偏重，其涉及面之廣，論述層次之多，提出見解之深，都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sup>5</sup> 參見《王國維詞新釋輯評》第520頁，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

### 三、引進西方理論

其實，葉嘉瑩的接觸西方理論與方法並將其與中國的傳統詩論相結合，對中國傳統詩詞作詮釋，並非她早期有意識為之，而是完全出於偶然的機遇和聯想。六十年代在海外教學時，她爲了更好地把中國詩詞中的感發生命的東西傳達表述出來，在自己的英文水準提高後，也去旁聽了一些西方文論的課程，借了一些西方文論的書來看，這時候，每當遇到西方文論中與中國傳統詩論有相暗合之處，她就往往爲之怦然心喜，而特別在遇到一些主觀、抽象的傳統詩話無法向西方學生直接作富有邏輯性的理論解釋時，偶爾引用一些西方文論，往往倒能收到豁然貫通的效果，這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由此，葉嘉瑩對西方理論和方法產生了興趣，在繼續傳統治學講究詩詞感發生命路子的基礎上，她開始適當地融合西方的理論和方法，這使她的研究又上了一個臺階。

研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使葉嘉瑩對西方文學理論真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爲王國維治學的實踐告訴她，正是由於吸收了西方康得、叔本華（尤其後者）的理論學說，才使王國維的學問達到了博大精深。在閱讀了大量的西方理論著作，涉獵了包括闡釋學、符號學、接受美學、女性主義等多種西方理論學說與方法後，葉嘉瑩感到了自己眼界大開，她發現，西方理論中有不少與中國傳統詩論可相暗合之處，這使她感到十分驚喜，而借用西方文論顯然可以加深對中國傳統詩論的理解和把握，甚至可以獲得心通妙悟之效果，這對她來說無疑是錦上添花，有著極大的欣悅。由此，她便開始自覺地運用西方理論和方法，結合中國傳統詩論，相繼寫出了以西方理論解析中國詞學的系列短文《迦陵隨筆》，以及融合中西文論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論文：〈鐘嶸「詩品」評詩之理論標準及其實踐〉、〈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例說〉、〈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等，還有專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詞學古今談》（與繆鉞合著）、《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等，這些文章和著作立意高遠，視野開拓，體大思精，融會中西古今，確實令人耳目一新。葉嘉瑩在這方面的大膽嘗試與開拓，獲得了很大成功，她爲此感到十分興奮，她爲自己的學術研究道路開了新生面，邁上了新臺階。繆鉞先生對她這方面的開拓性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她對詞的特質作了根本的探討，發前人所未發，是繼《人間詞話》後對中國詞學的又一次



值得重視的開拓，開了一條詞學研究的新路徑。這對葉嘉瑩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她決計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當然，她也同時意識到，不能僅依賴西方理論而缺乏中國古典詩詞的功底和修養，倘如此，則會丟棄根本，產生荒謬，無法達到探索中國古典詩詞奧秘的目的。葉嘉瑩認為，在探索西方理論的同時，必須始終不忘中國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生命的重要性，從而將中國詩詞之美感特質及傳統詩學詞學放到世界文化的現代時空大座標中，尋找其恰當的位置，作出更具有邏輯思辯性的理論說明，為中國詩詞研究的發展作出貢獻。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9 卷，2008 年 7 月  
頁 557-56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49, July 2008  
pp.557-562

## 《現代新詩美學》評介

洪靜芳\*

書 名：《現代新詩美學》

作 者：蕭蕭

出 版 社：爾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年 7 月 20 日初版

蕭蕭在臺灣現代詩史上，無論創作、研究、賞析、評論的量與質，都不容小覷。

2007 年出版的《現代新詩美學》是蕭蕭的第一本書，如果一個人一年能出一本書的話，那也要一百年的時間。放眼古今，在詩領域上，具有創作、評論、教學、編輯等多重身分，積極投入又可以完全稱職者，唯獨蕭蕭，當非過譽。

經過長期觀察臺灣現代詩的發展，蕭蕭對於各類詩的成型、源流、特色等無不洞悉，近年來他似乎特別著力於對現代詩評論，並深入探索臺灣現代詩的美學特質。在 2004 年，蕭蕭已出版了《臺灣新詩美學》，書中從入世精神、出世情懷；儒家美學、佛家美學；現實主義美學、超現實主義美學……等等各個面向，以二元論述的書寫方式探索臺灣新詩的美學和歷史，呈現臺灣詩壇的多元風貌。而《現代新詩美學》無疑是《臺灣新詩美學》之後的一本「續集」。在《臺灣新詩美學》，蕭蕭提出臺灣現代詩史上的共構現象：《現代

---

\*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國文學群講師

新詩美學》則提出共構後的交疊現象；二書「共構交疊」，實應視為一體，方能窺蕭蕭新詩美學觀點之全貌。

## 一、以「史」為出發點，提出共構交疊的理論

「共構」及「交疊」是這兩本書之「眼」，也是蕭蕭新詩美學的核心。基本上蕭蕭是循著臺灣歷史的軌跡——「一個累積式的移民社會」中的種種現象，歸納出斷裂與鍛接的歷史脈絡：

斷裂的事實，鍛接的必然，是新詩美學的歷史脈絡，臺灣文化的多元現象也因此在新詩創作中顯露無遺<sup>1</sup>。

這個理論的體系，可以說是觀察臺灣詩史，所歸納出來的架構。而最為精采的部份，就在本書緒言中的最後一節：含籠「共構」與「交疊」的新詩美學。

在臺灣的現代詩史上，早在 1970 年陳千武提出的「兩個根球」，指出臺灣現代詩的兩股源頭後，不斷被引用，幾已成定論<sup>2</sup>。作者在這樣的基礎上，再以「X」字型、「Y」字型具象說明歷史紋路，更令人一目了然：

一般論述臺灣新文學源流，大都會以 Y 字型來說明歷史的紋路。Y 字型所顯示的是兩個源流匯整為一條大河……如果以 X 字型來論述臺灣詩學，或許更能符合文學史發展的實際情況。「V」字型的上端仍代表文學源流，來自不同的兩個根球，反「V」字型的下端則顯示 1949 年以後文學的發展，仍顯示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或者說「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鄉土派」與「現代派」）兩股力量的較勁，我們稱之為美學上的「共構關係」。但真正令人讚嘆微波的，則是

---

<sup>1</sup> 見《臺灣新詩美學》，頁 8。

<sup>2</sup> 收錄於鄭炯明編《臺灣精神的崛起——笠詩論選集》，頁 451-452，〈臺灣現代詩的歷史和詩人們〉：「一般認為促進直接性開花的根球的源流是紀弦、覃子豪從中國大陸搬來的戴望舒、李金髮等所提倡的『現代派』……另一源流就是臺灣過去在日本殖民時代，透過曾受日本文壇影響下的矢野峰人、西川滿等所實踐了的近代新詩精神……。」

「V」字型或反「V」字型所開展出來的兩大斜線之間的大範疇，可以交疊又交疊，交錯又交錯，交融又交融，新詩美學，華彩光影，全在其中<sup>3</sup>。

## 二、深入淺出的說理

不搬弄佶屈聱牙的術語，羅列艱澀的理論，本書行文之流暢，實在清新可喜，究其因素，除作者的詩人才情，也在作者擅用比喻以說理論，並多援具代表性詩人證理。

在提到「浪漫主義」的永恆價值，作者言：

浪漫主義不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浪潮，而是文學火鍋裡的湯底，文學浪潮裡永遠不可或缺的鼓盪的海水<sup>4</sup>。

在評論白萩時，作者言：

現代主義者白萩，在大張現實主義旗幟的《笠》詩社天空，正是一隻單飛的孤雁<sup>5</sup>。

這樣的比喻俯拾即是，比諸其他詩論之枯淡，著實令人驚喜。

為更明白證明現代詩的「交疊」現象，作者也一一列舉了具代表性的詩人為例，如本書第二章：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疊美學，便以張秀亞、紀弦、席慕蓉為佐證客體；在第三章：孤獨的美：現代主義裡的古典文學情愫，則以鄭愁予為範式。這樣的行文方式，令讀者很快明白本章節之旨趣。順帶一提，在佐證詩人論述中，作者往往為代表詩人標上一個副標題，如「紀弦：英雄式的浪漫主義詩翁」、「席慕蓉：情境化的浪漫主義詩精靈」；或舉白萩為「閉鎖式現代主義代表」、洛夫為「放逸型現代主義代表」……，其適妥之程度，幾乎也令讀者叫絕。

---

<sup>3</sup> 見《現代新詩美學》，頁 22。

<sup>4</sup> 見《現代新詩美學》，頁 29。

<sup>5</sup> 見《現代新詩美學》，頁 194。

### 三、標舉浪漫主義並不曾消失的現象

本書名為《現代新詩美學》，乍看本書通篇以現代主義作為論述脈絡的框架，但作者卻處處舉例點明浪漫主義「如影隨形」的存在：

臺灣新詩美學的建構中，從來沒有人指稱或標舉「浪漫主義這面旗幟」，但是，浪漫主義的精神傾向與思想內涵，卻一直貫串在新詩的創作裡。可以說，臺灣新詩壇雖然沒有浪漫主義之名，卻有浪漫主義之實<sup>6</sup>。

這一段話說出了臺灣現代詩壇的實際情況，現代主義雖說主宰著整個臺灣現代詩壇，其中卻不乏如席慕蓉以「浪漫之姿」屹立詩壇者。從民國 42 年（1953）以降，在「橫的移植」集體催眠似的口號中，幾乎沒人「正眼」看過浪漫主義吧！但一般而言，我們都大抵同意，浪漫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學思潮，作為一種文學基本的創作精神，它是不會消失的，只不過在「現代主義」的時代精神中，本就是為「反浪漫主義」而來，自然忽略了二者和諧共存的事實。

### 四、圖象詩的探討

本書共有七個章節，分別是：

- 第一章 緒言：共構後的交疊現象
- 第二章 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疊美學
- 第三章 孤獨美學：現代主義裡的古典文學情愫
- 第四章 閉鎖式的現代主義
- 第五章 放逸型的現代主義
- 第六章 生靈觀照與心靈關照的交疊美學
- 第七章 圖象詩：多種交疊的文類

一直以來，圖象詩從未被重視，在遊戲之作的刻板印象下，很難登詩壇顯要位置。

---

<sup>6</sup> 見《現代新詩美學》，頁 33。

蕭蕭在此獨立用了一個章節探討圖象詩，論述的方式與前面幾個章節，舉代表性詩人為證的方式顯然不同。本章共分為四個小節：緒論：圖象詩的邊界特質、臺灣圖象詩的基本類型、臺灣圖象詩的裝置藝術、結語：圖象詩的未來趨勢。

蕭蕭在這裡詳實地探討圖象詩的發展，以見證臺灣新詩史中「交疊美學」的活絡，自是其見人未見的獨到眼光。尤見結語四段：一、圖象詩助長現代主義（派）蓬勃；二、圖象詩激發後現代主義鬥志；三、圖象詩蹲下去潛入新詩裡；四、圖象詩站起來舞向數位詩。可以看出作者對圖象詩的重視，在為圖象詩推究根源時，更以為圖象詩為數位詩之先驅，並為數位詩奠下良好的基礎，這些觀點不難看出作者特厚圖象詩的理由及期待了。

## 五、結語

淺陋如我若要對本書作過份責備求全的要求，則只能在名詞的定義上吹毛求疵了。首先，筆者對「美學」之被廣泛使用，感到困惑。放眼學術界，「美學」一詞被用得太空，卻很少被嚴格界定。我以為作為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是可以關注這個小問題。

另外，蕭蕭在本書第一章中說：「本書繼《臺灣新詩美學》確立共構關係之後，試圖抽絲剝繭，指陳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的緣由，論述這種新詩交疊之美。」可見這兩本書無論在讀者看來或作者心目中都是互相印證的。《臺灣新詩美學》毫無疑問是指在「臺灣」這個時空所觀察的新詩美學現象；但「現代」或「現代主義」卻是臺灣詩史上最有爭議的一個詞彙，《現代新詩美學》明舉「現代」為書名，行文無疑是以「現代主義」為架構之框架，但所謂「現代新詩美學」究指「現代主義的新詩美學」或「現代的新詩美學」？又「現代詩」、「新詩」在作者的概念中，是相同的？不同的？或也是「交疊」的？「共構」的？作者以「現代新詩美學」為書名，是否別有用意<sup>7</sup>？當然，關於這點，聰慧的讀者應該在字裡行間看出端倪，那也就不構成問題了。

其實自民國初年，當第一批現代詩人如胡適等人開始創作語體的白話詩至今，詩學、詩美學之類的詩論並不少，但讀來總覺是拿固定的鞋型來套自己的腳，讀了蕭蕭的《臺灣新詩美學》、《現代新詩美學》，才發現可能我們都太輕忽了臺灣文化錯綜複雜的歷史背

<sup>7</sup> 作者若將此書命名為「臺灣新詩美學續篇」，或「臺灣新詩美學—現代篇」之類，是否更通俗明確？

景<sup>8</sup>，這兩本書可以說是蕭蕭長期觀察臺灣詩壇，並累積多種經驗所建構的理論系統，讓我們得以回頭檢視真正屬於臺灣自己的現代主義進程，也是真正以臺灣為主體的一本臺灣新詩理論的專書。

## 參考書目

1. 楊宗翰，《臺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2年6月初版。
2. 孟樊，《臺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
3. 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7月。
4. 蕭蕭，《臺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出版社，2004年2月10日初版。
5. 蕭蕭，《現代新詩美學》，臺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7月20日初版。

---

<sup>8</sup> 一般學者多認為蕭蕭是以中國傳統詩學做現代詩批評，此固然以其熟稔中國古典詩背景有關，又或者以「史」角度而言，古典詩和臺灣現代詩有著不可否認的、實際上的、「縱」的繼承關聯。關於此點2002年陳政彥的學位論文《蕭蕭詩學研究》做了討論。



## 學術活動報導

# 秦阿房宮遺址考古新發現與新思索 ——意料之外考古發現的科學啓迪

李毓芳\*

阿房宮遺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趙家堡、聚家莊一帶，地處西安市以西 13 公里。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地方文物管理部門根據「鑽探得知，遺址分佈的範圍是：北到三橋鎮以南，東至灃惠支渠，南到和平村，西至長安縣紀陽寨。」劃定了包括「秦始皇上天臺」、「磁石門」、「烽火臺」遺址在內的秦阿房宮「遺址面積達 6 平方公里，保護區面積 10 餘平方公里<sup>1</sup>。」近年來，西安市及其郊區基本建設迅猛發展，爲了確保秦阿房宮遺址的文物安全，進一步究明秦阿房宮遺址確切範圍及四至是至關重要的。爲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於 2002 年 10 月組建了阿房宮考古工作隊，開展了阿房宮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2002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1 月，阿房宮考古工作隊相繼調查、勘探、試掘和發掘了阿房宮前殿遺址及傳說中的阿房宮「秦始皇上天臺」遺址、「烽火臺」遺址、「磁石門」遺址等。

秦阿房宮遺址北臨渭水，與秦咸陽城遺址隔渭河南北相望。文獻記載秦阿房宮前殿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阿房宮考古工作隊領隊

<sup>1</sup> 西安市文物局文物處、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秦阿房宮遺址考古調查報告》，《文博》1998 年第 1 期，西安。

建於秦都咸陽上林苑之中<sup>2</sup>，秦亡之後這裏又為西漢上林苑所在地<sup>3</sup>。2002年10月至2004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秦阿房宮遺址進行了大規模考古勘探、試掘和發掘，其中勘探面積35萬平方米，試掘和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根據考古勘探、試掘資料，阿房宮前殿夯土基址東西1270米、南北426米，從秦代地面算起，現存前殿遺址夯土台基最高12米。在前殿基址北部邊緣，考古發現寬6~15米的北牆基址，北牆基址南側發現大量秦代瓦片堆積，這應屬於原來北牆及北牆南廊頂部的覆瓦遺存。在這些秦代板瓦與筒瓦上，發現有「左」、「左司」、「左宮」、「右」、「右宮」、「北司」、「大匠」、「大匠乙」、「大匠昌」、「大左」、「五工左」、「少左」等常見的陶文。考古調查瞭解到，在前殿基址東西兩邊，原來有夯築土牆，在土牆附近亦有瓦片堆積，現在這些地方已被現代村莊建築所覆蓋或破壞。推測上述前殿基址東西兩邊的牆跡有可能是文獻記載中的「阿城」東牆和西牆，連同已經考古發現的前殿基址北牆，恰為文獻記載的「阿城」三面之城牆<sup>4</sup>。前殿遺址的考古勘探、發掘證實，在前殿遺址的表土層之下為擾土層，其下為漢代至宋代的堆積層，再下即為前殿基址。前殿基址面上沒有發現秦漢宮殿建築遺址經常出現的磚瓦、瓦當等建築構件遺物堆積，也未發現與宮殿建築相關的牆體、壁柱、礎石、散水、地面、窖穴、給排水設施等遺跡。據此，推斷秦阿房宮前殿遺址沒有建成，僅僅建設了前殿的夯土基址工程。在阿房宮前殿遺址的考古勘探、試掘、發掘中，在漢文化層之下與前殿夯土基址之間也未發現「火燒」痕跡<sup>5</sup>。

在過去劃定的秦阿房宮遺址中，還有「秦始皇上天臺」遺址、「阿房宮磁石門」遺址、「阿房宮烽火臺」遺址等，近年來對此也進行了考古工作。

「秦始皇上天臺」遺址位於秦阿房宮前殿遺址以東500米，遺址之上現存高大夯築土台，高15.2米，上下分為三層。夯築高臺遺址東西111米、南北74米。在該遺址北

<sup>2</sup>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sup>3</sup> 《漢書·東方朔傳》：「舉籍阿城以南，周至以東，宜春宜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文選》卷八揚雄《羽獵賦序》雲：「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禦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三輔黃圖》記載：「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

<sup>4</sup> 宋敏求《長安志》：「秦阿房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二十裏，西、北、東三面有牆，南面無牆。」

<sup>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阿房宮工作考古隊：《阿房宮前殿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考古學報》2005年第2期。

30 米，有一與高臺及其遺址時代相同的大型建築遺址，其範圍東西 240 米、南北 118～148 米。從「秦始皇上天臺」及其北部建築遺址出土遺物判定，它們的時代應為戰國時代中晚期至西漢時代<sup>6</sup>。

阿房宮前殿遺址東北 2000 米的「磁石門」遺址，經過考古勘探、試掘發現，這是一座高臺建築遺址，現存夯築基址南北 57.5 米、東西 48.3 米，夯土厚 3.7 米；建築台基現存南北 45 米、東西 26.6 米，高出今地表 1.5～2.4 米。該建築遺址沒有發現門道及其及闈址相關的遺跡，它不是一座「門址」。遺址之內出土了戰國時代至西漢時期的板瓦、筒瓦和瓦當等遺物，其時代屬於戰國中晚期<sup>7</sup>，該遺址的始建年代要早於秦代末年的阿房宮前殿基址，從遺址時代與建築形制兩方面來說，將其認定為阿房宮北宮門建築都是不能成立的。

《水經注·渭水》卷八記載：「鎬水北逕漢靈台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止，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鐵兵器的普及使用在西漢時代中期<sup>8</sup>，秦代鐵兵器極少，以秦始皇兵馬俑坑一號坑已考古發現的兵器為例：共出土青銅兵器劍、鉞、戟、戈、矛、金鈎、弩機等 486 件，成束的銅鏃 280 束，零散的銅鏃 10895 件，而出土的鐵兵器只有鐵矛 1 件、鐵鏃 1 件、鐵鋌銅鏃 2 件<sup>9</sup>。就鐵鏃而言，其不及銅鏃的十萬分之一，短兵器中的鐵兵器僅及青銅兵器的 0.25%。磁石只能對鐵兵器發揮作用，至於銅兵器就起不了作用了。那麼「磁石門」的修築顯然當時是「無的放矢」了！

阿房宮前殿遺址西南 1200 米的「烽火臺」遺址，經考古勘探、試掘，這也是一座高臺建築遺址，現存台基東西 73.5 米、南北 48.7 米，夯土厚 3.6 米。遺址之中發現一些迴廊、柱礎石等遺跡，出土了戰國秦漢時期的磚瓦等遺物，據此判斷該遺址建於戰國時代中晚期，使用至西漢時代<sup>10</sup>。將該遺址說成「秦阿房宮」的「烽火臺」遺址，顯然是不

<sup>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阿房宮考古隊：《上林苑四號建築遺址的勘探和發掘》，《考古學報》2007 年第 3 期。

<sup>7</sup> 李毓芳等：《近年來阿房宮遺址的考古收穫》，《中國文物報》2008 年 1 月 4 日第 7 版。

<sup>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武庫》，文物出版社，2005 年，北京。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第 315～316 頁，大象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 1 版，鄭州。

<sup>9</sup>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上），第 249 頁，文物出版社，1988 年。

<sup>1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阿房宮考古工作隊：《西安市上林苑遺址一、二

能成立的。正如上述考古資料所揭示的那樣，這個遺址應始建於戰國時代，遺址的建築性質應為戰國時代流行的高臺建築，與「烽火臺」建築形制完全不同。「烽火臺」（即文獻中的「亭燧」、「烽燧」等）一般屬於邊防設施，目前多發現於西北地區<sup>11</sup>。在中國古代都城及宮城之中或附近，至今還沒有發現過「烽火臺」設施。

上述「秦始皇上天臺」、「磁石門」、「烽火臺」三處建築遺址，其營建時代均為戰國時代中晚期，早於秦代末年修建的阿房宮前殿，不屬於阿房宮的附屬建築。至於這些建築遺址的性質，應為戰國秦漢時代流行的高臺建築遺址。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 212 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即阿房宮）渭南上林苑中。」上林苑修建於戰國時代中晚期，是秦國都城咸陽城附近的「國家公園」。上述阿房宮遺址保護範圍之中所謂的阿房宮「秦始皇上天臺」、「磁石門」、「烽火臺」等遺址，實際就是「渭南上林苑」中的一部分建築遺址，它們大多沿用至西漢時代，又成為漢上林苑中的建築。

幾年來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說明，當年的阿房宮前殿建築只構築了規模龐大的建築基址，地面之上的主體建築並未實施。也正因為當年阿房宮前殿僅僅營築的是前殿基址，所以「火燒阿房宮」也就無從談起，「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杜牧〈阿房宮賦〉）自然也就無處可尋了！在秦阿房宮前殿遺址秦代文化層中所取土樣進行植矽石分析，其資料也說明，這裏根本沒有發生被火燒遺存。至於現在還有的學者提出，「前殿阿房」雖未建成，但是「阿房宮」及其附屬宮室還是有的。其實這種推斷、假設，是不符合中國古代都城建設規律的。因為中國古代都城建設，一般是宮城先於郭城建設，宮城之中大朝正殿先於其他宮室建設。

關於阿房宮遺址考古發現所做出的結論，即阿房宮前殿沒建成，阿房宮更無從談起，至於「火燒阿房宮」之說也是子虛烏有。這在社會上、學術界均引起巨大反響。有人說這與古代文獻記載是不一致的，其實嚴肅的歷史學著作對此記載是十分清楚的，如司馬遷在其《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明確指出：「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名名之。」在秦帝國覆滅前夕，秦二世為了恢復因修建秦始皇陵而停工的阿房宮前殿工程，在秦王朝最高統治集團之中存在著嚴重分歧，丞相去疾、李斯和將軍馮劫因主張停建阿房宮前殿工程，

---

號建築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2期。

<sup>11</sup> 吳乃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或喪命、或成爲階下囚。阿房宮前殿工程雖然恢復了，但是很快秦帝國就滅亡了，阿房宮前殿也就成爲一個沒有完成的工程。因此，班固《漢書·五行志》記載：秦二世「復起阿房，未成而亡。」

既然歷史文獻關於阿房宮問題有著明確的記載，那麼爲什麼長期以來人們還是認爲阿房宮被項羽燒毀了？我想由於秦始皇大興土木的暴政繁刑，導致了強大秦帝國的迅速滅亡。秦始皇大興土木專案很多，在後人看來阿房宮是其中最爲典型的事例之一，在人們的觀念中，阿房宮前殿建築越恢弘，給百姓造成的痛苦越深重，使社會的矛盾越激化，留給後人的歷史教訓越深刻。歷史學家對秦帝國、秦始皇的歷史判斷是正確的，但是在歷史資料的使用上，不能因爲結論的判斷正確而忽視歷史資料自身的科學性、真實性；更不能爲了強化結論的說服力，而使用「放大的」甚或「誇大的」歷史資料。阿房宮前殿規模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在西漢政治家賈山向漢文帝「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時，就變成了秦始皇「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sup>12</sup>。」到了魏晉時期的《三輔黃圖》中的阿房宮，已是「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再到了唐代大文學家杜牧《阿房宮賦》中的阿房宮，更成爲了「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連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漫迴，詹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賈山對阿房宮的描述，是要說秦始皇「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以至於「一夫大諱、天下嚮應，」強大的秦王朝迅即土崩瓦解。杜牧的《阿房宮賦》在於通過對秦王朝與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宮之渲染，說明這樣一個道理：「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而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希望唐代的統治者能夠吸取秦王朝的滅亡教訓！

但是作爲歷史科學研究，關於阿房宮的規模以及是否被火燒，則應該尊重歷史事實，

---

<sup>12</sup> 《漢書·賈山傳》卷五十一。

並及時吸收新的科學研究成果，糾正各種不全面、不準確的東西，還歷史以原貌，恢復我們真實的、科學的「歷史記憶」。

作為我自己意料之外的阿房宮遺址重大考古發現，使我們得到深刻的科學啓迪：對於歷史事件本身，歷史學家、文化人等既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對於歷史人物的缺點與優點，同樣人們也不能誇大或縮小。歷史學是科學，尊重事實是科學的基本要求，也是歷史學作為科學的靈魂！考古學是實證科學，當今歷史學研究在考古新資料的不斷發現中、多學科結合新方法的不斷應用中、學科理論的不斷創新中，歷史學自身是在不斷地糾正不正確、不準確的「人類記憶」判斷中發展。作為近代科學發展出來的考古學，是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識、“記憶”的科學，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使這種對歷史的「認識」與「記憶」都產生了全新的飛躍，使「歷史學」越來越成為真實的、科學的「學問」。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中文撰稿格式

- 一、全文請用橫式（由左至右）書寫。
- 二、字體：採新細明體，12 級字。英文、數字採 Time New Romans。
- 三、章節標題序號：依序採下列編次符號：一、（一）、1、（1）、a（a）……等。
- 四、符號：1.標點採新式全形符號，。：；！？，破折號爲—。圖書、期刊、報紙、劇本、學位論文名採《 》；論文、篇名、詩篇名採〈 〉。在行文中，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例《莊子·天下篇》。英文書名採斜體，篇名採“ ”。
- 五、引文：獨立引文時，每行低三格，上下不空行，採標楷體，12 級字。正文內之引文加「 」；引文內別有引文採『 』；引文之原文有誤時，應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而必須標明時，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若需特別引用外文，請依中文方式處理。
- 六、附註：採細明體，10 級字，置於該頁下方。註碼採阿拉伯數字，隨文標示，解釋名詞，置於該名詞之後；註解整句，置於句尾標點符號前；獨立引文，置於標點之後。徵引書目格式如下：
  - （一）首次徵引之範式：
    1. 專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月），頁碼。
    2. 論文集：作者，〈論文名〉，收於《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月），該文起訖頁碼。
    3.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西元年月），頁碼。
    4. 學位論文：作者，《學位論文名》（學校系所名稱，學位名稱，西元年月），頁碼。
    5. 報紙文章：作者，〈篇名〉，《報紙名》版次（或副刊、專刊名稱），西元年月日。

(二) 再次徵引之範式：

1. 再次徵引的注如不接續時：作者，書名或篇名，頁碼。
2. 同出處連續出現在同頁時：同上注，或同上注，頁碼。

(三) 多次徵引之範式：如論文中多次徵引同一本書之材料，可不必加注，而於引文下改用括號注明卷數、篇章名或章節等。

七、數字：

1. 世紀、年、月、日，及部、冊、卷、期等，用阿拉伯數字。
2. 屆、次、項等用中文數字，如第二屆、三項決議。

八、圖表：

1. 投稿者所附之照片、圖表須於縮版印刷後仍清晰可辨。
2. 圖、表均須編號，如「圖 1」、「表 1」，並加標題，相關說明文字則置於圖、表之下。

六、參考書目：

1. 請依出版時間先後順序，分類著錄。
2. 專書著錄之範式：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月，版次。
3. 期刊著錄之範式：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西元年月。
4. 網頁資料請另立一類，並請加註網站位址及流覽日期。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外文撰稿格式

### English Style Guide

Articles are written in font Times New Roman in font size 12.

Numbering for titles follows the system 1, 1.1, 1.1.1, 1.2, etc.

English punctuation marks should be used and authors should follow the style guide for poetry, drama and other literary documents according to MHRA, MLA or APA.

For quotations the first line should be indented, but font size 12 should be used. Double quotation marks should be used for quotations whereas single quotation marks are used within quotes. [sic] is used for mistakes in the original and ... is used for omissions.

Footnotes use font Times New Roman in font size 10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Arabic numbers are used for footnotes and are placed after the word or passage they aim to explain.

Sources are listed alphabetically on last name of the author. With several publications by one author put the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first and move back in time. Below are some examples of MLA citations for your reference.

**Book:**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Example: Stephens, John.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2.

**Book (Anthology or edited collection):** Last Name of Editor, First Name, ed. Title of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Example: Hunt, Peter, ed.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sup>nd</sup> edition,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A chapter in an edited collection/anthology:**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chapter." Title of the book. Ed. Editor's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Page Numbers.

Example: Reimer, Mavis and Clare Bradford. "Home, Homelessness, and Liminal Spaces: The Uses of Postcolonial Theory for Reading (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s." Children's Literature Global and Lo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Eds. Emer O'Sullivan, Kimberley Reynolds and Rolf Romøren, Oslo: Novus Press, 2005. 200-217

**Entries and chapters in encyclopedias & dictionaries:**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entry or chapter." Ed. Editor's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Title of the Encyclopedia or Dictionary.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Page Numbers.

Example: Wilkie-Stibbs, Christine.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child reader." Ed. Peter Hunt,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79-190.

**A journal article continuous pagination:**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 Number (Date of Publication): Page Numbers.

Example: Harker, Jaime. "Contemporary Japanese Fiction & 'Middlebrow'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Case of Banana Yoshimoto's 'Kitchen'." The Translator 5 (1999): 27-44.

**A journal article discrete pagination:**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Date of Publication): Page Numbers.

Example: Desmet, Mieke K.T. "De vier dochters van Dr. March. Een klassiek Amerikaans meisjesboek in een Nederlands jasje." Neerlandica Extra Muros 43.2 (2005): 20-27.

**Newspaper article:**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article." Newspaper Title Date: edition, section: page number(s).

Example: Chang, Yun-Ping. "Students should begin English in grade three." Taipei Times 17 February 2004: 8.

**Television or radio program:** Author or Presenter (if important) “Title of the episode or segment” Title of the Program. Name of the Network. Call letters and city of the local station (if any). Broadcast date.

Example of radio program: Lawson, Mark presenter “Peter Pan in Scarlet.” Front Row. BBC Radio 4. 5 October 2006.

Example of TV program: “Grass Roots: Gone Rural, Swaziland.” The World Challenge 2006. BBC World. 7 October 2006.

**Sound Recording:** Artist’s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Recording. The Manufacturer, Year of Issue.

Example: Midler, Bette. Experience the Divine: Bette Midler Greatest Hits. Atlantic Recording Corporation, 1993.

Example of reference to a song: Mitchell, Joni. “Both Sides Now.” Dreamland. WEA International Inc., 2004.

**A Film or Video Recording:** Title of the Movie. Director’s name. Distributor, Year.

Example: Modern Times. Dir. Charles Chaplin. United Artists, 1936.

**Internet sources:** Last Name of Author,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about print publication (if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electronic publication. Acces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bout print publica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Date. Information about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itle of the site. The date or latest update date. Organization that sponsors the site.

Access information: Date of access. <URL>

Example: Ardagh, Philip. “Return to Neverland.” Books Review. 7 October 2006. Guardian Unlimited 2006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7 October 2006. <<http://books.guardian.co.uk/review/story/0,,1888592,00.html>>

**Work from Library of Personal Subscription Service:** Author’s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article.” Print Publication. Name of Database. Name of Library or library system. Date of Access. <URL>

Example: Fox, Geoff, ed. "The Silence of the Critics: A Symposium."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 29 (1998): 1-18. EBSCO: MLA Database. Tung Hai University. 7 October 2006. <<http://web.ebscohost.com/ehost/pdf?vid=8&hid=109&sid=8086750d-9c10-4950-b292-194a1f7468a6%40sessionmgr103>>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日本語論文執筆要綱

0. 本日本語執筆要綱は本学報の「中文撰寫格式」(中国語論文執筆要綱)に基づき、一部、日本語論文の習慣により改めた。このほ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9巻徵稿啓事」第三項、第四項も参照すること。
1. 本文はワードによって作成し、横書き(左から右)にすること。
2. 字体：論文名はMS Gothic(フォント12)、本文はMS Mincho(フォント10)、脚注はMS Mincho(フォント9)とする。
3. 章節：章節の分け方は特に定めない。
4. 句読点符号：句点には、(全角カンマ)を用い、読点に。(全角句点)を用いることとする。図書、紀要、論文集、新聞、台本、学位論文には『 』(二重かぎカッコ)を用い、論文、篇名、詩篇には「 」(かぎカッコ)を用いる。英語書名は斜字体を用い、篇名は“ ”(二重引用符)を用いる。
5. 引用：本文とは別に長文を引用する場合、引用文の上下を一行空け、引用文は2字分、本文より下げる。本文中に引用する場合「 」(かぎカッコ)を用い、引用文内に更に引用がある場合は『 』(二重かぎカッコ)を用いる。引用文に間違いがある場合は、振り仮名でママと記す。引用文の途中を省略する場合は、……(三点リーダを二つ)で記す。また、引用の出典は、山田(1976:234-235)のように、姓(西暦による出版年:ページ数)を記すか、或いは山田太郎(1976:234-235)のようにフルネームを記してもいい。正式な書名、論文名などは参考書目として、本文の後に載せる。
6. 注釈：注釈はMS Mincho(フォント9)を用い、ワードの自動編集で脚注を用いる。
7. 数字：西暦、年、月、日及び、冊、巻、期、シンポジウム、学会などの開催回数などはアラビア数字を用いる。

8. 図表：

- (1) 写真，図表などを載せる場合は縮約しても、鮮明なものを選ぶ。
- (2) 写真，図表には左上に「写真1」，「図1」，「表1」など通し番号をつけ，説明は写真，図表の下に書く。

9. 引用文献：

- (1) 書籍，論文，ウェブ資料の順に分けて挙げる。また，日本語以外に引用文献がある場合は，日本語，中国語，欧文，その他の言語の順に並べる。
- (2) 出版日時により古いものから順次配列する。同一著者の著作を複数用いている場合は，その著者のもっとも古い著作の次に，他年度に執筆された著作を並べてもいい。同一年に，2つ以上の著作がある場合は，出版年の後に a，b，c など小文字アルファベットを用いる。
- (3) 専門書：作者，西暦年月，『書名』，出版地（都市）：出版者，版次の順に記す。
- (4) 論文：作者，西暦年月，「論文名」，『図書，論文集の名称』巻。
- (5) ウェブ上の資料は別に項目を立て、ネットアドレスと検索日を記すこと。

## 【更正啓事】

1. 本刊第 48 卷編輯委員會，校內委員戴絲美（外文系）、翁育瑄（歷史系）、何淑靜（哲學系）、蕭幸君（日文系），誤植第 47 卷委員，特此更正。
2. 本刊第 48 卷頁 565 柳瀨善治〈松尾慎《台湾における言語選択と言語意識の実態》〉，行 4「書名」原空白，應補「《台湾における言語選択と言語意識の実態》」。行 5「作者」柳瀨善治應更正為「松尾慎」。行 6「出版者」原空白，應補「群學出版社」。行 7「出版時間」原空白，應補「2006 年」。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8 卷編輯委員會